二〇〇八年度香港書獎
《亞洲週刊》二〇〇八十大好書
香港書展二〇〇九「名家推介」新書

墓碑

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上篇

楊繼繩 著



第7版（修訂本）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二〇〇八年度香港書獎
《亞洲週刊》二〇〇八十大好書
香港書展二〇〇九「名家推介」新書

楊繼繩 著

墓碑

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上篇



第7版（修訂本）

目录

墓　　碑

永久的墓碑（代前言）

（一）

（二）

（三）

第一章　祸起中原

一、信阳事件

二、“潘、杨、王”事件

三、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旗帜

四、至少饿死三百万

第二章　甘肃不甘

一、用政治高压制造假话

二、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

三、“共产风”一波高一波

四、荒唐的引洮工程

五、全省普遍大饥荒

六、通渭问题

七、对甘肃问题的处理和余波

第三章　天府饥魂

一、皇恩浩荡　幸福无边

二、“三面红旗”鼓狂飙

三、李井泉狠开“顶风船”

四、四川省饥饿的时间最长

五、只准讲“疫情”，不能说饥饿

六、“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七、吃青、刑罚、扣饭

八、一股救命的潜流

九、反右倾加剧了饥荒

十、四川饿死多少人？

第四章　安徽不安

一、说凤阳，道凤阳

二、无为风波

三、亳县的惨剧

四、跳出三县看安徽

四、“救命田”救了农民

五、安徽饿死多少人？

第五章 粮仓里的饿号

一、沉重的征购任务

二、“五风”也渡山海关

三、守着粮库饿死人

四、吴德小心翼翼地“踩钢丝”

第六章　富饶的饥馑

一、江渭清奉命行事

二、这里“五风”也成灾

三、干部横行乡里

四、粮食短缺　物资匮乏

五、江苏也有人吃人

六、政策放宽　形势好转

第七章　岭南风云

一、广东创造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二、罗定事件

三、高要闹剧

四、南雄之灾

五、宋庆龄老家的饥荒

六、江门市郊的哀嚎

七、中山县的“十多八少”

八、宝安无宝

九、顺德不顺

十、来自合浦的报告

十一、逃港狂潮

第八章　齐鲁之难

一、批判赵健民，大反右倾

二、毛泽东、刘少奇给山东鼓劲

三、山东的“五风”有特色

四、山东省粮食产量和征购

五、馆陶事件

六、济宁事件

七、全省大饥荒

八、舒同丢官

第九章　浙江之折

一、从农民口中夺粮

二、江华紧跟毛泽东

三、鱼米之乡的饿殍

四、炉头生产大队：从丰足到饥荒

五、富裕路桥镇的昔日

第十章　大饥荒中的云南

一、从刀耕火种到共产主义

二、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三、农业、工业齐跃进

四、陆良事件——“大跃进”中较早暴露的饿死人事

件

五、“免疫力”难抗反右倾

六、边民外逃

七、骚乱和暴动

八、退回去就有生路

第十一章　燕赵悲歌

一、徐水闹剧

二、闹剧不只发生在徐水

三、大跃进　大跃退　大破坏

四、河北创造了开“吃饭大会”的经验

五、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前奏

六、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附记

第十二章　黑色的贵州

一、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二、贵州办食堂的经验“全国仿行，不

要例外”

三、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

第十三章　各省饥荒纵览

一、十二省以外情况

二、各省饥荒程度轻重不同

三、饥荒轻重不同的原因

第十四章　大饥荒年间的城市生活

一、城镇的粮食供应

二、城市和农村有一个时差

三、靠国家粮食定量生活的城市居民

四、高级干部特需供应

五、几类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

六、关于“毛泽东不吃肉”

下篇（综合篇）

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

一、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二、苏联撕毁合同不是大饥荒的原因

三、偿还苏联债务也不会产生大饥荒

第十六章　大饥荒的祸根是这样酿成的

一、把革命和建设搞得快一点

二、周恩来带头反“冒进”

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四、南宁会议：毛泽东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

五、成都会议：总路线已有雏形

六、八大二次会议：总路线终于形成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一、毛泽东掀起农业集体化高潮

二、从仙居事件到社会主义教育

三、“人民公社好”

四、从共产主义退回社会主义

五、城市人民公社

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

一、消灭家庭

二、大办食堂过使农民家徒四壁

三、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四、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五、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第十九章　“五风”肆虐

一、“共产风”留下历史的笑柄

二、“浮夸风”使人疯狂

三、瞎指挥搞乱经济

四、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了风

六、“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七、“五风”屡禁不止

第二十章　执政者对危机的反应

一、纠偏只有八个

月，庐山会议一风吹

二、毛泽东独自“唱低调”，别人还得唱高调

三、所有制上退让，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四、搞退赔，仅是纸上文章

五、扩大农民自由，但执行中遇到意识形态障碍

六、实行责任田，仅是暂时措施

七、下放城镇职工，减小粮食压力

八、整风整社，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

九、几个重大错误一直坚持到底

第二十一章　庐山之变

一、神仙会暗藏杀机

二、彭德怀为民请命

三、毛泽东翻脸倒乾坤

四、大臣们机变求

自保

五、常委们昧心陷忠良

六、反右倾烈火烧神州

第二十二章 粮食问题

一、 统购统销以前的粮食情况

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基本没吃饱过

三、“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四、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五、残酷的高征购

六、粮食部的喜讯，农民的眼泪

七、压农村，保城市

八、大饥荒年代的代食品运动

九、农民的热量平衡

第二十三章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一、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结果

二、用各省官方数

据计算的结果

三、国外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

四、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

五、我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

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

一、农业跃进　粮食减产

二、以钢为纲　搞乱全局

三、工业跃进　盲目建厂

四、全面跃进，全面紧张

五、被迫调整，一步三折

第二十五章　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

一、大饥荒年代的社会治安

二、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震动的原因

第二十六章　大饥荒的制度背景

一、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二、国家垄断一切

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四、用枪杆子保卫权力

五、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政体

六、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

七、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八、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

九、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

十、这个制度缺乏纠错机制

第二十七章　集体信仰——共产主义宗教

一、对千古难题的探索

二、共产主义探源

三、中国为什么走上了极权主义

第二十八章　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一、在七千人大会上高层出现分歧

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进一步触怒毛泽东

三、八届十中全会祭起“阶级斗争”的杀手锏

四、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五、从批判“修正主义”走向“原教旨主义”

有关大饥荒的大事记

参考文献

一、 来源十分可靠的原始文件

二、 官方文件

三，有关省的官方文件

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及批示

五、专著

六、论文、研究报告及文章

七、回忆录：

八、资料汇编：

九、地方志

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其它国家领导人的著作

墓　　碑

——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杨继绳　著

2007年8月

永久的墓碑（代前言）

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我改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第四，在写这本书写到一半时，北京宣武医院在为我体检中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当然，主要还是前三种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一）

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

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嘟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父亲在生产队里负责放牛。那头水牛很可爱，经父亲精心照料，它壮实而清洁。这头小水牛虽然不会讲话，但它的眼神会说话：或是亲近，或是忧伤，或是渴望，或是恼怒。它通过眼神可以和父亲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骑着它在山坡上溜溜。两个月以前，父亲托人叫我回家。生产队里把这头牛偷偷地杀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学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进屋，就闻到诱人的肉香。父亲不吃。他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实是找借口，让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来，他在旁边看着，眼里露出慈祥的光。我后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于饿成这个样子！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父亲杨修身，字毓甫，号洪源，生于1889年（光绪15年）农历6月6日。他实际是我的伯父，也是养父。从我出生三个月起他把我养大成人，他和我的母亲（养母）对我胜过亲生儿子，他们对我超出常人的疼爱在家乡传为佳话。后来我从乡亲那里得知，不管刮风下雨，父亲总是抱着我踏着乡间小道到四乡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乡八邻。

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辈在神龛前磕破了头皮后长跪不起，直到我苏醒。我头上长了一个大脓疱，母亲硬是用觜吮吸出脓头，才得以痊愈。他们对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农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贫困，却千方百计供我读书。对我的品行要求极为严格。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１９５０年，我们所在的麻元乡乡政府经常召开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有一次，一场大型斗争会在枣刺岭召开，父亲带我去参加。会场是一个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处临时搭了台，山坡上站满了农民。口号震天，荷枪的民兵耀武扬威。被斗争的人五花大绑拖到台上，每一位诉苦的人说完话后，都有人涌上台对被斗者一顿暴打。打到后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枪毙。这一次就枪毙了１４人。我看到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我和几个小伙伴从会场回来后，玩起了斗地主的游戏。没想到父亲看到后把我拖到家里，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后来我听他说，被枪毙的不全是坏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带我去看斗争会。

我母亲（养母）１９５１年去世后，我就和父亲相依为命。母亲刚去世时，我一度失学在家。他不让我干农活，腾出家里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学习。可是，有一次交公粮，他却让我挑两小袋稻谷和他同行。他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要让我体验体验。谁知到半路，我走不动了。他就把我连同两小袋稻谷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粮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得了12担谷的田（相当于三亩）。当时分得土地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我小小的年纪也分享到快乐，可是没过两三年，土地又收归集体了。

１９５４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于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得走读。从家里到学校２０华里。为了缩短我上学的路程，父亲在离县城１０里路的麻桥，找了一间旧房子，开了一间小茶铺。这１０里路全是大马路，为我走读创造了条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发我去学校赶早７点钟的自习。有一天下起了暴雨，这间旧房子的山墙倒了，差一点把他压在下面。后来学校给我助学金，我能寄宿读书了，父子才结束了这种艰难生活。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

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党团组织灌输什么，我没有任何怀疑，都全盘接受。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获得全县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学加入少先队队，初中加入共青团，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当学生干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１９５９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我做这些都是真诚的，没有丝毫功利目的。父亲的死，虽然我很悲痛，但没有减弱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当时大批青年人也积极地投入了“大跃进”，他们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饿但没有怨言，他们也是真诚的，共产主义在鼓舞着他们，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理想而献身。

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我们那里绝大多数农民终生最大的活动半径不超过５０公里。我们家乡虽然离汉口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对农民是遥不可及的。人们对汉口的向往只能停留在儿歌里：“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汉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桥”。县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县城来回也得花一天的时间，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岖的羊肠小径。很多人一年仅去县城一两次。夏夜洗完澡后乘凉，是农民最惬意的时候。有的一家几口人坐在自家门前，一边喝着自产的粗茶，一边摇动着自家用麦秸编织的扇子，谈起家长里短。爱热闹的人则围坐在一起，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或谈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桃园三结义”，或谈几十年前从武

汉传过来的“兴汉灭旗”。但这些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使人腻烦。如果谁谈起县城里发生的新鲜事，大家都竖起耳朵听。谈论县城情况的人会引起人们的尊敬。

乡村的闭塞虽然使农民无知，但却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纯真。父亲对１９５０年斗争会的反感，不是来自理性的判断，而是出于人性的自然。

我１９５４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上学时，是带着一片空白的头脑离开农村的。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封锁了来自境外的一切理论和信息，另一方面又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政府既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竭尽全力地歌颂中国共产党；一切新闻机构，都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年人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闭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利用这些垄断机器，长期灌输共产主义价值，排除和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攻击。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效。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近百年来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积贫积弱的中国，通过“三面红旗”，能够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人类最高的理想——共产主义。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眼前的问题算得了什么？

我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这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我不敢怀疑。很多残酷事实在我眼前发生。万尚君，是比我高一届的同学，因称赞铁托一篇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讲话，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他考初中时是全县第一名，我是继他

之后的第一名，所以我们很熟悉。他学习成绩优异，读书多而勤于思考，仅十七岁因独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里，人们本来视中央政府的声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经历简单的青年人真诚地相信这些灌输，而那些有一点阅历的家长，或是对“神器”的迷信，或出于对政权的恐惧，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现与政府不一致的思想，总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顺从，听话。

１９６０年我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一进学校，就参观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进行忠诚教育。接着下乡劳动５０多天，一方面接受劳动教育，一方面开展保卫“三面红旗”的辩论。虽然我们饥肠辘辘，但不怀疑“三面红旗”。这所历来以思想开放著称的大学，却十分封闭。清华大学历来有很多名教授，但我们只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知道闻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陈寅恪，不知道吴宓。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很多，但我们能借到的书，除了工程技术书籍以外，只有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清华的两位校友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学校不仅对这件事秘而不宣，还在团干部会上吹风：这两个人思想反动，不要像他们那样走“白专”道路。在大学期间我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１９６４年５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的人们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很单纯。是的，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在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塑造成这个政权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几十年内不发生什么大事，这个政权能稳固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就终生持有这种信念。

使我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华大学成千上万张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情况使我震惊：我多年来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败，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２月，我和同班几位同学一起到２０多个城市“串联”，各地的大字报也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

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３０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着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实。我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道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对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进入八十年代，家乡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气派。亲戚朋友也曾劝我为父亲修建一个墓碑。我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１９５８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在我心里的确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我心中墓

碑上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二）

发生在我家里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读者将会在本书的第２2章中看到，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薜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且不谈应该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这是投向日本两棵原子弹中较大和一棵。

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万人。中国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１９２０处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

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饿死人数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死人数的好几倍。

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我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他指着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我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着惨烈的悲剧。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那时，“人相食”不是个别现象，古籍记载“易子而食”，而在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阳的一些县里，在甘肃通渭，在四川，我都听到了当事人讲述的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我还见到过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本书在各省章节里，有着详尽的记载。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一切官方文件，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逃往香港的难民和海外侨民的国内亲属传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体据此陆续发出了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是零星的，极不全面的，但中国政府一概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蔑”。

为了扭转世界舆论，中国政府邀请了一些“友好人士”来华访问，希望借他们的笔“澄清事实真相”。对这些来华访问的人士，中国政府作了极其周密的准备，精心安排了各种行程，包括访问地点、接触人员以及接待外宾的台词等等。外宾访问时，与老百姓高度隔离，有的地方有意布置丰衣足食的假象。当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的方实，曾经承担过陪外宾到安徽考察的任务。在他85岁的时候，曾向我谈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骗外宾的情况（见本书第四章）。受骗的外宾，回国之后，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伟大成就”，说中国不但没有饥饿，而且人民丰衣足食。英国记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受骗后再骗别人的外宾之一。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售”的产品，在《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发生２０多年以后，一些外国学者和旅居在国外的华人，才开始对这场空前的悲剧，作了一些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研究者远离中国本土，又无法看到中国档案馆里的内部资料，阅读他们这些研究成果，总是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全国各地的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我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我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三四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　可是，大饥荒已经过去40多年了，在中国国内还没有这样一本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我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魂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

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份（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面积比六十年代减少、人口增加两亿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粮食竟然多了起来，年轻人不知何为饥饿，农民还面临"卖粮难"的问题。这是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制度发生了变化：联产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见制度对于饥荒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饥荒而著称、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厉的舆论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里的马克思，是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把苏联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这就是极权制度。

中国的专制制度从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沿袭了两千多年，有着丰厚的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承袭了这个制度以后，尽管这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手段、现代组织手段，因而对社会、对官员、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它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专政的强制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边远的乡村，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极权制度，从上面看是权力高度集中，不仅民权被完全剥夺，连中央一级官员也沦为最高领导人的办事员；从下面看则是奴性十足，从高层官员到底层百姓，都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对掌权者俯首听命，百般迎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沿袭秦始皇构筑的权力“金字塔”。在其顶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一个议事机构。毛泽东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决定任何事务的权力，实际上处于一种类似帝王的位置。毛泽东除了党的领袖、国家主席以外，还身兼军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强大的武力威慑力量。“金字塔”顶端的其他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地位。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政。毛泽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领袖，实际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权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时代，毛泽东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回答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都是一样的！”1950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颁发节日口号时，毛泽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稿件上，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可见毛泽东也把自己当皇帝。

１９５５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济指导方针“冒进”，高指标、高速度，造成了１９５６年国民经济全面紧张。由于粮食高征购，１９５６年农村已经饿死了不少人。周恩来、陈云等人本来无意反对毛泽东，仅凭在第一线工作的实际需要，实行了“反冒进”措施，毛泽东对此大为震怒，周恩来差一点丢了官。１９５８年毛泽东思想狂热，其他领导人也跟着狂热，造成恶劣而严重的后果以后，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年初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

了批评，毛泽东立刻翻脸，不仅放弃了原来的纠正措施，还变本加厉地推行１９５８年的错误政策，使造成农民饥饿的政策持续了三年之久。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这里不仅不能奢望有反对党的声音，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恐惧产生谎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力。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的人恐惧就越严重，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因而对这个制度更加"忠诚"。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因政策失误造成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读者将会在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里看到，远隔千里的省份，情况竟是那么相似，这正是政治一体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讨好；在下级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一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他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争越激烈，毛泽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地位的威胁，接连不断地清洗。在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不惜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的错误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锁，使高层决策者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补救灾难性后果还不能伤及最高掌权者的威信，纠正错误不

可能到位。灾难性的后果主要是由农民承担。

在过去的皇权制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权力；极权制度下，老百姓连沉默的权力也被剥夺。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大小小的会议，要求每一个人“表态”，要求人们“暴露思想”、“向党交心”。每一个人思想深处最为隐秘之处，也必须向党敞开，让党检查。高压政治下的“表态”，实际是强迫人们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使人们失去了心灵深处最后的一点领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贱，使人们不断地践踏自己过去尊敬的东西，奉承过去瞧不起的东西。极权制度就是这样使民族性堕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表现的那样疯狂，那样的残忍，正是民族性堕落的结果，也正是极权制度的“政绩”。

这个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体民众的最高目标，并且用强制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推行这种理想。农民承担着实现这个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担着工业化的成本，承担着集体化的成本，承担着城市廉价生活的成本，承担着各级官员奢侈生活的成本。这些主要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来实现的。农民只能将自己的产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卖给国家。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这个制度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工业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农产品换回机器。因此，就不能让农民吃饱，而是用征购的方式强制地收走农民的粮食。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

刘少奇这里讲的是实话，这段实话表明，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压根儿就不让农民吃饱。农民卖完“余粮”以后，就没有留下多少口粮，这是使大批农民饿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经济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中国官方文件称为“农业合作化”。实际上，“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互利互补，后者是取消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剥夺。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

农业集体化将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集体化时给农民留了一点自留地，仅够一家吃菜而已，１９５８年这一点自留地也收归集体。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村头等候队长派工，在作业组长带领下集体劳动。

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粮票分本省的和全国的。如果离开本省，就得带全国粮票。要领到全国粮票，必须出示省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到外省的证明信。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

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实际上是在社会一体化基础上，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高度统一的基层政权形式。这种作法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１９５８年，还一度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实行统一的军事指挥。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等各种“大办”当中，官员对农民像指挥军队那样部

署、调动、指挥。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担心已传达到基层。农民以为，国家的粮食很多，吃完了政府会供应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光了，但最终等不来政府的供应。

公共食堂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热饭打回去成了凉饭。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公共食堂还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是普遍的现象，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

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在任何情况下，多数人是服从制度的，反制度的只是个别的例外，反制度者通常会被制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融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即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毛泽东是这个模型的制造者之一（严格说来他是专制模型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自己也要受制于这个模型。在这个制度框架中，毛泽东行为有其自觉性也有他的无奈。任何人无力与这个制度抗争，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虽然较早地发现了１９５８年的问题，也下达过种种纠正的指示，但无济于事。按照当时理想的逻辑，在当时的制度框架下，现在看来十分荒唐的事，在当时都是合理的，是顺理成章的。

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产松动了许多，人民公社已经解体，统购统销已经废除，百姓们能够在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为弱势群体；支付改革本少的阶层享受成果最多，从而成为强势群体（或称为既得利益群体）。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

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问题在于，在制度变更的过程中，怎样减小社会震荡，怎样防止社会动荡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我想，只要大家都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可以找到减轻震动、减小破坏的办法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为政治民主确立了经济基础，从而极权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极权社会。经济市场化加紧催生着政治民主化。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第一章　祸起中原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原地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红旗举得最高，“经验”出得最多，饥饿也十分严重。河南的饥荒是从政治运动开始的。1957年7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55万人的15%，也占河南省干部总数的15%。1958年又在党内开展了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运动。政治运动造成了恐惧和狂热，造成了浮夸和残忍，也造成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其中，“信阳事件”最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信阳事件

据当年中共中央监委（即中纪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调查的李坚对我说，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一是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阳事件”。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在1958年，信阳地区辖信阳、息县、固始、潢川、新县、罗山、淮滨、商城、光山、确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阳、遂平、上蔡、平舆、正阳18个县和信阳、驻马店两个市镇（当时驻马店为镇）。全区面积28000平方公里，850万人口。这个区的一大半面积曾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战争年代为革命牺牲了数十万人。当地的老人说：“对共产党来说，大别山树有功，草也有功。”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著名的鸡公山风景区就在信阳。人们说河南省“三阳开泰”（信阳、南阳、洛阳），是指这三个地区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三个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万人因饥饿而死，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来，这个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时隔40年，外界还不知其中内幕。

1999年9月，为了解“信阳事件”真相，我专程赴信阳调研，陪同我的是新华社河南分社高级记者顾月忠和大饥荒年间常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后在中共驻马店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由于顾月忠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关系，信阳市委对我们接待十分热情，但得知我们这个调查题目以后感到为难，他们让宣传部把我们送到鸡公山，希望我们在这个著名的旅游胜地玩几天就打道回府。我们在山上呆了一天后就下山，并利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调查任务。

我们在住地狮河宾馆召开了几个“信阳事件”当事人（健在的当年地委和县委干部）的座谈会，同几位关键人物进行了个别交谈，还下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回到郑州后，又查阅了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信阳事件的基本情况。

1、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

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政治斗争，下面也会搞同样的政治斗争，而且越到下面斗争越扩大、越残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杨、王”（见后文）之后，接着是反右倾运动。

我们可以从信阳地区光山县看到河南省反右倾运动的残酷性。1959年月11月11日，光山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批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张福洪被扣上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在批判会上，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踢了张一脚，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12日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张斗争了两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块，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13日又把张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已经不能走路了。14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15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只能趴在地上，斗他的人用脚踢，头发一块一块地被拔光了。16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18日说张盼望蒋介石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要喝水没人给，19日中午张福洪死了。据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后来的回忆中说，1959年春天，为了解决农民饥饿问题，马龙山曾让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当时其它地方也这样做，中共中央没有批评）。庐山会议以后，把包产到户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行。马龙山不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搞的。在专制制度下，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张福洪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其它各县的反右倾斗争也很残酷，如息县批斗县委副书记丰佩然，说他否定三面红旗。县委书记徐锡兰主持。徐锡兰坐在上面，手枪放在旁边。丰佩然站在下面，有人按脖子，有人用拳头打，有人用脚踢。

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人次。在政治高压下各级干部不得不胡言乱语。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新闻，消息传开之后，6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2分队平均亩产3530.75

斤的消息。7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

这三颗“大卫星”都是信阳地区放出来的，是反右倾斗争的“硕果”。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中，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就给谁带上“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等政治帽子，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

1959年信阳出现旱灾。在当时全国一片狂热的情况下，信阳地委提出“大旱大丰收”的口号。明明受灾减产，却要说产量超过1958年。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在8月初开了一个各县负责人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预防饥荒。这个会议引起不同看法。不久，庐山会议精神传了下来，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计产量。在这样的气氛下，产量越报越多，后报的比先报的多，各县领导不敢先报，怕报少了挨批。据当时大会工作人员余德鸿40年后向本书作者回忆，开始报了300亿斤。当时张树藩和邱进敏二人不相信这么多，让大家再报，报了150亿斤，最后落实到72亿斤。地委常委讨论时，九名常委中有8名认为1959年比1958年更丰收，1958年是56亿斤，1959年72亿斤也是很正常的。但张树藩只相信30亿到40亿斤。

8月底9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信阳由张树藩带领县委书记出席（地委书记路宪文没有出席）。会议一开始就让各地委书记报产量。张树藩先报了地委常委讨论的72亿斤，然后又讲了他自己的意见（30亿到40亿斤），省委对张树藩很不满意，问地委书记路宪文：“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在省委的逼压下，路宪文又召集到省里开会的县委书记重新报产量，县委书记们都低头不说话。在路宪文的一再逼迫下，有人不得不大胆地反问：“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吗？”路宪文说：“有人对家里报的产量有看法。”“有人”就是指张树藩。接着，召开扩大会议，按照省委的意图要各地区找右倾典型，并对右倾典型开展批斗。对说过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随即撤了曹明的职务。

2、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指标

浮夸不是数字游戏，最终要由农民来承担实实在在的恶果。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河南是粮食大省，粮食征购的压力很大，对所属地县，能多征购就多征购。张树藩在上引回忆录中写道：

扩大会议以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逃荒要饭现

象。很多公共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以红薯叶、野菜充饥。

中央和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中讲的征购数比张树藩说的16亿斤小一些，但也认为征购过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1959年信阳旱灾。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而当时信阳地委把产量估计为64.27 亿斤。省里根据这个产量安排信阳征购任务为9.6亿斤，比1958年多征4300万斤。地委又向各县加码5%，征购任务总共10.49亿斤。全区完成征购任务之后，除了种子、饲料之外，剩下的口粮每人平均全年只有164.5斤（原粮）。按每人每月35斤计，可吃4个月。当时没有副食，没有油，35斤原粮只有25斤左右粮食，也是半饥半饱。加上全区有180万人搞水利，吃掉了相当一部分粮食。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检查说："去年信阳全区秋季粮食总产量估计只有20多亿斤，却夸大为64亿斤，省里给信阳地区分配的征购任务是9．6亿斤，而地、县、社又层层加码，比省里任务又多了20%以上。10月中旬征购任务完成了7亿多斤，就有3751个食堂仃伙（37万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搞反瞒产，认为瞒产私分具有普遍性，几乎社社有，队队有。" 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反瞒产私分的力度，加剧了饥饿。

1958年，信阳地区组织了120万劳动力大办钢铁，占全地区劳动力总数的30%。商城县放出日产钢铁6000吨的"超级卫星"，冶金部在商城开现场会。土炉子里炼不出铁，就把农民做饭的锅，门上的铁鼻，庙里的钟，全都化了铁块向上级报喜。大炼钢铁消耗了一些粮食。50多万劳动力大办滚珠轴承，水利工地上的200万人，这些上工地的劳力曾一度放开肚皮吃，也消耗了一些粮食，留在生产队的粮食就更少了。

3、血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农民交不起粮，政府反而认为是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粮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1960年12月6日，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确山县召开万人大会反瞒产斗争的经验。

鸡公山现场会把反瞒产私分推向了高潮。2001年3月，77岁的李瑞英

（张树藩夫人）向我介始了她亲身经历的鸡公山现场会的情况。她当时任信阳地区妇联主任。1959年6月，地委让妇联主任李瑞英带一个工作组去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这是信阳县委书记徐国樑的试点。李瑞英等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发现这个典型是假的，农民都在挨饿。她没有总结经验，以工作组的名义向地委书记路宪文写报告，要求给这个公社21万斤粮食。路宪文不但没给粮食，还给李瑞英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去。王秉林到鸡公山公社也发现社员挨饿，回来对路宪文说了实话。路宪文说："王秉林也动摇了。"王秉林怕被打成右倾，按照路宪文的意见，在鸡公山公社组织了一个反瞒产私分成果的现场会。会上展示查出来的瞒产私分的粮食。在这些箔屯里，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层粮食，下面都是稻壳。在鸡公山现场会上，地委提出，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干部要过"三关"：群众叫喊关，人口外流关，食堂停伙关。接着，又组织干部参观罗山县"四摊子反瞒产私分会"（四摊子：干部会，贫农会，统计会计会，富裕中农会），在这以后，大部分县召开了贫雇农大会、现场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谁要是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大丰收"、"右倾"等政治帽子，并进行批判斗争。还把食堂缺粮停伙说成是群众威胁干部，把群众遗弃子女、饿死路旁说成是"向党进攻"。

图1－1：（lmag-15）1999年9月10日，大饥荒年代任信阳地委秘书长的王秉林在信阳狮河宾馆接受本书作者采访。

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526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年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9毒打，因伤势过重，5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年10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年10月13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

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0月20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天后死去；

1959年10月24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年10月2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年11月10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天后死去；

1958年11月12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3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4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次，直至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年12月9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天后死亡；

1960年1月8日，陈湾小队54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况，现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1039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

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在政治高压、残酷斗争的情况下，说假话成了人们的一种生存本能。潢川县委委员宿世良、农工部长徐从在伞陂寺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白天在生产队里吃不上一顿饭，被迫晚上回公社吃一顿，但不敢说生产队已经停伙的情况。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莫怀光在下面工作一天半没有吃到饭，回公社不敢说下面的情况。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贾新元在信阳事件发生后对省委工作组说：“当时我不是不知道，去年报名服兵役的200人当中，体重合格的只占40%，一天死一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曾经三次到县里反映情况，但因怕戴右倾帽子，走到县委院里、门口，返回来了。回来还不得不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公社书记宋士九到伞陂大队督促征购，这个大队的队长对他说：“下面实在没有粮食了。”宋书记批评大队长：“你这是右倾思想，你看问题太简单了！”这个大队共召开了四次的反瞒产、查漏洞的大会，四个生产队长都被批判，三个队长被大会斗争，24个作业组长人人过关，其中19人被斗。这个大队被迫报出藏粮24万斤，但验收时一颗粮也没有找到。

1999年9月，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老农民余文海（他1958年曾任生产队会计）向本书作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把生产队干部集中到张李开会。让报粮食。不报就集训、批判、斗争、拷打。结果说出这里有一仓库谷子，那里有一仓库黄豆。报了粮食就要上交，明天几点钟送到。为了过关，我们队也说了假话。第二天我守在队里的电话旁，10点钟，电话响了，问：粮食送来没有？我说，正在装。12点钟又来电话；粮食为什么还没送到？我说正跑在路上呢！后来又来电话催，我说，我是会计，不知道！晚上又集中开会，不说假话就挨打。怕挨打，多数人都说假话。”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潢川县任务完成得不好，省委让他们写一个报告。潢川县委1959年10月30日的报告认为，粮食征购困难的原因，首先是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思想不够明确，对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对粮食问题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在农村斗争的焦点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党内外一部分干部右倾思想成了粮食工作的主要危险，突出表现是不承认大丰收。第三是干部作风不够深入，抓得不具体，不细致。这个报告提出要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辩论来搞征购。其实，写这个报告时，潢川县已经大量饿死人了，报告对此只字未提。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欢这个报告，并于11月17日向全省转发，提出了要组织粮食入库的新高潮。怎样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转发潢川县委的报告的按语中写道：

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的情况很具体，不仅找到了粮食征购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材料准备。

潢川县桃林公社，食堂停伙、社员挨饿不仅没有放松征购，反而更加紧了。县里说，下面有粮食，就是不拿出来，别看白天食堂停伙，晚上吃干饭，让各级查漏洞、查隐瞒，见粮就往上送。吴集大队杨楼生产队留了25斤“泥巴苏”稻种（水稻的一个品种），也拿去顶征购任务入库了。县、公社几乎每天开电话会议，要进度，搞评比，让任务完成不好的队在大会上作检查。有的大队书记听说要开电话会议就吓得发抖。何陂大队为了查漏洞、查瞒产，搞车轮战术，大队干部轮流值班，一连开了十天十夜生产队干部会，动员，辩论，自报隐藏粮食数量，下去验收，验收没找到粮食就再动员，再辩论，再自报。最后把全大队所有的草垛都扒了一遍，才搞出了3000多斤粮食。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

果。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共潢川县委在1960年6月3日的检查中写道："我们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保持连续三年潢川在征购工作中的红旗。在征购任务完成了60%进展很困难时，地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我们排到了倒数第三名，省委宋致和书记在电话会上点了潢川的名。""我们分不清实事求是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患得患失，不敢说实话，怕把产量报低了，说是否定大跃进、大丰收，怕受批判，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上级满意，官运就亨通，上级不满意，就会丢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级，不顾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为了讨好上级，就逼下级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一级逼一级，逼到下面就不择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见的手段。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11月初，在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强征购、反瞒产仍在继续进行。公社代理第一书记钱庆怀，在他主持的10个大队中，每天夜里12点开汇报会，凡是征购任务完成排在后三名的，当夜进行批斗。据这个片8个大队统计，被斗的大队干部22人，小队干部39人，作业组长44人，当场打死1人，打后死去的7人。对讲实话的干部一律扣上"否定成绩"、"右倾分子"的帽子，进行无情斗争。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炳智说没有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当场被斗，四个人抬起刘的四肢，像"打夯"一样往地面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伤。40年以后，我到息县采访，这里的老农民还记得这位钱书记。老农民说，钱庆怀原来是副书记，公社书记熊永宽到县里开会去了，让钱留下来搜粮食，他带领十员大将（公社武装部长等打手），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搜，有一点粮食就弄走，搜走了上万斤粮食，因此他有"政绩"，由副书记升为代理书记。息县在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中，对被斗对象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刑罚：捆绑、吊打、揪头发、炒盐豆。

我在调查中发现，山东、甘肃在反瞒产中也有这种刑罚。什么叫炒盐豆？1999年，我问了不少河南人和山东人都说不知道。2000年8月，我在甘肃省通渭县找到了一位被炒过豆子的老干部，他向我介绍了这个刑罚的情况：执行者有很多人，他们站成一个圆圈，被炒的人（一个或多个）站在中间，四周的人把他们从这边推到那边，又从那边推到这边，这样不停地推来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命令他站起来继续"炒"，直"炒"到站不起来被抬出去。一些有心脏病的人被"炒"死了。四川省把这种刑罚称为"洗毛芋头"。

据不完全统计，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360人，自杀的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

个干部打死群众91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150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44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36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认3人。

1959年冬天，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原称卫星人民公社）第二任党委书记郭书志（第一任书记陈丙寅被上级派遣组成"中国嵖岈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出访印度）接任时，粮食已被征购一空，他正发愁没粮食吃的时候，接到了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路书记火冒三丈地吼："当前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的，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要开展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的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在路宪文的命令下，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急忙赶到嵖岈山人民公社，对郭书志说："开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快。"很快，全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集中到公社办公处前的空场上。他们的讲话很严厉；"我们要下决心、下狠心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该斗的斗，该捕的捕，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迁就。谁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斗。"接着分组讨论，自报粮食。

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在县里召开的三天反瞒产私分大会上吓病了，在家吃了几天药刚刚见好。听到通知他开会，心里就很紧张。听说要留下来讨论挖粮食，心里一急，眼前发黑，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下意识地说："没粮食.....真的......没粮食......"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进屋子里，仍然浑身发抖。一位叫包根的小队会计，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对他开展批斗。包根经不住拳打脚踢，就说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本人藏了粮食500斤。朱遂平立即就成了批斗对象。他开始看不起包根的软弱，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中间。一阵拳打脚踢之后，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头发拉了起来。有人拿来一条凳子，让朱用一只脚站在凳子上面做"金鸡独立"。没待朱站好，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踢翻凳子，朱遂平倒在地上。人们冲上去又是一暴打。打过，又让他做"金鸡独立"。朱被打得血流满面，还没承认藏粮食。于是，就用一根细麻绳把朱捆了个结实，麻绳勒进肌肉里，再把绳子搭到树上，使劲一拉，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满脸豆大汗珠往下滚，脸呈猪肝色。朱遂平开始求饶："放了我吧，我

说，我全说。”参加会议的生产队干部看到这势头纷纷交待：这里藏粮食多少万斤，那里藏豆子多少万斤。三级干部会大获全胜。中共遂平县委立即向信阳地委报喜：三天挖出粮食45900多斤。会后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粮，一两粮食也没有找到。

1959年12月，已经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了，河南省委还念念不忘征购任务。省委副书记宋致和12月4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农村生产情况很好，“在逐步认清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强调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发动群众深入工作后，部分县（新蔡、上蔡、汝南）的征购进度有较快的进展，完成了任务，而有些征购进度仍然迟缓，至今完成情况很差。”他认为“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种”，一是大丰收，征购任务不重，能够完成任务，基层干部存在思想问题；二是有思想问题，也有工作问题；三是工作努力，但生产差。他认为“凡是大队和生产队贫下中农占优势、掌握了领导权的，既能完成征购任务，也能安排社员生活；凡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篡夺了领导权的，瞒产私分严重，既不肯完成征购任务，社员生活也没有很好安排，因为他们瞒产私分的真正目的是要搞垮食堂。”，不过，宋致和在这个报告中还是拐弯抹角地为农民说了两句话：“这些地区目前不应该单纯地抓粮食征购了，必须全力转为抓好分配，安排好社员生活，．．．．如果再硬突粮食征购，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断炊。食堂停伙以后，大队干部还规定“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大队组织了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25个党员中，有21打过人。社员称大队办公室是“阎王殿”。全大队原有346户，死绝了的有39户，原有人口1496人，死亡555人，其中，饿死490人，打死55人，逼死10人，遭受毒打的有438人。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报告：“全区大队以上的干部共有5万人，犯有种种违法乱纪的干部估计不下50%，一时打人成风，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残，绝大多数公社、队设立监狱和劳改队，乱捕、乱扣成风。”

4、恐怖的饥饿和死亡

粮食强行收走了，1959年9月份就出现食堂缺粮现象。当时就多吃菜，少吃粮，劳动力吃粮，非劳动力吃菜，一天吃一顿或两顿，后来有的食堂几天吃一顿。到了10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伙。11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12个大队122个生产队的291个食堂，缺粮的为

100%，断粮80多天。吴集大队在9月中旬（农历8月13，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10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从1959年9月有7645户，34897人，其中男15349人，女19548人。1960年5月剩下6953户，29438人，其中，男14349人，女15044人。人口死亡5459人，死亡率为15.64%，绝户692户，绝户率为9.27%。何陂大队死亡率为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断粮80多天，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瘦弱死亡者临死时吐水。两种死亡的特点是死时不发烧，反而体温下降，临死时都能吃东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饭。吴集大队马路生产队社员杨春山，怕儿子没人管，在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把两个三四岁小孩扔到坑里淹死，以后自己死去。群众死亡率达14%以上。

在断粮以后，公共食堂寻找了各种代食品：

吃稻草。稻草是喂牛喂马盖房搓绳的材料。现在，人们先用铡刀把稻草铡碎，放在大锅里炒干焦，再放在石碾上碾成碎末，再用石磨磨，磨完再过箩成面状，再掺上百分之三十红薯干面再做成窝窝头。

吃玉米杆。玉米杆是农民烧火做饭的燃料，平常年景连牲畜也不吃，现在也成了食品。吃的办法是，去掉外皮，放进锅里炒干切碎，磨成面，掺上红薯干，做成窝窝头。

吃白鹭屎。白鹭是一种水鸟，以鱼为食。屎呈青白色，不臭。饥饿的人们把白鹭屎挖回家，用水洗洗，放在锅里蒸熟了吃。

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树皮、蚌壳、棉絮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

1999年9月，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记者鲁保国陪我到信阳了解当年情况，他回忆：“1959年下半年我乘长途汽车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车上的乘客谁也不敢谈论饿死人的事。在罗山县城西门外我看到一具尸体，就给罗山县委打电话反映了情况。光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成了绝户。虽然到处有饿死人，但领导干部还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杨守绩请人吃饭，喝皮丝汤。”

我问鲁保国：“作为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为什么不写‘内参’呢？”他回答说：“亲眼看到说真话的人受那么多的摧残，我哪敢写‘内参’？”

1999年9月10日，在信阳狮河宾馆，71岁的余德鸿（1959-1960年任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向本书的作者回忆说：

粮食被征购走了，秋收刚过农民就没粮食吃。我们到遂平县石寨铺检查农业生产，路经青石桥大队，想住在这个大队里。大队长慌得不得了，我们说："简单一点，随便弄点吃的就行。"一直到晚上9点半他才端上吃的来，是几块南瓜做的糊糊。大队长说："瞒也瞒不住了，你们不来我们南瓜糊也喝不上了。食堂停伙几天了，我找遍了全村才找到这两个小南瓜纽纽。"我们到息县东岳庙公社王庙大队，已经下午5点半了还没有人下地。为什么不下地？农民说："今天的饭还没吃呢！"我们还看到两棵榆树被砍倒，树皮被剥光，有人还一边剥一边吃。第二天到唐坡，高粱还没有打苞，就把秫杆青的吃了。这还是秋收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情况。以后的情况更惨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农历10月草根树皮吃光了。以后就大量饿死人。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几公里路边看到6具尸体，回到离我家5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100多具尸体。外面传说尸体被狗吃了，还说狗吃人吃红了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时哪有狗？

开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门板上用牛拖走，后来就抬不动了。防胡西边的刘长营村，一家姓杨的，大人死了没抬出去，剩下3个8-12岁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尸体维持了几个月。后来从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头，孩子说人的脚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阳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上写的是38万多人（本书作者注：信阳地方志上写的是48.3万人）。据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在这里调查，向中央报告是105万人。我认为，105万这个数字不算多，我是淮滨人，这个县40多万人死了18万，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万人死了2万多，死了42%，我家所在大队吴寨大队死了52%，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共75人，1959年冬天两三个月就死了38人，我家里死了6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继子。

我采访余德鸿两年以后，他给我寄来一份他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其中写道：

在全地区18个县市中虽然有好有坏，灾情有轻有重，饿死人有多有少，但悬殊不是很大的，没有饿死人的社队是没有的，没有饿死人的农户比例也不是很大。我对淮滨县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些，因为我不仅是淮滨县人，五十年代初期,我还在那里担任过土改工作队的大队长、

区团委书记、县委秘书、县委委员、副县长等职。记得当时淮滨县有50万人左右，有人说死了18万，也有人说死了16万或17万，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从我家住的防胡公社来看，说全县的死亡30％不算大。据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任宽回忆，防胡公社5万人左右，共饿死了2.2万人。占总人口的40％多。其中吴砦大队（我家那个大队）死亡人数占人口的52％。小余庄生产队（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户、75口人，共饿死38人。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13户人家死绝了9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有400多人，饿死了300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207人，饿死107人，其中死绝了6户。原地委党校副校长李心龙在老家的共有6口人，死了4口。总之，凡是我所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都占半数左右.....我于1959年12月份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到防胡的9公里的路旁，见到尸体约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极其难过。从防胡回家的4公里的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西的幸福河沿岸，发现大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图1-2：余德鸿、余文海等照片

1999年秋，我到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见到了70多岁的老农民余文海和他的两个儿子余海龙、余海滨。家里空空的，余海滨在北京打工，刚回来秋收。余文海当年是小队会计。他回忆说：

我爷、我娘、大爷、大娘、奶奶、两个妹妹、一个娃子全都饿死了。村西头一个坑里埋了上百人。那时四个庄一个食堂。余庄、高庄、蔡庄、徐庄都集中在余庄吃饭。锅拿走了，家里不让做吃的，连烧开水的东西也没有，只好用搪瓷缸烧开水喝。在家里想弄点野菜吃也难。有的家饿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里用被子盖起来。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没有力气抬，二是想留个名额还可以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尸体在家里放一个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那是在大队姚庄，我找生产队长姚登举开会，在生产队办公室我闻到肉香。他说：“吃肉吧。”我问：“啥肉？”他说：“死猪肉。”我揭开锅夹一块放在嘴里，软软的。我说：“这不是猪肉。”他说这是别人割的死人肉，是从地里死人身上片下来的，他拿来一块煮着吃。（谈到这里，送我来采访的司机小陈问：人肉好吃吗？余文海回答说：蛮好吃的！就是软一点。）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

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

余文海说，冬天过后，将死人都埋在村边的一个大坑里（这个坑是1958年挖的，原来是作别的用途）他领我到这个大坑边，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长满了庄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迹。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片令人悦目的绿色下面，竟有几百具饿殍的尸骨！不过，在原来的大坑附近，人们种了几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只有这几棵吸收了饿殍营养的大树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图1-3 死人坑上的大树

河南省的档案资料留下了很多饿死人的记录。

中央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据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据工作组调查，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

报告称，死亡人数中男多女少。据1959年9月底统计，全区共有人口8042097人，其中男4081717人，女3960380人，到1960年4 月统计，全区实有人口7647874人，其中男3769499人，女3878379人，改变了原来的男多女少的情况。固始县死亡的人数当中，男的占72.3%，女的占28.7%。另据平舆、汝南等8个县死亡人数统计，男的占56.6% ，女的占43.4%

报告称，壮年劳动力死亡多。潢川县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54.7%，固始县青壮年占67.9%，淮滨县6大队死亡的1464人当中，劳动力占54.2%。与此相关的是造成很多孤儿。仅固始县七一公社就有370多名孤儿，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就有200多名孤儿。

报告称，各地有一些死绝户。据潢川县仁和公社的陈湾、杨集、彭店等5个大队统计，死绝户为238户，占原有2373户的10%。陈湾大队因死亡人数过多，把原有的51个村庄合并为41个村庄。

报告称，社员比基层干部及其家属死亡率高。据淮滨县桥沟公社的万围、左围大队统计，万围大队、生产队干部死亡占8.8%（204人，死亡18人），社员1515人，死亡404人，占26.7%；左围干部死亡占11.8%，社员死亡占15.24%。该县城郊公社杨波大队共有156户,没有死人的31户,其中干部13户，炊事员4 户，磨面的1户。该大队前店生产队共31户，没有死人的6户中就有干部5户，炊事员1户。

“五类分子”（即历次政治运动中定的地、富、反、坏、右）比劳动群众死亡多。据上述左围大队统计，该大队贫农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3%，地主富农死亡占其总人数的31%，坏分子214人，死亡8人。

信阳饿死人最多的时间是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这4个月。1月后还在继续饿死人。

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小组1960年6月3日提供的报告称：

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6668人，占该公社总人口的比例为14.5%，谈店大队黄营生产小队小黄营食堂原是四个村庄21户、96人，死5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53%，死绝了两户，现在这四个村庄并为一个村庄。徐营子一家4口人，大人先死，没人埋，后来两个小孩也死了，四具尸体整整放了十几天。伞陂寺大队陈寨生产队杨大围子小队原有23户、119人，死51人，死绝3户。由于死人太多，没死的人没有力气，死人没有人埋。杨有兰一个小孩死在食堂里整整放了十几天。后来还是支书程林德找人在一个坑里埋了36具尸体。

全社10月半开始停伙，到12月7日，共停伙53天。县里干部都知道，不敢说。

朱岗食堂，37户，共138人，死亡47人，死绝5户。没死人的户是干部、会计和劳动力多（挖野菜的人多），死绝户是劳动力少，没人挖野菜。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百年潮》发表张树藩这篇回忆时，删去了这一段。本书作者依据张树藩夫人李瑞英提供的原稿补上这一段。

信阳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滨县。信阳的老干部对本书作者说，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小车是从

死人的尸体旁边开过去的，但他们却没有向上反映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调查报告说："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13个村庄没有人烟。"

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1958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多人。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在1960年10月9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

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万到14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减少了639个。.....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20年，已死于狱中。

在群众大量饿死的时候，干部多吃多占的情况比较普遍，淮滨县汤坡大队前店生产队的社员说："我们饿肿了，干部吃胖了。"就是这个汤坡大队，在1959年10月上旬，每人每天半斤红薯，另加红薯叶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0月21日到11月25日，每人每天四两红薯和少量的红薯叶，11月26日到12月上旬，全吃青菜，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2月中旬，5天时间每人一天只吃一顿菜，在这以后连续停伙五天。就在这种情况下，抗旱20天，每天只睡两三小时。省委检查中心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潢川县何陂大队死亡率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全大队60个生产队干部只死两个人（群众反映这两人是好干部，没有多吃多占）。23个大队干部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连浮肿病都没有（后来查明，大队干部自去秋以来，到1960年5月13日，多吃和往家里拿，计牛猪肉3000斤，鸭子300余只，鱼150斤，羊15

只，香油570斤，粮食5000多斤）。

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信阳地委副书记王达夫分管反右倾运动，态度很坚决，整人很厉害。他是新蔡县人，新蔡饿死人不少，他家不少亲戚到他家，他是知道真实情况的，但他反右倾越反越有劲。信阳事件以后他还是当地委副书记。余德鸿等到省委告他，说他在信阳事件中有责任，省委才给他记过处分并调动工作。

就在信阳大量饿死人、人相食普遍发生的时候，《河南日报》还宣传形势一派大好，连续发表七篇"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文章。

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多亿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没有从外面调粮食。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尤太忠将军是光山县人，他老家饿死人最多。他回家探亲后回部队说了真话，挨了批评。湖北省长张体学是新县八里畈人，他家有亲戚饿死了，他回家看过，回去反映过情况没起作用。在那种体制下，连这样的高官说真话都没人听，老百姓就更没有地方说话了。

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10月的统计数是549171人，12月的统计数是100万人：

中央调查组引用的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

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是这样写的："据今年10月分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县潢川、商城、正阳、罗山等7个县。在全区4473个生产大队中，人口死亡占总人数20%以上的有520个大队，其中有些大队死亡人数占50%以上。光山死亡

97154人，占总人数的19.87%，死绝户5639户。”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60年12月6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上说：“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

1999年以后，我在信阳、郑州、北京访问了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信阳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100万人，可能更多。

5、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打死

本书前面已介绍过，在反瞒产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饿得没办法的农民如果偷吃了一点东西就可能被活活打死。讲真话的，不听话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光山县被打死的1008人中，县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大队干部4人，小队干部47人，党员11人，团员61人，基本群众848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87人。

杨蔚屏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6月，光山县的53个生产大队被打死的群众就有404人（其中活埋1人），这404人当中，生产队以上的干部199人。干部打社员更是家常便饭了。泼河公社陶湾大队，11个大队干部、16个小队干部打过社员。支部书记黄某，在正月十五这天早晨就打了社员47人，并把一位县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团委书记胡某亲手打过92人，并用“点天灯”的残酷手段烧死2人。

我采访的当事人说，杨慰屏提供的数字比实际情况要小。

中央调查组成员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1960年10月9日提供的关于息县的调查报告描述了当时的惨状：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

夏庄公社罗圈子大队队长杨某和统计员罗某于1959年11月28日，将偷耕牛的7名社员用一根铁丝穿7个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游街，一边走一边打。该大队有两名社员因杀牛被打死。

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三个干部打死8名社员。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刘宝和生产队社员赵强，饿得两腿浮肿还得赶着牛下地干活。他在地头昏了过去。醒来，他爬到收获了的玉米堆里，大口大口地吞吃已经干得发黄的玉米叶子，把嘴扎得直流血。他意外地发现一个没有收尽的玉米，如获至宝，想起家中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孩，他强忍饥饿，把玉米藏在怀里。谁知被队长闫某发现了，闫某把赵强捆了起来，手拿扁担没头没脑地往赵强身上打，打得鲜血直流。打了以后还让赵强干活。赵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刚走到地头，就一头栽倒地上死了。

一天夜里，遂平县嵖岈山公社李尧大队死了一头老母猪。饲养员宋和看到四下无人，就把死母猪扛回家里。用刀子一开膛，发现猪肚里还有12只粉嫩的猪娃子。宋和十分心疼。他想，先把猪娃子吃了，把母猪埋起来以后慢慢吃。然而，他还没动手，大队长翟某带了一伙人闯进来，二话没说先劈头盖脸地给宋和一记耳光，打得宋和满嘴流血。接着把他五花大绑送到大队部，吊在大队办公室的梁上。大队委员们连夜把母猪肉吃了，宋和被吊了一夜，疼得大叫也没人理。第二天，宋和脖子上吊着猪娃子和猪头，被队干部押着游街示众，一边游一边喊：“我是贼，我偷杀了猪。”游街一天，宋和滴水未进，倒在路旁死了。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一个老头饿得没办法，偷杀了一只羊，煮到半熟时，被民兵营长发现了，当场被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上，挂在老头的脖子上游街。游完街后，用绳子捆起来吊在树上。从上午一直吊到晚上。老头不停地惨叫求饶，没人理睬。老头惨死在树上后，民兵营长把尸体拉到河坡上，盖上麦杆，点一把火烧了。

嵖岈山公社袁庄大队饲养员刘志兰和袁志红，弄死了一头小猪崽，被生产队长发现后，一个人脖子上挂一块猪崽肉游街。接着开会批斗。两人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

1959年11月12日，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大队黄西店小食堂停伙两个月了，全小队社员共同商议，把本队一头牛杀了分吃，由队里17名社员执行。此事被大队干部发觉后，率领打手队，把17名社员绑到大队部，一起吊起来毒打了一整天，刘太国、黄兰友、黄国孚、王申喜、王声召、王元福六人被打死。

乔培华根据档案写的《信阳事件》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事例：

1959年11月8日，干部发现徐湾小队社员方正义家中有一小块牛肉，方正义立即遭到毒打，6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5日，晏湾小队社员胡德厚，没有按干部派的活去拔菜，遭到残酷毒打，两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日，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队里款未还，遭到毒打，5天后死亡。晏的妻子黄秀英在家里炒麦子吃，被干部抓住，以偷粮的罪名开群众斗争大会。然后将黄捆绑，用冷水淋冻，不久死亡。家中5个小孩，除14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4个全都饿死；

1959年11月20日，韩湾小队社员阮祥海，因没有听从干部的安排去捡牛粪，遭到捆绑毒打后不让吃饭。阮饿得没办法，到食堂拿点花生米吃，被当场打死。

河南打人的情况如此严重，是因为从中央到省里制止不力。早在1958年，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有一封群众来信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信中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十分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没有打人的干部被扣上了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1958年11月29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给吴芝圃。在批语中，毛泽东虽然提出要处理，但态度极不坚决。怎样处理呢？他写道："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他这里说的"犯了错误的同志们"就是打人凶手。毛泽东怕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

1999年秋天，信阳一些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你不打人，别人就打你。那年头，打人是一种勇敢行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对共产党忠诚。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

6、各级党委都极力掩盖死人真相

农民挨饿，还向外封锁消息，不让向外面写信，所有的邮局都由公安局控制了。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里的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光山县一位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结果这个医生被逮捕法办了。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

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

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的干部，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67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城关公社一位绰号叫李瞎子的人说，他在城关收容所里，就看到死了300多人，每天抬出的死人少则3人，多则10人，有的还没断气就抬出去扔了。城关公社社员娄家绪说，1959年冬，省委检查团要来的时候，孤检查团发现收容所里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87个，其中有4个没有断气。

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为了掩盖真相，不惜残酷打击向外面透露情况的人。1960年8月以前，息县全县反映没有粮食吃的人民来信58件，其中6件匿名信当“反动信件”交公安局侦破，有一封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匿名信，经对笔迹定为汝南银行干部郑连邦，立即将他逮捕。1960年3月12日卫生所的干部王启云写信给党中央，反映饿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中央仿照“包文丞陈州放粮”，公安局侦破后，对王启云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

信阳地区妇联主任李瑞英（专员张树藩的夫人），到西平县看到饿死人，还听说有吃死人尸体的情况，想向在华北局工作的老战友李雪峰反映。为了不被人发现，她先给李雪峰的夫人翟英写了一封短

信："你们在家吗？如果在家请速回信，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们。"这封信第二天就退回来了。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都没有通信自由，可见极权制度的严酷。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内容是反映光山饿死人的情况，公安局就追查写这封信的人。邮局柜台的营业员回忆，发这封信的人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县范围内抓女麻子，让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报到，一个一个地检查，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事后才知道，写信的人是一位在郑州工作的女子，回到家乡光山县（一份资料说是潢川县）探亲看到饿死人，才写了这封信。

我1999年到河南调查时，在一些老人中传说张铁匠冒死上访的故事。后来在档案馆中我才得知这件事的详情。张铁匠即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张富，铁匠出身。他1959年12月到信阳调查生产救灾情况。他先后两次把所了解的情况向省委书记宋致和和省委常委兼省监委书记刘名榜汇报过。张富在潢川县了解了仁和、双柳两个公社。仁和公社杨楼大队有1900多人，当时死了300多人，双柳公社从1959年10月1日到12月26日死亡2363人。张富把所了解的上述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打印后分送潢川县委、省民政厅和刘名榜，并于12月底向宋致和与刘名榜作了口头汇报。

春节期间，张富又以拜年为名，到刘名榜家中反映信阳死人的情况。刘名榜装作打盹，只说了一句："工作上有错误，以后写个报告吧！"张富很着急，准备向中央反映。张富找到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肖剑波，表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意思。肖怒气冲冲地说："下面不是你说的那个情况。谁欺上瞒下？你到中央去告谁？"第二天，张富偶尔见到了刘名榜，刘问张："你为什么要到中央告状？你知道底下的问题没解决吗？什么事都要你过问！"张富准备去北京，受到阻止。先是民政厅的处长找他谈话，威胁他，接着民政厅党支部副书记找他谈话，并紧盯着张富一步也不离开。还对张富说："省监委来电话，不让你去中央，已经通知了公安部门，你想走也走不了。"后来民政厅赵厅长劝张富休息。第二天，张富去火车站买票，又受到阻止。

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不顾各种阻力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人也越来越多。1960年4月初，身为监委书记的刘名榜看到已经掩盖不住了，不得不向中央监委反映了固始县饿死人的情况。

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农民饿得走不动了，还不能在外人面前显出饥饿的样子，有的地方（如光山县）不让走不动的饥民走路拄拐棍。捂是捂不住的，有的信件还是转到了中央。中央派人到信阳调查。

7、死人事件暴露后还极力捂盖子

1960年5月。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县委报的死亡人数是500多人，不准多报。并连夜派人到各大队进行部署。经过部署的团结大队当即下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生产队长、会计：公社分配我们大队死亡人数34人，大队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数字不能多，不能少。各队分配数字如下：一队4人，二队5人，三队5人，四队5人，五队2人，六队7人，七队4人，八队2人。"还下通知规定，12岁以下的小孩不能统计。伞陂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523人，第二次报的是3889人（后又改为2907人），后来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6668人。

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随着问题的暴露，死亡人的数字就多了起来。"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亡18000多人，现已初步查明已达8万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来人，现已增加到近10万人。嵖岈山公社过去只报死600多人，现在查明死4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

信阳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揭发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的材料中说：1960年5月，杨蔚屏到信阳检查工作。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接待并陪同。使王秉林感到意外的是，杨书记一直没有提到去冬今春发生的问题。王秉林主动向他汇报信阳死人的问题，杨不表态。光山县秦河公社书记讲公社死人的情况，杨书记还是不表态。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向杨书记反映光山死了38800人，杨书记指示："弄清死人数字要心中有数，死人的原因主要是灾荒，死人问题以后不必再追究了，不必再查了……"

王秉林说，杨书记这次来信阳共10天，除在嵖岈山公社吃了一顿招待饭以外，其余都是在县以上的机关吃的，每顿都是五六个菜和一个汤，有肉有鸡蛋，还喝酒，看了一次戏和三次电影。

王秉林说，1960年5月，地委向省委书面报告死人的数字，省委在地委报告上加了"（包括正常死亡在内）"，以图缩小死亡人数，然后上报中央和下发各县。信阳地委在自己的检查报告中认为自己犯的是"方针政策上的错误"，杨蔚屏改为"是粮食工作中的错误，是主观主义和工作方法的问题。"杨书记这一改，就把信阳的错误性质大大减轻了。

1960年7月的地委扩大会议（即鸡公山会议）是捂盖子会议。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瑞英向本书作者介绍：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李立，

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刘名榜主持这次会议，信阳地委的领导人和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继续肯定“大好形势”，其目的是缩小信阳事件的影响，掩盖省委和地委的错误，减小省委和地委在信阳事件上的责任。鸡公山位于湖北、河南交界处，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清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在这里建造了一些避暑的别墅，民国年间被达官贵人辟为避暑胜地。一望无边的绿色山头上掩荫着一幢一幢白色的小别墅。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面色红润的领导干部们是面有菜色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杨蔚屏在会上讲：“信阳的工作总的是好的，省委是满意的。一般地讲，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的干劲都很大，热情高，有力争上游的劲头。错误是暂时的，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潜力是很大的。”“至于死人数字，48万或者45万都没有关系，不是数字少3万就好，多3万就厉害。”“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如果上半年搞还搞不下去，现在可以了，可以坐下来解决问题了。因为毛泽东主席给了我们一个指头的机会。”这是指毛泽东讲“三面红旗”中出的问题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有了毛泽东这句话，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说是“一个指头了”。

插李瑞英老人照片。文件：lmage-17

由于这“一个指头”的限制，会上不让彻底揭问题，很多与会者还没有发言，会议就开始作总结了。接着，由对地委的批评转为对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等个人的批判。这时，地委党校副校长严仲儒发言，继续尖锐批评地委的错误。杨蔚屏对地委副书记王达夫说：“这个人（指严仲儒）观点不对头，要跟他谈话。”第二天，杨蔚屏在讲话中就不指名批评了严仲儒。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说：“你们党校怎么出了这么一个副校长？”在严仲儒发言之后，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也发言批评地委。杨蔚屏说：“固始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不作检讨，还抓住地委不放。叫他作检讨。”根据杨蔚屏的指示，地委决定，将严仲儒的发言交给各小组进行“讨论”，叫杨守绩在大会上作检讨。在鸡公山会议捂盖子的时候，老红军、副省长王国华上了山，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路宪文，为张树藩和李瑞英夫妇说话，张树藩回忆中说：“王国华的发言在会上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说话的。”在鸡公山会议上，决定逮捕马龙山，并准备将他判死刑。省委是想用杀马龙山一个人来表示省委已经对信阳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以减轻自己的责任。

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2001年11月9日寄给我的《关于信阳事件的忆述》中是这样介绍鸡公山会议的：

信阳饿死人的问题已经掩盖不住了，李坚、李振海等花了三个月时间的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105万人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省、地委主要负责人心急如焚，从7月20日开始，信阳地委在鸡公山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省委派杨蔚屏、李立、刘名榜参加。原来被打成右倾的干部对这次会抱着很大希望。希望能揭开盖子。但是，这次会议还是捂盖子。面对这种情况，张树藩同志连续做了三次发言（总计长达1.4万字），揭出了信阳地区的实质问题，从而打乱了会议部署。路宪文、王达夫、延炳玉、武建华等人，背着张树藩开了秘密会议，认为张树藩继续进行右倾机会主义翻案，决定将会议转向集中批张。后在杨蔚屏等的干预下，才没有进行。....会议开到8月15日结束，最后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拘留。

1960年9月底，省委派杨蔚屏、刘名榜再次到信阳。由刘名榜向地委常委传达吴芝圃的指示："信阳地区在历史上工作是很好的，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成绩不小。发生这个问题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一个时期来说，至多也是三七开，至于广大干部党员，全区坏人也只占4%－5%，个别严重的地方也不过占10%－20%，不会太多。""信阳地区的问题是一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有错误。"在这个传达会上，杨蔚屏说："中央对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省委对路宪文的处理（当时路已被撤消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央没指示，省委也没有权处理他。"

1960年11月，中央派来的李先念、徐子荣、王从吾和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在吴芝圃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让张树藩在信阳步兵学校接待他们。在招待所会议室喝茶时，吴芝圃当着中央领导人的面对张树藩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把省委蒙在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对吴芝圃这种虚伪态度，张树藩毫不客气地反驳："芝圃同志，你真是一点情况也不知道吗？对我进行了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敢斗我吗？既然省委批准的，又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计产量时我说得少，反瞒产私分时我不仅没反出粮食反而拿出了700多万斤粮食去给群众吃吗？我说干部强迫命令、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才给我扣上了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省委批斗我的根据不就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么说一点不了解呢？对我的批斗不是你安排的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吴芝圃的脸红得像一块红布，非常难堪。张树藩还要继续说，陶铸连忙阻止说："不要再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你批错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了。

8、中央对信阳事件的调查和决策

据张树藩回忆，1960年2月，中央内务部郭处长到信阳作过调查，郭处长听说饿死了20－30万人，立即回北京作了汇报。“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以后，向部领导做了汇报，部领导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必武马上派李坚、李振海两位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

本书作者从李坚那里得知，1960年4月，中监委接到河南省监委的报告，派调查组到河南调查，调查组成员有李坚、李振海等人。2001年3月，经过李瑞英老人的介绍，本书作者到万寿路李坚的家中，采访了80多岁的李坚。中监委是中纪委的前身，李坚从中纪委副主任的职位上离休。这位老人思维还很清晰，但耳朵聋，交谈很不方便。经三次艰难的交谈，他告诉我他“三下河南”的情况：

1960年4月8日，王从吾将河南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反映固始的情况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4月12日，中央监委书记办公会议听取了王从吾向董必武汇报的全国城市党的监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据董必武在会上的指示，中央监委派我们去河南固始。

在这之前内务部钱瑛反映浮肿病死人的情况，谭震林批评了内务部，说：“浮肿是不是粮食问题造成的还没有结论。”所以去河南我是有顾虑的。我带了两个人去河南，在省里见了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他谈了一些情况，但谈得不多。省里又派了两个人，一共5个人一起去信阳。我们5个人都有顾虑：“彭德怀都挨整了，我们还能说话吗！”到了信阳，地委又派了两个人，一共7人。我们出信阳，经罗山到潢川，看到在山坡上、水沟里都有没掩埋的尸体。

我们到了固始，说死了3万多人。杨守绩在省党委校学习，我们就住在杨守绩的办公室里。第二天早晨起来，在固始县城街上，看到十多个人被五花大绑，用一根绳子穿起来游街，说是被抓的“流窜犯”，实际是逃荒的农民。

我们到商城，看到还在修水利。县委副书记告诉调查组，商城死了几万人。从商城到新县（将军县），路上看到一个妇女趴在路边不动，一看，快死了，用手摸她的鼻孔，还有气，就把她带到公社，让食堂给点吃的，活过来了。在光山县泼河公社，找水利工地上的人谈，他们都说家里死了多少人，公社死了多少人。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山东肥城人，南下干部，他说的死亡人数少。从光山县回到信阳路上，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男青年死在路边，尸体上趴满了苍蝇，天热了，尸体有气味。我们回到信阳地委，找到地委书记路宪文，希望他加强

救灾措施。我问路宪文：死这么多人，是不是坏人破坏造成的？路回答说：不可能是坏人破坏。他说饿死人的原因是浮夸，加上吃食堂。如果让老百姓自己去挖野菜，也不致于死这么多人。专员张树藩见到我哭了，我问死了多少人，张说40万。这40万是公安局说的数字。我怕这个数字站不住，我让我带的两个人在监委会上向各县监委书记分头核实各县死亡人数（后来告诉我105万）。我再到确山看一看，又到许昌看一看。在许昌停一天就回到郑州。到郑州核对，也说信阳死了40万。在郑州我住在省委第三招待所，当时毛主席也在郑州，住在第二招待所。我想，饿死40万，这是建国以来最重大的事，想找毛主席汇报这事。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去。我在郑州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省干部的活动。

吴芝圃让农业书记找我谈。我说，路上还有死人，救灾力度要加强，水利工程要缓一缓。

我们在河南除调查了信阳以外，还看了其它地方。我认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区一是信阳，第二是南阳，第三是许昌。我们心里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调查情况写了一个书面报告。中监委还没有上报中央，谭震林就不同意这个报告。他是书记处书记，是副总理，分管农业的。对这个报告意见不一致，就没法上报。中央监委常务书记刘澜涛又派公安部的于桑等去调查。于桑调查的数字是60万。这时才以王从吾的名义写了报告送给刘少奇。刘少奇批示："发动群众，把形势扭转过来。"刘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着手解决信阳的领导班子。

1960年10月，我们第二次去信阳。我带了三个人（有中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四个人。这次调查的数字是饿死人100万。我从信阳到新乡了解情况，看到原阳也饿死了人。我亲眼看到一个戴皮帽子的人饿死路边。在原阳我接到电话，中央要我回去汇报。我回北京后，安子文听了我的汇报，听完汇报后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报告。

在这期间，毛泽东也派人作了调查。11月15日，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也要解决三分之一地区的问题……"毛泽东主席的批示，把信阳事件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样,就把大批基层干部集中起来"集训"。

1961年1月，王从吾到中央党校当校长去了，我又到河南调查。到新乡、开封，也发现饿死了不少人。还说老百姓暴乱了。到下面一看，原来一个妇女，说自己是"皇姑"，向群众说："解放猪，解放羊，解放粮食散食堂。"这个"皇姑"被抓起来了。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四名干部

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处。10月24日，李富春将这一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26日上午，毛泽东在李富春送的报告中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这四名干部是不是李坚等四人？也许是李坚向我介绍时，大概时间太久，误将李富春错为周恩来；也许是从另一渠道的四名干部送材料给李富春。王从吾、徐子荣1960年12月1日《关于信阳地区封建势力复辟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报复情况的报告》上呈的领导人中，有周恩来、李富春，可见，除了周恩来以外，李富春是过问过信阳事件的。河南省委党校乔培华1990年10月30日上午访问王从吾记录提出了与李坚说的大体相同，是中监委通过安子文向周恩来汇报的：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排除重重困难，直接到村子里找农民群众了解情况。这才知道问题太严重了，饿死人的数目很大。后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又调查了其他几个县，情况同样严重。通过初步调查，查有实据死人数目70多万。这一情况立即汇报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的主要领导，他们感到问题重大，决定当天晚上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信阳的情况，紧接着，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又写了一个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的报告后，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向毛泽东主席谈了信阳事件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告信阳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原来没有一个人汇报，中央不知道。"会议上周恩来决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由周恩来亲自点将所组成的工作组是高规格的。组长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副组长是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他们率领从三个单位抽出来的几十人前往信阳地区。中央工作组在信阳调查了一个多月，情况比较严重的县基本上都走到了。中央工作组回到北京后，又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一份正式报告并附有零星报告和随时报告。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调拨大批粮食到信阳以解燃眉之急，同时指示从河南省直属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到信阳工作，帮助当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整社整风运动。

从各种不同的历史资料看，从1960年2月开始到1960年10月，中央不同的部门几次派人到信阳作过调查，10月份，毛泽东就拿出了基本看法。

毛泽东是怎样看信阳事件的呢？在中共中央转发的《信阳地委关于整

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4号）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文件一再强调“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但是，毛泽东这些话在什么时候、什么文件上批的，我还没有找到。中央调查组王从吾、徐子荣给“主席、总理、富春同志并子文同志、中南局陶铸、任重同志并省委”的报告称：“从群众的控诉揭发的事实看，完全证实了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千真万确的是反革命复辟，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地主、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

在甘肃省档案馆我看到了西北局张德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传达资料。

张德生传达说，毛泽东主席1960年10月27日、28日两次谈话，其中谈到信阳问题。毛泽东主席说，信阳很多地、富、反、坏篡夺了领导权，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区是大好形势，三分之一是大不好形势。大不好形势的地区有三种情况：一是地主封建残余钻到我们队伍中来了；第二种是我们的人蜕化变质，如信阳地区9个县委第一书记讨了地主的女儿做老婆，成为地主的代言人，只有一个没有变；第三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打人、杀人成性。

刘少奇也曾在一个报告上批示：信阳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让信阳人民来个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坏和国民党残余为什么能如此猖狂？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过去所说的“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对象是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反动派。按照这个逻辑，对信阳事件的处理，除了应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补课”。

实际上，信阳是老区，民主革命不可能不彻底。土改以后省委副书记孟飞曾代表中南局到信阳搞土改复查，结论是肯定的。但是，毛泽东既然这么说了，下面就得百分之百地执行他的意见。

于是，在信阳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矛头直指农村基层干部。

9、基层干部承担了饿死人的责任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等到信阳落实中央的精神。李先念是在大别山创建根地起家的，对这里民主革命是不是彻底，他应当很清楚，但他还是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意见。看见死了这么多人，李先念哭了。他说，我一辈子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在长征时西路军突围回到陕北，这是第二次。

张树藩回忆说，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前，中央派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在吴芝圃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不久，就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中央和省里来的干部亲自主持鸡公山会议揭信阳的盖子，搞民主革命补课。说信阳干部都不行了。中央从各部委抽调452名干部、省委抽调1844干部，信阳地委又抽调1483名干部，一共4779人（另一资料说中央派干部359人，河南省委派干部765人，抽调各市县干部2986人），来对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一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由新派来的人任领导职务。对原有干部进行集训。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人，已经集训了8000多人，特别集训5000多人，斗争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办的275人。已经有1327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1621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训了有开斗争。"李先念说，对这些人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吴芝圃、戴苏理亲自到固始县开万人大会，宣布杨守绩是反革命，当场逮捕。为什么对杨守绩特别重视呢？因为在1959年开始出现浮肿病人并有人饿死时，杨守绩没经地委同意就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吴芝圃这么重视杨守绩，显然是捂盖子，掩盖自己的责任。

大量的农村基层干部在劫难逃。以潢川县为例，当时的整风领导小组认为，全县12个公社中，6个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6个已蜕化变质。在178个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46个，占总数的82%；部分烂掉的25个，占14%。在1710个生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100个，占总数的70.3%；部分烂掉的有360个，占21%。潢川县整风领导小组统计，全县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15156人当中，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地、富、反、坏分子有2144人。

中央专案组于1960年11月20日上报了《关于信阳事件专案审查情况报告》，这个报告说：

信阳地区在去冬今春，由于路宪文等反坏分子篡夺了党政领导，以反右倾为掩护，大搞反瞒产运动，采取乱打、乱捕、乱杀等地主、国民

党的手段，对全区800万人民，实行了大规模的阶级报复，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恐怖局面。

信阳的问题，不是一般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不是违法乱纪问题，是地主、国民党的阶级报复活动，....各级党政组织变成了地主、国民党进攻人民的大本营。各级领导干部变成了统治、残害人民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杀人凶手。

报告说，根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和省委指示精神，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专案审查，审查对象是县委书记、书记处书记、县长、地直机关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干部，其他应审查干部由各县进行审查。报告说，初步审查的情况是：

按上述范围，现列入专案审查的39人，其中地委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13人：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地委副书记王达夫、石富荣、延炳玉、武建华、副秘书长王秉林、文教部副部长王墨林、宣传部副部长刘培林、工业部副部长贾西雨、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书记刘文彩、孙广生、淮滨县委第一书记石绍举，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等。

中央专案组将上述人员分三类：第一类是阶级异己分子夺了权，共12人，占30%。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如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地主家庭出身，以中农身份混入党内；第二类是被反坏分子拉出去了的，与反坏分子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共4人，占10%，如马龙山；第三类是蜕化变质分子，共21人，占60%，如王秉林、石绍举等。

在县以下的公社和大队，掀起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像土改时斗争地主一样，召开诉苦大会，对前两年为非作歹的基层干部进行控诉和批斗。群众运动一起，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出现了，有的公社干部80%、甚至100%地受到惩处。打骂、肉刑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上蔡县几千人被打，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又加在基层干部身上。

继全面夺权之后，又全面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措施是，将原信阳地区的各级干部，包括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和社队不脱产干部，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员、会计、炊事员等人，统统集中起来审查。每县少则数千，多则上万，机关、学校的房子都关满了人。被集中的有多少人？余德鸿说是40万人，张树藩回忆录说是20万人。集中起来的人，根据问题大小分别编为两种班次。问题大的编入特训班，限制人身自由，门前架着机关枪，在周围设岗哨；问题轻的编入集训班，也限制自由

和武装看管，但较松一些。

应当说，在极权制度下，本来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的确干了不少坏事。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大饥荒是全国性的事件，是由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造成的，从更深一层讲，是由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把责任完全推给基层干部，让他们作替罪羊，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执行者当成“反革命”、“阶级敌人”，而制定政策的中共中央还是“正确、光荣”，始作蛹者毛泽东还是“英明、伟大”，产生饥荒的制度照样是“无比优越”，这是一种妇孺都能辨别的低级谎言。

从中央派来大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对信阳事件的看法。

1960年12月6日，河南省委召开常委会，王任重（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王从吾（中央监委副书记）分别就信阳事件作了重要讲话。

王任重说：

这次中央开会，毛泽东主席两次谈了关于革命运动的问题。主席说，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没完成，民主革命也没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还要继续搞革命。虽然上一次主席就提出信阳问题是敌我问题，但是认识不深刻。这次主席这么一讲，特别是同志们讲了情况以后，认识更深刻了。

听了主席的指示，到光山县看了以后，思想才明确了，确确实实县社都有敌我问题。

现在看来，目前我们认识上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是不是把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地当成了敌我矛盾处理呢？不，显然不是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认识上有错误，那就是对明明显显的敌我矛盾认识不足，对打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国民党实行资产阶级报复的本质没看清楚。

国民党残酷烧杀抢掠也不过如此。最有名的湖北红安在10年内战时期被敌人杀了10万人。全县48万人剩下38万，但那是10年搞的。比较起来，光山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残酷的情况如果说不是敌人搞的，那就不可理解了。

明明看着群众死亡，硬是扣着口粮不发，明明看到食堂停伙，也不准群众家里冒烟，不准群众挖野菜，不准群众出去逃荒，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对待人民不如牛马，任意打骂，一直打到

死，连一点人性都没有，这不是敌人是什么？

要爱人民恨敌人，要领导人民申冤报仇。我看起码要杀他几千，甚至杀他上万。这些人为了保存他们自己，大批杀了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非狠狠地杀他一批不可。

在这些地方要进行第二次剿匪反霸，进行第二次土改镇反，进行第二次民主革命，要发动群众，打倒敌人搞革命。

为什么干部队伍烂掉这么多？为什么“五风如此严重？为什么党的政策贯彻不力？主席也问过我们，是不是搞了以后还会再犯？我们说，真正采取革命的办法，充分发动群众，搞好了，干部群众觉悟提高了，也许不至于再犯。

今后怎么办？挑选干部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地主女儿结婚，起码对领导干部要加以控制。

徐子荣在讲话中说，要把这一仗打好，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战斗。要把民主革命这一课补好，现在已经开始了，作为一个革命来讲，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现在是贯彻下去的问题了。现在看来，信阳问题暴露得差不多了，整个死亡人数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万人口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这确实是敌人的大谋杀。信阳从去年11月到今年7月经历了一场很严重的白色恐怖。如商城中铺公社88000多人死了8000多人，有500多个村庄被毁灭掉了。除了干部及其家属外，群众没有一家一户能幸免，一家死一个两个是轻的，有1900多户死绝了。

按照当时的思路，出现了问题就认为是阶级成份不好的人干的。事实上这些成份不好的人本身是受害最深者（中央调查组已有统计：信阳事件中五类分子比劳动群众死亡多），他们在土改、镇反以及各项政治运动中已经下入了十八层地狱，他们不可能干这么大的坏事。作为从事公安工作的徐子荣眼睛还是盯在这些人身上。徐子荣在这次讲话中说，有很多县社钻进来的五类分子、地主恶霸、封建爪牙、土匪、反动会道门、特务可是不少。应当肯定有的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石绍举有一班人，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胡闹一气，为了提拔坏人把地主改成富农。徐锡兰也是提拔了一批坏人搞坏事。马龙山问题更大，和香港派来的特务有勾结。分析起来，这个地区土改不彻底。现在专案不少，都要查，信阳已有三五千了。

王从吾在讲话中说，从信阳和其它地区暴露的大量材料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对

劳动人中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是阶级敌人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办国民党的事，是反革命复辟。信阳地区的党政组织的领导权被坏人夺取了，变质了，基本上烂掉了。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初步调查是地主出身，入党后私自改为中农，抗战时期和托派张慕陶有关系。其他5个书记，除一个被打击排斥以外，4个书记对信阳事件都有严重罪责。地委基本上烂掉了。全区18个县市先后任县委书记20人中，初步查出2个当过汉奸，12个蜕化变质，其中8人娶地主反革命的女儿做老婆。这14个人当中70%都有严重问题，现已停职反省。在职6个当中，一个当过伪保长，一个犯过严重错误，另4个待继续考察。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罗山5个县的县委书记共41人，有钻进党内的漏网富农，日伪保安队员、维持会长、三青团、强奸犯4人，蜕化变质25人，其中被地主拉下水的5人，这29人占总数的70%。

由于对信阳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复辟，因此，在对主要责任人定罪的问题上，中央监委和中南局的主要领导人曾经拟定过，在信阳，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每个大队杀3－5个人，全地区杀上万人。这个方案中央没有批准。最后决定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后请示毛泽东，他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最后的判决结果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判3年徒刑，8个县委书记的处理结果是：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死缓，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罗山县委书记徐书波、息县县委书记徐锡兰、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潢川县委书记梁代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淮滨县委书记石绍举、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遂平县县长张庆林、信阳法院院长丁张喜、信阳专署公安局局长韩仁炳，都判了几年徒刑。这些人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县委书记被逮捕法办以后，他们的家庭、亲属也受到株连。息县徐锡兰被抓走后，妻子也被抓走，抄了家，封了门，扫地出门。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儿子，因母亲关押不能带孩子，只好强行断奶，活活饿死。其余三个孩子最大7岁，最小的3岁，沿街要饭达三年之久。光县县委书记马龙山被捕以后，妻子带着孩子不敢再住在光山县，到处流浪，以拾菜根、要饭充饥，拾垃圾、卖破烂度日。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被捕后，妻子也抓起来了，三个孩子在家受凌辱，同学们对他们又骂又打。

当时在民主革命补课的大风暴中，他们都作了不很深刻的检查。

路宪文的检查说：“我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去冬今春在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等重大问题上，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在一个时期工作方针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说，他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抗旱斗争胜利后的农村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对秋季产量作了浮夸的估计，把灾年当丰年。高估了粮食产量，多征购了粮食；第二，对农村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在解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把粮食紧张的一切现象都说成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因而错误地在全地区范围内开展反瞒产的斗争。第三，我毫无群众观点，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我在粮食工作中存在着一种片面的观点，在征购上总想多征购一些，认为国家掌握了粮食出了问题有办法，在统销上总想少销一些。

显然，路宪文的检查和上级对他的定性相差很远。

当时被认为十恶不赦的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在1960年10月21日的检查中倒是说了一些当时没人敢说的真话。他除了承担一些责任以外，还认为：“这样严重的事件不是发生在一个县或一个公社，而是全区性的，并且普遍而严重。这就足以证明了地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够正确的。”（如果他知道这样严重的事件不仅发生在信阳，而且发生在全国，他敢说中共中央不正确吗？）他在检查中还认为，出现这个事件的原因是“几年来，特别是去冬今春以来，单纯强调所谓国家观点，将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并以此为纲，大反右倾，实行错误的思想方法和措施。”马龙山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简单，可能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才豁出来说出这样的话。

这些倒霉的县委书记现在大多数已经离开人世。1999年秋，我到信阳第二干休所找到了风烛残年的石绍举。在一个大院子里有一排一排的房子，信阳的一部分离休的老干部住在这里。走进院子，看到一位手拿拐杖、衣着不整的老人坐在一块石头上晒太阳。这就是石绍举。他步履蹒跚地把我们领到家里。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家里摆设简单而杂乱。在一楼的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很大的毛泽东主席像。我采访时他已经81岁了，思维不很清楚，但过去的事还记得。他说1958年在郑州和毛泽东主席一起看戏，看的是穆桂英挂帅。“毛泽东主席坐在第七排，吴芝圃陪着，我也在第七排，在边上。”他把和毛泽东一起看过戏当作终生的荣誉。石绍举是江苏人，1940年参军，七次负伤，1958年前后在淮滨县和固始县都当过县委书记。他老伴张生芝，当年任固始县妇联主任，倒是记忆清晰，表达得也很清楚：

1960年农历11月7日晚上10点钟，全地区同一个时间捕人，捕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大队和小队干部，食堂管理员、炊事员有的也捕了。固始县就押了3万多。先把他的枪下了，戴上手铐押走了。家

抄了，门被封了。抓走的人有的是被捕，有的是集训。他是被捕，我是集训。集训班四面都架着机枪。我沾成份好的光，很快把我放了。我要是出身地主就倒霉了。杨守绩的老婆出身地主，两口子全都抓起来了。他们4个孩子当时都很小，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父母抓走了，孩子们哭着喊爸喊妈。在固始开万人大会批杨守绩。

大概是老伴的谈话勾起了他的回忆，石绍举也接上了话荐：

对我是撤职查办管教反省，坐了一年牢。不过，还是吃干部粮。当时的事不能提，提起来我就睡不着觉。当时不是没有粮食，就是不敢动。看到农民没吃的，我找粮食局副书记周义原，我想借出三五百万斤，等收完了粮食再补上。周义原说，粮食是有，但是吴芝圃书记说过，国库里的粮食一粒不能动，每天进多少，出多少都要往地区里报，一下子拿三五百万斤那怎么行？其实当时早两个月发粮食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谈起饿死人，老太太把话接了过去。她说：

我奶奶饿死了，我姐姐也饿死了。我姐在息县，是头年11月饿死的。死后放在家里，没有埋。为的是想顶个名额，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实际上，食堂早就停伙了。第二年2月埋的。放了几个月，眼和脸被老鼠啃得不成样子了。家乡的人饿得没办法跑到我这里来，我不敢留，那时不让农民外跑，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我给点吃的赶紧把他们打发走。

我是妇联主任，最知道妇女的苦处。那时百分之六十的妇女不来月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妇女子宫下垂，直到1961年才有人生孩子。

图1-4 石绍举夫妇照片）

后来由于河南省和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信阳的情况，再说信阳是反革命复辟就太不符合实际了。对被关押的县委书记们也逐步放松了。1963年9月到10月间，他们先后从牢里放出来，分别到农场、农村劳动，每月发几十元生活费。1978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社会都解冻，又批准他们重新入党，重新定级，重新安排工作。有的人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人世。当他们知道全国各地都发生类似信阳的问题后，他们不服气，还不断地写信上诉，要求彻底平反。他们认为信阳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其责任不在下面，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更有责任。

路宪文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生活也比较俭朴。在那种体制下死心

眼紧跟吴芝圃，在吴芝圃的多次表扬下忘乎所以，加上下面几个专说好听的参谋，所以犯了错误。信阳饿死人的问题暴露以后，吴芝圃把责任全推到路宪文身上。他在批判路宪文的会上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我过去不认识你路宪文，现在我可认识你了！"下面干部就在省委书记面前求表现，纷纷上去殴打路宪文。原来一直保路宪文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慰屏表态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应当立即枪决。

路宪文在申诉书中一再强调，在信阳发生的事情1959年在商丘就发生了，信阳问题是商丘问题的继续和发展。饿死人的情况在全省都发生了，把信阳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处理是错误的。1993年，离休已经10年的路宪文得了癌症，他在病床上口述了《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文中总结信阳事件发生的原因时说，"错误地发动政治运动，用政治斗争的办法造就一言堂的局面，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这是一条重要教训。文中还写道：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因为党一再宣传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群众为空洞的宣传所鼓舞，都想马上过共产主义生活。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理权都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生产管理权、生活主动权，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所关心，群众对党组织有依赖性，不再留生活后路。粮食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没有。刚收了粮食就饿肚子。群众坚信共产党不会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食。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是产生信阳事件的社会原因。

我很想见一见路宪文，准备同他深刻谈一次，但是，在电话中，他当律师的女婿说老人身体不好，婉言谢绝。

二、"潘、杨、王"事件

路宪文说得对，信阳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南阳，在许昌，在商丘以及其它地方，都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只不过信阳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而已。河南问题不是某个地区的局部问题，而是全省的问题。有人说，没有"潘、杨、王"事件，就没有全省的大饥荒，也就没有信阳事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潘、杨、王"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1958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之间，十多万人挨整，20多万人受株连，100多人致死。两年以后，又说搞错了，为被整的人平了反。

多年来，人们对这个重大事件的情况不甚清楚。2001年3月到5月间，我三次访问当事人杨珏。从林业部部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杨珏住在王府井西边不远的晨光街10号5－14号。这是一个高级干部住宅区。他虽然已86岁，但思维清晰，他夫人冀雨不时插话补充。为了帮助我弄清历史真相，杨珏还打电话给在山西的王庭栋（在省人大常委主任的职务上离休），王庭栋很快给我寄来了他写的回忆材料。此外，我还查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才比较清楚。

“潘、杨、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潘复生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杨珏是平原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庭栋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1952年12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来当国务院总理的朱熔基这时给他当秘书）。当时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划归河南、山东、河北），张玺推荐潘复生到河南接替他的职务。王庭栋随同潘到河南省任副秘书长。1955年,杨珏调到河南任书记处书记。张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吴芝圃是第二书记，吴是河南人。在一般情况下，张玺调走了，吴芝圃很可能接任第一把手。潘复生来了，河南干部中有怨言：“河南就找不出一个省委第一书记？”这是批判”潘、杨、王”的人事背景。

吴芝圃，1906年3月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夏，考入杞县县立甲种农校。在这里，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924年暑假，吴芝圃考入了开封省立第二中学高中班，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他衩组织派遣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了毛泽东主讲的农民运动等课程，临近毕业的时候，他跟随毛泽东先后到曲江、海丰等地，参观学习阮啸仙、彭湃等领导的农民运动。革命战争年代，吴芝圃作为河南地方主要负责人之一，为革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对毛泽东崇拜有加。他也像毛泽东一样，酷爱古书，下乡时还带上一竹箱线装书随时阅读。杨珏说，在北京开会时，吴芝圃到琉璃厂花300多元买了一本旧书，非常高兴，一回到宾馆就津津有味地吟诵。下基层时坐着小面包车，还带着一箱古书。路过试验田，有人说：“你看这麦子长得多好，下去看看吧！”他们下去看了赞不绝口，到了地委，地委书记路

宪文在汇报时说今年收成不好，吴芝圃反驳说：“你应当下去看看，今年的麦子长得多好！”

1、潘、杨、王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为什么要批判这三个人？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分歧是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开始的。

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上，潘、杨、王等认为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毛泽东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芝圃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后来还有万户社。

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两万多人闹事（年前主要是闹社，年后主要是闹粮）。临汝县1956年下半年31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参与“闹社”的群众近6000人。商丘地区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个高级社中的242个生产队和40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1957年春节前后，全省开展了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仅商丘地区的民权、永城、夏邑三个县就有1397人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9人。

1954年7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芝圃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主持了工作。他一上任，就着手纠正他认为工作中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8条40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要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即农业税），不计征购任务（即向国家卖“余粮”）；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门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讨论后于1957年6月25日公布实行。接着，潘复生先后召开了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和地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区向群众深入宣传这个《宣传要点》，并切实推行这个《宣传要点》。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减少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他看到一些农民蹲在马路边看送公粮的马车，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泪流满面。原来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留给农民的口粮多是鲜红薯，一到春季就烂掉很多。他回来后向省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人均380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这些意见使他们戴上了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罪状。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不久，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农民都实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实行一个月就发不了）。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几个村办一个食堂，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人太多，打饭排长队。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吴芝圃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越性。

2、潘复生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免职

1957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五次全会（扩大）第一次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认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这次会还批评河南省委1957年7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会议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文件。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把潘复生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并提，同时也谈到“潘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复生、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确的，不处理也对”；“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有的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复生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把潘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潘复生同志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在会外吴芝圃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了河南的党内斗争，邓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

在这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月18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3、“潘、杨、王”的“八大罪状”

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就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义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

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

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

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

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

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等几个文件）；

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

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 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消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芝圃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

4、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此时杨珏还没有免职）等省委领导人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是，一回到省里，吴芝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

王”“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当时认为，这场运动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运动声势浩大。《河南日报》在显著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新闻报道。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的专刊。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历数其“罪状”。京广、陇海铁路的火车一进入河南境界，从车厢里的广播中就会听揭批“潘、杨、王”的稿件。根据省委布置的任务，全省各地到处都写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杨、王”的剧本。各级党组织层层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部署和讨论，并且通过座谈会、算帐对比会、报告会、展览会、广播会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大字报铺天盖地，据省委1958年10月统计，全省共贴出批判“潘、杨、王”的大字报16亿多张（原统计资料如此）。大字报数量如此之多，是因为层层往下布置。不写大字报，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复生”。在半年时间内，从省委机关到农村生产队，都在批“潘、杨、王”，都在“拔白旗”，谁要有不同看法，或曾经同意《宣传要点》的看法，就成为“白旗”被“拔”掉，成为“小潘杨王”而受批判。而在这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就会成为“红旗”而受到提拔重用。其实，多数农民是不得不跟着走，有不少人连什么是“潘、杨、王”也搞不清楚，很多农民以为“潘、杨、王”是“潘阎王”，是一个凶恶的人。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就在省委的九次全体会上，潘复生正患着病，发高烧躺在家里，与会者把他“揪”到会上进行批判斗争，不准他坐，不让喝水，批判者指着鼻子大声斥责，他只能低头认罪不能申辩。批判以后，潘复生拖着病体，走几步蹲下休息一会儿，休息了多次才回到家中。

潘复生家门口扎了三个稻草人，象征潘、杨、王三个人（这种稻草人在全省很多地方都有）。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还组织小学生从窗户向他们家屋里撒尿、砸石块。潘、杨、王三家的门窗玻璃全被砸烂，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床上地下满是砸进来的石头瓦片。他们除了要写交待、检查材料以外，还在专案人员的看管下，到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声念揭、批自己的大字报，念得口干舌燥不给水喝。每天下午都要挨斗，他们站在中间，低着头，批判的人辱骂他，有些人拳打脚踢，往他们脸上吐口水，吐得他们满头满脸。

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潘复生的夫人赵玉琴是老病号，也拉出来一场一场地批斗，杨珏的夫人冀雨是河南省委委员、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省委领导杨蔚屏多次逼她揭发杨珏，冀雨没有

揭发，就一次一次地批斗，也戴上了“严重右倾”的帽子，由正厅级降到副厅级。王庭栋的夫人刚生下孩子两天，被人认出，立即被赶出医院。他们三家的孩子也受到歧视，有的被撤消了学生干部职务，有的被摘掉红领巾，身心受到摧残。王庭栋的儿子患病不准住医院。连杨珏家不识字的保姆也被强令揭发，并动员她离开杨家，这位保姆说：“我走了，五个小孩谁管？”坚持留了下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8级降为11级，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由9级降为12级，在省里公开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的驴圈房里，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1958年7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祝贺：“我首先向河南的同志道喜。我祝贺河南省夏季大丰收，也祝贺河南战胜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拔掉了这一面白旗，也祝贺你们巩固了以吴芝圃同志为首的这一面红旗。”谭副总理的祝贺在会场上得到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的暴风雨强化了政治斗争的暴风雨。几乎各县都揪出了“小潘复生”，这些“小潘复生”所遭受的摧残比潘复生严重得多。据估计，全省揪出“小潘杨王”十多万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不下20万人，摧残致死一百多人。

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封住了人们的嘴，为说假话扫清了障碍。谁要对高产卫星、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就会成为“怀疑派”。“怀疑派”是和“潘、杨、王”“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就会成为辩论对象。而当时的所谓“辩论”，就是不让不同意见的人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判，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一听到不同的看法，就会有人说：“辩论他！”就会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挨打，接受训斥。

谁是谁非，群众心里最清楚，农民同情潘复生、不满意吴芝圃，省里张贴的布告后面吴芝圃的名字，被农民用牛屎糊起来了。

三、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旗帜

自1957年河南揪出7万名右派分子以后，知识界已经噤若寒蝉。1958年又揪出“潘杨王反党集团”，在党内和干部中形成了政治高压气氛，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中共全国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省委主办的

《中州评论》上就发表了吴芝圃的题为《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的长文，使主观唯心论进一步发展，讲假话更是异想天开。河南省演出了一场场闹剧，不仅给河南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全国起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

打倒了潘复生，吴芝圃就成了河南省的第一把手。他是反右有功而升官的，上台以后继续反右。以激进的态度推行“三面红旗”的政策。使河南成了全国注目的地方。

粮食产量放高产“卫星”是河南最先搞起来的，人民公社是河南最先创造的，不讲科学地兴修水利，深翻、密植也起自河南。河南不断地出经验，《人民日报》经常介绍河南的经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河南省已经成为全国“大跃进”的旗帜。

1、水利建设不讲科学，劳民伤财

水利事业不是单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集中更多的力量。而极权制度正好有这个优势。因为它掌握了全社会的资源，它可以调动全国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平心而论，在毛泽东主政的时候，中国的水利事业还是有成绩的，有的水利工程在邓小平时代还在受惠。但是，当时把事情做过了头，让老百姓作出了难以承受的牺牲。在搞水利工程时，不讲科学，只顾蛮干，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加以迫害，使得不少水利工程实际成了大祸害。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是最典型的祸害。三门峡水库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泥沙问题，抬高了黄河上游的水位，使渭河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造成了2003年巨大的渭河水灾。

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1957年10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后吴芝圃召开座谈会，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谭震林亲自赴会讲话。11月到12月初，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谭震林再次赴会讲话。12月7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情况简报》，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于是，1958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市、县领导、农林水利负责人开会，吴芝圃组织讨论1958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标。1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

教育。

据吴芝圃说，河南省投入1958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万，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88亿立方，蓄水能力262亿立方……灌溉面积共达到12546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48条巴拿马运河”。实际上，1957年度（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设只能完成土石方2909万立方，后来持续跃进的1960年度（1959年10月至1960年9月），也只完成土石方1.34亿立方。80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亿立方，到80年代，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万亩。全省地方资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设，1958年度是1.6亿元，1959年度是2.1亿元，至於群众投入劳动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

1958年同时有9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600亿立方米（其中7个省办大型水库库容达46亿立方米），库区主要在河南境内的丹江口水库，投入河南民工3万人。1959年，同时施工的大型水库已达11个，加上几十个中型水库，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的承受能力。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科学态度被“敢想敢于”所代替。昭平台、鸭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60年代后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传可灌溉1000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12万亩，后又全部报废。兰考—商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1958年3月至1958年8月），计划利用黄河故道蓄水40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1959年11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标，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盐碱化，1961年盐碱化面积达519.88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1958-1959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谓“一块地对一块天”。可是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铁佛寺、白果冲两座水库在没有建成导流工程的情况下，就将大坝合龙，在1960年5月17日夜突降暴雨时，大坝冲毁，近2000人被淹死。

在水利工地上的农民，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头两个月还能吃饱饭，到1958年10月以后，以及1959年和1960年，基本上饿着肚子从事繁重劳动。水利工地上的干部作风极为恶劣，对农民任意打骂和摧残，在水利工地上饿死、打死无数。中央调查组王从吾1960年12月6

日在河南省讲话中说，仅固始县三个大的水利工地上就饿死17000多人。上蔡，新蔡，罗山，遂平和豫北共产主义渠等水利工地上打死饿死人也很多。

2、大放“卫星” 农民遭殃

毛泽东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芝圃，对河南省的高指标和大跃进起著关键的作用。吴芝圃代表河南参加成都会议，提出完成前述指标的时间，比元月时的省委决定再大大提前。他对毛泽东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在3月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本书作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这是毛泽东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的长远目标，河南说一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会议过程中，毛泽东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被毛泽东肯定的数字，已是1957年实际指标的2.4倍。当然，毛泽东也曾几次对河南省的高指标表示担忧，但对吴芝圃还是鼓励多于批评。

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浮夸风。1956年苏联放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所以，1958年，中国农村就把农业取得很高的产量称为放了“卫星”。“放卫星”就是“浮夸风”最突出的表现。

浮夸风是从1958年夏收开始的。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开始叫卫星人民公社）韩楼大队队长陈世俊、妇女队长曹玉娥等种了2亩9分地的试验田，小麦确实长得不错。正准备收割的时候，公社社长钟德清来了。把陈世俊、曹玉娥等叫到大队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钟德清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只有放了高产卫星，才能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放卫星是为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也为咱们国家争光。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陈世俊问：“亩产多少才算放卫星呢？”钟德清说：“至少亩产3000斤。”听了这个数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过去一亩才打100多斤，一下子打这么多，是不是太离谱了。钟德清说：“我看你们这块试验田不错，打打试试吧！”曹玉娥说：“这块地再多也不过亩产七八百斤。”钟德清说：“大家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

望啊！”大家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出办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放恁大卫星，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放到一起打。”钟德清说：“对呀，弄到一起打不就中了吗！”曹玉娥说：“那不是哄人吗？”钟德清说：“你没看全国现在的形势，不跟上趟行吗？再说，这也是为人民公社争光，为党争光的事，我们吹点也是好心，要从政治上考虑嘛！”就这样，他们连夜割麦，割完就打。打完过秤，总共11178斤，按2.9亩算，平均亩产3854斤，最后扣点麦余籽，按3530斤上报。第二天（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方璜的报道：

卫星公社放出第二颗卫星--2亩9分小麦亩产3530斤。

继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消息传开之后（这个消息登在《人民日报》6月8日第一版），这个社的小麦继续打场脱粒，10日第一大队2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6斤，平均亩产3530.75斤，比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750斤的3 倍多。这个丰产奇迹是2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技术员陈根和、保管员陈红运等6人在小麦丰产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

这块2亩9分地的小麦长得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有120多万株。在麦收前，全县各地许多群众和农业技术员都来此作了参观评比。10日，这2亩9分地的小麦脱粒时，在打麦场上监督打场、扬场和过秤的有中共遂平县委委员、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卫星乡乡长银宗吾、卫星社社长钟德清和这个大队的干部。另外还有好几十个社员。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过数次丈量，丰产事实完全可靠。

……

方璜是本书作者的同事，是前辈，她已离休多年，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眼中，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好老太太。在她75岁的时候，本书作者向她问起这件事。谈起这段历史，她唏嘘不已。“我是奉命下乡寻找卫星的，下去后听县里的领导同志说韩楼放了一颗亩产3583斤大卫星，将信将疑。到了现场一看，真看到了好大的麦囤，又是当着县社的领导过的秤，心里虽然有点嘀咕，也不敢提出疑问，只好如实报道。谁知是假的！在这种体制下当记者，留下的只是惭愧和遗憾。”是的，在专制体制下，新闻只不过是专制者的喉舌。写什么，不写什么，记者是不能作主的。方璜一直对我说她有责任，对不起人民。其实，当时派谁去也得这样写，除非不工作。

《人民日报》为放卫星的消息配的社论更是加油添醋：

社论一开头就引用了一首诗："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接着写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这样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美丽的幻想和神话的东西，于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人们歌唱着的，就是已经实现了的或者很快就要实现的。""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有2、亩9分小麦亩产达到了3530.75斤。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当年在公社搞展览的原遂平县一中教师魏玉超对康健回忆说：报纸登了高产消息以后，省里来通知要办粮食丰产展览，要我们公社派人去。公社党委让我和曹玉娥去。展览布置好后曹玉娥回来了，我还留在展览会上。记得8月初，天很热，通知说中央领导来参观展览。原来是周总理来了。大伙儿很激动，手都拍红了。周总理来到遂平县人民公社展室时，讲解员江玉兰激动得忘了讲解词。周总理笑着对她说："别着急，慢慢讲。"江玉兰才恢复平静，讲起了亩产3853斤的经过。周总理说："你们放的卫星不小啊，听说西平县比你们胆子更大一些，放了亩产7320的卫星。"

周恩来于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两次参观丰产展览，当他看到西平县和平社二亩小麦平均亩产7320斤和猛进社一亩七分地的小麦平均亩产7201斤时，非常重视。他说："西平在你们那里，西平是第一的，是状元。"

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人们用常识作出判断：7320斤，在一亩面积的打麦场上平铺将近半米厚，这是不可能的。在人们的怀疑中，地委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去核实。王秉林回来说是真的。1999年，早已离休在家的王秉林在信阳市狮河宾馆同本书作者谈起了这段经历，他说，那是麦收后一个月才报的产量，我们看了装在箔屯子里的麦，也量了土地面积。当时我心里怀疑不是一亩地打出来的，在那种政治气氛下谁敢说呀？只好说是真的。我还没回来，《河南日报》就登了。

对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下面引用康健先生记录的一场"小辩论"的情况：

嵖岈山公社有一位叫刘金占的生产小队长，在生产队长扩大会议上，听公社社长钟德清传达信阳地委会议的精神，当他听到明年小麦要亩产一万二千斤时，他觉得太离谱,说："亩产一万二千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过瘾哩。"这一句话使他马上成了辩论对象。他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接受辩论。刘金

占慌了手脚，忙说："老少爷们，别动手哇，你说说这亩产一万斤中不中？"没有人回答他，在会议主持人的发动下，人们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拳打。不一会儿，刘金占鼻青脸肿。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还讲不讲理呀，你们都是种地的，一亩能产这么多小麦吗？"也许是良心发现，参加辩论的人们退缩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烟来。见辩论会冷场，主持人急了，说："怎么？刘金占的反动言论你们还同情？谁不和他辩论，大家就和你辩论！"这么一说，人们不敢怠慢，又冲了上去，一边打一边说："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讲理！"刘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主持人问："服了吗？"刘答："服了。"问："能打一万二千斤吗？"答："真能打一万二千斤。"辩论会就这样胜利结束。

康健先生就是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一直在当地工作，他这本书的材料都跟当事人谈过，是可信的。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一旦成为风气，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愈演愈烈。

秋收期间，河南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此时，农民在干部的威逼下，正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他引用毛泽东1955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泽东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表1-1 1957-1961年河南省粮食情况

项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	246	281	217.6	185.9	144.2
贸易粮	213.91	244.35	189.22	161.65	125.39
征购(亿斤)	63.89	99.79	67.65	26.58	22.62
销售(亿斤)	46.27	73.49	73.20	40.28	31.27
净拥有(亿斤)	196.29	218.05	194.77	175.35	134.04

总人口(万) 4840 4943 4979 4818 4830

人均净拥有(斤) 405.56 441.13 391.18 363.95 277.5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河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注：表1-1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一，《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原粮，征购和销售是贸易粮，为了便于计算，将原粮数换算成贸易粮（原粮数除以1.15即是）。二，此表中的（产量 - 征购 + 销售），即为当年河南省的粮食净拥有数。但是，《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生产年度（当年1月 - 12月），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当年7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例如，1958年粮食产量244.35亿斤（贸易粮），是当年夏收和秋收之和。而1958 - 1959粮食年度，所对应的产量是1958年的秋收与1959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计算出来的河南省各年粮食净拥有量是一个近似数。差别是，计算中用下一年的夏收代替上一年的夏收。由于夏收在总产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所以误差不是很大。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本书其安各省的粮食表格都同此注，不再另注。

1958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粮食部这个数字也是偏大）,却浮夸到702亿斤。1959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217.6亿斤，又浮夸到450亿斤。高估产的后果是高征购，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6%，达到99.79亿斤！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40.84%。1959年征购67.65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5.75%，此外公社还征了5.5亿斤自筹粮和周转粮。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而吴芝圃不相信农民没有粮食，认为生产队干部受富裕中农的影响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认为“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在全省大搞“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挨户搜查，拆屋掘地，批斗干部,致使大量干部群众被摧残致死。前面介绍的信阳地区血腥地反瞒产私分情况，仅是河南省的一个局部。

3、“大跃进”花样翻新

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先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为了让车子推得更快，又要求在车子轴上安滚珠轴承，实现“轴承化”。轴承

是一种精度很高、用硬度很高的合金钢制造的机器零件，一般工厂是没有条件生产的。而河南省要求农民自己做。仅商丘地区投入人员达100万，“户户是工厂，家家叮当响”。当然，这样用手敲出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即使这样，“轴承化”的经验在《人民日报》的鼓动下在全国迅速推广。种红薯与土地深翻是另一个热点，河南省在长葛县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全省种红薯2500万亩，深翻土地1.5尺，每亩施肥3万到5万斤。7月27日，农业部在长葛县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芝圃吹嘘全省深翻土地8000万亩，每亩施肥5万斤。7月到9月，每天有3000人参观嵖岈山，而参加各种各样现场会的人更是川流不息。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商城县人民公社的规模达2万户，7月20日，在城关镇召开成立大会，有10万人参加，除了国内多家新闻单位以外，还邀请了外国记者。苏联驻华使馆官员也应邀到会。会后，《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作了显著报道，国务院还为此发了奖状。

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工业、大办共产主义新村…，这些“大办”的资金和材料都是靠“一平二调三收款”得到的，即靠无偿剥夺农民得到的。连各家做饭的铁锅也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交了大办钢铁的任务，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作小高炉的燃料。而这些“大办”都是搞大兵团作战，“白天一片红（旗），晚上一片灯”，瞎指挥，强迫命令，稍有不听话的就捆、绑、吊、打，受摧残的人不计其数。1958年10月20日，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一份群众来信反映干部吊打社员逼人致死的情况，这封信经毛泽东批示后，中共长葛县监委调查结果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公社的第一管理区从1958年8月初到10月20日止，被打人员共122人，捆绑吊打的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皮带等10多种；还有多种形式的罚跪：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有人被逼上吊自杀。

河南省大炼钢铁也走在各省前面。1958年3月18日，河南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再次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万吨”。9月又召开大会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9月12日，《河南日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

吨铁”。9月15《河南日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9月1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 铁1.8万吨，放了“卫星”。10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顿时，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

由于征调农民去“全民炼钢”、“大办工业”、“大办水利”，1958年秋季收获时全省有一半粮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

由于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进入城镇地方工业企业，后来又炼焦炼钢，劳力十分缺乏，妇女大批走向第一线，家务劳动没人干。于是，公社办起食堂、幼儿园，搞什么“家务劳动社会化”。吴芝圃在《中国青年》9月号上发表题为《论人民公社》的文章，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以后，河南一些人也“牛”起来了，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150名学生到了河南。他们看到了一些实际情况，搞了一个《问题汇编》，这个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负责这件事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一场强劲的“共产风”。省委的报告却自豪地介绍，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他财产自动交给公家”。猪羊鸡鸭归公社，大蒜、萝卜、白菜也归公社。“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宣传为是吃饭不要钱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剥夺了农民自己拿饭碗的权利。

农村的风刮到城里，城市也纷纷建立公社、大兴基建、大办工业。1958年全省基建投入16.04亿元（当年财政收入仅14.16亿元），吴芝

圃高兴地说："截至8月底，全省新建和扩建各种厂矿378000多个。"这一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职工129万人，职工总数超过1957年一倍多。城市经济急剧膨胀，比例严重失调，加剧了粮食紧张。城市的共产风也将市民的私人房产收归集体所有。

1959年4月，在全国一度对1958年狂热进行反思，河南也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钢由80万吨调为22万吨，生铁由150万吨调为80万吨，粮食由500亿公斤调整为325亿公斤，基建投资由18.6亿元调整为13.6亿元。可是调整后的指标依然高不可攀，年终落实产量，钢只有5.14万吨，生铁69万吨，粮食只有97亿公斤。基建投资竟然仍按原计划，强行完成18亿。但是吴芝圃并不正视1959年的实情，在12月中下旬的计划会议上，要求1960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持续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增长55.7%，粮食270亿公斤，钢铁达到150万吨。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河南工农业、城乡供需关系、财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趋紧张，农村问题已非常严重。可是，吴芝圃仍然要高举"三面红旗"。1960年2月4日至19日，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

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吴芝圃等受宠若惊，进一步在公共食堂方面大动脑筋，1959年2月开始，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据说改革炊具32种，如跃进火炉、洗菜机、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用。1959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点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庐山。于是，省城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前期，由于发言中批评"五风"的多，没有打开炊具机械。毛泽东7月23发表了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妇联主任冒充炊事员担任讲解员。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机械化是假的，毛说上了史向生的当。

面对农村的严峻现实，一些农民和乡村干部在1959年尝试"包产到户"，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支持支持这些救命措施。秋后的反右倾斗争，这些措施被视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耿起昌、王慧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干部受到迫害。王慧智被整得神经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后面人追他，他一边跑一边喊："吴芝圃来了！"

四、至少饿死三百万

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河南省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量97.45亿公斤，下降22.9%；1960年农业产值再下降11%，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口粮告罄。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大量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全省牲口死亡74万头）。而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征购任务一点不减少。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断粮。吴芝圃在1962年1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年、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

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

1959年1月20日，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中说："春节那天，在夏邑、虞城，田野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两县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有的是排队买东西一头栽在地上就死了，有的在田野里挖野菜就倒下死了。2月25日，署名"山东即墨县1220部队全体官兵"的信中反映，河南省的虞城、夏邑农民口粮每天只有4.8两（16进位，相当于10进位的3两），谁要说吃不饱，就要被批判和挨打，说他们是右派。现在群众就像绵羊一样，不敢说话了。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1960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却以"开门红　春意浓"为题，继续粉饰太平，仍坚持全面跃进。1960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1960年3月，吴芝圃还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标有所批评，谭震林与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但在毛泽东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2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并于4月15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芬兰共产党党代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吴却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因此，死人的事不断

扩大，密县、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和黄泛区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大量死人的事件。除信阳以外，南阳、许昌两个地区也大量饿死人。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一，死亡比例不低于信阳地区。

南阳地区的唐河县毕可旦，1958年秋也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报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唐河都不落后。1958年秋，唐河县建起炼钢炉4617个，将锄头、铁锨等农具也扔进炼铁炉，让80多岁的老太太拉风箱，他还对上级检查的领导说："看，我们的老太太都能炼出钢铁。" 1958年6月7日《河南日报》在报眼位置报道了"唐河县湖阳镇民主农业社二亩四分小麦，平均亩产1106斤"的消息。6月9日，《河南日报》报道了唐河县郭滩乡、岗柳乡、长秋乡、湖阳镇、源潭乡平均每亩实产超千斤的消息。6月20日《河南日报》又在报道唐河县先锋一社谷子："估计亩产可达11625斤。"既然粮食产量高，征购指标也就高，唐河县粮食大量外调。1959年9月，食堂被迫停火。大批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到1960年春，因饥饿而死的农民达数万。毕可旦头脑清醒了，他先后五次向上级要返销粮，都遭到拒绝。由于唐河县"反隐瞒"不积极、被地区天天点名批评。接着，省、地委派工作组进驻唐河，认为唐河县"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组认为唐河县的班子已"烂掉了"毕可旦停职反省，接受审查。同时，南阳地委将淅川县、邓县、新野县4名主要领导逮捕，报省里执行枪决，省里又上报了中央，虽然最后未获批准，但是南阳各县的主要领导都很震惊。11月21日，中共唐河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实行"面对面、背靠背"揭发，毕可旦有意站在会议室门口同与会者一一握了手，当时同事们以为毕书记是准备去坐牢而告别。1960年头11月22日凌晨，毕可旦和妻子刘桂香带领4个孩子排着队一步步挪向井台，挨个跳进了井里。经抢救，只有刘桂香及14岁儿子毕剑增被救活，毕可旦及3个女儿毕金荣、毕玉春、毕玉英永远离开了人世。

在饥饿中，各地都有人吃人的事件。鹿邑、夏邑、虞城、永城等县共发现吃死人肉的情况20多起。据中央工作组魏震报告，鹿邑县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发现人吃人的事件6起。马庄公社马庄大队庞王庄贫农王玉娥（女，18岁），于1960年4月19日，将住在旁院的堂弟弟王怀郎（5岁）活活地溺死煮吃了。怀郎的亲姐姐小朋（14岁）也因饥饿难忍吃了弟弟的肉。

饥饿的农民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很多家庭连锅也没有，早被砸了炼钢。偷藏、偷吃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乡村干部抓起来批斗、吊打。除了饿死以外，被打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这至今仍是一个

谜。文革运动中，群众批判吴芝圃，有说死了300万。到20世纪末，也有人说河南饿死了500万。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确切的根据。

我们可以用《河南统计年鉴》上提供的人口数据作一粗略的计算。

表1-2 河南省历年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年份 年平均人口（万）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5 4606 30.79 11.75 19.04

1956 4693 35.85 14.00 21.85

1957 4787 33.67 11.80 21.87

1958 4891 33.15 12.69 20.46

1959 4961 28.06 14.10 13.95

1960 4898 13.98 39.56 - 25.58

1961 4811 15.25 10.20 5.05

1962 4872 37.50 8.04 29.46

1963 4970 45.08 9.43 35.65

1964 5089 35.84 10.61 25.23

1965 5170 36.10 8.45 27.65

1966 36.04 8.24 27.80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00年，第103页

大饥荒对人口的影响分两个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因饥饿使出生率下降，少出生人口。这两部分可用下面两个公式计算：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 当年平均人口×（当年死亡率 - 正常死亡率）

某年少出生人口数 = 当年平均人口×（正常出生率 - 当年出生率）

其中：

正常出生率 = [（1955，1956，1957年三年出生率之和）/ 3 +（1964，1965，1966年三年出生率之和）/ 3] / 2

正常死亡率 = [（1955，1956，1957年三年死亡率之和）/ 3 +（1963，1965，1966年三年死亡率之和）/ 3] / 2

当年平均人口 =（上年年底人口 + 当年年底人口）/ 2

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 - 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年后三年（1964 - 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计算出生率时，终点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各地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用表1-2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0.61‰；正常出生率为34.71‰。

计算结果如下：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1960年分别为10.17万、17.31万和141.8万，合计169.28万。1958-1961年少出生人口分别为7.63万、32.99万、101.54万和93.62万，合计235.78万。由于数据是官方的，这个死亡数字显然比实际要少。我们可以粗算一下，信阳至少饿死100万，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豫东以及其它地、县也饿死了不少人。吴芝圃在检查中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他没有说1958底到1959年10月年和1961年的死亡的人数，如果加上这两个时段的死亡人数，即使按吴芝圃的估计，总的死亡人数也有300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说河南饿死300万，实际情况只会高于此数。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结果是，1959 - 1961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93．9万人，与我的分析相近。

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中吴芝圃却没有受到处分。中共中央对基层干部和高级干部采取了双重标准。

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这个会的内容是对河南省自1958年以来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人们称之为所谓揭盖子会。这次会上除了揭露信阳问题以外，还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区的饥荒问题，如豫东问题，密县问题，长葛县坡胡问题等。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

次会议。开始大家不敢讲话，开到后来，大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有的发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阳事件中对地、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定性，说吴芝圃是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死官僚，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干敌人的工作，说省委是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要求对吴芝圃进行法办。在这种情况下，陶铸和王任重没有理睬这些批评，反而引导大家把省委的错误定调为“不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而是执行中央路线中犯了左倾冒险错误”。这就是说，河南省委没有犯“路线错误”，而是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错误。这样，错误的性质就大大减轻了。

陶铸和王任重对省委领导人和地县级领导人，采取了双重标准：地县级领导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反革命复辟，一律法办；而省委领导人却连“路线错误”也谈不上。显然，这种丢卒保车的办法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

王任重说，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如果他认为中央路线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倒也是实话，但他认为中央路线是正确的）。他列举：从1955年潘复生生病，吴芝圃在任河南省代理书记期间，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同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只是中间有点缺点，那是枝节问题；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也是执行了中央路线，当然，1958年也犯了一些错误。王任重对河南省委的工作进行历史回顾以后说：“河南省委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占什么比重呢？应该是三七开，成绩是七分，缺点错误是三分。”王任重为省委干部作了开脱以后说：“信阳地区死人到底谁负主要责任？信阳那么多人的血债应记在谁的头上？主要责任在哪里？应当说路宪文、马龙山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祸首。”

吴芝圃在检查中除了说自己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恶果很大，教训惨痛”以外，也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他这种推脱的根据，与毛说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一致，毛听了也会高兴。吴芝圃在检查中说：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看，在河南，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和部分篡夺领导权的县、社、大队已经超过了40%。最近排队的情况是：三类县（市）43个，占全省104个县的41.35%，三类公社256个，占全省1193个公社的44.05%，三类大队10476个，占全省27739个大队的37.8%。在这么多的地区，篡夺了领导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和灾害造成的困难机会，向农村中的贫下中农进行极端残酷

的阶级报复。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和破坏的目的，主要是毁灭人。敌人用种种剥夺人民吃饭的办法，用种种无休止的强迫人民劳动的办法，用奴隶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过的最毒辣的刑罚，活活把大批人饿死、累死、打死。甚至截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简直恢复到河南解放前国民党、地主恶霸、土匪流氓的黑暗世界。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

陶铸将会议意见汇报给周恩来，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处理意见：只要彻底揭露、坚决改正，可以不给处分，但省委领导主要成员作部分改组。吴芝圃没有受任何处分，陶铸对这个决定解释说："吴芝圃和潘复生的情况不同。潘复生是路线错误，而且是抗拒，不改正错误。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几年来工作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几个月时间内犯了错误，而且中央一揭发，就坚决拥护，坚决改正。"中共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常务书记，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1962年4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吴芝圃调到中南局主管文教。临走时带走了100多箱线装古书。广东老干部金明说，有一次毛主席到中南局，陶铸将书记处书记向毛一一介绍，毛主席见了吴芝圃说："啊，你在这儿咧！"吴哭了。还有一次，中南局几省干部开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

第二章　甘肃不甘

2000年8月，新华社甘肃分社副社长申尊敬邀请我到甘肃采访。我想，再过半年我就要退休了，过去几次去甘肃只顾完成采访任务，没有很好地收集资料，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我立即在北京准备好查资料的介绍信等有关事项。到甘肃后，恰逢申尊敬去宁夏还没有回来，我就抓紧时间到有关单位查了几天资料。这些单位比较开放，可以任意查阅，需要复印的大部分可以复印。在甘肃期间，老记者林田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介绍了一些情况。林田告诉我，饿死人最多的通渭县在定西地区，造成甘肃饥荒的原因之一的引洮工程，也在定西地区。申尊敬回来后，问我到哪里去采访，我毫不犹豫地说：去定西。这次采访回来后我发表了《水的故事》、《洋芋经济》、《定西思路》等五六篇稿件。其实，这些稿件只是为了报答申尊敬给我收集资料的机会，最主要的收获是了解了甘肃大饥荒的情况。我回到北京研究甘肃资料后得知，西北局1960年12月召开的兰州会议，是揭盖子的会，这个会上的文件、简报、发言集中反映甘肃1958 - 1960年的情况，可惜我没有找到。今后的研究者应当首先找到这套资料。

甘肃省在中国西北地区，东部干旱少水，十分贫困；河西走廊一带则靠祁连山的雪水，比较富裕。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两三年间，这里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也发生了严重的饥馑。这个省虽然地处大西北，但其情况和中原等省极为相似。先是严酷的政治运动使得人们不能说真话。接着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盛行。出现饥荒时又把粮食问题当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大批农民惨遭摧残，一批人死于人身摧残，更多的人死于饥饿。

一、用政治高压制造假话

1958年，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春节刚过，甘肃省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战争年代曾任第四军政委，至今仍然保持军人作风，还喜欢用指挥军队的办法来指挥地方工作。2月9日，他作了《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谈“整风运动”。他高兴地谈到，自1957年6月开展的反右派斗争、8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19500多个农业社中，有13000多个社的大辩论已经结束或基本结

束，有6000多个正在进行，有200多个即将开始。

张仲良轻巧地而颇有成就感地说出的这些数字，在其背后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此时，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还没有召开，全国“大跃进”的号角还没有吹响。张仲良得风气之先，提出“跃进！再跃进！”。他又用整风的方法来把全省的思想统一在“大跃进”中来，他自己觉得这是高明之举。

张仲良说，中国共产党甘肃省二届二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的成就，就是从我们党的队伍中揭发出以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为首的反党集团和其他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辨清了两条道路这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省领导的高层揪出反党集团，这是1958年初很多省都出现过的情况：河南揪出了“潘、杨、王”反党集团；山东揪出了李广文、赵健民、王卓如反党集团，福建省揪出了以江一真、魏金水（1959年）为首的反党集团，青海省揪出了以张国声（1959年）为首的反党集团，浙江省揪出了“沙、杨、彭”（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反党集团，安徽省揪出了李世农、张恺帆、刘秀山反党集团……甘肃省揪出了“孙、陈、梁”反党集团并不出人意料。

“孙、陈、梁”反党集团有哪些“罪行”呢？张仲良在这份报告中说：

1956年是我省大变革、大跃进的一年，孙梁陈反党集团却认为我们的工作‘一团糟’，‘今不如昔’。

他们不承认1956年粮食增产26亿斤的事实，反说这是省委谎报成绩。

孙殿才视察银川、吴忠地区后向省委的报告是一个十分露骨的攻击党的政策、攻击社会主义、要求恢复资本主义的纲领。

在羊入社的问题上，孙殿才、陈成义等人拼命反对省委的意见，使省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指示，在人民委员会上四次通不过。”“他们和党外勾结、相互呼应，党外人士说羊入社是‘二次土改’，他们就说羊入社‘一步登天’。

他们甚至和党外人士勾结起来，妄图要党接受他们保护地主、富农利益的反动主张。

在修水利问题上，党外人士说这是‘秦始皇磨民’，他们则说‘五百万亩

水地是6百条人命换来的’。

梁大钧骂别的专区粮食增产是吹牛，并且四次压低银川专区的产量，不完成省人民委员会的粮食征购任务。

这个反党集团对资本主义多加袒护，对单干户的‘八大自由’不加过问，也不同意省委的批判。在他们的支持下，银川地区不少群众积极经营自留地，热心为自己开荒，大量从事资本主义的副业。

张仲良说：“在我们党内出现孙梁陈反党集团，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说到这里，张仲良批评“党内一些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他说：“几年来，孙梁陈反党集团为了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维护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个人主义的野心的目的，他们曾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上，在反对地方主义问题上，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一直同党进行着斗争，党内一些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却分不清这个大是大非。”

张仲良在这个报告中，大讲阶级斗争。他强调“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批评“党内右倾思想严重和阶级立场模糊的同志”把许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张仲良“郑重地提起党内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注意”，“孙梁陈反党集团及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要活动市场之一，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严重右倾思想是他们的保护色。……这是十分危险的。”

张仲良拧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才把话题引到“大跃进”上来。他说：“长期以来，在甘肃省党内外流行着一种极其错误的论调，彷佛超越了现实是主观主义，而落后于现实就不是主观主义。孙梁陈反党集团一直就持这种论调。这种论调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前进中的主要思想障碍。它不仅挫折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影响了我们各方面工作的飞跃发展，而且给右倾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张仲良在这里提倡超越现实，这正是大跃进的思想基础。

然后，张仲良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站在事物的积极一面，向前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进派，不要站在事物消极的一面，向后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退派。”在那时，凡是与“三面红旗”有关的，就是积极面，只能促进，不能促退。

在报告中，张仲良介绍了甘肃省的“小马鞍形”，说明右倾思想的危害。这个“小马鞍形”是以水利建设为例的：在1956年，由于党内外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一个高潮完成了400多万亩水地。1956年下半年

到1957年上半年，因为吹了一股右倾歪风，开始洩了劲。省委提出了修300万亩水地的任务分不下去，减到250万亩分不下去，减到150万亩还是分不下去，最后定为130万亩。但是到了9月底，只完成了102万亩。这次整风运动，特别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又把干劲鼓起来了，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500多万亩，全年可超过1000万亩。

在介绍了这个情况之后，张仲良说："1956年生产大高潮之后，没有能够再掀起一个高潮，正是由于右倾思想顽强阻挠的结果。"因此，张仲良主张"不断革命"，即"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不断的进行革命。"张仲良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分子更恶毒、更危险"，"姓中的比姓右的更危险"。

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在全省制造了一种高压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干部有七个不敢讲：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征购指标高；不敢讲完不成任务；不敢讲邻省比甘肃强；不敢讲客观条件；不敢讲调动工作。甘肃省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高压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张仲良参加庐山会议，由省委副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霍维德召集在兰州的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并以中共甘肃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经过认真检查，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严重缺粮的七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这个报告还说严重缺粮的地区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粮，因缺粮和浮肿致死的现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已严重存在。但不久，这份报告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被认定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甘肃省志·大事记》）。" 张仲良从庐山回来以后，联系到甘肃的"马鞍形"，把霍维德、宋良成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地、县也有代表人物。通渭县委书记席道隆给霍维德提供材料（包括死人的问题）也被说成是"是向庐山送子弹、发毒箭"。在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全省大批判，持不同意见的人，说真话的人，都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1957年下半年到1960年三年时间内，就批判了19万多人，其中脱产干部4万多人。仅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重点批判斗争的脱产干部就有11000多人。其中高级干部151人。二届省委委员、候补委员47人中，有11人受到批判处分。省委常委内除少数没有受到批判或批评以外，其他都没有幸免。

张仲良反右倾大获全胜，9月11日给中共中央送上了好消息："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以迅速，争取九月

底全部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看了很高兴，让中共中央给省委回信，肯定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粮食奇缺，大批人饿死。

张仲良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党内政治斗争的主张：“党内斗争频繁尖锐正是反映了甘肃更穷更白、落后势力强大的特点，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更恶毒、更危险。”“不管敌我问题、思想问题，都是‘白旗’，统统都要扯下来。”等等。这些主张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冤案。

张仲良的这些主张不全是他的创造。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甘肃省的省级单位行政19级以上干部讨论这个会议的文件时，省委办公厅一位知情者发言说：“省委派人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甘肃反右倾问题时，书记处一位领导人问：“甘肃党内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尖锐？这是因为甘肃的跃进幅度大，落后势力强。”还说甘肃反右倾反得好，量大质高，马列主义水平高。1959年以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都到过甘肃，他们在视察中，对甘肃的工作持肯定态度。批判霍维德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

甘肃省的反右倾斗争制造了不少假案、冤案。天水地区就是一例。1961年1月5日，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主持的中央工作组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甘肃省天水地区反右倾斗争中大批干部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的报告。报告说，1959年冬，天水地区的反右倾斗争发生了严重的混乱。某些坏分子篡夺了党的领导，乱斗乱捕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并且捕风捉影，捏造材料，制造了大量假案，陷害好人。这种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1960年4月才停止。据统计，全地区共搞了103个反革命集团，集团成员达700多人。秦安县委第一书记宇文荣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其成员达103人。后经查明，这些集团全是假的。我们从镇原县“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可以看到这些假案的规模和后果。

二、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

《百年潮》1999年第4期发表了“中共镇原县委党史办公室”写的文章：《“大跃进”期间的镇原冤案》。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在这里摘要引用。

镇原县曾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属平凉地区。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年年都征购过头粮。1954年，实际征购粮占

总产量的30.5％；当年回销粮食占购粮数的27.1％。1955年受灾减产，仍征购了22.9％的粮食；当年回销粮为购粮数的106.3％。 1956年收成较好，但完成征购后，当年回销粮仍占购粮数的43.6％。1957年，大旱将近200天。 加上冻、雹、虫灾，粮食减产四至五成，平均亩产只有82斤。县里怕向上级交不了差，虚报为亩产95斤，后又被加码到115斤，并据此定下征购任务。结果，当年回销粮3300多万斤，为购粮数的130.3％。 1958年，因大部分劳力被抽调去大炼钢铁，大搞水利，丰产没丰收，当年回销粮食仍占到购粮数的75.6％。

由于年年都征购过头粮，农民家中毫无储备，经常青黄不接。农民不得不乱找代食品，吃苜蓿秆、洋芋蔓、棉蓬籽、谷衣子、荞麦衣等。浮肿、中毒、死亡现象不断发生。县政府一面派干部下乡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一面向上级报告灾情。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还以个人名义，向省、地领导机关写了报告。省、地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也多次到镇原县调查了解情况。1958年1月，平凉专署副专员贺玉卿带领工作组来镇原检查生产救灾工作，针对许多区乡已经出现的饿死人现象，决定还没有完成的100万斤购粮任务停止入库，以稳定局面，安定人心。贺玉卿还批判了虚报、冒进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5月14日，省委常委、新任平凉地委第一书记李正廷、副书记鲁践、专员崔世俊等率领20多名干部到镇原县的屯宇、临泾、开边、肖金等区乡调查了解群众缺粮情况后，报请省委批准，拨给供应粮食指标1800万斤。县上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作了安排。但是，由于地委领导在三干会上强调，镇原的粮食问题，根本原因是反革命在作怪，要彻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坏。于是，粮食问题便成为制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要起因。

1958年7月，平凉地委派出以副书记潘焕杰、检察长胡礼新为首的工作组进驻镇原县， 从粮食问题入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拔白旗”、“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寻找镇原落后的根子，搞起了所谓“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

工作组负责人一到镇原县，就夺了县委、县人委的一切权力，县级领导人都被派到农村工作。同时，让县里的公、检、法合署办公。在7月初召开的县人代大会上，潘焕杰点名批判大会执行主席许国和，并把镇原的过去一概否定。说镇原县解放前“地处敌我短兵相接的斗争前线，反革命势力相当雄厚”；解放后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都“极不彻底”；“农村两条道路辩论不深不透”；“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不少政治不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爬上了各种不同的领导岗位”。甚至还说“镇原县是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所

谓的“政治大革命”运动，成了全面打击迫害干部群众的运动。

就在这次人代大会上，工作组负责人以“右倾保守”、“地方主义”等“罪名”对许国和、张万寿进行了批判斗争，并宣布免去其县长、副县长职务。7月下旬至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镇原县三届一次代表大会，会期14天中， 就以9天时间批判许国和、张万寿、慕宗乾、范学俺等县、乡领导干部30多名， 会上被批判并撤销职务的农业社干部达400多名。潘焕杰在会上说：“许国和的问题很严重，他认为购粮任务太重了，供应指标太少了，这是政治问题”，给许、张等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反党集团”的帽子，并撤销了慕宗乾的县委常委和副县长职务，开除了1937年入党的县民政科长刘自的党籍。

工作组负责人认为“县人委完全变质，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据点”，县委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有问题，县公检法干部和警察都不可相信，于是让他们统统靠边站，连他们的亲属也不得幸免。许国和的妻子王珑，是镇原县委副书记，当时正在省委党校学习，被勒令回县，批斗数月，还逼着她与许离婚。许的岳父王子厚，是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中共镇原县党组织的创建者、陕甘宁边区树立的英雄模范，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也被揪回批斗，并被撤销了武都行署专员的职务。许的大哥许国福、二哥许国才(均系农民)、五弟许国治(党员干部)、弟媳李喜梅等都被无故株连，遭到批斗关押，许国才死于狱中。许国和70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批斗，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许的年仅6岁的孩子，被赶出县委家属院，寒冬腊月，流落街头，被好心的市民贺老汉收留到他家暂住，才得幸存。“集团”的其他成员，也都是一人株连一大片。

在农村，工作组则以“右倾保守”、“思想歉收”、“否定大跃进”、“替富裕中农叫嚣”、“反对粮食政策”、“煽动闹事”等莫须有的罪名，批斗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全县50％以上的农业社干部被批判斗争。

许多农民这个时候也被戴上“资本主义冒尖人物”等大帽子，遭到非法搜查，打骂捆绑。一时间，到处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组负责人仍不罢休，又提出：“要出几百万张大字报，进行全民大辩论，大揭发，开展拔白旗运动。”规定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每人每天写100张大字报，中学学生每人每天写50张大字报，内容还不准重复。于是，人人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没什么可写就挖空心思地胡编凑数；思想不纯的人，则乘机捏造事实，陷害好人。随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批判，许、张等人的问题升级为“右派分子、反革命”。9月中旬，更刮起了所谓“红色台风”，把问题上纲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县委每天都召开广播大会，宣讲许、张的“反革命罪行”。潘焕杰在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马上要着手排出反

革命集团名单，名单要多排，不断地排……”随即开始大逮捕。据地委工作组10月2日的《镇原县两个月工作情况报告》反映，已贴出大字报500多万张，“插红旗”．”两万多，“拔白旗”(撤换农业社干部)870多名，打击“阶级敌人”2000多人。其中逮捕了1041人。至10月20日，逮捕人数又增至1096人。

大逮捕时，全县分为五个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组成员或县委常委担任工作组长，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逮捕证，随时填写，随地捕人。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在先锋农业社听到群众反映没粮吃，请求供应回销粮，即指示随从人员把反映问题的人名记下来，立即召开群众大会，一下子就逮捕了48人。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同村里一个贫农社员同姓同名。在捕人大会上叫到这个名字时，那名贫农社员应声先站了起来，结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于狱中。另一次，工作组负责人和县委一副书记到马渠一带下乡，几天时间就抓了200多人，还用麻绳把人串起来，一串一串地往县上拉。

10月22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来到镇原县，听取了潘焕杰对当时镇原县情况的口头汇报后，竟然立即表态：“事不宜迟，迟则有变，立即逮捕，一网打尽。”当晚，他们便从平凉、泾川调来了公检法干部和公安部队。24日，县城戒严，到处架起机枪，如临大敌。然后，分三批逮捕了许国和、张万寿等县、社干部169名。10月31日，省委批准将此案定性为“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全县被定为案内成员和受株连的1650人，其中逮捕判刑的1503人(后死于狱中333人)，管制147人；前后受到批判斗争的有3000多人。

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逮捕关押的人，受到严重的人身摧残。逮捕时压倒在地，麻绳五花大绑，像捆柴一样，用脚蹬踩揉捆，有的当场就被捆得昏死过去，有的造成终身残废。许国和、张万寿入狱后，专门给带上20多斤重的特制镣铐，并采用各种酷刑进行折磨。张万寿因“认罪态度不好”，还给戴上“骑马铐”（即从裆下把两手铐上），站不起，蹲不下，几天几夜疼痛难忍，喊叫声惨不忍闻。

冤案的制造者不仅把矛头对准镇原县的广大干部，而且对于在镇原县粮食问题上说过公道话的省、地干部，如平凉地委第一书记薛程、专员崔世俊、省委副书记霍维德、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思宏等，也都进行了批判。镇原县的历任县委书记、县长，也都被集中回县进行检讨，接受批判。

30年代曾任国民党镇原县县长的邹介民，在红军援西军驻防镇原时，曾与刘伯承、张浩、李达、宋任穷、罗炳辉等红军将领友好合作，对支援红军有过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邹在陕西宝鸡任

职，肃反运动中，刘伯承、李达等证明他是民主人士。他与许国和、张万寿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见过面，却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成员，从宝鸡押回镇原，判处死刑，未及批准执行就死在狱中。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起义的董其武部下团长慕介夫，1958年在家养病，也被定为许张集团成员，逮捕关押，惨死狱中。他死前在狱中哭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共产党自食其言……”

正是在这场“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政治压力下，上面“一言堂”，下面“随风倒”，谁也不敢再说实话，报真情，自然也就“顺利”地很快形成了“大跃进”的局面。两个月时间内，就将全县87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10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县抽调7万劳力(占总劳力数的72.5%)到华亭等地大炼钢铁。在农村开展收缴废铁运动时提出：“交一把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把群众家中凡是铁的东西，从饭锅以至妇女的头发卡子，统统收缴了。大炼钢铁之后，紧接着又集中8万多劳力(占总劳力的83%)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口号是：“斩断三河，水上五原，大战百日，完成五渠三池一库，打井10万眼，挖窖8600个，实现井窖星罗棋布化”。与此同时，又提出几个“大办”，并很快宣布实现了“万厂县”，“七天扫除文盲”，办起了700所大学等等。

当时，各地竞相“放卫星”，牛皮越吹越大。什么千斤乡、千斤社、万斤川、万斤塬，深翻地15尺、亩施肥200万斤、亩下籽180斤、亩产粮40万斤、“耕一余十三”(即耕种一年所产粮食够吃十四年)等名堂，都出笼了，以至于把1958年全县的粮食亩产确定为比上年的实产翻两番。与此同时，还大刮“共产风”，提出“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钱大家使，有债大家还，劳动不记工，分配平均摊”等口号，任意平调劳力、土地、牲畜、家禽、农具、房屋、树木、生活日用品等，有的地方甚至连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都平调去了。如此“大跃进”，弄得群众苦不堪言，生活越来越艰难。

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经济上被肆意掠夺，生产积极性严重挫伤。据1961年统计，1958年以来全县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6708人。根据县委在马渠公社三个大队的调查，三年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2%。由于人口死亡和逃荒外流，使全县劳动力由1957年的12.8万，减少到1961年的10.3万，三年多时间减少了18.8%。同期，全县牲畜减少了4346头，存活的也都瘦弱不堪。

其实，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纯系子虚乌有。1961年12月4日，平凉地委向省委报送了关于平反此案的报告。省委于1962年7月17日批复同意地委的报告和结论。但是，由于当时的甄别平反工作

仍在某些冤案制造者的参与主持下进行，大部分问题只作了内部纠正，未公开平反，而且结论材料还都不同程度地留了“尾巴”。尽管大多数冤狱的干部安排了工作，但不少人使用不当，继续含冤受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庆阳地委协同镇原县委对此案进行了全面复查。1981年3月19日，甘肃省委发出为此案彻底平反的通知，指出：“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纯属一起重大冤案。”

三、“共产风”一波高一波

甘肃省的“共产风”两起两落。第一次是1958年秋、冬，刮起了一股很强劲的共产风，1959年6月至9月停止了（这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反“五风”的措施，两次郑州会议。甘肃省搞全民算帐，清理退赔），1959年9月以后“共产风”又重新刮起（庐山会议的影响）。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甘肃省委召开农业书记会议，提出三年过渡到公社所有制，要求公社一级经济要占全部农村经济一半以上。这使“共产风”越刮越狠。

甘肃省定西地区在1959年秋后再度刮起的“共产风”有以下形式：

——借发展社有经济为名，大办农牧场，无偿平调土地、劳动力、畜力。陇西县北寨公社办农场，就从生产队无偿拿走土地2700亩，牲畜132头，羊2000多只，猪150头；

——借机关大办粮食为名，机关、学校，任意平调农民土地；临洮县城关公社东街生产队共有426亩水地，被机关调走了311亩；

——借大搞千头牛场、万头猪场为名，猪、牛一律无偿集中，造成大量死亡。陇西县的社队办的猪场，猪的死亡率达80%以上；

——借基建征地为名，多占地，占好地。临洮县级9个单位，以基建征地的名义，占用城关公社土地92.5亩，分文未付；

——借大搞协作为名，不分你我，乱调劳动力，工分不清理；

——借调整耕作区为名，队与队之间无偿调拨土地；

——借“帮公社修办公室”为名，无偿使用生产队的劳动力和建筑材料；

——借公社搞储备粮为名，无偿调拨生产队的粮食。

“共产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土地荒芜，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十分恐慌，1960年春天，靖远县城关公社东关邻生产队听说公社要调骆驼，就把40多峰骆驼提前杀了吃了。东关生产队听说公社要办养猪场，就把40多头大小猪全都杀了吃了。

敦煌县1958年全县办成一个人民公社，县干部想快一点过渡到公社一级所有制。1958年，想把生产队的羊三年内变为公社所有，采取了“三、二、五”的办法，即公社调走30%，大队调走20%，生产队留下50%。牛、马、驴也上调不少。1959年夏季按上面的要求退了回去，但感到公社经济来源只剩下积累提成一项，农林牧副渔都没有了。公社经济如此薄弱，共产主义因素怎么能发展起来？秋季正好赶上反右倾，乘机又把羊收上来了，当时按羊只总数的20%上调公社。在公社的影响下各大队也“平调”生产队的财产，如大队办牧场，调生产队的牲畜。结果，集中到公社和大队的羊只由于管理不善，大批死亡。调上来的大牲畜，也死亡不少。时任敦煌县委书记的马骥英在1960年底总结教训时说：“如何对待共产主义？思想不明确。到底谁共谁的产？总认为要过渡到共产主义，应当是公社共生产队的产。认为社有经济大，过渡就快，快总比慢好。因此总是想从生产队上调，发展社有经济。”

郑州会议重新明确了所有制问题，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小队为基础），为的是从所有制上制止“共产风”蔓延。但是，甘肃省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批判过“四级核算”（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很多干部为此挨了整。再加上多年的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中形成了过渡越快越好，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越多越好。因此，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持怀疑态度。上面又督促公社大搞公共事业，公共事业的资金和物资从哪里来？只能从社员和生产队那里“一平二调”。

武威县永昌公社沈郁大队，自然条件优越，本来是一个富队。1958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刮得很猛。县、公社从生产队里乱调劳动力，调牲畜；用生产队里的青砖石灰修发电站；生产大队把小队的牲畜集中喂养；各队之间互调劳动力不记工分，修居民点、搞沼气，拆了社员500多间房子，花费了25000多个工作日，15000元；收回社员自留羊，砍伐社员的自留树。等等。结果，集中起来的60多头小牲畜只剩下3头。全生产队的牲畜不到1958年秋天的一半。社员积极性不高，畜力不足，生产下降，1958年平均亩产250斤，1959年平均亩产157斤，1960年只有63斤。1960年1月到7月，死亡141人。

民勤县新河公社西湖生产队也是一个刮共产风遭到严重破坏的生产队。这个队1958年初共有381户，1787人，其中劳动力521个，耕地2850亩。这里本来是一个生活水平较高的队。1958年冬季，刮起了强劲的“共产风”，大搞“一平二调”，以建社办工厂、幼儿园、食堂、兴修水利、建新村等种种名义，无偿调走社员和生产小队的土地、房屋、劳动力、牲畜、钱、粮、草、料、农具、家具。结果，从1958年秋到1960年底，大牲口由208头，减少到160头，羊由463只减少到75只。原有猪78头，到1960年底一头也没剩。大车由112辆减少到56辆。1958年粮食总产量54万斤，1960年只有19万斤。1958年社员每人平均收入32元，1960年只有10元。

四、荒唐的引洮工程

在粮食产量上搞浮夸，高指标、高征购，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刮“五风”（关于“五风”，请看本书第19章），这些甘肃省和其它省份没有多大差别，甘肃省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引洮工程。引洮工程集“五风”之大成，对促进甘肃省的饥荒起了重要作用。2000年8月，我在临洮县和岷县采访时，一些老干部介绍了不少当年引洮工程的情况。后来，我又看到了《炎黄春秋》1993年第3期上杨闻宇的文章，使引洮工程的情况更加清晰。下面所叙述的，了我在两县采访得到的资料以外，都是出自这篇文章中的资料。

引洮的出发点，是因为陇中和陇东严重缺水；引洮之所以造成灾难，是因为用行政强制办法去做没有能力做的事。

左宗棠说：“陇中苦瘠甲天下”，其所以苦，就是没有水。这里的年降雨量平均不到4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1400多毫米，而这可怜的400毫米的降雨70%以上集中于7、8、9三个月的几场大雨。春夏期间没有水，小麦不是出不了苗、拔不了节，就是灌不了浆，收成很低很低。

这里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地下水，不可能打井取水，除了雨季以外，河流大多数是干涸的。只有洮河是个例外，但除临洮县和岷县以外，其它县不能受洮河之惠。

这样，陇中和陇东地区大部分地区农业灌溉用水和人畜生活用水就全依赖雨季的降雨。恶劣自然环境造就了奇特的生活方式。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每家都挖一两口水窖，把雨季的水积存下来，供全年之用。所谓水窖，就是挖一个深几米的大坑，坑底和四周用红土夯实防

渗漏，下雨时存5 - 10方水，再在窖口盖上盖子。过去，在这里看一个家庭是不是殷实，主要不是看存了多少粮，而是看存了多少水。

甘肃中部东部是黄土高原，土层很厚，只要有水，这里一定是富饶之地。

据《岷县志》（1995年版）介绍，洮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在其上游的岷县，平均流量120立方米／秒，实测最大流量1500立方米／秒（P＝5％）。2000年夏，我到临洮采访，在县城旁边的河段，只见清流滚滚，目睹了大西北少有的丰沛的水量。

在大跃进的年代，中共甘肃省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把洮河引上黄土高原。1958年2月11日，在中共甘肃省委二次二届会上正式决定了“引洮水上董志塬的计划”。这个计划所划定的灌溉范围东西长320公里，南北宽200公里，灌溉耕地1500万亩。其工程的初步规划为：总干渠引水150立方米／秒，由海拔2250米的岷县古城水库起始，经临洮、渭源等县，到达海拔1400米的庆阳县董志塬，全长1150公里，总干渠水面宽40米，渠底宽16米，水深6米，50吨到100吨的船可以自由航行，被称为“山上的运河”。另有干渠15条，总长3500公里。引水工程还包括两座水库，估算土石方20亿立方米，浆砌石和混凝土约273万立方米。还可以利用落差建几十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34万千瓦。当时设想，这项引水工程建成后，20多个县面貌大变：“旱地变水田，山顶稻花香，米麦堆满仓，绿荫遍山岭，牛羊成大群，鱼鸭满池塘，电站林立，电灯齐明，机声轧轧，汽笛呜呜，船只如梭。”

引洮工程于1958年6月12日正式开工，先后动员定西、天水、平凉三个专区近20个县的干部和民工参加修建。职工达3000多人，民工10万多人，施工高峰时达16万人。计划四年半完成。平均日投入劳动力：1958年10.6万人；1959年11.2万人；1960年8万人。截至1960年底，两年半投入直接工6000万个工作日。

这个工程倡导者宣传的前景鼓舞人心，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1958年9月，全国第三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的447位代表参观了这一工程。国家水土保持办公室主任屈健和代表们给予整个工程很高的评价。动工以后，全国20个省、自治区的650名代表到工地参观。1958年秋季，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特地到工地视察，他说：“这个工程不但有全国意义，而且有世界意义……，引洮上山显示出我们不仅是社会的主人，而且是自然的主人。这里最重要一条是敢想干。这一点甘肃跑在前面了，这是共产主义风格，.....它使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前景。”在会川指挥部的山崖上，刻着朱德委员长的1958年10月9日的

题词：“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

从开工之日起，引洮工程一直是在“反右倾”、“反保守”的大批判中进行的。工程指挥部认为，右倾机会主义一遇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向党进攻，千方百计地企图迫使工程下马，迫使引洮工程失败。在大批判的高潮中，谁发表对工程不同意见，谁就可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这么巨大复杂的工程，却采取“三边”和“三分段”的作法，即“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和“分段测量、分段设计、分段施工”。后来又加了一“边”：边修改。按最初设计方案，总干渠上53座隧洞，总长64公里。后取消全部隧洞，总干渠一律改为明渠。对越不过去的崖头，或深劈而过，或长距离绕开。深劈之时，最深的竟达219米，最大的一处开挖土方竟达2300万立方米。数千民工站在崖头干了几个月，还看不出个眉目。事已至此，只好放弃深劈，部分采取隧洞。

古城水库设计容量为3亿多立方米，坝高42米。是引洮上山的枢纽工程。1958年5月第一次“土法”截流，发生决口而失败。7月初第二次截流初步成功，8月中旬洮河上游骤降暴雨，河水陡涨。洪水冲下来的木材、麦草堵塞了导流渠，大坝有被冲毁的危险，两万名民工的生命也受到威胁，只好决口排洪。决口排洪救民工被定为“破坏事件”，这件事的决策者受到惩罚。10月21日，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数万民工又掀起第三次截流。工程上马不到两年难以为继。甘肃省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张仲良在会上提出“引洮工程是我省英雄人民的伟大创举，是大跃进的产物，......只准办好，不准办坏；只准加快，不准拖延。”

但是，客观事物并不迎合张仲良的主观愿望。经过两年半的艰难施工，到1960年底，已无法进行下去。1960年12月，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改组了甘肃省委，张仲良下台。新的省委决定，引洮工程1961年6月全线停工。引洮工程局在总结与检查中提出了两个问题：1，工作量大，工期长，原规划中对引洮效益估计偏高，工作量估计偏小；按偏小的工作量计算，也需12亿个工作日；2，技术问题没有过关。如高边起坡稳定问题，滑坡问题，坡积地区的防渗、防破坏问题，黄土的防渗和湿陷问题等。都没有解决。

1961年8月17日至22日，水电部在张含英部长主持下，就引洮工程开了一个座谈会，认为，这一工程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有很多目前我们尚不能克服的困难。

1962年3月8日甘肃省委决定，引洮工程正式下马。

引洮工程动用了大量劳动力，影响了农业生产，还消耗了大量的粮食。例如，在1958 - 1959年甘肃省粮食收支计划中，全省征购粮食44000万斤，销售粮食13390万斤。而引洮及大通河工程就用粮7500万斤，占征购粮食总量的17%，占销售粮食总量的56%，其中主要用于引洮工程。

后来官方资料披露：“引洮工程三年耗费6000万元，国家投资1.6亿元，完成土石方1.6亿立方米，仅占计划量的8%，一亩地也没有浇上。已施工部分有的当年就被山洪冲毁。”

所谓投资1.6亿元，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在那个大刮共产风、随意调的年月，无偿占用了农民多少财富和劳动，是一个远大于1.6亿的数字。

有人说，“引洮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马，血淋淋的下马。”所谓血淋淋的下马，主要是指死人之事。工程拖到后期已陷入了全国的“困难时期”，工地上饿死无数。工伤死亡的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除了引洮工程以外，还安排了其它水利工程。就是到了1960年元月，省委布置修建容量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209座。1960年完成了191座。动员劳动力最多的时候达到270万人。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成功的水利工程。我的老家湖北省浠水县的“东西干渠”是1958年“大跃进”时开工的，六十年代建成后到八九十年代还受益。最有名的是河南林县1960年2月开始建设的“红旗渠”于1969年建成，至今还被人们当作奋发图强的典范。为什么引洮工程留下骂名，而“红旗渠”今天还被人歌颂？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是不能解释的。平心而论，在大跃进的荒唐背后，有些事情也体现了老百姓的心愿。问题在于独断专行的决策机制和强制性的执行手段。这种决策机制必然造成决策失误，强制手段必然造成对老百姓的剥夺。这种决策机制和执行手段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

五、全省普遍大饥荒

中共甘肃省委在粮食问题上搞浮夸，1958年粮食产量最初说是220亿斤，后来落实到185亿斤，最后说是完成了110亿斤，实际不到80亿斤。1959年又提出粮食总产270亿斤的大计划，结果离计划更远，比1958年还少。实际产量不高，但征购任务还是完成得很好。在1958年，甘肃省在中央里得到了“由缺粮省到余粮省”的好名声，省委第一

书记张仲良认为甘肃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征购任务一完成，口粮、种籽、饲料都没有了。

表2-1 1957 - 1961年甘肃粮食情况

年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 74.5 76.6 64.9 41.39 45.00

贸易粮 64.78 66.61 56.43 35.99 39.13

征购(亿斤) 16.91 22.2 25.09 12.34 9.65

销售(亿斤) 13.08 20.38 19.27 17.94 10.75

净拥有(亿斤) 60.95 64.79 50.61 41.59 40.23

总人口(万)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人均净拥有(斤) 485.63 505.51 391.46 334.31 332.25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甘肃分册》。

说明：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甘肃省的饥荒在1958年春天就开始了，当时农村就有饿死人和人口外出逃荒的现象。接着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张仲良一直认为甘肃是“余粮省”，不承认农村缺粮，听不进饿死人的情况。只要哪里反映这类情况，就认为这是政治问题，就大搞反瞒产私分的斗争，批判、斗争反映真实情况的人。1959年冬到1960年春，情况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张仲良等却在基层干部的政治态度上找问题的根子，仍然搞高指标、高征购，坚持左倾蛮干的作法。直到1960年7月，才被形势所迫，作了一次检查，向中央写了《关于检查一个指头问题的报告》，当时发生严重问题的县有13个，只报了9个；报告还说外流人的人口多半已经回来了。他们一面粉饰太平，一面让农民每天吃三四两粮食，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

一些干部在反瞒产私公中胡作非为。1960年初，清水县食堂已经没有粮食，还搞反瞒产私分。张树驿公社派公社党委副书记徐效瑞去松河大队支“发动群众、狠抓斗争”。徐到松河以后，一方面到社员家翻箱倒柜地搜粮食，还向公社汇报说查出了11万零920斤粮食，按每人每月22斤计，可以安排到6月底。除口粮安排好了以外，还可以征购5万多斤。为了让公社相信，让总支书记毛文清和生产队长造了一个名册，还代表社员在册子上按了手印，说口粮已经安排好了。结果这个队1月下旬就饿死了44人。毛文清自杀身死。在反瞒产私分中，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世荣指使总支书记王秉正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30多人，给有些被斗争的社员觜上戴驴笼头，身上驾上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40多人，并私设监狱，把3个生产队干部关押40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20多人，致死2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6人。这个县有些社队比白驼公社更严重。干部掌握了勺把子、秤把子，剥夺了社员的吃饭权。这些人残害群众的刑罚有100多种，其中有：在脸上刻字、拨头发、拨胡子、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淋开水，最普通的刑罚是扣饭、扣粮。问题被揭发以后，省里按中共中央的精神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在清水县进行了“民主革命补课，并将补课的经验在全省推广，称之为“清水经验”。

1959年在农村饿死人的时候，张仲良、何承华在河西地区检查工作，和张掖地委书记安振一起，提出把农村供应比例由80%、90%压缩到20%。为了证明农村有粮，何承华让人写了《农村一瞥》，极力粉饰太平。1958年省卫生厅到农村检查，写报告说浮肿病是“营养不良、劳动过度”造成的。省委常委会讨论时，对这个看法作了批判，说“这是攻击大生产运动”。有些地方群众向上级反映饿死人的情况，就封锁、打击。高台县县委第一书记杨某派干部到邮局扣押、修改群众反映生活问题的信件1万多份。这件事反映到省委，省委听之任之。

从1958春年到1960年底，“全省四分之三的地区严重缺粮。全省1300多万人口中，有700万人口每天口粮在7两以下（16进位，7两相当于10进位的4.375两）。没有食油，没有蔬菜，没有肉，这点粮食是繁重体力劳动的唯一能源。许多地方群众食不充饥，衣不遮体，屋不避风，成千上万人外出逃命，浮肿大量发生，疾病到处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芜。”在这场大饥荒中，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问题”（下面专作介绍）、“清水经验”以外，其它地区也没有幸免。

表2-2和表2-3，对当年的死亡情况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这两个表是甘肃省委有关部门1960年12月23日制作的，现存甘肃省档案馆。甘肃省当年这个人口数据和1990年代出版的《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中

的数据略有差别。

表2-2 1958年 - 1960年全省人口死亡情况 1960年12月23日统计

地 区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兰州市	1172840	9166	0.78	1236065	14586	1.18	1261521	7045	0.56
平　凉	2226510	19317	2.20	2248230	42134	1.67	2303158	38856	1.69
天　水	3230337	114331	3.50	3172816	46610	1.47	3033746	81607	2.69
定　西	2480864	26483	1.07	2548531	55993	2.20	2392720	107972	4.51
张　掖	2756347	59707	2.17	2800203	46982	1.68	2787016	73102	2.62
甘　南	340206			377016	6687	1.77	351614	10384	2.95
临　夏	874353	18511	1.55	898359	17384	1.94	882060	28992	3.27
总计	13081457	272465	2.10	13281225	228385	1.70	13011835	348388	2.68

说明：1957年全省人口：12726493；死亡人数：142044；死亡率：1.12%。

据表2-2，从1958年到1960年，全省死亡人口849238人，1957年为正常年景，死亡人口为14.2万人，按这样粗略推算，在近85万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的约有43万人。这样，从1958年到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仅有40多万人。这个数字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以临夏为例，表2-2中临夏回族自治州1959年和1960年两年死亡人数为46376人。而据临夏市工作组的总结，仅这个市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临夏市仅是临夏回族自治州的8个县级单位之一，而临夏市在这八个县中死人不是最多的。例如，据表2-3，和政县死亡人数比临夏市要

多。又如，1965年揭露的通渭县的死亡率是30%以上，而表2-3中只有18.4%。1998年1月7日的《甘肃经济日报》一版上发表的副省长员(上为厶，下为贝)小苏写的《正确认识甘肃粮食问题》一文中披露，在60年代的困难时期，“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会宁、定西、宁静、西海固地区采访，他们得知，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都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饿死人数，最少已近百万。由此可见，甘肃省全省饿死人数在１００万以上。

表2-3　1958年 - 1960年14个县市人口死亡情况　　　1960年12月23日统计

市 县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总人口	死亡人口	死亡率%
白银市	223612	1519	0.68	239512	2150	0.9	252818	1191	0.47
玉门市	170050	1262	0.74	182372	1384	0.76	186891	2524	1.35
酒泉市	336317	9072	2.7	365291	5962	1.63	389643	11458	2.94
张掖市	359440	9848	2.74	343285	6787	1.98	386512	16380	4.87
定西县	230902	2882	1.25	239181	6098	2.55	220713	10561	4.78
通渭县	281091	4155	1.48	270494	10229	3.78	213992	39473	18.4
陇西县	367641	4553	1.24	360434	16249	4.51	336367	17454	5.19
岷　县	386228	4249	1.1	398279	6389	1.59	360146	23649	6.57
静宁县	489633	6823	1.39	485070	11421	2.35	455070	121581	2.76
武山县	573751	11374	1.98	578306	9420	1.63	542217	28253	5.21
清水县	335357	13566	4.04	340000	8041	2.37	283472	16425	5.79
高台县	168456	5222	3.1	167788	2282	1.36	151131	10635	7.04
民勤县	230036	6574	2.75	242183	3740	1.55	204576	5012	2.89

和政县 276661 6500 2.36 277368 5128 1.85 265588 13361 5.03

这个资料虽然缩小了数字，但也说明了一个真相：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大量饿死人以外，其他地方也大量饿死了人，死亡率在5%以上的有六个县、市，占14个县市的42.9%。而且表明，庐山会议以后，继续反右倾，死亡人数增多，即1960年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1959年，死亡率也大大上升。

《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一书中提供了以下数据。详见表2-4。这些数据也是官方提供的，虽然也缩小了饥荒程度，但比其它官方数据较接近实际一些。

表2-4 1955-1966年甘肃省人口统计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总人口（万） 1155.04 1218.7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1240.1 1249.17 1290.03 1345.44 1392.97

出生率% 28.8 28.2 30 31.5 19.3 15.5 14.8 41.4 42.1 47.2 45.3 42.5

死亡率% 11.9 10.8 11.3 21.1 17.4 41.3 11.5 8.2 10.4 15.6 12.3 11.49

自然增长率‰ 16.9 17.4 21.7 10.4 1.9 -25.8 3.3 32.9 31.7 31.6 33 31.1

资料来源：苏润余主编《中国人口·甘肃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据表2-4中的数据，用本书作者的计算方法，计算结果是，从1958年到1961年，甘肃省饿死人66.67万，少出生人口80万。显然，由于这里使用的是官方数据，这里算出的近70万的非正常死亡是最低数。曹树基先生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年－1961年甘肃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02．3万人。

甘肃省档案馆保存的当年汇报材料的简报中，可以零星地看到饥饿的情况。

天水：天水地委1960年12月24日在给“省委生活安排领导小组”的报告中说，马跑泉公社峡口生产队患浮肿、干瘦、子宫下垂等因营养不

良造成的病人占总人口24.2%。公粮征购任务只完成一半，口粮每人每月按12斤算，也只能到明年2月份。这个报告说，像这样的生产队全地区有1800多个，占生产大队总数的40%左右。

岷县：省委农村工作部于1960年8月19日给省委的《关于岷县问题的报告》中说，岷县的问题十分严重，其中以理川、闾井、南川、南阳等公社最严重。全县患浮肿病的有5万多人。死亡21900多人，占总人口的3.16%。

武威：最困难的1960年情况不得而知，直到1962年元月，这里的饥荒还相当严重。中共武威地委1962年1月15日向省委的报告说："据永昌县委14日电话汇报，该县双贝、朱王堡、红山窑、宗家庄、八坝、焦家庄、西坡、河西堡、水源、陈仓、流泉、西湾、龚家堡、南坝等14个公社，有浮肿病等病人3255人，断炊1876户、8782人，占总人口的11.9%……地委认为，永昌1961年的粮食收成比1960年好，粮食征购任务已基本完成。但是，由于在征购工作中部分社、队把口粮、种籽也征购了，部分社队有些问题是可能的，但总是不会太大。"从这个报告的文字看，像是向省委解释和掩饰这里发生的情况，并不是报告问题。

甘南：直到1962年4月，这里还处于饥饿状态。1962年4月8日，中共甘南州委向省委的报告说："由于口粮安排紧张，人口外流现象仍在上升，疾病也有增长，宰杀耕畜的现象各地都有。由于种籽不足，今年粮食作物面积有完不成的危险。临潭县共缺粮369万斤，州上仅给110万斤，该县长川公社种籽缺142740斤，口粮缺198956斤，共缺341696斤，县上给了114000斤，口粮一颗不安排，只安排种籽26740斤，……由于种籽不足，不少公社和生产队已停止下种。……由于生活所迫，一些农民变卖家产、以物易物。浮肿病、瘦病、小儿营养不良症大量发生。……最近夏河县拉卜楞公社30多人在县里请愿，其它县也发生请愿情况。"

临夏：也是在全国形势正在好转的1962年，中共临夏州委向甘肃省委报告这处州保安族的困难："在全县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个民族的的生活更为困难。．．．．由于粮食问题得不屋解决，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为了保命，拆卖房屋，出卖家具、衣物，甚到卖子女，家的家具卖光，一贫如洗。疾病问题十分严重，患病者占总人口的22．8%。非正常死亡也陆续发生。外流乞讨日有增加。"

在枯燥的死亡数字后面是血淋淋的故事。长期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是延安时代的老干部，在1956年至1961年间，她任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书记处书记。在此期间，由于说真话，一度被打成"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1960年12月的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平反。在她81岁的时候（1999年），她自费印了一本回忆录《悠悠岁月》，这是一本很有资料价值的书，事情都是她亲身经历的，完全可靠。其中，对临夏在大饥荒的情况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资料。现摘录几段如下：

1959年12月9日，我下放到和政县苏集公社。这里群众没有粮吃，饿得干瘦、浮肿，有的冻饿而死。榆树皮都被剥光吃掉了！有一天县上来电话，说张鹏图副省长要到康乐视察，命令我们连夜组织人把公路两边被剥光皮的榆树，统统砍掉，运到隐蔽的地方去。人都快饿死了，哪有力量去砍树、抬树？我们办不到，留下榆树正好让张鹏图副省长看看。可张省长没有来。当时和政县委书第一书记是薛振田同志，为了保住乌纱帽，竟如此不顾人民死活！

有一次，我去临夏向葛曼汇报吃树皮、饿死人的情况。葛曼根本不相信，说那是地主、富农在捣乱，故意制造假情况，是给我们脸上摸黑。我说，讨饭、吃树皮、饿死的都是贫下中农呀。他说，富裕中农不敢出头，故意让贫下中农那样干的。你说的饿死人是因疾病而死，是正常死亡。他还让我去反瞒产私分，把粮食找出来，说在某公社搜出了几百万斤粮食。葛曼整天坐在州委办公室里，不下去看看群众吃什么，不看看群众怎样在死亡线上挣扎，却在临夏大兴土木，营造四大公园：红园、绿园、蓝园等。这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吗？但他确确实实是共产党的临夏州委第一书记。

何承华到河西视察，汽车陷在泥里。群众看是省领导的汽车，许多人奋不顾身地跳进冰冷的泥水，把汽车推出来。他却认为群众能推动汽车，一定有粮吃。就让农民报总编黄文清写了一篇为《农村一瞥》，这一瞥，不知瞥死了多少人。因为他们认为农村有粮食，就不供应了。

据中央派到临夏市工作组1961年3月18日的报告，临夏市1959年、1960年两年共死亡人口41381人，占人口总数的8.7%。死亡率在15%以上的有马集、韩集、红台、癿（读qie）藏四个公社。有些生产队和小队人口死亡达三分之一以上。红台小沟门生产队共有人口1267人，死亡414人，占总人口的32%。癿（读qie）藏公社锦光9小队106人，死67人，死亡率63%。全市死绝388户，留下孤儿100多名。有的生产队一天就死20多人，人死后无人抬埋。尹集公社铁寨生产队两个萝卜窖里就挖出60多具尸体。红台公社阳洼李家庄贫农马有卜全家10口人，全死在炕上，尸体腐烂了没人埋。有的妇女死了，小孩还爬在母亲尸体上吃奶。

不少地方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临夏市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

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乩（读qie）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乩（读qie）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乩（读qie）藏公社团结生产队贫农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插入李磊信其书的照片：

除了饿死以外，还有打死的。在农村，干部不仅掌握着"印把子"、"刀把子"可以对不听话的群众施以种种酷刑。甘肃省对农民的刑罚有100多种，如：脸上刻字、拔头发、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浇开水等。干部还掌握着勺把子，秤把子，可以随时剥夺农民的吃饭权。对不听话的可以扣饭、扣粮，让他活活饿死。被揭露出来的清水县的问题就比较突出。1962年12月3日甘肃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写道："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荣亲自指挥总支书记王秉振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30多人，给有些被斗群众嘴上戴驴笼头，身上驾着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40多人，并私设牢狱，把三个生产队干部非法关押了40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20多人，致死2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6人。有的社队比白驼的情况还严重，那里成了坏人统治的天下。"

中国城乡差别较大，在这次大饥荒中，城市情况要比农村要好得多。但是，处于城乡差别有利地位的城市，也发出了饥饿的呼喊。

1960年12月9日，甘肃省工交部反映工交系统出现了大规模浮肿病。白家咀永昌镍矿的近7000名职工当中，有60％的人发生浮肿病（腹部膨胀，像女人怀孩子），其中严重的占20％，已死3人。地质局和建工局两个单位的94名女职工当中有55名不来月经，其中半年的8人。主要病状是眼胀，发睏，四肢无力。

中共白银市委1960年12月18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积极防治浮肿

病发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写道：

根据最近检查，市属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单位及部分公社职工群众中，得浮肿病的情况十分严重。从11月份起，在白银厂、棉纺厂、交管局等几个单位首先发生，下旬逐渐增多，12月上旬，情况更加普遍和严重。病情发展的情况是，工人中多，干部中少，男的多，女的少、体弱的多，体强的少。其病状是：先眼皮、面部发肿，后逐渐发展到四肢浮肿。轻者早晨起来眼皮肿，中午好转，时肿时消；较严重的，头晕，腰酸，四肢无力，体温下降，夜间失眠，小便次数过多。更严重的腹胀，体肿，有的生殖器、膀胱肿大。主要原因是缺乏营养和劳动过度。

中共玉门市委在1960年12月11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在厂矿、企业、机关、党校中发生浮肿病情况的报告》中写道：

根据12月上旬了解，在我市厂矿、企业、机关、学校普遍发生浮肿病，发展仍有上升趋势，情况较为严重。据调查，仅玉门石油管理局、玉门铁路办事处、西北矿山机械厂、市商业局、市党校等14个单位，共有浮肿病人3132人，发病比率最高的单位，占人口总数的25%。症状：头晕头疼，脸肿腿肿，腹胀尿多，四肢无力，心慌畏寒。浮肿病人工人多，干部少；重劳力多，轻劳力少；集体食堂多，在家吃饭少。

中共酒泉钢铁公司党委在1960年12月30日发给上级机关的报告中，除了列举浮肿病人状况以外，还谈到女职工闭经、男职工阳萎大量发生的情况。酒泉钢铁公司是鞍钢援建的，职工多是东北人。当时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几个月没有供应食油，生活极为困难。“由于疾病大量发生，职工思想波动。怕死在戈壁滩上，要求回东北的职工增多，有的变卖东西，有的不辞而别。”

通常情况下，省会城市饥饿情况应当轻一些，但是，中共兰州市委在一份报省委的报告也发出了饥饿的呼喊：“从11月以来，我们陆续发现在部分干部和职工中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截至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在工业系统51个单位的68096名职工当中，患病者3346名，占职工总数的5.6%。在市级财贸系统的士3313名职工当中，患病者401人，占3.32%。在宣教系统的21个单位的1882名职工当中患病者226人，占12%。在市级党政治机关的5900名职工中患病者544人，占9%。值得注意的是，在兰州市幼儿园的145名幼儿当中，有浮肿的达31名，占总数的21.3%。”财贸系统有食品分配权，患浮肿病者比例最小。营养不足是发病的主要原因。“11月份兰州皮革厂23人的蛋白化验结果是，总蛋白低于6克（正常值）的有17人。中等体力劳动每

天需热量至少3500千卡，据605厂检验，职工摄取的热量每天只在2500千卡左右。”

在劳改、劳教农场中被强制劳动人情况就更惨了。据玉门地区劳改部门给玉门市委和省委的报告中说，最近以来，我市劳改、劳教农场疾病、死亡情况非常严重，而且呈上升趋势。1960年11月份以来，饮马农场和蘑菇滩农场共死亡265人，其中，饮马农场劳改犯188人，蘑菇滩农场劳教人员77人。饮马农场在11月21日一天就死亡34人。饮马农场1960年以来共死亡劳改劳教人员395名。大量死亡的原因一是饥饿，二是劳动过于繁重，三是进入冬天没有取暖条件。劳改劳教人员粮食定量少，还有一部分粮食被农场干部食堂尅扣下来。夹边沟农场是死人最多的劳改农场。甘肃日报记者王景和、和凤鸣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夹边沟和安西农场劳动教养。王景和饿死在夹边沟农场，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和凤鸣在安西农场九死一生。和凤鸣在晚年写了《经历——我的1957年》一书，记录了当年的惨状。夹边沟农场原有劳教人员2800多人，没有饿死的只有六七百人。不少死者的遗体被饥饿难耐的难友吃掉。这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直言获罪的知识分子。死难者的遗体因掩埋十分草率，累累白骨露在外面绵延两公里。每一堆白骨都包含着一个惨绝人寰的悲剧。现摘录这本书中一个死难者的悲剧：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董坚毅1952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劳动教养。后又转到夹边沟农场的高台明水分站。他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在董坚毅劳动教养的两三年里，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千里迢迢地到农场看望亲人。当时兰新线还没有与上海接轨，要转车数次才能到夹边沟。1960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死。11月上旬的一天，作为医生的董坚毅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对组长刘文汉说：“按照经验，她两三个月来一次，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见到她。”由于大量死人露尸荒野，董坚毅教刘文汉如何用衣被毛毯裹扎他的尸体。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时年35岁。刘文汉将他包扎停当，埋在一个由雨水冲刷的一个地穴里。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来了。她掀开窑洞的草帘子进来，急切地问：“老董在吗？”刘文汉只好告诉她：“老董已经去世七八天了。”这句话一出，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难友们见过的死亡过多，都已麻木不仁，见到她恸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对。两三个小时以后她终于镇定下来，要求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体。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埋葬董的地穴，尸体不见了。经过多方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老董的尸体

被抛在荒野。老董身上包的毛毯、鸭绒被已被人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于头上没有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和哭个没完，亲个没完！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几个人硬是拉着把顾晓颖扶回窑洞。后来，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刘文汉拿出自己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一条军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

六、通渭问题

在大饥荒期间，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件。虽然通渭饿死人数比信阳少，但非正常死亡率比信阳高。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当时，中共甘肃省委和中共中央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通渭在甘肃省东南部，属定西地区。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县，有2000多年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县之一。

通渭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特殊意义。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以后，"长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一直走到甘肃南部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俄界会议的决定，到甘肃东北向苏联靠近，以苏联为后盾打游击。

1935年9月21日，红军到了哈达铺（现属甘南自治州宕昌县），这是一个有几万人口的小镇，2000年我到这里寻找红军的足迹，看到的是一个萧条的小镇，但从沿街两旁整齐的木板铺面，可以想象出当年的繁荣。这里有一个邮局，红军从邮局里得到一些大公报（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在1935年9月2日和9月23日的大公报上，有"关中匪情"专栏，其中有"匪首"徐海东在陕北活动的报道："徐海东窜甘，刘子丹（原文如此——作者）进据绥德南区"。毛泽东、张闻天等看到这些报道才知道，陕北有一支共产党军队和一个革命根据地。他们一口气读完了这个报道，大喜过望。9月28日，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目的地，从此红军找到了落脚点。9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等随第一纵队到达通渭县城。接着党中央和军委机关的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随同第二纵队来到县城。找到了落脚点，部队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在文庙街小学召开的联欢晚会上，毛泽东首次朗诵了他在长征路上吟成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

丸

金沙浪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然而，24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的第9年，通渭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灾难。

1、通渭饿死人的比例最大

从1959年到1961年，通渭县大量饿死人的事，除了高层以外，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不知道这里曾发生过如此惨烈的事情。

2000年8月，我利用到这个县采访之余，就“通渭问题”召开了老干部座谈会、找了一些人个别交谈。我想在通渭查阅历史档案，县长也让档案室支持。但县档案室负责人说，上级有明确指示，有关“通渭问题”的档案不能开放。后来我通过别的途径，在其他档案馆找到了与“通渭问题”有关资料。加上老干部座谈会和个别访谈，我终于弄清了被掩盖40年的真相。

据新修《通渭县志》，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78462人，减少人数占1958年总人数的28.1%。1956 - 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为276742人（即1958年年末人口和1957年年末人口的平均数）按这个增长率计算，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应有人口299506人，1961年实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应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当于应有人口的32.8%。这98251人包括饿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据资料记载，1960年2月外逃未归人口只有3892人。地处大西北的一个小县，在两年时间内，人口减少如此之多，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象。

省卫生厅组织的医疗队一份报告描述了人们是怎样因饥饿而致死：

通渭县从1959年到1960年整整一年口粮不足，以致壮人体弱，老人死亡，妇女闭经，小儿萎缩，发生了大量的瘦病。长期营养不足，大伤元气，油尽灯熄，造成了死亡，消瘦和浮肿在症状上有所不同。但实际是一回事，主要是瘦。瘦的发展就会浮肿。浮肿实际是人体内部血浆蛋白胶体渗透压降低和新陈代谢减弱，血管后渗透力增加。血液的水份通过血管后渗透到组织间的间隙中长期滞留，形成水肿症状。因此，浮肿不是一种单一的病，乃是消瘦到一定程度的症状，是消瘦发展的表现。根据近一年所见，一般是消瘦——浮肿——消瘦——浮

肿，如此反复数次，最后形成低血糖性昏迷，心肌衰竭，突然死亡。

消瘦本身只是缺乏营养，没什么症状，容易被人们忽视，认为浮肿可怕，没有认识到消瘦的危险。马营、榜罗、第三铺等公社发生的死亡大多是这一类。最突出的是城关公社东方红生产队五小队张家岔村，1958年有人口204人，从1959年11月起到1960年底，人口减少三分之一。现有的128人当中，有65人生病，最近又死亡13人，主要是老人和小孩，都是突然死亡的。

消瘦与合并症：消瘦是缺乏营养使人体不能正常发育，甚至发生组织异变。消瘦除了营养缺乏外，也有伴随肠胃病、消化不良而致腹泻、下痢，大量蛔虫寄生。这是因为缺乏口粮，饥不择食，饮食不洁而来。城关公社双堡生产队乔底湾，全村23户，119人，有70人患病，除12人外，其他都合并有肠胃病和蛔虫症。这个大队的申家岔小队共35户，130人，患者97人，其中合并肠胃病的97人，合并蛔虫症的93人

根据通渭县的情况，对消瘦病产生的原因作出不全面的分析：

生活不好，缺粮少米，吃代食品发病就高。

因病体弱，长期不能恢复健康，

第三，代食品选择不对。新景公社有人吃了荞衣，再经过风吹，就会全身发麻，皮肤发痒，面部发黑，很快就肿起来。吉川、义岗公社有人吃了野蓖麻，轻者昏晕、肿胀，重则死亡。

生水、吃生粮、生菜，是产生寄生蛔虫、肠胃病的原因；

第五，由于粮少，家庭虐待现象较为严重。大人虐待小孩，儿子虐待老人，健康人虐待重病人，重男轻女，父母虐待女儿、媳妇。受虐待的，消瘦就严重。

第六，据说吃了死人肉的人，不愿吃粮食，且“瘦得肉贴骨头”，这类人在消瘦以前，表现眼结膜充血。

通渭，这个古老的县份，本来是一个礼仪之乡。但是，饥饿使人们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人格。食堂里打汤，起初是一家一个罐或一个盆，后来汤越来越稀了，人越来越急了，家里派去打汤的人在回来的路上边走边喝，还不到家就已经所剩不多。这自然要引起其他人的不满。于是一场场你死我活的争食斗争便在家庭里发生了。结果是一家人四分五裂，一人一个罐，每到食堂打汤的时候，人人怀抱一个罐，

一齐拥挤在门口守候，即使两口子也为争食而闹不和。食堂关闭之后，一人一口锅，各煮各的菜。那时在食堂里打饭时兴用脸盆或瓦罐（因为容量大），汤喝完了碗可以舔而且舔了又舔，但罐子无法舔，只有小孩会立即把头伸到罐里，舔不到的就用小指头一遍又一遍地捋到口里。一天，公社食堂里做的洋芋菜，一个公社干部的碗里掉下了一片洋芋，落到地上，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急忙伸手去拾，手却被这位干部踩在脚下了，孩子疼得大声喊叫，而那位干部好像没听见。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还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今后'病'一个埋一个。"县委明确指示，要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的报告称：在1959－1960年的大饥荒中"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个孩子失去了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000多头，羊被宰了40000多只，猪、鸡、猫、狗等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停顿，学校工厂关门，社会动荡不安。"

2000年8月9日，在本书作者召开的通渭县的老干部座谈会上，几位亲历者讲述了当年的惨状。他们说，《通渭县志》上的数字是向中共西北局汇报的数，是缩小了的，实际是饿死了三分之一。当时，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绝了。大量尸体没有人掩埋。1959年初冬，全县饿殍遍野。城关公社五星大队旧店子三个生产队共700人，每天饿死30多人，活着的人将尸体抬到木轮车上，拉到附近的水沟里集体掩埋。原鸡川公社马清凤（后为幼儿园园长、特级教师）一家八口人，除她在陇西师范上学没有饿死以外，其余7人全部饿死。7具尸体堆放一坑。后来县里要求"打扫卫生"，命令队里将土坑踏陷，表面上看不出痕迹。

参加座谈会的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县人大主任，当年是省冶金厅干部，是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说，1959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发生不少。1960年2月，他到中林大队(属城关公社)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是见不到炊烟的。他们进去的时候看到锅里正煮着什么，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方言，指眼睛不好或瞎子）。敬根年强调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锅里有只胳膊还连着一只手，看那手才知道是个小孩子。"后来又到襄南公社的吴家河，大队长董效

元告诉他们说，黑石头大队的蔡东花吃过人肉。碰巧他们正好见着了这个女人，眼睛红红的，头发脱落得很厉害，一头的头发茬子，很可怕。她还吃了自己亲生的不到五岁的女孩。问她为啥要吃的时候，她说饿急了呀。

那时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30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王书记当年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

2000年8月，我到通渭召开座谈会时，通渭县政协干部张大发在座，他是《通渭县志》的编者之一，对这一段历史比较熟悉，也有研究的意愿，还可以查阅通渭的历史档案。我建议他抓紧时间，抢救资料。在我这本书已经完成的时候，收到了张大发的著作《金桥路漫》，他走访了很多当事人，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也有很多人吃人的事件。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原碧玉公社玉关大队朱家峡生产队朱西，明里在草垛、地埂间捕食老鼠，暗中偷食人肉，后来将一窝蜂一次煮食，中毒致死。

一个只有四口人的家，儿子已经饿死了，剩下奶奶、儿媳和一个孙女。一天孙女也死了，年轻的妈妈望着死在院中的女儿发愣——她无力哭泣，哭也没眼泪。就在这时，奶奶从屋里爬出来，拖起孙女干柴一般消瘦的尸体，向后院走去。过了一会，年轻的妈妈来到后院，发现孩子已被奶奶碎尸后煮进了锅。后来，这个煮食孙女的奶奶也没能活下来，大概"罪孽深重"。

通渭县中医大夫卢念祖(已故)回忆说：1959年腊月，他三妈带着女儿到河沟里刮人肉，开始还颇有收获，后来去的人多了，碰上一具尸体，连骨头割下来几个人打平和（方言，即平均分）。一天他三妈煮了一条人腿，端给奄奄一息的他三爸吃，他三爸不忍吃，摆手示意让其端出去。可当他三妈刚端出客房门，就被几个闻腥赶来的饥民抢吃一光。不几天她三妈失踪了，人们在庄后的地埂下发现一双女人的小脚，从鞋袜上认出是他三妈的。

饥饿者捕食不到死人，便捕食活人。原陇阳公社车家岔大队卢家庄生

产队社员卢雄娃在串亲途中被饥民弄死，刮去了全身肉。鸡川公社某村一家社员，丈夫在外地工作，听说家乡发生饥荒，寄来了十多斤粮票。这女人把面买回来后，反锁大门，数日不出。好些天过去了，村里的人还不见这家门里有人走动，翻墙进去，几个孩子早已饿死了，但不见这位女人，以后也不知下落。70年代初竟东窗事发，原来这位女人弃下儿女，背着面逃走，但她还没走出村庄就被人杀后吃了。案发后，有人追查，但杀人者早死了，死无对证，不了了之。

原陇阳公社周店大队大湾生产队张四娃用木棒子将十二岁亲生女打死煮食，后来这一家四口人无一存活。申家山中年妇女牛某某把四岁亲生女儿弄死后碎尸煮食，也属同例。

还有一位干部身份的人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他家的故事。他说，当时，我们家有六口人，父亲去了洮河水利工地，我和弟妹由母亲拉扯着。母亲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不知在什么地方藏了点粮食，每当深更半夜，弟妹们睡熟了，母亲悄悄地把我叫醒，将一把用石窝（方言，即舂）踏细的熟面塞到我口里，然后用被子捂住我的头，等我吃下肚子，她才安然睡去。母亲为什么只给我吃，而不给弟妹们吃呢？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只觉得妈妈偏心我，至于更深的意思，我就不知道了。有一次，我看见母亲望着皮包骨头的弟弟妹妹脸上显得非常痛苦，问她怎么啦，母亲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不久，弟妹们都死了。过了一年，大约是1961年春，父亲从洮河回来了，母亲把我交给父亲说：“没办法，我只给你拉扯活了一个，就……就一个了呀。”话没说完，便“哇”地一声哭倒在地上。父亲把母亲抱到炕上，也跟着哭。这时，情况已经好多了，可是母亲整天哭得爬不起来，任凭我和父亲怎么安慰也无济于事，不久，母亲的眼睛哭瞎了，那时，她才三十多岁。一天天，我也长大了，我终于悟出了母亲当年的用意，她是为了保住我家的“香火”。

在第三铺乡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一对夫妇养了五六个孩子，连他们自己一共七八张口，怎么养活？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当母亲的把一个六七岁的女孩扔到野地里。可孩子并没有死，母亲看到那双翻动的眼睛，那双乞求的手，不忍心又把她抱回来。可是抱回来还是活不成，为了保住惟一的儿子，最后又狠心扔出去了。也许老天不要她的命，她抓吃身边的野草，竟然活下来了。她现在也成了孩子的母亲，想到那时的情景，她会有什么感慨呀！还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煮吃了小女儿，大女儿似乎觉察到了什么，拽着妈妈的衣襟央求道：“妈妈，你不要吃我，等我长大了给你添炕哩！”

那年年底，事态更为严重了。能逃的逃，不能逃的等着死，死了还有谁掩埋他们呢？幸好是冬天，尸体僵而不腐，否则将是怎样的一番情

景呢？更可恨那年月里的老鼠，常常成群结伙出来行劫，将尸体啃得不堪入目。

曾任通渭县副县长的白尚文，其母饿死了，曾任县人大主任的阎玉祥一家饿死6口人，今寺子赵家山的一位老人(当时为大队干部)回忆道:“当时村里已死人过半，可是生产队的仓里还有几十斤油渣、几十斤粮食，就是不敢分给社员吃。省委工作组长王秉祥来村查访时，问：‘人都饿死了，为什么不把它分给社员吃？’我们无言答对，心里却明白：谁敢吃呀！吃了也不得活呀!

2、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

1958年，通渭县的县委书记是席道隆，山西人，时年35岁，新中国成立前因参加革命坐过国民党的牢。县长是田步霄，陕西人，为人忠厚，办事认真，工作实事求是。

由于席道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工作积极”，省委对通渭县的工作很满意。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这对一个小县的县委书记来说，是无上的光荣。席道隆由于“坚持运用马列主义辨别方向”，成了全省干部学习的榜样。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是决定搞“大跃进”的会。席道隆在会上得到了“真经”，回来以后工作更积极了，立场更坚定了。

1958年，他们响应毛主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把全县原有的169个高级合作社合并为14个人民公社，全县为一个联社。在一个月之内办起了2759个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饭。农村管理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全县组织一个民兵师，各公社成为战斗团，大队为战斗营，生产队为战斗连，连下设排，排下设班。“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在生产上提出了“千斤元帅升帐（粮食单产），万斤洋芋上天（洋芋单产）的口号。在公社化中虽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农民抢收自留地里的庄稼，杀羊杀猪，他们说：“看着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为了清除阻力，全县开展共产主义大辩论。辩论的题目是：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建成共产主义？显然，对这样深奥的问题农民是说不清楚的。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共产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谁反对组织人民公社，谁就是反对共产主义，谁就要受到批判、斗争。有不同看法的就是“白旗”，要“拔掉”。仅1958年，全县共“拔白旗”565人（其中县机关干部3人，公社干部11人，生产队干部66人，作业队以下干部485人）。这是定西地委组织部1959年复查时的统计数，实际“拔白

旗”的人数要多得多。有的公社下达“拔白旗”的指标，生产队为了完成指标，谁开会来晚了就“拔”谁。在“拔白旗”的同时，对那些积极跟着跑的人“插红旗”，即表彰，这使一些青年人更加狂热。中共通渭县委1965年7月5日《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指出，从1957年到1959年，在大辩论、拔白旗、批判富裕中农冒尖人物中，共错批判斗争农民10360多人。

为了迎接共产主义，全县大平大调，大刮共产风，使农民受到很大损失。从土地、劳力、畜力、农具、树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财物，平调总价值990多万元。

在生产上集中指挥。种什么，不种什么，不根据农民的意愿，不顾自然条件，提出“四不种”、“五消灭”、“八登殿”，随意改变种植结构。与此同时，把大量劳动力调离农业生产战线。1958年春，抽调劳动力17900多人（占总劳动力的19.7%）大搞工业。5月，又抽调18000多劳动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8月正当田黄在地，不顾收割，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的检查，以10多天时间，集中5万多劳动力（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51.4%），从刘家埂到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60公里的长蛇阵，扎彩门，飘红旗，大字报满山，锣鼓喧天，突击水土保持工程。10月，又抽调25000多名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1959年，又调5万多劳动力兴办水利工程。一个仅有20多万人口的县，如此大规模抽调劳动力，使得耕地荒芜（年底荒芜耕地11万多亩）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16423万斤，1958年11576万斤，1959年8386万斤，1960年3632万斤。

一方面粮食大幅度减产，一方面向上级虚报粮食丰收。1958年计划总产38000万斤，秋后上报数为26000多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2.25倍），征购任务定为4360万斤（实际入库4154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36%）。1959年计划总产24000万斤，秋后上报数为18000万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2.15倍），征购任务为5400万斤（实际入库3958万斤，占实际总产量的47.2%）。当然，这些没有完成的计划数和浮夸的上报数也是上级逼出来的。

3、“完不成征购任务，提头来见！”

《通渭县志》上记载的历年粮食征购数比上述报告要少一些，但两者还是比较接近。从县志上列出的历年数字可以看到从1953年到1959年通渭人民负担之重。到1960年，由于人口大量死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征购任务不得不大量减少，一直到90年代还没有恢复到1959年的征购水平。

表2-4 通渭县历年粮油征购统计（单位：万斤）

年度	征粮	统购粮食	征购合计	统购油品
1949	758	/	758	/
1950	856	/	856	/
1951	958	/	958	/
1952	989	/	989	/
1953	846	1137	1983	/
1954	863	1760	2623	/
1955	873	1837	2710	148.37
1956	1123	2476	3599	127.11
1957	1399	2897	4296	128.23
1958	1265	2785	4050	82.48
1959	1428	2398	3826	78.36
1960	140	36	176	0.34
1961	389	227	616	13.58
1962	384	225	609	2.06
1963	419	175	594	24.68
1964	485	675	1160	39.31
1965	455	844	1299	57.47
1966	526	833	1359	54.96
1967	527	802	1329	23.54

资料来源：《通渭县志》，第361页。

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征购任务又逐年增加，只好让农民勒紧裤腰带。早在1957年粮食征购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很紧张，政府动员群众卖陈粮、吃陈粮。公社分配时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出现饿死人现象。到1959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中，就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草衣、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进入1959年春天，定西地区粮食局势日趋紧张。到5月20日止，全区库存粮食仅有6208万斤。销售量每天平均达110多万斤。由于上一年秋后征购了过头粮，到春天需要大量返销给农民。5月份，粮食供应面达45%左右（正常情况供应面10%左右），而且供应面继续扩大，有可能达到65%。由于1958年上报的数都是大丰收，现在这么大的供应面，很多人不相信，认为农村有粮食，要求供应粮食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面对农村大量需要的粮食供应，省委提出“需要服从可能，销售服从指标，安排服从调拨，农村服从城市”的原则。这就把向农民供应粮食压到最低位置。同时，要求各地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加强粮食征购。根据这一方针，定西地区一方面对各县提出了粮食控制计划，另一方面继续向农村要粮。

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死，中共通渭县委却不承认现实。他们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谁要求供应粮食，就给谁扣上“以粮食问题攻击县委，是富裕中农，是怕死鬼”、“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动摇人心”等等政治帽子。县委认为“当前粮食赶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一起搞鬼，要进行打击。”“剥树皮是冒尖人物搞破坏”、“闹粮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团”，还说“装病、闹粮、剥树皮、要统销粮、不论耍什么花招，玩弄什么手段，我们心中有底，顶住了这股歪风，丝毫没有被假象所迷惑”。县委召开全县电话会议，要求公社召开“万人斗争大会”，生产队召开“千人斗争大会”，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批斗要求政府供应粮食的农民和说真话的基层干部。还提出“对富裕中农要来个双倍打击、加倍赔偿，算清不劳动、破坏生产、不合法收入三笔帐，把他们压在泰山底下，叫他几辈子翻不过身来”。

通渭县委这么做，是上级逼出来的。高征购指标是国家定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又是一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官员。在他的高压政策下，干部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指标高，不敢讲公购粮食任务完不成。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说：“党的历次斗争的胜利，都是反右倾的胜利”，“防左容易，防右难”，“在反右倾斗争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定西地

区从1958年以来产量一年比一年低，而征购任务一年比一年高。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在电话会议上说：“公购粮入库时，是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手段。”1960年春季，农村断粮时，窦明海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窦明海是省委书记张仲良十分看重的干部，是全省有名的“积极分子”、“先进人物”。正在粮食紧张的时候，省委决定将席道隆调往岷县任第一书记。岷县的条件比通渭要好一些，人口也多一些，这一调动对席道隆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省委有一个附加条件：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以后才能到岷县上任。为了早日到岷县上任，席道隆就采取了更加严厉地手段加强征购。

1959年8月开始，通渭县“反右倾“斗争，有1169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被说成是右倾，遭到批判斗争。县长田步霄到基层搞调查，回到县里讲了真话，席道隆把田步霄打成“反党分子”，“小彭德怀”，多次批斗。1959年10月29日田步霄自杀身亡，时年35岁。田死后，县委以“彻头彻尾、誓死不改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中共定西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并组织机关干部对着尸体开批判会。

反右倾斗争是完成征购任务的主要手段，对讲真话的干部动辄批判、斗争、撤职、开除、法办，在斗争中普遍推、撞、打，进行肉体摧残和人格侮辱。

一方面睁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50多人，生产已经停顿，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

在陇川公社召开了一次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席道隆在讲话中强调说：“要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于那些顽固不缴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其缴出来，必要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要有革命的铁的手腕和铁的行动。” 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常河公社书记赵殿京听完全县电话会议以后，已经是凌晨两点了，还坐在床边不说话。县团委书记孙毓业看他神情不对，问道：“怎么啦？”赵殿京说：“明天完不成任务，让我提两个人头来见。我赵殿京只有一个人头，哪有两个人头！”他们只好连夜下乡搜粮食。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如陇阳公社搜查了

637户，无偿拿走了农民杂粮43833斤、面粉3235斤，洋芋31089斤，菜150斤，银元272枚，铜404斤，布30匹。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为了搜粮食，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里。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马营公社党委书记张学圣亲自主持斗争，毒打群众160多人，当场扣押劳教的66人。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和社员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纸帽子游街、男女脱裤子互相戴在头上、用包谷棒子和先麻（一种毒草）塞阴道、用绳子来回拉阴户等120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1100多万斤（大部分被“万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群众将这些恶行比作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狼狗”等。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通渭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14个劳教队，集中劳教1637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个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他们的口号是“立场稳”、“心狠”、“手快”、“刀子利”。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和土枪50多枝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160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66人当中因伤致死4人。

农民正在大批死亡的时候，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据定西地委扩大会议1961年1月13日的简报记载，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不吃农民的苜蓿饭，从兰州饭店用专车送吃的。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仅1960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339.7斤，油23斤，鸡蛋260多个，粮食473斤，糖及糕点62斤，红枣320斤，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茶叶、水果等。

其实，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顾农民死活的干部，眼看着大批人饿死，席道隆也允许农民自找生路，1959年春，借中共中央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出台的机会，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谁种谁收；将牲口分户喂养；给生产小队下放权力；等。1960年1月上旬，随着饿死人数的增加，席道隆连夜去地委汇报粮食情况和人口外流、死亡等问题，受到批评而回。他的这些良心发现以后的表现，后来为他带来了灾难。

4、省委工作组继续反右倾

通渭县大量死人，当时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向中央写信。2000年8月，我在通渭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两位老人认为是一位学生匿名写信给谭震林，谭震林让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接待这个学生。但是，几十年了，谁也不知道这位学生的名字，也没有人自称是当年的这位学生。也有人说，中央两位处长到过通渭，是他们向上面反映了情况。

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组到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从工作组留下的文件来年，他们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去通渭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正处于反右倾的高潮之中。

1960年 3 月 1 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7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工作组负责人王秉祥当时给省委写的《关于通渭问题的报告》中反映了他们的工作情况：

2月9日，我们到通渭动员所有的干部给社员送面粉、粮食上门，突击安排群众生活。2月21日到3月3日，召开100多人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了席道隆为首的一批破坏分子在领导通渭工作期间所犯的严重罪行。接着，各公社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县委扩大会议精神，解决公社领导核心问题。同时向全县人民公布了席道隆等破坏分子的罪行，进一步发动群众大张旗鼓的揭发批判。

……通渭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总的根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勾结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三个万岁"（即"三面红旗"——作者注）。……

席道隆等的主要罪行是：

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解散人民公社，破坏农业生产。早在1956年初级社转高级社时，他们就提出“分队（小队）生产，按队分红”的办法缩小集体规模。将分配单位由原来的327个（初级社）变为644个。公社化后实行“四级核算以小队为基础”，分配单位缩小为1195个。并给小队规定了许多不应有的权力。他们提倡大量土地“谁种谁收，谁收归谁”，牲口分户喂养。……碧玉公社党委书记李廷杰还把土地分给社员，强迫大量解散食堂。……

包庇、重用五类分子，与他们勾结一起残害人民。席道隆一再强调说“通渭的镇反很彻底”，“五类分子破坏已经没有什么了”等等，1956年，席道隆就一次释放160多个犯人。在公社以上领导核心中有16名五类分子。….

严重违法乱纪，对劳动人民实施打击报复。去年秋冬，他们为了掩盖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罪行，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假借“整社”和“完成征购任务”的名义，在全县大搞“万人斗争大会”、“大兵团作战”抢劫群众的粮食和财物，并设立社办劳改队，关押拷打群众。……

破坏统购统销政策。去年夏收和秋收，席道隆号召社员收割社里的庄稼，并宣布“谁收归谁”，在全县干部和群众中瞒产私分和贪污盗窃成风，直接影响征购任务的完成。……

开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进行走私活动。在一些城镇市场上，投机商贩活动十分猖狂。商业局两次从新疆（不是从国外——作者注）走私我省缺乏的物资。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李坤润2月19日给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报告中说：

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四级制，以包产小队为核算单位，59年春耕时提出小队种不完的土地由社员谁种谁收。造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大发展，地、富、反、坏分子破坏活动嚣张，抗拒公粮入库，偷盗、私分、瞒产普遍发生。对此严重的问题，县委又采取了极端错误的作法，以整社检查团为名，组织大兵团不分贫富逐门逐户进行大搜粮，组织万人斗争大会，把贫下中农和五类分子一起斗争。

包产到队、让农民开荒种小片土地，本是摆脱饥荒的重要措施，而工

作队把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大加批判。李坤润上述报造中批评这个县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不彻底："县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怕运动（指反右倾运动——作者注）深入，将自己的错误暴露出来，因此在去年10月县委扩大会议上，只解决了以田步霄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后，就草草结束了会议，企图将他们的问题遮掩下来，混过关去。"

据通渭县委1960年3月10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78人进行揭发批判。说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这个电话报告中列举他们的罪行，主要是划小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阶级成份不好的人等。

省委工作组负责人之一、中共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1960年4月20日给省委书记张仲良写的《关于通渭、陇西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列举了席道隆的几个错误：第一，在政策中推行了一条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一条中列举了划小生产队的经济核算单位、对空闲土地谁种谁收等事例）；第二，在政治上同情、包庇和放纵五类分子（这一条中列举了席道隆1956年亲自主持释放了160多个犯人等）；第三组织上拉拉扯扯，宗派主义；第四，在手段上严重违法乱纪（这里列举的是"万人斗争大会""批办劳改队"等事例）。窦明海这个所告中还说"情况大为好转，粮食全部安排下去疾病基本得到制止，外流人口往回走，群众情绪稳定，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实际上，通渭的饥荒还在发展，大批农民正在死亡。

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报告》中说"这个县不是一般的落后县，而是全县溃烂，问题的性质非常严重。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了县委领导权。从上到下，彻头彻尾的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报告也列举了席道隆的"四级核算小队为基础"、"牲畜分散到户"、"种籽分散到户"、"谁种谁收"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省委工作组对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发放了一些粮食，但未能扭转形势。"通渭问题"本来是左倾错误造的问题，省委工作组却认为是右倾造成的问题，这加剧了人口死亡。1960年死亡人数相当于1959年的3.86倍。

20世纪90年代，王秉祥在甘肃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上离休。我在甘肃调查三年大饥荒时，不少人提到他的错误。甘肃省原妇联主任李磊的《悠悠岁月》中，记述了王秉祥在三年大饥荒中不少的恶行。但是，90年代出版的《通渭县志》上，王秉祥却是一位救饥民于水火的好官

的形象。2000年，本书作者到通渭采访时，《通渭县志》的编辑张大发对本书作者说，1998年，《通渭县志》编撰定稿之后，送到甘肃省地方志领导小组审查，当时任省政协主席的王秉祥，兼任地方志领导小组组长。《通渭县志》的审查稿一送到，就引起了他的注意。由于对1958-1960年发生的“通渭问题”，《通渭县志》较为真实地记录了王秉祥的功过。王秉祥看了之后，《通渭县志》上不仅删去了记录的他错误的一段文字，还加上了这么一段：“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省、地委工作组百余人到通渭。他了解情况后，如实向中央、省委报告了通渭大量死人的问题，并及时供应粮食，组织干部、教师下农村抢救人命。”

由此可见，在大饥荒年代主政的干部，如果在80年代继续在当地主政或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这个地方的人口数据和历史记载，就可能被篡改。

省委工作组除了加大了反右倾的火力以外，还以阶级斗争眼光对全县干部时行了分类排队，排队的结论是：“从通渭县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干部政治情况看，问题是很严重的。该县历年来在镇反、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整社、整党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搞得不彻底，五类分子没有从干部队伍中和党内清查出去，仍然进行隐蔽活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乘机大肆破坏，现在敌人已露出水面，这次必须乘此机会，由内到外，内外结合，狠狠打击，否则通渭的面貌不会改变。”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中共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持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这个看法的提出比“信阳事件”以后提出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早八个月。

5、揭盖刨根运动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金330多万元，药品136吨，棉布110多万尺，棉花6万多斤，还有食糖、蜂蜜、红枣等。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亡的8万多人抢救过来了。并成立孤儿院，收养孤儿1200多名。在抢救灾民的过程中，医疗队员王俊、刘春华（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组织恢复生产。为此，国家先后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142万元，无偿投资270多万元，购买了牲畜4700多头，添置修补农具4万多件。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胥起云向省委的电话汇报说，为了救人，工作组

作了十二点安排：1，口粮一律按6两吃（每天供应量，当时秤是16进位，6两即10进位的3.75两——本书作者注），不得降低，不能再有断粮现象发生；2，病人（即肿病和瘦病）每天增加2两粮食（相当于10进位的1.25两），每月2两油，停止劳动，免费治疗；3，买粮有钱给钱，没钱记账；4，发下的棉花棉布立即制成衣服，尽快穿上；5，立即停止整社，集中力量抓好生活安排；6，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的第9条，要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宣读，关于社员回家做饭问题，由社党委提出意见，报县委批准；7，有问题及时解决，公社解决不了的要及时上报；8，对断顿、疾病、死亡、外流、干部违法乱纪要立即采取措施，查实情况，报告县委；9，隐瞒实际存在的问题、知情不报、不说老实话的，要严厉批评，不改的要给处分；等等。

这些措施对扭转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救济粮有“九个不供应”：地、富、反、坏、右、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富裕中农冒尖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不供应。

而真正解除饥饿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县志》记载：“是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吃的问题。”这一年，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社员增加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租借集体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饲养。这些政策也是大丰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认为西北局的兰州会议是扭转局面的一次会议。兰州会议是1960年12月开的，正是在毛泽东批示信阳事件之后，也是在《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指示之后。西北局也按“民主革命补课”和抓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通渭问题。当时总的估计是，通渭问题的出现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破坏所造成的。1965年9月9日，中共甘肃省委报送西北局的《甘肃省委报送“通渭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写通渭问题的原因时认为：“有许多部门和公社的权落到了坏人手里。152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敌伪党、团、军、警、宪骨干，特务、一贯道等24名，占15.2%，30名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种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8名，占22.6%”。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根据。因此，将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民主革命补课的对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补课是以整风整社的名义进行的。在整风整社过程中，开展了全面的夺权斗争。1961年1月19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揭开‘通渭问题’的盖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齐拔掉”的口号。接着，全县开展了“揭盖刨根”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拔席道隆的根”。对各级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被“特训”的人被认为是问题更严重的人。“集训”和“特训”都是集中起来进行揭发、

批判、斗争。除原来逮捕的县级干部以外，又对360多名县以下干部进行了处理。

由于1962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上层干部口头上表示承担责任，1962年5月13日，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省地委决定，释放席道隆等17名县级干部，并重新安排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从定西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

七、对甘肃问题的处理和余波

1960年12月上旬，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揭发了张仲良、何承华、阮迪民、王秉祥等人的错误，认为他们的问题是“一私一左”，改组了甘肃省委，由汪锋代替了张仲良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新省委对部分地委书记如窦明海、刘逢皓、胡学义等也进行了揭发批判，改组了部分地委。同时根据信阳经验，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在农村夺权，有几万人被批判斗争。信阳的一条经验就是对农村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新省委在1961年2月27日发出了《关于举办集中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的规定》。这个规定说：“凡是官僚主义分子，严重官僚主义分子，和其它有严重错误的分子，如不立即调离当地，就会阻碍整风整社运动，不利于发动群众者，可实行集训，凡是钻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对劳动人民进行了阶级报复，残害人民，不惩办不足以平民愤者，应首先进行特训。”根据这个规定，全省共集训、特训了10869人，其中集训6105人，特训的4764人。在集训队和特训队周围架上了机枪，他们在里面接受批斗。但据甘肃省的老干部说，被集训和特训的人数实际要比这个数大得多。

1962年底，阮迪民、王秉祥努力为自己翻案，张仲良不敢翻案，但同情支持他们。他们批评西北局兰州会议“不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揭发批判缺点和错误，从中吸取教训；而是否定成绩，一切皆非，一味地揭发，一味地批判。”他们认为，“甘肃没有特殊错误，只有一般性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许多事情是请示了中央的。”还批评“集训、特训打击面太宽了。”“信阳经验不符合甘肃的情况”“清水经验是错误的”。

不仅是上述干部要求翻案的.，1962年底，在执行错误路线而挨整的干部中很多人有这样一种看法：甘肃省没有特殊错误，只是同其它省一样的一般错误。他们列举了中央领导人当时如何支持他们的事例，

说许多事情是请示了中央的，颇有委屈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在省一级干部当中，在县以下干部中更为严重。在1961年11月28日《定西地委转报各县委扩大会议对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的一些意见》中，比较集中反映了基层干部的这种情绪。这个材料是定西地委1961年11月25日报给甘肃省委的。现摘要如下：

甘肃出了大问题，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自视察，也曾派工作组到甘肃工作，对甘肃工作评价很高，却没有反映问题。

引洮工程中央知道，开工时发过贺电，朱德、习仲勋也视察过，没有发现问题纠正错误。

谭震林同志是主管农业的，全国农业出了问题与他有关。他曾说过‘粮食已经过关’、‘绳索牵引是农业发展的方向’，还说‘货币是货币又不是货币，商品是商品又不是商品，这是初级的按劳分配’。这些说法给下面的干部增加了糊涂认识。

共产风，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都是中央提出来的，应该由中央负责。

刘主席视察河南工作时提出一县一社，对下面影响很大。

‘五风’是上面刮起来的，下面的强迫命令是检查团逼出来的。

省委讲对过去的错误不查责任，可是张仲良、窦明海还是书记，而对下面不是集训、特训，就是撤职查法办。省委、地委书记虽然没有直接伤害人命，但下面违法乱纪是他们逼出来的。这几年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上面出题，下面发挥；下面胡干，上面支持’。一切归罪下面是不公平的。

1962年12月3日甘肃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中批评了基层干部抱怨上级的情绪。报告中说，这种说法“是想把责任推给中央和毛主席，是非常恶毒的。”“甘肃的错误，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特殊性错误是主要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谓特殊性，就是甘肃的错误，在多数情况下，是由张仲良等同志的个人思想品质所造成的。”

从留下的历史资料来看，说甘肃省的问题完全是张仲良的个人思想品质问题造成的，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公道的。在当时的制度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饥荒，但各地程度不

同，其中严重程度决定于“甚”的程度。张仲良的“甚”在哪里？上述的报告中列举了几件事：1，中央曾规定国家给公社的投资，70%用于扶助穷队，30%用于公社。而甘肃省改为全部用于水利建设和社办企业；2，毛主席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讯，张仲良不但没有贯彻执行，反而用自己的名义另发了“关于给生产小队下放五项权利的意见”来代替；3，中央提出的水利方针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他们改为“蓄引提并举，大中小结合，小型为基础，大型为骨干”；4，中央规定反右倾只在党内进行，他们却在党外搞反右倾斗争；等。现在看来，这些“甚”并不算冒尖。河南、四川、安徽的“甚”，更为严重。张仲良后来调到江苏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由封疆大吏降为副省级执委官员。

第三章　天府饥魂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历来以自然条件优势、物产丰富而闻名于世。然而，在大饥荒期间，这么一个富饶的省份，却饿死了上千万人。

我多次去过四川。每次到四川完成采访任务之后，我总要顺手牵羊，收集一点有关大饥荒的资料。2000年12月，考虑到即将退休，我利用最后一次出差机会又专程到成都，集中一个星期时间收集四川大饥荒的资料，还找新华社四川分社几位经历过大饥荒的老记者交谈。用这些材料写完四川这一章后，又从网上发现了东夫先生的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他是专写温江地区的，文字很漂亮，他说“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经得起查证的”。我又对这一章再次改写，本章中关于温江地区和红光公社的内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均取自他这本书。

一、皇恩浩荡　幸福无边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四川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即成都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三面红旗”的中心内容。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一文件，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会议是在著名的金牛坝招待所召开的。这里的一切设施都按照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安排，完备的保卫、医疗及食品检验等机构，可以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和绝对安全。从种种无微不至的安排，可以看出毛泽东出行的气派，也足以表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

毛泽东是 3 月 4 日到达成都的。第二天，一位省委领导人陪同他绕城浏览。成都的城墙系康熙年间重建，大部保存完整。毛泽东说：“北京的城墙都拆了。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毛泽东一言既出，成都市的城墙当年全部拆除。

从小汽车的窗口中，毛泽东又发现一道独特景观，这就是四川独有特色的茶馆。毛泽东认为，在茶馆喝茶花钱太多，流露出不满之意。随行的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四川省的茶馆一时绝迹。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到成都市中心的耀华餐厅就餐。从此，餐厅就把他进过餐的地方布设为纪念馆，供人瞻仰。

3月21日毛泽东到灌县参观都江堰。他指着脚下的离堆问："这岩会不会被水冲毁。"答："不会，这是粒岩，很坚硬。"毛又问："一百万年以后会不会？"众人无言以对。事后人们反复琢磨领会伟大领袖的深刻思想："这确实是个关系到川西平原安全，关系到子孙万代幸福的问题"，便用钢筋水泥对离堆进行了加固。

插图片：李井泉陪同毛泽东视察都江堰

lmage-46

3月16日下午，毛泽东睡完午觉起床，决定到乡下走走，李井泉陪同，汽车直驶郫县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察。事先作好了准备。毛泽东信马由缰向就近的一户农舍走去，迈开大步径直进入农院。大家只好跟在后头。毛泽东一低头进了茅屋。年近六十的女主人温幺娘眼睛不好，模模糊糊见一个高大魁梧的人走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干部模样的人。毛泽东问她入社没有，何时入社，一问一答。当毛提到分多少粮食，够不够吃的问题时，站在一边的副社长代她作了回答。

插图片：毛泽东访问成都农户。

Lmage-42

1958年3月20日郫县县委办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县合兴乡红光社谈话纪要》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主席走后，当天晚上就下大雨，二十四队的记工员说，当真是"龙行一步，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

40年后，作家东夫不无调侃地追述毛泽东离开红光公社以后的情况："自从毛主席到来的那个傍晚起，整个红光社都沉浸在幸福和兴奋之中。有幸见到伟大领袖的人骄傲而激动地向人们诉说每一个细节，错过机会的后悔不迭。人人争相和握过毛主席手的人握手，以分享一份幸福。人们长时间地回味、追寻和领会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动作、神态，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走过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人们筹划着，要在毛泽东下车的地方修一个'幸福门'；把毛

泽东走过的机耕道修成‘幸福路’，路两旁植柏树；修一座纪念馆；建一座‘幸福亭’；毛泽东下过的田取名‘幸福田’；他跨过的沟上建一座‘幸福桥’；根据他的指示新建的小学取名‘幸福小学’；见过他的18名小孩成了‘幸福娃’（事后查出身，这18个孩子只有一个出身好的得到了‘幸福娃’的名字）。幸福万分的温幺娘把毛泽东在她院子里看过的小橘子树取名‘幸福树’，把毛泽东路过的菜园改成花园，叫‘幸福花园’，毛泽东把弄过的水烟锅和烘笼不便以‘幸福’命名，也被她精心保存起来。”

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把中国老百姓铸就出十足的奴性。他们崇尚皇权，迷信皇权，总是把福祉寄托于一个好皇帝。红光公社出现的这种崇拜狂热，正是源自于深厚的皇权土壤。在这种土壤上最容易生长出个人崇拜的毒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层，正好利用这种专制制度造就的奴性，大搞个人崇拜。就在这次成都会议上，针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出的反个人崇拜，毛泽东两次提出他主张个人崇拜。一次是他在3月19日的讲话，一次是在3月18日陈伯达发言中的插话（见本书第十五章关于成才会议的记述）。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对毛多有吹捧。陶铸、柯庆施主张对毛泽东要有迷信。柯庆施还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三面红旗”和对毛泽东的迷信、盲从，是造成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成都会议是制造这两个祸因的重要一环。

成都会议给天府之国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这灾难遍及全国。

二、“三面红旗”鼓狂飙

“三面红旗”鼓起了横扫四川的狂飙。

首先是飏起了“浮夸风”。7月底，双季稻早稻收割，红光社首次放出一颗亩产3752斤的“卫星”。《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旁，这里的干部下定决心，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才出出这颗卫星。

8月5日夜晚，郫县县长高义禄宣布，全县早稻平均亩产1030斤，比去年增加一倍，获全省冠军。全省目前出现的三千斤以上的早稻“卫星”都出在郫县。高县长说：“这是毛主席来郫县后照出来的红光！是人民冲天干劲开出的鲜花！”

接下来是紧锣密鼓的放卫星比赛，各公社放出了一颗比一颗更大的高产卫星。

8月27日上午，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率领地委常委赶赴犀浦。上午参观，下午开始收割，一百多农民涌进这块只有一亩多的田里收打，县委的验收团验收，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郭岚亲自把秤。又要放出一颗更大更大的卫星。

此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李井泉不在，使这颗“卫星”的发射遭到重大挫折。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几位水稻专家说是颗卫星是假的，“是稻子成熟时才移并在一起的。”主管宣传工作的省委秘书长阎秀峰只好宣布：“各报不要发表这颗卫星的消息。”

根据阎秀峰的指示，《四川日报》28日没有刊登犀浦高产“卫星”消息。而《四川农民日报》因为总编没有参加27日阎秀峰主持的会议，第二天（28日）却用整个头版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报道。

成都市和各县看了《四川农民日报》的报道，前来犀浦参观的人将这块田围得水泄不通。收打完毕，经“验收团核定”，当场宣布这块田亩产为45217斤5两8钱。

真实情况是，稻子是8月13日才并在一起的，比县委坚持说的7月13日并栽的时间整整晚一个月。也就是说，是在稻子完全成熟以后移到一起的。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得知真相后，通知郫县县委：一、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承认错误；二、作书面检讨；三、给做假者以处分。宋随即赶往成都，向阎秀峰作了汇报，阎表示同意宋的处理。

县委的检讨还没送上来，地委就挨了一记耳光。9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苏方的一篇特稿“卫星田畔庆丰收”，肯定了这颗假“卫星”。

地委刚刚接到郫县的检讨报告，又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9月12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爆炸性新闻：郫县友爱乡亩产突破8万斤！这是到这天为止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四川第一次在高产卫星上夺取全国冠军。

《四川日报》发表这样的消息，是因为第一书记李井泉从北戴河回来了。《四川日报》是李井泉的喉舌。他亲阅、亲审，甚至连何日见报、登几版几条都写得清清楚楚，报社的总编辑完全听他的。

李井泉，1909生，江西人，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军。到广东后曾任东江特委秘书长，1930年到中央苏区，1931年任红35军政委，长征时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抗战时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晋绥分局书记。1952年任四川省省委书记兼省主席。老百姓叫他李主席，干部叫李政委。

李政委对他不在家时发“卫星”受挫很不甘心。在一次省级机关会议上，特别通知温江地委领导到会，李井泉对宋文彬说：“郫县的4万斤田是假的，你们搞块真的嘛。”李井泉要地委承认这颗卫星的“既成事实”，要恢复郫县的名誉。

只要李政委一个暗示，下面会闻风而动。他的态度如此明确，地委迅速作了检讨，承认对“少种、高产、多收”的态度不坚定，对郫县的成绩鼓励支持不够。这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

“放高产卫星”只不过是浮夸风的一个侧面。郫县的一个报告说：“浮夸风我县各级都有，普遍而又严重。”浮夸风首先在产量方面，接着扩展到生产方面，从种到收，其间每一个环节都有浮夸上报的“神仙数字”、“跃进数字”。有的上报“平均每亩地下肥几十万斤”，“增种面积超过原有的面积几倍”，后来在各方面都有浮夸风。

并社，人民规模越并越大。郫县把红光、晨光等一部分本来规模较大的社又多次进行了合并。两年大并三次，有的竟连并七次。最大的管区有1100多户（北方村庄大，1100户不算大，四川的村庄，小居住分散，上千户就是很大了）。公社大，食堂也大，有的食堂吃饭人口达1420人。吃一顿要走七八里路。并一次社和并一次食堂，就打乱一次所有制，物资大共产，财产大破坏，干部大调动。并社以后干部不知道自己所管的边界，社员间互不认识。

大办钢铁。全四川几天之内竖起几十万座土炉子，成千上万的炼铁大军不分白天黑夜大干。无煤无铁矿的温江地区，也抽调50万以上精壮劳力，由各县第一书记亲自带队，组成炼铁大兵团，背起背包、粮食，扛起锄头、扁担浩浩荡荡地向西部山区进发。没有煤就砍树，没有矿就挖遍山上的各个角落。炼铁大军吃住在山上，还得有千千万万的支前大军做后勤保障。崇庆县的炼铁兵团需要砖砌炉子，县上组织数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街道居民拆城墙，不分昼夜往山上运砖。城镇各单位无一不是炉火熊熊，家家户户的金属器具，从古董到老太婆的簪子全部进了炉子，变成质量低劣的土铁。四川还创造了“大窑炼钢”工艺：选一块山谷凹地，将周围山上的树木剃头似的砍光，一层木头、一层矿石的填满，然后放起大火，连烧数日，待木头燃尽，抠出烧得矿石不是矿石、铁块不是铁块的黑东西，敲锣打鼓地

抬去报喜。

公社化和大炼钢铁是以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开路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一切“白旗”、“灰旗”、“黄旗”统统拔掉。强大的政治压力扫除了障碍，共产主义的临近煽起了热情，一切狂想和胡闹，畅通无阻，愈演愈烈。

“让土地大翻身”的深耕运动也成了一股狂风。温江专区规定的深耕改土程序为：一、用犁犁或用锄头挖第一层“表土”；二、把表土搬运到一边；三、翻第二层“生土”；四、把生土砌成中空的土堆；五、在生土堆中燃起柴火“熏土”；六、在熏土上泼粪水；七、将熏土敲碎、铺平；八、在熏土层上施渣肥、堆肥、老墙土千脚泥等；九、将表土搬回、铺平、耙细……如果是放“深耕卫星”挖地数尺，以此类推。把精耕细作了几千年的土地彻底翻了身。

为了解决牛力和劳力紧张的矛盾，要求各社制造使用“绳索牵引”的深耕工具，据说可以提高效力若干倍。“绳索牵引”实际上是人牵引，田边支一个绞盘，一根强绳子拽住犁，若干人推动绞盘牵引犁田。《人民日报》报道，温江专区以每天一千部的速度制作绳索牵引机。《都江报》说，大邑县委书记侯宪亲自督战，全县苦战五六昼夜，就实现了“绳索牵引机化”。

一时间，川西平原上遍地是坟场一般密密麻麻的熏土堆，丘陵山区更是“坡上有坡，山上有山”，白天黑夜遍地火光，烟雾弥漫。在红旗招展下，成千成万的深翻大军，按照军事化的编制，一队队的摆开阵势，不分昼夜、不避风雨地在田野里战斗。大邑县在一半主要劳动力上山炼铁的情况下，从十多岁的小孩到七十岁的老人全都投入到深耕运动中来，组成“野战兵团”，打破乡社队界限，采用运动战、阵地战的方法，四处安营扎寨，轮番转移作战，“白天紧张劳动一天，天黑又连续夜战”。

大炼钢铁、修水库、电站、铁路、公路、工厂，一批批的男劳力离开了田土，仅修建后来半途而废的岷江电站和成灌铁路，温江专区就调集了10万民工。

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劳动战斗化，使得干部的权力无限扩张。瞎指挥、欺压百姓、打骂农民就成了家常便饭，特权发展也就必然。

全省各地大搞指挥路、丰产路、园田化，大拆房子，大搬迁，大调劳动力。荣县除了1958年大刮“共产风”以外，1959年秋天种冬小麦时又刮一次，1960年插秧时再刮一次。“共产风”和瞎指挥是同时发生

的。为了种“丰产路”（即不惜代价地把马路边的田种好，取得丰产——主要是给上级领导和参观的人看的），搞“大兵团作战”，县委提出了“一切劳动力、牲畜、农具、支援丰产路”的口号，说是支援，实际是无偿调拨。“大兵团”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吃到哪里，在哪里天黑，就住在哪里，“共产风”也就刮到哪里。对“丰产路”的庄稼要求“美观好看”，条播要“隔山对行”，做成“梯子式”、“宝塔式”、“楼台式”，还要写字编号。由于形式主义的“严格”要求，一再返工，几十个劳动力一天才种一亩田。长山公社100多人种一分地，一天一夜没有种完。由于只顾路边田，离路较远的田大面积荒芜，全县四分之一的耕地抛荒。在全县范围内并队、并食堂、并房屋。长山公社2870户就有1133户被迫搬家。其结果是，集中的地方拥挤不堪，一间房屋住几家，一家分几处住（男女分居，夫妻分居），有的不得不住猪圈、牛栏。社员的家具、家禽、家畜也因搬迁而遭受巨大损失。食堂合并以后，原来食堂储备的蔬菜、燃料、炊具也同时合并了。这样的反复折腾使社员一无所有，有的说：“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才是自己的”、“只有穿在身上、吃进肚里的才是自己的”，有的说：“连我们人也不是自己的。”而干部们却说：“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理区把公路两旁8华里长、1华里宽的2000多亩的面积上的180多间房子拆毁。全县不完全统计，共拆房子12000多间。有的三姓人家同住一间房子，有的公婆儿媳同住一间。在这一间房子内还在关鸡鸭，又挤，又脏，又臭。拆房子时，干部根本不同社员商量，私自敲门锁，将社员衣物抛弃遍地，顷刻间就把房子变成一堆瓦砾。有些外出人员回来不见自己的房子和妻子儿女，伤心痛哭。有的地方让社员一年搬家七次。有的管理区干部随意搜查社员的家，见什么拿什么。为了报复干部，有的社员捉一条活蛇放在米坛子里，干部搜查时，手伸进米坛子里，差一点被蛇咬伤

“共产风”使农村生产力大受破坏，农具大量丢失。乐山县通江公社柏杨管理区1958年共有中型农具2686件，到1961年仅剩515件，两年多共丢失2171件，丢失了82%。农具严重缺乏使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该管理区第4生产队原有晒席110床，丢失了93床，1960年收获水稻时，因缺晒席，翻晒不及时，稻谷生芽2万多斤，占总产量的18%以上。第一生产队原有犁、耙106架，丢失96架，因此，不能及时整田赶上插秧，使80亩中稻迟插20多天，还荒田30亩、地60亩，减少粮食产量3万多斤。

乐山县棉竹公社第二管理区，共七个生队，470户，1775人，800个劳动力，耕地面积2783亩。由于生产上的瞎指挥，1960年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减少了25.7%。瞎指挥是十分荒唐的：

一切强调“统一”、“一致”，强调“整齐划一”。在水稻育秧时，上级规定秧田必须“瓦背式”，通道必须很直，一些已经撒了谷种并且发了芽的秧田，由于不符合上级的要求，让农民把发了芽的谷种一粒一粒地拾起来，重新整田撒种。洋芋一律要带状种植，43亩地没有按统一规定种植的洋芋，苗已经长出了四五寸，有的已经结了小洋芋，也要挖出来重栽，结果大幅度减产。插秧要求“对路开厢，顺路成行”，为了插得直，下田必须带尺子和绳子，不合要求就一律返工。

种植不看季节，不看气温。气温已经很高了，还强令社员用火温床育红苕苗，结果烤坏红苕11000斤。还规定“霜降”前不准挖苕，谁挖红苕就说谁破坏生产或企图瞒产私分，结果，“霜降”过后气温很快降低，挖红苕已经来不及了，大量红苕烂掉。春耕大忙季节，本应集中力插秧，却让大批劳动力去搞“园田化”，结果到了“谷雨”、“立夏”，过了水稻直播季节。

种植作物不因地制置宜。170多亩深田、冷浸田，本来只适合种中稻，不宜种早稻，上级却强迫种了早稻。100多亩适合种红苕的地却强迫农民种了包谷。这两项起码少收粮食4万多斤。

1958年，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搞“大兵团作战”，把全区7个队的几百个劳动力集中在一起搞深耕，实行“军事化”，180人挖一亩多的一块田，挖了一天一夜，麦种用了60斤，结果收成还不够种子多。劳动力集中以后，其它各队都误了生产季节，造成了大量荒地，如四队共有田129亩、地172亩，1959年小麦只种了40多亩，而且是在冬月（即农历11月）间才播下去，结果小麦产量比1958年减少了63．14%。在农业大忙季节，还把大量劳动力调往水利工地，使插秧的季节也误了。一些公社在全社范围内统一调配劳动力，把这个队的人调支另一个队去插秧，把另一个队的人调到这个队里除草。大批劳动力“东一站，西一站，抱着锄头到处转。”效率低，劳动质量差，大片土地被抛荒。成都市金牛公社共荒芜土地5400多亩，插秧季节已过而没有插的有1000多亩，插秧后因管理不善而没有收成的有4000多亩。

长宁县桃坪公社中坝管理区，说是执行中央的“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将95.2亩的可耕地划为休闲地，致使粮食减产。

三、李井泉狠开“顶风船”

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了乱子，中共中

央采取了一系列纠偏措施。但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开“顶风船”，抵制中共中央的这些纠偏政策。李井泉在四川省说一不二。他的地位来自毛泽东的信任。成都会议全体到会人员合影时，毛泽东让李井泉坐在他的身边。一个多月后的八届五中全会，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地方的封疆大吏中，进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只有李井泉和柯庆施两人。这样，李井泉不仅是四川王，还是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之所以信任李井泉，是因为李井泉能从“最根本处”理解他的思想。1958年夏秋的大跃进出了问题，1958年秋冬到1959年春夏，毛泽东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降温”措施，中央发出的一些文件，也有一些纠左的倾向。李井泉坚持不“降温”，不纠左。他这种态度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批评，7月23日庐山会议转向以后，他成了最能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人。李井泉这种“顶风”态度表现在一系列的政策上。

其一，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是降温的，李井泉从武昌开会回来继续坚持大跃进。1958年12月省委在金牛坝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布置了1959年的更大跃进任务。

其二，第二次郑州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以“队为基础”。“队为基础”的“队”，是指生产小队，而不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而李井泉则在万人大会上宣布：“队为基础，在我们这里是管理区。”所谓管理区，就是在生产大队和公社之间的管理层次，比“队为基础”的“队”高两个层次。根据李政委定下的调子，四川省绝大多数公社实行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继续保持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不久，他还对核算单位由公社下放到以管理区还心痛不已，他说：“去年公社化初期推广新技术很快，现在体制一改变，按他们的意愿就把新技术都顶回来，有问题了，生产全由农民搞吗？还要无产阶级干啥？”

其三，继续推行1958年那一套高指标和瞎指挥。1959年4月19日省委发布农业生产“八项规定”，严格规定各类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规格，要求各地坚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自始至终都抓紧”，把高产万斤推向高潮。李井泉还提出在农业上“搞几个运动，田间管理，农田水利，积肥造肥，包括养猪，全省每年增加一千万头猪。”“中央明年以农业为基础，我们还是要大搞钢铁，明年搞150万吨钢。”“九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中共中央的肯定了四川省委1959年4月的“八项规定”。4月26日，将这“八项规定”日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在这个文件的批示中说：在农业生产问题上，有些地方存在着松劲现象，在克服浮夸虚报倾向后又出现了一种指标订得越低越好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应当注意克服，

应像四川省委一样，做出些必要的规定，把生产运动搞起来。

自大跃进以来，吹得最热闹的当数河北、河南、湖北、安徽、广东等省。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他们中大部分开始转舵，有的还纠正得较为彻底。只有四川没有转舵。最能表现李井泉“顶风”勇气的是他不向下传达毛泽东给小队干部的一封信。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写信的对象是“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谈了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这是自1958年底纠偏以来，他走得最远的一次。对高指标、密植以及农业生产的其它方面，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话，降了温。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告诫人们：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中共中央办公厅先用电话把毛泽东的这封信传达到四川省委，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应当立即传达到小队干部。可李井泉指示：“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后再传达到生产队中去，不要转弯太急，防止消极情绪。”在接着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李井泉一再强调，对毛泽东这封信“要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会议印发的“纪录稿”仍然坚持“八项规定”中的高指标和密植规格，声称《党内通信》中指出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当然要反对，“但是保守主义、尾巴主义也要反对”，全省1959年的粮食生产高指标“不能动摇”。李井泉还说，估计《党内通信》传达到基层后，“会产生放任自流和消极情绪”，要大家有所防范。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其中的一条明令将毛主席的党内通信，“立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论执行。”李井泉根本不理睬。

接到《党内通信》的干部们惊喜万分，他们说：“主席把话说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极情绪”使省委的高产措施面临泡汤的威胁。坐立不安的李井泉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令将发到县委的党内通信收回。文件是收回了，影响却收不回。此时此刻，李井泉最关心的是如何消除《党内通信》造成的“消极影响”。5月14日，省委又召开地、市委

第一书记紧急电话会议，传达李井泉关于密植的紧急指示。

为了稳住各地区的头头，省委在重庆传达毛泽东党内通信后，又分片组织学习讨论。在川西北片区学习讨论中，主持会议的廖志高声称主席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北京有人吹冷风，主席有压力”。暗示党内通信中有些话并非毛泽东本意。温江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在会上表示自己是“稳健派”，话一下就传到李井泉那里，正在川北视察途中的李井泉连打几次电话给宋，斥责宋是在“散布冷空气”，接着李井泉又打电话告诉宋，说3×7寸密植要坚持搞，他说他已打电话问了广东的陶铸，陶铸也说没问题。

针对毛泽东《党内通信》中讲真话的问题，他作了不同的解释。他说讲假话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以多报少”的瞒产私分，一种是“以少报多”的浮夸。他就后一种假话辩解：浮夸主要是“我们不摸底”，并不是为了荣誉和出人头地，“主要还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我们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粮食、油料少了，争夺粮油的问题。凭良心说，我们还是想国家多拿一点，你就不想国家多拿一点吗？”

如此明目张胆同毛泽东的指示唱反调，是李井泉存心想同毛泽东对抗吗？不，没有任何事实证明他对毛泽东有丝毫不忠。他的“反调”是出于一种自信，他相信他比别人更理解毛泽东，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更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不会有风险。

的确如此。

1958年底到1959上半年中央发布的一些纠偏措施，被一些干部看得过于认真。这样的干部事后吃了大亏，有的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事实上，毛泽东在酿成1958年大错的根本的问题上（即“三面红旗”）从来没有未动摇过，他要纠正的，是一些方法和作风问题，方法和作风问题一经纠正，还要继续大跃进。

就在毛泽东唱低调的时候，李井泉一再强调，大跃进的成绩必须肯定，大跃进必须继续进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他一面批评搞浮夸风、共产风和穷过渡，同时又表扬这些刮五风的干部：“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种非常宝贵的积极性“应当坚决加以保护”。

李井泉不愧为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他从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中，能透过表面，揣磨到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东西，并努力贯彻。毛泽东在《内部

通信》中说“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高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李井泉知道毛泽东心底里喜欢高指标，所以，省委的高指标不变。眼下正在插秧，毛泽东在《党内通信》说“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李井泉猜测毛泽东心底里喜欢密植，所以继续下密植的死硬命令。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59年春到四川调查，发现四川对插秧有规定，即“双龙出海，蚂蚁出洞”（即只有行距，没有株距）的高密植，社员不愿意，这时正逢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下达，其中有“插秧不可太稀，也不可太密”，田家英据此就在他“蹲点”的公社号召不要过分密植。在省委召开的会上，他反对过分密植，同李井泉发生了争论。最后省委还是决定，全省继续实行高度密植，只让田家英报在公社稀一点。

对一切在“三面红旗”方向上稍有后退的政策，不管来自何方，李井泉是一顶到底，毫不让步：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中规定：一、纠正少种、高产，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种土地全部都要种庄稼。二、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私人喂养。三、恢复自留地，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

毛猪若下放给私人喂养，必须分给自留地，否则无法解决饲料问题。四川省委的规定是：毛猪下放到生产队饲养，划给一定的饲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猪私人喂养自然无法实行。实际上，四川一直没有实行恢复自留地和毛猪私养的政策。

1959年5月26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给公共食堂开了一个大口子，规定：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多办，农闲少办，灵活执行。食堂范围太大的，可适当缩小。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交给个人保管食用。中央指示的关键之处是口粮分配到户，只要实行了这一条，食堂便会土崩瓦解。当时全国许多地区食堂一哄而散。

四川省委把中央的“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解释是：食堂要办下去，分配的粮食由食堂保管，节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粮食分给个人，实际上除了“食堂吃饭”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话。

1959年6月11日，中央发出一个更为彻底的纠左指示，作出四条规定：

允许社员自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私有私养的完全归个人所得。

恢复自留地。不管社员喂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都应分给。自留地生产的产品由社员自由支配。

鼓励社员种植零星空地，谁种谁收。

归还社员屋前屋后林木果树。

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一样，中央的这个指示直接发到“生产队支部委员会”，并要求把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并认真实行，取信于民”。

四川省委拒不执行。不把文件下发生产队，不张榜公布，不准社员养私猪，不分自留地。

总之，从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间，中共中央的一切纠偏措施在四川都受到抵制。四川就这样“顶风”，一直顶到庐山会议之前。

1959年的庐山会议“神仙会”阶段，田家英等反左的人士的心情相当轻松，会上提出了很多批评大跃进的意见。在揭露1958年以来的问题时，李井泉却不轻松。在李井泉主持的西南组开会时，田家英再次谈到下面受压虚报产量的问题。田家英的发言受到李的压制“以致讲不下去”。7月23日，“硬着头皮顶住”的毛泽东终于开始反击，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李井泉押下的这一赌注开始大量进账了。7月23的讲话中，毛泽东在讲到公共食堂问题时，表扬了四川：

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百分之九十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三分之一的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

庐山会议以后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迅速左转，李井泉上半年顶风“算是顶对头了”。他轻松而自豪地说：“我们去年在泸州地区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去年这一年我们在公有化程度上搞的比较高的。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的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毛泽东对李井泉更加信任，

李井泉的地位更加稳固。1959年秋天，李井泉获得了“政治大丰收”。为李井泉的政治大丰收“埋单”的是四川老百姓，四川省的饥饿时间最长。

四、四川省饥饿的时间最长

四川省的饥饿始于1958年冬，结束于1962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

绵竹县红旗公社共有125个食堂，除有8个食堂的口粮因种蔬菜由国家供应以外，有65个食堂、15146人于1958年12月底到1959年1月底先后断粮。有25个食堂、4644人于1959年2月15日断粮，有25个食堂、6708人于2月底、3月初断粮。仅有两个食堂、389人可以吃到5月底。没有粮食的食堂，有的把留给猪、牛的饲料的粗粮吃完了，有的把当年的谷种也吃了。自断粮以来，每天出工人数减少，干活只有5小时左右，效率很低。

红旗公社1958年粮食大丰收，为什么到冬天就没粮食？这个报告说：第一，去年大搞钢铁时，全社抽5400多个劳动力上山，每人每月带走45斤米，上山5个月，共带走66万斤大米，折原粮94万斤。第二，去年“大兵团作战”时，放开肚子吃，由两餐改为三餐，晚上“夜战”还要加一餐，平均每人每月吃57斤大米。该社放开肚皮吃了两个月，共超吃粮食160多万斤，相当于两个月的口粮。第三，去年征购时，粮食部门要求“放卫星”，仅统购粮食一项，就多入库60多万斤。第四，去年秋收时，因劳动力不足，使成熟的谷子没有及时收割，抛撒过多，红苕、黄豆损失更多。每亩田损失粮食30 - 80斤。粮食收回后又没有保管好，又发生严重的霉烂现象。其中，红苕霉烂最多。

粮食短缺，人口减少，生猪大量死亡。李井泉对这样严重的问题却大加掩饰。他不相信没有粮食，1959年2月27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上说：

有些同志认为高产卫星是假的……这很显然是怀疑的，不相信别人的经验，这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3月19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对于生猪大量死亡作出解释：

我大概算了一下，算死了300万头，就算死了400万头，我们全省12

月以前有3700万头，三千嘛，三百嘛，这是一笔帐。另外还有几笔帐，第二笔帐，大概300万头里面可能杀吃的，就占一半，真死了占一半；第三笔帐，死的当中，病死了一部分，中间大猪吃小猪，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二是不该死的；第四笔帐，据说穷队死得少，富队死得多，富队里面富裕中农不爱护，也还有地主、富农整死了一批；第五，我们去年下放了一批猪。我有这五笔帐，我说不该死的猪大约有100万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讲的成绩和缺点的比例。当李井泉还满足于“九个指头”成绩当中的时候，饥荒继续发展。

1959年4月8日，省委简阳县工作组报告，浮肿病增多，解放公社的四个大队，其中因肿病死亡的就有22人，其中16人为青壮年。由于饲料不足，生猪大量死亡，解放公社一个耕作区，由4000多头减少到2600多头。

饥饿不断发展。

盐源县新民公社共有10个食堂，到5月中旬就有8个绝粮。其余2个食堂到6月初就没粮食了。现在，大人上山挖棉苟苕，小孩上山打野生果子吃，生产无人过问。牲口整天没人赶出去放，同样饿着。已赶上山去放的，饲养员只顾自己找野生植物吃，把牛羊拴在树上，有的羊吊死了。在组织社员进行小春脱粒时，社员一边脱粒，一边吃生麦子。

可悲的是，即使处于这种情况，干部们还不承认没有粮食，还下大力量征购夏粮入库。征购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瞒产私分。这些使饥饿继续发展。

长宁县桃坪公社从1959年4月中旬有些食堂就半停伙，5月25日，食堂基本解散，粮食由社员自行解决。社员只好挖野菜和观音土（这里称为“仙泥”）吃。大河管理区4月份饿死了219人，到6月份，又饿死了218人。到7月6日，共死560人，占总人口的6.64%。

1959年7月23日，省委副书记阎红彦在仁寿县考察工作时给省委的信中谈到，六月中旬发现缺粮情况严重和被迫停伙的食堂有1918个，占食堂总数11437个的16.9%，约有15万人。县委汇报说患肿病人数56289人，占总人口的5%，个别生产队占总人数的30 - 50%。截至20日止，因肿病死亡197人。阎红彦的数字是县委汇报的，一般情况下，县委总是少报肿病和死亡人数。阎的信中反映干部强迫命令的情况：方家公社胜利管区去冬在收购棉、粮、废铁时，将群众集合在出

工之前，强令群众交出家里的钥匙，群众下地后，干部挨家搜查，将群众家里的粮、棉、铁器一律拿走。这个公社今年由于未完成春耕生产任务和夏粮征购任务，遭到罚跪、挨打、扣押反省的干部有31人，其中，新民管区60%的小队长挨打被斗。基层干部打群众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1959年7月29日，郭炳林从简阳报告，肿病更加严重起来。全县有3万多人发生肿病。石桥每天有2000多人买“肥几粉”（一种没有营养、对身体有害的代食品）。到10月才能吃到红苕，还有两个月，可能要出大问题。

1959年冬到1960年夏收之前各地饿死人很多。绵阳石马公社总人口7531人，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5月－7月间，死亡946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2.56%。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社员就处于口粮不足的饥饿状态。1959年大春收获后就开始断粮，各食堂在中秋节前后就没有口粮了,一个多月间只吃菜和红苕叶子，11月进入红苕收获期，边收边吃，每人每天平均吃1斤红苕。吃了20天红苕以后开始吃种子，每人每天2－3两粮食（16进位）。由于干部多吃多占、层层尅扣，社员连这二三两也吃不到口。在这期间干部还以“反瞒产”、“反偷盗”的名义，对社员进行捆、绑、吊、打，任意扣饭，任意搜刮社员财物。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这个管理区1958年有420户，1818人，到1961年统计，只有344户，1138人，两年间人口减少37.4%，劳动力减少了40%。其中1959年11月到1960年2月三个多月内，死于干瘦病的有396人，占总人口的21.7%。这个管理区有一个食堂原有141人吃饭，到1961年1月只剩70人，死了一半。祠堂湾食堂原有135人，死了65人，其中死绝8户。第四生产队社员郭世义家原有11口人，死了10人，只剩下一个小孩，死人没人去埋。这个管理区由于死人多，剩下的人集中居住，使得47个湾（自然村）没有人烟。外地来人办事，找不到一个引路的人。

一份又一份死亡报告送到李井泉手里，李井泉却无动于衷。1960年初，正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2月14日晚，李井泉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

主席（指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年三、四、五月份，全国各地要把食堂搞起来，粮食掌握到食堂，各省要学习湖南、河南、四川等省，要保证搞上去。我说四川的绝大多数是坚持下来了，而且有些办得像连队的伙食一样。主席说，那样难，要办得像连队伙食那样。这件事你们看怎么样？（参加会议的同志说：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你们那些县委书记摸不摸底，了不了解粮食掌握在谁手中。

掌握在个人手中就不好办。个人有粮，就不在食堂吃饭。我们要下决心，在三、四、五几个月内，把食堂搞上去。

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要进行激烈斗争。

应该规定几条，如：干部一律到食堂吃饭，干部掌握的粮票一律要收回，他们到食堂吃饭，才会关心食堂。建立和健全食堂委员会，召开食堂代表大会。粮食分配要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下的平均主义，这个平均主义是革命的平均主义。一个管区内的口粮标准要统一。我省的食堂工作主要不是恢复和发展的问题，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去年这一年我们省在公有化程度上是搞得比较高的。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是有消极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领会，应该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的问题上，就是允许自愿，也是为了办好。

李井泉在这个座谈会上最为得意之处（收回自留地，公有化程度要提高，粮食不能掌握在个人手里，坚持办食堂），正是四川省饥饿持续时间长的根本原因。李井泉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基本是一致的，这也是饥荒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三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对于下面反映上来的严重情况，李井泉却是轻描淡写。1960年3月26日，他在南充第二次地委书记会上讲话说：

在生活安排中，我们全省有那么几个县，很突出的那么几个县，如眉山、广汉、秀山，都有那么一片片，听说这些问题比较突出，需要解决，现在已经解决了，领导有的调换了，安排生活的粮食拿去了，粮食通通的不下放，生产也起劲了。总之，这个问题要解决好，缺种子，缺肥料，没猪，猪死了一部分，甚至个别队死了大部分……华阳县委书记三个月不下乡，他住的那个公社却死那么多猪。还有个管理区死人，肿病那么严重，这就是官僚主义。

显然，最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是下面的干部，而是李井泉这些高官。由于他们不敢正视现实，使情况越来越严重。

1960年2月，粮食部在四川南充召开了为期5天的全国粮食厅长会议，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一份来自有关部门的档案记载，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2月9日讲话说：“四川每年都要调出大量粮食支援全国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农村食堂每天两稀一干，吃四两粮。四川人民把方便让给别人。会上提出“学四川，学南

充”。四川省向会上提供的材料说，四川人民生活安排得好，90%以上已经安排落实。

四川的官员们打肿脸充胖子。其实，这几年四川粮食非常紧张。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有一个统计数字。

表3-1 1957-1961年四川省粮食基本数据 （单位：亿斤）

年 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 量	465.1	495	368.3	323.9	260
征购量	110.88	121.58	129.28	95.37	65.57
销售量	59.09	92.7	101.37	87.43	69.68
调出量	51.79	28.88	27.91	7.94	-4.11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注：产量为原粮，其它两项为贸易粮。产量为生产年度（1月1日——12月31日）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7月1日——次年6月30日）。

从表3-1中可以算出，1957年到1960年，四川是净调出粮食（征购量大于销售量）省。为了便于比较，将产量原粮换算成贸易粮（原粮除以1.15），减去征购数，加上销售数就是省里可以支配的粮食。1957 - 1961年分别为：352.64亿斤；401.55亿斤；292.35亿斤；273.71亿斤；230.02亿斤。按人口平均为：507.75斤；567.08斤；413.05斤；396.84斤；356.12斤。这个数字包括工业用粮、种子、饲料、口粮。

这里还要为李井泉说一句公道话，他也不是完全一门心思向上多交粮食。在粮食征购指标上，他也曾向中央讨价还价。在有关档案馆里，还保存他给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信。例如，粮食部党组安排1960 - 1961粮食年度四川征购指标为118亿斤，1960年8月5日，李井泉给李先念写信要求降为108亿斤。信中说：“今看到中央同意粮食部党组1960 - 1961年的粮食安排意见，其中关于四川粮食征购数字仍没有加以调整修改。关于这个问题，省委曾再三考虑过今年的收成，只能征购108亿斤，建议仍按我上月22日报告意见将征购数字加以调整。”最后的结果还是没有采纳李井泉的意见，征购数为129.28亿斤。当然，李井泉不会直接向毛泽东讨价还

价。在中央部门领导面前他争取一些地方利益，更有条件使他在毛泽东面前说大话、说假话。

用表3-1的数据再加上人口数据，我们计算出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先把每年的产量由原粮换算成贸易粮，（产量 - 征购量 + 销售量）就是净留给四川省的粮食。再按总人口平均，就是人均净占有粮食。这不是每人的口粮，其中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

表3-2 1957-1962年四川省人均净留粮食(贸易粮)

年份 1957 - 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产量（亿斤）404.43 430.43 320.26 281.65 226.09

净留粮（亿斤）352.64 401.55 292.35 273.71 230.20

总人口（万人）6945.2 7081.0 7077.9 6897.3 6459.2

人均净留粮（斤）507.7 567.1 413.10 396.84 356.39

资料来源：据表3-1及相关人口数据计算。

由表3-2可看出，四川省人均净占有粮食，1959 - 1960年粮食年度只有413.10斤（贸易粮），扣除工业用粮、扣除工业用粮、城镇的供应粮，扣除饲料和种子，大概不足200斤。1960年和1961年的情况更差。

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范睦回忆：

那些年，我分工采访财经，对四川的粮食情况是清楚的。四川是个粮食调出大省，5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调出32.24亿斤，三年“大跃进”放卫星，创高产，大话说过了头，连续三年减产，1960年产量比1949年减少了30亿斤，但粮食外调任务有增无减，1960年达到68.4亿斤，比过去增加一倍以上。从1959年起，三年内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原来的512斤猛降到260斤。由于强迫命令征了过头粮，粮库告罄，春荒没有返销粮，农民只好饿以待毙。三年灾难期间，四川的一千多万人就是这样活活饿死的。

范睦这里“外调任务”比档案中的“征购量”、即上述粮食部提供的数字要多。可能是完成外调任务以后，中央再给四川增加了调出任务，粮食部说的是贸易粮，也可能范睦说的是原粮，1斤贸易粮相当于1．15 - 1．2斤原粮。

当年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回忆数和范睦说的比较一致。廖志高回忆说：四川省历来就是调出粮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间，共调出粮食162.77亿斤，平均每年调出32.54亿斤。1958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减产，而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增加。1958年外调39.6亿斤，1959年外调49亿斤，1960年外调68.4亿斤。1959年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1958年的512斤降到1959年的278斤，1960年又降到260斤。为什么中央一再向四川追加任务？当时中央领导人的解释是：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地区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饿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饿死人。”

1960年4月4日，一份向省委的报告反映，金堂县三星公社的食堂，每人每天只供应4两粮食（相当于10进位的2.5两），没有菜。五爱管理区287个劳动力，70多人生病（饿病），能下地的只有80多人，病人还在增加。下地的人不能干活，躺在田埂上睡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强调“我们不当伸手派”，不向上级要粮食。而干部不在食堂吃饭，另外开伙，大吃大喝。

1960年9月26日，梁岐山从开县向省委报告，目前口粮接不上红苕产新，食堂处于半停伙状态。有的食堂名存实亡，有些食堂吃红苕叶子和南瓜叶子当顿饭。红苕叶子吃完了，影响了红苕的生长。赵家公社人和管区第三生产队207人因浮肿病死了91个，土地荒了一半，水稻平均每亩只收180斤；剩下的116人当中，还有不少浮肿病人。但是，开县的干部还认为粮食被瞒产私分了，还搞“献粮运动”，口号是：“人人交待，人人过关，自己检查，大家提意见。”

1960年10月22日，中共壁山县委报告，本月18日统计，1－10月13日止，全县共死亡15544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4.5%。据省委壁山工作组1962年1月19日报告，1961年，大兴公社死亡839人，占总人口的10%，其中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占死亡人数的67.9%。另据中共壁山县委1962年1月2日报告，自1959年以来，死亡率不断上升，1959年死亡13058人，占总人口的3.2%，1960年死亡约20000人，占总人口的5.9%，1961年死亡人口21685人，其中农村死亡20987人，占农村总人口的6.2%。按县上述数字，三年共550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一般说来，县委上报的死亡数总是缩小了的，这还不包括1958底和1962年的死亡人数。

绵阳县松桠公社是一个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地方，但从1959年到1960年两年共死亡1528人，占1958年总人口的13.2%。

广汉县金鱼公社的不完全统计，1960年死亡1443人，死亡率为

7.1%，出生294人，出生家庭多为干部。连山公社1960年死亡1268人，死亡率为7.7%，1960年2月，这个公社出现浮肿病人1000多人，公社领导人隐瞒不报，反而向县委报喜，说全公社只有6个病人。这里的7%以上的死亡率不包括1958年到1959年的死亡数，1961年以后还继续饿死人。

1961年秋后，全国很多省份开始走出饥荒，而四川省还处于严重的饥饿之中。1961年8月31日，四川省委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检查组，提交了一份渠县群众挖吃观音土的调查报告。摘要如下：

六月下旬，大峡公社文兴大队的20多户人家，有15户在蒲家山挖观音土吃。七月中旬，挖土的人愈来愈多，蒲家山一处不够挖，就去太公石、河底子去挖。七月底、八月上旬更加严重，挖土吃的已扩大到三个区十八个公社。

我们在蒲家山、太公石、河底子、龙凤咀等四处调查的结果是，被群众挖空的土估算为400多立方米，挖土的约有一万人次，挖走的土50万斤左右。群众在挖土的过程中，由于坑少人多，还需要在烈日之下排队等候。路远的人为了不在当日爬过高山之后再挖土，头一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庙学校过夜，第二天早挖早走。这所学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这里，最多时有100多人。新河公社三大队派一老农专门挖土交给队里，队里给他记工分。由于饥饿，不少人边挖边吃。有的小孩由于天热和饥饿，昏倒在地，挖好的土也背不回去。挖土时还造成塌方，压伤了人。

群众把挖回的泥土，经过发水、磨细等简单处理后，就渗合着南瓜花、丝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来吃。有的地方还有人卖土粑的。庆丰大队262户人家当中，就有214户、755人吃过泥土。截至8月23日止，他们挖回9840斤观音土，已经吃掉了6768斤，现在还继续吃。吃土后普遍反映肚子疼，屙不出，有的诱发了不少疾病，有6人死亡。据对三个生产队的初步调查，吃泥土致死的就有13人。

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给人以面粉的感觉，但它不含一点粮食中的成份，连动物也不吃。从1959年春开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观音土的记载。北川县游坪公社马鞍山农民1960年冬到1961年春就大量挖吃观音土。这期间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处发生群众挖观音土吃的严重情况。

从1960年底到1961年底，四川全省各地都有关于饥饿和死亡的报告，如武隆县对平桥、鸭江两个区10个公社的了解，1－6月份死亡率4－5%的有4个公社，5－6%的有3个公社，6－7%的有2个公社，最

高的顺兴公社为8.28%。10个公社1－6月共死亡3362人，占总人口的6.23%。

到了1962年，全国已经基本走出饥饿的时候，四川还有大量关于饥饿的报告。1962年1月21日，江津地委关于肿病情况的报告称，截至1962年1月20日，肿病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两倍多。1月1日至15日，全地区共死亡5743人，比前15天增加了2.1%。江津地委1月29日报告称，江北县1月5日，有病人112190人，10日上升为120635人，15日上升为133801人，20日上升为141523人，25日上升为147560人，占总人口的22%，其中肿病和枯瘦病人占84%。1962年1月25日，长寿县省委工作组马吉良电话汇报说，1月15日，肿病人达36000人，比上年12月下旬增加了1.57倍，到22日又增加到41000人，占总人口的9.2%，肿病较多的江南区，占人口总数的25.5%。1月上半月的15天内，全县共死人1700人。因家里吃粮问题，发生了妻杀夫、父杀子、兄杀弟的人命案也都出现。云集公社挖观音土吃的有1513户，占总户数的37.8%。秤砣公社有24个生产队靠挖观音土充饥。1962年1月26日，万县地委关于肿病的简报称，近来各县肿病普遍上升，非正常死亡又有增加。1月23日，肿病和干瘦病比一星期前（1月16日）上升了17.87%。1月17日到23日，死亡人数比上周上升25.3%。

1962年3月2日，粮食部两位局长（林翩天、吴国宪）在四川调查后向部里报告，江津地区壁山县城北公社共有9818人，1960年全年死亡548人，占总人口的7%，这个公社甘塘大队原有589人，1961年死了102人，现有肿病58人。这个大队第四生产队共有143人，仅1961年11－12两个月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3%。城西公社来龙大队第四生产队小湾浣子，有7户37人，已死12人，患肿病住院11人，社员张世富一家五口全死绝。有两户父母双亡只留下两个孤儿，一户父母一亡一病，只有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家。其余三户除生产队长一家7口健壮以外，都有浮肿病或干瘦病人。黄角大队还出现了杀子而食的现象。这个报告还说，江北县1961年12月统计，浮肿病人79469人，1962年1月15日统计，浮肿病人增加到133610人，占农业人口的22.1%。全县死亡27305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4.5%。1961年1－10月平均每月死亡1678人，11月增加为3387人，12月死亡增加为7225人，1962年1月上半月就死了2805人。壁山县1960年死亡两万多人，1961年又死亡两万多人。进入1962年还在继续死亡。

1962年3月17日，当年任粮食部长的陈国栋，根据四川粮食厅副厅长管学思的汇报的情况，给李先念副总理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不完全统计，全省浮肿病人144万人，11个特重灾县从去年7月到今年3月

就死亡145800人，占农业人口的2.3%。1962年1月底，60万人的江北县就有浮肿病人14.7万人，占总人口的24.6%。这个县去年12月一个月内就死亡7225人，占总人口的1.5%，今年3月上旬每天死亡100人左右。路毙和河里的死尸到处可见。壁山县大兴公社，最近三个月内死亡人数占全社总人口的12%，兴隆大队231户，781人，最近三个月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13.8%。其中9户死绝，另有9户只留下11个孤儿。

1962年5月27日，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关于西昌地区点滴情况报告》中说："在西昌、德昌、米易公路沿线看见成片的荒田，据说这不完全是旱象造成的，有的是连年死人过多，无人耕种所致。我们在西昌锦川公社六大队的公路上发现中年妇女刁永相饿死在路上。经过雅安紫石公社六七大队时，在马路上看到一位被打得不能动弹的妇女，群众说她偷吃被打成重伤。公路两旁荒田荒地很多，麦田的草长得和麦子一样高，大块大块的水稻田未整出。病人还很严重，最近不断死人。群众说他们公社死了三分之一，现在还未停止。"

1962年7月25日一份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发生肿病234万多人。据7月20日统计，现有肿病人51万多人。

1962年9月，正是秋收季节，从雅安还传来饿死人的消息。一份报告说，目前病人仍然很多，非正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芦山县仍有病人2000以上，占总人口的4%（财贸部的工作组调查说，还有3034个病人，占总人口的5.6%）这些病人都属三度肿病人，较严重。目前芦山县有孤儿1000名以上，约占总人口的2%以上，平均每个生产队有两个，个别人口死亡较多的生产队，孤儿竟占总人口的20%。清源公社光明生产队，20户，初级社时有107人，现在连迁进的3人，共55人，死亡率竟占50%，目前有孤儿13人，占总人口的23.6%。

过度饥饿使人失去理性，暴露出动物的残忍。在大饥荒期间的四川省，有记录的人吃人事件有多起。

大邑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30岁，于1960年4月23日把亲生女（李水清，8岁），儿（李永安，9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两，被发现，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给了她一人四两米，两个孩子没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队长×××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将饭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做活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

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41岁， 1960年3月16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当晚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篼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1.5元一斤，共卖了11.75斤。这事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她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灌县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39岁。1960年3月16日下午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灌县崇义公社第三管理区周裕光，39岁，解放后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3月16日下午，她针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来，砍去头部、四肢，将肚肠挖出丢在河里，将身子拿回家煮吃。

五、只准讲“疫情”，不能说饥饿

人口大量死亡，全国各地统一口径称“疫病流行”，不能说饥饿所致。1959年5月23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宣教动态》以“为什么肿病继续上升”为题报道，“据卫生部报告，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较广。从今年一月到目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等11省、自治区共发生肿病105.5万人，死亡6700多人。其中以山东省最为严重，1月至4月14日，发生肿病病人77.9万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1日，就发生肿病病人17.3万人。其次是河南省，从1月到4月20日，发生肿病15.3万人，死亡2000多人。”这里没有提四川和安徽，因为这两个省当时盖子捂得很严，外界不知道。

这篇报道分析肿病发生的原因，第一，因口粮紧张，群众以为吃盐可以增加力气，每天吃盐1两以上（正常日需3钱），因吃盐过多，引起代谢障碍发生浮肿；第二，食品单调，长期间未能调节，脂肪、蛋白质严重缺乏或不平衡；第三，去年发过肿病未能根治，今年复发；第四，原患有慢性病、贫血、身体虚弱、年龄大，肠胃不好。

1960年春天，正当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饥饿的时候，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中说：

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

起来，并且一定要于1960、1961、1962这三年做出显著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

1961年2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把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子宫下垂等因饥饿所致的病态和其它常见疾病混在一起，用常见疾病来掩盖饥饿致病。并且笼统地要求各地加强“疾病治疗”。四川省委看到卫生部这个报告，立即下发通知，用“疾病”来掩盖饥饿，用“卫生工作”来代替对饥民的救济。通知说：“在抢治浮肿病、妇女病、小儿病等主要疾病的基础上，结合进行四大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更进一步做好以食堂为中心的集体化卫生工作，防止传染病的流行”。接着提出了三项措施：一、开展防治肿病突击运动，迅速清理现有肿病病人，集中免费医治、营养、休息三结合的办法突击抢治；二、进一步加强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集体卫生工作，办好公共食堂；三、围绕防治肿病这个中心，结合防治钩虫病、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和季节性传染病。这些措施洋洋大观，就是不提给农民增加粮食供应。从此以后，各地上送的报告，都把饥饿致病、致死，都说成“疾病”、“流行病”、“疫情”。

1959年8月9日上午，四川省委杨万选自南溪报告说，长宁县流行的水肿和腹泻，自6月下旬以来发病人数占总人数的13%。兴晏公社一个生产队今春以来死亡率达17%。发生这次“流行病”的原因，西医说是缺乏维生素B以及食堂不卫生造成的，中医说是湿气和脾胃不和造成的。这个报告也提到粮食不足，就是不敢说因饥饿而致病致死。

1959年秋后不久，古蔺县因饥饿出现大量浮肿病人，饿死人的情况也相当严重。这时，从县委到地委省委，统一口径说古蔺出现了“疫情”。12月7日，中共泸州地委办公室关于古蔺县疾病情况的汇报中，将发病人数缩小为403人，还说前次所报数字不准（实际前次报的数字是大大缩小了的），“把一般正常的疾病或富裕中农闹粮无病叫病等都统计进去了”。这个报告还夸大其它疾病的比重，缩小肿病的比重。说钩虫病占86.6%。“肿病是钩虫病的晚期，并非急性传染病，更不是吃代食品所致。”

这个报告很符合李井泉的口味，第二天他就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这个报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肿病和钩虫病往往结合着发生，在注意肿病的同时，要首先治钩虫病。请卫生厅对此加以研究，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解决。”这个批示进一步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饥饿引向钩虫病。12月12日，“泸州专区古蔺疫情调查工作组”上报了一份更符合李井泉口味的报告，这篇报告完全没有粮食不足和饥饿的影子，还批驳了“有些人认为病是吃代食品造成的种种错误论调”，说是钩虫病占31.9%，一般慢性病占25.8%，感冒占19.8%，胃肠道病占

13.8%，其它病占8.7%。结论是："当前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冬季除害灭病运动，大力抓好钩虫病的防治，大搞食堂卫生和积极预防冬季多发病和传染病的宣传教育工作。"省委负责人之一的杜心源于1960年1月2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结合开展春节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检查和防治工作。"这是一场掩盖事实真相的闹剧，用"爱国卫生运动"代替了对饥民的救助。

然而，爱国卫生运动救不了饥饿的农民，"疫情"继续发展。省委除灾灭病办公室1961年1月18日报告，泸县到1月8日止，有肿病人20626人，比去年12月下旬增加30%以上。资中县1960年12月下旬肿病人比10月份增加了四倍。但这个数字还不是肿病人数的全部。各地都少报、瞒报。长宁县原报肿病人4000多人，经查至少在8000人以上，江安县上报7709人，实际至少有2万名。在一个公共食堂，干部上报16个肿病人，实际有116个。泸县死亡率已占总人口的7%，死亡还在继续，1961年1月4日到8日，五天就死281人。

既然是疾病，就得治疗。因此，四川省委下令，各地要组织医疗机构，加强治疗病人。其实，治这种"病"最有效的药品就是粮食。由于政府把住粮食不松口，要求供应粮食就是"闹粮"，而"闹粮"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各地开出了治疗肿病的种种药方。

1960年4月16日，内江地区一份给省委和内江地委的报告中讲到资中县肿病又有所发展。当地的治疗处方是：鸡蛋一个，白酒（50度以上）一两，雄黄二钱。三者混合均匀后一次生服。效果很好，不再复发，无负作用。1960年10月23日，万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在开县召开中西医座谈会，提出了治肿病的多种验方：

水夜合、荀儿皮各适量，熬后去渣，用汁煮稀饭吃。可消肿、健脾

复方糠丸。细糠1斤，黄豆4两，车前子4两，陈皮一两，将糠、豆磨细、炒熟后，混合做成5钱一丸，日服三次，每次2丸。

老虎姜、猫儿皮（草药名）何首乌、臭草根、路边姜，兑红糖熬水喝，或用汁炖黄豆吃。

夜关门、饿马黄、炮桐子树根、山胡椒根、川牛夕熬水兑红糖喝。

高梁杆根熬水喝，可消肿强心。

高梁篼切成一寸长，加水煎（一斤湿高梁篼加2斤水，干高梁篼加4斤水），煎一半后放红糖5钱，为一日服量，分三次服用。

各地发现的药方都向省委汇报，由省里向其它地方传播。但药方都离不开红糖，黄豆，药材，有的还要鸡蛋，一般农民是得不到这些极为珍贵的东西，而干部却从这里得到了鸡蛋、红糖、黄豆的供应源。

四川省委曾多次发出突击抢治肿病的通知，要求各地把病人集中起来治疗。各地利用中小学教室、祠堂，牛棚建立临时病房。1961年3月，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报告说，全省已办起临时肿病医院27005个。已集中治疗病人952000多名。

但是，这些所谓临时医院条件极差。一是缺医少药。涪陵县黄旗公社集中了600多名肿病人，不分重病轻病，一律吃大锅煮的草药。荣县有些临时医院，病人集中了10多天后，没有药吃。二是经费不足。有的公社医院垫付资金，连工资都发不出，南充县95个公社，有42个公社医院发不了工资。农村医务人员70%－80%都集中治疗肿病，没有业务收入。病人大量集中以后没人管理。有的临时医院管理不好，接连发生事故。合川县永兴公社在半个月内就发生6起烧伤和跌伤事故，烧死3人。

江北县仁睦公社中建大队医院集中了病人158人，只有一个医生，而且生病卧床，三个护理员不懂业务。医院没有菜吃，没有开水、热水，冬天病房没有烤火，病人也没有药吃。

江北县石坝公社六耳大队医院集中了172个病人，只有8间病房，30多张病床。只好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地铺上，地铺上草很少，30%的病人感冒，没有燃料，有的病人长时间没有洗脸洗脚。

涪陵县明家公社医院收有63个病人，其中重病人53个，不懂医务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兼院长，两个医生中一个原来是会计，两个护理人员中一个是11岁的孤儿。病房臭气难闻，连护理人员也不愿进去。

涪陵五马公社医院粮食不足，病人上顿不接下顿，经常断炊，没有菜，以盐水代菜，每天都有病人死亡。病人住院后工分挣得少，粮食分得少，出院后生活下降，加剧了饥饿和死亡。

芦山县清源公社芦溪大队的临时医院，病人自己做饭，缺炊具、缺柴烧，20多个病人用一个洗脸盆轮流做饭。雅安天全县大坪公社住院88个人，两个月后，死亡33人，转重的4人，没有改变的16人。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在雅安考察时看到不少肿得很严重的病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医院治疗，他们说：医院条件很坏，在那里死得更快些。金堂县五星管理区的肿病医院是牛棚改的，清洁卫生没有搞彻底，臭气难闻。病房没有门，四周没有墙，90%的病人睡地铺，铺草很薄。有的

病人没被子，白天还喊冷。广汉县金鱼公社医院院长黄某，把活人装进棺材埋掉。

金堂县栖贤公社二管区肿病医院常住病员八九十人，只有医生一人，“保育员”两人，病房是包谷杆搭的草棚棚，睡的是谷草地铺，男女病人混住一房。广汉兴隆公社肿病“疗养院”病人住的是“檐口边、拌桶内”；西外公社“重病院”的病人水肿破皮不能料理自己，被盖、鞋、袜、裤子都是湿的，有的人睡着吃饭、屙屎，无人护理；中兴医院有的病人死了无人处理，同室的病人挪得动步子的只好搬走，走不动的“伴同死人住了三天三夜”。

广汉松林公社医院半年内收治肿病人250人，地委干部王树本去了解情况时，已死亡97人，去的当天又死2人，第二天死3人，他离开时只剩下的67人，估计将近一半活不到半个月。

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饥饿的折磨，把妇女们的身体完全摧垮，妇女病广为流行，最常见的是闭经和子宫脱垂。妇女们突然之间都不来月经了，正常的生理活动周期中止了，伴随而来的是头晕脑胀，脚酸手软，腰腹胀痛，面黄肌瘦，乡下人称之为“干病”。同样因极度虚弱和劳累的原因，导致子宫悬吊组织松散，脱垂出体外，乡下人称之为“吊儿肠”（“儿肠”即子宫），长期磨擦，感染溃烂，痛苦不堪。温江县除害灭病办公室1960年6月份作了一个调查，全县18到45岁的“经期妇女”5万多人中，停经的达两万多人，另有子宫脱垂的2000多人，他们并认为这个数字“可能偏小”。据他们在金马、永兴两个公社重点了解，前者停经妇女占经期妇女一半，后者达60%。金马公社896名停经妇女中，18岁到25岁的青年妇女有334人。一份来自温江涌泉公社华丰管区的调查说，全管区15到50岁的124名妇女中，停经的达90人，占妇女的70%以上。

妇女病也要求集中突击治疗，但大部分“医院”和肿病医院一样条件恶劣。明明饿出来的病，却得不到营养的供应；治不好，又要治医生的罪。情急之下，医生就下猛药，结果酿出大祸。邛崃双江公社鱼唱管理区“疗养院”医生李明征，将草乌、南星等有毒草药加进处方，护理员又未按操作方法泡制，就让病员服了。医院条件太差，医护人员晚上都在外面去住。两小时以后，服药的29人全部发作，呼天抢地，无人照应。凌晨五点钟，医生李明征闻讯赶到，发现已经有四人死得硬梆梆，还有一些奄奄一息者，他就跑出去投河自杀了。

“医疗”解决不了饥饿。“疫情”继续发展。1961年7月5日，宜宾地委除害灭病小组“关于肿病发展情况的报告”称，自6月中旬以来，我区肿病又有发展，从6月18日到7月2日，15天上升了29%。死亡情况也比

较严重，7月2日比6月18日死亡增加了40%。宜宾县月波公社光辉大队金竹生产队去年年底总人数是192人，到今年7月2日，只有147人，减少45人，将近死了四分之一，最近几天又死了主要劳动力6人。由于大量死人，田土大版荒芜。宜宾县安边公社总耕地面积13171亩，抛荒2506亩，占总面积的19%。中共宜宾地委一再声称要采取措施挽救危局，但饥荒还继续发展，1962年2月2日发出的"宜宾地委关于当前治病情况的电话汇报"中说："我区病情到1月29日止，全区出现肿干病123832人，比5天前上升了10%，死亡还在上升。"

六、"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使干部拥有一个令人致命的权力——社员的吃饭权，也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群众吃一顿肉，他们吃几天肉。

公共食堂炊事员掌握了勺把子的权力，这是直接分配食物的权力。汤汤水水的大锅稀饭，见了顺眼的勺子沉底一捞，就吃得多一点，见了不顺眼的皮面上一划，清汤寡水几片菜叶。炊事员还可以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输送救济。这样重要的岗位，一般落到干部亲属或亲信头上。

在饥饿中，干部多吃多占是普遍现象。省委检查团的一份报告中说，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占干部总数的75%。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他们对社员可以任意惩罚，社员无法监督他们。什字区严海臣等5人私分黄谷14000斤，中坝管理区主任张吉臣一人就贪污粮食3000多斤。他们将贪污的粮食大肆挥霍。社员说："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都被大嘴乌鸦吃光了。"大足县土桥公社有不同程度多吃多占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吃掉集体粮食100多斤。后给以撤职处分。1962年复职后，又办干部小伙食团，共吃掉大队提留粮800多斤、国家供应社员的粮食400多斤，还拿300多斤回家。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各地治肿病的临时医院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场所。由于政府对这类医院

供应一些红糖、粮食等，很多干部及其亲属以病号名义，冒领补助粮食和糖。干部利用这个机会多吃多占，还把上级供应给病人的红糖、粮食据为己有。江北县石坝公社有92名干部没有病虚报为病人领取补贴，还有137名干部家属、亲戚报称“病人”领取补贴。此外，医院的院长、保管员、护理员、炊事员、运输员、勤杂员贪污尅扣病人的供应物品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在涪陵县明家公社医院，病人看到粮店供应的100斤面粉被医护人员分了。各地医院病人普遍反映，国家供应的黄豆、红糖，他们都没有吃到。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在公共食堂无米下锅的情况下，干部们尅扣口粮，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区的几个干部把小春剩余的2000斤种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区任其挥霍。1959年中秋节前后，他们从副业队提回几十只鸭子，专供几个干部吃。

垫江县界枫公社共揭发出177人有盗窃行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干部137人，占盗窃人数的77%，占干部总数的82%。这些干部除了盗窃集体的粮食和财产以外，还对社员明火执仗。石花管理区大队长夏某，竟在白天以没收富裕农民财产为借口，将老上中农夏炳盛家的被盖2床、蚊帐3笼、桐籽110斤、麻20斤、漆1斤、红海椒2斤、烟叶1.5斤全部拿走，连一床草席也不放过。

在食堂断粮、群众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郫县红光管区竟不顾群众死活，开办干部食堂，大米白面，吃酒吃肉，几个干部吃了牛肉200多斤，过旧历年一队社员食堂杀了一只150斤重的猪，干部食堂就拿去90多斤。红光公社有两对著名恋人，一对是县委农工部部长潘兆清和公社党委书记郑功瑶，另一对是合兴公社总支书记刘绍元和和独柏管区的支部书记游福群。他们的干部食堂将供应照顾病人和幼儿园的白糖、鸡蛋都卡住吃掉。1960年过元旦，杀了一只猪重130斤，刘和游就拿走吃掉60斤，当时全管区六个食堂已全部停伙，只吃一点白水煮的苕叶，死人累累，但他们却大摆宴席三桌，为其一周岁的儿子做生日。他们为了吃鲢鱼，在数九寒天，逼迫十余个社员下水戽鱼，共戽了60斤鱼，刘绍元、游福群和潘兆清、郑功瑶就吃了30多斤……更恶劣的是刘绍元在公社上碰到一个社员拿了一只鸡，刘硬说是偷来的，把鸡拿走，社员跟着要鸡，到了乡公所，刘便拿起电话，假装给派出所打电话，社员看到叫派出所，便吓跑了，鸡被他们吃掉。1960年，潘兆清，郑功瑶夫妇数喜临门。五月潘兆清升任华阳县委书记。六月郑功瑶升任郫县县委常委。

四川省留下的档案中，只有揭发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县以上干部的特权行为没有留下多少资料，这是四川省委严加控制的结果。当

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提供了李井泉的生活情况，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基层干部的特权行为是为了吃饱，而少数高级干部则是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追求享乐。

七、吃青、刑罚、扣饭

饥饿难耐的农民，出于生物的本能，见到可吃的东西难免要吃。当时可以吃的东西无非是还没有成熟的庄稼，如青麦穗、青稻穗、青玉米等。但是，这种“吃青”行为一旦被干部看见，轻则罚款、扣饭，重则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折磨致死。而更常见的情况是，农民没有偷吃，却被干部诬为偷吃而受到惩罚。

荣县五一公社新进大队二队社员朱玉发1961年春天拿了地里的胡豆2.5斤，被罚款120元（相当于科级干部四个月的工资），除了把他家里的衣服、被子、席子、红苕及口粮供应证全部没收外，还将他身上衣服脱光，进行批斗。朱玉发每天还要付给向他“追赃”的人粮食每人1.5斤，工分10个。地委向县里下达了“追赃”任务120万元，县委又将这一任务下达到各区，各区又加码下达到公社。各公社、大队为了完成任务，采取了“人跟人、脚跟脚”的“追赃”活动。有的公社规定“倾家荡产，卖巾巾片片，卖儿卖女，都要缴清赃款”。因此，在乐道、成佳、龙潭、唐山等区的农村，“追赃”的干部见鸡捉鸡、见鸭捉鸭，见什么拿什么，社员的衣服、棉被等都被拿走。有的“追赃”干部借机大发横财。社员童光前趁给食堂打柴之便，拿了一点柴回家，公社令其赔款270元，童无钱赔，公社将他家老人的两具黑漆棺材当即抬走，生产队里还拉走了他的一只大母羊，抓走了一只鸡和一只鸭。有的公社用评议的办法确定偷盗的数字，富南公社三大队在255户中就评议出偷盗户254户。

1960年春，古蔺县的公共食堂已经断粮多日，能吃上漂汤（汤内有少量菜叶）就算改善生活。人口大批死亡。龙美公社金坪管理区去冬今春死亡人口占原有人口的24.7%。没死的人很多患有肿病，边干活边呻吟。饥饿的社员被迫偷吃粮食。彰德公社二管区一队84户，偷盗和私拿粮食的就有77户。干部对吃青、私拿的处理也十分严厉。潭庙公社一社员偷了2斤红苕，支部书记计算：这2斤红苕下种后可产3000斤红苕，其价值30元，当即罚偷苕的社员37元。除了高额罚款以外，扣饭、罚跪、捆绑、吊、打、劳改、搜查、没收财物。扣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六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

有64户被扣过饭。社员说，这个队有“三扣”：不按吃饭时间到食堂要扣，不能下田的病人要扣，不向食堂交野菜的要扣；还有“三不扣”：干部不扣，干部家属不扣，干部亲戚不扣。这个六一管理区在1960年1到6月，就有29人被捆绑吊打，其中有4人致死。有的公社规定，社员不请假外出、不出工、不参加会、不交野菜、不交青饲料，一律扣饭。古蔺县飞龙、彰德、玉田三个公社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144人中，有三分之一打过社员，被他们捆绑吊打的社员有124人，其中被直接吊打致死的和逼死的有33人，致残6人，重伤7人。据对古蔺县德跃、摩尼、太平、白沙等6个区22个公社调查，1960年1到6月，干部打社员造成严重后果的有76起，因吊打致死的16人，致残的6人，重伤7人，扣饭饿死7人，自杀多起。新建公社白沙管理区1月至3月，受到种种不同程度肉体惩罚的社员119人，其中，吊打逼迫19人，打残1人。圣灯公社第九管理区第五生产队队长张某常吃双份饭，1960年3月23日，社员黄文先没有出早工，张队长当即扣黄的早饭。黄说：“为什么要扣我的饭？有人还吃双份饭呢？”张队长认为黄伤了他的面子，命令社员毛学友拿些大粪，将黄按倒在地向黄的嘴里灌，弄得黄满头满嘴都是大粪。

省委整风整社温江工作团在上报省委和地委的一分报告中写道：

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全县大抓生产、生活和继续开展反右倾斗争中，罚款、扣饭和算损失账等违法乱纪现象普遍发生。在1960年二、三、四月，全县大搞“突击落后”，合并大管区、大食堂等运动中，罚款、扣饭、捆绑、吊打社员群众，以及“洗毛芋头”、“留学”、“开富裕中农座谈会”（即白天监督劳动，晚上轮流批斗）、乱捕、乱扣、乱撤干部的情况愈来愈严重、普遍。逼死人的事件不断发生。直到六、七月“新三反”期间，这股风势稍有缓转，但在8月至11月的粮食核产工作中，在县委部分主要负责干部分别主持的淮口等地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上，又发生了打人、“洗毛芋头”、罚跪等行为，直到这次会议期间仍然没有刹住。

“洗毛芋头”在河南、甘肃称为“炒豆子”，这个报告介绍，1960年12月13日晚上，龙王公社四管区社员曾本春到食堂请人给小孩看病，被武装队长罗某与支部书记吴某碰上，被他们诬为“偷东西”，当即遭到毒打，并搜查其家，曾取刀刎颈自杀，经急救未死。12月14日，民校教师贺某发现竹篙公社联盟管区社员罗龙利偷鸡，贺将罗龙利及其母捆送队上，狠打了三次，又将其父家中搜刮一空，逼得罗龙利跳井自杀未遂，其父于15日上吊死亡。

这个报告介绍说，仅竹篙区1960年2月到11月，在少数公社、管区、生产队干部的主持下，活活打死社员6人，被他们“洗毛芋子”、吊打

之后自杀的83人，被扣饭饿死1人。据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饭，230户被搜查，99人被罚苦工，68人被罚款，27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人，致残者3人。

“洗毛芋子”又称“打肉皮球”。长江流域的农民洗毛芋是将毛芋放在木桶里，装上一些水，再用一根带把的木棒在桶里来回推动，使毛芋相互磨擦而去掉表皮。这里说的是：　将被惩罚的若干人围在中间，四周的人将他们推来推去。这种刑罚和北方称为“炒豆子”的刑罚相似（本书甘肃章、河南章、山东章都提到这种刑罚）。

这份报告介绍，龙王公社人和管区有3被人整死，2人被整残。贫农社员龚明通因出工不积极，被分支书记罚扣饭15天，他饥饿无奈，挖了一些红苕，被“洗毛芋子”而成重伤，送回家后上吊自杀。大明管区分支书记廖某，强令有病的社员肖有根从公社背米回管区，肖走得慢一些，就以“磨洋工”的罪名，轮流三次给肖“洗毛芋子”，第二天，肖上吊自杀。肖父因气愤不已而死，其妻精神失常，幼子无人照看也很快死亡。1960年8月，土桥管区双流公社就有五个社员被干部迫害致死。该社总支委员兼前进管区支部书记吴某，在1960年一年内就逼死社员两名，“洗毛芋子”10多人，扣饭300多人，罚款罚苦工20多人。又新公社社员周玉明因得肿病，管区主任周某强迫其出工，昏倒在地，而主任反而诬陷他偷吃红苕，当即毒打，拖回办公室，第二天即死。据不完全统计，土桥区从1960年1月到11月，由于干部扣饭饿死8人，因占小便宜被干部组织斗争、“洗毛芋子”而后自杀26人，被干部活活打死2人。

据不完全统计，长宁县桃坪公社总支书记、委员、支书与乡干部15人当中，关过社员的就有9人，占60%。全社伙食团长以上的干部441人当中，扣过社员饭的212人，打过人的19人，捆过人的48人，虐待病人造成死亡的有31人。被他们扣过饭的社员不计其数。他们私设劳改队，私设监狱，不准病人吃饭，强迫病人劳动。碾坎生产队罗大娘母子4人病在床上，10天不给饭吃，死了3人。中坝管理区的劳改队中有一个叫陈玉秀的11岁女孩，她被迫干了5天5夜的活，疲劳过度，口鼻流血而死。大同管理区社员李友成怕扣饭，带病出工，病倒田间，被抬回后，队长说他装病，踢他几脚，回家即死。

1960年二、三月份，合川县南屏公社由于饥饿，群众“吃青”现象比较普遍。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谭某在作业组长以上的干部中布置：凡是有偷窃行为的人，抓住后就吊、打、罚款。谭还在中南、白鹿两个管理区先后开会毒打6人以示范。还在会上公开说：“劳动力多得很，整死几个没关系，打死十个算五双，砍成几块好肥南瓜窝窝。”“整这些人

要有斗争性，不执行就反右倾。”并规定偷一棵胡豆或一个包谷罚一元，偷一个红苕罚5元。从此，这个公社打人、扣饭、罚款、抄家成风。据统计，全社159名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中，捆绑吊打过社员的就有89人，占56%。被打的社员565人，被罚的478人，被抄家的588户。对社员施的刑罚有：“吊半边猪”、“鸭儿浮水”、“猴子搬疙瘩”等。据检查团调查，有44人在吊打和扣饭后致死，有19人打成残疾。另据樊执中1961年11月13日对南屏的报告：一，该公社伤亡496人中，吊死、逼死、活埋的有42人，打伤、打残的62人，因病还强迫劳动或扣饭而致死的有392人；二，被罚款的有387户，罚款额为12400元。白鹿管理区社员张绍荣拿了7根红苕，被干部捆绑吊在树上，罚款20元。张妻交了19元请求放人，干部们不仅不放人，还拿出5元罚款买酒办菜，在旁吃喝。

1960年2月至3月，太平区委副书记唐某（农民称他为“唐阎王”）在“突击落后”运动中，搞所谓“拆散落后窝”，强令他认为的“落后”院子的178户社员“大搬家”，不愿搬的66户都被斗争，有19户被重点批判，8人被捆，当场逼得社员钟相成投水自杀。

据不完全统计，合川县南坪公社被打死逼死496人，其中，吊死、逼死、活埋的有42人；打残、打伤的有62人，因病但还强迫劳动或扣饭致死的有392人。这些非正常伤亡大都是公社党委书记亲自主持或下令造成的。另据乔志敏报告，公社党委书记谭某不仅在干部会上布置，凡是有偷窃行为的人抓住后就吊打罚款。他还在中南白鹿两个管理区生后开会毒打6人示范，在会上说：“劳动力多得很，打死几个没关系，打死十个算五双，砍成几块好肥南瓜窝。”全社队159名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中，捆绑吊打过社员的有89人，占干部总数的56%，被捆打的社员565人被罚款478人，被抄家586户。

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食堂事务长徐建民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4月，先后吊打过社员18人。社员徐文普偷吃了两个红苕，被徐建民吊打后5天即死。这个管理区还组织了一个“劳改队”，凡是犯了“错误”（偷吃了东西）都被送去“劳改”，“劳改”时间有一个月的，也有两个月的。“劳改队”劳动繁重，每晚加夜班，不能回家。社员陈素华夫妻二人都被“劳改”，有一次偷偷回家给小孩喂药，被干部发现后，揪着头发拖回了“劳改队”。社员郭士身患重病卧床不起，队长强令其出工，3天后死亡。社员周代珍的儿子从修铁路的工地病重抬回，生产队长让社员马上挖坑埋掉，不准抬回家，经社员多方说情后，抬回去多日才死。

有了公共食堂以后，干部就掌握了农民的饭碗，扣饭是干部整治农民最常用的办法。这样，“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落实到每个人的肚子

里。1960年1月，金堂县农民因饥饿而外出逃荒。1月19日，金堂县委向各区、公社、管区发出了《关于控制和清理人口外流的紧急通知》，文中规定："外流劳动力，其家属应写信找回，到期不回，伙食、粮食自行负责，公社一概不管"。农民外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粮食定量省下来留给家里人吃，现在外出的人粮食定量被扣，对外出农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隆盛公社接此通知后又加以发挥，要外出人员家属天天写信，哪天不写，就扣哪天的饭。有的公社规定了各种扣饭的条款，扣饭就成了社员的家常便饭。在饥饿的时代，管食堂的人常常决定社员的生死。

江北县沙坪公社小屋管理区党支部委员贺某，在该管理区长河堰食堂工作期间，对患肿病的社员普遍扣饭，饿死病人数人。社员朱海清患肿病不能出工，被贺连续扣饭两个月，第一个月每天只给三两原粮，第二个月只给二两，到最后5天一颗粮食也不给，朱被活活饿死。社员蓝权在水库工地上患病回家，不能出工，被扣了30天饭，蓝没办法，每天挖野菜充饥，不久饿死在山坡上。社员冯银山一家7口人，有4人因患肿病不能出工，全家被扣饭，结果7口人全部死绝。江津县大河公社龙会管理区社员范如英，患有严重肿病，支部书记李某强令他挑粪，在挑粪中倒在路上死亡。荣昌县社员李洪英患有严重肿病，干部强令他下水田干活，其妻苦苦哀求干部不要派李下田，结果，李妻被干部打了几个耳光，还扣饭两天，李洪英下田后几天死去。荣昌县高峰公社第十四管理区50多岁的女社员杨慈民被干部怀疑为偷鸡，押送到管理区吊打一顿，第二天放出，杨在回家路上晕倒，神志不清，管理区支部书记高某即令将杨埋掉，临埋时杨还在呻吟挣扎，结果还是活埋了。

农民遭受如此严重的迫害，其借口除了"偷吃"、"不服从领导"、"散布右倾言论"以外，反"瞒产私分"也是一个重要方面。1959年，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到10月份，秋征任务才完成了70%，在上面的压力下，县委慌了神，企图通过打人、捕人来完成任务。10月2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这是一个残酷斗争的大会。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于是打人就普遍化了。这个会上吊打了30多名社队干部，10多人致残，捕了3个公社干部。10月25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4000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打人比长山会议更普遍、更残酷。这个会有30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14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4人，撤职8人，受其它处分2人。该公社大小干部被打的有142人，当场打死1人（贫农，生产小队长）打残病死1人

（新下中农，财经大队长）。县委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打人成风，“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坏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于是，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农村如此，城镇如此，机关、工厂、学校也如此。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3人。

1960年9月，永川县水碾公社，在党委书记叶某（县农水局长兼）主持的一个会上，作出两条决定：一，凡干部有瞒产私分的，一律迁到别的管区；二，凡社员有小偷小摸的也一律迁到别的管区。会后作出60户迁移的计划。这个公社在叶某的主持下，被搜查的社员占全社总户数的60%，被吊、打、捆绑的有48人，被扣饭的有76户。当时，叶某任县委工作组长，这个工作组的15名干部就有13名干部亲自打人、罚款、抄家，叶亲自吊打过7人。

一份报告称，涪陵县马鞍公社，县里安排社员每天的口粮为6两（相当于10进位的3.75两），但是这个指标还经常被干部扣除。太乙大队有一个作业组6户人家就有5户被扣过口粮。社员夏道珍由于在青黄不接时拿了队里的一点苞谷，被干部发现，七算八算，算出要扣口粮1700斤。此后，每次拨口粮都按20%扣除。有人说这样扣是要饿死人的。队长说：“一年扣不完扣两年，两年扣不完扣三年。饿死一个抬出去，饿死两个挑出去！”另外，大队将还没有收割的作物分配给社员看守，如被别人拿走，就成倍地扣除看守人的口粮。大石大队第三生产队郑得荣看守的苞谷被人拿走了一百多个，就扣他口粮96斤。因此，这个公社继续出现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大石大队1－9月上旬死亡51人，占总人口的6．3%。社员体质很差，90%以上的妇女都停经，今年只出生两个小孩（干部家属）。

江津县双龙公社对社员罚款名目有十多种：吃青胡豆罚款，开会缺席罚款，逾假不归罚款（社员离村外出必须请假），死猪罚款，死猪不报罚款，完不成包产数罚款，中午休息时捉鳝鱼罚款，插秧间距大了（不符合上级的密植标准）罚款，小孩损坏庄稼罚款（即小孩饿了偷吃青庄稼），等等。铜梁县西郊公社二管区规定，摘一颗青胡豆罚款一角（当时社员一天的工分才几分钱）。安居公社葫芦管理区规定，社员外出超过假期，每天罚款1元。

1961年1月4日到6日，省委刘文珍和江津地委张凤伍到大足、铜梁、壁山等县检查了14个食堂，看到的都是停伙、饥饿和死亡。1960年

的死亡率都在7%以上。狮子公社糖房管区三食堂，社员万子民的小孩扯了几棵牛皮菜吃，队长不仅扣了万全家4口人两天的饭，还把万子民捆走来游街示众。壁山公社借阁管区党支部书记对社员实行抄家、罚款、扣粮、扣饭。社员拿一个苞谷扣口粮10斤，拿一个红苕扣口粮6斤。他让一个8岁的孩子一次要挑120斤煤，挑不够就要扣饭。这个管区70%的社员被扣过饭。刘文珍等从壁山回永川的路上，看到三个社员担着箩筐，其中有一些坛坛罐罐。停车一问，女社员叫周敬明，是马坊公社的。她丈夫生病没有吃的，她去找炊事员要点吃的，炊事员答应让周自己去拔点萝卜。拔萝卜时被作业组长发现了，说她偷。退回了全部萝卜，还罚款37元。这相当于一名科级干部一个多月的工资。她丈夫又饿又急，死了。她还不起罚款，只好带着几个小孩改嫁给永川的社员丁树林。丁树林把自己节约下来的一点米拿出来请作业组长吃了一顿饭，请求免去罚款。作业组长坚持要罚，把女方的一些家具作价18元作抵偿，还剩下19元用公债券补齐后才放他们离开马坊。刘文珍等没想到一个作业组长就能对农民如此作威作福。

在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里生活的农民，一切生活资料都被干部所控制，一切生产活动都得听从干部安排，一切行动自由都被干部剥夺，个人行为，家庭生活都被置于干部严密的控制之下。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下，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对农民骇人听闻的大规模迫害。当然，这种情况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十分严重，有的地方情况要好一些。情况好坏取决于农村干部的素质。但是，从总体上看，农村干部素质是不高的，再加上上级各种任务的沉重压力，因此迫害不是个别的。毛泽东把这种大规模的暴行归结于“民主革命不彻底”（见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的批示），即认为这些暴行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所为。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是推卸责任的托词。在整风整社中，这些有过违法乱纪行为的干部曾受过严厉的处置（如举办集训班、特训班，反过来又对这些干部施以残酷的刑罚），大批干部被撤职（如新繁县河屯公社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被打下去和“冷落”的占干部总数的66%），由于干部大量撤换影响基层工作，1962年以后，这些干部的处分也都撤销了。

八、一股救命的潜流

与李井泉所倡导的提高公有化程度、坚持办食堂相反，在四川省的基层，有着另一股潜流，这就是分田到户、增加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正是这股潜流，对减少人口死亡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当时却受到残酷打压。

1959年8月4日，省委检查团泸州分团叙永检查组安法孝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他们发现，在天堂公社部分生产小队推行了红苕“包产到户，以产计工”的办法。支持这种办法的人说，它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减少了干部调工的麻烦，劳动力强的户非常赞成。也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集体生产调不动工，食堂无法恢复，劳动力弱的户吃亏。8月31日，李井泉对报告作了批示：“这是一个典型的右倾材料，印发到会干部阅，供讨论反右倾参考。并发各县委参考。”1959年9月1日，省整社、生产检查团泸州分团安法孝又送上一个长达万言的报告，详细介绍了泸州专区的右倾作法：

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五月上旬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之后，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讨论了公共食堂问题，方针是解散。会后，各县布置了解散食堂的工作。说口粮、烧柴困难，说公共食堂浪费粮食，是“贪污盗窃的漏洞”，说“公共食堂虽然有优越性，我们现在优越不起”等。为了解散食堂，各级党委都召开了紧急会议，层层布置，打通思想，限期解散食堂。有的公社要求“三天准备，七天散完”。在这“一风吹”的布置下，很多县的大部分解散了．．．．．．5月22日，省委发现这一情况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第一书记限期恢复。并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

关于自留地问题。隆昌县等地方1月和5月两次划地给农民。出现了以下问题：占耕地面积多了，超过了高级社时自留地的水平；社员对自种地的经营管理越来越积极，对集体生产关心少了；影响了食堂巩固；影响公社的粮食征购任务。

关于猪的喂养形式。5月上旬地委在布置解散食堂、下放猪只给生产队的同时，又布置将一部分公有公喂猪退还社员私人，可以公有私喂，也可以私有私喂。

这个报告最后说：以上这些是右倾思想的反映……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富裕中农出身的干部，主张单干，反对集体，夸大口粮困难，反对公共食堂，要求猪只退给个人，领导上一方面感到这是一股邪气，也曾给以批驳，另一方面却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作了让步。有的负责干部向下级干部宣传所谓“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把集体生产和个体生产相提并论（原来邓小平的“猫论”源自他的家乡四川）。

9月2日，李井泉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

看来泸州专区在公共食堂、自留地、猪分散喂养、几个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全专区性的，是从上而下的，是有不约而同的共同

主张的，是直到现在还未基本纠正的，是很值得开展讨论，并且要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才能纠正过来。

泸州专区的不少领导干部丢了官，一批人受到批判。在两个月以后的反右倾斗争中，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副书记陈怀堂，在全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名列前茅。但是，严酷的政治斗争并没有止住这股潜流，它在农村还在悄悄地发展，还在悄悄地为饥饿的农民缓解困难。四川省委每年都要发出“关于纠正包产到户的指示”，但包产到户还是没有纠正。

两年以后，1961年9月19日，中共四川省委工作组上报的《关于江北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错误后的情况报告》中说，江北县接到省委关于纠正包产到户的指示以后，于7月下旬召开了各级干部会议，派出干部下去进行纠正，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纠正包产到户右倾错误是不彻底的。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社员对包产到户恋恋不舍。尤其严重的是，从8月底以来，这种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思潮又在全县范围内抬头，较7月之前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右倾倒退活动。突出的表现是：包产到户的面积不断扩大；一部分大队把大春粮食作物（包谷、中稻）以作业组或院坝为单位进行了分配；秋菜包到户和社员占用集体耕地种植秋菜的现象相当普遍；部分大队将小麦种子全部分到了户；扩大了自留地。报告说，“在群众中，主张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的错误思想相当严重”，“兴隆区10个公社党委书记没有一个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这个报告说，右倾倒退错误已经是一股顽强的势力，稍不注意，就会旧病复发。因此，“有必要广泛深入地进行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纠正包产到户右倾倒退错误的群众运动”。

1961年9月25日，李井泉对上述报告作了很长的批示，同意报告的建议：在农村搞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没有制止住这股救命的潜流。一年以后，又是这个江北县，“包产到户等单干活动普遍而严重，在全区591个生习队中，去年红苕几乎全部包产到户，今年小春约占60％”。这里不仅大搞包产到户，还提出了以下理由：1，只有包产到户，才能提高生产积极性，干活不用催，活路作得细；搞集体生产人多心不齐，活路质量不好，进度不快。2，包产到户，谁劳动好，产量就高，谁就能多吃粮，谁懒谁挨饿，这才是多劳多得，按劳分配。3，包产到户后，粮食损失是自己的，看得严，不会出小偷；集体的粮食损失了没人心疼，容易出小偷。4，包产到户用不着干部派工，不要熬夜评工记分，更不会因评工记分而吵架。5，集体生产小队干部两头受气，上面领导批评，下面社员骂娘；包产到户以后省心多了。6，搞集体

生产没饭吃，一搞包产到户粮食就多起来了，就不会饿死人。“黄鳝没手没脚都会弄吃的，人还搞不到吃的？”“你把田荒起来不让我们搞单干，怎不饿死人？”其它地的包产到户的面积也很大。1961年8月，屏山县清流公社五一大队70．1%的土地、44%的耕牛分到了农户，这个县所属的地区包产到户的面积也很大，地委领导人牟海秀说：“第一次摸只有百分之几，第二次摸有百分之十几，现在摸的结果有百分之二十六的生产队，估计还不一定摸清”。

为了纠正包产到户，四川省委搞了一个“三包一奖”，想用此取代包产到户。所谓“三包一奖”就是“包产量，包工分，包投资，包奖励”，生产的粮食多，记工分就多，农民不能支配粮食。这实际是一种记工分的改进办法。包产的指标很高，损害农民的利益。这种办法取代不了包产到户，还没有全面推行就流产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那个年代，对包产到户来说，是没有“春风”的，但还是顽强地在地下生存着，发展着。这是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细胞，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有着深厚的基础，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显然，这股潜流的顽强生存是以不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为代价的。在一次又一次“反右倾倒退”的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是无法统计的。

九、反右倾加剧了饥荒

四川饥饿时间最长与这里不停顿地反右倾有关。

1959年8月17日，历时46天的庐山会议结束。全国开展了“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运动。李井泉对反右倾是很积极的，就在庐山会议之前，他也是坚决反右的。庐山会议之后，有了毛泽东的令箭，他的劲头更大了。

1959年8月30日上午，李井泉向四川省的干部传达了庐山会议。他在传达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粉碎”，“四个保卫”，即“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他重申了“三面红旗”的伟大意义，他说：

公社化运动是伟大的运动，是几亿农民、首先是贫苦农民搞起来的，大办钢铁是几千万劳动大军。这样巨大的群众运动在革命史上也是少

有的。中国革命有革命战争运动，有民主革命运动，如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运动，但这些运动的范围窄一些，时间也是分段的，而不像大办钢铁、公社化规模那么大，范围那么宽，时间那么集中。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本来巴黎公社是失败的）是革命的创举，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后方向。按照这一看法，中国的公社化、大办钢铁更不得了。公社化意味着大跃进，可以超过以往的速度，不仅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超过社会主义国家的速度。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按照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当是钦佩不已，赞扬不已，应当是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马克思都赞成了，难道我们这成功的经验就不应该赞成吗？

接着，他讲“一大二公”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说：

人民公社运动是如何来的呢？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能不采取的一种生产关系的变化。至于小社变大社，我们原来就有大社的，如张泗洲的社一千多户，现在一乡一社两千多户，这是大跃进以来必然要做的。大跃进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办起了食堂，这样一天可以多劳动一、两小时，可以腾出一部分劳动力。公共食堂办了，猪在社员家里就不好喂，就要入社，交食堂喂。猪入社了，自留地就不需要了。所谓一大二公就从此而来。……这些是为了生产发展而采取的措施，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不是凭主观愿望所采取的。至于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问题，这是合乎广大贫雇农、首先是30%劳动力少儿女多的贫雇农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这一部分贫苦农民是半无产阶级，全国有1.5亿，全省有2000万人。有这样的阶级基础才办起来的。既然符合多数农民的要求，首先是30%贫苦农民的要求，我们党就应当领导这个运动。……我党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后下心领导这个运动是正确的。不领导这个运动还要出乱子。不信，解散了试试看。今年解散了，明年还会办起来。

李井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十分信任的人。他的这些话可能反映了当时高层的认识。现在看来，这些看法有着很重的主观色彩。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认识是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李井泉这个报告透露了“三面红旗”以外的事情。李说：彭是高饶联盟的漏网分子。张闻天也给高饶联盟当过军师。彭也承认自己是高饶联盟的忠实成员。与其说是高饶联盟，不如说是高、饶、彭联盟。高岗在东北，彭德怀在朝鲜掌握志愿军，他们两人相互利用。彭德怀先后同人谈过党内有人反对党。说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要篡党，他们的后台是刘少奇同志。并说从主席到重庆谈判就开始了。这显然是诬蔑，为的是想达到推翻刘少奇同志的目的。高、彭、黄对刘少奇

同志是不满意的。彭德怀到处散布说刘少奇是篡党的后台，完全同高岗讲的有个圈圈是一样的。

几年以后的“文革”证明，李井泉讲不是空穴来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被弄成了一个“叛徒集团”捆在一起被打倒了。从这里可以隐约地看到，反高饶联盟、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这三次斗争之间，从人事上看，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毛泽东在这三次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周恩来在这三次斗争中都扮演了神秘的角色。

1959年9月7日，金牛坝地委书记会，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在会上的讲话，一再强调“坚决贯彻总路线，坚决继续搞大跃进，真正向着人民公社万岁这个方向来搞。”为此，要坚决整顿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他说，现在已经不是左的问题，右的方面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他解释毛主席分析1959年形势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说，右派分子把“问题不少”理解为刮“共产风”，认为我们没有纠正；实际上，“问题不少”是指右倾抬头，右倾活动，有猖狂进攻之势。现在的问题不是刮“共产风”，不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是右倾问题。李大章说，右派分子说反左比反右难，实际上反右要搞深搞透也不容易（李井泉插话：反右是阶级斗争，这个东西是阶级影响问题，不大容易啊！）。李大章在报告最后强调，现在我们主要搞反右，反右是立场问题，是阶级问题。

1959年的8月到9月，四川省委在成、渝两市召开整整一个月的省委扩大会（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第11次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第一阶段在成都开，第二阶段在重庆开。会议一开头搞了一个“政治测验”：到会的1300多名市、地、州干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不传达毛主席讲话的情况下，先阅读彭德怀的意见书，张闻天的发言和《李云仲意见书》，然后人人必须表态。一些政治上受到信任的领导干部被打了招呼，所以他们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一些警觉性较强的干部含糊其辞。对三个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正直而又未得到内部消息的人。大家表完态后，才放毛泽东讲话录音，传达中央决议。在会议中共揭发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严重右倾动摇的、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共61人（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动摇的共49人）。会上选择了8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重点批判。他们是：邓自力（泸州地委书记）、陈怀堂（泸州地委副书记）、张戟（省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陈星（重庆钢铁公司代总经理）、杜石生（重庆望江机械厂厂长）、高毅（宜宾造纸厂党委副书记）、夏戎（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张家义（成都军区11团政委）。

作为军区团政委的张家义是怎样成为省级的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

呢？这是他一次回乡探亲招来的横祸。第11次会上每位代表得到了一份由李井泉批示的参考文件："张家义的材料"上说："原11团少校政委张家义在七、八月份休假回家（江苏铜山），给军区干部部写回两封信，其中对当地农村工作发泄了极为不满的情绪。"这是两封什么样的信呢？

七月十九日张写给干部部王三科同志的信

王科长请转牛部长：

我十二号从成都动身，十七日到家，一路未出什么问题。到家后困难重重，没饭吃，有钱买不到，吃了几顿草子菜叶对我教育不少，也逼得我很难在家多住。

老百姓情绪很不好，对生产没信心，对领导抵触很大（说毛主席共产党好，下边干部不好）。除了一些生活较好，吃得饱饭外，余皆挨饿。现在正处于农忙，每日大人10两，小孩6两到半斤。绝大部分的人都饿得面黄肌瘦，骨枯如柴，走不动路。我们这个村七百人口，在五六两个月分（那时日食4两）因病无粮而死、饿死、上吊、投水自杀了三十余人。医生看病在处方上都是建议领导上给病号增加几两粮食，这样救活了十几个人。

我家人口较多，父母都在，弟兄六人，除已分居多年的二叔被饿死外，全家20余口均平安无事。我到家后都哭哭啼啼，尤其父母哭闹，要求把他们带到外边来。二老有钱，但是买不到东西，我一个月给的三、四十元钱花不掉，因此，曾几度想吊死。我如果不带走他们有饿死吊死的可能。这种情况使我在思想上很不平静，埋怨地方干部领导无法（这都是思想活动没说出）。

上述等等情况，使我想把我的父母及四弟（因我四弟太好，他一分粮不吃，给老人吃，使他饿得不像样子），带往成都过一段时间。因为寄的钱到家不起作用，买不到东西。

上述请求可否，请速来信告诉我。如果可以，请给迁户口的证明。不能去也告诉我，不会闹问题，这种困难不是我的家庭一家之事，可以想通。

我所说的上述情况，是真的，没有扩大之处。

我家乡的生产我了解了一下，使人可怕，能够做活的很少，20多条牛死的只剩一条小牛，土地荒芜面积很大，很危险。

此致

敬礼

张家义　7月19日

八月六日张写给干部部王三科的信

王科长同志请转牛部长同志：

部里来信，我于八月三日收到，四日离家返成都，原准备八月七、八日即可至成都，因路上买票困难，恐十五日左右才能回去。带父母问题遵照部里来信指示办,请勿念。

从来信中可以看得出，感到我对当前农村问题认识不足，甚至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这样及时的关心和提出的批评，使我非常感激。但是，我的家乡所存在的问题也应该认为是严重的，否则，这个极其严重的问题由我的思想不好来负责，那么真有些吃罪不起了。说实在的，上次去信的主要目的，是请求带我父母去成都，作为反映几个村庄甚至于一个乡的情况，的确太片面了。但是那些情况是有的，是存在的。如果和四川、陕西、河南等省政治情绪、生活、生产情况以及干劲和干群关系等作比较，我家乡比上述地区差远了。什么原因我一下子也说不出来。

我认为那个地区马上就会好转了，因为引起了上级的注意，现在又进行整社了，处分了不少干部，撤职停职的（乡以下干部）也不少。据说也有法办的。以此来大力发动群众（那里的群众非常落后）。

我到家后把我了解的情况，以对党负责的精神，向乡党委和县委某一干部作了汇报，他们都认为对整社有很大帮助，然后也参加了整社活动。动员群众积肥、生产，并亲身到地里作些有关生产活动，和耕作区的干部交谈整社、生产情况。由于参加一些活动对我教育很大，总的感觉是这样的：学习有关人民公社文件时，对于其优越性这方面领会较深，但由于客观问题（干部作风、生活不好、不能多劳多得、党的方针政策群众领会不深）的影响，公社中存在严重的困难（家乡那里，不是全国）和建设公社的复杂性了解不够，这次探亲解决了；关于紧缩开支、厉行节约比听几次报告还解决问题；党的政策不能被群众所掌握，以及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性；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在那里都需要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斗争的激烈，是过去未所预料到的，群众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根深蒂固等等问题的认识提高了不少。我认为这是我极其主要的方面，否则也不全面。事

情多，见面再说，不对请批评。

此致

敬礼

张家义　　八月六日于郑州市

从这两信中还可以看出，张家义是一个善良而真诚的人，他的组织观念还是很强的。然而，就是这两封信，使这位团政委成为四川省八个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一。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唐，但是合乎当时的政治斗争逻辑的。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第11次会议，除了揭露出来了61个各种“分子”、批判了8个重点人物之外，还通过了两个决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的决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泸州地区以邓自力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中共中央对《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次会议（扩大）情况的报告》十分重视。1959年10月13日批转全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59]807号），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在我们队伍里只是少数，但是他们不仅会在他们所主管的工作范围内妨碍总路线的执行，而且他们的思想在适合其发展的气候下，会像病菌一样向外扩张、传染。为了贯彻执行总路线，为了教育干部和群众，为了教育和改造有右倾错误的同志，都必须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一切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要像对待病菌那样，从一切角落里加以扫除。

这个按语中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比作“病菌”，而且一连用了三个“一切”，可见其态度的严厉和坚决，文件下达之后，全国的反右倾斗争升级。中共四川省委第11次会议之后，全省各级党委都召开了相应的会议，全省的反右倾斗争热烈展开。

在农民正在大量饿死的农村，是怎样反右倾的呢？早在9月2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中就作了安排。这个文件指出了农村右倾思想的表现：1，在农业生产上，他们把增产计划指标定得越来越低；2，在粮食问题上，他们少报产量，瞒产私分，有粮闹粮。既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

又要尽量扩大销售指标；3，在公共食堂上，他们不主张积极办好食堂，甚至下令解散食堂；4，利用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制造混乱，以达到他们解散食堂、瓦解公社、退回单干的目的。文件说，“上述这些右倾思想和行为，是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倾向，也是实现各项任务的主要障碍。”“这些右倾思想和行为，是有它的阶级基础的。实质上是党内一小部分不坚定分子在生产、粮食、食堂、抗灾等斗争中的动摇，是一部分出身富裕家庭和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深的分子，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不满的反映，并且有的就是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为了保证增产，节约粮食，战胜灾荒，必须系统地彻底地揭露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从9月起，在全省各地主要是在农村展开一次反对右倾思想的大辩论。”“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极少数右倾分子．．．．．”

从这里列出的右倾的几项表现中可以看出，文件制定者还是主张高指标、高征购，还是要保住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保住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而这些都提到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这些正是大饥荒的根源。他们不仅不改弦更张想办法缓解饥饿，实际上还在继续制造饥饿。

指导思想既定，就在农村开展大辩论、大批判。“通过这次辩论，使右倾分子更加孤立，使不坚定分子坚定起来，使右倾思想失掉市场”。我已经在本书其它处作过介绍，大辩论、大批判不是文字和口头游戏，而是拳脚相加、捆绑吊打，而是眼泪加鲜血。

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由县委农工部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一手操办，全面彻底，人人过关。把一些不爱开会的，开会迟到的，不爱劳动的，说秧子栽密了的，做活不合规格要求的，报产量低了的，说落后话的人都作为右倾分子来反，专门开管理区大会把这些干部和社员处以刑罚……其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别队等十多种。特别队就是劳改队，有的地方称劳训队，是公社、管理区建立的准监狱机构。管理区以上的干部一句话就可以将社员送去劳改。转业军人杨心田反右倾时给工作组的干部提了意见，就被毒打了两次。杨当时爬着回去，后害怕斗争逃跑。杨在外逃期间因没有吃的，患了严重的肿病。成都市公安局将杨作为流窜犯捉到送回来。工作组便派两人将杨从床上拉到大会，叫杨站到五个重叠起来的板凳上斗争，斗争后没几日就死在厕所边上。

据万县地委龙宝工作组9月20日报告，龙宝公社在反右倾中对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排队，在全社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234人当中，坚决拥护总路线的占42.3％，在个别问题上有右倾情绪的占44.9％，右倾思

想严重的占10.3%，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占2.5%。通过排队确立了“依靠谁、团结谁，批判教育谁”的阶级路线。辩论前对骨干队伍进行了组织和训练。因此，在辩论会上，右倾思想严重的人“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公社和食堂的优越性”。全公社受到批判的干部和社员100人。然后，进行组织整顿，“保证了贫雇农和促进派占领导优势”。

在反右倾斗争中，各地报上来挖出多少瞒产私分粮食的好消息。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59年12月18日向中央办公厅的报告：据万县统计，在公社扩大干部会议上，自动交待瞒产私分粮食达740多万斤。自贡市区双塘等8个公社自报出隐瞒粮食620多万斤，占总产量8%。巴县各人民公社在扩大干部会上批判的76人当中，彻底低头认罪的有71人，占93.2%。这个报告说，“大批判带来了大跃进”，巴县各人民公社扩大干部会议上，共收到保证书决心书2344份，竞赛挑战应战书1260份。会后生产上“一跃再跃”。邛崃县采取大兵团作战，改造冬水田40万亩。事后证明，这些数字有的是政治起哄，有的是虚假的。这些隐瞒的粮食是子虚乌有的，但由此增加了粮食征购的任务。

除了农村以外，工厂、学校也开展了批右倾斗争。1959年11月7日，在重庆潘家坪召开的市、地委书记会上，李井泉进一步扩大斗争面。他自问自答地说：“机关那些非党群众要不要搞？总而言之是要搞的。职工群众需不需要搞？新工人把农民的观点都带到工厂里来了，工人队伍中也不纯洁，也需要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进行改造。学校看来也要反右，但中央讲，不搞拔白旗，不搞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有些人实际就是右派，但不戴右派帽子，只批思想。”

为了把暗藏的右倾份子挖出来，主持运动者还千方百计动员大家“鸣放”，以“引蛇出洞”，把1957年对付“右派”的一套搬到党内来。温江专区各县反右倾运动的五级干部会议编发的大批简报，记录了这种坑人的手段是如何进行的。郫县报告，他们将运动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一、大鸣大放，畅所欲言；二、组织先进队伍，进行大会发言，肯定成绩，树立正面典型；三、大会重点批判，小会自觉检查，问题严重的右倾分子，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分；四、学习省、地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安排当前工作，定入库、生产计划，大抓晚秋作物。

需要指出的是，四川省反右倾不只是在1959年。从1958年到1962年的整个饥荒年代，是不断地批右倾的，不过没有1959年那么集中罢了。

在反右倾斗争中，四川省多少人挨了整？下面列举一些官方数字：

截至1959年11月20日，全省省、地、县三级机关干部共有197015人，在反右倾斗争的运动中，参加运动人数为127694人，共有9425人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973人，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有6452人。重点批判对象占干部总数的4.78%，占参加运动干部数的7.38%。这组数据不包括成都市非党干部数和泸州、凉山各县的数字。见表3-4。

表3-3 四川省在反右倾中重点批判对象人数

表3-4 四川省在反右倾中重点批判对象人数

（1959年12月22日　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制表）

	干部总数	参加运动干部数	重　点　批　判　对　象								
			三　类			四　类			三四类合并		
			人数	占干部总数（%）	占参加运动干部数（%）	人数	占干部总数（%）	占参加运动干部数（%）	人数	占干部总数（%）	占参加运动干部数（%）
合计	197015	127694	6452	3．27	5．05	2973	1．51	2．33	9425	4．78	7．38
省级机关	22287	22148	689	3．10	3．15	205	0．91	0．92	903	4．05	4．1
地专级机关	52938	27617	1371	2．61	4．96	550	1．05	1．99	1921	3．66	6．95
县级机关	121790	77929	4383	3．6	5．62	2218	1．82	2．85	6601	5．42	8．47

说明：1，本表数字是各地截至11月20日的统计，还不是最后的定案数字；2，地专机关干部总数中缺成都市的非党员干部数；3，县级机关中缺泸州、凉山各县数字；4，表中三类即“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四类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59年11月21日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数字与上表数中，省级机关的数字与上表一致，地、县两级数字略有差别：地专机关：共有干部51248人，其中，严重右倾的1332人，占干部总数

的2．59％；右倾机会主义分子524人，占干部总数的1．02％；两类合计1856人，占干部总数的3．62％。县级机关（缺两个专区县人数）：共有干部116840人，其中严重右倾的4076人，占干部总数的3．48％；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081人，占干部总数的1．78％，两类合计6157人，占干部总数的5．26％。

除了省、地、县三级机关以外，全省区级机关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905人（不完全），占区级干部总数的3.46％；公社党委书记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1030人（不完全），占干部总数的7.18％；厂矿企业党员干部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为1204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2.84％，非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999人；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党员干部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的人数为384人，占党员干部总数的3.99％，占参加运动党员干部总数的4.84％，非党员干部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162人。

公社以下干部受批判的人数没有全省的统计数字，但个案统计数字表明，受批判的比例比县以上大得多。1962年10月13日中央工作组情况简报写道：合川县1959、1960、1961年三年间，由于反右倾扩大到基层，整风整社、反瞒产私分等运动，共处理了干部5184人，占全县干部总数25283人的20.5％，其中公社以下干部17716人，处理了4699人，占26.5％。各级干部处理面是：公社级：党委书记占60％；党委副书记占35.7％；正副社长占36.7％；一般干部占28.6％。大队级：正副书记占57.2％；正副大队长占38.7％；一般干部占31.6％。生产队级：正副队长占24.8％，一般干部占11.8％。江北县兴隆区自1958年到1962年，全区大队一级的干部328人当中，受过大会批判斗争和各种处分的占40％；在454名生产队长中，受过大会批判斗争和各种处分的占51％。

以上数字是枯燥的，但每一个数字后面却是血淋淋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是无情的摧残折磨和成千上万的家破人亡。

1961年9月，四川省委又根据中共中央有关精神，对在1959年反右倾以来被错整的人给予“甄别”。对致死、致残、自杀的干部和社员，区别情况经济上给予轻微的补偿，政治上给予安抚。但对在运动中自杀的干部不予抚恤，被开除了党籍、团籍的，不再恢复党籍团籍，并应指出自杀行为是错误的。

四川省的反右倾并没有结束。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重庆市团委的干部在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时，联系四川省实际，谈到四川省饿死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认为，中央可能不知道。主持团市委工作的副书记

于克书提议向中央写一封信，反映四川省的情况，其他几位团市委副书记都同意。于克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署名写了一封匿名信，为了避免查出笔迹，找打字员用打字机打出来。

1962年6月，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于克书到北京出席会议。会上，他们向胡耀邦汇报了四川的情况。胡耀邦和他们二人的谈话被整成简报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于是，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书记约廖、于二人谈话。他们向杨尚昆作报三个半小时的汇报。杨尚昆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邓小平得知情况后主持会议，派人到四川调查。李井泉得知这些情况后，利用八届十中全会抓阶级斗争的机会施行报复。1962年4月23日 - 5月8日，重庆市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按照李井泉的旨意，揪出了“萧、李、廖”反党集团。萧是萧泽宽，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分管共青团工作；李是李止舟，时任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廖就是廖伯康。省委认定他们是四川省刮“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的代表。

十、四川饿死多少人？

在饥荒年代，四川造成了多大损失？我手头有一份四川省统计局1962年5月提供的统计表。详见表3-5。

表3-4 1955-1961年四川省粮食、生猪、耕牛和油料产量统计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粮食（亿斤） 404.6 445 465 492 368 323 260

生猪（万头） 1907.3 2000 2500 2600 2000 1200 1100

耕牛（万头） 492.6 509.7 515.5 525.3 556.3 516.1 496.5

油料（万担） 842.6 814.4 814.6 843.8 1000 500 400

据表3-5可以算出，1961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了44.1%，生猪少了56%，耕牛减少了5.7%，油料减少了51%。然而，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刘宗棠对我说，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损失，四川省统计局得看省委的脸色行事，提出的数字都是领导人能接受的。如油料下降不会少于70%，生猪按头算不能说明损失多大，因为剩下的猪只有骨头没有肉。

四川省计划委员会认为统计局的粮食产量数偏高，1962年7月，他们对1957－1961年四川省的粮食产量作了回顾性分析，分析结果是：1957年430亿斤；1958年470亿斤；1959年390亿斤；1960年323亿斤（他们认为此数还是偏高）；1961年260亿斤。按这个数字，1961年的产量也比1957年减少了40%。

四川是中国的养猪大省，其猪肉供应全国很多大城市。死猪比较集中的时间是1960年， 1960年10月份，内江只有猪52892头，比1959年减少了43.6%，比1960年6月份减少了37.2%。1960年1－10月，全县共死猪47298头，占1959年底猪只数的58.5%，相当于现有猪只数的89.4%。其中61.2%是瘦弱死亡，27.2%是疾病死亡。

新繁县河屯公社的人口，公社化时为10650人，1962年3月降为8500人；牛从400头降为343头；猪从4700头降为1684头；拌桶从1576个降为750个；晒席从5340张降为785张。大型农具共减少了70－80%。又如九大队四小队30户人家只剩下三个箕，两个烂箩筐一个装干肥用的口袋。新繁县位于成都平原，得都江堰之利，又离省会成都不远，其情况在全省不应当是最坏的。这个公社1959年水稻亩产457斤，1960年下降为380斤，1961年又下降为277斤。1961年收益分配的结果是，“倒找户”占68%，即68%的农户忍饥挨饿劳动一年，不仅得不到一分钱的报酬，还欠集体的钱！

当然，损失最大的是死人。各地死人的状况是非常悲惨的。

邛崃县道佐公社第三管理区1958年十一月建立公社时有840人，到1960年底出生19人，迁入11人，应有870人。大规模的死亡从1960年二、三月间开始。其时全管区五个食堂全部断粮，死人之惨烈，已到活人无力掩埋死人的地步。喂牛的老年人汪齐茂、汪杨氏夫妇死后摆在床上四五天，汪齐松命三个社员将尸体埋掉，三个社员将尸体拖出来扔到一个露天空粪坑里，直到烂成一堆白骨也未掩土。社员汪齐洪、廖文兰（女）等六人死后，尸体扔在离马路几丈远的土坡上，路上行人举目可见，被成群的老鸦啄食一尽。年底工作组统计，全管区死亡262人，外逃及不明生死的数十人，尚存516人，较公社化初期减少人口40%。

温江清平公社社员李方平饿得奄奄一息，县委检查团下来检查生活，管区干部怕他走漏风声，便把他关进保管室关了三天，生产队长报告说李已死，管区干部下令“死了把他埋了算球”。社员张绍春薅油菜饿倒在田头，队长以为他死了，赶快挖了个坑想把他埋了，埋到一半，张醒过来，大叫“活埋人了……”，吓得队长扔掉锄头就跑。

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温江地委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梁进学因实报所下放公社的粮食产量，在反右倾中受到批判，被下放到新繁的新民公社当社员。1960年3月，县上又要求他们一批下放干部到邻近的新都县马家公社“突击落后”。他后来在个人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次“突击落后”时，目睹的可怕一幕：

我先去二大队，我从马家中学后面出去一看，小春作物长得相当不好，特别是油菜，好些是“一柱香”，顶上只有几个小花苞。田里看不见人出工，只有几个女社员在淘苕菜。我走近问她们：“你们男社员哪里去了，怎么不见人做活路？”她们回答说：“男社员住居民点去了，只有我们几个女的还在做活路。”我心里一诧，问：“你们还修了居民点？在哪里？”他们用手一指，说：“在河边上，你们去看嘛！”我顺着他们指的方向，走了一里多路，到河边上一看，我的天啊！那是公社化以后规划的集体坟园，两片坟茔，几乎全是新的，大致有一百多座。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返回到这个大队的三生产队公共食堂，在食堂门外红苕窖里看到丢了一个死娃娃。我找到生产队长说：“把那个死娃娃找个地方埋了。”他找到几个社员把死娃拖到红苕窖里，下边还有个死了的老太婆。生产队长为难地对我说：“实在饿得没办法了，人死了都顾不得埋了。”

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刘宗棠，当年正在第一线采访农业。他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是1961年冬天。当时我重点跑川西。川西平原有一种肥料叫苕子（绿肥），平时也可以作猪饲料。那时有的农民饿极了就偷苕子充饥。一次我我在郫县采访，早晨起来地上满是白霜。我看到一块苕子田里有一个人爬在那里不动，走到跟前一看，他死了。嘴里啃了一嘴苕子叶子。他是爬在地上啃的。我和分社记者李世义到一个地方采访，看到一个老农民大骂共产党，我们很奇怪，一打听，原来是党支部书记的父亲。不是他，谁敢骂？人家追问他，他就说：我骂我儿子！

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在回忆中写道：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的情况。苗前明说：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在省委工作会议

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县委书记说他那里人口死了一半，有的村子死得一个都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子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埋人的人饿死了，只好再从其它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反映荥经县情况的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报中央，但我刚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涪陵专区丰都县，三年死于“肿病”的就有十万余人，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

荣县仅1960年，两次青黄不接的季节，就饿死了6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10%以上。这还不算1959年、1961年和1962年死人的数字。

根据1989年出版的《郫县志》，1958到1961年4年间，全县人口由28万降至23万，净减5万，如果考虑这几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大约在8万人左右。郫县报告说，全县劳动力比1958年减少近20%，其中有七个公社减少30%。友爱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上半年有855个劳动力，现有500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每个标准劳动力负担3.9亩土地，现负担13亩土地，即劳动力减少60%。

温江全区人口1957年为494万人，1961年为433万人，4年净减61万人。考虑这4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约为90万人。

根据温江地委工作组1961年的一份调查材料，毛泽东亲临视察过的红光社，1958年有4020人，在庆祝毛主席视察红光社3周年的日子里，还剩2750人，净减1245人，减少了三分之一。

四川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一书中，提供了各年度年末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数据。见表3-6。

表3-5 1955-1966年四川省人口数据（单位：万人，‰）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年末总人口 6790.6 6790.6 6945.2 7081 7077.9 6897.3 6459.2 6485.6 6695.8 6898.3 7136.8 7386.3

出生率 28.39 28.5 29.22 24.03 16.71 11.73 11.81 28.01 50.11 46.94 42.41 39.95

死亡率 9.18 10.41 12.07 25.17 46.91 53.97 29.42 14.62 12.82 13.87 11.46 10.76

自然增长率 19.21 18.09 17.15 -1.13 -30.26 -42.23 -17.6 13.39 37.28 33.07 30.95 29.2

资料来源：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根据表3-5中的数据，采用本书“大饥荒　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中提供的办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用年度平均人口数，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计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时，取前3年（1955 - 1957）和后3年（1963，1965，1966）的算术平均数。正常死亡率为11.12‰；正常出生率为35.90‰。

计算结果如表3-7。

表3-6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万人）

年份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合计

非正常死亡人数 98.53 253.37 299.42 123.04 22.65 797.01

少出生人数 86.96 139.61 172.59 165.53 54.5 619.19

资料来源：据表3-6计算。

计算结果表明，在大饥荒期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800万人，少出生人口600万人。《中国人口》这套书中的数据也是官方提供的，与实际情况有差距。因此，上面计算的结果也比实际发生的要少。

事实上，今天不可能得到完全可靠的饿死人的数字。这是因为，在大饥荒期间，中共四川省委就“加强了人口统计工作”。1960年初，四川省委下达了一个“关于加强户口管理人口统计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思想基础上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以金堂县为例，开始，金堂县委根据各公社上报的数字统计，出现了出生少死亡多的“反常现象”，受到地委批评，要求按照省委“只有生得多、死得少，没有生得少、死得多”的精神重新统计。金堂县委召集各区、社干部开会，传达省委精神，反复强调“人口统计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批评死亡数字大的区社是“对人口统计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社队干部知道，弄不好要戴右倾帽子，赶紧重新“调查”。土桥区六个公社原报出生人口1800多，死亡3800多，重新“调查”后，死亡数大大减少。有的公社的统计报表一而再、再而三被打回，先后“复查”十一次，直至“生得多，死得少”才算完事。

刘宗棠说，文化大革命中传出来的数字是饿死800万。廖伯康在他的书稿中说饿死1250万人，东夫的书稿中说是饿死了1000万人以上，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说“有的县饿死人将近总人数的20%，不少县都在10%以上”。1962年7月受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的《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萧风写的《四川情况》中，写道：“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如果按萧风说的净减少1200万人，则饿死人则在1200万这个数字之上。人口减少的数字中包括外流人口（估计大约500万），但这几年还出生了人口（初步估算，1958－1962年出生人口不下500万人）。出生人口数和外流人口数可以相抵。曹树基先生在他的《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书中认为，从1959－1961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亿口为940．2万人。如果加上1958年底和1962年的数，非正常死亡应在1000万以上。我认为，四川省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人1000万到1200万之间，少出生人口在400万到800万之间。

第四章　安徽不安

20世纪90年代，我利用几次去安徽采访和开会，收集了一些安徽大饥荒年代的资料。2001年5月，我借在合肥讲学的机会，又花了七八天时间，专程到合肥、蚌埠、凤阳进一步查阅资料。从凤阳回来后，又得到了无为、亳州等地的资料，再加上对原中监委李坚老人的几次访谈，安徽情况就很清楚了。在这一章我先介绍几个县的情况，然后再介绍全省的情况。

一、说凤阳，道凤阳

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凤阳花鼓”反映安徽农民逃荒要饭的情况：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腰鼓走四方。

自从出了“毛皇帝”，风调雨顺也饥荒。大饥荒年代，凤阳农民连“身背腰鼓走四方”逃荒的自由也没有。

凤阳，位于安徽省东北部，地处淮河中游南岸。这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在明朝开国功臣的91人当中，凤阳籍的就有41个。这里至今还留下朱元璋修建的中都皇城、皇陵和朱元璋少年当和尚的龙兴寺等古迹。站在中都皇城南门的残垣上北望，想到这块古老土地上的黎民百姓的累累苦难，使我感慨万端。

在800多页、120多万字的《凤阳县志》中，留下了凤阳历史上很多光辉的篇章，而对1959－1961年那场空前劫难只含糊地记下以下文

字：

1960年2月15日　全县采集代食品906.8798万斤，其中有薯根、鸡爪菜、茅草根、掐不齐等。

1960年2月15日　据统计，1959年和1960年，全县农村外流人口11196人，占农村原有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0.7%，有孤老1580人，孤儿2280人。1960年粮食产量9507万斤，比1957年的22760万斤减少了13253万斤。

1961年8月4日，中共凤阳县委学习贯彻中央《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的精神，在部、委、科、局负责人会议上，总结了凤阳两年来刮“五风”的失误和教训：1，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卖了过头粮。2，封锁消息，掩盖死人真相。3，是非不分，反右倾中错斗争了一些好人。4，界限不清，共产风一刮再刮。5，占用农村劳动力过多，削弱了农业战线。6，乱出主张，生产瞎指挥。7，任务要求过高、过急，劳逸失当。

这本县志是1999年出版的，离大饥荒年代已经40年，还是极力淡化那场大饥荒的情景，后人很难从中了解当年的历史悲剧。作为县志，不敢记录这个县发生的空前悲剧，本身就是悲剧。

1、凤阳的大跃进

在凤阳，大跃进实际是大灾难。对这场大灾难，历史资料中都有记载。

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7年凤阳是个丰收年。实收产量为20624万斤。在一般情况下，1958年粮食计划定为2亿斤是比较合适的。县委却上报了8亿斤的指标。1958年实收为1．5000亿斤（《凤阳县志》数为1．64086亿斤），但县委估产为4亿斤。1959年，实际产量只有1．8亿斤左右（《凤阳县志》数1．06918亿斤），但又上报为4．0500亿斤。本来是连年减产，却上报连年增产。

表4-1 凤阳县1957 −1963年粮食产量

产量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单产(公斤)	58	38	30	28	42	43	50
总产（吨）	113801	82043	53459	47534	65701	66449	62345

资料来源：《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178页。

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是高征购。1958年产粮82043吨，即1．64086亿斤，国家征购了7102万斤，即拿走了43．28%。由于留下的粮要扣除工业用粮、非农业人口供应粮、种子和饲料，剩下才是农民的口粮，所以，通常国家拿走了30%就显得紧张。现在拿走40%以上就更紧张了1959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仅1．06918亿斤，却征购了5974万斤，国家拿走了54．49%。板桥乡淮东社1959年1月份调查，全社240户、1172人，缺粮断炊的有184户、892人。大溪河乡断炊的很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凤阳县委书记处书记赵玉书说："1959年冬到1960年春，据不完全统计，外流人口10529人，肿病达3万人，非正常死亡现象普遍布严重。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原有利于163人，非正常死亡率558人，占30%；刘府公社双山大队官帝村原有577人，死亡104人，占18%；太山大队曹端村原有435人，死亡38人，占8．7%。"

在农民吃不上饭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高征购任务，只能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进行横征暴敛。1959年冬到1960年春，县、公社、大队层层开会逼交征购粮食任务。县委要求各公社一天三报：早上报粮食入库计划，中午报粮食入库情况，夜里报入库实绩数字。每天晚上对入库多的社队进行表扬，对入库少的社队严厉批评。一级一级地向下施加压力，压力一级一级地放大。1960年春节期间，板桥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江山大队党总支书记邓某，在县委的压力下，在安子集召开80多名干部的征购会议，要求各生产队交出粮食。谁说没有粮食就打谁。张信成、狄为朝等10人被打。会后，这些干部就分头到农民家中搜粮食。1960年午季（即收小麦的季节），小溪河公社党委布置统一行动，搜查粮食，被搜查的有8046户，占总户数的73.4%。长塘大队只有一家没有被搜查。山河大队组织一个17人的"挖粮潜力专业队"，人手一棍，到各家东捣西戳，翻箱倒柜，发现社员王坤锅里有烙饼，便一涌而上，开锅吃光。

"共产风"一刮再刮，刮地三尺。"共产风"开始是1958年秋飚起来的，引起了混乱，1958年秋、冬，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想刹住"共产风"，但怎么刹也刹不往。这股风从上面层层往下飚，一级大一级，一阵紧一阵。到1960年春天又形成第二次高潮。在1961年初的五级干部会上，县委书记赵玉书检查说："上级虽然下令刹共产风，但没有刹住，原因在县委的指导思想特别是我的指导思想上。我们总是想快点向高一级的所有制过渡，我们曾计划把全县14个公社分三批向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过渡。我们总是希望社有经济发展快一些，供给制尽可能早一些，公共积累尽可能多一些。"公社为了发展社有

经济（当时认为公社所有制比生产队所有制更接近共产主义），大量集中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大队也以“个人服从集体”、“小集体服从大集体”的名义，把生产小队和社员的财产集中起来。山河大队实行“五集中”：猪集中，把小队和社员的猪集中起来办“万头养猪场”；鸡集中，规定每户或每个劳动力交2只鸡，兴办“万鸡山”，并规定每户只准养鸡3只；鸭子集中，大队在一个早晨趁人不备，统一行动，把鸭子集中到大队集中饲养；厕所集中，扒掉社员的私人小厕所，一个庄建一个大厕所；山芋种子集中，把社员已经育好的山芋种子集中起来。这些集中起来的猪、家禽大部分死掉，集中起来的山芋种子也烂了。山药、毛芋、生姜是凤阳小溪河地区的经济价值高、产量大的特产，过去是家庭种植。干部认为这种生产方式不符合共产主义原则，不让社员种植，出了苗也拔掉。有的地方提出“三年见苗要犯法”的说法。

为了尽早地进入共产主义，自1958年以来，搞了很多“大办”，如：大办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土铁路，大办文教卫生事业，大办土化肥等等。这些大办所需要的资金、物资、劳动力都是通过“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的办法，剥夺生产队、剥夺农民而得到的。

“共产风”颳的范围很广，从社队集体的土地、劳动力、畜力、农具、资金、粮食、以及社员家庭的生活用品，如家禽、家畜、房屋、树木、家具等。扒社员的房屋，捉社员的家禽，砍社员的树木，收社员自留地和自留地里的庄稼。有的地方把社员自留地里的南瓜苗拔出来栽到集体的地里，结果全部死光。强占房屋，逼人搬家，不搬就强行把东西扔到外面。强行收走各家做饭的锅，甚至当着社员的面把锅砸烂了，老人要求留下一口锅烧水也不行。大通桥大队为了办农场，乘社员下地生产之机，将大通桥东头一个小庄子社员家的东西全部抛了出来，房屋由大队占领。社员无家可归，痛哭流涕。

为了给“共产风”造声势，到处树牌坊，扎“跃进门”，在屋顶上、田埂上、山头上，路边上，到处都写上大标语，形成了一个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的热烈气氛。

公社以建设共产主义新村的名义，强行拆掉社员的房子。小溪河公社由于拆房并庄，有7个大队的25个村庄无人居住。石马大队大郢生产队将5个村庄并成1个，男、女、老、少分四处居住。乔山大队31个村庄，1960年6月，总支书记梅某强迫群众在半天之内并成6个庄子，拆掉房子300多间，党员不干开除党籍，团员不干开除团籍，社员不干不给饭吃。说是建新村，实际上旧房子拆了新房子没有建，社员无家可归，100多人被迫集中居住，有14户40人住在3间通连的房子里，晚上大门上锁，民兵持棍把门，尿尿拉屎都在一起。

1958年底全县共有房子224143间，两年来共拆掉、倒塌39555间(其中倒塌25266间，拆掉13400间)，占17.7%。全县有29个村庄的房屋拆光、倒光。在小庄并大庄时，社员像躲避日本鬼子一样，造成田地荒芜，草苗丛生，群众流离失所，大伯子和弟媳妇同住一室，连撒尿都听得到。有的妇女只要一提并庄子的事就哭。

荒唐的瞎指挥。在生产上追求形式，不求实效。要求红旗插满田间，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一边喊口号。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把大部分人力、畜力、肥料，都调到公路铁路两旁，调到社与社、县与县的交界处，做出样子，而里面却是大片土地抛荒。全县只有耕地141.2万亩，1960年春夏种上报播种面积184.8万亩，超过了耕地总面积40多万亩。

农民一早起来不知道当天要干什么，连生产队长也不知道当天要干什么。生产指挥权和调度权高度集中，由公社甚至县里统一指挥，公社或县领导人像战争年代指挥淮海战役一样，组织“大兵团作战”。小溪河公社13个大队，1960年春季以来，参加大兵团作战的有86个小队、284个小组、3395个劳力。从“开秧门”起连续40天，有的持续达3个月之久。有的大队，犁田搞大兵团作战，收麦子搞大兵团作战，栽秧搞大兵团作战，甚至连铲草皮也都搞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打破了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生产小组的界限，取消了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劳动定额和生产责任制。新华大队900个劳力，参加“大呼隆”劳动的就有700人。有一天，代圩生产队干部带领100多个社员，抬着2000多把秧，到大韩家庄插秧，因地未整好，就又抬到刘园，刘园也毫无准备，又抬到前庙。到了前庙，天色已黑，无法栽秧。一天行程12里，空跑4个庄，棵苗未栽，秧苗全部死光。劳力大量乱调，东调西，西调东，乱成一团。

在凤阳，瞎指挥到了荒唐的地步。违背农时，不按节令种植，有些地方出现了春节种玉米、清明栽水稻、三月种麦子、立秋栽烟叶的离奇事情。这是因为，虽然农时错过了，但上级下达的种植计划还没有撤消，虽然违了农时，但计划还是完成了，向上级也好交待了。为了完成县委定的70万亩水稻的任务，有些地方把没有水源的旱地也改成了水田，甚至犁掉已经长得不错的旱粮栽水稻。门台公社宏光大队本来不适合种水稻，上级强令“旱改水”。1958年旱改水1600亩，平均亩产50多斤；1959年旱改水850亩，平均亩产31斤；1960年旱改水900亩，平均亩产只有2－3斤。为了种水稻，本地无水下秧，派了48个人、25条耕牛运了3万斤稻种到60里外的总铺公社去泡种育秧，干了29天，连种子也丢了。第4生产队有500亩黄豆，已有半尺高，大队硬叫犁掉改种山芋，社员不愿意，还是犁掉了480亩。结果每亩只收

300斤山芋，而剩下的20亩黄豆每亩产200多斤。还是门台公社宏光大队，1960年春，麦子一版金黄，正当收割之际，却被调出500多个劳动力去黄湾支援。行程两天，到那里安了一天家，找工具一天，口粮没运到饿着睡了一天，回来又走了两天，花了8天时间，只干了半天活。结果，自己的麦子遇上了雨，损失很大。

这样荒唐的事还有很多：小溪河公社乔山大队8亩大麦已经盘根，干部硬叫犁掉，种豌豆，每亩下种200斤，一粒未收。这个大队的涧西生产队，春天撒播花生80亩，用种1200斤，秋天只收三斤半。新田大队秦塘小队1960年3月种麦子7亩，采取拔苗助长的办法，每亩施化肥100斤，不仅烧死麦子，连草也不生。光明大队的驻点干部，竟布置下雨天割麦 ，晴天栽秧。长塘大队为了扩大面积，竟把3万多斤稻种撒在花园湖一尺多深的水里，还强迫社员在水田栽烟250亩，片叶未收。万保大队张庄生产队干部，大雨刚过，就叫社员在满田是水的稻田里栽烟32亩；石马大队在水里播黄豆120亩，颗粒无收。李武大队社员钟万祥每亩下麦种25斤，大队却说下种少了，叫犁掉重种。新华大队把全部土地划成三个作业区，规定作业区的其他作物一律废除，仅1960年一次就犁掉已种上的庄稼近千亩。小溪河大队街西小队，田里麦子未运完，劳力就被调去抗旱栽烟叶，结果因苗小天旱，栽的全部死光，地里的麦子也损失7000多斤。

县委要求密植，密到不合理的程度。提出“四个不种”：不“条播”不种，下不足多少种子不种，不施多少肥不种，不“畦田化”不种。在农业上还要搞很多“化”，如车水风力化，运输车子化，车子轴承化。结果一化不化，劳民伤财。

刘府公社下令一律批旱秧，不能打水秧。刘府大队生产队长汪贵珍因地制宜打了一亩半旱秧，公社王书记知道了，开会斗争汪贵珍。汪辩解说：“我电因地制宜，为了多打粮食。”王书记说：“听党的话，就应该打水秧，一粒不收也是好干部；不听党的话，打多少粮食也是坏干部。”结果撤了汪的职。

由于全县统一指挥，不断地有“中心任务”。每一个中心任务来了以后，就要动员社员不分昼夜“突击苦战”，在工地“安营扎寨”。要求社员“雨天当晴天，黑夜当白天”、“大雨小干，小雨中干，不雨大干”，不少妇女因饥饿和劳累过度，患了闭经、子宫下垂等疾病。长期饥饿和过度劳累，造成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大量抽调农业劳动力，削弱了农业生产。凤阳从1959年11月10日到1960年5月8日，全县农村劳动力投入水利建设的每天就有3万到5万人，最高时达7万人，占当时劳动力总数的63%。此外，还常年修土

铁路的劳动力3700多人，修公路的2000多人。县委计划1959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2亿元，比1958年增长14倍，工业职工从1957年的924人增加到1961年的8724人。还抽调了25000多农民搞工业。秋种没结束就动员农民上工地，第二年春耕大生产已经开始，还不让农民回来。留下来搞农业的全是妇女和小孩。

大办钢铁运动最高峰时，共有63000多人赴钢铁前线。县委的总结报告说：全县“建成平炉3000余座，1立方米高炉875座，1.5立方米高炉163座，6.5立方米洋高炉2座，冲天炉18座，红炉129座，炼钢炉3290座之多。现在临淮、门台两地的钢铁基地已初具规模。”

2、三年饿死九万人

凤阳，一个不到40万人的县，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9万人，饿死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根据新修《凤阳县志》，1961年全县人口比1957年净减少了89113人，减少的人数相当于1957年总人口的23.41%。全县人口直到10年以后的1967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即全县人口为38万人。如果按1952年到1957年人口平均增长率2.44%计算，1961后全县应有人口419315人，照这样计算，1961年比应有的人口少了127353人，这个数字包括非正常死亡和应当出生却没有出生的人口。如果考虑外流人口，死亡人数会小一些。

以上说的是全县总人口，若单看农村人口，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凤阳县志》同一资料，1961年农村人口比1957年减少了89125人，相当于1957年总人口的26.56%，即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67年，即10年以后，人口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如果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因素，人口减少远远高出26.56%。在这期间有人口外流逃荒，但同时又接收了蚌埠等城市下放的城市人口。外流和城市下放人口相抵，净外流人口一万多人。

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80年代初考察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的公社每三个人就有一个饿死。按郭书田四分之一的估计，以1957年380711为基数，则饿死95178人。这和陈振亚说的1959 - 1960年两年饿死60245人大体相符。新华社记者张万舒写道：“1960年虽然风调雨顺，一派好年景，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三县1961年的统计，共少了四十多万人。”凤阳沁岗村，“全村34户，175口人，逃的逃，死的死，剩下了10户，39人。”

据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1961年2月1

日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 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饿死14285人 ，占26.6%，这个公社半井大队原有4100人，饿去1627人，占39.7%，大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人，死亡48人，占68．6%。全县死绝8404户，占总户数的3．4%。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20户，死绝4户。小溪河公社饿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饿死 1139人，占24.2%。大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人，饿死48人，占68.6%。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占总户数 的3.4%。饿死和外跑而空无一人的村庄27个。小溪河公社曾有21个村庄饿死和外跑而空无一人。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宜乐家34口人，死去30人。小溪河公社长塘大队赵庄子张玉璞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孤老与孤儿。

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现在很难了解当年死人的具体情况，只能从档案中了解过去。1961年1月，凤阳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目的是纠正“五风”，会上发动参加者“大鸣大放”，揭露问题。会议由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主持，开得严肃紧张，会上发言的有90%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泪。现摘录1961年1月《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如下：

总铺公社鹿塘大队张洼小队社员代表王庭华质问副县长宋兆银说：“58年你带我们去官沟水库去挖干渠，饭都不给吃，还叫五天五夜不睡觉，哪个能吃得消？去年，我们村饿死了一二百人，县长你知道吗？”

总铺公社国光大队社员代表说：“县委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死了人不敢反映，我们庄300多人就死了87个，说起来真痛心哪！”

殷涧公社凤阳山大队占家小队支部书记武善兰说：“60年春天，县委给群众吃的山芋干，由于已经变质，苦味难闻，群众说是吃汤药。结果加剧了浮肿病，4月份仅10天时间就死了27人。”

武店公社党委书记万德元说：“59年在武店开烤烟现场会，县委明知道没有这么多烟叶，硬说有。县委书记处书记董安春让一个驮子的烟分三个驴了驮，显得烟卖得多。他还布置，对饿得脸色不好的社员要看紧，不让他们上街，免得让外面知道。饿死的人要埋3尺，上面还要种上庄稼。”

武店公社山王大队代表李金明说：“1959年我们收35000斤粮食，叫

征购58000斤，结果我们交33000斤，社员只吃2000斤。真的没有粮食了，群众吃麻叶子，什么都吃光了，我向董安春汇报：我们没有吃的了。他说我带头闹粮，要开除我的党籍。结果我们280人，死后还剩170 人。我家5口人，死掉4个，就剩下我自己，你叫哪个不痛心!”

武店公社全心大队代表说：“1959年秋，一点吃的也没有，天天死人，他(董安春)到我们那检查工作，还向干部说：目前是大好形势。我们队原有2500多人，现在只剩1300多人，死那么多，我们向董安春汇报，他还说我们玩花样。我们带他去看死人 ，他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

曹店公社和平大队社员代表王夕周说；“这两年尽说鬼话，以上压下。58年谁讲真话就揪谁。这两年死了这么多人，就是以小报大的结果。报的都是千斤田、万斤田，这飏的是鬼头风，飏一年人都死光蛋了。我们那里北山下有一户叫曹玉乐的，一家34口人，就死了30人，只剩下4人。曹泽祥死了没人埋，耳朵被老鼠吃掉了。”

黄湾公社荷花大队生产组长杨大松说：“59年我们队实际只有2000斤粮食，大队干部周友香硬叫我们报10000斤，我说没有这么多，就说我思想右倾，批我两天。结果，我们庄子原来582人，死了80多人。”张湾小队支部书记崔厚军补充说：“大队书记周友香不准白天埋死人，说影响不好。有一次，黄德良替人家抬了一个死人，就批斗他两天。”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总支书记王焕业说：“60年春天，工作组钱轩家里死了11口人。开始死人时家里来人送信，他摇摇手，不让讲，带几个钱回去处理就算了。最后只剩3个人，实在没办法了，就请示领导把3个孩子户口粮油关系迁到机关来。请示再请示，到批准时，3个孩了也饿死了。他因此精神失常。”

板桥工作组张玉朴说：“张牙庄原来42个劳动力，现在很少了。我母亲死了，老百姓吃代食品屙不出屎，屎带血，用草棍捅。我回单位向检察长反映，说我反三大万岁，诬蔑人民公社，斗我三天，写了6份检查。要不是徐部长，就把我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1960年春天，我家5口人都死了，我就带出一个小孩来。死了哪敢讲，就说病死了算了，只好睁眼倒瞎霉。”

被毛主席表扬过的合作化带头人陈学梦在会上发言说：“今年(1960)春天，生活困难，顿顿饭都不离草。王家湖有37户人家，大人大部分都死光了，现在每户只有一个少老子无娘的孤儿。小孩子们看到我说：老主任，我们家大人都见不到你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看看你，多

痛心，多凄惨哪!”

考城大队代表王家凤说：“我家20口人，去年（1960）死掉10口。我的4岁的小孩有一天对他娘说：‘把我送走吧，再过几天我就要饿死了!’”

府城公社红旗大队生产组长陈守先说：“60年春天，光蔡庄一个地方就死80多人。当地干部还组织一个送病专业队，专门抬人。”武店公社今天在会上发言13人，就有4个伤心痛哭。考城大队社员代表王家来说：“我们大队原有5000人，现在只3200人。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有死这么多人。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呢，今年我们往哪里都跑不掉，到处有劝阻站，就算跑出去了，没有粮票，到哪里也没饭吃，只能活活在家受死了。我家6口人，死掉4口，还有两口人。我是最后一个喂牛的，快要接上夏收，才没有死，12个喂牛的人都死了。”讲着，讲着，就哭起来了。

武店公社光明大队姚营生产队社员代表姚继山说：“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好，就是凤阳县委不好。58年秋种每亩地下种四五十斤，甚至几百斤，结果搞的不能收。59年没有粮食硬叫报，没有办法就报空。说这里有几千斤，那里还有几千斤。报过不算还要兑现，朝屌上兑！我们光明原有1630多人，死了800多人。姚正会家饿急了扒死小孩吃。人心都是肉做的，眼泪往肚里流。这都是县委一手造成的，破坏党和毛主席的名誉。”

殷涧公社社员代表发言指出他那里饥荒的严重情况，殷山生产队，原来有217人，一冬春就死了95人，小殷家一个庄子39人就死了22人，夏黄小组原来70多人，死了48人。

曹店公社中心大队上宋小队耿沈小组社员代表耿＊说：“今春上（指1960年）上宋小组劳动力死得太多了，没有人埋，从我们耿沈抽人去埋。我们埋了半天只埋5人。这么惨的事由谁负责呀？我看主要是县委。”　府城公社社员代表洪冠群说：“金传之因偷几只山羊，队长葛＊＊不给饭吃，全家四口人被活活饿死。”杨学群（小队书记）说：“马玉新生病还叫犁田，跟不上犁说是装病，结果被绑打，扣饭致死。她死在家里没人知道，小孩还趴在身上吃奶，三天没吃着也饿死了。”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社员代表宫学仁说；“我们宫李家80户不到，就死掉59人，牛、驴死光了，房屋倒塌50多间，全队1400多亩田，去年就荒掉1000亩。干部还像活阎王一样，排着队打社员，哪有百姓过的日子！” 山河大队1958年有5536人，现在只有2970人，其中死亡

1558人，占总人口的28.1％；劳力下降1375个，占整半劳力的48.8％。

武店公社凤龙大队生产组长唐秀棋说：“60年我们那里死人很多，小唐家死了一半，门西、武庄两地，一家一家全死光了。现在我们那里犁田的都是小孩。”

与会代表还揭露了大量惨无人道的事实。大溪河大队郑山生产队社员常介翠的母亲有病（饿病），找生产组长花某要点面给母亲吃，花说：“还给她饭吃？都快要死了。还不如趁犁田人中午没回来给她埋了算了。”常不同意，花说：“你不同意就死在家里，埋在家里。”常没办法，只好把没断气的母亲埋掉。

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更恶劣的是黄湾公社张湾小队规定死了人不仅不准戴白布，还叫人披红！

由于死人太多，留下了大量的孤儿。据不完全统计，1961年底全县孤儿2389人，其中男1493人，女906人。以年龄分：1-3岁48人，4-6岁296人，7-9岁798人，10-15岁124人。孤儿已收容247人，未收容1964人。孤老1527人，其中男658人，女869人。按年龄分：60 -65岁910人，66 - 70岁359人，70岁以上258人。孤老已收容258人，未收容1269人。1962年全县有孤儿3304人。其中:公社收养702人，大队收养704人，群众代养908人，单独生活990人。有在大人死了，小孩子没有死，睡在死人怀里一两天。

从1959件到1960年，全县发现了不少人吃人的事件，有记载的就有63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8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

武店、曹店等地反映人吃人的事件多起。＊＊棋说：“有一天晚上我开会回来，看到唐永丁家劈人骨头，放在锅里煮，吃人肉，唐永丁自己端一瓢在门口吃，他说，我已经吃掉几个了。现在庄上的孩子都喊唐永丁是毛猴子。”

1961年8月9日晚，拖拉机站王站长在科局长整风会议上的发言说：“1959年我在板桥公社浙塘大队整社，汇报人死问题时不敢说是因缺粮，就说是因卫生工作没搞好。一个妇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县长)汇报后，季派工作队夜里把这个妇前女捆起来送到公安局，说她破坏社会主义。．．．．．从板桥回来看到一个坟堆上有六七具

尸体。”

考城大队王家凤说：“西泉发现人吃人了，张正九汇报给董安春，他不让汇报，还叫查，说，吃人的人是坏人。”

对人吃人的现象，县委书记赵玉书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还怕暴露真相，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63人，关死33人。

不过，中国农村有一种传统，认为人肉是不能吃的。有人说吃了人肉的人活不长，也有人说吃了人肉会生病。所以，吃人还是个别现象，多数人宁可饿死也不吃人肉。即使是个别现象，由于中国人口多，从总的数字上看，吃人的情况也是很多的。

农民明明是饿死了，还不能说是因饥饿而死的。县委领导人赵玉书和董安春到武店公社考城大队检查浮肿病情况，问医师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总是治不好，少什么药？”王医生回答说：“少一味粮食！”赵、董二人立即决定，将王医生交大会批斗后逮捕。

农民大量死亡，而各级干部却向上级向外面封锁消息，隐瞒情况。1960年端阳节，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张少柏在临准化名“石求明”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我打跑了个人得失念头，确立以党和人民得失为重，才下决心反映去冬今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的4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是极其惊人的。一个死亡5％，一个死亡率1％强，一个占15％，一个占20％多。．．．．．在死人最严重的时候，有的村子一天死亡5－6人。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跑的跑，死的死。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已死了的有100名左右。”结果，张少柏一度受到迫害。

1960年春天，蚌埠市副市长马骞听到家乡（小溪河公社新四大队）人口大量外流和死亡，即从蚌埠市支援豆渣1万斤，运到临淮关，通知家乡来运。结果遭到总支副书记杨云春、副县长缪坚的拒绝，阻止群众起运。而且缪坚还去信给地委检举了马骞，说马“思想右倾，有问题!”

1961年凤阳县委书记马维民在总结两年经验教训的三级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对死人的情况，我们大家基本是了解的，开始个别死人的时候，认为是个别情况，对上不讲，自己想办法解决了就算了。以后死的人多了，问题搞大了，就惊慌失措起来，对上更不敢讲了。死人明明是饿死的，而说成是年老死的，疾病死的，把非正常死亡说成是

正常死亡。有些地方还不允许死者家属哭丧带孝，不准埋坟，对反映死人情况的来信加以扣压，甚至对来信者进行打击；有的干部因为如实向组织反映了死人的情况还挨了斗争。”“因为怕犯错误，怕受处分，怕摘掉乌纱帽，而不敢暴露真实情况；越不敢暴露，问题就发展越大；问题越大，就越不敢暴露。”

3、饿死农民，撑死干部

在1961年初的五级干部会上，与会者揭露，一方面社员大量饿死，一方面干部生活特殊化。1960年春弃婴很多，县委书记赵玉书责令下边不准收拾，如果收拾，谁收谁养。相反，赵家不见了一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期3天破案。群众说：赵家一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县委书记杨某，1960年春天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他在总铺公社带着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相，借以取乐。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干部们却请客成风，大吃大喝。有一次，县委开会，有部分委员当场吃醉，开会胡说八道，会议无法进行。副县长兼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缪某，下去检查工作带酒带肉带厨师。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某，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口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县委工作组林兴甫说：“县委江一舟主任不但吃细粮，还不定量。不在食堂吃饭，用油炸锅巴吃。赵政委一家不吃粗粮。”赵政委就是县委书记赵某。武店工作组杨义全说：“县委生活特殊，东西都被他们吃了，吃细粮。这叫什么‘四同’？群众有肿病，买不到糖，商业局送给县委每人一包。病人为什么吃不上糖？都给他们吃了！”强华说：“武店现场会浪费很大。公共食堂没有饭吃，赵楼两天饿死13人，现场会还大吃大喝。炸油条，炸糖糕，水饺子，馒头，早晨12个菜，中午24个菜。喝的是金字酒。双营子庄上的浮肿病人，被锁在家里，怕外人看见。”总铺工作组贵（档案字迹不清）说：“59年冬60年春，在群众肿病死亡的时候，县委大请客，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吃鱼吃肉，水库经常送鱼来，都分给几个书记、常委，从来没有一个人给钱。招待所随便吃，县委每个月都吃几百斤粮食，这些粮食救济一个生产队，要少饿死多少人？”

当时凤阳社员中流传一句话：“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管理员。”“一两”、“一钱”指的是县里给社员的粮食定量。既然小队长和管理员饿不死，更大的官大吃大喝也就见怪不怪了。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从大队书记到小组干部和炊事员，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后来整社时初步统计，仅几个大队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1960年5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副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缪某到山河大队检查工作，对食堂断炊、群众死亡

不闻不问，竟与梅某等人在大赵小学吃肉喝酒。社员盛长英的弟弟看到了，支部书记端了一碗饭给他。缪竟把饭夺了下来，批评支部书记说："你们是怎样教育社员的？"公社开了一个小吃部，专供公社几个干部吃喝。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石玉平一直单独起小灶，从1960年7月到11月，只在食堂吃过6顿饭，家里不少腊鱼腊肉。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某，代销店的鸡蛋、洋糖包供给他。他下去检查工作，总是大吃大喝。乔山大队书记梅某和会计梅某，以办"三八"农场为名，挑选全大队最漂亮的妇女8人，其中7人被他们奸污

4、政治高压，鱼肉百姓

上述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等其所以泛滥成灾，主要原因是通过政治运动，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消灭了不同意见。

政治高压从"大跃进"以前就开始。自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13日止，通过整社、鸣放、揭发检举，搜集整理了"地、富、反、坏"分子单人材料4196份。其中，经研究批捕1327人，管制1406人，斗争批判和监督生产1025人，不予处理的127人，尚未研究决定的313份。此外，通过侦察破案、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逮捕366人，内部肃反和搜捕外逃共捕45人，对国家机关、企业、学校清除出来的"反、坏"分子及城镇"反、坏"分子，集中劳教59人。综上，地富反坏分子受到各种打击的共4214人，占四类分子总数的89%，占全县人口总数的1%强。其中，依法逮捕1736人，占四类分子总数的16 %，占全县人口总数的0.43%；依法管制1406人，占四类分子总数的13%，占全县人口总数的0.35%。

如果说以上是对当时所谓"敌我矛盾"的打击，那以，从1958年开始，就重点打击"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在办人民公社过程中，全县共辩论和斗争722人，其中贫农96人，下中农58人，上中农438人，富农63人，地主32人，其他35人。1959年反右倾时（在农村称为以两条道路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不同意见的打击更是变本加厉。一些说真话的人，一些对上述胡闹提出的人，被扣上了"反党"、"右倾"、"怀疑派"、"保守派"、"否定成绩"、"攻击三面红旗"等政治帽子，对这些人以开辩论会的名义进行批判斗争。县长赵从华由于对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有些看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反右倾斗争中,共排出有问题的党员和干部41人，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8人，严重右倾思想的10人，严重个人主义的8人，右派分子14人，坏分子1人。省级劳动模范陈学孟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反对生产上的瞎指挥，被戴上了"资本主义"和"右倾思想"的帽子。而对那些有不同意见和因饥饿而偷吃的普通社员则是取捆、绑、吊、打、关等残酷手段。

在1961年以后的纠偏中，群众揭发出前两年违法乱纪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有1920人，占干部总数的34%。被体罚的群众达28026人(包括扣饭的15001人)，占农村人口的12.5%。因体罚扣饭致死的有441人，残伤383人。赵玉书曾在一次电话上布置说："凡吃山芋种、油菜苗的，给我打!"杨某在总铺公社"蹲点"时，对完不成征购任务的大队干部不给饭吃。县委候补委员、原检察院院长陈某，亲手打人17名。1960年全县逮捕和拘留2078人，经过正式批准手续的只有300多人。在2078人当中，1076人是因饥饿偷吃的。由于关人过多， 牢房拥挤，死在牢里的就有382人。

以上是全县的数字，一面的情况更为严重。分工在小溪河公社的李某、板桥公社的季某、总铺公社的宋某等县委委员，私打手铐、私设公堂，擅自关押群众，成立劳改队。1959-1960年，武店公社被体罚的群众有1285人，其中被处死95人，被扣饭的1622户，3760人。小溪河公社犯有各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错误的干部有391人，占干部总数的39．1%。受体罚的群众3175人，占人口总数的9．4%，被打逼和扣饭致死的有96人，致残的103人。乔山大队总支书记李某、大队长张某，在1960年夏季的一天就活埋4个小孩，埋到腰深才经人再三劝说，才扒出来。1960年5月，大溪河大队牛同生产队长岳某将一个拔玉米秸吃的岁小孩丢到水深3尺的田头窖里，幸亏其母发现才被救出。小溪河公社小溪河大队北夏庄生产队有社员240人，挨过大队长打的就有237人。下放在山河大队工作组的展某，先后在大赵生产队捆绑吊打群众33人，扣饭30多人，罚款27户。一次社员王尚同老婆有病，展却说她装病偷懒，不给打饭，王妻饿得到食堂要饭，展看见后，强迫来打饭的社员每人用筷子刮她一下鼻子，谁不刮不准谁打饭，结果王的鼻子被刮得皮破肉烂。大溪河大队郑山生产队社员常介翠母亲有病，常找生产队长花某为母亲要点吃的，花说："还给她吃的？都快要死了，还不如把她埋了算了。"常介翠不同意。花说："你不想埋，就让她死在家里，埋在家里。"常介翠无法，只好把没的断气的母亲埋掉。大溪河大队尹陈生产队社员郭传良放牛时牛吃了庄稼，队长陈某当即用劈柴将郭的手指砸断三根。

1960年2月，殷涧公社白云大队赵窑生产队，社员赵小锅，17岁，有一个7岁小弟弟，因饥饿偷了一些山芋，被生产队干部韩某用棍子打得晕死过去。因饥饿无奈，又偷山芋2斤，韩将赵小锅的手指头砸烂四个。赵又疼又饿，两天内死去。又以偷山芋的罪名，5天不让7岁的弟弟吃饭，也随之饿死。这位姓韩的队长，共打了23人，骂了60多人。

1960年3月中旬一个中午，在板桥公社安乐大队山西生产队，队长缪

某硬说15岁的女孩小苗偷山芋种吃，将她捆起来，用铣把和毛竹乱打，小苗当场晕过去两次，醒来又打，尿一裤裆，胳膊被打断了。被缪打过的人有35人。1960年3月24日早晨，52岁的社员叫刘金友。队长缪某说刘金友放牛去晚了，不让刘吃饭，刘只好下田挖野菜吃，又说刘破坏生产。这天天气很冷，缪强行脱掉了刘的棉衣棉裤，捆绑起来用棍子毒打。刘疼得喊“爹爹饶命”，始终没有松绑。胳膊被打断，全身青紫。打后卧床不起，两天不给饭吃，5天后就死了。

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被干部捆绑、打骂、吊罚、扣饭、游庄的群众就有1078人，占总人口的36.3 %，被打死2人，逼死1个。北夏生产队共有社员240人，被队长李某打过的就有237人。社员王功良死后，工作组展某叫王的老婆去燃灯工地做工，因其小孩在家有病不愿去，展要斗争她。这个妇女被迫上了工地以后，小孩就在家里死了，小孩死后几天无人问，尸体被老鼠咬得不像样子。大队副书记史某，借口寡妇王氏母女俩要外逃，不给饭吃，并罚王氏苦工一天，晚上，又把王氏同一个男社员捆在一间房子里，同时把王氏的小孩捆在食堂里。第二天，王氏母女俩外逃后，史又把她家的三间房扒掉。工作组李某发现社员庙永产偷了几个山芋，就把庙捆起来，把几斤山芋挂在庙的颈子上“游庄”。三官庙生产队团员鲁维安，从水库工地上回家看小孩时，生产队长史某一连两天不给饭吃，还要史到小溪河去挑水灌秫秫。鲁维安饿急了，偷了半碗秫秫，史某就把鲁绑了两天不给饭吃。不几天，鲁就病死了。

1960年麦收时，山河大队总支书记陈某叫社员苦战三昼夜。有一天鲁殿发在场上打瞌睡，被陈用开水浇头，颈子上面皮都烫烂了。乔山大队长邓某，去年春天以劝阻外流为名，将一个过路人捆到大队吊打，从身上搜出12斤粮票和12块钱，自己入腰包了。总铺公社凤兴大队生产队长王某逮到小偷李某，用铁火叉烧红了烙嘴。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韩某，逮到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4个手指。黄湾公社淮丰大队小队长张某逮到偷青的社员王小脚，用铁丝穿上耳朵，并用铁丝捆着手吊在木梁上。三小队社员吴开聪的两个小孩饿得偷吃青苗，支书黄某指使打手用铁丝把两个小孩的耳朵串在一起，并对小孩说：“你们俩打个电话吧。”星火大队支书钟某利用妇女偷青的过错，在田里强行奸污。板桥公社浙塘大队长孙某，逮到一个偷青妇女，打倒在地，用枪捣妇女的阴部。

李武大队社员徐开兰曾当面批评过队长苏某贪污病院的油，当徐开兰发生严重浮肿病后，苏不叫医生进行治疗，说：“痨病鬼，治不好。”以致徐病日趋严重。之后，苏乘乡里来人检查病院的机会，企图将尚未断气的徐开兰活埋。当时徐的小孩在场大哭，不好下手。就

用饼乾将小孩哄走，把徐用稻草盖上，抬到外边活埋了。徐在被活埋前还惨叫：“给我稀饭吃！”

武店公社赵楼大队副大队长赵某说：“群众是奴隶，不打不骂不扣饭就不行。”1960年，他打过30多个人，有的被打伤，就的被处死。全社原生产小组以上干部1163人，犯有违纪错误的有265人，占22．2%。被他们捆绑吊打、拘留关押、扣粮扣饭、罚劳役等有1285人，其中被处死的95人，被扣饭的1622户、3760人。

5、在水利工地上

大跃进以来，凤阳搞了不少水利工程。兴修水利应当是好事，但由于缺乏科学态度，不少水利工程劳民伤财却得不到“水利”。在水利工地上，农民的处境不如奴隶，他们饿着肚子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大批人在饥饿、疲劳中死去。

建设电灌站是凤阳当年的一项水利工程。这项工程的工地经常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还克扣民工口粮12万余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道厚提出“三天三夜不吃饭，工效还要翻三番，下雪还要光着脊梁干”的口号。县委委员、副县长杜某，看到民工不脱衣服干活，就骂人家没有干劲。水利工地上还规定：多劳多吃，少劳少吃，不劳不吃，照出勤人数发口粮，炊事员、勤杂、病号不超过10%。民工请假非经指挥部批准的不给饭吃。民工生病就撵回家，被赶回家的病号因不发口粮或少发口粮，有的就死在路上。宋集公社宋集大队民工王士中有病不能上工，两个民工架着他去抬土，被折磨致死。据统计，电灌站共死民工2474人，占民工总数14293人的17.3%。这还不包括折磨得奄奄一息抬回家后死亡的人数。利民公社上电灌站的500人，死掉307人，占60.4%，宋集大队上电灌站的40人，死掉29人，占72.5%。群众叫杜思俭“杜阎王”，把电灌站叫做“阎王殿”。县医院周医生到电灌站检查病情，向地委汇报说浮肿病人较多，张政委把桌子一拍，说：“这个傢伙扩大病情，思想右倾！”

县委委员兼小溪河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某在燃灯水库私设“法庭”、“牢房”，“劳改队”，任意关押民工。他指使人打了20多副手铐，专门对付所谓“调皮捣蛋”的社员。被他关押和上铐的群众有70多人，被整死的有28人。在这个水库工地，白天强迫劳动，晚上不分男女关在一起。规定每头牛、半里路每天要拖480趟，完不成任务就送去劳改。牢房里的刑罚多种多样：罚站，捆绑，吊打，用铁丝穿耳朵。大溪河社员王占满，还没断气，就叫民工把他埋掉。民工把他放在外面没有埋，他苏醒过来爬了4天，爬了20里路才回家。燃灯大队黄庄小队社员丁学然因偷宰了老母猪，被李某押到水库工地劳动，白天强迫干重

活，晚上铐上铐子关禁闭，一个月后，丁学燃被活活折磨死在牢中。小溪河大队南刘家生产队社员宋维勤因从水库偷跑回来，李某知道后，就把这个社员抓起来，白天劳动扣饭，晚上关禁闭，被折磨致死。民工病死了不上报，不通知家属，随便把死者埋掉。

1960年春，山河大队副队长缪某带民工上水库，强迫社员像奴隶一样劳动，他亲手吊打社员100多人，并先后死去35人。新华大队副队长张某把社员许山友捆绑送水库，许不愿去，张将许反绑，用牛拖，许被拖得皮开肉绽，直到许惨叫“愿意”后才放下，接着就捆绑送水库，不允许有病送回，第4天死去。张某对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向他提过意见的社员史前山进行报复。他利用民工上水库的机会，将史家两个劳动力分别调去修水库和铁路，还强迫在家的老母和两个孩子像男人一样，每天交70斤野菜，否则不给饭吃，同时规定：不准家里冒烟，否则没收。与此同时，又诬史家两个小孩偷东西，将两个小孩捆绑吊打。第二天，两个孩子就病了。孩子的病越来越重，老母哀求张，请求住院治疗，张某竟恶毒地说：“还住什么医院！我非叫你家死得没有开门的没有关门的!”没几天，两个小孩死去，接着老母也连气带饿死去。

6、分田到户　渡过难关

食堂断炊，饿殍遍野，外出逃荒又受到层层“劝阻”，即使通过重重关锁逃了出去的也找不到活路，因为其它地方也是大饥荒，没有粮票吃不上饭。外逃的人不少饿死路旁。在这生死关头，有些生产队不顾共产主义思想的禁锢，偷偷地把田分到户，让农民自己在土地中找吃的，以渡难关。1961年，府城公社四凤大队实行了“三包四定”的办法，平均亩产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县里总结这个队的经验，在全县推广。当时，安徽各地也搞起了分田到户，在全省范围内搞起了“责任田”，当时农民称为“救命田”。到1962年改正责任田时凤阳县委报告，凤阳县的2993个生产队中，集体经营的只有564个，只占18．8%。包产到组的有1254个，占41．9%；实行责任田的有1176个生产队，占39．3%。实际上实行责任田的比例比这个数字大得多。这些分到户的田的确救了农民的命，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全家老小在地里精耕细作，当年就可以吃饱肚子，两年形势就好转起来。刘府公社有的社员说：“单干单干，快活一年，四两烧酒，两个鸭蛋，逢双赶刘府，逢单赶车站”。他们认为搞责任田有三大好处：一是政府省心，生产不要问；二是干活的人多全家老少一齐干；三是粮食产得多，家家有余粮。“但是，分田到户毕竟和共产主义目标是相悖的。中共中央很快“纠正”了这一作法（安徽称为“改正”）。1963年，工作组在凤阳“改正”责任田和包产到组时，人们也比较理解干部的苦衷，

有人说："责任田是瓦上霜，是见不得太阳的；是看鸭船，是经不起风浪的"，也有人说："人随王法草随风，中央要这么做，你不随也不行"。但在改正中还遇到了重重阻力。黄泥铺公社有的小孩在街上唱："成乡长，你想想，没有责任田，哪有米和粮。"城南公社的农民说："前年我们像雀子一样，关在笼子里闷死了，刚放出来溜了两年，现在又要把我们关起来了。"也有人很坚定地说："我不改，坚决干责任田。"也有人准备搬家到山沟里去搞责任田。原来搞责任田的积极分子和坚决反对"改正"的人都受到了惩罚。全省有10万农村干部被斗争、关押，有的家破人亡。尽管如此，但没有消灭农民搞责任田思想，10多年以后，又是凤阳的小岗村最先搞起了责任田，并且在全国得到了普遍推广。

二、无为风波

无为，在风景秀丽的黄山脚下，是安徽的一个大县，面积有2900多平方公里。1950年，人口为943397人，1369302亩耕地。它位于长江北岸，与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隔江相望。

1、大步奔向共产主义

1955年春，全县成立了111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久，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述，全县一气呵成"社会主义合作化"。不少人在秋后即缺米少柴，随之纷纷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结队抢分集体的存粮；有的硬行私分集体保留的稻种；有的公开责怪政府，咒骂干部。省、地派来了工作组，"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干部、党团员中的右倾保守、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平均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在整社期间，还派来了一位华东地区一级宣传员XXX， 他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账算清楚：有大军渡江时的损失账，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全国各地派来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这一连串的"帐"，把老实的农民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只得背地叽咕；"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现在又变卦了。"从此再也没有敢说退社了。

大跃进那年，安徽省委从安庆地区调来一个叫姚奎甲的干部担任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当时，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们，纷纷逃到江西省。姚奎甲视此情况，一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干涉，批评江西省随意

接收安置，一面派人前去动员返回。还要求各个车站、轮船码头，凡没有各级政府开具的正式证明的，一律不卖票。断炊的农民，逃命遭到阻拦，已经逃出者又被追回。被追回后，又得不到生活上的安排，遭厄运者数量很大。

1958年9月，全县原有435个农业社并为31个人民公社。县委又拟了一个“关于试办共产主义人民公社问题”草案，不到10天的时间，“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在全县普及。

严桥区响山农业社的社长叫陈广复，是个老退伍军人，此人在部队搞过供给工作，他在1955年就在农业社实行过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公社化时搞起供应制更是轰动一时，连毛泽东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说“安徽省无为县在三国时曾出现一个黄文炳，现在又出了一个陈广复”。毛泽东视察安徽时，还要到他们社去看看，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陈广复的响山社供给制有这么一段顺口溜：

发米发柴又发盐，

过年过节样样全。

有酒有肉有香油，

红糖鞭炮带挂面。

到热天，发草帽，

另有一把芭蕉扇，

有毛巾，有香烟，

还有肥皂洗汗衫。

要结婚，就支款，

生了孩子更安然，

有产假，还不算，

糯米红糖加鸡蛋。

继后《人民日报》发出了《安徽省响山社最早实行供给制》的报道和《一棵共产主义的幼芽》的通讯。文中肯定地说：“响山社许多可贵

的创造，是发人深省的。全国农村正在大跃进，时代逼着我们必须考虑共产主义的具体形态。共产主义，应像列宁指出的那样：‘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划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要自由地领取’”。

无为除实行“供给制”外，还大刮“平调风”。“平调”的种类有土地、劳力、耕牛、农具、房屋、家具、家禽、家畜、现金、粮食、柴草、木料、砖瓦、芦席、毛竹、稻繁、车辆、鱼、藕、棉被、棺材等。据袁乃平、吴克明、朱宗新 3人于1960年12月12日调查的红旗公社新民大队情况：“全大队共平调的房屋471间，拆掉房子109间。 平调土地119.9亩，平调耕牛21头，平调水车119辆，母猪21头，手推独轮车35辆，船1条。”

该县统计资料标明：1958年期间，县向公社调支的劳力所做的劳动日就有736万个，连同各种器材物资总共价值746万多元。大江公社1959年提出要实现“七个万”：万头猪场、万鸡山、万瓜棚、万鸭棚、万鱼塘、万鹅滩、万亩丰产片。公社提几个“万”，大队跟着提几个“千”，生产队也提几个“百”。要实现这些目标，层层要从下向上调集物资和财产，千方百计集中凑数，最终剥夺的还是社员。从1958年秋到1960年春，大集中、大平调、大搬、大拆和大兵团作战之风，一刮再刮。1959年秋后，全县实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现大杀、大吃、大卖等现象，搞到最后，家禽家畜几乎绝迹。农村被搞得满目荒凉，农民家贫如洗。

共产风给无为带来了前所未见的灾难。据有关资料表明：

一、大量的饿死人。杨金声在《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无》中写道：“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57年底，全县总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只有662557人，减少了320422人。再加上1961年饿死的人数，无为县总共饿死人应当在30万以上。”谢贵平调结果是，全县饿死20余万人，占“大跃进”发动时总人口的20%左右。

二、耕牛农具大大减少。 1957年全县耕牛共有38597头，到1960年只有28100头，减少10497头；大型农具原有294805付，到1960年只有118561件，减少176244件，其中减少程度最严重的是无城区，达80%。

三、土地荒芜，粮食减产。从1958到1960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粮食总产量1957年为6.7亿斤，1958年为6.2亿斤，1959年为4.4亿斤， 1960年为4亿斤，与1957年比，减少36.5%。

2、父母官从农民嘴里夺粮

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受到上级的压力，也对下级施压。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是6.2亿斤，却上报13亿斤；1959年总产量是4.4亿斤，上报11亿斤。当时任职县粮食局的夏可文[4]回忆说，1958年他奉上级命令去调查农民亩产的真实数，他随机抽取3块土地肥瘠程度不同的田分成3个等次，亲自监督收割和打谷，结果发现上等田平均亩产120斤、中等田80斤、下等田40斤。他想将真实数字上报，但区里干部怕影响政绩，不给盖章，最终粮食产量还是按区里干部虚报的数字盖章上报。

中共无为县县委书记姚奎甲为了保官，编造了瞎话。千千万万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姚书记反而说农民“不缺叫缺”、“闹粮”，下命令要基层干部反“瞒产私分”。

1958年底粮荒日渐严重，大多数农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却在县委扩大会上说：“现在农村到底有没有粮食？我们回答是，粮食不仅有，而且很多。粮食问题，关键是领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

1959年12月11日， 姚奎甲在区、社书记会上还强调说，“要认真清理仓库、种子、加工厂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场基上有没有稻，查代食品找未找尽……”

12月12日，他在红庙公社召开的生产队芳以上的干部会上，用斗争、吊打、扒掉衣服罚冻、打嘴巴等刑罚，威逼催粮。在会议期间和会后不久，红庙公社就饿死7600多人，其中，闸北大队原有4944人，饿死2260人，占该大队总人口的45.7%。

14日，姚奎甲亲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瞒产会议，追逼十分激烈。一个大队书记赵宪成被撤职，官镇大队骆以寿被斗被打；东河大队牌坊生产队一姓魏的小队长，姚还叫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治华组织人专门斗争了两天。姚对精华大队会计赵同庆说：“你不交代瞒产账，就法办你，审你罪，看你狠还是我狠。”东河大队生产队长汪为山，被斗时，受到打、拖、冻，还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浇。姚奎甲怀疑赵渡大队副书记刘长山瞒产3000斤稻子。姚找刘个别谈话，严加追逼，姚说：“你还蒙我吗？你不讲，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这次谈话到深夜，刘长山一回家就自缢而死。姚奎平宣布刘长山叛党畏罪自杀。

12月中旬，姚带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等人，在六洲公社新华大队搞反瞒产重点时，亲自和通信员张修白吊打了生产队长李必松，并指使民

兵和通信员捆绑生产队长胡必喜、陈能富和会计李必华3人，以后又捆吊打12人。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瞒产，把农民中的口粮搜尽，一面逼迫干部，千方百计抓粮入库。1960年秋粮入库时，虚报的受到了表扬，还登报说“一马当先”。 开城公社实际入库只有3万斤，粮站站长如实上报，姚叫办公室副主任打电话说：“把这个狗娘养的绑上来”。一次姚打电话要土桥公社书记马玉根继续送粮，马说：“只剩30万斤种子，实在无法送了。”姚说；“口粮也要送。”

1959年10月，尚礼公社已饿死人。姚在公社书记会上对该社书记刘谊宽说：“ 你回去，如3天完不成24万斤征购任务，下次来开会就提头相见。”第二天晚上姚召开电话会，刘因吐血病倒，由副书记任士好接电话，姚命令刘马上到县里来，刘还不敢说自己吐血，连夜跑到县里，结果被逼得将30万斤种子送进了国库。

姚奎甲对下抢夺农民的口粮，对上汇报还说对农民的口粮已作了“很好的安排”。无为县委不顾农民死活，大量的饿死人。但几年来连连得到上级表扬；1958年得中央的超纲要奖状，1959年得地委的超纲要红旗。上级的表扬使姚奎甲有恃无恐，在征购上任务一加再加，既卖了口粮，又卖了种子，前面卖粮，后面挨饿。1959年冬，部分食堂停伙断炊几十天，仍布置加快粮食入库，每天要入库数量，少报不行，多报欢迎，刘渡公社先报一天完成20万斤，批评后，逐渐增加到每天70万斤。

3、农民的苦难

农民们由于饥饿乏力，个个都骨瘦如柴，走路都摇摇晃晃，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须带拐杖，无法下田劳动；即使被干部用棍棒驱赶下田，农民两腿也深陷淤泥中而无力拔出，只好在田块四周播种、插秧，消极应付，于是田块中央长满了稗草。

上行下效。为了从农民口中夺粮，县里逼公社，公社逼大队。本来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就采取种种手段摧残农民。一份调查报告称：该公社严重强迫命令的干部35人。他们对农民打骂捆吊来完成征粮任务。被他们捆绑吊打的达2049人，致伤14人，致死5人，被逼自杀1人。

1960年11月，县委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少数干部任意体罚群众，捆绑吊打，尅扣伙食，罚跪、罚冻、罚晒太阳。有的私设监牢、小劳改队。有的还采取用石头砸手指、钢针扎手、剪刀剪耳朵、火棍烫鼻梁、针缝嘴巴等等令人发指的刑罚。”下面是这个材料中列举的具体

事例：

1、新河公社公路大队第二小队妇女熊德兰，因饥饿难忍，偷了一点蚕豆，被指导员宋某发现，当场狠打了一顿，晚上开辩论会，随后把她调到另一生产组劳改，因羞愤自杀而死。

2、汤沟公社姜桥生产队农民龚维经，患浮肿病，生产队长江某叫他参加劳动，他因体软无力未去，队长一天不给他饭吃，第二天被迫下田，死在田边。

3、姚沟公社共产党员李某捆打14人，1960年利5月，在第7队，把偷吃蚕豆的女社员叶玉英的嘴巴用针线缝上。

4、红旗公社花疃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张某，全生产队47户人家，除他自己家外，其余46户都被他扣过饭，并摔碎社员的打饭盆10个、小饭桶一个和一些其它打饭用具。社员蔡大喜有病，把田沟整理得粗糙了一些，就遭张某毒打他一顿，回家上吊而死。春季栽早稻时天气很冷，浮肿病人张本胜、张成年不能下田，生产队长张某硬要他们下田，张本胜上午下田，下午死去。

5、羊山公社阮井生产队长任某捆打社员19人，其中被迫外逃15人，死1人。社员周可法有病，1960年4月的一天，他牵牛跌进水里，任某硬说周可法不想下田劳动，故意把衣服跌湿。周不服回了嘴，任某当即打了他两个耳光，并且扣饭，周当天中午上吊而死。

6、陡沟公社官圩大队队长蒋某，1960年前后，共捆打社员24次，打伤致死2人。1959年10月的一天，蒋召开会议，因下雨，徐村有7名社员迟到，蒋即打每人一大棍，到会场还给5人罚跪。社员许以民因妻子被罚跪不服，说：“你就搞我们贫下中农”，蒋某即抓住许以民，施用“人搭桥”的刑罚。即把人脚放在一个桌子上，手扒在另一桌子上，全身悬空，然后将两张桌子同时向两边拉开，使人跌下。许以民摔伤后几天就死去。

7、《无为县三级整风运动开展情况》中写道：全县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1554人。石涧公社陈闸大队第6生产队队长江某从1958年3月到1960年3月，共捆打吊过社员164人次，其中被打伤9人，致死4人。

8、新河公社马城大队石碑生产队队长傅某，1960年上半年不到100天的时间，就打了35人、达153人次。女社员倪华的小孩偷了5斤稻，傅将倪华吊起来打，将纳鞋底的大针烧红，在她的鼻梁上烙了一

个“十”字火印，并责令妇女队长将倪华的头发剪光，以示偷窃。社员陈文明因病不能参加劳动，被傅一顿毒打，伤重致死。

9、赫店公社苏塘大队汪塘生产队党支部书记丁某，1960年3月，小饲养员丁玉因偷吃蚕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丁玉脸上剪掉了一块肉，当时血淋不止，第二天头部肿大，加上挨饿，半月后死亡。

10、1959年春节刚过几天，襄安公社青龙大队宣村生产队长宣某就要社员下地干活，有三位社员迟到，宣队长开口就骂：“你妈的弄x，你们想吃不想吃饭？今天你们三人就给我站在池塘里，不要你们干活！”三人还未来得及说明情况，宣队长就一个耳光，说：“你们不想干活还有理由？你们不站到池塘里，就别想拿到饭票子！”三人为了中午吃到那碗稀饭，虽然穿着棉裤棉鞋，只得站到水塘里去，水漫膝盖，冻得三人满脸青紫，浑身发抖。

11、大江公社官镇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某、小组长张某，人称他们是“活阎王”，1959年冬，57岁的社员陈长河，因患浮肿病不能劳动，被扣饭一天多，陈饿得没办法，便向张某磕头要饭吃，张讽刺地说：“你脸上有肉，不吃没关系。”孙连气带饿，当场昏倒在地，醒后爬到食堂就死了。

无为县南乡有一小孩，因饥饿难耐，大白天爬到生产队田边偷食田中稻种，被生产队长发现，冲上前去，一锹铲下去，将偷食小孩的右手四指齐刷刷铲断。

查阅1957年到1961年无为的气象资料，无论从月降水量、最长连续降水日数和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看，还是从暴雨日数和暴雨连续日数看，不存在旱涝灾害。在这样基本风调雨顺的情况下，饿死了30万人。

家里饿死了人不敢声张，不去报告，让死者仍躺在床上，用被子盖得严严实实、平平整整的。别人问起，就说生病不能起床。家里活着的人照样到食堂给他领回一份浪打浪的稀饭或代食品，以保全活人的生命。饿死的人虽然是骨瘦如柴，尸体干瘪，春夏气温虽高还可保存一段时间，冒领死人的饭的天数就多一些。但存放久了，引起干部的怀疑，上门检查，揭开被子一看，常常是尸体上的眼珠被老鼠吃掉了，脸、耳、鼻、脚趾被老鼠咬得露出了骨头。有些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2003年8月19日，谢贵平先生到无为县昆山乡莲花靠山村访问了时年60岁的苏秀芳。苏秀芳回忆说：当年她住在苏老村，苏老村至昆山街

沿途3、4里路，每天都见无人收埋的尸体十几具，要么是其家人已全部饿死，要么是家人因饥饿无力挖坑掩埋亲人的尸体。 . 她说，苏老村原有570人，到后来因饿死加上外流，全村只剩下2百多人，好几户人家死绝。苏秀芳一房（共一个曾祖父的所有家族）共72人，其中饿死和被折磨死53人。她母亲死后，她的弟弟时年2岁，依偎母尸旁，嗷嗷待哺；为了多领得一勺稀饭（当时他们村按人口到食堂领取口粮），被迫用棉被裹住她母亲的尸体，与家人同卧一床，不让别人知道她的母亲已死；以死人冒充活人，多领取一勺粥水，从而使姐弟俩得以苟延残喘，据苏秀芳说，她的堂妹饿死后，她的二伯以收埋尸体为借口，将尸体带到苏老村村后山冈上，割下尸肉煮烧食用，而将尸骨仅草草掩埋，苏老村许多村民都看到这一幕。当年在县粮食局任职的夏可文对谢贵平说，无为县城有一货郎小商人，穿街走巷做一些小生意（当时叫“投机倒把”），经常将赚的钱换一些食物藏在货郎担子里自己食用，从不给他的妻子和儿子吃；每当他的妻子和儿子向他求食时即遭他的毒打，并扬言要杀掉他们母子俩；妻子饿得快要死的时候，趁丈夫熟睡之际，与儿子一起用绳子勒死他，以夺取食物。据昆山乡新华村村民反映，当时该村有一老妇，一日邻居偶进其屋，见老妇人正在吃肉，忙问其来源，老妇良久不语，后在干部的追问之下被迫说出实情，其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据老人们讲，有些饥饿的乡民经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 当年任无为县派出所所长的胡大海说：“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都有，但大都是饥饿的原因。”

4、谁讲真话镇压谁

县委人民来信办公室，1959年、1960年共收人民来信1173件，绝大部分都未认真处理。有的还作为反动信件侦破。

一次，石润公社党委书记谭布真，匿名向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姚奎甲在省里开会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告知谢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厅蒙处长进行专案侦破。谢数次以测验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为名，要全县大队以上干部每人亲笔写一份学习心得送到县委，核对笔迹。对笔迹没有查出，姚奎甲就到处怀疑，逼迫县委办公室主任潭荣植、原副县长刘希文及汪卓、朱吉祥、胡志杰等同志承认，最后谭布真怕连累别人，主动承认是他和一名大队干部写的。结果谭被斗争，定为右倾分子，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两级处分，并送农场劳动。

县委组织部原副部长钱汉轩，病退后化名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无为农村情况。姚截获这封信后，即交县委办公室转赫店公社书记丁学甫进行侦破（因看出是从赫店邮局发的），并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到处查对。钱怕定错他人，即向丁学甫承认是他写的。当时钱正发烧，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后命令丁学甫立即派人将钱送到县里。姚一见钱就破口大骂“你这个混蛋，是张凯帆的爪牙、走狗，吃饭不干事，还向中央告状”。随后把钱关了一个多月，组织两次斗争，令其反省。

一次，田桥公社书记季永山、庙后大队书记杨克才、港河大队大队长汤圣传3人写信给毛泽东，并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无为问题。姚得知后，即派人去北京将季等人领回，经过斗争后下放劳动。后将杨克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教；季永山、汤圣传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3级降为25级的处分。在他们劳动期间，杨克才因去芜湖一趟探望爱人，季永山请假去马鞍山看病，姚说他们不老实，还想告状，即将他们逮捕起来，

关押一年零8个月。

严桥南岳小学副校长陈英，于1959年7月至10月3次向姚奎甲写信，反映当时无为基层干部作风和群众生活的实际问题。姚不但不支持，反把陈英写信问题转告文教系统整风领导小组，要其对陈斗争，并说：“有个小学教师给我写信，内容非常反动，骂到县委头上来了。我已叫县委办公室通知区里派专人将陈英送到县里来，你们要转告文教局组织专门会议进行斗争。斗争后要专人看管。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学教师还整不倒。”斗争结果，将陈英划为右派分子、撤职降级、监督劳动。

姚奎甲对县委办公室主任谭荣植说；“今后如有人向中央和国务院投寄的信，要邮局堵住，每天晚上要检查”。一次，姚到襄安镇，见有个摆摊子代写书信的，姚怕他代写人民来信，亲自把他带到公社审讯，并把他的摊子毁掉，还威胁他说：“今后再要写，我把你捉起来法办。”这个人吓得逃走了。

一些干部因讲真话处分后，即送劳改。王福大队办了一个收纳90多人的小劳改农场。强迫劳改人员于重活，做不动就打，有时甚至不给饭吃。这90多人中，除派出所送去的五类分子21人外，其余大部分是干部和社员群众。

1960年初，周恩来收到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饿死人情况的来信，致函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求查明情况后回复。函件全文如下：

希圣同志：

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明后复我一信。

敬礼！

周恩来

一九六O、三、二十九

以后揭露的事实证明，这些来信反映的情况，不仅不是像周恩来说的“夸大其词”的“个别现象”，而且情况要严重得多。

5、张凯帆“大闹无为”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大批张凯帆，说他“大闹无为”，把张凯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无为的老百姓，一直把张凯帆当英雄，当清官海瑞。

张凯帆1927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并领导了无为“六洲暴动”，1933年9月，他在上海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时被叛徒出卖后逮捕，关进了龙华监狱。他在龙华狱中作诗言志：

龙华千古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

一般鲜艳一般红。

他在狱中睡双人床上铺，他用铅笔将诗写在墙上，位置比较高，监狱管理人员没有发现。解放后，解放军在清理监狱时，发现了这首诗，误以为烈士写的。萧三在他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收集了这首诗，署为“佚名”。后来，出版社得知是张恺帆写的，便来信说明并道歉，张复信说：“我是幸存者，获烈士称号，当不胜荣幸，何歉之有？”

1959年春以来，身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张凯帆，不

断得悉无为“田园荒芜”、“灾情严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极为不安，便来到无为作实地察看。1959年7月4日，他一到无为，就有农民拦住他的车子，有的人向他叩头，要求他解决吃饭的问题。他目睹农村的悲惨情况，十分伤心。7月7日，张出席了县委召开的五级干部会。他在会上的讲话说：

在去年大跃进中，浪漫主义太浪漫了，本来长得很漂亮，可是粉堆厚了一些。比如，明明亩产400斤，硬说是800斤，1000斤，你多我比你还多，横竖越多越好。

我们有些同志为了面子又不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请问，你们到底是要面子还是要农民吃饱肚子呀！？这次，我从石涧那边过来，见到病人很多，特是浮肿病人多，粗腿的多，妇女子宫下垂的多，闭经的多。.

如果要走贫穷的道路，哪个去干革命？我张恺帆也不干！

农民吃什么东西，一家大小平均不过二两。我们有些同志胆大妄为，乱改粮食标准，置群众生死于不顾，还有一点人性吗？

食堂一般不要搞了，这并不影响人民公社的性质.....现在食堂办得并不好，很多人愿意回去吃，只要你们把粮食、柴草、菜园地给他，给他们解决锅，他们会举双手欢迎的，愿意单吃的。

他建议把库存几百万斤粮食供应给病人和儿童；农村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他便写信给省委，建议省委考虑农村食堂是否暂时停办。

他在无为的20天里，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并细心察看当时的干群关系、农民生活和庄稼生长的状况。他看到人们脸如黄蜡，骨瘦如柴，有的拄着拐棍，有的卧床不起，饿死人的现象已有所闻所见。到处禾苗生长得犹如枯香直立，满目凄凉。张凯帆心急如焚，他一面与县委书记姚奎甲交流情况、沟通思想；一面多次电告省委、地委反映情况，请求给予支援，一面沿途呼喊，要求干部和群众同舟共济，启发农民多种蔬菜，振作精神。他得知红旗公社王福大队书记张定根，横行霸道，打人骂人无计其数， 且一次即逼死3条性命，但此人为姚奎甲所宠。张凯帆通过政法部门将其逮捕。新民大队一生产队长黄大本、陡沟港河大队一生产队长倪进长因多次打骂群众并打碎社员的锅，张凯帆对此十分愤慨，随即通过地方组织，将其宣布撤职。

最能表现张凯帆胆识的是他在无为提出的“三还原”、“两开放”。他经过调查研究，根据群众的意愿，和另一位书记桂林栖商量以后，果断

地提出：占用社员的房屋还原，伙食还原（即解散食堂，回家做饭），公社化中没收的社员自留地还原；市场开放，鱼塘开放（可以让农民搞点鱼虾充饥）。但是，他这些救农民于水火的做法却招来了弥天大祸。

1959年8月1日，中共无为县委给地委写报告，并将此报告上报省委。报告说："张恺帆于7月4日到无为县检查工作，9日下午在大队检查时，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的三还原，并要县委向下贯彻。到7月15日，全县六千多个食堂被一风吹散，只有120个食堂坚决不散。"

8月2日，芜湖地委立即向省委报告："我们认为张凯帆提出的三还原，特别是命令解散食堂，是违背中央和省委关于办食堂的方针和政策的。"报告还揭露"张凯帆指示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的三个变化（劳动力、农具、房屋）和干部作风、各种发病情况等五项内容，而且均以公社化前后为界限，不知用意何在，请省委研究。"

8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就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食堂一事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说："我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同志于七月初到无为县检查工作时，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的混乱。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对张的这种作法很有意见，认为是违反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现将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的报告转上一阅。"

8月10日，毛泽东在省委的报告上作了极为严厉的批语：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的目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

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

显然，毛泽东这里不仅仅是批评张凯帆，主要是借机批评彭德怀。但张凯帆也难逃过一劫。

1959年8月27日至9月21日，曾希圣主持召开了县处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对张恺帆进行了批判。接着，又批判了省委候补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陆学斌。因为陆对浮夸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还同意张恺帆在无为县的作法。

随着斗争的深入，省委把张恺帆和陆学斌定为“反党联盟”，作出了《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批判运动，一大批说真话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张凯帆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批斗51天，关押200多天， 经批判斗争后送淮北某矿劳动。其妻史迈也受到了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

张的二弟昌选、堂兄视三、堂弟昌树，还有在抗日时期曾任皖江参议员、老民主人士王试之都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死。凡与张有过接触的人都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服。对这些人进行抄家搜查、强迫劳动，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送到大蜀山畜牧场劳动。据不完全统计，遭受株连被批斗、处分的无为籍各级干部就有28741人。于是，张恺帆试图纠正的“共产风”在无为县又刮了起来，导致形势迅速恶化。张恺帆被批判之后，地方干部的专权和高压越来越严重。由于被判的人太多，以致于无为县监狱爆满，连仓库里都关满了人。后来政府不得不将那些无处关押的人押往临近的白湖农场（庐江县境内）和普济圩农场关押。在押送路上，老百姓说劳改犯多得象行军队伍一样。

“七千人大会”以后，张恺帆平反，官复原职。文革中又受摧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先后担任省委书记、省纪委第二书记、省政协主席、省政协党组书记、省委顾问等。

三、亳县的惨剧

亳县（现为亳州市谯城区——属阜阳市）位于安徽省西北边陲，东、北、西三面与河南接壤，南面与东南与本省的太和、涡阳县毗邻。全县面积2200多平方公里。1957年耕地面积273万亩，农业人口73.7万人。1958年到1961年，由于同全国各地一样的原因，农村生产力遭

到严重破坏，农村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在大饥荒期间担任这个县人委（即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的梁志远，兼任县委农村工作生产福利科科长和县委生活福利办公室副主任，那时县委和县人委合署办公，很多事情都由他经手。他既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又经常下乡调查情况，是一个十分了解情况的历史见证人。2002年和2005年，梁志远先生根据三年农村工作笔记和有关历史资料，写了多篇记述亳县大饥荒的文章。其中，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亳县农业卫星经验官修记》（2003年第一期）、《亳县统购统销反右的后果严重》（2003年第7期）、《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大、人委、政协》（2006年第3期）。另有三篇稿件《炎黄春秋》编辑部觉得很好，但不敢发表，即《沉痛的历史教训——亳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实录》、《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安徽亳县大办共产主义食堂》。后两篇发内部版《春秋文存》，印数只有几十份。在已发表的稿件中，由于政治条件所限，《炎黄春秋》编辑部删除了部分敏感的内容。征得梁志远先生的同意，本书这一节全部取材于梁先生上述作品的原稿。

1、放“卫星”，高征购

1958年秋，安徽省委、阜阳地委（当时亳县属阜阳地区）迫不及待地要求所属各县大放“卫星”。亳县闻风而动，并抢先在各县前头。9月27日召开的县党代会上宣布，五马公社将要放出亩产万斤以上的特大水稻“卫星”，并作出了“今年粮食实现亩产千斤县，明年亩产万斤县”的决议。之后，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在五马公社泥店大队，选上好水田，打上木桩，先竖后横网好铁丝，从一百零几亩稻田里将成熟的水稻中选优拔棵，移栽到1.389亩水田里，并在田埂栽上青草，以表真实。经过几昼夜苦战，园满完成了水稻特大“卫星田”的创造任务，连夜上报省委、地委，并通知各社队组织干部参观。许多参观者站在稻穗上合影留念。收获之后，这块“卫星田”放出了亩产40803斤的特大“卫星”。省、地、县报纸、广播及时发表了消息，省地委迅速发来了贺电。

全县社队干部通过参观学习，“并田移栽”水稻和合并收获形成高潮。在秋收季节，高产“卫星”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全县数不清放出了多少“卫星”。有的来不及像水稻那样并田，干脆就把多亩地的收获作物放在一起，上报成很小面积的收成。特别是红薯起收时，把十几亩甚至几十亩地里大块红薯挑出来堆放到一块几亩地里，要求上级来验收，以放特大“卫星”。

经过一段狂热的浮夸，亳县知名度大大提高，一跃跨入了农业先进县的行列。县委负责人和亩产4万多斤“卫星”的泥店大队负责人，出席

了1959年的全国群英大会，亳县和泥店大队都受到了国务院的奖励。

产量报得太高，征购指标也随之提高。1957年实际征购1.3亿斤，1958年提高到3亿斤。到1958年底，粮食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因此，大会追，小会逼，干部群众人人过关，拔白旗，批右倾，把征购粮食多少当作衡量干部左、中、右的标准之一。虽然食堂多数停伙，浮肿病大量发生，但县委还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硬说无粮是“假象”，是“西北风”，到处翻箱倒柜，大搜粮食。后来地委派副专员张剑华带工作队来检查，搞清了真相，县委才勉强承认没有粮食，安排了农村粮食返销。但是，返销粮食很少，十天口粮三天吃光。在打击说真话的人的同时，大力表扬说假话的人。1958年，县委让一位新提拔的县委副书记宋某去分包五马公社，他很快伙同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某放出亩产4万斤的水稻高产卫星，全社粮食产量跃居全县第一。秋季征收“过头粮”从而夺得全县的“帅旗”。1960年3月4日，正当农民大量饿死的时候，他们竟把二月份县委分配给该公社的人均每天4两（相当于十进位的2．5两）的返销粮4500斤退回给县里。从而在县委扩大会上受到大力表扬。结果，五马公社是饿死人最多的公社之一。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8月29日，县委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在全县城乡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县委的头脑又膨胀起来。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凡是反映过农村粮荒、饥饿的党员、干部，均被视为否定1958年成绩、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给予无情打击。1959年粮食进一步高征购，征购量和总产量的比率由1958年的33.2%，提高到39.5%。1960年春，大批饿死人的时候，返销粮每人只有二两左右，相当于十进位1两多。

“五风”大行其道，畅通无阻，是因为没有人敢说真话，党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1958年10月， 县委书记为了更方便推行其意志，将县委和人委（即县政府）合署办公，县长、副县长下农村蹲点，以党代政达三年之久。1959年春，农村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以后，如实反映情况的人都遭到残酷打击。

2、亳县的公共食堂

1958年9月7日到17日，在10天之内，全县就实现了公社化。在公社化的同时，全县办起了4700多个公共食堂。食堂一般由生产队长负责，司务长由会计兼任。食堂所需的房子、器物都是用“共产风”刮来的。刚开办的一个多月，一日三餐有干有稀，门前红旗飘扬，男女老少一起进餐，像民间办喜宴似的，社员家中来客和路上行人都可以到食堂吃饭，一律不收钱和粮票。当领导参观、记者采访的时候，一片欢腾，高喊“食堂万岁！”

但喊“食堂万岁”的毕竟是少数典型。大多数食堂是开饭时社员排长队领饭，食堂门口蹲着大片吃饭的人群。排在队伍前边吃完了饭，排在后面的人还没有领到饭。雨天要踏着泥水去领饭，冷天领到饭以后吃冷饭。对老弱病人无法照顾，乳食不足的婴儿难以补贴。更重要的是，吃粮无计划，粮食浪费十分严重，秋收后不久就没有粮食了。多则两三个月，少则一个多月，大部分食堂就被迫停伙。此时，1958年的粮食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为了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一方面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搜粮，一方面在县内主要干道和周边县市设立“劝阻站”，查缉逃荒农民。1959年2 - 3月间，全县因缺粮，食堂停伙，浮肿普遍发生。大批农民逃荒到邻近的河南省。到1959年3月上旬，全县只有几十个食堂起伙，春耕生产基本处于停顿状态。直到麦收季节，食堂还处于时开时停的状态。麦收后不久又出现夏荒，食堂还是难以正常开办。当时农民私下传顺口溜：

食堂没有粮，

饿得人脸黄，

浮肿像黄牛，

干瘦像螳螂。

1959年8月29日，县委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和省委反右倾会议，全县反右倾运动迅速展开。“保卫食堂”是反右倾的一项重要任务。县委负责人在大会报告中对食堂特别强调：“人民公社的食堂为什么会被一风吹掉？主要是对敌人打击得不狠。有人认为食堂一片黑暗，有人在动摇军心。”县委认为，办不办食堂，农民参加不参加食堂，是拥护不拥护共产党、拥护不拥护社会主义的一场阶级斗争。因此，农民绝对没有“入堂自愿，出堂自由”，即使是无粮下锅，喝清水，吃菜汤，也得集中在食堂喝。在反右倾运动中，对停伙的食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对那些所谓“污蔑食堂、攻击食堂”的给予严厉打击。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小陈庄生产队长程中德曾编过顺口溜：“食堂食堂，经常没粮，小孩没吃，饿得叫娘。”因此将他定为右倾，撤销了队长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进行了多次批斗。

在这种形势下，县委还对时开时停的食堂，要求一村一堂地全面起伙。为了巩固食堂，采取了分户不支粮和收尽社员饭锅的“两头挤”的办法，做到不漏户，不漏人，农民全部到食堂去吃饭。为了显示“一大二公”，把食堂合并起来，越办越大，农民到食堂吃饭越来越远，吃一顿饭要跑好几里路，雨雪天苦不堪言。观堂公社沙土集850人一个食堂，锅小笼少，经常不能按时开饭，晚饭经常等到9点多钟。有

人编了打油诗："早饭等到日正南，午饭红日偏西山，晚饭等到更鸡叫，不知明日再多晚。"为此，在干部和教师中广泛排查，要找出编这首打油诗攻击食堂的"坏人"，最后没有查出结果。

农民为了生存，搞些野菜、树皮，但是，没有锅成了社员家庭的一大难题。有些生产队把锅部分还给社员，但一到粮食收获季节为防止吃青或上级检查时又把锅收回来。农民白天不支锅，把锅藏在柴草中或沉放在河边的水中，等到晚上再拿出来煮些野菜、树皮充饥。

靠反右倾恢复起来的食堂口粮标准很低，一般日均每人2两左右。大部分食堂两年没有吃油，更谈不上吃肉。有的食堂几个月没有盐。冬天不供应热水和开水。食堂缺柴也是一个普遍问题。解决缺柴的办法一是砍树，二是拆房。全县树木被砍达80%以上，全县房屋倒塌和被扒10万间以上。有的地方挖坟劈棺当柴烧。在田野劈棺后剩下片片白骨，令人胆寒。

1959年秋，县委副部长以上干部从县、人委机关食堂撤出，成立了县委小食堂。小食堂里吃细粮，一切副食品满足供应。县委主要负责人有时还另加小餐，公社党委书记来往也在小食堂用餐。在小食堂虽然凭票用餐，但粮油月月透支，透支的全都由县委财贸部解决。

公社食堂一般说来有明有暗。明的是公社机关食堂，按标准凭票用餐；暗的是可以多处饱食。如在小农场，火箭营（以武装民兵为主体的单位）、公社饭店、公社菜园等地方，采取多留粮、多供粮的办法，以满足一些领导人的需要。有的公社不仅暗吃饱食，还聚餐、饮酒。

在大队一级，先办食堂，后被统一撤销，大队干部到所在生产队食堂吃饭。多数干部是明餐不饱暗餐饱，东庄不饱西庄吃，千方百计地安排好自己和家属的生活。还有不少干部贪占粮食，以保证自己家属饱餐。个别作风恶劣的干部不顾农民死活，采取硬卡农民口粮、偷盗食堂粮食，除满足家属需要以外，还高价出售。在农民日均口粮二三两的时候，食堂的粮食被干部吃掉了三分之一左右。

干部不仅自己多吃多占，还把食堂当作摧残农民的工具。古城公社一名干部说："我就靠食堂的一把勺子一杆秤，想叫谁死谁就得死，想叫谁活谁就能活。"当时的食堂有"五多吃"、"八扣饭"。"五多吃"是：干部多吃，干部家属多吃，干部近亲多吃，炊事员多吃，上级检查人员多吃；"八扣饭"是：病事假扣饭，少干活扣饭，上工迟到扣饭，不服从领导扣饭，吵架闹不团结扣饭，对上级检查人员说实话的人扣饭，偷吃青苗的扣饭，偷庄稼的扣饭。五马公社李集大队社员段刘氏

因病不能干活，被扣饭，上吊自杀而死。城父公社宿庄生产队长宿某，除满足全家吃饱以外，还从食堂偷粮卖私馍，并利用馍饭诱奸妇女10人，全队饿死80多人。立得公社修刘大队乔园分支部书记乔某，扣饭致死农民11人。亳县农村流传着：

刮大风，

起大雾，

饿死社员留干部。

当时，也有一些好干部坚持与农民同甘共苦，不用手中的权力多吃多占，其中不少人饿死。五马公社罗庄大队陈楼生产队的苏如章等四名党员全部饿死。这个公社颜集大队有一位生产队长也死于饥饿。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 对食堂有所宽松。在冬季为分户取暖，县委规定：“经县委批准可采取食堂统一管理、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接到指示后，县委原打算分两批报地委批准以后实行分户做饭，但没等到报批，食堂就一哄而散。据11月底统计，全县4438个食堂，没有分的只有287个，全是小农场、敬老院等不宜分开的食堂。1961年4月26日，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号，文件宣称办不办食堂由农民自愿，在这之后共食堂才正式解散。

3、全县饿死20万人

饥饿使人口大量死亡。

当时农村流传民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的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1960年冬整风整社以后的若干年内，县委曾经研究过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梁志远见到过三组数字：

1961年3月17日，县委在亳县三级干部会上整风检查，在一份绝密材料中说：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4.4万人；

1979年阜阳行署计委、农林局编印的《解放以来30年（1949－1978）农业统计资料》，其中亳县1959和1960年两年全县农业人口减少了28824户，占原有户数的15.9%，150503人，占原有人口的21.1%；

1996年2月出版的《亳州市志》第75页刊载：1960年城乡总户数比1958年减少了29400户，总人口负增长9.6万人。

那么，究竟1959年和1960年农村非正常死亡人口有多少？梁先生用自己当年调查研究的材料作了分析。

1960年5月上旬，县委为了对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心中有数，让他安排一个中等大队人口死亡比例调查。他选了古城公社李8大队作为调查对象，并拟好分姓名、性别、年龄、成份、死亡时间五项内容的提纲，交县委生活检查组组长王心斋去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该大队原有3130人，1960年1月至5月8日，共死亡719人（不含外流死亡他乡的人数），占总人口的25.3%，同时还在继续死亡。回报后，县委认为，选点不准，死亡比例过大，要重新选点调查。

接着，由县委书记亲自选点，以十河公社十河大队为全县中等大队。梁志远派县生活检查组组长李运曾等人前往调查。调查结果是：从1960年1月1日到5月15日，共死亡909人（缺东关分支三个生产队，没查），占被调查村队原有人口的29.15%，同时还继续死亡。

这两个生产队如果加上1959年和1960年1月到12月底的死亡人数，总共死亡人口都占原有人口的30%以上。

1960年底，梁志远带领姚志远等，在双沟公社王阁大队调查了饥荒偏重的大王支庙等六个村庄。这里原有127户，575人，两年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的41.5%，其中死绝18户，占原有户数的13%，小李庄原有75人，死亡36人，占原有人口的48%，小许庄原有65人，死亡32人，占原有人口的49%。

更有甚者，1960年底，梁志远在五马公社泗合大队杨庄调查，原有68人，除4人外流未归外，全庄仅剩18人，两年死亡46人，占原有人数的70%以上。

1960年3月中旬，古城公社李腰小学课间休息时，两个十二三岁的学生坐靠在教室门前的墙根前死去。3月19日一次降雨，检查主要公路，发现19人饿死路旁。

梁志远根据以上调查判断，全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应当在20万人以上，有近3万户彻底毁灭。留下了一大批鳏寡孤独，仅观堂一个公社，就有孤儿400余人。有的孤儿被收养后饿死。十八里公社羊庙大队幼儿园收养11个孤儿，饿死10个。

据典型调查，1960年1－5月间，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贫农占本阶层的28.25%，中农占本阶层的12.5%，地主富农占本阶层的44%。

在地方上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也死于饥饿之中。例如，魏岗公社后孙湾生产队饿死了烈士的母亲孙＊氏，烈士的弟弟孙石头沦为孤儿。五马公社罗庄大队陈楼生产队苏如章，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复员时为营级军官，他女儿饿死后，他吃了女儿的尸体后也腹泻而死。五马公社草寺大队彭小庄，1960年3月饿死了归国华侨彭广胜夫妇，彭在饥饿无奈时曾给他旅居40年的法国友人去信，待友人回信时，彭已死数月。十九里公社明洼生产队知名人士李琴丹（清末秀才）饿死，李已编入1996年出版的《亳州市志》名人传略，但其死因则写为“病故”。

有的家庭死人不报，继续到食堂领饭，有的死人无法抬埋，留在家中。大杨公社许洼生产队，1960年3月有一农妇将其死去的丈夫和女儿用被子盖在床上5天，多领两人5天的稀饭，使她和另一个孩子没有饿死。

没有饿死的人饥饿无力，不能掩埋饿死的人。在路旁、田间、集镇街巷、食堂门口、学校教室，.....到处都可以看到尸体。1960年春，十河公社宋大大队薛竹园村因没有劳动力抬埋，就用一车多尸的办法把尸体拖往地里。双沟公社高范生产队，因无力挖坑，就把不少尸体投在田间的枯井里。1960年10月，梁志远在十八里公社集南杨庄的肿病“治疗点”上看到，浅埋在河坡上露头露脚的尸体就有7具。

由于饥不择食，全县因吃野草、蘑菇等中毒而死的人数以千计。五马公社丁双庙生产队高思曾家因吃臭大麻籽，一家五口全部死亡。1959和1960年，每当新粮接口季节，饥饿过度的农民因暴饮暴食而死亡也相当多。张集公社北曹大队早庄生产队， 1960年月5月15－24日10天之内，因暴食青麦、生麦，撑死10人。

4、饥饿之外再加摧残

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各级党委都闭眼不承认，还说是假象，是“西北风”，是“右倾势力的反攻”，不准返销粮食。1960年春人口大量死亡时，才开始返销粮食，但每人每天只有2两左右。农民不得不向外求救，而求救信被定为“反革命信件”，写信的人有的被捕入狱。

不让饥民外出讨饭。县、公社、大队遍设有“劝阻站”，阻止饥民外出逃荒。劝阻站星罗棋布，村头、路口、车站、码头，都有劝阻站的人站岗放哨，此外还有流动岗哨。劝阻人员对过往行人和企图外出农民

盘查、搜身、扣留、打骂、捆绑、关押。过往行人带有食物一律没收，连青菜也属查禁之列。

1960年春，立德公社修刘大队乔园分支书记乔某，在食堂以各种名义经常对社员扣饭，致使11人死亡。观堂公社观堂大队夏庄夏耿氏和古城公社油河大队梁景志，都是在因有病不能干活，在1960年春天被扣饭后上吊自杀死亡。

五马公社泗合大队四个村庄，大队副书记焦某不喜欢其中的一个30多口人的小村庄，对这个村庄的缺粮、饥饿、病死不闻不问。到1960年这个小村庄30多口人全部没有了，房子拆了，树砍光了，蒿草满庄，80亩地全部荒芜。

1960年初春，五马公社党委在罗庄大队召开扒茅草根（找代食品）现场会，为了不让参加会议的人看到罗庄大队的浮肿病人，就把这些病人集中驱赶到边远的荒野里，到会议结束时，数人冻饿而死。

农村基层干部对饥饿而“吃青”的农民或拿庄稼的农民进行逮捕、拘留、劳教，不少人死在狱中。个别地方对农民施行惨无人道的刑罚：对妇女打掉裤子不准穿，裤裆里装麦芒，系头发将人悬空吊在梁上，用铁丝穿耳朵.....

5、人吃人的惨状

梁志远在《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中记录了大量的人吃人的惨状。

该文称，在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这个严重问题是由少到多，到1960年4月达到顶峰。有时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在城郊、集镇、村头摆摊卖的熟猪肉中，有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引起腹泻而死亡；另一些人常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常吃等。

针对人吃人的情况，县政法部门也惩办了一批，先称“破尸案”，后按

上级指示，统称“特种案件”。这种处理是先严后宽，以后就不告不理，不了了之。这种案件能办不能说，对外只字不漏，对上汇报慎之又慎。稍有泄露，就大祸临头。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及此事的人也受到打击。因此，这些情况一直不为外人所知。梁志远在这篇文章中提供了一些案例。

县委亲自处理的第一起“破尸案”

1959年春，城关公社涡北派出所抓获了一起正在煮死小孩肉的盲流农民，遂将“犯人”和小孩肉送到县公安局。公安局当时不知如何处理。一位副局长向县委第一书记赵建华作了汇报（当时梁志远在场听了汇报），当即定为“破尸案”，并决定逮捕“犯人”。县委政法书记李庭芳亲自审讯后认为，“犯人”身体瘦弱，无政治目的。于是未经请示县委，发了两个馍，将“犯人”教育释放。县委知道后，李庭芳受到严厉批评。李又让公安局将“犯人”抓回，重新入狱。经过半个月的审讯，确定“犯人”没有政治目的，县委批准将其释放。本案到此终结，但办理案的派出所所长李玉贤，因向别人说过历史剧《打銮殿》中的剧词：“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批斗，并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两级，调出公安系统。李庭芳也被调去带民工到皖南修铁路，再没有回亳县工作。

饥饿残忍吃亲人

叔父吃侄女。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吃了其侄女的肉。1960年，其兄嫂死后，一个不满10岁的侄女被其收养，不久侄女饿死，被其吃掉。因吃人肉，精神紧张，患病多年。

儿子吃父亲。1960年5月25日，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孙振林（中共党员，县文化馆副馆长）等人汇报：在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检查，群众强烈反映农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被煮吃掉，并将一部分充当猪肉以每斤1.6元卖掉。由于当时政府对这类事采取回避态度，所以没加追究。

父母吃儿子。1960年3月28日，双沟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某，在小儿饿死后，被煮吃，吃后夫妻两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饿死五口，剩下两个孩子被送进大队孤儿园。

母亲生吃女儿肉。1960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口人已饿死3口的情况下，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

上啃掉几块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当检查人员任怀赞（大杨公社烟酒专卖主任）发现时，该人已全身浮肿，处于半昏迷状态，但知道要馍，要饭，要医，要药。生产队长朱本善把真实情况告诉检查人员，并说昨天刚把生吃的女儿埋在地里。

据张催粮回忆，1960年春，我家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全家4口人，饿死两口之后，身边只有一个瘦弱的女儿，她迫于饥饿，丧失理智，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之后精神失常，有时呼叫女儿的名字。

据市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他家在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社员王某的老婆（1922年生人）在1960春因饥饿打起了十来岁女儿的主意，将女儿打死煮吃。此人在90年代初还健在。

父亲杀吃亲生儿子。据大杨财政所离休干部、中共党员孙传玺回忆，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孙传玺妻子娘家的邻居），1960年将其亲生儿子小秃子打死煮吃，全家8口人先后死光。

据法院原秘书尚振华（离休干部）回忆，他所经办的案件中，有一个先吃小孩的惨案。案犯是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

梁志远的一个亲戚吃了死去的儿子，夫妇腹泻病危，其婶母说他们不该吃人肉。他说："情愿一顿吃饱死，不愿长饿活着生。"结果两夫妇死亡,全家7口人死去5口。

哥哥杀吃弟弟。据市技术监督局、中共党员、退休干部杨心宽回忆：1960年春，我在城父公社任组织部长，该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村，韩某（16岁），其父母死后，即与其弟韩四生活在一起。1960年3月，他因饥饿将其弟弟打死，头和脊背放在泥圈里，肉放在锅里煮时被干部发现了。经审问供认杀弟煮吃的事实。因未满18岁，公社党委作决定时我参加研究，将韩某抓送公社"火箭营"（一种强化劳动的组织）扣留关押，数月后在"火箭营"死亡。

据亳州市原书记李兴民回忆：我家原住亳县大杨公社郭万大队李老家，与前瞿庄石某家相距很近。石某家是一个18口人的家庭。1960年春，18口人饿死近一半的时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泻。除石有亮一个活着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

一些多户吃人的村庄

据古城公社沼北大队原副大队长、共产党员马占坤回忆：1960年春，该大队河西王村多户农民吃人肉。大队多次检查屡禁不止。王某的母亲屡教不改，被大队书记耿某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致死。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长、中共党员陆美（女，已离休）在1960年3月3日汇报：魏庄公社蒿庄村，全村40多户有25户吃人肉，严重时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下地扒死尸。社队都知道此事，认为无法制止就听之任之。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是一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他们吃人肉是半公开的。张某氏，用人肉加稀饭救活了近门的一个孤儿张催粮（即回忆本村张韩氏杀吃女儿的张催粮），张催粮现已年近半百，有时还谈论这方面的事。

埋不住的盲流尸体

1960年4月，梁志远去县劝阻站（县城到西北角、南京西路北）检查盲流人员的生活情况，站内医生杨文德说：“劝阻站盲流死亡人员被扒吃了不少。”随后，梁志远与杨医生一起去坟地看，确实有不少被扒的站盲流人员墓坑，地上烂衣狼藉，还看到一个未理发的中年男子的头。梁问杨医生：“公安人员怎么处理？”杨说：“我已向公安局反映过多次了，没人表态。”

一次批斗吃人肉者的大会

据立德教育办公室会计、中共党员李士远回忆：立德公社杨王大队李寨村，1960年春，吃人肉的越来越多。大队、生产队制止不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采取了抓典型召开群众大会批斗的办法。抓了一个多次吃人肉的老中农李某的老婆，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要求人人参加，不参加者食堂扣饭。几个干部在会上发言。指摘她“犯法”，“往政府脸上抹黑”等。还说：谁再这样（指吃人肉），就把谁关死在监狱里。批斗会后，吃人肉的就少了。

一场抢吃人肉的闹剧

据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1960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

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人肉的市场交易

1960年春，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人肉的市场交易也随之出现。城郊有，集镇有，农民摆摊设点和流动串乡卖人肉的也有。

1960年3月下旬，城父公社党委电话汇报：丁楼大队李楼生产队农民吕某，于3月17日至21日，共扒掘三具女尸，煮熟后充当猪肉，在菜桥闸工地摆摊出售。

1960年春，核桃林场王庙林区邢庄邢某，常以人肉充当猪肉串乡出卖，在当地广为人知。

1960年春，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任寨农民周某，以人肉煮熟充当猪肉在本村出卖，被县委农工部科长李延荣等人发现后令其埋掉，周某害怕追查，当即逃跑。

1960年春，五马公社黄营大队郭桥村，一个57岁的农民杀死本村13岁男孩连臣，当夜煮熟自己吃了一部分，第二天在村头路口当猪肉出卖。县公安局田朝珍等人侦破此案，将犯人逮捕，判处死刑，执行前死于狱中。

四、跳出三县看安徽

介绍了三个县的饥荒情况，再看一看安徽省当年的全貌。

安徽是毛泽东重视的地方，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到安徽视察，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当时领导人对共产主义的热衷。人民日报记者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对毛泽东活动的报道是要经过中央、甚至毛泽东本人审批以后才能发表的。这则报道是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等当时的思想状况的：

舒茶人民公社今年的农业和茶叶生产都有很大发展，今年的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7200万斤，平均亩产1600斤，比去年增加138%，每人平均有粮1900斤，比去年增加136%。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以后，已经实现了吃饭不要钱。毛主席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可以办到，其它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

可以不要钱了。"曾希圣同志告诉毛主席说，舒茶人民公社8600户现已养猪32000头，现在这个公社的食堂每星期每人可吃到半斤猪肉，将来全社计划养猪6万头，如果吃一半，卖一半，这样每人每天平均可以吃到四两猪肉。曾希圣同志说：这个公社的食堂目前还不供给蔬菜，由社员自带蔬菜吃，将来也是要供给蔬菜的。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指示说："人民公社将来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

毛泽东在这里谈到人民公社要实行供给制，吃饭、穿衣都不要钱。这对几辈子缺衣少食的农民来说，是多么大的鼓舞！基层干部认为自己要亲手建成共产主义，感到无比自豪。

人们急切地希望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急切地希望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将私有财产变为公有财产。既然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消灭私有制一定是正义之举。"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而率先反对"共产风"的干部就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被打了下去。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治淮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刘秀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反右倾使"五风"迅速蔓延。

1、"五风"是怎样摧残农民的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安徽省也不例外。

1958年的安徽可谓意气风发。

这一年安徽部分地区发生旱灾，《安徽日报》头版通栏标题是"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大话说得没边儿。1957年秋，淮北水利建设动工，按当时的能力，整个水利工程每年只能完成4亿方土，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40亿立方任务，基本解决淮北水旱灾害。开工以后，省委制定了一个冬春完成8亿方土的计划。据当时报纸报道，这个任务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过了一个月，第二个8亿方土的任务又完成了。1958年2月，省委又下达了第三个8亿方土的任务。为此，《安徽日报》发表了《八亿，八亿，再八亿》的文章。文章写道："上山可以擒猛虎，下海可以缚蛟龙。可以翻天覆地，可以移山倒海。一个、两个、三个8亿土方算得什么！"可见口气之大。

在这五风中，"共产风"处于灵魂地位。它是其它"四风"的出发点，也是其它"四风"的认识依据。

所谓有"共产风"，就是农村基层干部（其中主要是十八九岁到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干部）搞的一种群体性、强制性的行动，他们将私人和小

集体的财产无偿变为大集体的财产。当时的说法是“一平二调”，即从小集体和农民家庭中，无偿拿走各种财产（物资、资金、劳动力、土地、生活用品等），以满足兴办公共事业（如办公共食堂，办养老院，幼儿园、办学校，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大炼钢铁等）的需要。既然“一平二调”是为了兴办公共事业，又消灭了私有财产，因此，搞“一平二调”的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他们不仅不负疚，还有一种自豪感。

在安徽，共产风像其它各省一样，是从1958刮起来的。毛泽东在安徽讲供给制无疑会给这股风增加了动力。

1959年蚌埠大办土机床，没有原材料，就让社员将家里的门板、门框、板凳、甚至连棺材都拿去做机床架子。做出来的土机床全是废品。1960年春天，蚌埠市委提出，在郊区5个公社建立15个万头养猪场，每个大队建立一个千头养猪场，每个生产队建立一个百头养猪场，还要建立若干个养鸡场、养鸭场。为此，强迫社员交出自己家庭的猪羊鸡鸭，还强迫社员搬家拆房盖猪圈。结果，集中起来的猪羊鸡鸭大量死亡，有的被少数干部偷吃偷卖了。

和“共产风”相关的是“浮夸风”。浮夸风就是吹牛说假话成风。这种说假话的风气是强大的政治压力的产物，也与当时全社会的气氛有关。明眼人一看就会知道，《人民日报》关于毛泽东在安徽活动的报道，其中说的粮食产量和养猪数量显然是浮夸的。曾希圣明目张胆地向毛泽东说假话，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这种假话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对各地干部当然会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各地、县在省委的压力下，说假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1961年3月，蚌埠市委书记程光华代表市委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谈到浮夸风时说：“我市盲目赶风头的现象是很严重的，甚到为赶风头而造假。1958年，看到其它地方放了粮食高产‘卫星’，我们郊区也假造了一块‘卫星田’，将三亩半稻子移栽到6厘面积的稻田里，实际亩产只有200斤，却吹嘘为11000斤，并拍了照片，开了现场会，登了报纸。……我们提出‘人家有的我们要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组织干部翻阅种种报纸，寻找新鲜报道，并派出干部常年在外地取经，强调‘先进经验不过夜’，听到风就是雨，看到其它地方的新消息，不加分析，不问需要，就盲目跟着干起来，就造成了严重的浮夸风。”程光华的话反映了当时干部们的心态。

既然粮食产量这么高，征购任务也就相应地高了。而实际情况是，从1957年到1961年，粮食产量农年下降，征购任务逐年提高，农民口粮逐年减少。

表4-2 1957 - 1961年安徽粮食情况

项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	204.00	184.00	147.00	150.48	121.75
贸易粮	177.39	160.00	127.82	130.85	105.87
征购(亿斤)	68.42	58.47	57.09	35.06	25.68
销售(亿斤)	40.95	59.10	50.67	32.44	23.16
净拥有(亿斤)	149.92	160.63	121.40	128.23	103.35
总人口(万)	3356.00	3426.70	3445.50	3085.60	2987.70
人均净拥有(斤)	446.72	468.76	352.34	415.57	345.9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安徽》。

注：表中粮食产量为生产年度，购销为粮食年度。

表4-2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从人均净拥有量来看，人均口粮（贸易粮）：1957 - 1958年度，为312.7斤，1958 - 1959年度为312.7斤；1959 - 1960年度为246.64斤；1960 - 1961年度为291斤；1961年1962年度为242.1斤。这里是平均数，由于压农村、保城市，农民人均口粮比这个数少得多。再加上层层克扣，农民吃到口里就更少了。不过，虽然1961 - 1962年度数字最小，但这时曾希圣放开了政策（包产到户，三边地），农民实际掌握的粮食比前三年要多。

安徽的饥饿从1958年冬天就开始了，1959年春天已经很严重了。可悲的是，广大农民因饥饿濒于死亡，而从省委到中央还不相信农村没有粮食。1959年，《经济消息》第9期发表了安徽省的一篇文章，题为“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文章一开头就说：

安徽省委工作组最近对桐城县闹粮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材料表明，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安徽省委认为，桐城县的材料，可以代表全

省一般情况，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粮食工作。

这篇文章援引调查报告的材料说："所谓粮食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原来各农业社瞒产私分的现象非常普遍，且瞒产数字很大，花样也很多。有的生产队平均亩产1700斤，只报700斤，有的搞秘密仓库，一个生产队在一夹壁墙中藏粮3万斤，另一个生产队把五万四千斤粮食藏在稻草堆里；有的干部带头集体私分，有一个生产小队每户分粮200斤。"

文章列举了大量的"瞒产私分"的情况以后写道：

为什基层干部普遍瞒产和带头闹粮呢？据了解主要是公社化以后，由于宣传工作没做好，一些（不是一些，而是大多数，或者全体－－毛泽东注）基层干部和群众以为"成立公社以后一切都要归公"，再加上卖粮时采取了"小社卖粮，大社结帐"的办法，使小社到卖粮以后粮钱两空；某些公社又对增产的大队几次追加征购任务，使基层干部对统购不摸底，因此，思想上有几怕：一怕实行"三包"办法，由公社统一分配；二怕报实产量会追加征购任务；三怕春荒时公社在各队间调剂余缺；四怕自己报实产量而别人不报，自己队吃亏。这样，瞒产私分就成了普遍现象。至于吃糠，吃菜，叫喊没有粮食吃，只是一种以攻为守的办法，目的在于希望不再追加他们的征购任务。

文章接着讲，在做好宣传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以后，"不到一个星期，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停伙的食堂恢复了起来，原来吃糠吃菜的又变成了两干一稀，暗仓变成了明仓，干部群众闹粮变成了议论丰收，无精打采变成了兴高采烈，田野里又开始出现了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局面。"

毛泽东真是相信了这篇奇文中讲的情况。相信瞒产私分，相信农村粮食很多。他比一般干部高明的是，不是就事论事地反对"瞒产私分"，而是从所有制上找原因。1959年2月28日，他在这篇文章加了以下按语：

政策是对的，理由没有说清楚。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1958年如此，1959年及往后几年还是如此。要翻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制，需要多年时间，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逐步发展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

这篇文章，加上毛泽东的按语，转发全国。虽然对抑制"一大二

公”的“共产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使全国各地的高层干部对粮食形势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加强了全国各地对农民的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从而加剧了农村的饥饿。死人越来越多。

1960年安徽农村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我的一位老同事、现在和我同住在一座楼里的陈大斌，他的家乡在安徽淮北平原，他是这样描述当时他家乡情景的：

1960年，我正在邻省上大学。春节前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他再三告诫我："千万不要回家过年！"我想这太不近情理，可能家乡出了什么变故吧！可是，即使我从最坏处着想，也没想到会出现那种局面！

半年后我回到故乡，简直是被吓呆了！下了火车找不到回家的路，老路废了，挖了深坎横沟，长满荒草荆棘；而新路没有修通。深翻五尺的土地，留下一条条深沟，一道道土岭.....绿油油的故乡大平原被挖得遍体鳞伤，成了“人造丘陵”！

还没进村，远远地就看到了村里的塌屋和断墙，过去村里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匝匝的绿树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半人高的野蒿、荒草。许多屋子倒塌了，水井、池塘似乎移了位置......故乡的人呢？许多看着我长大的前辈们，甚至有一些同辈人，包括我的一些亲友在内，都在那年春天亡故了！我的奶奶饿死，母亲逃往准南，婶婶带着几个孩子逃往宁夏，父亲躲过这场大劫，吃草末树叶作下了胃病，几年后肠胃大出血亡故。可是，比起来，我家的灾难还算轻的，村里好些正是壮年、青年人都饿死了。有几户人家老老少少全部死绝。。..

夜间，我躺在没有一棵树木、院墙几乎倒尽的空空荡荡的院子里，呆呆地望着满天繁星和耿耿天河，村子里死一样的寂静，偶尔有什么声响，父亲告诉我，那是野狐子在蹿，人烟少了，野物白天也敢在村里乱跑……

这就是“大跃进”之后的农村，人口大量死亡，土地荒芜，村庄破败……

与群众大批因饥饿而死相对应的是，干部们却照样享乐。留下来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曾庆梅到蚌埠检查工作时，一到蚌埠就要跳舞，还以书记的名义让女演员连夜学跳舞陪伴。当时蚌埠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影响很坏。”曾庆梅是安徽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主管党纪的高官如此，其他官员就更放肆了。

“1960年安徽省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地委却抽了许多人去盖宾馆。中秋节时，街上饿死人，而地委、县委书记却在交际处大摆酒席，不是星期天也办舞会，找人去跳舞，吃夜宴。”

既然刮“共产风”的人们有一种“替天行道”的自豪感，那么，对于他认为阻碍这个伟大目标实现的人，进行无情打击，当然也是天经地义的。基层干部素质本来很差，有了这种为了共产主义而横扫一切的心态，什么极端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对共产风不满、或有与共产主义风格相反的行为，那就要遭殃了。

省监委书记曾庆梅1960年8月4日的一份报告反映了一个公社干部迫害农民的情况。萧县马井公社有专业组长以上的各级干部909人（公社一级34人，大队一级161人，生产队一级403人，专业组一级311人），据揭发的材料统计，犯有不同程度的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有368人，占干部总数的40.5%。其中，公社干部违法乱纪的占33%，大队干部违法乱纪占64%，生产队干部违法乱纪的占50.4%。违法乱纪的具体表现是：

捆绑、吊打、关押、体罚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全社被捆绑、吊打、关押的有1026人，占全社总人口的3.8%。打人的花样很多，打耳光，扭耳朵，让人自己打自己，让人互相打，带驴笼嘴，冷水浇头，等10多种。更加疯狂的是以下刑罚：活埋人。郝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保民今年春天埋过5个小孩，土埋齐腰深，社员苦苦哀求才扒出来。用针刺。范庄大队党支部书记胡念堂麦收前发现两个10多岁小孩在地里吃豌豆秧，因为这两个小孩太瘦，身上无肉，就用针刺耳朵。脱女人裤子。陈坡生产队队长吴某看到社员陈徐氏搓了几穗麦子偷放在裤腰里，吴即当众把陈徐氏的裤子撕掉，陈徐氏羞得当场投河，被救回家后晚上自缢身死。让社员吃屎。郝庄大队郝庄生产队社员郝明良在地里摘了几根豆角吃，支部书记硬逼他吃下一块牛屎，吃下去后还逼郝说“牛屎好吃，又香又甜”。

扒灶砸锅。不准社员在家生火做吃的。据不完全统计，仅生产队干部直接砸锅的就有151人，共砸锅234口。

扣饭。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全公社被扣饭的就有537户、1558人，其中因扣饭而饿死多人。有的还采用“一人犯错，全家扣饭”、“一户犯错，邻近四户都要受辩论”的连环保制度。社员朱宗道有病，多喝了一碗稀饭，当即扣饭10天，不到10天，朱宗道就死了。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萧县，几乎每个县都有类似情况。

农民在下面挨整与干部在上面挨整是并行不悖的。如前所述，因张恺帆而被牵连的人达两万八千多人。此外，还有大批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蚌埠为例，这个以交通枢纽为特征的城市，1958年10月，彻底清算罗霞光（市委第二书记）、王荣华、杜宏本、李世农、史坚、李斌、吴正等反党联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大批干部受到牵连。1959年11月，又揭发出以市长朱德兴等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这一次被批判的干部有236人。蚌埠共有1000多名干部受到批判斗争。1962年甄别时，这些被打下去的干部全被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和原级别。在“共产风”最为猛烈的时候，这种以打击不同意见为目标的政治运动，把“共产风”推向了极端。

2、捂盖子和揭盖子

安徽省的饥饿状况一直被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捂着盖子，既不向上面汇报，也不让下面说真话。毛泽东很相信他，还让他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到山东揭盖子。但安徽的盖子不能长期捂下去。严重的饥荒使大批人死亡，在外地工作的军人、学生、干部回安徽家乡探亲，发现乡亲大批饿死，不断有人向中央写信。但写信的人反而被迫害。在省委捂盖子的指导思想下，各级领导都封锁消息。

1960年3月13日，省委财贸部向省委了一份《关于当前粮食工作上的几个主要情况》，当时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作为主管粮食的部门财贸部的这个报告只字不提死人的情况，却对人民反映饥饿的来信百般曲解。请看：

从人民来信的数字看，今年一二月份比去年同期增加，1月收到182件，2月收到283件，计476件，比去年一二月增加187件。以阜阳、蚌埠最多。从已经检查的31件内容看（省查2件，地委查17件，县查12件）部分属实的8件，占26%，完全不实的23件，占74%，其中13件匿名信有12件是捏造的，是恶毒攻击的。例如，江西省军事医学科学院何承才（安徽人）来信说：金寨县关庙生产队政府不给一点粮食，群众生活问题很大，人口外流死亡很多。当即进行调查时发现，这个地方群众每月都能吃到35－40斤粮食，每天一干两稀，外有蔬菜，没有一个人因生活困难而外流或死亡。这封信及调查结果已转该学院。

一件匿名信说定远县沛河公社荒沛大队，从去年6月到现在光吃青菜和树皮，有的还吃死小孩，人口大批外流死亡。经查对结果，这个队从去年6月到8月，每人每天吃1斤小麦，9到12月吃1斤杂粮、4斤菜，今年1－5月每人安排12两原粮，另外还有蔬菜和代食品，也没有因生活问题外流和死亡。

朱升平来信说，凤台县清泉集附近有两个月吃不到粮食，有不少病人死了，有一个村就死了十几个人。又说，上河堤的只吃到6两粮，在家的还吃不到6两。经查结果是，清泉集附近的新庄、孟庄，老姚湖等村庄，每人每天吃粮6两、淀粉6两，加上干菜，合1斤以上。清泉集整个大队3个月来死了23人，是因老弱病而死的。

不知道是曾希圣的指导思想促使财贸部写出了这样的报告，还是这样的报告使曾希圣坚信没有饿死人，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认识。更大的可能性是，这种说假话的情况是上下互动的。

回乡探亲的人因反映真实情况大都受到迫害。1960年春节时，福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潘康，回到家乡凤阳小溪河公社新华大队，看到了南毛小队和石马大队大韩小队饥饿的惨状，他家里也死掉多人，到公社又见以缪坚为首的公社干部大吃大喝，极为不满，与缪坚进行了一次争吵，并且拿出自己的工资给小队买种子。潘回部队后，缪坚等发动大队、小队干部向福州空军连发三封检举信，说潘康"思想右倾"、"立场不稳"，回家"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缪坚亲自向福州空军写信，说潘康是"牛鬼蛇神"。福州空军第一次来调查，县里还编造假情况欺骗调查的人，福州空军第二次来调查，才得知这个小队饿死了66个人。但是，潘在部队还是受到不应有的处分。

1960年7月2日，蚌埠地委办公室转来一封信，这封信是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另一资料说他是凤阳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张少柏化名"石求名"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百分之五，一个死亡占百分之十五，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收集起来被大人遗弃的儿童有三四百人，死亡有一百名左右。"事后才知道，饿死的人这个数字还要多，但此信被定为"反动信件"由公安部门追查，对张少柏横加迫害。

一方对外面封锁消息，一方面在安徽制造假象欺骗从外面来安徽的人。董必武到安徽阜阳视察，安徽省事先作好准备，清理沿途死尸，把浮肿病号集中看管，不让董必武看到真实情况。1960年在新华社工作的外国专家休假，国内部副主任方实陪同外国专家去合肥游览。安徽省委安排他们去逍遥津公园等有限的地方。在外宾所到之处，完全布置了一派丰饶、富裕的景象：湖里有穿着漂亮的女子悠闲地划船唱歌，在路旁的小店里食品丰富。省委所划定了外宾活动的地方，不让老百姓进入，特意布置假象欺骗外宾。

由于捂盖子，民众饥饿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直到1961年秋后，饥饿还相当严重。地处交通枢纽的工业城市蚌埠一份报告称："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浮肿病有2330人，干瘦病141人，子宫脱垂2936人，闭经病2895人，小儿营养不良尤其突出。据卫生部门9月份对9个幼儿园、托儿所、五个居民段、二个铁路职工住宅点的调查，在3181名7岁以下儿童中，营养不良的就有1176人，占总数的36．9%。其中有328个儿童得了不能站、不能走的软骨病。

越是弄虚作假，死人就越来越多，情况也就越难封锁。反映安徽问题的信件有一部份送到了中央。1960年4月，中央监委派审查处处长刘力生和信访科长张珉去安徽潜山了解群众生活情况。8月，中央监委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解群众生活情况。11月，中央监委派李海去安徽阜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情况。这几次调查得到了一些真实情况，但由于从上到下封锁，他们没有得到安徽的全面情况。12月，中央根据中央监委反映的情况，派以中央监委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工作组去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参加工作组的有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监委、共青团中央、和农业部等部门的干部。不久，安徽省委书记、省监委书记曾庆梅和蚌埠地委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真相，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说工作组听信坏人的话。工作组被撤回。

1960年12月28日到1961年1月3日，王从吾主持中央监委会议，听取派往安徽工作组的汇报。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安庆地区群众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发生原因，以及有关当地领导封锁消息的情况。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安徽省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反映情况不实。

由于安徽省委不让人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的活动，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因此，在这次中央工作组汇报工作之前，王从吾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作了汇报。接着，谭震林、柯庆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批评了他们，把张少柏（署名“石求名”）的检举材料向他们谈了，他们表示认错。

1961年1月3日，王从吾在中央监委会常委会上说：昨天，我与曾庆梅、单敬之同志谈话，指出：第一，你们回去以后，一定彻底揭开盖子；第二封锁消息不对，单敬之也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央监委；第三，对张少柏应给予表扬，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老实话，是好同志，你们要保证对他不打击报复；第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反映真实情况，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曾庆梅说，他完全同意检查组的意见，他们准备检查处理。扣压人民来信问题他们有责任，向中央写信反映检查组的问题是错误的。

1961年4、5月间，中央监委又派农村处处长李坚、张珉等人去安徽

进一步调查。李坚等先不到合肥，而直接到下面了解情况，他们得知蚌埠15个县、阜阳8个县、肥东、肥西宣城等28个县大量饿死人情况。蚌埠监委书记邓衍才告诉他们，蚌埠地区15个县就饿死了100万人。李坚等又到凤阳、定远，得知更多的情况才回到省里。他把省监委的人集中起来，要求他们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省委怕从监委打开缺口，对监委施加压力。曾希圣看到李坚的调查材料，拍桌子骂："他们在安徽搞特务活动！"老红军翁可业（省监委副书记）调查了蚌埠15个县，曾把调查情况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置之不理。翁可业把调查汇报的底稿交给了李坚。李坚向王从吾作了《安徽省肿病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称，安徽饿死了300万人。王从吾将这个材料以调查组李坚的名义送给了中央书记处。面对血淋淋的事实，曾希圣辩解说，是下面向他封锁情况。中央监委王从吾拿出翁可业给省委的报告底稿，对曾希圣说，已经有人向你们报告了，怎能说下面封锁你们？曾希圣才无话可说。

安徽的盖子迟迟没有揭开，所以饿死的人很多。直到1962年1月7000人大会上，才彻底揭发了安徽的问题，中央批评了曾希圣的错误，曾希圣作了检讨。

2001年春，83岁的李坚对本书作者说：盖子揭开得早，死人就少一些，安徽盖子揭得晚，死人就多，四川盖子一直没有揭开，死人就更多了。

3、欺骗肚皮

在粮食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安徽省各地采取了欺骗肚子法。一种办法是让同样的粮食多出饭，营养价值降低了，但肚子可以显得更饱。

改进做饭的办法，同量的粮食多出饭。粮食严重不足，不少食堂创造了"先进的"做饭方法，1960年1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节约粮食领导小组发文推广。文件说："这些先进的方法大大提高了出饭率，最高达到一斤米出饭8斤，山芋干出饭达四斤四两，都较原来的出饭率提高了二三倍。"对此事"必须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教育，对各种右倾思想应给予坚决的反对和批判"。这个文件介绍的方法如下：

净米饭先进制作方法：

高温双蒸法。每碗放米1.25两，再兑入开水5两，然后将碗放入盛有开水的锅内，用大火蒸到九成熟时，再兑入开水4两复蒸，前后约60分钟即成。每斤米可出饭8斤。

一炒三蒸法。先将米入锅炒10分钟，再用开水浸泡10分钟，泡透后再将水除去，入锅干蒸20分钟，再盛出摊凉后加水（每斤米放4斤7两水）复蒸10分钟后，再盛出凉干（10分钟），最后加水再蒸。每斤米可出6斤饭。

浸泡双蒸法。先把米用开水浸泡半小时，连同盛米器具放入盛有开水的锅内蒸，半小时后拿出摊凉（约10分钟），每斤米再加水4斤6两，再蒸40分钟，每斤米可出饭6斤2两。

双蒸法。每碗放米1.25两，参水6.6两，放在开水锅内蒸煮，30分钟后每碗再加水2.5两，复蒸20分钟后，每斤米可出饭7斤半。

泡米复蒸法。先把米用水泡10分钟，水除去摊凉以后，将米放入锅内蒸20分钟，再拿出摊凉并再进行复蒸即成。每斤米可出饭6斤半。

蒸煮法。先用热水将米浸泡20分钟后，入锅煮，到米涨开时捞出复用笼蒸，每斤米可出饭5斤4两。

干、湿双蒸法。将米干蒸后，以1.7两米兑2.6两水的比例，加水复蒸，每斤米可出饭5斤6两。

山芋丁饭先进制作方法：

双泡双蒸法。先将山芋丁用水泡2小时再蒸，蒸后1小时取出，用凉水浸泡后，再放入笼内兑水复蒸，每斤可出饭4斤4两。

浸软复蒸法。先用温水洗淘山芋干，待浸软后，入锅干蒸，蒸熟取出摊凉，10分钟后再加水（每斤山芋加水1斤1两）复蒸，一个半小时后成饭，一斤山芋丁可出饭4斤4两。

山芋面饭先进制作方法：

炒烫法。先将山芋面干炒，炒后用开水烫，山芋面凉透后用水拌合，制成馒头，入笼蒸后，每斤山芋面可出饭4斤4两。

发酵蒸馍法。将山芋面进行发酵，制成山芋面包，一斤山芋面可蒸出馒头3斤。

小苏打拌制法。用混合面做饭时，先用水烫一烫后加小苏打拌合，做出馒头蒸熟。每斤可出山芋馒头4斤。

豆粉面制饭法。先将豆粉面炒熟，冷凉，用开水烫后，用温水拌合制

成馒头蒸出，每斤面可出馒头4斤4两。

很明显，上述“先进”制作方法，并不能真正能增加食品的量，只是吸水多一些，膨胀得厉害些，而且反复蒸煮，破坏了营养。农民说，这是“欺骗肚皮的”的办法，但是，只要把肚皮装得满一些，农民还是愿意接受的。这种量不增多、营养下降，而显得很多的食品，今天可以作为减肥食品。因为它可以满足生理感官的需要，而不增加营养。

大力寻找代食品。上述“先进”的制作方法，还是需要粮食（包括山芋）的，到后来粮食完全没有了，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只好发动群众寻找代食品。大搞代食品是中共中央的号召，当时的各级党报也大力宣传某些代食品的营养如何丰富。

1960年，安徽省全省各地都大量采集代食品。以蚌埠为例，1960年11月29日，市委第一书记程光华在全市小秋收会议上作了《全民动手，大办代食品》的专题报告。他指出，“搞好以代食品为中心的小秋收运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过好生活搞好生产的一个关键性措施，我们必须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把大搞代食品的小秋收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961年3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以发出了《中共蚌埠市委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共蚌埠市委文件　[61]52号），文件一开头就指出，“自今年春季以来，我市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采集野菜的高潮。”报告进一步强调野菜的好处，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抓住清明前后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掀起一个采集野菜的新高潮。

1960年11月29日，蚌埠市委第一书记程光华在发动群众采集代食品的报告中，列出了以下代食品的营养价值：

表4-3 一些代食品的营养价值

品种（公斤） 蛋白质（克） 脂肪（克） 碳水化合物（克） 热量（卡）

玉米芯（粗粉）66 25 68 812

红芋叶（粗粉）185 58 128 1900

红芋藤（粗粉）168 59 116 1785

红芋茆（粗粉）90 70 113 2273

黄豆荚（粗粉）100 47 113 1356

榆树叶（干粉）185 47 101 1663

桑树叶（干粉）163 92 40 1853

化生桔（粗粉）122 32 91 1221

红芋叶（淀粉）92 66 294 2260

红芋藤（淀粉）101 49 470 2727

黄豆荚（淀粉）103 27 394 2227

资料来源：程光华：《全民动手，大办代食品》，1960年11月29日。

上述的代食品是与庄稼有关的，或一般荒年吃的榆树叶、桑树叶之类。几个月之后，这些代食品吃光了，就把一般荒年不吃的野草当代食品了。1961年3月26日，中共蚌埠市委发出的《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中，列出了这些代食品的营养。

表4-4 每1市斤各种代食品的营养成份

代食品名称 脂肪（克） 蛋白质（克） 糖分（克） 热量（卡）

地豆子 3.75 27.9 32.4 275

猪牙菜 1.5 17.9 2.5 95.5

荠菜 0.5 36 35 288.5

香荠菜 1.5 24.9 22.5 203

豆瓣菜 1.75 23.8 19.6 180

芙莉苗根 1.25 12.4 95.7 443.5

拉拉藤 1 21.9 24.6 195

野辣菜 4.25 18.6 17.9 157

蒿兰菜 1.75 18 27.3 197

草鞋底 1 20.6 16 155

双叶苗 2 23.2 35.5 253

剪子股 2.45 22.6 13.9 168

面条菜 1.15 25.7 19.5 191

羊蹄棵 0.2 31.1 20.7 209

资料来源：中共蚌埠市委：《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1961年3月26日。

蚌埠市留下来的上述两个文件中，都提到一个月有数十万人次上山、下田采集代食品。然而，野菜、树皮也是有限的。不出多久，树皮没有了，野菜也没有了，代食品也很难采集了，人们只好坐以待毙了。

我在凤阳看到一份文件：《中共凤阳县委通知（1960.10.1）》，粮菜混吃，是节约粮食、保证吃饱吃好的一个重要方法，在大抓蔬菜生产、大种萝卜的同时，还应大搞各种代食品，以弥补当前蔬菜之不足。每亩约计可采集豆叶100－150斤。采后用水煮八成熟，手揉、挤出绿水，变成豆叶块，煎、炒、熬菜或兑粮食做饭都可以。

四、“救命田”救了农民

挽救危局最有效的办法是从共产主义倒退回来。1958年各地搞“一大二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乐观其成的。“一大二公”引起的“五风”造成了很大破坏，中共中央才被迫退回来，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是指公社、大队、生产队，即人民公社的财产由这三级共同所有，而生产队是基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对遏制“共产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还没有改变“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咚呼隆，出勤不出力，记的一样工”的状况。生产仍然上不去。

安徽的责任田酝酿于1960年秋，试点于1960年底，形成于1961年春，结束于1962年底。对于安徽的责任田，毛泽东态度暧昧，他前后四次表态值得玩味。

1960年8月28日，曾希圣提出了在生产队下划份三个组，分别包产：一组包口粮，一组包饲料，一组包商品粮。10月，他进一步提出：“生产队下面均设生产组，避免生产大呼隆。”这年10月，曾希圣接替舒同，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1月，安徽省委贯彻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批示信》，曾希圣从山东赶回安徽，在

会上他强调："我们是三级半所有制，小组是半级所有，以加强生产责任制。包产仍实行双包制，小队向大队包产，小组向小队包产。"此后，这个办法在安徽省得到全面推广。但以生产小组为单位还是没改变"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的问题，只不过是"大锅"变得小了一点。

1961年元旦后不久，安徽省委派副省长张祚荫和郑锐到山东向曾希圣汇报情况。曾希圣听完汇报后向他们讲了几件事：第一，关于恢复农村经济问题，他说可以走包产到户的路子，并说已给黄岩同志打过电话，请他亲自去金寨县搞包产到户的试点。第二，已经向毛主席请示，农村食堂制度不成功，要取消，让社员一家一户自己做饭吃。第三，安徽也出了大问题，主要责任在他，他向毛主席请示，拟不再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回安徽纠正自己的错误，把安徽生产搞起来。

看来，曾希圣深知安徽问题的严重，他捂盖子的目的是想在外界知道安徽问题之前，自己把问题先解决掉，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包产到户。

1961年2月，曾希圣从山东卸职回安徽，路经蚌埠时，在此地驻点的省委常委张祚荫向他谈了一件事：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73岁的农民刘庆兰带着有肺病的儿子上山开荒，没有牛，没有犁，只靠一把锹，第二年收了粮食3300斤，除了口粮种子外，还卖给国家1800斤粮食，向公社交了60元钱。可见，包产到户不仅是农民的要求，而且的确能解决问题。

一回到合肥，他就提出"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办法。"劳动底分"就是每个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如成年男子每天底分是10分，妇女为6分，少年为5分，是事先评出来的。按底分包地就是按劳动能力包地。这样，就把土地分包给劳动力了，只要上交承包的粮食就行了。曾希圣强调，这不是单干，因为土地和大型农具还是公有，包产得到的粮食还是统一分配（超产的归自己）。他强调"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超产部分归自己），大农活和技术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尽管开始推广，但干部还是有顾虑，怕说是分田。1961年3月15日和16日，在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上，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个作法。毛泽东回答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好事。"曾希圣立即叫秘书把毛主席的话电告诉省委，并说：已经通天了，可以搞。这样，安徽就全省搞起责任田来了。正在全面推广的时候，在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又让柯庆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由于看到毛泽东态度和上次表态有所不同，3月20日，曾希圣又给毛泽东、刘

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写了一封信，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责任田的作法和积极作用，也指出了这个办法的缺陷。信中说"我们的做法，并不是单纯接受部分群众的要求，而不顾可能发生的危险；而是吸取它的好处，又规定办法防止它的坏处。"毛泽东看信后没有表态。3月28日，曾希圣回到合肥，当晚召开省委常委会，简要传达广州会议，说："这个办法（指责任田），现在看来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能够增产，我们就今年试验一年，如果实践证明是好的就继续搞，如果证明不好，就不搞了。"为了减少搞包产到户的阻力和猜疑，1961年4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安徽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中说："我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的办法是从3月6日开始的，到3月20日接到希圣同志由广州发来的电话后即行停止。总计个省试行这个办法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39.2%。"这里说的广州来电后"即行停止"应当是一种谨慎的试探。因为毛泽东在广州说了"如果证明不好，就不搞了。"实际上此时并没有停止。为了消除中央的疑虑，这个报告对外面的批评作了解释："在试行中，有些地方由于宣传工作做得不深不透，以致有少数群众把这个办法误解为包产到户，甚到误解为分田，也有的希望多吃超产粮，故意把它说成包产到户写信给工厂做工和给部队服役的亲属回家生产。实际上，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这和六十条中所说的'实行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1961年7月，曾希圣又一次在蚌埠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曾希圣立即向省委常委和地市委书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部署继续推广责任田。到10月中旬推广面达84.4%。

责任田的效果很好。全省大部分地区一年就消灭了荒地（1959 - 1960年，因人口大量死亡土地也大量抛荒）。牲畜农具很快增加（1958 - 1960年农具大量破坏，牲畜大量死亡）。1961年10月份36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的36个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比上一年增产38.9%。粮食多了起来，交了公粮以后基本能够吃饱。因此，农民称责任田为"救命田"。为了吃饱，第一年种的主要是红薯。当时不少河南人到淮北来捡地里没挖净的红薯。

在形势刚有好转的时候，毛泽东对责任田的态度发生了变。1961年12月，毛泽东在江苏无锡把曾希圣找去，用商量的口吻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回答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还让群众搞一段时间。"当时毛泽东没有表态。1962年继续推行责任田。但是，为了怕人家说责任田是资本主义，就再三强调"五统一"。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7000人大会）。大会结束后，中央留下安徽省的代表揭盖子。和吴芝圃、舒同不同的是，曾希圣不仅要为安徽省大量饿死人承担责任（在这方面还有他压制民主的霸道作风，毛泽东讲不要走“霸王别姬”的路就是说曾希圣的），更要为责任田承担责任。责任田虽然经过毛泽东的首肯，但毕竟和共产主义不是一个方向。中央当时的说法是，责任田没有经过试验就全面推广。中共中央改组了安徽省委，派李葆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曾希圣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老百姓恨他，因为他领导下的安徽饿死几百万人；百姓怀念他，是因为他搞了救命田。而党内的正统派，却对他的救命田抓住不放，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他是湖南资兴人，1904年生，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他参与创建中央军委二局（即军事情报局），并担任首任局长。由于二局提供的大量的准确的军事情报，对粉碎国民党对江西苏区的几次围剿和以后的长征中摆脱国民党的追击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时，他执行左的政策，给安徽造成了严重后果，又到山东反左，揭开了山东的盖子。1965年8月，中共中央调他到西南局任职，不久就“文革”爆发，他在四川被揪斗。后来人们对他印象最深的不是传奇性的军情工作，而是责任田。1968年7月15日逝世。

中央的态度很明确，责任田要改变。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对李葆华说，责任田是走回头路。回合肥以后，李葆华在安徽省书记处会议上说：“现在看，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安徽的责任田，一种是中央的十二条、六十条，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践证明，按中央的办法做不会走回头路，按责任田的办法做要走回头路，而且后果很坏，会把农民引向单干道路，发展下去会两极分化，出现高利贷。”1962年3月20日，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会上通过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责任田与中央的六十条背道而驰，它引导农民走向单干，其结果是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方向上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地把它改正过来。

在改正责任田的过程中遇到很大阻力，也出现了争论。一些了解基层情况的干部上书毛泽东和省委，主张继续搞责任田。这样的干部不仅安徽有，中央也有。1962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并书记处诸同志，表示支持责任田。同年7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派人到安徽符离集调查，写出了《关于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调查报告》，肯定了责任田的好处，主张对责任田“不能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调查报告时，邓子

恢直言指出，生产责任制好，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可以在农村普遍推广。不久，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又一次推荐这个调查报告，因而招来了严厉的批评。但是，邓子恢还重申："对责任田，我现在还这样看。"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连同邓子恢的职务，一起被撤消了。这个会议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安徽省的责任田被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而受到批判。

1962年底，安徽省分三片举办了有区社干部1万多人参加的改正责任田训练班，结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成工作队，大张旗鼓地到农村强制改正责任田。省委要求"1963年春耕以前改正一些生产队，其余部分在1964年春耕以前改正过来。"不过，很多地方采取明改暗不改的办法，延长责任田的实行时间。中共中央将《安徽省委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转发全党，以期推动全国各地改正"责任田"的工作。这个文件介绍了改正责任田的进度，列举了"责任田"的五大危害。

在批判"单干风"时，一大批干部受到批判。随着"四清"、"文革"，这种批判变本加厉、日益升级。全省从上到下有几十万人因责任田的牵连受到了批判斗争。

15年以后的1978年，安徽省又在全国率先搞起了责任田，最后在全国普遍推广。

五、安徽饿死多少人？

三年大饥荒期间安徽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本书作者据《中国人口.安徽分册》的数据计算结果，为226.28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为243.06万人。（见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这本书的基本数据来处官方，显然是缩小了的。这里我再按1989年《安徽统计年鉴》计算，结果是，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24.67万人；少出生人数为241.17万人。计算过程如下：

表4-5 安徽人口统计资料

单位：万人；出生率、死亡率：‰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总人口 3201 3243 3337 3394 3426 3043 2988 3234 3232 3181

平均人口 3366 3410 3235 3016 3111

出生率 27.7 33.2 29.7 23.8 19.9 11.4 12.3 53.3 50.7 39.9

死亡率 11.8 14.3 9.1 12.3 16.7 68.6 8.1 8.2 7.9 8.6

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1989年，第40页，41页。

正常死亡率＝
[（11.8＋14.3＋9.1）/3＋(7.9＋7.2＋7.1)/3]/2＝9.55(‰)

非正常死亡人数：

1958年：3366＊（12.3－9.55）‰＝9.26（万人）

1959年：3410＊（16.7－9.55）‰＝24.38（万人）

1960年：3235＊（68.6－9.55）‰＝191.03（万人）

1961年实际死亡率低于正常死亡率。可以说没有饿死人。

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24.67万人。

正常出生率＝
[(27.7＋33.2＋29.7)/3＋(39.9＋41.8＋41.1)/3]/2＝35.55(‰)

1958年：3366＊（35.55－23.8）‰＝39.55（万人）

1959年：3410＊（35.55－19.9）‰＝53.37（万人）

1960年：3235＊（35.55－11.4）‰＝78.13（万人）

1961年：3016＊（35.55－12.3）‰＝70.12（万人）

4年少出生人数为241.17万人。

《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一书中出生率和死亡率和《安徽统计年鉴》数据一样，但历年总人口数略高于《安徽统计年鉴》，所以用《中国人口.安徽分册》的数据计算出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略高于用《安徽统计年鉴》计算的结果。由于这两本书的数据都是官方公布的，缩小了饥荒严重程度。

安徽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1961年5月，中央监委调组李坚写了一份

报告：《安徽省肿病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称，安徽饿死了300万人。2001年春，李坚向本书作者说，“文革”中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被打成叛徒被打成叛徒下放到安徽，在安徽几年他作了一些调查，回北京后告诉李坚，安徽饿死人数不是300万，而是500万。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年到1961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0．6万，占饥荒前人口总数的18．3%。

当年在公安部三局（管人口统计）工作的人口学家王维志，据各省上报的数字分析，1960年这一年安徽省死亡率超过100‰县有11个：肥东县124.89‰，巢县101.23‰，宿县144.32‰，凤阳136.04‰，定远118.45‰，五河116.70‰，阜阳125.57‰，太和174.79‰，亳县162.38‰，宣城163.10‰，无为182.30‰。这些数字是官方上报的，从梁志远的亳县调查就可以证明，显然是缩小了的，但比后来出版的《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一书中的死亡率要高一些。如果考虑三年的情况，总的死亡率超过15%是没有问题的。安子文说的500万，占当时全省总人口15%左右。综上分析，从1958年冬到1962年春，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应在500万到600万之间。

户籍管理部门的分县市死亡人口统计显示，仅1960年一年，安徽省就有192万人非正常死亡。死亡率最高的是太和、无为、宣城、亳县、宿县、凤阳、阜阳、肥东、五河、宿松、濉溪、灵壁、涡阳、全椒等县。安徽各县死亡率高低不同，是年全省非正常死亡分布见图4-1。

第五章 粮仓里的饿号

吉林省位于中国东北中部，全省有耕地面积6083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1%，另有可垦面积432万亩。吉林地多人少，当时全省900万人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占有耕地6.76亩，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是中国的重要商品粮基地。从历史资料看，大跃进年代的吉林省委领导人不走极端，不赶浪头，在毛泽东面前有时还敢讲一点真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号称“中国的粮仓”的省份，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不过， 与内地其它省份相比，吉林的饥荒要轻得多。

一、沉重的征购任务

吉林是产粮大省，征购任务重。1957 - 1958粮食年度，由于粮食征购任务偏重，1958年春天，全省一些地方就出现了粮食紧张的情况。在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群众叫喊缺粮，找乡社干部要粮请愿。有的地方发生群众抢购副食品，个别地区还发生了群众抢粮分粮事件。长春市南关、二道河子两个区，每天有二三百人，最多达四百人，半夜就到豆腐房门前排队抢购豆腐渣。双城县群众夜里11点就开始排队抢购煎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1957年布置征购任务之后，省检察院就积极配合。1957年10月，省检察院就指示全省各级检察院，注意及时打击破坏粮食征购和粮食政策的违法犯罪分子。1958年1月9日，又与省法院、监察厅联合召开了专署及重点县的三长会议，会后公安、法院、监察等部门，密切配合征购粮食工作队。1958年1月29日和23日，分别召集的24个县检察长汇报。据汇报材料，各地共处理了427件粮食犯罪案件。除了公安机关逮捕的96件和法院决定逮捕的52件以外，检察院侦察处理了279件。其中套购粮食56件，粮食投机倒把的50件，抗交公粮拒售余粮的51件，贪污盗窃粮食的43件，密打私分粮食的71件，其它8件。追缴回粮食481.1多万斤。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仅公主岭地区7个县、市的统计，从1957年9月到1958年1月初止，检察院、法院、监察厅三家共侦破破坏粮食政策案件189起，其中属于套购、抢购进行投机倒把的8起，隐瞒产量私分粮食的130起，抗缴征购的19起，盗窃粮食的2起。使国家粮食损失73.94万斤。这些“犯罪”，实际上是农民为保卫自己利益的一种自发的斗争。这些案件的处理中包含着农民多少血和泪！

表5-1 1957 - 1961年吉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86.00 105.00 108.00 80.00 88．00

贸易粮 74.78 91.30 93.91 69.57 76.52

征购 29.58 49.61 51.77 44.56 38.61

销售 26.27 32.34 33.36 35．32 30．61

净拥有 71.47 74.03 75.50 60.33 68.52

总人口（万人）1248.1 1280.9 1313.0 1397.1 1414.3

人均净拥有（斤）572.63 577.95 575.02 431.82 484.48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吉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以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向毛泽东叫苦：粮产量的增长远远赶不上征购任务的增长。与1957年比较，全省1958年－1960年平均分配产量增长15.8%，纯征购任务增长了75.6%；在分配产量中，征购的比重由28.2%增长到51.8%；留粮比重由71.8%下降到48.2%。特别是大豆种植面积多、商品粮比重大的粮豆产区，由于大豆没有单独定产定购，每遇歉收减产，即须以粗粮抵交大豆任务，更加挤了群众的口粮。

“分配产量”是上级分配的产量任务，实际产量的增长达不到增长15.8%的幅度。吴德算的这笔账和粮食部的账略有差别。

有些地方，粮食产量下降，征购任务却大幅度增加。例如，怀德县1960年的粮食产量比1953年减少了38.3%，但征购任务还高于1953年。1953年征购粮占总产量的41.69%，1958年和1959年约占80%，1960年占67.46%。

在这个粮食大省，省委领导人每年却为粮食发愁。1959年6月9日，中共吉林省委以特急件向中共中央送交了《关于当前粮食情况的报告》。报告说：

1958－1959粮食年度，吉林省征购入库（贸易粮）49.27亿斤，城乡销售预计32亿斤，到1959年5月底已实销28.68亿斤。纯调出计划16.8亿斤（到5月末已调出15.2亿斤），军需供应8900万斤，粮食损耗4000万斤。这样，预计6月末库存为4.9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8200万斤。

从1959年7月到接上新粮前（主要城市到11月15日，县城到10月底，农村到9月20日），城乡销售最低需要11.35亿斤，其中，城镇需要销售7.63亿斤，农村非农业人口缺粮供应3.44亿斤，军需供应2800万斤。这样安排，收支相抵，赤字为6.36亿斤，再加上最低库存2.5亿

斤，共差8.86亿斤。

尽管农民口粮不够，但国家的征购任务还是必须完成。由于征购任务太重，逼得农民自杀事件多有发生。为此，1960年2月20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政策，彻底杜绝自杀现象的通报》，通报说，“全省自征购粮食以来，自杀事件已达43起。”自杀事件的发生是因为“错误地采取所谓‘追、逼、压、扣’等强迫命令的办法，甚至到群众家里翻箱倒柜”。

不降低征购任务，只讲征购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下一个年度的征购任务还是减不下来。

为了保证征购任务的完成，1960年10月31日，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分管粮食的省财贸书记栗又文向大家交了全省粮食供求紧张的“底”，要求各级干部“进一步认识到粮食工作的艰巨性和支援全国、支援灾区的重大意义”，强调“根据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我们必须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支援全国，支援灾区，同时还必须安排好人民生活。”提出粮食工作的“五条方针”：低标准，瓜菜代，办好食堂，管好粮食，劳逸结合。

农民口粮低，国家的征购任务也很难完成，到了11月12日，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248万吨的28.64%。11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送上《关于粮食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先向上级算了细账：1960-1961粮食年度，全省粮食估产550万吨，扣除25万吨（自留地、啃青），按525万吨进行分配。国家征购任务248万吨，拿走了总产量的47.2%。农民口粮147.2万吨原粮，平均每人320斤。这对吉林省这个粮产区来说，口粮标准是很低的。这还不包括几十万山东移民。算账以后如实地讲了困难：“我省每年春粮食向外调，到六月以后，就需要从外省向省内调，由于调拨不及时，每年三季度城乡供应非常紧张。特别是近几年来，省内粮食库存逐年减少。1956年六月底库存为69万吨，1957年为52万吨，1958年为31.3万吨，1959年为38.7万吨，1960年为27.4万吨，今年库存更难增加，这样就更加难以周转。希望能在上交任务中，给我省留下15 - 20万吨，作为明年三季度的周转库存。”上级是否同意他们有要求，没有看到有关资料，但是，他们敢于向上讲困难，和四川、河南和贵州等省的领导人相比，还算不错的。一方面向上级叫困难，另一方面还得抓紧完成征购任务。11月18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接着又抽调3万多名干部深入农村，大抓粮食征购和生活安排，到11月25日统计，就完成了征购任务的74.32%。吴德还要求不能松劲，进一步完成征购任务。到1961年1月底，完成了征购任务的96%，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表示：“征购已经宣布结束……大量入库已无可能。”征购任务结束

以后，“只给农民留下口粮7.8亿斤，今后8个月，每人平均只有85斤。...不少地区把一部分口粮交了征购粮，有的地区还交了一些饲料粮。目前各地已提出要求返销粮达7亿斤.......各地上报目前就没有粮食的已达219万人，占农村人口的23.8%；到七月末缺粮人口473万人，占农村人口54.1%......由于口粮紧，目前人的体力开始减弱，患浮肿病人数，据去年12月末统计有两万人左右，现在还在继续发展中。饲料不足，牲畜死亡增加。”

到了1961－1962年度，粮食征购更加困难。这一年度的征购任务减少到220万吨，到了11月底，完成了征购任务的80.4%。到1962年2月15日，征购粮食共入库201.1万吨，就宣布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实际上征购粮入库还在进行，到2月底征购入库为202.5万吨）。征购任务完成后，农村人口集体分配口粮每人平均235斤。其中各地很不平衡。集体分配口粮300斤以上的占农村人口的33.6%；200－300斤的占28.2%；100－200斤的占24.2%；不足100斤的占12.6%；没有分配口粮的占1.3%。从2月15日到接上新粮（9月20日）还有7个月零5天，以200斤口粮计算，平均每天只有口粮9两，还算过得去。如果不足100斤，每天口粮就不到4两6钱，饥饿就很严重了。镇赉县反映，结束征购后，该县平均每人分配口粮96斤，全县570个生产队中，有78个生产队没有分配口粮，有176个生产队口粮在50斤以下，两者占生产队总数的44.5%。中共延边州委反映，敦化县全县534个生产队中，分配口粮在200斤以下的有113个队，其中有43个队现在有的吃饲料，有的吃种子。镇赉县嘎什根公社有三个生产队的社员，先后13次到附近的新生农场强取粮食，参加人数达75人，共拿走粮食5300斤。榆树县在粮食集运中，连续四次发生乘机偷粮事件，参加偷粮的有23人，拿走粮食1300多斤。1961年以后，县以下的干部吸取了前两年浮夸的教训，上报产量一般都留有余地，对征购任务也讨价还价，征购任务不得不减少。由于有了自留地，集体分配的口粮不足，由自留地产的粮食补充。完成征购任务最困难的是梨树县。省调查组认为，这个县是社员过多地搞自留地、搞小片开荒，影响了集体生产，造成粮食减产。“有的队实际走上单干道路了”，集体完不成征购任务，社员自留地的粮食却多了。双马大队第五小队，社员自留地、小片荒地产的粮食最少的每人有300斤，平均有500斤。夏家堡子大队第六小队25户有19户种了队里的熟荒地，多的三亩半，少的也有半亩。有的户小片荒地、自留地多达7亩、产量最多的达7担。所以，省里虽然上向面叫苦，农民的生活还是比前两年好。社员自留地产的粮食多了，这是摆脱饥荒的最为有效的办法。

粮食短缺，就寻找代食品。据1960年12月底统计，全省已收储各种代食品原料51万多吨，以食堂为中心建立了大小加工点4万多个，组

织了38200个代食品生产专业队，参加专业队的人数有46万多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15%，已制成淀粉3万吨。被利用做代食品的原料有20多种，有玉米叶、玉米杆楷、玉米瓤、稻壳、豆杆、柞树叶、榆树皮等。为了得到更多的代食品，省委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搞代食品的“三百”运动，即动员100万人（指主要劳动力），大干100天，为全省农村人口每人生产100斤代食品。

不仅是吉林，在整个富裕的东北三省，也大搞代食品运动。1961年1月18日，东北局在向中央、主席的报告中说：“据各省报告推算，全区在扣除征购粮、种子、饲料和年前已吃掉的粮食以后，今年1到9月，农村每人的口粮相当多的地区不到120斤，辽宁省平均每人只有92斤。为克服困难，在东北全区开展一个以制造人造淀粉为中心的大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并已初步取得成效。据年前统计，全区参加采集代食品原料和制造代食品的共有548万多人，已采集各种代食品原料640亿斤，加工出淀粉3.6亿斤。主要是苞米皮、苞米心、苞米杆做成的。全区80 - 90%的食堂吃到了代食品。”1月17日到20日，东北三省财贸部长又召开了会议，专门研究了代食品问题。会议要求在3月底以前达到农村每人干湿淀粉100斤，要像抓粮食一样抓代食品的进度。会议还要求，大中城市每人每天能吃到一钱人造肉精。会上还介绍了一些地方搞代食品的经验。如辽宁省锦县建业公社四合大队，全队310户，1500多人，有一半人参加了制造淀粉，按现有加工能力，每天可制出淀粉4200斤。黑龙江商学院建立了一个人造肉精厂，日产60斤到100斤，全校四个食堂、2000多名师生，平均每人每天可吃到人造肉精三钱到五钱。辽阳市第一高中，去年11月有31人发生浮肿病，后来每人每天吃一到二钱人造肉精后，师生健康情况大有好转。

其实，搞代食品不用政府组织，不用动员，在肠胃的压迫下，人们会自发地去搞。在城市，直到1961年，食品不足的问题还没有缓解，有些市民在城市绿化中寻找代食品。在吉林省会长春市，自1961年5月以来，市内不少树被扒了皮。据统计，仅南关、朝阳、二道河子三个区，被扒了皮的树有1036棵，绝大部分是榆树。一般都是零星扒的，也有连片的。除了扒树皮以外，也有不少人撸榆钱、树叶作代食品。长春市扒树皮的情况在4月以前就开始了，4月7日，市建设局发出了禁止乱种菜、损坏树木花草的紧急通知，但扒树皮现象还继续发展。接着，市长出面召开了公安、教育、团委、建设局等单位的会议，禁止扒树皮及在市区乱种菜。市公安局、建设局组织了300多人，分赴各公园和树木多的地方，由早4时到晚11时，轮班巡逻，对于扒树皮、毁坏树木的人，则行政拘留。在长春以外的地方剥树皮的情况更为严重。延边地区各市、县，除敦化以外，公路、铁路沿线以及村子

周围，大部分榆树都被剥光。

除了寻找代食品以外，吉林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大力推广“做饭增量法”，同样的米可以做出更多的饭。农民说这是哄肚皮的办法。吉林省在推广时却说，据辽宁、陕西两省若干个科研机构，将增量法和原来做饭的办法对比试验证明，增量法既能把粮食中的养分发挥出来，容易消化，增加热量，有利于增强体质，又能吃饱吃好，节约粮食。按全省农村一年消费口粮238.5万吨计算，如果都用增量法做饭，就等于增产粮食75万吨，可够全省900万农村人口吃4个月。

二、“五风”也渡山海关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也渡过了山海关，在东北大地肆虐。这“五风”本来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产物，哪里有“三面红旗”飘扬，哪里就有“五风” 肆虐。而“五风”之所以毫无阻拦，是政治运动的结果。政治运动使说真话的人沉默，使智者沉默。

从1957初年到1959年末统计，吉林全省有19611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占全省党员总数的2.49%，其中开除党籍的7243名（内有反革命分子446名，各类坏分子1103名，阶级异己分子1101人，右派分子857名）。在这些受处分的党员中，中央管的党员干部25名，省委管的党干部125名。

1959年8月26－9月10日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掀起反右倾运动。吉林省反右倾批判的对象：李树仁：省委委员、公主岭地委第一书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李晨：通化市委书记处书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徐壁人：吉林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委员，留党察看二年，撤职；张书田：四平市委宣传部长，留党察看一年，撤职；袁小平：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严重警告，撤职；宋均：长春市基建交通部长，撤职；崔世臣：辽源市委书记处书记，撤职，保留市委委员；闻风：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设计院副院长；杨光：白城地委书记处书记；石达：省林业厅副厅长。

从这个名单上看，吉林省的批判对象层次比较低，最高的是地委级。而相当多的省里，批判对象中有省级。这说明吉林省反右倾斗争不如有些省那样激烈。

1959年12月31日，中共吉林省委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彻底

揭发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树仁和李晨，并批判了其他一些人的严重右倾错误的基础上，作出决议：省、市、地、县机关以及厂矿、企业、学校领导干部中的反右整风已经开展了的，应继续深入；没有开展的，应及时开展；无论开始先后，一律搞深搞透。在农村中，继续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整党整社运动。集中弄清“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党的领导等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彻底揭露和粉碎右倾机会主义，以保证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巩固党的统一和团结。”这个决议，把反右倾斗争从省级干部中推向基层。

吉林省委领导人虽然不像河南、山东、四川等省委领导人那么狂热，但还得跟着政治潮流走。“五风” 肆虐和反右倾运动是同时发生的。

1959年3月，吉林省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批评和制止横行了半年的“五风”。与会的发言者揭露了不少农村“五风”的情况。在1958年大跃进中，由于平均主义，由于农业劳动力不足等多种原因，粮食大量浪费。秋收非常粗糙，不少粮食没有收上来。海龙县吉乐公社的吉祥等三个队，仅在乱草中就打出稻子128000斤，占水稻总产量的18%。有些队的水稻，到1959年3月还堆在场院里没有扬出来。杏岭公社大兴第三队损失的水稻，每亩地至少25斤以上。大家估算了17个生产队的损失，约有270000多斤，相当于1958年700亩地的产量。双辽县三巨管理区有一垧（一垧等于10亩）多高梁，50多椽子，到1959年3月还没拉回去，在高梁椽子附近的地上有2寸厚的高梁粒。有的生产队“见堆就有粮”（土堆、草堆、柴堆、楷禾堆、格莠堆里都有粮食）宏伟管理区一个生产队的90垧高梁一天一夜就打完了，只打出600多担，至少七八十担粮食没打下来。柳河县凉水河子公社第六队到1959年3月还有14000多捆稻子放在场院没有管理，任凭“鸡刨猪糟”。靖宇县榆树川公社有两千捆莜麦直到初春还放在地里。另外，不少生产队大量的萝卜、白菜、土豆、甜菜，由于没人管理，放在地里冻坏。不少生产队牲畜丢了没人管，认为跑也跑不出公社范围。因此，牲口大量死亡。农具破坏丢失也十分严重。

在这次六级干部会上，延边、通化、吉林等地区的干部认为平均主义在吉林有八大表现：1）分配拉平，富队尽量多积累少分配，穷队少积累、多分配；2）评级拉平，在评定劳动力等级时，不分特产专业队和一般专业队的不同情况，均按统一的比例；3）劳动量拉平，不分男女老弱，不管干活多少，只要出工，就记一个工；4）生产资料拉平，富队的财产多调，穷队少调或不调，把富队的财产往穷队里调；5）细粮拉平，不分朝鲜族、汉族，不管稻田多少，细粮一律按20%供给；6）口粮留量拉平，不管增产队还是减产队，一律按人均

480斤留粮；7）菜金标准拉平，不管收入多少，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一律3角；8）年节供应猪肉拉平，不分养猪多少、好坏，春节期间一律按一斤肉供应。

吉林市郊区的九站人民公社是“五风”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这个公社原来是一个先进单位，整风整社时发现问题严重，才认为是“被地富反坏分子把持了领导权”。这个公社的张久管理区的干部们，经常以“向党开炮”、“放毒”、“资本主义分子”、“破坏分子”、“不服从党的领导”等罪名，任意打骂群众。他们经常威胁农民：“凡是不老实的，就得专他们的政！”动不动就说：“专他们一下！”专政的办法有三种，一种是“训练班”，即集中起来强制劳动，不给报酬；一种是“养病房”，对自称有病不能劳动的，就送养病房，睡凉炕，喝寸米粥（极稀的粥，一寸粥只有一粒米）；一种是插白旗，游街、吊打。全管理区共308户，被专过政的就占总户数的20%左右。农民王德潤一家三口被迫害致死，干部们还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死一个摆着，死两个挑着，死三个垛着！”生产上瞎指挥，全公社有6000多亩不宜种菜的土地硬让种了菜，如地势低洼的840亩地强行种洋葱，种子花了10800元，仅收700元。“五风”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以这个公社大荒管理区为例，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了44.2%，1960年比1958年减少了58.55%。

在大刮“五风”当中，农村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比较严重，1959年春夏整社时进行了整顿，情况有所好转。1959年秋反右倾以后又有发生。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报告，少数基层干部欺凌老百姓的情况：1）威胁、逼供甚至造成农民自杀；2）捆绑、吊打农民；3）乡社办“教养队”、“集训班”，实际是劳改队；4）随意拘留；5）以食品不能外流为名，沿途堵截搜查，查到的食品被干部没收。这些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情节也相当严重。中共吉林省委在1960年12月28日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报告中说，如果有人不让“一平二调”，不听瞎指挥，干部就手拿几种“武器”对付：一是扣“帽子”：“右倾”、“不听党的话”、“富裕中农思想”、“本位主义”等等满天飞，吓得农民不敢说话；二是辩论，社员说，“一辩就没头，非把人眼珠子辩得冒汗（流泪）不可。”三是扣粮、扣饭、扣工分，罚款；四是撤职，梨树县榆树台公社一个管理区的书记，三个月撤了9个生产队长；五是硬逼，逼小脚妇女下水田，逼病人下地劳动；六是打骂和各种形式的体罚。

1959年3月的六级干部会议以后，接着进行了整风整社，吉林省的“共产风”在一些地方一度平息。但是，1959年秋反右倾以后，又刮了几次。1960年12月28日，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试点情况的报告》中将全省463个公社排队分析后的结论是：过

去“共产风”纠正得比较彻底，以后没有基本再刮的占28%左右；过去“共产风”纠正不彻底，或者1959年冬季又刮起来的占54%左右；过去“共产风”一直没有得到纠正，继续刮，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的占18%左右。为什么“共产风”一刮再刮呢？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认为，这是由于“不少同志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风’，怎样才能到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的区别，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等根本问题，没有从认识上弄清楚，所以在工作中就掌握不稳。”吴德说，1959年冬，有些地方为了发展社有经济，为向“基本社有制”（即公社一级所有制）创造条件，产生了急躁情绪，又刮了一次共产风。

1960年3月，省委又召开了一次六级干部会把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绪压下去了。但是省委的会议，不可能扭转庐山会议造成的形势，“共产风”在发展。吴德在报告中列举了“共产风”的几个方面：一，在1959年冬大搞水利建设中，无偿抽调管理区的劳动力、运输队力和物资、器材；二，在发展公社一级所有制经济中，从管理区又调上了不少东西，有的地方把穷区和富区合在一起；三，许多公社要管理区以物资和生产资料上缴公积金；四，机关学校、厂矿、部队在大搞副食品基地时，无偿地或很少报酬调用公社的土地、车马、劳动力的情况比较普遍；五，农村中小学搞勤工俭学和自给性生产，发动管理区献土地、车马、农具；六，在整顿食堂和大办福利事业中，有些地方没收社员员自留地，全部放到食堂，无偿占有社员房屋、家具；七，有些地方在解决粮食问题时，没收社员自留地产的粮食、蔬菜，甚至翻箱倒柜；八，有些公社无偿调用管理区的车马，成立运输队。吴德认为，1960年下半年的“这次共风刮的比过去面广，有的是从公社内部刮的，有的是从公社外部刮去的，有大集体‘共’小集体的，也有全民‘共’集体的，有集体‘共’个人的，也有全民‘共’个人的。有些地方，外部来的风比内部刮的厉害，党、政、军、民、学都有份。”

1961年，“共产风”还继续刮。1961年1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了《关于有些地方违反中央指示重犯“一平二调价”错误的通报》，通报指出，“有些地方在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纠正“一平二调”的同时，又发生“一平二调”的错误。”通报列举了一系列“一平二调”的种种事例后说：“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帮助公社党委纠正这一错误，并且通过这个事实教育干部，以避免类似错误继续发生。”但是，半年以后，“一平二调”还是发生了。1961年7月15日，中共吉林省委不得不再发文指出：“去冬以来，省委在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过程中，关于重犯“一平二调”错误的问题曾发出多次通报，三令五申地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不许再刮共产风，必须维护公社三级集体所有制和社员个人所有制……但是，还有少数的党组织和干部对省委的指示不重

视，而是充耳不闻、置之不理。”

“五风”对农村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的破坏。1959年4月末全省有猪187万头，比1958年6月的239万头减省了22%。鸡鸭鹅减少更多。农安县农安镇人民公社五里界管理区，1957年以前第一生产队有大小牲畜35头，到1959年6月只有17头。1957年有猪240多头，1959年6月只有28头。1957年一垧地（10亩）能打8担，1958年只打6担，还向上报增产几倍。为此，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问题”等文件的精神，发出了《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解决社员自留地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社员只要养一头猪（包括现养的和计划养的），就给1分到2分自留地。自留地收益除缴农业税以外，不抵口粮，不上缴积累，完全归个人所有。此外，大牲畜死亡和瘦弱问题也比较严重。通榆县1959年冬到1960年春，大牲畜普遍瘦弱、大量死亡，特别是幼畜成批死亡。

从怀德县可以看到集体化、特别是公社化以及1958年以来的“五风”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情况。1961年5月10日，吉林省委传宣部长宋振庭提供了一份调查报告说，怀德县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吉林省的重要产粮县之一。但从1953年以来，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逐年下降（1960年和1953年比，的播种面积减少了10%，单产减少了36%），粮食产量逐年下降。1960年的粮食产量比1953年减少了38.3%。历年粮食总产量数字如下：

1953年：31.2154万吨；

1954年：26.4796万吨；

1955年：32.0271万吨；

1960年：19.2702万吨。

1958年和1959年粮食产量浮夸很大，数字说不清，大约20万吨左右。

怀德县饲养大牲畜条件好，范家屯的马市全国闻名，过去南方各省都到这里来买马。但是，1960年的大牲畜比1953年减少了36.5%。剩下的大牲畜瘦弱不堪，按拉犁的牵引力算，三头才能顶过去的一头。部分社队已经无力种地。与此相应的大车也减少了51%。

部分社队群众收入逐年减少，不少地方房屋失修，漏雨。南崴子公社

一半左右的房子漏雨，不少房子在屋子里可以看到天。刘房子公社湾沟8户中有3户房子透天。

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征购任务加重，剥夺了农民的口粮。1958年和1959年，怀德县粮食产量大约20万吨左右，却虚报为31.3262万吨和25.1644万吨。征购任务按上报的产量数确定，1958年和1959年的征购任务都为16万吨。1953年征购粮占总产量的41.69%，1958年和1959年约占80%，1960年占67.46%。征购任务刚完，就等着返销粮下锅。

1958年以来社员口粮标准很低，群众体质很弱，据初步调查，全县已有浮肿病人16000多人。经过检查确认的由于浮肿病和合并症死亡的有68人，未检查确认的死亡人数就不清楚了。

吉林是中国主要的人参产区，其中抚松县又是人参的重点产地，其中东岗为最。1958年以来，由于强调人参产区粮食自给，强调人参种植以国营和公社为主，因而人参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东岗人参产量81741斤；1961年只有23518斤，只有1957年的28.77%。由于人参产量降低，社员收入减少，人参产区的人口外流，希望“找个农业生产好的地方，能够吃饱肚子。”

三、守着粮库饿死人

粮食减产、过重的征购任务和“五风”的折磨，使得吉林省这个富饶的省份，也发生了饥荒。

1961年春，由于浮肿病人不断增多，省卫生厅派医疗队到洮安县福顺人民公社的福安管理区和德顺人民公社的全保管理区救治。这里社员体质很弱。自1960年10月以来，大量发生浮肿病。1961年3月6日至9日，医疗队在这两个管理区按门逐户进行了检查，共检查了1457人，发现浮肿病322人，占被检查人数的22.1%。福安管理区共有劳动力187人（女86人），就有84人（女44人）患浮肿病，占劳动力总数的44%。福安区被查出的155个浮肿病人中，初发者64人，占发病数的41.3%，其中较重者7人；时肿时消逐渐恶化的86人，占发病数的55.4%，其中较重、体力非常衰弱者25人，已有腹水或消肿后干瘦、身体极度衰弱者5人，占发病人数的3.2%。入冬以来，福安管理区死亡12人。经调查除其中5人因年老体衰或患其它疾病死亡外，4人是浮肿合并其它疾病死亡，3人纯是浮肿后腹水或干瘦而死。范海庭，59岁，患浮肿后消瘦，死前一天晚上精神还好，第二天突然死亡。王进

城，36岁，患浮肿后干瘦，死的前一天产野外拾柴，第二天突然死亡。于留柱，52岁，也是患浮肿病后消瘦死亡。

1961年3月5日，中共延边州委干部何建中从延边打电话向州委富书记汇报说（兰干亭记录），在延边，2月上旬统计的浮肿病有1万多人，图们镇浮肿病人占总人口的7%，延吉县朝阳公社占总人口的7.5%，有些学校、机关占的比重更大，医学院占15%，州报社占10%。在3899名妇女干部中调查，患妇女病的就有1154名，占被调查人数的29.6%。延边地区各市、县除敦化外，群众都在剥榆树皮吃，把树干中间的一段剥光。目前公路、铁路沿线以及村子周围，大部分榆树皮都被剥光。

1961年6月2日，吉林省卫生厅党组报告，根据省卫生厅工作组到吉林、通化、四平、白城等地区的检查和从部分地区的工作报告看，目前全省农村浮肿病的情况仍很严重，部分地区病情还有发展。有些浮肿病人时消时肿，由轻转重或呈干瘦状态，重病人日渐增多。一般地区重病人占现有浮肿病人总数的2%左右，重病区的重病人占病人总数的6%以上，并继续发生死亡现象。此外，全省患子宫脱垂的病人约两万多人，闭经病的发病率约为农村青壮年妇女的0.5－3%。另据典型调查推算，1961年6月全省农村重症浮肿病人，约3万人左右。省委发出通知，要加紧对这部分人治疗。这个数可能偏小，怀德县1961年7月下旬有浮肿病人1万人，其中重度的有1348人，浮肿人数还有上升之势。吉林省当时有43个县，怀德县的人口和灾情处于中等情况，按这个县的情况推向全省，重度肿病人应当有5、6万人。

浮肿病不仅发生在农村，城镇也出现不少。据吉林省卫生部门资料，自1960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吉林市全市（缺船营区）发现浮肿病人4179人(市内3874人，外县305人)。主要情况是：1）城乡、机关、学校、工矿、企业、饮食行业、地段居民中均有发生。据21个单位调查，只有三个单位没有发现。患者性别无差别，壮年比例较大，壮年占患者总数的40－50%；2）部分单位发病率比高。据21个单位调查，有四个单位达5%以上。最严重的是市实验小学，占30%。在一部分重体力劳动工人当中，比重较大；3）从发展趋势来看，从11月起到12月有显著上升。据吉林铁路医院就诊人数统计，11月下旬为313人，到12月上旬就发展到550人，到12月中旬则发展到780人；4）浮肿患者的症状是：下肢及颜面有不同程度的浮肿，全身软弱无力、头昏、面紧、多尿（一夜可达四、五次甚至有尿急现象）等。个别患者出现昏迷，但从全市情况看，还没有发现因浮肿致死的情况。

1960年10月到1961年3月6日，省直机关共发生不同程度的浮肿病人976名，省直医院采取积极措施先后治愈246名。发病较高的单位有

人民检察院占职工总数的80.9%；卫生厅，占61%；机械工业厅，占49%；省委组织部、轻工业厅，占48%。发病率较低的单位：新华社，5.9%；财政厅，7.7%。

吉林虽然也出现了饥饿和浮肿病，虽然有个别饿死人的记录，但还没有发现大批饿死人的历史档案。据官方公布的人口统计资料计算，从1958年到1960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有12.78万人，另有因营养不足少出生人口43.32万人，详见表5-2。与有些省份相比，吉林的饥荒显然要轻得多。

表5 - 2：大饥荒期间吉林人口变动（单位：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一）

195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总计

年末总人口 1224 . 5 1280 . 9 1313 . 1397 . 1 1414 . 3 1476 . 4 1537 . 1

出生率 32 . 64 33 . 31 28 . 04 32 . 51 26 . 45 40 . 70 47 . 03

死亡率 7 . 5 9 . 1 13 . 4 10 . 1 12 . 0 10 . 0 9 . 4

非正常死亡 0 . 09 5 . 64 1 . 45 4 . 17 1 . 40 12 . 78

少出生人口 6 . 12 13 . 11 7 . 64 16 . 45 43 . 32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 . 吉林》

注：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的计算方法和计算过程参见“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在大饥荒期间，吉林面临另一个突出问题是“自由流动人口”。吉林是丰饶之地，自然是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人们的首选。大饥荒年代，“闯关东”的人会更多一些。据新华社吉林分社老记者向本书作者介绍，1960年进入吉林的流动人口最多，但我没有找到这一年的资料。1961年关内饥荒有所缓解，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口流向吉林。1961年10月30日，吉林省公安厅和民政厅联合向省委报告说，今年以来，流入吉林省的自由流动人口有23万人，其中流入城市经过收容遣送的有48700多人，流入农村、矿区的有18万多人。在收容的48700人当中，关内各省有23000多人，东三省的25700人。关内人当中，山东人占60%。从黑龙江省和辽宁省流入吉林的，辽宁人最多。流入农村、矿区的18万多人多数是携带家眷投亲靠友的农民。中

共吉林省委11月13日批转这个报告，要求严格控制、制止自由流动。并说：“当前我省正是严冬季节，对逃荒来的灾民，需救助者，都要适当予以照顾，不能饿死冻死人，不要怕因为这样做会招引来的人更多”。吉林省这个态度使不少流民免于冻饿而死。不过，据新华社吉林分社老记者回忆，当年还是有一些流民冻死在冰雪之中。他们的记忆是有据可查的。仅1961年1月1日到2月8日，在沈阳铁路局长春管区内，就死亡38名。关内流入到吉林的人口多，吉林流出的人口也不少。据中共四平地委1960年6月15日报告，自1960年2月以来，该区双辽及怀德、梨树、伊通的少数公社，先后发生了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情况。据5月21日统计，总计外流45314人，其中男女劳动力18250人。这些人大部分流到黑龙江、内蒙和吉林省其它县（与此同时，从外地流入的人口为19263人）。外流人口中，不仅有社员，还有干部、党员、团员。据卧虎公社统计，外流人口中有队长以上干部51人，党员52人，团员145人。外流原因主要是吃不饱。有的生产队每人每天只有四五两口粮。对寒冷的吉林来说，四五两口粮不到700千卡的热量，生存是很困难的。延吉县也发生过人口大批外流的情况。

为了解决流动人口问题，一些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成立了收容遣送站。有些收容遣送站违法乱纪，打骂、体罚流民。例如，四平收容遣送站的31名干部中就有19人打骂体罚过流民。有拳打、脚踢、拧耳朵、竹条抽、木棒打、扒光衣服推到屋外冻等十几种刑罚。有的把人打得口鼻流血、头破血流！凡是进四平收容站的必须直腰对面坐着，不许乱动。书记、站长、管理人员看见谁不顺眼就打。收容所住的地方非常拥挤，6.6平方米的房间住72人，男女老少挤居一室，不让活动，不让出门，不让晒太阳。被收容者在屋里大小便，虱子成群滚成蛋。由于环境太恶劣，11月份3天就死了5人。

四、吴德小心翼翼地“踩钢丝”

面对1958年以来复杂的政治经济情况，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及其同僚们小心翼翼地“踩钢丝”：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尽可能不过分地伤及农民利益；在解决农村困难、保持管区的社会稳定时，千方百计地维护“三面红旗”。

1958年以来，吴德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一再表示，“人民公社是实现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这是我们党运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同全国一样，吉林省在1958年的工农

业生产和其它各个战线都出现了一个大跃进的形势”。所以，吉林省在公社化、大办钢铁、深翻土地、密植等诸多方面，都是很积极的。但是，在这些方面，吉林省没有新的创造，在《人民日报》上报道吉林的新闻也不很突出。当“三面红旗”的问题暴露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吉林省也积极跟着中共中央纠偏，但在纠偏的同时，吴德们还是小心地维护“三面红旗”。

对中共中央1958年冬天到1959年春天的一系列纠正“五风”的措施，吉林省贯彻得比较认真。从1959年1月到7月（庐山会议之前），吉林省进行了整社工作。从1月到3月，主要是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1959年3月到7月，省里开了六级干部会议、县里开了五级干部会议，公社也开了社员代表大会，揭露批评了“五风”，落实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包产落实”、“分配社员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等指示。对“一平二调”的财产，也进行了清算，并退赔了一部分。这些措施，落实了包产单位部分所有制问题，调整了生产和生活方面大集体和小私有的关系。在整社中也退回了农村干部贪污和挪用公款的一小部分。

省委在纠正1958年错误时，特别注意维护“三面红旗”。吴德在六级干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强调：“我们在估计本省情况时，首先必须肯定1958年的巨大跃进，必须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必须肯定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热情和高度积极性。如果有谁企图否认这些，谁就是违背最明显的事实，谁就是否认了全省人民和广大干部的努力，他就一定要遭到广大群众的坚决驳斥。”

在大办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问题上，对1958年的过激问题也有所纠正。1959年6月30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文件（ ），对农村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提出了比较宽松的政策。首先调整了供给制，提出1959年不搞供给制。文件认为，1958年秋收以后，吉林省绝大部分人民公社，都实行了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有些公社由于供给制占的比例过大，影响按劳分配原则的执行，因而影响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到1959年6月，中共吉林省委认为，大多数公社供给制的部分仍然过大。一般的供给部分占社员分配部分的60％ - 70％，少数公社占80％左右。因此，凡是供给部分所占比重过大的地方，应当进一步调整。调整1958年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的比例：工资部分应占60％ - 70％左右，供给部分占30％ - 40％左右。在这个原则下，条件好的可以采取伙食供给制，条件差的可以不实行供给制。1959年秋收分配中，如果还要继续实行供给制的，供给部分应不超过30％左

右。凡是实行供给制的地方，为了约束二流子、懒汉，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可以实行“定工吃饭，旷工缴饭钱”的办法，或实行“基本伙食工分”的办法。

这个文件对公共食堂的问题看得比较早，而且提出了更为宽松的办法。按照中央“公共食堂必须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原则，认真整顿公共食堂，必须真正达到节约劳动力的目的。就全省广大社员群众的要求来看，以办劳动力食堂为最好，并且灵活着办，春耕、夏锄、秋收三大忙季可以办，其它季节可以少办或不办。凡是家无辅助劳动力做饭要求在食堂吃饭的，一定要把食堂办好；凡是有辅助劳动力做饭而要求退出食堂的，应允许退出。食堂规模过大的，可以适当缩小。

这个文件承认，办“全民食堂”矛盾较多：一是社员家庭没有泔水，养猪有困难；二是食堂只能按劳动力的情况做饭，很难照顾到老幼病人的需要。三是全家在食堂吃饭，使社员的伙食水平趋于平均了，吃细粮多了，收入少的社员顾不上穿；吃粗粮多了，收入多的社员有意见。四是在粮食困难的情况下，在家吃饭可以掺上一些菜吃，而且可以做到劳动的人吃干饭，不劳动的人吃稀饭，在食堂就有困难。五是我省气候较冷，一年四季都得烧炕，办全民食堂也得烧“两把火”。因此，全民食堂不宜勉强坚持。不论办什么食堂，口粮都应以人定量，分配到户。愿意到食堂吃饭的，再把粮食交给食堂。其它很多省强调口粮指标到户，粮食到食堂。吉林把口粮分到户，显然对农民有利。

1960年春天，中共中央推广了贵州省大办公共食堂的经验、强调必须坚决办好公共食堂。此时，吉林省也同全国一样，宣传“公共食堂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阵地，要不断地巩固、壮大”，同时还继续强调：“我省冬季较长，气候寒冷，农村居住分散，给办常年的、全民的较大的食堂，带来一定困难。为了适应客观条件，照顾群众习惯，目前，对全民食堂不宜要求过严，应采取灵活的方式，可以办大一点的，也可办小一点的；还可以平日集中办，冬季分散办（伙食小组）。”

到了1961年，吉林的公共食堂绝大多数是劳动力食堂，只有在农忙时劳动力在这里吃饭，其他人不在食堂吃饭，全民食堂基本停办了。吴德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现有条件下，全民食堂已经证明行不通，仍在坚持的极少。现有的食堂，许多办得不合群众的意愿，存在的主要总是：管理不善，费柴、费人、费钱；‘百斤粮不顶百斤吃’；有平均主义；影响社员家庭饲养业的发展；‘吃饭不自由’。”但他在信中又说，我们调查了两个山区的食堂，单身汉、没有老幼拖累的年青夫妇、五保户，这几类户90%要求坚持办常年食堂。“看来，由于情况不同，群众要求不同，所以食堂办不办，怎么办，都应由当地群众讨

论决定，不好‘一刀齐’。”请注意，吴德这封信发在1961年5月10日，是在《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号文件之后。这个中央文件是4月26日发的，其内容是毛泽东批转胡乔木的湖南调查，是准备解散公共食堂的。此时，有些省委书记也送上来自己的调查报告，相当多的省委书记主张解散公共食堂。吴德对是否解散公共食堂显得有点暧昧。聪明的吴德知道，毛泽东从心底里是爱公共食堂的，在解散食堂问题上暧昧一点，会给毛泽东一个好的感觉。这正是吴德踩钢丝的技巧所在。

在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吉林也比较彻底。和全国各地一样，1958年以来，吉林省的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增长幅度过快。1960年8月，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职工增加到170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95.6万人，增了1.28倍。另外还有城乡公社办的工业增加的职工19.6万人。由于农业劳动力大量进入工业，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1958年每人担负耕地26.4亩，1960年担负36.5亩。因此，根据中央精神和吉林的实际情况，吉林计划精简职工15－18万人，从城市压缩31万到34万职工回农村。在以后的两年内，吉林继续下放城镇人口，总的下放指标是81.2万人，实际下放98.0万人。

第六章　富饶的饥馑

江苏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地形以平原辽阔、地势低平、河网稠密、湖荡众多为特征。江苏省因气候适宜、资源丰富，历来是中国最为富饶的省份之一。这里是鱼米之乡，历史上很少闹饥荒。和其它省份相比，这个省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人们称江苏省为“富饶的宝地”。

在1958年到1961年间，江苏省这个富饶的地方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当然，和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山东等省相比，饥荒程度要轻一些，但广大农民也遭受到严重的摧残。

一、江渭清奉命行事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一个比较稳当的人，也是一个熟悉“党文化”的老练政治家。在毛泽东面前，他察言观色、审时度世，估计不会带来危险的情况下，有时还能挡住毛泽东某些不合理的要求。如，在反右斗争中，毛泽东曾希望在江苏省委常委中抓出右派，事后还派彭真到江苏传达对江渭清“打招呼”，说江“右”。江渭清还是挡住了，在省、地、县几级主要领导中一个右派也没有抓。全省抓了13349名右派，约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的2．4%。江渭清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对他的“右”，对在毛泽东面前敢讲真话的事，写得绘声绘色，对“三面红旗”危害江苏的事，也写了一些，但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淡化。从现存的档案中反映，江苏省在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年代，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不过，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在大跃进中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对中共中央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不走极端。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且毫无效益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

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开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江渭清在这次会上代表江苏省委作了发言，发言的题目是《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他着重介绍了江苏的“跃进”形势，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已树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跃进思想，以“苦干、实干、创造性地干”的精神，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并列举了当时的一些豪言壮语，诸如“政治挂了帅，生产

飞上天”；“干部能下海，我们能擒龙”；还有一些新编的顺口溜：“志气比天高，干劲冲云霄；掏干大海水，切断荒山腰；就用这股劲，实现四十条”等，借以说明江苏人民势如破竹、敢作敢为的精神。

5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学习和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运动。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闭幕，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马上部署筹备召开江苏省委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地方工业可以自力更生大发展；三是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办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会议结束后，一场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在江淮大地掀起。

南京市有20万人参加宣传大跃进的活动。所有宣传员、报告员全部出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在强有力的政治鼓动下，工农商学兵和街道居委会全都行动起来，基层细胞进入了高度亢奋状态。江苏各个城镇的职工、学生和居民纷纷上街，敲锣打鼓。4 月27日，南京市玄武区举行“火炬歌唱大游行”，数万与会者齐声高唱《东风压倒西风》等三首指定必唱的歌曲，载歌载舞，表示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当时人们确信大跃进可以带来幸福，他们的这种态度是真诚的。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江渭清觉得，这样的口号明显过头了，尽管在“大跃进”，还没有这个物质基础嘛！所以，当中央分管农村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来南京视察工作时，江渭清向他说：“谭政委，光放开肚皮吃饭，不搞生产也不行，还要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谭震林采纳了江渭清的意见。后来的“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是他视察江苏“大跃进”以后提出来的。在“共产风”中，有的提出“人民公社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剩余”、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配，将社员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农具等统统收归公社所有。全省组成了132个“民兵师”，农民实行了军事化。在“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全省各地大办公共食堂，农村绝大多数人都到食堂吃饭。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号下，盲目蛮干到了离奇的程度，如“农田深耕”从几尺到一两尺，“试验田”以白糖作肥料“夺高产”；密植“越密越好”发展到几亩水稻移并在一起，以“并苗移栽”制造假“卫星”等等。

江苏省的大跃进也是从兴修水利开始的。江苏省委要求实现“三年全省水利化”，在严寒刺骨的风雪中，数百万群众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奋战。民工往往每天劳动长达12 - 15 个小时，甚至更多。1958年3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工程开工，这是当时江苏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准军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亿土石方，如果包括农田水利部分，江苏全年共完成43亿土石方，相当于1957年的13倍。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听各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汇报，毛泽东一边听江渭清汇报，一边插话。当江渭清讲到江苏今冬明春水利建设准备搞3亿方时，毛插话说：“吴芝圃讲搞300亿万，我看得死3万人；曾希圣讲稿200亿方，我看得死2万人；渭清讲3亿方，可以一个人不死。他们那是虚夸。”看来毛泽东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但江苏不是搞3亿方，而是搞了43亿方。所以还是死了人。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江渭清在参加北戴河会议期间，于8月20日专门就大炼钢铁问题同省委通了电话，提出了三点意见，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认真研究，坚决贯彻执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15万吨钢的任务，按18万～20万吨的要求来保证完成，只准超过，一斤也不能减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个月了，各级领导决不能向困难低头，炼钢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时加以解决。三是各地、市委第一书记，有钢铁生产任务的县委第一书记，都要亲自抓钢铁生产，农业由其他书记或常委去抓。这就是所谓“钢铁元帅升帐”。大炼钢铁运动以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的。

北戴河会议一结束，江渭清就赶回南京，进一步部署钢铁工作。当时，钢铁生产进展缓慢，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完成预定任务。江渭清十分着急，他在9月2日召开的市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强调，9月份一定要超额完成计划，保证全月完成5.5万到6万吨生铁和2万吨钢的生产任务。

当时形势逼人。全国已有6个省日产生铁1000吨以上，其中湖南达到3000吨，河南达到1.8万吨，而江苏才910吨多一点。中央决定9月23日召开全国大炼钢铁电话会议。江渭清急得没有办法，抢先召开地、市委书记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力争在9月22日突破口产生铁3000吨，29日放出个“大卫星”。什么叫“大卫星”呢？当时，日产生铁突破5000吨是“小卫星”，8000吨是“中卫星”，如果在国庆节那一天宣布江苏日产生铁突破1万吨，这就是“大卫星”。

对于“大炼钢铁”中大放“卫星”，任务一天比一天加码，指标像天文数字一样翻了又翻，江渭清和省委的其他领导人在思想深处是不赞成的，但又不好公开反对。1958年9月20日，毛主席在张治中、罗瑞卿、曾希圣陪同下来南京视察“大跃进”形势，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以后，指示他们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提醒他们不要因为大办工业，放松了农业。同时，他又提出要江苏搞I00万吨铁，问江渭清能不能完成？江渭清说搞不到这么多。事实上，群众性“大炼钢铁”效率低，质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所以江渭清又说，像这样全民炼钢铁，说句不好听的话，叫“劳民伤财”。毛主席听江渭清这么回答，就说：“不谈了，明天再谈。”

第二天，毛主席把省委书记处的几位领导人都找去，说：“我要江苏搞100万吨铁，渭清讲搞不到。顺元，你什么意见？”刘顺元愣了一下，回答说：“渭清同志是班长，班长怎么说，我赞成。”毛主席就问：“惠浴宇，你什么意见？”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顺元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又说：“江渭清不但说搞不到100万吨铁，还说这是劳民伤财，你们也同意吗？”见大家都不开口，毛泽东就问江渭清：“渭清，你还有什么意见？” 江渭清说：“主席，我们千方百计去搞，能搞100万吨更好，实在搞不到，就请您派人来检查我的工作。”毛主席说：“好，就这么办。”

江渭清觉得，向毛主席、党中央讲真话，讲确实存在的困难，这是应有的责任，但“大炼钢铁”是当时全党的大局。他这个第一书记不抓不行。为了争取建国九周年到来之际，放出日产万吨生铁的“大卫星”，全省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都动员起来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带领群众日夜奋战，砍树挖煤，找矿炼铁，连铁门铁栏杆都拆下来炼铁了，美其名曰“找米下锅”。在所谓“小土群”齐上阵的口号下，堆起了数不清的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新华日报》有个报导：9月30日“3万座土洋高炉烈火漫天，400万钢铁大军激战炉前”。据统计，当时全省一度动员了将近700万人炼钢铁，不仅有整劳力，而且有半劳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国庆前夕，终于放出了日产生铁10073吨、烧结铁4000多吨的“高产卫星”，成为全国九个“万吨省”之一。

如此不惜代价地“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事后江渭清算了一笔帐，1958年“大炼钢铁”中，全省高炉利用系数平均只有0.5左右，炼一吨铁需耗煤五六吨至七八吨，炼出的铁许多不合格，钢大部分是土钢，根本不能用。所建上万座小高炉，只有个别的保留下来。直接经济损失更是惊人。全省土法炼钢炼铁共计亏损

14109.6万元，省里补助9000万元，其余部分均由各地从地方财政中抽钱填补。

为了实现“生活集体化”，全省一度办起30万个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占农村总人口的97%。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已经发现，这样大呼隆吃食堂，管理困难，浪费甚大，弊端甚多。还在1959年春夏，省委就同意一些地区提出的经过群众讨论、本着自愿的原则，可以把口粮分发到户，实行社员回家自炊自吃的办法。但是，庐山会议以后，刮起新的“共产风”，把这些做法当成“右倾”，加以批判。一些停办的食堂，被迫重新开伙。1960年春统计，全省共有农村公共食堂16.8万个，参加农户4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55%。

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各地都找彭德怀在本地的代表人物。柯庆施在庐山会议结束时，曾向江渭清提出要批评刘顺元，暗示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刘顺元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被派往被苏军占领的旅大任副书记、第二书记。当时的苏军横行霸道，军纪极差，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苏军领导人则是大国沙文主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刘顺元多次抵制了苏军的恶劣行为。1947年9月17日，旅大苏军总司令宣布将刘顺元“驱逐出境”，并被带上了“反苏”的帽子。1948年8月，刘顺元任济南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委。斯大林得知刘顺元还担任要职，十分不满。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时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到你们的信任，我希望在今后的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刘少奇回国后令刘顺元写了检讨，并降三级使用。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刘少奇找到了刘顺元，并于1954年9月，任命他为中共江苏省委常务书记。

刘顺元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积极并充满热情的。后来，他感到从合作化到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风气越来越坏，很有意见，曾经公开批评过“三六九干部”、“风马牛干部”。“三六九干部”是指不干实事，只会在嘴上卖弄“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以势压人的干部；“风马牛干部”是指见风使舵、吹牛拍马的干部。这些话传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所以柯想批判刘顺元。江渭清没有按照柯庆施的意见办，他向柯解释，说要看通篇文章、报告讲的是什么，不能凭一句两句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长嘛！我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就这样应付过去了。当年秋天，毛主席乘坐专列路过南京，在列车上召见江渭清和省委其他负责人，并询问了“反右倾”情

况。江渭清向毛汇报说：我们有“右倾”思想，但没有“分子”。譬如对1958年放农业”高产卫星”、“钢铁卫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说过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而是反对浮夸虚假。这样，从江苏省委到由省委管理的各地、市、县委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归省委管理的基层党员干部，被划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是有的。全省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等254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总数0.2％，比当时中央所作的全国大约占2％的估计少得多。

但是，大势所趋，全省从上到下还是层层搞了“反右倾”运动，进入大跃进第三年，即1959年底到1960年春夏，在煞“五风”时开始制止的“左”的错误做法、浮夸不实的口号，又重新出现。一些地方提出在三五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已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农村公共食堂又被视作“有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生事物”而大加提倡；还有的提出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与此同时，工业方面一度下调过高的指标，被批为“右倾”；农业指标则由下调变为上调，一些地方重新提出要像1958年那样，“争上游，创奇迹”，“竞赛评比打擂台，现场会议插红旗”，不顾实际，盲目蛮干。

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的实际结果是，1960年农业全面减产。全省原计划1960年粮食总产380亿至400亿斤，实际只完成191.96亿斤，比上年减少6.58亿斤，还低于1952年199.5亿斤的水平；棉花600万担，实际只完成248.5万担，比上年减少93.1万担，低于1953年294万担的水平；钢铁、原煤等，均远未达到计划指标。

由于高估产、高征购，从1959年秋冬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浮肿病、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现象。1960年春夏，情况更加严重。这年2月，省委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共有12.6万人。另据镇江、扬州、徐州、淮阴四专区和南京市不完全统计，农村外流人口达14.8万余人。到6月份，省卫生厅统计，全省共有89.2万余人次患上了浮肿病和消瘦病。一些地区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以宝应县为例。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该县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在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多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而且为数不少。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就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二、这里“五风”也成灾

2002年，我专程到江苏调查大饥荒的历史。从六十年代的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江苏大饥荒的情况比《江渭清回忆录》中说的要严重得多。

1958年开始，江苏各地像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这一股股歪风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58年，扬州地区全地区共建立了123个农村人民公社，比较多的是5000户到20000户的大社。在并社过程中大刮“共产风”。“粮棉到处抛，农具、耕牛无人要，田头、仓库乱糟糟”，“吃饭不要钱，劳动不记分，多做少做都一样”。自留地收归集体，见树就砍，把社员家庭的猪、羊、鸡、鸭、房子、家具、都归集体所有。有的干部公开宣传：“一切归公，连自己的骨头也是公家的。”同时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把军营生活引入农村，强迫命令成风。兴化县西鲍乡三大队唐朱社（原高级社），108户，452人，1958年9月将363间民房全部拆光，拆下的材料用来修水利、盖食堂、造窑厂和建大队部。这边开会，那边拆房，社员在一边啼哭。房子拆后，一部分社员在搭建的19间草棚子里居住，有的住在小船上，有的住在猪屋里，有的住在草堆肚里。靖江县孤山人民公社宁介大队有19个自然村，1113户、4956人，被强迫搬家的有370户，腾出的房子用于食堂、幼儿园、商店、农具厂等。并且要求当天晚上全部搬光，一毛不留，行动慢的社员挨了打。泰州县大泗镇把街道拓宽到汽车可以对开为标准（当时没有汽车），两边还要留人行道，强行拆掉了一批民房。

盐城地区东台县唐洋公社卢南大队自1958年以来，刮了五次“共产风”。第一场风是1958年10月大搞水利工程。当时县里提出“倾家荡产搞水利”的口号。公社党委下令去水利工地之前要“车子化”、“轨道化”，以便在水利工地上实现车子和轨道运土方。为了做车子、做轨道，组织100多人砍树，一共砍了10天，长了几十年的大树也被砍了。没有车道板，从社员家里搜出800多张长凳，锯掉凳腿。1958年，80%的人上了水利工地。吃在工地，睡在工地。为了搭工棚，就拆社员有房子。四队杭武珍头天出嫁，第二天娘家的房子就被拆掉了，第三天带着新郎“回门”，家没有了，就在废墟上大哭起来，招来了干部一顿臭骂。第二场风是1958年大办公共食堂，拆社员的房子，拿社员的炊具；第三次共产风是1959年秋季农具改造运动，连小树都砍光了；第四次是1960年春扩建大队养猪场，又一次拆房子盖猪圈。拉走社员养的猪。猪前头被赶走，女社员在后面哭。第五次共产风是1960年6月办托儿所，需要什么都是又从社员家里拿。五次共产风弄得社员家徒四壁。曲唐公社胡庄大队共产风也是共刮了五次，但内容

不同。第一阵风是大办钢铁；第二阵风是深翻土地，大搞绞绳犁；第三阵风是“四集体”和“十个不要钱”（四集体：集体吃饭，集体住宿，集体劳动等。十个不要钱是吃饭、吃菜、洗澡、看戏、看病、上学等）；第四阵风是“倾家荡产搞水利”；第五阵风是大办万头养猪场。刮共产风时对劳动力“一平二调”，命令一下，说走就走。一个社员正在理发，头才剃一半就被干部拉走。吴金才等9个社员正在用船到曲唐拉粪，半路上干部让他们丢下船拉走，船再也没有找到。

1960年11月16日，淮阴市五里公社八大队省委工作组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介绍了“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的详细资料。现摘引部分如下：

五里人民公社在第八大队举办的万头猪场，三年来无偿调用第八大队集体和社员个人的现金、物资、粮食、劳动力、耕牛、猪子、农具等折价达24300元，相当于全大队去年分配给社员收入总额的80%，相当于今年预计分配给社员收入总额的90%，向其它大队调用的东西也很多。盖猪舍就拆社员的房子，砍社员的树，调社员的砖头，砍社员的芦苇；没有猪就把大队和社员的猪调来；需要劳动力，就叫生产队派工；没有土地就让生产队划拨。...共拆去社员房子37间，砍树51558斤，大前庄一个生产队就砍了1000多棵树。第六生产队社员周国柱是一个穷母孤儿户，被砍掉树木48棵。社员房子被拆、树被砍，虽然心中不满， 还得放着鞭炮、喊着口号，把木料、砖头送到猪场。从去年11月底到今年3月底，八大队经常有50% - 70%的劳动力被抽去建设猪场。第三生产队和第五生产队由于没有劳动力收获，六七万斤山芋烂在田里。这个大队去冬今春既没有冬耕，也没有积肥，六、七月间，遍地皆草。

这个万头猪场里的生猪大量死亡，仅今年1月份就死了150多头。现在只剩下生猪170头，还难以养活。

这篇报告中提供的在生产中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的事例也是很典型的：

命令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上有关播种面积、作物布局、播种规格、技术措施、种子选择等，统统由上级命令决定，生产小队和社员无权过问，不得因地制宜；二是干部任意打骂社员群众。

今年春天，市委召开了一次有公社书记、大队书记出席的春播现场会议，强调大面积连片种植，规定玉米行距六、七、八寸，株距四、五、六寸。市委书记刘如高在大会上大喊大叫地说：“你们就这么干，如果出了问题杀我刘某的头，如果你们不执行就杀你们的头！”五里公社第二生产队因没有执行上述规定，公社就召开辩论会

把大队书记斗争了一番。第八大队按照上级指示，确定一、三、四小队是“山芋区”，六小队是“饲料区”，第一生产队共有土地470亩，硬要他们种250亩山芋，结果玉米和山芋大减产，每亩山芋只收90斤，连种子也不够。第三生产队有20多亩高梁已经长到1尺多高了，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连片种植棉花的面积，硬要他们拔掉高梁，改种棉花，造成了很大损失。相反，这个小队有一片80多亩地适合种棉花，上级却硬要他们种甜菜，结果没有出苗。第五生产队有30多亩适合种高梁的地，为了连片，硬要他们种玉米，结果每亩只收玉米30斤。

由于瞎指挥，产量大减。社员愤怒地说：“只要我们能当半个家，生产也不至于弄成这个样子！”

在丹阳县大泊公社，干部个人的决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得照办，达不到干部的要求就“训”人是“修正主义”、“右倾思想”、“不服从党的领导”。被公社领导人“训”过的小队干部不计其数。小队干部只能被动地听指挥，不能因地置宜地安排生产。社员说：“大队干部多头多脑，小队干部没头没脑，普通社员昏头昏脑”。在麦收时，公社第二书记提出“两天突击，一天扫尾”的要求，麦子还没割完、已割的还没脱粒，又决定70%的劳动力“只准插秧，不准割麦”。生产队提出不同意见，公社第二书记说“麦子烂了公社党委负责”，还一天五个电话会议、四次电话检查，强迫下面按他的意见办事。结果很多青麦被割掉了，7000多亩小麦霉烂。

常熟县莫城公社是共产风比较严重的一个公社。据中共苏州地委调查，这个公社“平调”的物资按最低价格计算，总值达57.5万元，平均每户损失82.5元。被“平调”的有耕牛、农船、农具、房屋、家禽、猪、粮食、家具、柴草、现金等。被平调的财产用于大钢铁、大兴水利、发展集体经济、盖礼堂、盖办公楼、修干部宿舍等，也有一部分被干部混水摸鱼据为已有。“一平二调”是在强迫命令下进行的。群众稍有不满就扣政治帽子“姓共还是姓资？”、“对党是什么态度？”、“促退派”、“老右倾”等。公社要东西时“一条线”（电话）、“一个印”（通知）、一声命令，要马上送到指定地点。如果生产队干部稍有抵制，还有“四个法宝”：辩论斗争，靠边休息、撤职查办、劳动改造（公社自办的劳改队）。公社要盖礼堂，一天开三次广播会，说：“北京盖人大会堂全国支援，公社盖大礼堂全社支援”，要下面按时送砖送瓦送木料。为了完成任务，闯将大队五小队三个自然村一昼夜拆得片瓦不留。有的社员还在床上睡觉，拆屋队就上房揭瓦。农民说：“共产风是龙卷风，是破产风，刮一阵，穷一次。

由于大量拆民房，使不少地方居住很困难。扬州地区1958年有房350万间，到1960年7月只有300万间。其中，因1958年到1959年水利民

工要自带工棚，拆掉房屋12万多间，搞居民点和工具改革拆掉房屋53000间，办养猪场拆了5万多间，机关单位占用民房24万多间，办社队工业占了15000多间，大队办公室占了50000多间。食堂占用13万多间，粮库占用35000间，民办学校占用25000多间。江都县高徐公社1958年建大礼堂9座，都是拆民房盖的。民房拆得多盖得少，大批农民无房住。兴化县有14110户没房住。高邮县二沟公社合兴大队芦家小队21户65口人只有三间大房，四间小房。有的农民只好露天过夜。

建湖县天美公社郑南大队在1956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曾经是一个富社。1958年10月，建湖县委书记陈豫华在南京开会时打来一个电话，要各地一定把粮食产量报上一千斤。当时早、中稻已登场，产量已成定局，许多人感到为难。支部书记孙喜来在郑南小队开了一次现场会，叫胡达成把五、六亩田的稻子堆在一个场上，说是一亩田产的，并且“验收”，结果产　量达到了1340斤，以此为样板，让各地向郑南大队看齐，这样，建湖就成了“千斤县”。 1958年陶明任工区书记时，汇报粮食产量只准多报，不准少报。结果有的报亩产1000斤，有的报2000斤，有的报1万斤，两万斤。最后，小队长沈文柏报了15万斤。陶明表扬沈文柏，说：“还是沈文柏气魄最大”。 1959年大队粮食核实产量为60万斤，但公社党委书记朱士凯一定要按73万斤算，结果全大队30多天没粮食吃，造成社员不正常死亡50多人。这个公社1956年粮食产量是127万斤，1959年降到60万斤，1960年预计53万斤。粮食减产，社员收入下降。社员编了顺口溜：“入社好几年，得了块半钱，打斤油，称斤盐，余下买包烟，回家和老婆吵了大半天。”

常熟县莫城公社1959年全社水稻平均单产实际是605斤，而公社偏要各大队按800斤的产量制定分配方案。结果征购多了，社员口粮少了。没有粮食，就在小队和社员中反瞒产私分，硬分配任务：强迫不同生产队的社员承认每人偷吃了200斤，300斤，400斤，甚至500斤。群众思想不通，干部带头承认。公社副书记陈根兴、副主任张甫生分别承认了自己偷吃了400斤和800斤。社员说：“浮夸风让人人都戴上了贼的帽子。”

常熟县的浮夸是在“核实产量”的名义下进行的。1959年10月14日，常熟县委在《关于开展核实丰产运动的情况报告》中说：全县“出现了千斤以上的公社4个、大队53个、小队687个。”是怎样“核实”的呢？请看白茆公社。在这一年收割中稻的时候，常熟县委书记和白茆公社书记在白茆召开了“核高产、立标兵现场会”，用“加压力”的手段，弄虚作假，确定十一大队七小队是中稻千斤小队，然后让各队以

此为“标杆”报产量，产量越报越高。县里又开全县大队、小队会计会议，让会计们“核实”产量，会计会上报的产量更高。县委认为会计“觉悟提高了”，让阿各公社书记到车站去欢迎会计“胜利归来”。产量报上去了，为了找到粮食，就大反“瞒产私分”。这样做的结果是，“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人口减少”。

六合县瓜埠公社保江大队1959年本来只产粮食96万斤，大队党支书马其银却上报产量为107万斤。上级就按107万斤下达征购任务。征购任务完不成，就到社员家挨户搜查，把自留地的粮食、口粮全都搜走了。社员只好吃野菜充饥，造成了浮肿、死亡、外流和弃婴。农民说：“干部浮夸，我们浮肿”、“干部说大话，我们送小命”。

三、干部横行乡里

在江苏省档案馆，我看到一份1960年7月间一份“整风整社”的会议简报。不少发言者一针见血。双圩公社团结大队社员代表唐汝贵说：我们真像小媳妇，一句话说不到，大队干部就批评“你破坏”，“你造谣”，“你是右派”，“你落后”，“你右倾”。这些帽子都吓死人。还动不动就说，“要辩论你！”兴西公社南沙大队社员代表史增祥说：田里忙得要死，秧栽下去还没醒棵，草长过秧头不让我们去除草，却让我们去熏土。我对干部说，要先除草，后追肥。他说：“你不听党的话！”吓得我再不敢讲话了。有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绑人，扣饭，任意摧残社员。双圩公社曹杨大队代表说：我们那里的支书、队长狠得不得了，群众背后称他们为“活阎王”。安丰公社仇家大队社员仇正安身体不好没有参加劳动，干部不让他吃饭。一天早上仇正安已经把粥打回去，又被干部倒下来。仇正安回去就上吊死了。海南公社蔡新大队代表李洪德说：“干部浮夸，我们浮肿。” 双圩公陆祖大队代表反映，这个大队的支部书记王某，大哥当副业主任，二哥做大队长，老婆做出纳会计，家属一共14个，个个都不下田。社员说：我们过去养地主，现在养干部。

扬州地区江都县黄思公社17名党委会成员亲手打过人的占53%，7名常委中有4人亲手打过人。副书记陆某向下面干部说：“不打人就是右倾”。从1959年下半年算起，动手打人、吊人的干部就有228人，占干部总数的47.5%，被吊打的群众1602人，打伤多人，打死12人。这个公社三联大队的14名干部就有13人打过人。民兵营长张某一连打了73人，打死2人。孔北生产队共37户，被打的有32户。摧残社员的手段极为毒辣：穿鼻孔，跪田头，脱衣挨冻，火烫手心，针穿指甲，把人吊起来再在颈上挂重物，等等。建湖县天美公社郑南大队的五个大

队干部打过社员近90人。在强迫65岁的女社员劳动时，又拖又拉，还用牛屎堵觜。18岁的女社员胡二保劳动不合干部的要求，被罚脱光衣服，只穿短裤头在田间挨冻4个小时。这个队干部常用扣饭的手段来处罚社员。有20多位社员被扣过饭。这个大队自公社化以来没有给社员分过钱。1960年夏收后分过一次，但社员所得极少。有人编顺口溜："入社好几年，得了块半钱，打斤油，称斤盐，余下买包烟，回家和老婆吵了大半天。"而干部享有特权。社员的顺口溜："社员苦做死做，没衣没裤；干部场上站站，有肉有饭."干部还可以随意挪用公款，而社员有急用苦苦求干部，也拿不到钱，社员说："书记要钱手一伸，会记拿钱不作声，社员要钱两腿奔。"

兴化县夏家大队自从办了高级社以后，连续三年没有给社员分配,，社员的农具折价一文未给，社员的家具要拿就拿，社员的房子要拆就拆，社员的家庭要搜就搜。在1958年8月成立人民公社时，把洋（脚）车、船、犁等大中小农具和社员自养的猪、禽实行了大集中。为了建居民点，大拆房，大砍树。共拆房了70间，庄子周围的270多棵树全部砍光，一棵不留。九月底、十月初，正是秋收大忙季节，却把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劳动力调到白山去种麦、到宦家去砌居民点，时间长达三四个月之久，结果粮食"大丰产没有大丰收"。平均亩产只有279斤，却向上报亩产1600斤。大队饲养的400多只鸭子，被干部吃掉了300多只。一年间，干部仅夜宵就吃掉大米500多斤。社员没有饭吃，有的干部是"一人当官，四户冒烟"（自己、姐姐、岳父、姘妇）。社员住房只拆不盖，住房从422间减少到229间，减少了42%。到了1959年冬和1960年春，走进庄去，只见残垣断壁，通天破屋，废般坏车，触目即是。社员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社员无床无被，无垫无盖。社员说："到了夏家，从人的脸色就可以分出谁是干部，谁是群众。干部没有面黄肌瘦的。大肚子，生小孩的，都是干部家属。"从1959年腊月27日到2月28日，食堂72天没有开饭，造成人口外流和死亡。非正常死亡56人。1960年1－3月，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开饭，又造成大批非正常死亡。1957年，夏家大队人口从939人降到858人。在这期间，死了162人（1959－1960年间死了142人，生了81人（1959－1960年间生了21人）。

据1960年秋初步统计，吴县东桥公社有41%的干部犯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错误，有1284人受到他们的伤害。从1960年1月24日到8月5日，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20起，其中已经查明被干部逼死人命的有6起。有些坏干部横行霸道，任意扣粮、扣钱、罚工、罚饿。公社党委委员兼一大队党委书记李某，1960年1月，在"消灭小自由"的口号下，抄家44户，夺去了77%的家庭锅子，处罚了51人，斗争了10人，有4人被逼自杀（其中二人获救）。五好社员查小妹被抄家时搜

出了一点大米（这是查小妹省下的口粮，留给小孩做粉吃的），让查小妹交待。查小妹有口难言，上吊自杀。她死后小孩无人照顾，不久也死去。公社党委副书记鲁某，在他分管的第9、第12和第13三个大队里，打了40多人，罚饿101人，罚款1158元，罚粮200斤，罚工102次，抄家121户。他还指使小队干部没收社员的多种财物，铲掉20多处自留地，夺走28户的锅。这个公社的领导人认为，“凡是自留地种好了的地方，大田定要荒掉”，所以，他们强迫社员把自留地里的肥土挑到大田里去。

六合县瓜埠公社保江大队副大队长谢某自己经常多吃多占，谁对他的行为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就对谁报实施复，先后打过15人，停伙22人，逼死两人。社员卜金奎曾批评过谢某特殊化，谢某不让卜吃饭，还用棍子打卜，卜气得把碗和饭票摔在食堂地上，说：“我不活了，不给吃，反正也是死！”谢说：“死就死，死了少一个懒汉！”卜回家后就上吊死了。谢还说：“死了活该！”保江大队勤劳小队60岁的饲养员员张昌荣，双眼失明，队长郭某为了让自己的姐夫当饲养员，让张下田劳动。张不下田就扣他全家的饭。张一到食堂打饭就挨打，一共挨打了10多次。张没办法，就偷了队里的东西，又挨了一顿毒打。张只好到瓜埠街上讨饭。1959年大年三十晚上，张死在滁河岸边的草沟里。这个小队12岁的小女孩林小絮子，体弱不能上工，队长郭某硬要她上工。林小絮子每天只吃二两粮，饿得不行就到田里偷萝卜吃，被打得头破血流。不久，林小絮子死去。她的母亲周秀英也被队长打过22次，经常被扣饭，有一次几天不给饭吃，不久也饿死了。社员林海州，因患哮喘病，病情严重时不能上工，经常被队长郭某停伙，停伙时他只好到瓜埠街上讨饭。有一次，林饿得倒在街上。家里人把他抬回来就死了，临死前说：“叫队长给我吃些！”郭听到后骂：“吃你妈的屁！早死早好！”保江大队大小队干部共41人，除了一个小队长没打过人以外，其他都打过人，全大队的劳动力28%的劳动力都挨过干部的打。干部对社员如狼似虎，自己却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社员说：“过去养肥猪，现在养干部”。对集体财产，级别越高的干部控制权越大。社员说：“公社干部要钱张张口，大队干部要钱伸伸手，小队干部要钱得研究，社员要钱磕破了头”。

干部们对群众作风十分恶劣，却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瓜埠公社保江大队党支部书记马某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他“15岁参加土改斗争，为了组织高级社，他和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这时他打人的作风发展了起来。每月要打二三十人，有时每天要打几个人”。但是，他“听党的话”，“为了算帐兑现，他可以几夜不睡觉，为了检查备耕生产，他可以少吃一顿饭，备耕的中心任务是保养耕牛，他连夜不睡觉跑遍全大队所有牛棚检查耕牛，春节后，县委号召消除赌风，他一连

几夜不睡觉去抓赌”，“他开会老坐在公社温书记旁边，看脸色行事。温书记说，1960年丰收，他也说，粮食多。温说，试验田可收5万斤，他便说，5万斤不多。温说，麦子要赶快割掉，他马上回来命令社员：青的也得割”。他所在的大队一再谎报产量，卖过头粮，直到这个大队发生严重的肿病（201人）、死亡（75人）、弃婴（22个）、外流（13人）时，他还谎报有3万斤粮食。另据省委检查团扬州分团报告，农村干部中“积极工作，执行上级决议，搞试验田，干劲大，热情高，．．．．这是普遍的、主要的情况。．．．．．根据靖江县孤山人民公社大队排以上的102个干部调查，88%的干部能积极工作，坚决执行上级决议，这是取得大跃进和重要因素之一”。

四、粮食短缺　物资匮乏

《江苏五十年》一书的“综合篇”中谈到，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得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起来，粮食连续三年减产，一批工厂下马，集市物价猛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遇到了特大困难。

江苏省的粮在大跃进期间是减产的，1960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957年的81.8%，而征购任务一直居高不下。从下表可知，江苏省净拥有粮食连年下降。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表6－1　1957－1961年江苏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220．00	230．00	201．80	195．00	180．00
	贸易粮	191.30	200.00	175.47	169.57	156.52
征购		65．69	74．52	74．26	58．76	44．05
销售		63．82	70．56	73．14	49．41	40．70
净拥有		189.43	196.04	174.35	160.22	153.17
总人口（万人）		4183	4258	4290	4246	4243

人均净拥有（斤） 452.86 460.40 406.41 377.34 360.99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江苏》。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江苏各地都有粮食困难的记载。

丰县1953年粮食总产量是30787万斤，1960年只有25000万斤，沛县1955年粮食总产量是34986万斤，1960年只有26000万斤。大牲畜也是连年减少。丰县1955年有大牲畜72000头，1960年只剩31000头。

1960年12月，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干部徐慎行给陈部长和省委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个县当年粮食清仓入库的数字为1亿7587万斤。泗阳需要的粮食是：种子3620万斤，饲料670万斤，社员口粮1亿4002万斤（11月底以前每人平均已吃掉151斤，共计8560万斤。12月1日到明年6月10日，每人每天以半斤计算，共5442万斤），城镇供应和行业用粮1500万斤。共1亿9792万斤。需要和产量相抵，还缺粮2205万斤。其中山芋4斤折粮1斤，稻谷1斤顶1斤。如果按规定山芋5斤折1斤，稻谷打七五折，则缺粮3314万斤。在这种情况下，地委还要求泗阳调出粮食1500万斤。县委多次开会研究，为了分担国家困难，不向省地委要粮，力求自己平衡。措施是：拿出600万斤榨油后的豆饼、花生饼、棉籽饼充口粮。社员平均口粮标准由半斤降为6两2钱（16进位）。这是县委定的标准，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太低了。实际上能吃到社员嘴里的远远低于这个标准。

本来口粮指标很低，各级干部还要千方百计地尅扣社员的口粮。以准阴市王兴公社为例，尅扣口粮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层层留机动粮。公社安排给沿河大队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为0.4348斤，口粮总数为106514斤。但大队在向小队安排时，又从总数中扣除1万斤为大队机动粮。这样，社员的口粮降为每天0.3971斤。小分配给社员时，又扣下一部分作为小队的机动粮。第二，套包产指标，分空头粮。两准大队每人每天口粮标准为0.5斤，但所属12个生产队山芋没有过秤，而大队是以核定山芋产量计算口粮的。因此，大队给各生产队12月份的口粮中有99800斤山芋的包产指标（折粮19960斤）。山芋过秤后，实际只产山芋63800斤，缺3500斤（折粮7000斤）是空头数字。第三，倒算过去多吃的粮，扣发今后的口粮。在口粮安排落实以前，社员多吃了一些。在安排今后口粮时，把过去多吃的也算在今后分配的指标内。第四，归户计算，分配到各户的口粮加总起来比大队分配

给小队的粮食总数要少。第五，克扣超支户和地主的口粮。两淮8队社员厉秀英等五户因人口多，劳动力少，年终决算时超支（欠队里的钱），家里拿不出钱还队里的债，队长就不发粮票给他们。此外，发给地主的口粮每人每天比社员少一两。

尅扣口粮的情况不是个别的。1961年1月20日，省委干部李树仁在给陈副省长、逢部长、省委办公厅并淮阴市委、地委的信中反映，在王兴公社有些生大队正处于饥饿状态。沿河大队"集体加个人的胡萝卜只能吃到春节，山芋叶子只有2000斤，按每人每天半斤计算，只能吃四、五天"，连省委工作组在这个公社的28名干部也有10人患了浮肿病。李树仁在这封信说，在口粮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有的生产队还克扣社员本来已经很少的口粮。克扣口粮的方式有多种：1）公开克扣。如两淮大队第8生产队发放1月份口粮的时候，竟将占口粮总数40%的山芋干扣而不发；2）将口粮挪作它用。水利工地上每人每天补助的半斤粮食、生产队长外出卖柴吃掉的粮食都摊到每户社员家中，在发放1月份口粮时扣掉了；3）干部认为粮食有蚀耗和秤耗，在分口粮时扣除；4）干部克扣尾数。分粮食时只给社员整数，小数点以后干部留下；5）大月发小月粮。去年12月本来是31天，却只给社员发30天的粮食；6）在粮食的运输和保管中舞弊。将舞弊中损失的粮食在分配社员口粮中扣除。等等。被克扣的社员口粮有很大一部分被干部多吃多占了。李树仁在信中说，王兴公社是一个经历了四个月的三反运动、并有工作组驻扎的公社，尚且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尅扣口粮现象，其它公社就更难说了。昆山县有些地方规定：外流人口扣口粮，不出工的扣口粮，偷红花草的扣口粮，不请假的扣口粮，生病的扣口粮，完不成劳动定额的扣口粮，不在食堂吃饭的扣口粮。

农村饥荒，城市物资十分匮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商业部门拥有分配物资的权力。那时名义是凭证供应，实际上，经常有证券买不到东西，有限的物资就全凭商业部门分配了。商品越匮乏，他们的权力越大。这时，商业部们就利用特权谋私肥己。1960年11月4日孙海光、邱路二人写的《关于苏州市副食品市场供应情况的检查报告》中，揭露了苏州商业部门开后门、多吃副食品、乱搞协作、铺张浪费的问题：

苏州市商业局所属的蔬菜、水产、食品三个公司，所有干部个个开后门，多吃副食品。蔬菜公司今年1月到8月，开后门卖掉的洋芋、长豇豆、荸荠、大白菜、胡罗卜共339000多斤。该公司水果批发部1月到8月，共购进苹果2000多斤，给内部人员吃掉的就有1500多斤。水产公司114个干部1月到9月共私买鲜鱼4693斤，平均每人41斤，其中买了100斤以上的有12人。今年1月到9月，市场上欠群众肉票58万张，

折合猪肉、禽肉17万斤，而食品公司内部人员购买和开后门卖掉的肉食就有28000多斤，折合肉票40多万张。该公司鲜肉批发主任夏某在今年4月份就买猪肉猪五脏96斤。金阊区菜场人员共有494人，其中参与集体私分蔬菜的就有432人，占员工总数的87.5%。原南豪街分配部主任金某、李某二人，在今年春节前私自从仓库中运走一车大白菜，“五一”节供应居民的油豆腐也被他们一夜分光。朱家庄菜场人员在国庆节每人偷分10斤藕、5斤菱、3斤毛豆。据估计，这个区每天被菜场人员分掉的蔬菜约在2000斤左右。

孙海光、邱路的这个报告还揭露，1960年上半年，苏州市财贸部门，拿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的副食品去与无锡、内蒙古、东北等地乱搞协作。计有：肉5万多斤，鱼3万8千多斤等。在协作中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商业局去年请客76次，75桌。今年请客36次，59桌。更令人痛心的是，在严重饥荒的情况下，大量食品霉烂在商业部门的仓库里。这个报告称，半年多来，蔬菜公司由于保管不善，烂掉的食品计有：梨子15万斤，桃子2万斤，桔子2万斤，萝卜干3万多斤，猪肉及猪五脏2万6千斤，鱼虾5万斤，虾酱6千斤，皮蛋20万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业部门不是做买卖的，而是国家分配物资的权力机构。没有监督、没有制衡的权力，没有不腐败的。

五、江苏也有人吃人

由于“共产风”和生产上瞎指挥，粮食大幅度减产，再加上高征购，农民留下的口粮很少。到了1959年春天，各地就出现了饥荒。徐州地委、淮阴地委、盐城地委、南通地委、扬州地委等纷纷给省委打报告，要求省委调粮食支援。靠近江苏的山东、安徽的地方政府也给江苏省委写信，说江苏省不少农民外流到他们那里，给他们增添了压力，要求江苏省迅速解决。

1959年1月28日，山东省临沂地委向山东省委报告：“近几天来，江苏省邳县、新沂等地部分群众流入我区郯城、苍山等毗邻地带，仅据郯城报告，现流入该县南部的就有2000多人。他们说，没饭吃，才外出逃荒。还说，江苏一天只发4两粮，干部叫社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邳县食堂10天没开饭，放节约粮食的卫星。”1959年4月4日印发的《整顿建设人民公社情况汇报第23号》记载了以下情况：

兴化县：种子吃光，在临播种季节，各地没有种子。人口大量外流。大营公社八一大队有3700人外流，动员回来后，只安排了2500斤粮食，一天全部吃光。在大饥荒期间，兴化县饿死三四万人，县委书记

郭玉汉被撤职。

高淳县：3月底统计，到5月底共需口粮259万斤，种子1073万斤。除去存粮，共缺824万斤。目前群众吃粮标准为：1－3岁每天3－4两，3－7岁每天4－6两，7－15岁每天6－8两，16岁以上劳动力每天11－12两（这里说的都是16进位，是原粮）。由于层层尅扣，实际社员还吃不到这个数字。全县患有浮肿病人3000多人，外流人口3000多人。

溧阳县：据3月19日统计，吃到5月底还缺粮120万斤。到小麦收割（6月上旬）还缺粮400万斤。浮肿病发展较严重，开始出现死亡。

1959年3月25日，南通地委向省委作的“关于粮食问题的紧急电话汇报”中说，全地区有2955个食堂的生活没有安排好。由于食堂停伙，加上干部“压服”，全地区2月份以来（主要是3月份）发生自杀事件57起，共死掉17人。自杀身死的情况是：1）年龄大，食堂又不开伙，自杀身死的4人；2）没有吃的，到处找东西吃，中毒身死的2人；3）因瞒产私分被干部发现，干部教育方法生硬，自杀身死1人；4）从水利工地上开小差回来，食堂不让吃饭，气愤自杀而死4人；5）因挖社员余粮，社员实在没有，被迫自杀身死5人。这个电话汇报中说，如皋东城公社有99个食堂每天只吃一顿粥。海门县东新公社五工区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因吃了三天菜，饿昏在床上。不少地方发现浮肿。由于粮食紧张，海门县三阳公社社员把很稀的粥抬到公社党委，一边走一边骂：“这叫什么社会主义？这叫什么人民公社？过去叫我们吃萝卜，现在又叫我们吃薄粥！”

1959年3月24日，《南通县委关于石港人民公社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说，县委曾一再指示，公社、工区不许层层扣留机动粮，但据了解，公社、工区、食堂都从社员的口粮中留下了“机动粮”。在社员口粮如此不足的情况下，还用挨家摊派的手段，从社员口粮指标中强行扣下各家交粮任务，让社员在交粮计划表上盖手印，最后张榜公布。八工区四连第十三生产队，28户，出榜公布以后，就有14户因无口粮而哭泣。第四生产队28户，有18户为无粮而哭泣。这份调查报告还披露了几起饥饿的事例：

黄吉姑娘，女，30岁，中农成份，住16工区，属第5食堂。家中有5口人。其夫黄义在九圩港做河工。她和15岁、13岁、3岁三个孩子在家，4口人每月供应30斤粮食。该食堂饭票每10天发一次，3月2日，是第10天中的第8天，饭票用完了。当日中午，黄吉姑娘到食堂去，看到那里正在煮胡萝卜。她向炊事员和队长请求打一点胡萝卜给孩子吃。队长说：“这胡萝卜是给干活的人吃的，没你的份。”她眼泪汪汪

地回去了。一回家就在床上绞颈，被第二个孩子发现，喊了社员徐明英、工区主任任国安去，她已气绝。解开绞绳，灌了热水以后才苏醒过来。

刘治科妻，29岁，中农成份，住11工区，属第7食堂。其夫去九圩港开河，她带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2岁）在家。每天供应粮食12两（16进位，相当于0.75斤）。3月2日早晨，两顿共打五勺子粥，中午3人各吃一碗粥后，下午挑了半天塘泥。晚上将食堂分的一点胡萝卜煮了给孩子吃。她吃了一点擦菜就去食堂开会，因饥饿而昏倒在食堂。

葛桂兰，男，71岁，下中农成份，住9工区，属第15食堂。他家有儿、媳和15岁、8岁两个孙子。3月3日早晨在食堂打回6碗粥，5人各吃一碗，儿子葛洪硬要他把剩下的一碗吃了。中午大孙回家发现祖父服了农药，当即请医生急救。他硬不肯吃药，并说："我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省点粮食给你们吃吧。"最后还是给抢救过来了。

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宝应县4万人饿死，事情闹大。江渭清亲自出马，逮捕了县委书记徐向东。江虽自我检讨说"宝应事件，省委要负一定的责任"。在1959年上半年，本来很富庶的高淳县就已发生严重的的饿死人事件。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回去说："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倾了，你们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况。"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委书记刘元撤职了事。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 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武进县东安乡，仅两万人口， 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人。1959年12月31日，中共徐州地委《关于第四次生活安排扩大会议的报告》中说："最近个别地区因多种疾病引发的浮肿病约有15000人，妇女子宫下垂3000多人。

1960年夏天，食堂还是大面积停伙。扬州地委估计，夏粮入库情况不好，部分地区到秋收的口粮还要缺15天左右。江都县各食堂普遍一天三顿粥，粥很稀，群众说跟喝水一样。兴化县"三无食堂"（无粮，无草，无钱）127个。粮食质量很差，加工又很粗糙，有的食堂"只见泥石不见米"。江都县有个食堂在40斤粮的粥锅里竟捞出麦芒4斤多。社员说"喝粥满嘴攻，吃饭卡喉咙"。由于吃的质量太差，严重影响社员健康。兴化县昭阳医院病人成倍增加，病人开刀后发现肠壁上粘着许多麦芒、碎石、碎磁等。疾病、死亡、外流人员不断增加。据高邮县调查，从1955年到1958年人口出生率一般为3.3％ - 3.7％，死亡率一

般为1.3% - 1.5%。但1959年死亡率上升到3.5%，出生率下降到1.8%，死亡率大大超过了出生率。1960年上半年死亡率2.85%，出生率1.08%。这个县1960年上半年总人口为59.4万人，比1957年减少了7万人。由于妇女子宫下垂、月经闭塞影响生育，很多地方近两年生孩子很少，如江都县竹家墩农场有45名妇女，几年来只有两个人怀孕，其中一个还是干部家属。

距南京不远的茅山人民公社西冯大队，稻麦两熟田占三分之二，一熟水田占三分之一，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也有很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1957年以来，连续三年征了过头粮，农民口粮很低。干部尅扣社员的口粮的现象相当普遍。出现了浮肿、消瘦、子宫下垂等疾病。从1959年开始，就改变了过去生多于死的规律，变为生死相平，1960年上半年死多于生。

县志是官方定稿的公开出版物，但其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情况。据《溧水县志》1990年版第94页记载的数字推算，三年间有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又据《常熟县志》1990年版第1030页数字计算，在3年间非正常死亡11000多人。据《高邮县志》第61页及162页数字推算，1959年非正常死亡16000多人。高邮县两位县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大加批判，1960年又非正常死亡17000多人。1961年，又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

苏北里下河地区1961年与1957年比较，人口减少了5.5%，劳动力减少了12%，发育不良的青少年很多。据兴化、高邮、宝应、建湖、阜宁、盐城、东台七县统计，直到1962年还有病人151200多人，占七县总人口的4.5%，而且发病人数还在增加。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3月，宝应县全县死亡11643人，占总人口的1.57%，其中非正常死亡的有5500多人，高塍公社死亡率3.8%，和桥公社上水村和下水村两个生产队共470人，死亡46人，死亡率达10%。宝应县望直公社望直大队原有人口2182人，到1961年6月，只剩下1094人，这1094人当中还包括县、公社下放的人口。

1960年7月，兴化县全县222个食堂开开停停，全县病人达4万，其中浮肿病、青紫病11046人，妇女子宫下垂8790人，失去父母的孤儿1423个。社员一生病当即减少口粮，病还没有痊愈就要下田劳动。垛田公社营业所主任假借医生名义在深夜把病人全部喊起来集中排队，手里拿着竹板说：“这就是医生！”用竹板逼着大家下田劳动。有的病人挑了一担土就跌倒而死了。

1960年10月9日，中共江苏省委转发了省委办公厅和兴化县委联合工

作组关于兴化县三个不同类型生产队的调查报告。在比较好的生产队里（仲家大队），从未放松过“三包一奖”制度，对于风行各地的合并生产队，这里也是“上动下不动”，而且从来不开夜工，保证社员8小时睡眠。这个大队除了少数人患浮肿病以外，没有饿死人。全大队757人，1958年到1960年人口没有减少，还增加了8人。而条件差不多的夏家大队情况就严重得多。1955年，这里“户户翻新屋，人人添新衣”，平均口粮590斤。可到了1959年冬、1960年春，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断墙残垣，通天破屋，废船坏车。社员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社员除了一只碗、一条裤之外一无所有，“宿在桥下避露水，蹲在塘里等裤干”。在两三个月内天天有死人。从1959年冬春之间，食堂72天没有开饭。这个人口935人的大队，就有315人外流，75人患浮肿病、青紫病、干瘦病，56人非正常死亡。1960年春天，这个大队的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开饭，外流、肿病、死亡情况比1959年更严重。几年来，夏家大队人口生死相抵减少了9%。夏家大队是典型的“人祸”。

1960年10月下旬，中共上海局办公室杨主任奉柯庆施之命到徐州“看看”，他看了丰县、沛县和东海县。10月30日他在徐州市南关招待所向地委汇报时谈到，三年来，这几个县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牲畜大幅度减少，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社员口粮只有半斤（其中地瓜干7.3两，地瓜四斤折一斤粮食）。县里对浮肿病不认帐，到下面去看浮肿病不少。老农民说：我们这些人三分这一过不了冬。杨主任说：连续三年吃半斤，人的底子再厚也不行。浮肿病是身体入不敷出的结果。以沛县为例，1958年有人口587049人，1960年上半年只有534528人，从1959年到1960年上半年，净减少了52521人。高淳县1958年全县人口为28万，劳动力为12.3万，从1958年到1960年8月，死亡近两万人，其中劳动力1万多人，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0%。该县东坝公社两年死亡劳动力94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4.6%。

建湖县天美公社蒿崙大队仅1960年1－6月，就死亡76人，其中患浮肿病、干瘦病、黄病和干部尅扣口粮而死的62人，占总人口的3.7%。1960年9月，患有浮肿病、子宫下垂、消瘦病等病人107人。社员孟庆和饿得不行找干部要点吃的，干部不但不给，反而把他推倒在地，说他装死，结果，孟庆和活活饿死。他死三天以后，三岁的女儿因无人照料也死了。而干部却大量多吃多占，还拿食堂的粮食回家喂猪。

位于省会南京不远的溧水县，从1958年开始，除了大刮共产风以外，还把大量的劳动力调离农业，要求全县的“十大水库，全面开花，一气呵成”，有的公社还大搞“二十个万”（万鸡山，万亩桑，万亩茶

等）。结果，粮食连年减产。粮食总产量1957年的21300万斤，1959年减少到14000万斤，1960年又减少到12000万斤。但县委领导人觉得粮食产量“低于邻县说不过去”，不承认粮食减产。1959年粮食刚刚入库，不少公社已经无粮发给社员，东屏的三位公社党委书记到县里哭诉无粮，县里不理，反而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将反出来的220万斤“空头粮”（被逼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没有粮食）当作社员口粮分配。有80个大队从12月起停发口粮，大批食堂停伙断炊。群众只好吃树皮、草根、青麦苗。生产停顿，肿病蔓延。县委还认为“病情比去年轻”。为了让倒里供应粮食，东屏公社主任把路边的弃婴送到县委，县委批评说这是对抗县委的行为。到1960年3月初，全县发病人数至少23000多人，死亡人数至少3500多人。此时，县委还向地委写假报告，说浮肿病是“原来有这个基础”，是“群众不卫生”，群众外流逃荒是“喜工厌农”，弃婴是“重男轻女”，还不向上级反映缺粮问题。1960年1－6月，全县浮肿病人达29200人，青紫病1840人，死亡6831人，弃婴420人，外逃4730人。实际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此数。如东屏公社原来上报死亡400人，后来核实为619人。有的公社由于死人太多，太集中，无棺无席，就白坑掩埋。就在工作组刘振国到东屏公社检查工作时，就有社员把两个小孩丢在塘里溺死。《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

溧阳县委第一书记颜景詹1959年春下乡慰问浮肿病人时看到10个患者死在路上。其中，43岁的农民周目中，从水利工地回来以后，晚上吃了两碗粥，过一会儿出去小便时就倒地死亡。丹阳县大泊公永安大队书记派社员汤志元到铁路上去做工，汤志元粮食不够吃，三次回来请求解决，这位大队书记大骂：“大队不是饭店，你给我滚出去！”汤志元没办法，喝了六七天咸菜汤，结果饿死在路上。

宜兴是江苏最富饶的地区，谁也不会想到这里也会饿死人。但是，这里不仅饿死了人，还有人吃人的记录。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和刘耀华同志到和桥公社，听到有些社员谈去冬今春饿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这个公社今人口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七。今年春天因为死人太多，人死后连稻草也不包。高楼大队有一户人家一天死了两个人，就用一副担子把两个死人挑出去了事。个别公社甚到发生过把丈夫、儿子害死后吃人肉解饥的事。堰头公社大儒大队贫农女社员孙来弟，丈夫浮肿病严重，不能起床。今年4月1日晚上，她用棉袄把丈夫闷死后，将内脏拿出来煮吃。铜峰公社黄童大队贫农社员卢洪生患浮肿病，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也把内脏拿出来吃了。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当然是个别的，但人口外流、疾病、死亡弃婴是大量的。

孙海光在这份报告中说，1959年，宜兴县年人均口粮290斤左右，1960年为314.7斤。宜光县粮食总产量1957年为5.1亿斤，1958年为6亿斤左右，1959年为4.8亿斤，1960年预计粮食总产量为3.97亿斤。在1960年的3.97亿斤总产量当中，种子4300万斤，饲料358万斤，社员口粮1.885亿斤，国家征购1.6145亿斤，储备粮45.7万斤。到他们写报告时，1960年的口粮部分已经吃掉了9623.8万斤。还剩9227.2万斤，按全县59.898万农村人口算，每人平均只有154斤，这点粮食要从12月底吃到明年6月。当然，这只是干部在办公室里算账，扣除浮夸后再经过层层尅扣以后，吃到社员嘴里的‰低于这个数字。这里说的还是带壳的原粮。青菜、胡萝卜已经吃光。孙海光看了几个食堂，看到一斤米放了13斤水，粥实在太稀。因此，入冬以来浮肿病、消瘦病人数逐日上升。据38个公社统计，11月下旬为6120人，12月上旬为6973人，12月中旬为10673人，12月下旬仅27个公社就有14650人。这些数字还是不完全的。人口死亡也是不断上升。如高塍公社9月死亡44人，10月死亡49人，11月死亡61人，12月前20天就死亡66人。

江苏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可以利用《江苏省统计年鉴》中人口资料作一下推算。设某年平均人口为上年底人口和当年底人口的平均数。1959、1960和1961年三年江苏省的平均人口分别为4273.89万、4267.59万和4244.52万，三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4.55‰、18.41‰和13.35‰，而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为10.26‰。以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值，则可计算出这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18.33万、37.78万和13.12万，合计则为69.23万。（此外，由于饥饿，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出生率下降，出生人口减少。采用同一套数据进行计算，三年少生人口202.89万人。二者相加，则是大饥荒结江苏省人口的损失为272.12万人。

《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一书中记载的人口数据和《江苏统计年鉴》略有差别。依据这套数据计算所得，大饥荒三年中，江苏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79万，少出生人口192.06万。大饥荒使江苏人口的损失为255.85万人。

综合两本书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可以近似的认为，大饥荒期间，江苏省非正常死亡约70万人，少出生约200万人。大饥荒使江苏人口损失约为270万人。

这两本书中的数据都是官方数据。显然，上述计算结果是最低数。

六、政策放宽　形势好转

由于贯彻中共中央两次郑州会议精神和落实中共中央12条政策，扭转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些作法，同时放宽了政策，实行了“三包一奖四固定“的政策，农民种自留地也放松了，1960年底到1961年初先后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到1962年，江苏农村情况开始好转起来，从集市贸易上可见一斑。各地商品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小到大，集市价格多数回落。到1962年夏天，过去市场看不到的东西现在有了，过去很少的东西，现在多起来了。市场上多年不见的生薑、百合、荷藕、荸荠、茨菇、以及家庭副业小商品都有卖的。6月份上市品种比上年同期增加60%左右。吴江县震泽公社的集市情况如表6-2。

表6-2 吴江县震泽公社集市情况

	1961年二季度	1962年二季度	比上年同期增减
水果	1217（担）	2819（担）	＋131．6%
鲜鱼	338（担）	883（担）	＋161．24%
家禽	2701（只）	5281（只）	＋95．52%
菜兔	2015（只）	10286（只）	＋410．97%
鲜蛋	12115（担）	16576（担）	＋30．37%
绵羊	1003（只）	4521（只）	＋350．47%

资料来源：江苏省人委财办秘书处：《金沙等六个集镇集市贸易的情况调查》，1962年7月15日。

这些商品不是农民吃不完才拿到市场上去卖，而是急需用钱。到集市来买东西的大多是城镇里有工资收入的人。1961年集市贸易价格很高，比国家牌价高出很多倍，当时有“一个八级工不如一捆葱”的说法。随着上市东西增多，价格逐渐下降。集市价格和国家牌价之比可见表6-3。

表6-3 吴江县震泽公社集市价格与国家牌价之比（%）

	畜禽蛋鱼	蔬菜类	日用杂品	生产资料	柴草类	鲜果类	苗禽苗畜

1961年初 347% 374% 167% 200% 87．7% 265%

1961年5月 311% 291% 174% 222% 277% 223% 327%

1961年6月 275% 364% 187% 236% 282% 153% 328%

1962年5月 249% 289% 213% 313% 306% 173．3% 260%

1962年6月 197% 184% 208% 347% 248% 130% 222%

资料来源：同表6-2。

从表6-3可以看出，食品类的价格是随着产品的增加是下降的，由于社员种自留地和自养家禽家畜的积极性提高，生产资料格和苗禽、苗蓄的价格上升。由于解散食堂，社员恢复了家庭生活，日用杂品和柴草类价格上升。

第七章　岭南风云

位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是渔米之乡，濒临港澳，经济发达。这么富饶的省份也没有幸免大跃进以后的灾难。饿死的人虽然没有四川、安徽、河南那样多，但还是给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一、广东创造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研究中国大饥荒的学者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文献：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的报告作的长篇批示。赵紫阳的报告是反映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毛泽东批示中认为“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这个批示和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传遍全国。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

广东省这个经验是怎样产生的呢？让我们借助历史资料还历史本来面目。

1958年“放卫星”把粮食产量说得很高，因而粮食征购指标相应提高，加上公共食堂一天三餐干饭，三四个月时间，粮食统统吃光了。到1959年1月，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要求返销粮食的告急之声四起。

陶铸坚信1958年粮食大丰收，不信没有粮食，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了产量，把粮食收藏起来或者私分给农民了。农民出于自卫，隐瞒了或背着上级分了一点粮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铸想像的那样多、那样普遍。

1959年1月中旬，陶铸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他到东莞是事出有因的。1958年底，就在一些地方断粮的情况下，广东省在表彰先进的“群英大会”上再次要求各县报粮食产量，并且宣布，凡是平均产量达到千斤的县，命名为“千斤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来开会的各县代表，由县长带队。在报产量时，东莞县长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张，打电话给县委书记，问要不要报千斤县。县委书记告诉他：“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回来再说。”锦旗、奖状拿到手后，县长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回东莞，而是塞到挎包里，静悄悄地送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

东莞拿回了奖品，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千斤县”。陶铸反瞒产，就找到东莞县。陶铸一行到达东莞县城的那天晚上，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干部们看到来头不小，就采取了蒙混过关的办法。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他在某村反瞒产，生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另一位公社书记说，他去过好多农民家，农民屋里、仓里是谷，箩筐里是谷，床底下有谷……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出来唱反调，她是广东省省长陈郁的夫人袁溥之，是省里派来反瞒产的工作组成员。她心平气和地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同志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

1月11日，在东莞县反瞒产大会上，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基层干部承认“隐瞒”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县委誓言要追出7500万公斤到1亿公斤粮食。陶铸警告大家：“保证三餐干饭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粮食。”他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粮食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

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陶铸的这篇调查报告。在这篇调查报告中，陶铸把公社的种种问题，归结为最重要的一条，即集中统一和本位主义的矛盾。所谓本位主义，就是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有个隐瞒了粮食的生产队解释，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确保供给制突然结束时，生产队仍有必

需的口粮。陶铸断言被隐瞒的资金，大概占人民公社总投资的四分之一。他在虎门开了一个星期会，从农民的米缸里，真正挖走了558万公斤粮食和1.2万元资金。

与此同时，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赵紫阳率领另一支工作队，到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雷南县调查。1月23日，雷南县召开4000名干部的大会。赵紫阳认定，雷南有严重的瞒产问题，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开展反瞒产运动。自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用来改善食堂伙食，不坦白的不准回家。

接着，赵紫阳在雷南县召开全省电话会议，把反瞒产运动，扩大到全省各地。他估计全省有25亿至30亿公斤隐瞒的粮食，几乎是1958年公布粮食产量的10%。1月25日，他指责全省多数基层干部都卷入了瞒产活动。 一场反瞒产斗争，骤然爆发了。

形形色色的辩论会、斗争会、大字报，有如狂暴的南海台风，铺天盖地而来。雷南县7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被迫承认参与瞒产。在被指控参与瞒产的基层干部中，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6人被拘捕，2人被监禁，109人被撤职，大约有50%的基层干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和处分。

反瞒产所到之处，风云变色。有些地方，基层干部不报瞒产，就不准回家过年；有些地方，逐家逐户搜查粮食，把农民往年的旧粮，也作为瞒产没收；有些地方，连农民家一罐半罐黄豆、花生、芝麻、菜种也搜刮一空。

雷南的反瞒产运动大有斩获。不仅查出了7000万斤粮食，还取得了解决农村粮食问题的经验。1959年1月27日，赵紫阳给省委送上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不正常的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赵紫阳在这个报告中介绍了作法：要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要反复交待粮食政策和对瞒产干部的政策。坦白交待，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

1959年1月31日，中共广东省委转发赵紫阳的报告批语说：“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

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195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转批了赵紫阳这个报告。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语中写道：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及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1959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按照赵紫阳同志在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

其实，陶铸在《人民日报》上发的文章，赵紫阳给省委的信，都和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1959年广东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将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由于连年减产，征购任务居高不下，农民实际比常年减少了61.250亿斤粮食，等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再加上公共食堂造成严重浪费，能够留给农民活命的粮食，已经见底了。农村人口，普遍一个月吃不到10公斤原粮，不少地方，一人一天只有三四两米。肉、油基本绝迹，青菜也非常罕见。到了月底，饿昏了头的人，靠吃蕉头、蕉渣、禾秆、鸡糠饼、木瓜心、番薯藤，维持着奄奄一息的生命，一些饥不择食的人甚至吃起观音土。省委派到四会县搞瞒产私分的干部汇报说，他们到了农村，看了农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没有一粒米。老农诉苦说，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有个工作人员，在一户农家看见热气蒸腾的锅，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锅里煮的是什么，一看，锅里煮的是野菜。

农村已无粮可购，城镇的粮食供应四面告急。省政府的应急措施是：把口粮、食肉、食油，一降再降。 1960年初，许多地方已降至一人一月只有9～9.5公斤米，3两糠油。粮食、薯类、猪肉、家禽、食油、鱼等，已从市场上销声匿迹，货架上空空如也。偶一出现，便引起疯狂的抢购，价格贵得惊人。在韶关，一公斤高价猪肉卖20多元（当时的计划价格每仅斤只有1元），一公斤南瓜也卖到 2元多，用米糠做的小糠饼，4～5分钱一只，人们买回来当饭吃。价格是1957年的10多倍。

4月20日，省民政厅一份报告指出，全省水肿病人，已从上旬的43181人， 激增到127821人，增加两倍。这是骇人听闻的数字。从中山、灵山、合浦、从化、新兴、梅县、潮阳、清远、儋县、东方、

乐东等县，传来一片噩耗。据省农业办公室对部分地区的“极不完全统计”，全省有80多万水肿病人。另外还有子宫下垂、闭经、干瘦病等，成了比伤风感冒流行得还快的病症。阳山县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总人口的4.02%。高要县有的生产大队的死亡率高达13%。

陶铸不是撞到南墙不回头的人。1959年3 - 4月间，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料，终于得出结论：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省委分析说，一是头脑发热，报产报高了。根据报产而制定的征购粮食的计划不符合实际。因此，购了过头粮。其次，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造成了大量浪费。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5月6日，省委发出《关于立即全面检查和采取有效措施消灭和遏止水肿病的紧急指示》，撤换了发病率和非正常死亡率最高的那几个县的领导。

不久，陶铸到潮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我来潮安是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我们要共同吸取教训。今后，不要再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吃饭。”在省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陶铸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诚恳地道歉：“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赔礼、道歉！”

但是，道歉不能补偿农民遭受的苦难。大跃进和反瞒产私分给广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5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007.15万吨。1958年下降到975.55万吨，1959年为830.35万吨。1960年为814.05万吨。1960年，全省农业产值倒退到1953年的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倒退到50年代初期的水平。1960年的死亡率比1957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

饿死人以后只追究农村基层干部的责任，并没有改变造成饥饿的政策和制度，所以，饥饿还在发展。

据历史资料记载，直到1962年3月10日，东莞县生活安排不下去的公社，还有9个之多。有些地方已经断粮，沙田公社有81户，234人断粮；望牛墩公社更惨，从3月开始已基本无口粮的有1096户，2227人。据揭阳、潮阳、普宁、惠来、大埔、海丰、梅县、五华等8个县的不完全统计， 当时已经断粮的有9468户，外出行乞、逃荒的有731人，出卖家具的有2463宗，卖小孩的25宗，自杀的一宗。

据广州市和93个县的官方统计，1962年4月，有35834人患上水肿病，64461患上干瘦病。仅广州市和汕头、肇庆专区， 3月份患水肿、干瘦病的共63839人， 比2月份增加20.4%； 海丰县4月上旬的水

肿、干瘦病人有5553人，比3月份增加了2000多人。

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用《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提供的数据计算结果，在大饥荒年代，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8万人，因饥饿而少出生人口157万人。曹树基教授用他的历史地理方法计算的结果是，从1959年到1961年，广东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5．7万人。

二、罗定事件

1998年，我的朋友、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天静先生得知我在研究大饥荒，就对我说：广东有个罗定事件，你要研究大饥荒，必须了解罗定的情况。何天静是罗定人，发生罗定事件时他在上高中。当时他在郁南县看到一个法院的布告，一个老太婆把孙子的屁股割下来煮了吃了被判死刑。何天静的伯父到处找稻糠吃，吃进去拉不出来，几天就死了。何天静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看到，每隔一两百米就有一两个水肿病人趴在路边等死。新东公社整个村子不见人，都死了。不过这些都是小村子，几户或十来户人家。

何天静说，罗定饿死人的情况引起了上面的重视。到1960年9月就开始采取措施。供应粮食，使食堂恢复起伙；对水肿病人以公社或大队进行集中治疗；孤儿以公社为单位集中起来，成立孤儿院。对罗定县和有关公社的领导干部时行了行政和刑事处分。何天静说：在广州的黄显标比较了解情况，他建议我采访黄显标。

1999年4月28日，经何天静介绍，我采访了黄显标。黄显标，罗定人。广东省监察厅监察专员。他一见我就说：“我不想谈这些了。学得文武艺，卖给帝王家。拿它的工资就不再揭它的短了。”我听出他说的是牢骚话，他良知未泯，还是谈了一些情况。

首先是反瞒产，逼着干部多报产量。把干部集中起来报产量，不说多不让回家，逼着干部说假话，虚报粮食产量。反瞒产和反右倾结合起来，不多报就是右倾。新惠县委书记党向明没有多报产量受批判：“新惠是粮仓，单季不超千斤，别的地方怎么办？”虚报，浮夸，造成粮食多得不得了的假象。

接着是1958年大吃大喝，大炼钢铁。当时的口号：“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广东省全省一天三顿干饭吃了三个月，是在公共食堂吃的，连吃带浪费。有人问这么个吃法够不够，就要受批

判。

到1959年初就没有粮食了。

1958年叫罗南县（罗定和郁南合并的），饿死人最多的是郁南。其中4个公社最为严重：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千官公社、桂墟公社和平台公社。其中又以千官为最。山区饿死人最多。有的人皮包骨，不敢看，有的人浮肿。有的全家死光。走不动，一般都是死在家里。有的趴在路边等死。我们生产队长全家都死光了。有的整个村子都死光了（南方村子小）。

发现死人后开始抢救。大人饿死了，留下不少孤儿，民政局收容的孤儿建立孤儿院有几栋楼。对将死未死的人集中治疗，调粮食吃稀饭。集中起来后，稀饭吃得太多了，又撑死了一批。

省委书记陶铸下命令：非正常死亡的人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这实际是让下面在统计饿死人数字时要控制。

事后，罗南县委书记傅正时被判死刑，但没有执行。1980年代平反后当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党委书记陈文被判无期徒刑。罗定事件后重新核实田亩，减轻负担。周恩来给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发了慰问电报。

毛主席在7000人大会上提到了罗定。

蔡廷楷是罗定人。据说是他最先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但《蔡廷楷传》里没有记述。

黄显标不愿详谈，第二天从广东省资料馆里看到不少关于罗定事件的历史资料：

据中共江门地委书记张进齐1960年9月20日向地委的报告，从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正常的水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其中纯水肿死亡的3436人，水肿加其它疾病死亡的3918人，其它病死亡的10052人。在死亡人数中，劳动力6223人，占死亡人数的35.9%。最严重的地区是原郁南县桂圩、平台、建城、千官、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泗纶6个公社，共死亡8566人，占总人口的4.6%。桂圩公社死亡率达6.92%，建城公社为6.49%。另外还有因瘦弱不能劳动的有3万

多人，身体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有20万人左右。从发生时间上看，这6个公社1月死亡711人，2月死亡932人，3月死亡1162人，4月死亡1623人，5月死亡1027人，6月死亡884人，7月死亡607人，8月1日到15日死亡301人。

桂圩公社是非正常死亡较多的一个公社，据地委调查组调查，这个公社1960年1月到8月死亡1278人，其中劳动力589人，占死亡人数的45%，占劳动力总数的5.6%。在全公社的129个生产队中，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15%以上一个，12%以上9个，10%以上7个，8%以上14个，6%以上26个，6%以下72个。另据三个大队调查，全家死亡的有10户，因父母死亡而留下孤儿的家庭65个。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留下孤儿180人无人照管，情况极惨，解决罗定问题的工作组来了以后，将这些孤儿集中抚养。

建城公社永高大队社员曾北数临死前两天，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群众谈起来仍痛哭流涕，非常悲愤。弃儿一度极为严重。县委、县人委和各机关门口都发现被弃的小孩。半年以来，全县先后发现劏小孩，吃死尸，吃人肉的事件7起。劏牛腿，割猪耳朵、割猪尾巴的现象也不少。偷窃和凶杀事件增多。

由于浮肿、瘦弱、饿死等现象发生，劳动力大量死亡，清明前下秧的只有种植面积的55%，大片田地丢荒。插下秧的田有40%不中耕追肥，禾草不分。牲畜大量死亡，桂圩公社1957底有生猪11000多头，1960年8月只有1000多头。

当时还有食品买卖，但价格高得出奇。桂圩是一个小圩镇，每逢圩日，有一百多个扶着棍子来做小买卖的人，东西很少，价格之高是从来没有过的，鱼仔一斤达2.6元。一个鸡蛋3角，一只鸡5元，连小蛇仔、蚱蜢、小虫也有人捉来卖，有人生吃小蛇、蚂蚁、蚱蜢。肚子饿，能吃的东西都吃。农民出卖家私、衣物现象也十分突出。桂圩公社桂圩大队有44.7%的家庭出卖过家私衣物，其余是无东西可卖的（本书作者注：和其它地方比起来，广东还是比较开明的，在其它省是不允许做小买卖）。

在死亡发生的时候，县委书记傅正时在电话会议上强调"清醒头脑，科学分析，划清界限，分清水肿，不要大惊小怪。"他的界限是，死前全部断粮才叫因水肿而死。并说："报多了水肿、死亡，你们（指公社党委书记）也有责任，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吗？"5月3日，在罗平召开的公社第一书记战地会议上，各公社认为水肿、死人情况严重，根据傅在电话会议上提标准统计，有水肿病人8947人，死亡915

人（实际远不止此数），但傅正时认为数字太大，叫各公社再“核实”，结果，将水肿病人压缩到2325人，死亡人数压到606人，其中与营养有关的仅14人。事后总结教训时有人说：“罗平会议是杀人不见血的罪恶会议。这个会议不是采取有力措施对饥饿进行抢救，反而千方百计地捂盖子。”

谁要说真实情况，就说谁被扣上“个人主义”、“否定大跃进”、“看成绩一团黑”、“居心不良，别有阴谋”、“想叫县委坐牢”、“想搞垮我们，叫坏人上台”等帽子。县监委书记崔德志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去检查，发现有几个食堂断粮停伙，情况严重，回来向县委汇报，傅正时不相信，反而批评崔德志“以后看问题要全面一些。”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第一书记王淑宜于1960年2月17日在一次会议上汇报了自己在罗圩大队调查的情况：死24人，水肿86人。话还没说完，傅正时就顶了回去，说：“王淑宜给高要七区事件吓坏了。”并说“这是阴谋”，“这是否定前任书记的成绩”。王淑宜是1955年高要七区死人事件受处分，1960年7月从高要七区调到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当书记的。4月底，另一县委书记肖轩风去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发现死亡1370人，其中直接与粮食有关109人，向县委汇报，又受到批评。与此同时县民政科长把同样的书面材料送给县委书记杨树槐，杨不仅不重视，反而说：“这是严重右倾，立场不稳，观点不明。”还说：“全县与粮食有关的死亡才20个人，你林田（林在上，田在下，读TANG）滨公社怎么会有109人？”硬要公社党委把109人改为6人才接受这个报告。

傅正时在地委开会时得知省委尹书记、地委张书记要到罗定县检查工作，于7月3日打电话给县农业办公室主任刘德风交待，水肿人数、死亡人数、粮食数要上下一致，前后统一，按罗平会议的数字为准。县农业办公室按这个意思给各公社打电话，要求各公社按县委的数字向省委汇报，并把数字一致落实到大队、小队。桂圩公社接到通知后，公社党委开了四个会，按县委分配的死亡47人非正常死亡7人（其实当时已死亡上千人）分配到各大队。

令人不解的是，一边大量饿死人，一边大量的粮食放在仓库里不给老百姓吃。直到1960年6月底，罗定县粮库里仍存有1100万斤稻谷。但是，除了县委第一书记傅正时和分管财贸的书记杨树槐以外，其他人全不知道有这些粮食。加益公社党委书记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哭诉说，过春节有几个大队断粮，曾三次打电话给傅正时，请求每人给半斤米过春节，傅不接电话。

罗定是蔡廷楷有家乡，蔡廷楷的亲属中也有饿死的。据当地传说，是

蔡廷楷的亲属把真实情况告诉蔡廷楷，蔡廷楷再告诉周恩来，事情才得以揭露，问题才得到解决。其它地方没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或者即使有大人物在北京工作，而这些人物并不关心家乡，盖子就揭不开了。

三、高要闹剧

高要县可以说是广东省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了不少人。由于这个县没有通“天”的大人物，上面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因而没有成为“高要事件”。在1958年 - 1961年任县委书记秘书的黄东文先生，在2002年投稿《炎黄春秋》杂志，详细记述了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情况。由于受政治条件所限，《炎黄春秋》杂志只能发表他文章中的一部分内容。现我据其原稿，摘抄如下。

放“卫星”

1958年夏秋在中原刮起的一股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传到广东时，早稻已收割完毕。要放早稻“卫星”已经来不及了。10月初，晚稻刚刚开镰收割。地处西江地区丘陵地带的新兴县迫不及待，率先向省委上报了“特大喜讯“：全县晚稻平均亩产1000多斤，出现了一大批亩产3000斤、4000斤、5000斤的晚稻高产“卫星田”，成为全省最早出现的晚稻高产“状元县”。对此，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省委各部门奖励10多辆汽车给新兴县。接着，县委书刘某调到高要县任县书记。高要县是西江地区的首县、富县，又是地委所在地。从新兴县调到高要县是升了官。出了名，得了利，又升了官。对刘某来说，“放卫星”的收获的确是很大很大的。

刘书记尝到了放卫星的甜头，一到高要县，就组织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率领各部、委、办局的领导人及各公社党委书记到新兴县去参观晚稻高产卫星田，并指定黄东文同去。

新兴县的一位县委书记向来参观的人说：“现在形势一派大好，’卫星’连片、连村，大面积出现，估计全县晚稻亩产至少要超过3000斤！”吃过午饭，他们到天堂公社参观“卫星田”，田里的稻子已经割完，田头整齐排列着已经脱粒的100多箩谷子，大木牌用白纸红字写着情况介绍：一块是地委书记的试验田，亩产8000多斤；另一块是地委常委、妇联主任的试验田，亩产6000多斤。参观的人都说：“真是大开眼界，思想解放了！”可是大家心里怎么想，谁都十分清楚，只

不过没人挑明罢了。当晚回到高要，刘书记要黄东文第二天带领各公社农业副书记再到新兴参观。在参观回来的车上，由于没有领导在场，大家说话没有顾忌。有人说："我点过禾头，数过穗数，算过谷粒，什么亩产8000斤，有六七百斤就很不错了！"有人说："这样的高产状元县，我看全省到处都是！"接着，莲塘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有才冲着黄东文吼道："老黄，明天下午你在办公室等着，莲塘公社也要向县委报一个卫星！"黄说："好啊，一言为定，你报来，我给你整理材料！"于是车厢里响起了一阵哈哈大笑。

第二天下午，张有才果然打来报喜电话，说："今天上午，我们莲塘公社在镇安大队召开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卫星田实割现场会，经过丈量土地，专人过秤，核实亩产，干谷5100多斤，特向县委报喜。"黄东文立即整好材料送刘书记，刘书记看了十分高兴，立即批示通报全县各公社。接着全县各公社纷纷放晚稻高产卫星，都是亩产四五千斤，五六千斤。这时，到高县要蹲点的地委副书记徐瑞沉不住气了。他在新桥公社道悦大队搞了一块晚稻高产卫星田，是用白沙大队一个生产队早稻错播的晚稻禾全部移移过来插下的。早造误播晚稻品种是不会和早稻同时抽穗的，由于生长期延长了一倍，可以高产。加上用十亩已经拔节了的禾苗移在一起，徐书记认为实现高产就很有把握了。于是就把计划指标定为6000斤。为了十拿九稳，这块田一共施了20车猪屎肥，田底里埋了20根凿通了的大竹子通气。为了加强通风和日照，四周还架起了十多台大电扇往田里吹风，架起十多面大镜子把太阳反射到田中间。在全县大放高产卫星运动的推动下，徐书记把原来报的6000斤亩产计划一下子改为10万斤，并立即组织全县各级干部去参观。不久，广东省委组织晚稻高产报喜团上北京向党中央报喜。全县第一个放高产卫星的张有才代表高要县上了一回北京。

查"黑仓"

高估产带来高征购。再加上一段时间吃饭不要钱，十万人大炼钢铁，粮食很快耗尽。一些大队三个月就把粮食吃光了，春节前就开始出现粮荒。有一位公社书记几次打电话向县委要粮食，在被拒绝的情况下，跑到县长办公室，跪在县长脚下痛哭，说什么也不肯起来。为什么放了那么多"卫星"短短三四个月就没有粮食？这使县委很困惑。经过反复研究不得其解，这时听到了省委传来的风声：生产队干部对上级无偿调拨粮有抵触情绪，就把粮食藏起来瞒产私分了。高要县委相信省委瞒产私分的看法。在省委的号召下，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查黑仓、反瞒产"运动。1959年1月21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4200多人参加，西江地委书记也到会讲话支持县

委“查黑仓、反瞒产”运动。县委书记在动员报告中要求：把瞒下的粮食报出来，不解决问题不散会，开到过年也要开下去！当时临近春节，参加会议的人思家心切，心情浮躁不安。黄东文到禄步公社禄步大队参加讨论。大队长胡启满把黄拉到一边悄悄地说：“老黄，实不瞒你说，我们大队确实搞了三个黑仓。”黄东文一听心头振奋，忙问他：“总共多少谷子？”胡启满一本正经地回答：“8万斤左右吧。”黄说：“你真笨，干嘛要搞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胡启满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像现在一日三餐干饭，放开肚皮吃饱，全大队两千多口人，粮山也要吃崩，到时候没有粮食了，社员找我要饭吃我向谁要去？”黄听后觉得有理，就深信不疑，马上向刘书记汇报。刘书记当即说：“好！立即通知禄步公社党委，召开全体大会，让禄步大队作典型发言。”胡启满在大会上讲得有板有眼，200多人听得很入神。胡启满讲完后，县委刘书记强调自报瞒产，谁报归谁，县、社一律不调走、不没收。号召大家放心自报。果然各大队纷纷报出了不少黑仓。县委立即召开公社书记会议，介绍禄步公社的做法，各公社书记听了十分兴奋。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八，各公社掀起了自报“设立黑仓、瞒产私发粮食”的高潮。整整一天，全县共有1800多位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报出了隐瞒粮食1.2亿斤。

春节后，黄东文到禄步公社进一步了解粮食“黑仓”清查落实的情况。出乎意料的是，公社干部说：“四级干部会上揭发的黑仓绝大部分是假的。当时已是年关，不报个假帐不能回家过年。”黄一听，心里凉了半截，马上到禄步大队去找胡启满，问他报的三个黑仓的情况。胡启满慢条斯理地说：“三个黑仓是假的，我们根本没有瞒产。”黄回到公社，公社书记杨希明对黄说：“公社党委在外坑大队查出了一个黑仓，有几千斤谷子，准备下午开现场会，请黄去参加。下午，黄到了外坑大队，果然看见场上摆满了几十箩谷子。趁现场没人，黄伸手到谷箩去探查，发现只有表面一寸厚是谷子，一寸以下全是谷壳。

饿死人

1959年2月下旬，莲塘公社普遍闹粮荒。饲料吃完了就吃种子，有的大队种子也吃完了。社员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各种疾病大暴发。大部分妇女患了子宫下垂、闭经症，男人则普遍患上了肝炎、水肿病，很多小孩患“马骝湿”病。各大队都出现饿死人。到4月初，有的大队死人已占上年年终人口总数的5%以上。到7月份，早稻收割大忙季节，由于繁重的　体力劳动，加上社员身体瘦弱等原因，病人大量增加。公社卫生院和各联队卫生站的走廊、办公室都摆满了病床。这时又发生了夏季流行病痢疾。到7月下旬，这个公社的温贯、罗勒、波洞等11个大队死人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温贯大队死人占总人口的

13%。

黄东文在石脚大队的两个月中，一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死的都是长期挨饿的中、老年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由于患病不能顶一个劳动力干活，口粮也由三级降到四级。她为了能吃到三级的饭（一天多四钱米），向队里苦苦哀求，参加食堂的粮食加工组（舂谷、筛米等繁重体力劳动），队里同意了她的请求，但只劳动一个星期就悲惨地死去。

有一些人是因为被干部扣饭而饿死的。高要县四甲大队在大队268户社员，除了干部家属以外，其余全被队长黄＊＊扣过饭或不给饭吃。全大队死亡184人，占原有人口的10%。社员有病不能出工就降低口粮标准，由吃6两改为3两，或者干脆不给饭吃。1959年春天，在建设双金运河工地上，社员黄龙富因有水肿病不能挑得太多，黄均仔给他停开两餐饭。他又饿又累又冷，晕倒在地当场死亡。临死前说："我今天是死在你＊＊仔手上，看你怎么下台。"黄＊＊回答说："死你两个算一双！"不到两个月，黄龙富的儿了也死了，妻子改嫁，家破人亡。

抓"恶鬼"

饥死人的情况出现以后，县就将责任推给农村基层干部。

1960年4月30日，由高要县委将由下放干部组成的"公路绿化专业队"一行70多人（黄东文是其中的一员）集中到县委，听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讲话。部长说："现在全县有一部分公社因为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恶劣，不关心群众，造成种种疾病流行，不正常死亡严重，特别是莲塘公社，情况十分严重，县委已派去工作组，对公社党委进行整顿。县委决定撤销公路绿化专业队，全体队员改为抓生活治病专业队，集中到莲塘公社，具体任务就是整顿食堂，抢救病人。"部长还一再强调："莲塘公社党委已经烂掉了，你们到莲塘后，归县委工作组领导。"5月1日，全体下放干部到了莲塘公社。才得知调到莲塘公社两个月的杨希明和放高产卫星的张有才被指控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害死了大批贫下中农"，两人都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了刑。7月，公社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在会上讲话说："今天这个大会是捉鬼会！近几个月来，莲塘公社发生了那么多种病，就因为有鬼！水肿鬼，闭经鬼，肝炎鬼，马骝湿鬼……都有！鬼在哪里啊？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里都有！要治病，不死人，就得捉鬼！把这些鬼都捉了，种种病都会好，就不再死那么多人了！"下午，县长宣布"莲塘死人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被捉的"鬼"共有48名。第一名是公社党委书记王北水，被开除党籍，撤销

职务，留在公社继续抓生活和治病工作。其实王北水在莲塘任书记只3个月，在此期间还拯救了数以千计的濒危病人。受处理后的第二天大清早就出门走访了5个大队检查病人情况，直到晚上1点才回家。受处理的干部，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非党团员撤销职务。下放干部中有两个人当“鬼”被捉：一个是温贯大队队长陈介忠，因为这个大队是莲塘死人最多的大队，另一个是张子尧，马来西亚归侨，原南方大学学生，他在给病人熬牛骨汤，为了调味尝了一点，说他偷吃，被开除团籍。

除莲塘公社以外，其它死人较多的公社也进行了“捉鬼运动”，全县一共捉了200多个。

过了半个月，地委工作来了，主要是了解1958年稻谷产量的真实情况和群众对县委大批处理干部的意见。又过了几天，地委召开会议，宣布县委大批处理干部是错误的，分别恢复了48人的党籍、团籍和公职。放卫星演变成捉鬼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

四、南雄之灾

广东省南雄县始兴公社也是一个饿死人较多的地方。地委工作组郑群、成家英、张乐民1960年7月31日提供的《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违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据地委工作组在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并在其中6个大队反复查对后统计，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止，共死亡2016人占原有人口20819人的9.9%。1959年死亡率（死亡人数/原有总人口数）是：周所大队为9.9%，南山大队为7.8%，黄所大队6.5%，上升大队5.5%；1960年死亡率是：黄所大队6.9%，南山大队5.2%，周所大队5%。死亡时间大部分集中在1959年秋季到1960年上半年。其中1959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53.7%，1960年死亡占死亡总数的46.7%。黄所大队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440人（其中1959年死亡217人，1960年死亡223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2%，其中全家死绝的有5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9户。罗坡小队42户人家死亡40人，占原有总人口229人的17.5%其中全家死绝的2户，父母双亡留下孤儿的2户。这10个大队除了上述死亡以外，还有水肿病人570人，妇女闭经495人，子宫下垂379人。

此外，未经地委工作组调查、而在6月26日始兴片（原始兴公社）总

结三反整社会上揭发出来的死人情况也十分严重。全公社统计（上述10个大队在内）1959年1月到1960年5月共死亡5070人（1959年死亡3075人，1960年死亡2035人），占全社原有人口83977人的5.91%。其中男2591人，女2479人。按阶级成份分：贫农3154人，中农1400人，富农305人，地主211人。从年龄结构看，1－15岁1394人，16－40岁668人，41－50岁629人，51－60岁901人，60岁以上1478人。

死亡原因：据被调查的6个大队死亡的1580人分析，被打成重伤死亡42人，被斗、打罚而被迫死亡的17人，水肿病死的553人，干瘦死的129人，老弱死亡199人， 婴儿死亡32人，麻疹病死亡78人，心脏病死亡120人，痢疾死亡40人。

死亡时间：1959年1月140，2月192人，3月328人，4月316人，5月257，6月245人，7月240人，8月342人，9月240人，10月224人，11月237人，12月274人；1960年1月318人，2月400人，3月600人，4月379人，5月338人。

由于饥饿，1959年很少出生人，1960年几乎没有出生。

始兴公社干部打骂刑罚群众成风。上至公社党委，下至包产队，上级打下级，干部打群众，处罚的形式无奇不有，残忍至极，如：捆绑、罚跪、罚立正、吊打、电刑、上雷公尖、削手指、灌屎尿、泼冷水、拔胡子、扯眼皮、假枪毙、戴高帽游街示众、设劳改队、罚劳役、罚款、没收财产等。

据6月下旬南雄县委召开的始兴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揭发，犯有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干部，1959年有508人，占干部总数的17.6%。受捆绑吊打等恶刑折磨的群众1118人；1960年1－5月违法乱纪干部有725人，占干部总数的25%，受捆绑吊打的群众2038人，其中有名字登记当场打死的1 人，被打伤后死的有53人，被迫死亡的20人，被连续扣粮食指标而饿死的21人，共95人。其中贫农60人，中农19人，富农3人，地主13人。

另据地委工作组对黄所、石下、周所、南山、上升、寨头、千家、东风、高留、丰村等10个大队调查，自1959年以来，这10 个大队殴打、捆绑过群众的干部有328人，占干部总数的43%，受摧残的群众1069人，占这10个大队社员总数18803人的5.9%，其中当场被打死的1人，打成重伤后死亡的49人，被打罚被迫致死的20人，共70人。

地委工作组对南山、寨头、周所、石下、黄所、上升6个大队被打

死、逼死的59人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五保户、10岁小孩，也有70多岁的老人。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被捆绑丢入河中活活淹死，有的丈夫被打死妻子改嫁，有的父母或儿子被打死剩下孤老或孤儿无依无靠。1960年3月，上升打队现役军人家属陈美伦因饥饿偷了一些青菜，被大队总支副书记郑某和队长李某打成重伤后拖入黑屋锁上，当晚死亡。这个大队的东头坪小队贫农军属刘宏富因患水肿病要求队长配点花生煲药治疗，队长不准，他就去田里挖了一点花生。被治保主任发现，捉去打成重伤吐血死亡。高昌大队刘庆辉，70多岁，队长张某怀疑他偷鸡，将他的胡子拔了一半并且打成重伤，然后两餐不给饭吃，又罚他挑塘泥，开夜工，两天后自杀身亡。该队社员林志弟夫妇被大队长怀疑偷鸡，打成重伤致死，留下一个11岁小孩和81岁老母。东风大队中农社员曾顺霞，19岁，因饥饿有点小偷行为，被大队长曾某多次召开群众会斗争、拷打，又扣口粮，被迫偷青菜。1960年3月一个晚上，曾某将曾顺霞用绳子捆绑丢到河里活活淹死。黄所大队贫农小孩丘生俚，12岁，因被扣口粮，被迫偷了一点花生芽，被包产队长丘某严刑拷打，用木棍打断左手，用石头砸破10个手指，还用刀割去一个指头，打成重伤后几天内死亡。该大队黄屋小队队长芦某，全队社员几乎全被她打过，连她叔父也被她扭着耳朵让其跪下，直接被她打成重伤致死的有4人。南山大队队长张某，自1959年以来，亲手殴打群众36人，其中被打成重伤而致死的4人，被迫致死1人。寨头大队女社员龚富园，1960年春天在队里插秧，因急着回家给孩子喂奶，收工时跑在前头，在这个队工作的供销社干部林某说她迟到早归，对她拳打脚踢，当场被打倒在地，滚下水圳，湿透全身，不久死亡，致使出生不到数月的小孩因没奶吃不久也死了。良原大队党支部书记谭某仅1960年1－3月，就殴打群众70人，其中，打死1人，被迫致死1人。为什么这个公社的干部这么残酷地打人呢？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某说："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他认为能打人的干部立场稳，干劲大。

毁民房，建新村。1959年10月，以朱某为首的公社党委决定拆除县城内的上围街建新村。共拆民房105户、932间、粮仓一座、大祠堂18座，总面积2万平方米。上围是过去地主集中地，是始兴县城最好的房子，大部分是火砖、石墙。朱某要求群众一天搬完，四天拆完，没搬完的封闭门户不准再搬。他们用180斤炸药、360个雷管爆炸坚固的围墙。由于天气寒冷，防寒烤火，焚毁了大量的木材，大量物品被毁。被拆掉住房的群众，有的住牛栏，有的住粪寮，有的住烂屋。在建新村的过程中，规定每天评出下游队。下游队的人被罚做通宵，派民兵看守。评不出下游队就由队长顶替。不下班不准社员回家，不开工的不开饭，不积极的扣饭。病号不准请病假，只吃二两米。吃饭只准五分钟，吃不完的不准吃。对不积极的社员"抽三筋"：打瞌睡的

抽眼筋，不卖力气的抽腰筋，听报告不站起来的抽脚筋。公社党委书记邓某公开号召："懒婆懒汉，不积极不听话的，可以罚跪，可以打，打死由我负责，打死他当掉了一片树叶。"他亲手打了14人。

1959年下半年以来，多数大队主要劳动力一餐吃2两米，二、三等劳动力一餐吃2两、1两半米，少的只吃7－8钱米。很多食堂长期"盐水挂帅"（饥饿无奈时喝淡盐水），公社党委会上有的委员提出请求县委拨粮食，朱某说："谁不要脸谁去县委要粮食！"1959冬和1960春之间，粮食最紧张时，朱某擅自决定全公社停发口粮一个月，公社留下8万担粮食不下发，要社员自己解决。本来粮食和食油指标很低，又层层剋扣，1959年9月，县委发给这个公社口粮1000担，公社全部扣下作"工业用粮"。1959年12月，全公社口粮41619担，到12月底只发下41200担，扣下419担，1960年2月，县里发下粮食43337担，公社又扣下3646担，先后扣下社员口粮5065担。公社党委还把1959年各大队卖粮款60多万元全部扣下，一文不发，致使全公社一年没有发工资，社员有病也没钱治。

在南雄县始兴公社，社员饿死，干部却大吃大喝。上至公社党委书记，下至小队干部，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公社和大队食堂都为干部设小灶，白天吃，晚上吃，公社书记、委员、大队干部要鱼，要肉，要油，随便挂上某某书记的名字就可以拿。饿死人最多的石下大队，专门指定几个最好的鱼塘为干部吃鱼之用。这个大队群众说："大队干部是老虎，小队干部是老鼠，社员挨饿成瘦猴。"公社党委书记魏某在深水渡工作，餐餐要通讯员端饭，还嫌牛肉煮鱼不好吃，骂社员不尊重领导。

广东省的饥荒不仅发生在罗定、南雄、高要等县，在其它地方也有发生。1960年底，广东省各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从各县的会议报告中都透露了"三面红旗"带来的灾难。

五、宋庆龄老家的饥荒

文昌县在海南岛，当时属广东省。这里是宋庆龄的老家，从这里崛起了对中国近代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宋氏家族。

1960年12月26日到1961的1月6日，文昌县召开了2718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

三年来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年粮食总产量19270多万斤，1958年

比1957年减产11%，1959年比1958年减产11%，1960又比1959年减产11%，三年累计减产33%。粮食减产引发畜牧业减产，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1957年死亡人数275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0.8%，1958死亡率为1.2%，1959年为2.4%，1960年为2.1%，三年一共死亡19092人，其中非正常死亡4299人，另外病人也不少，群众体质很差。直到1960年底，问题还没有解决。如锦山公社下溪坡大队还有水肿病人43人，妇女病（闭经、子宫下垂等因挨饿而致的妇女病）301人，瘦弱病88人。

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共产风”的危害。事实证明，凡是一向列为重点的社队共产风最厉害，共产风刮得越厉害，损失越重，死人越多。为什么文昌的共产风一刮再刮，没有间断，再且越刮越厉害呢？

一是急于建立共产主义新村，消灭城乡差别。在农村实行“五大集中”：村庄大集中，人口大集中，牲畜大集中，粮食大集中，生活大集中。这五大集中使农民住房被毁，树木被砍，夫妻母子分开，家庭被拆散，损失巨大。人集中后没有房子住，就10多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卫生不好，病人增多。猪牛鸭集中时，杀的杀，卖的卖，集中到公社或大队牧场后，一时饲料不足，管理不好，死的死，逃的逃。粮食集中后挖尽了农民的家底，吃了几个月的干饭，先松后紧，种子吃完。干活大集中，天天放”卫星”，大兵团作战，几百人、几千人在一个坑里搞生产，劳动力大浪费，粮食大减产。蓬莱公社高金大队第五小队村并村时，四天不出工，在家杀鸡杀猪煮干饭，摆酒席，大吃一场然后出村。过了一段时间返回原村时，连种苗也找不到。清＊公社迈号大队湖保堀小队并村后粮食、牲畜、农具全被“共产风”，刮光，全村一片荒芜，1959年，这个小队死亡人口占全大队死亡人口的五分之一。

二是急于从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有制过渡。中央、省提出五年左右完成过渡，而到了县里，就变成了越快越好。县里干部认为迟早总得过一次，迟不如早好，干脆来个抢先过渡竞赛。在过渡竞赛会上，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内完成过渡任务的30%，三个月实行基本公社所有制。这样，各公社就无偿抽调大队的土地、耕牛、劳动力、农具、种苗、家禽、牲畜，吞并大队的畜牧场、农具厂、农产品加工厂等。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很快倾家荡产，农民更是家徒四壁，遇到困难毫无抵抗能力。

三是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名义抽调大量劳动力从事大办钢铁和兴修水利等。1958年下半年抽调6万人上山搞钢铁，1959年抽调7万人搞深翻土地，又抽5万人到水利工地。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粮食减产。在工地上又消耗了不少粮食。

四是高指标。地区党委提出搞千斤亩运动，到了县里加码为万斤亩运动，到了公社、大队，变成了二万斤亩、三万斤亩甚至十万斤亩。1958年上报粮食产量2.811亿斤，实际只有1.728亿斤，多报了62%；1959年上报2.32亿斤，实际只有1.55亿斤，多报了49%；1960年少报了一些，但还是偏高。

五是生产上瞎指挥。种什么品种怎么种，全由上级领导说了算，不仅农民没有发言权，连生产队干部也没有发言权。如搞高度密植，不按农时季节生产。农民都知道这样做不行，却不让农民说话，发点牢骚就要挨批判。

六、江门市郊的哀嚎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江门市郊区的情况。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郊区情况比其它地方好得多，但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1961年1月21日提交的《江门市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称，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作出的初步统计，郊区三年来死亡723人死亡率是：1958年0.86%，1959年1%，1960年1.25%。目前郊区还有水肿病人56人，妇女病89人。

岭南真是化外天地，到1958年还有单干农户（即没有加入集体经济的农户）。上述报告披露，即使在岭南，这些单干农民也是很难生存的。1958年，江门市郊区党委组织一次生产大评比，同时带着一批单干农民（其中一部分是贫下中农）游行示众。从这个小队到那一个小队，组织社员出来观看并参加斗争。当队伍到达白沙大队陈屋村时，公社党委书记命令全部单干农民跪下来，头要向天，膝要着地，腰要直，让组织来的社员和他们“辩论”。公社党委书记问单干黄长培（贫农）：“你为什么插田不插直？”还没等陈回答，就一个巴掌打过去。然后又抓住另一单干农民甘旺的头发：“你为什么不车水插田？”又一巴掌打过去，打得甘满脸流血。由于公社领导带头打，其他人也跟着打。公社书记对郊区干部说：“要使单干户家破人亡。”不仅对单干户，其不听话的公社社员也采取种种残酷手段。打人、骂人、捆人，强制劳动、游行示众、不给饭吃，是干部对付社员的常用办法。

七、中山县的“十多八少”

中山县是珠江三角洲的丰饶之地。这里是适于粮食生长的沙田地区，

五十年代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商品粮。但是，这里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全县到底饿死多少人无法了解，但在1960年12月26日到1961年1月4日的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一些零星情况。据《中山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大涌公社仅1960年就死亡690人，死亡率为3.06%。这一年曾发生过三次水肿病，一月、四月、六月各一次。全县出现了“十多、八少”：水肿病多，死人多，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多，社员外逃多，烂寮多，农具损坏多，丢荒田多，崩牛鼻子多，死猪多，干部强迫命令多。八少是：收入少，口粮少，分配少，休息少，结婚少，生孩子少，劳动力少，副食品少。

在总结教训时，中山县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1958年以来的种种情况。1958年10月搞公社化，开始是每一个大乡一个公社，共建立了32个公社。1958底又将32个公社并为7个公社，1959年初再由7个公社分为16个公社，后又变成24个公社。体制的变化，伴随着“共产风”把生产队弄得一贫如洗。与此同时，大炼钢铁，深翻改土，放“卫星”，大兵团作战等等把农民推进了苦海，也使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稻谷产量连年下降，1960年比1956年减产18740万斤，减产23%。农民的口粮标准1960年比1956年降低了39%。瞎指挥，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现象也很普遍。珠江三角洲农民种田看天时，不能插北风秧，干部不顾农民多年的经验，提出“东风插，西风也要插，南风插，北风也要插。”群众稍有不满意，干部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北溪公社党委书记赵某对不服从指挥的社员画大花脸，剃光头。1959年秋天，他要板田三大队日割稻禾160亩，并包锄田40亩。社员被迫从早晨3点钟干到晚10点钟，还是没完成任务。赵书记一口咬定有坏人破坏，命令大队长立即排出7个斗争对象，召开大会斗争。队长没办法只好用抽签的办法找出7个人。社员说：“见了赵书记，魂魄都落地，好比见阎王，唔死脱层皮。”神湾公社党委书记黄汉廉，认为社员偷粮食，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各大队到农民家里搜查。有的大队等社员下田后，将桥板抽走（广东河叉多，下田得过河），不让社员回家，然后挨家搜查，造成人心惶惶。

八、宝安无宝

紧靠香港的宝安县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1981年1月3日的《宝安县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这个县仅在1960年患水肿病的就有1569人，死亡人数逐年增加。在全县240个大队中，1960年死亡率达1.5%以上的有63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26%，光明农场死亡率最高，达3.34%。肿病人数大量增加，1957年病人2786人，1960年达6322人。妇女闭经人数很多。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妇联主任说：“妇

女都闭经了，再不用发避孕工具了。”布吉公社板田大队共有606人，患各种疾病的有379人，其中水肿病67人，平均每10人当中就有一个得水肿病的。子宫下垂14人，闭经的18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8人。

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社员口粮从1957年每人每月40斤下降到1960的24斤，杂粮由20斤下降到5斤，食油由14两下降到1.5两，肉从半斤下降到2两6钱。

“共产风”、瞎指挥的情况也很严重。民治大队小队长揭发，公社党委副书记郑某在高峰水库对民工设立了一个劳改场，凡是逃跑回家的都和五类分子一样在场内劳改。布吉公社李朗大队社员代表吴来发说：“国家一穷二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现在社员一穷二白是共产风刮的。”他以甘坑小队为例，这里过去盛产水果、竹木、生姜，1957年以前是“春有桃梅李，夏有香蕉梨，秋季甜柿子，冬吃柑和桔。”那时年产水果5427担。但是，一连刮了三年共产风，果树死的死，废的废。社员说：“果树全夭折，松木命不长，竹头被处决，生姜见阎王。”

九、顺德不顺

顺德县正常年景的人口死亡率为0.7%－0.8%，而1958年为1%，1959年为1.23%，1960年为1.77%。可见顺德这个有名的富裕地区也有因饥饿而死的人。1961年1月3日提交的《中共顺德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提供了这一数字并且披露了一些情况。

为了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顺德县全县合为一个人民公社，后来又被迫分开。在合并和分开的过程中，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破坏。合并是强迫的，思想不通不行。北（三点水加窖）大队干部说：“自从公社化，两场大风暴，大共产，大拉平，不通整到通，开会大斗争，进门九成通，出门一成通，结果是，生产破坏家底空。”

顺德这个很务实的地方那时搞浮夸也不落后。当时的说法是：“有先进思想就有先进指标，有先时指标就有先进产量。”勒流公社勒北大队社员私下流传一个顺口溜来批评干部吹牛放炮：“近闻大炮到处响，吓得社员好慌张，不是社员无胆量，皆因指标太紧张，三万桑叶八万鱼，除非神仙下洛阳。”

顺德四级干部会议上认为，有些大队人口死亡多，除了生活没安排好以外，干部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群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捆人，

打人，不给口粮，是干部对待群众的常用手段。1958年春耕时，县委委员吴英规定了四条：第一，下雨时出工不能披蓑衣；第二，走路不能慢；第三，劳动时间不准小便和给小孩喂奶；第四，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

增城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出当时的“六统一”：生产计划统一，生产措施统一，生产规格统一，财务开支统一，口粮标准统一，作息时间统一。由此带来“四个不自由”：劳动不自由，说话不自由，吃饭不自由，睡觉不自由。还总结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干部有三条秘诀：一要少说话；二要看领导脸色，听领导的话，不要听群众的话；三是做精仔，不要做笨仔。

十、来自合浦的报告

1960年春，当时担任省委秘书长的吴南生在合浦县（当时属广东，后划归广西）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合浦县发生的情况。这个报告现存广东省档案馆。

这个报告说，水肿病发生是从1959年12月份开始的，到1960年春天水肿病人大批增加，不断死亡，日益严重。全县1月1日到5月3日，共死亡8382人，其中约有70%以上是水肿病死的。到他写报告时，全县还有水肿病人23940人，另有水肿消退转为极度消瘦的病人23739人。

吴南生的报告说，因水肿而死亡的情况今年1月份就已发生，但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中央提出“三反”以后，在4月下旬的四级干部会上才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目前各公社、大队设立的临时医院423所，集中病人42916人，正在进行治疗。

全县22个公社病情严重的有12个，大部分在北部粮产区。这些地区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3%左右，个别特别严重的小队高达14%，生病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20%－30%。在死亡人口中，劳动力占30%左右，在病人中劳动力占50%左右。

吴南生的报告说，干部没有分清什么是右倾，什么是左倾，因此普遍不说话，不向上面反映真实情况。有些干部反映了一些关于粮食、水肿病的情况受到了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以后，更不敢说真话。这不能不是这次水肿死亡事件持续时间长、造成严重恶果的重要原因。

十一、逃港狂潮

没有吃的就逃荒，这是农民很自然的选择。广东省比其它省比较开明的是，不把逃荒农民当作“盲流”加以惩罚，而是放手让农民逃荒，还给逃荒者开具证明信。香港是逃荒者的首选地。广东省甚至一度鼓励农民逃往香港。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发生在1961年和1962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

1961年7月20日，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贯彻“放宽”出港条件的精神，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东、宝等6个县市…… 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直到1962年3月，在由政法委员会主任寇庆延主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明确放宽边防的指导思想，“放宽尺度，多开孔道，有组织有计划地逐步增大出口比例”。会议提出要打破每天50人的规定（自从1958年港英当局搞出入口平衡以来，全省每天出境人数约50人），仅宝安县就从 5个增加到11个；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除放宽通行证外，还发出一些捕鱼证、探亲证、做工证等，方便群众赴港；正式批准边防各县实行“三五”政策（即准许每月出口5次，带回5斤东西，价不超过5元）。

寇庆延在政法干校第七期报告中说：“为什么人民要偷渡？研究结果，归纳起来，从根本原因上讲，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这是根本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去行不行？看来不去不行。为什么？因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几是中国人，而中国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广东人。我们算算，香港300多万人口，其中200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那么叫人家一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特别是两夫妇，各在一地，长期不叫人家见面行不行？有的妇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那就是说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合法不行，就采取非法，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再就是我们当前生产生活都确实有些困难，而我们暂时解决不了。有些人就想去香港解决问题，解决一点生活问题，也解决一点生产问题。”

但是，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从1962年4月下旬开始，各地的群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

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有一部分确实留下了。 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组织部，6月1日向省委紧急报告：“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 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竟高达1.1547万人，其中机关316人，农村11231人。 仅一个沙头公社，最高峰时（5月13日至17日），平均每天有96人逃往香港。东莞县6月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2.7197万人；增城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肇庆、等区的部分县、市，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数百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旬以后，每天外逃人员增到千人。最高峰的5月15日达4977人。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达8000多人。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

如果仅仅是广东一处出现外逃狂潮，可能中央也会采取与广东省委一样的放任和鼓励的态度。但就在此时，即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苏联。尽管南方外逃和大西北外逃原因不同，但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是相同的，国际舆论一时哗然。中央政府大为紧张，不得不扭转广东放纵外逃的作法。5月中旬，周恩来要求广东省委，把解决外逃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从这时起，广东省才开始紧急刹车，制止外逃。

1962年5月中旬，这股外逃风渐渐波及广州。 市井坊间，纷纷传言，为庆祝英女皇诞辰，香港放假3天，开放边境，内地居民不用通行证，也可以去香港。英女皇诞辰日是6月17日， 但实际上，在端午节（6月6日）前，市面蜚短流长，谣言四起，这些传言鼓舞着希望外逃的人们。

从5月中旬开始， 购买广深线火车票往边境的人骤增。购买平湖站（不用边防证买票的最后一站）火车票的，比平时多了22倍。到6月1日，火车站外竟积聚了上万群众。在徘徊等候买票的过程中，人潮开始出现骚动。

6月5日，广州火车东站的秩序十分混乱，一批批的群众冲击开往香港的火车，造成交通大堵塞。街道两侧，门窗俱闭。成千上万的群众，像疯了似地扑向车站，撞门攀墙，狂呼乱吼，连树杈上也爬满了人。那些年老体弱的，被冲得东奔西散，寻爷觅儿，老啼幼哭。

赵紫阳、林李明、曾生，以及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广祥，在省长陈郁家开会。他们接到广九铁路派出所报告，东站已经聚集了一两万群众，把前去维持秩序和宣传的警车推翻焚毁，有几个民警被人抓走了。副市长孙乐宜在现场劝导群众，处境也很危险。

曾生建议调军队来实行军事戒严。有人不同意动用军队。他们说，关键在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如果属人民内部矛盾，还得要以劝说为主。曾生认为，现在事态已成燃眉，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恐怕还会进一步恶化。就在这个时候，陶铸从广西赶了回来。大家立即向他汇报请示。陶铸断然回答："现在还叫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把公安局的车都砸了、烧了，还讲什么人民内部矛盾？"

陶铸一锤定音，大家同意用军队维持秩序。6月6日，满载部队的卡车，一辆一辆驶往东站。一个营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把车站两头封锁起来，往外驱赶人群。还有一队解放军从车站内往外推进。市政府的宣传车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广播，所谓边境开放纯属谣言，希望大家不要轻信坏人造谣，呼吁群众尽快离开。几十个闹事的人被拘捕了，大部分冲火车站的群众，顷刻散尽。至当天晚上，有1600多人被捕。火车站外除了戒严部队，已经再看不见闹事的人了。

陶铸认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特务在造谣破坏。全省军队立即奉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6月12日，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部署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6月14日，火车东站又聚集了近千名企图外逃的群众。

公安局采取了坚决的收容措施，这次逃港狂潮终于平息。但是，通过自由的香港媒体，已经传播到全世界。

第八章　齐鲁之难

在上世纪60年代任中监委处长的李坚，当年曾到河南、安徽等省对大饥荒作过调查，他对我说，山东是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1999

年，我到烟台养马岛讲完课就到济南，在朋友的帮助下，查阅了60年代的历史资料。经过几天查阅，有一些收获，但觉得我看到的资料还不够完全。山东大饥荒的情况，有待档案开放后，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我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写这一章。

一、批判赵健民，大反右倾

山东也像其它省一样，“大跃进”也是以政治大批判开路的。山东批判的对象是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

赵健民，1912年生于山东聊城冠县。1932年入党。1933年，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叛变，全省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赵健民也被捕，山东军阀韩复渠对他亲自审讯，他没有屈服。赵健民出狱后，和姚仲明等重新联络了地下党，恢复了山东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前，赵健民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在解放战争中，他任第二野战军17军军长兼政委，带领大军直入大西南，把国民党的军队赶出了贵州省。1949年后在西南局主管交通，主持修建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后任铁道部副部长。1955年任山东省长，大跃进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1958年因对浮夸风不满被扣上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山东省委的第一、第二把手都是从华东局调来的。赵健民是山东的老革命，在山东必定有较深的人事根基。是这位老革命对新来的上司不够尊重呢，还是外来的上司畏于赵健民的地方势力呢？也许二者都有,他们之间是不够协调的。赵健民是敢说真话的人，恰恰在这一点上被新来的上司抓住了把柄。帽子是现成的，而且是致命的——右倾机会主义，再加上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其实，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只不过是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说了一些真话，地方主义只不过是对中央派来的上司不够顺从。

1958年10月21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基层组织批判赵健民，向全体党员传达。省委认为，“自1956以来，赵健民同志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绩，成为反‘冒进’、夸大落后面的代表人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1956年8月，在一届四次人代会期间，赵乘舒同、谭启龙同志不在济南的时机，在人代会工作报告中，却完全否定工作中的巨大成绩，集中工作中的缺点，搜集落后面材料，大肆揭露和批判工作中的缺点，反对省委‘冒进’。”

2001年12月14日，本书作者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76号赵健民的家

中，见到了这位老人。当时他已经89岁了，身穿兰色化纤旧中山装，头戴一个大皮帽子。我到他家门口时，他扶着拐杖站在街边看着我，我以为是一位退休工人，没搭理他。我进他家，他才跟着进来。经他夫人杨瑞波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叱咤风云的赵健民。在他家简陋的客厅里，我们聊了起来。他首先谈到他和舒同的关系。他说："舒同是个知识分子，是江西抚州一个学校毕业的，爱好书法。是从新四军来山东的。我到山东后舒同约我谈话，我们是在办公室外边操场上谈的。我谈了山东情况，谈了我的认识和我的意见，希望在他的主持下把山东工作做好。舒同说，你谈得很好，但我觉得你还没有和盘托出。我说，我实实在在地跟你讲了，你还感觉我没有和盘托出。他怀疑我联系地方干部孤立他，不支持他。我说，舒主任，我已经实事求是地向你讲了我的意见，再不能编一个'盘'向你'托出'，看以后的事实考验吧。"

为了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对在省里有较深人际关系的干部倍加防范，在广东、山东、甘肃以及其它省份，都批判过"地方主义"，用外来干部钳制当地干部。赵健民在山东很有威望，当然是要防范的。毛泽东就是利用舒同来防范赵健民。

赵健民在接受我的访问时说："1958年大跃进，有全国的影响，寿张县西边有个范县，济南这边又有过高产卫星。这股风越刮越大，更大的卫星也出来了。我也是农村出身。知道这么高的产量做不到。高世贵是跟我一个村庄的，当时是支部书记，我问他亩产这么高行吗？他说做不到。我到农村考察，下面组织农民跳秧歌，我不高兴。我也到范县看过共产主义，是假的。舒同这个人，你越说好，他越高兴；你说实话，他不高兴。舒同在南郊宾馆盖了七栋小楼，毛、刘、周、朱、陈、林、邓，一个一栋。我当省长时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时还是一条罪状。1958年撤了我的省长，让我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济南钢铁厂搞扩建，需要材料，南郊宾馆盖别墅也要材料，我只好把材料让给他。

"山东饿死人不少哇！仅惠民地区就死了60万。后来薄一波对我说，山东饿死了300万人。"说这句话时，赵健民满脸沉痛而严肃。

除了批判赵健民以外，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王卓如也受到批判。全省农村开展了两条道路斗争运动。在济宁地区，"各地区都进入了大鸣大放阶段，大字报都贴了上千张，意见鸣了几千条，情绪很热烈，气氛很紧张。"与此同时，在全省各地乱拔"白旗"，乱扣帽子，成批地撤换干部和开除党员党籍。据山东省济宁地委监委不完全统计，济宁地区从1958年7月进行整风补课以来，到1959年4月，当作"白旗"拔掉的就有26000多人。1959年4月，中央

监委转发一份报告中对济宁乱“拔白旗”提出了批评。中央监委在转发告的按语中指出：“‘拔白旗，插红旗’是一个生动形象的口号。有一些地方干部，没有弄清‘白旗’的概念，就到处乱扣‘白旗’的帽子，那些带有急躁和惩办情绪的人，更把‘拔白旗’变成强迫命令、惩办干部的工具，少数坏分子则乘机制造混乱。今后处理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一般不要提‘拔白旗’，要实事求是地根据其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按什么性质处理。”

但是，中央监委的批评并没有扭转山东左倾狂热，因为这种狂热来自中央。

二、毛泽东、刘少奇给山东鼓劲

河北省有徐水县的共产主义热潮，河南省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又放了那么多“卫星”，与这两个省相邻的大省山东，却没有他的邻省热闹。毛泽东到这个省鼓劲了。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乘专车到济南，下午3时左右，召见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省委书记裴孟飞、军区司令杨得志到车上谈话。谈话要点如下：

下午3时到4时的谈话。

毛问谭：你们这里有没有干劲？

谭答：干劲有，但不够齐一。

毛：要经过辩论，什么也不做，搞他三天。

谭回报：今秋准备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秋季增产和明年跃进计划，进行大辩论，起码搞五天。

毛：五天多了。可以先辩论两天，到地里生产一天，再回过头来辩论一天，不经辩论，主意是你们出的，群众就不会自觉地积极起来。

谭：我们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山东跃上来了没有？

谭：跃是跃上来了，但比河南、河北兄弟省差一些。

毛：去河南开一次现场会，往返几天？

谭：一周时间。谭告，寿张县今年可以亩产双千斤，争取3000斤。

毛：去年四级干部会时你们急于收场嘛，急于将李峰暴露嘛，你们只贴了2000张大字报，贴他一万张就好了。

我到江苏去看时，他们开四级干部会，贴大字报几万张，印了十本。他们的口号是：帮省委整风。开始大家不敢讲，以后闷不住，妖魔鬼怪都出台。你们不让人家出台。

谭：现在除了赵健民的问题以外，省人民委员会以王卓如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的问题已经解决。

毛：如何解决的？

谭：在机关大鸣大放，大字报揭露王卓如包庇右派，搞独立王国，一直反对省委的冒进，甚到造假帐，搞两本帐，粮食紧张时隐瞒粮食不报省委。

毛：那是王卓如搞的还是赵健民搞的？

谭：地方主义头子是赵健民。

毛：他有报告没有？

谭：他领导的专案小组有一个报告。还有去年的二中全会上主席作了七条指示以后，还作了反“冒进”的报告。

毛：讲那七条时我是温和派。那时没有事实，人家不服，以后有了马鞍形，人家才服。同时，那时国际上有波匈事件，党内不宜公开分裂。

那时人们吵学生招多了，其实多招一点有何不好，不必反对嘛！那时说工人招多了，现在还是不够嘛！增加工资是多了一点，这也没多大关系。去年招生少了，到处哇哇叫，今年又不够了。南宁会议是去年八、九、十三个月跃进以后开的。问题解决得较好，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又发展了，可惜你们没参加。

谭：赵健民的报告也像潘复生那样，讲阶级斗争熄灭，讲敌我矛盾退出历史舞台。

毛：他自己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你们现在有几个书记？四个书记下台了。师哲怎么这样坏？他学的是苏联贝利亚那一套，惨无人道！

参观水稻、棉花时，毛问了很多问题，谭一一作了回答。

参观回来在车上毛又对谭说："三年赶上英国，再加四年，苦战七年赶上美国！但是不要对外宣传，这会使帝国主义害怕。"

这个谈话记录存山东省一个资料馆里。我回北京以后发现时间不对，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不可能在山东视察。《叶子龙回忆录》记载毛泽东"8月9日在山东农村视察"，8月13日《人民日报》上有毛泽东8月9日视察山东农村的报道和讲话摘要。但报纸上的谈话摘要中和山东省资料馆这份记录稿中的内容不同。不过，报纸上发表的中央领导人讲话和实际不同的事是常有的。可能是我把8月9日错抄成9月5日，也许9月5日毛泽东又视察了山东。看了这个谈话记录摘要，毛泽东的态度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还是要反右倾，还是要鼓干劲，要把群众的热情鼓起来，三年赶上英国，七年赶上美国，还要"引蛇出洞"鼓动人写大字报"让妖魔鬼怪都出台"。山东的干劲终于鼓起来了，赶上了河南，河北。然而，干劲鼓起来以后，出现的却是"五风"，这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

刘少奇比毛泽东早一个多月到山东。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他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就是这篇报告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

中共中央地位最高的两位领导人对山东如此鼓劲，山东在"大跃进"中自然不会落后。

三、山东的“五风”有特色

批判右倾思想以后，大跃进狂潮叠起，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去了，1958年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1959年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夏粮长势很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老天爷白帮了忙，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8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10月下旬开始，全省700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12月初达到887万人。甚至在1960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1959年、1960年两年，全省共荒地5000万至6000万亩。”

山东的大跃进是很有声势的，以泰安地区为例：

1958年8月　泰安境内各地农业社大办公共食堂，农户停止自炊，一律免费入公共食堂就餐。1959年1月，中共济南市委在泰安召开会议部署发展公共食堂，各地办食堂再兴高潮。泰山市、泰安县14处公社388个核算单位，建公共食堂2610处，就餐人数76.65万人，占两县市总人口的98%。

1958年9月29日　全地区动员144.95万人（占全区整半劳力的80%）参加省委部署的钢铁生产“淮海战役”。各县主要负责人到工地召开誓师大会，分采矿、运输、建炉、冶炼几路大军。铁矿共有6家，矿工5000余人。投产的各种小土炉19758座，还有各县发动群众搞起的土坯炉、水桶炉、大窑坩锅炉、烧缸炉等计462983座。日产铁由44吨达到5.93万吨，泰安、肥城放出日产千吨“卫星”。

1958年9月，中共泰安地委下发《关于办好人民公社的几点意见》。全区始办人民公社。至1959年1月，境内建成人民公社103处，入社农户102.69万，占总户数的98.2%，入社人口412.32万人。人民公社多是数乡并为一社，其规模5000～10000户。实行工农商学兵（民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体制，下设生产大队。办社初，提倡“一大二公”，无偿平调各生产大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至1959年，全区共平调各类生产资料和财物总值近2.5亿元。

在大跃进狂潮中，全省括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以下内容除了注明出处以外，主要摘自曾希圣1960年10年12月16日在山东省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存

山东省档案馆。

共产风　共产风集中表现在对财产“一平二调”，平，即平均分配；调，即无偿调拨，当时简称“平调”，即充公。

山东省的“一平二调”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东西都平调。劳动力、资金、土地、山林、房屋、车马、机器、作坊、农副产品、建筑材料、锄头、镰刀、铁锨、猪、鸡、鸭、水桶、灯笼、尿桶等大大小小的财产，都随意从群众家里拿走。章丘县群众说：“切菜板子刀，扁担勾子梢，杈把扫帚锨，犁耙绳索鞭，下至黄泉，上至青天，都可以随便调走。”也有人说：“一平二调就是抢劫。”

第二个特点是干什么事情也得用“一平二调”的手段。大办钢铁，兴修水利，办社工业，搞丰产方（即在一块土地上搞高产试验），办红专学校，办养猪场，办食堂，办托儿所，办展览馆，开现场会，干这些事所需要的一切，都从生产队和社员家里无偿调走。

第三个特点是，搞“一平二调”的不仅是公社干部，上至省级、县级，下至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搞平调。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公家平调农民的财产。

第四个特点是，“一平二调”风不是只颳一阵子，而是连续不断地颳。自1958年以来，连续三年，越颳越猛。日照县刮了15次，玉莲县洪凝公社颳了29次。寿张县张秋大队社员说：“三年来有五次大清剿：第一次是军事化大搬家，清剿家庭用具；第二次是大办钢铁，清剿铜、铁、锡；第三次是倾家荡产大投资，清剿社员财产；第四是反瞒产私分，清剿生产队的粮食；第五次是1960年春恢复食堂，清剿社员家里的粮食。”多次清剿，生产队、社员一贫如洗。

共产风除了“一平二调”以外，另一个方面是随意合并生产队，打乱基本核算单位。1959年冬到1960年春，合并了30%的生产队，由此被牵动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60%。有的公社的规模三年变了五次。农民说：“今年变，明年变，哪有心思搞生产。”

共产风的第三个方面是在分配上破坏按劳取酬原则，公社按照浮夸的产量过多地扣留公积金，不少社、队连续几年没有分配，社员没有拿过工资，没有分过东西。

浮夸风　1958年全省粮食总产量上报800多亿斤，后来落实到380亿

斤，最后落实到287亿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上报400多亿斤（原来是420亿斤，书记裴孟飞建议上报320亿斤，舒同不听，报400亿斤），后来落实为270亿斤，后来又说是243亿斤。1960年省委计划粮食产量550亿斤，各市、地委报的数字是374.74亿斤（亩产405斤，粮田面积9261万亩），比省里计划减少了31.9%。后来说落实为总产量为182.34亿斤（过秤入库174.97亿斤，其余为自留地、十边地的收入），实际只有160亿斤。

寿张县第一书记刘传友，1958年上报平均亩产5000斤，总产31亿斤，实际亩产只有297斤，总产量只有4.05亿斤。1959年上报平均亩产700斤，总产8亿斤，实际亩产只有298斤，总产量只有3.6亿斤。这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不同意浮夸的产量，讲了真话，被加上了“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粮食浮夸造成了一系列恶果。一是造成了农业已经过关或问题不大的错觉。因而各方面事业的计划安排都跟着这个吹得过高的“基础”而膨胀起来，结果超过了负担能力。以水利建设为例，全省原定1960年修建大中型37座，结果1959年冬到160年春，一个浪头就上了122处，800万人上阵。第二个恶果是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1958年是少有的丰收年，但由于粗收浪费，放开肚皮吃，结果1959年春天就出现了粮食紧张。1959年收成仍然不错，但由于估产偏高，仍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到了1960年春，又发生了上年更加严重的紧张局面。这个报告没有说，即粮食产量浮夸造成了粮食的高征购，农民的口粮都拿走了，这是最为重要和恶果。

命令风　在山东省很多地方，对社员强迫命令也成了一股恶风。

强迫劳动，大搞通宵夜战，分配过重的劳动，不顾社员死活。

强令摊派，寿光县收购鸡蛋任务层层往下派，不养鸡的也得卖蛋。这个县寒桥公社洛东二小队36户，只有一户养鸡，却强迫31户社员卖了103个鸡蛋。

强迫社员投资公社办的事业，逼得社员扒坟、卖家具，寿张县全县为此拆房53000间，扒坟38000多座。范县拆老百姓的房子、挖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来的砖瓦盖大礼堂、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平民百姓哭哭啼啼，拆房挖坟的热火朝天。

乱批判，乱撤换干部，对完不成任务的，不浮夸的，就扣上“右倾保守”、“不听党的话”、“没有全局观念”、“和党唱对台戏”等政治帽子，被辩论、斗争、撤换、处分。五莲县洪凝公社自1959年以来，撤换基

层干部192名，经调查，其中撤换错了的有80多名。郭林大队的小队干部撤换了60%，全队54名党员都当过干部，都被撤过职。

对强迫命令稍有不顺从的就打骂和刑罚。枣庄市阴平公社南庄生产队队长孙某，全村挨过他打的人有173名。社员张同云死了小孩没有即时报告撤户口，就停口粮10天，一家8口被饿死4口。益都县郑母公社副社长刘某打了40多人，群众称他为“刘百害”。寿光县对群众的刑罚有：绑、押、打、冻，拔胡子、拧耳朵、不给饭吃、坐老虎凳、拨肋骨等。1960年1月到7月，这个县被迫自杀的社员有688人。

寿张县石佛公社雷庄大队专门成立了打人执法连，连长范某一个人就打了70多人。供销社干部李某在修猪场时一夜就用木柴打了60多人。这个公社根据重点调查，打过人的干部占30%－70%，社员因挨打而上吊的死6人，自杀未遂的11人，伤重致残和发病的24人，外流人口4000多人中也有部分是因为受不了打而出去的。位海生产队共有52个小孩，在大兵团作战时，干部不让妇女回家喂奶，不能抱小孩看病，因而死了37个。

干部特殊风　在群众没有饭吃的情况下，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昌乐县朱田公社党委规定，商业部门的东西要优先满足公社党委的需要。公社党委50人，从1960年3月到8月，就吃肉1360斤，平均每人27斤。1960年10月12日，共青团山东省委孙继文、潘昭锡给省委写信，反映莱芜县的特殊化问题，其中写道：“县委五个书记除了田书记经常到食堂买饭和大家一起吃饭外，其他书记都在食堂单炒菜吃。每餐至少一个细菜，细粮随便吃。第三季度机关停止供应猪肉以后，每个书记每月发猪肉5斤。据说第一书记王某每月发猪肉票30斤，他爱人赵华（副县长）每月20斤。今年国庆节、中秋节，县商业局批给县委食堂猪肉40多斤，书记每人分5斤，每个常委分2斤，剩下很少一部分才给其他机关干部吃。这次过节县商业局送给书记、县长每人一箱子食品，价值二三十元。这实际是送礼，不过是交钱而已。”

瞎指挥风　在农业生产中不尊重农民的意见，不尊重科学，全凭上级领导干部的主观意志办事。生产队里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什么时候种，甚至禾苗的密度多大，农民没有发言权，生产队长也没有发言权，全由公社领导或县里领导人发号施令。农民明明知道按他们的号令做不行，也不能说。谁要是说了不同意见，谁就会被辩论，被批斗。这样的事例几乎每个公社都有。

山东的“五风”不是曾希圣第一次揭露的，1960年3月，山东省召开了有12000人参加的六级干部会，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在会上的报告中也曾批评过“五风”问题。山东省六级班干部会议秘书处1960年3月21日

编印的《会议情况》中，介绍了舒同报告内容。毛泽东3月22日、23日，对《会议情况》第一期和第二期作了批示，指出在一些县、社中，“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经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帐，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分子，一定要法办。”

但是，一直到1960年底，舒同撤职以前，“五风”还是十分严重。

四、山东省粮食产量和征购

据国家粮食部1962年提供的几个的报表中的数字，山东的粮食情况如下表。这是最后的实绩数，在当年年度，还有一个讨价还价过程。

表8－1：1957－1961年山东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242．10	287．00	243．00	182．34	180．00
贸易	210．52	249．57	211．30	158．55	156．52
征购	51．04	61．82	74．69	29．57	42．95
销售	55．66	71．42	66．73	45．44	40．93
净拥有	215．14	259．17	203．34	174．43	154．50
总人口（万人）	5373	5422	5373	5188	5265
人均净拥有（斤）	400.41	477.99	378.45	366.22	293.45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山东》。

表8-1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参看本书第＊页“祸起中原”——页码待定稿后由编辑定）。表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30％为口粮。

从表8-1中可以看出，大跃进年代，山东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粮食产量242．10亿斤，1961年只有180亿斤，三年减少了62．1亿斤，即减少了25．66%。在产量下降的同时，征购却大幅度增加，1959年度产量比上年下降了44亿斤，但征购比上年却增了12.87亿斤。1960－1961年征购下降是不得已的事，因为这时农民大批饿死，想征也征不上来。

表8－1中的粮食产量还包括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例如，1960年的182．34亿斤，实际过秤入库的只有174．97亿斤，其余7．37亿斤是农民自留地和“十边地产的粮食。

1958年是少有的好收成。但由于劳动力都去搞大办钢铁和上水利工地，秋收劳动力很紧，收割、打场都很粗糙，浪费很多，丰产不丰收。由于浮夸，误以为粮食很多，秋收后放开肚皮吃了一阵子。结果，还不到1959年春，粮食就紧张得很。卫生部报告，1959年“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比较广。其中山东最为严重，1月至4月10日，发生肿病人77．9万多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0日，即发生肿病人17．3万人。”在这期间，山东省委还不承认没有粮食，认为是生产队把粮食藏起了，有的县开始搞瞒产私分运动。1959年3月8日，舒同在发表了《当前人民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写道：

当前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在1958年粮食大丰收以后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除了灾区以外，全省各地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荒，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往往是那些大丰收的地方闹得反而愈加严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虽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毛主席向我们指出的，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寻找。

舒同在这里不认为没有粮食，他还坚信原来浮夸报上来的产量，认为还是大丰收。粮食哪里去了？他没有说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但认为由于所有制的原因，生产队、农民不愿意把粮食拿出来。这也是反瞒产私分的理论根据。这不是舒同的创造。2月份，毛泽东对广东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经验的批示是2月22日，毛泽东批示《经济消息》发表的《是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文章是2月28日。舒同的文章说瞒产私分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制的观点都是来自上述毛泽东的批示在。在极权制度下，上面一呼，下面百应。作为封疆大吏，不应是不行的。同全国各地一样，不管是不是所有制造成的，舒同也是大搞反瞒产私分，广大农民受害很深。

惠民县搞得最厉害，召开了全县五级干部会，把瞒产私分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省委总结了惠民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舒同亲自对这个经验作了批示，从而在全省开展了以反瞒产私分为内容的两条道路斗争与社会主义教育。各社队，村庄，都翻箱倒柜，搜查粮食。

1959年收成也不算坏，还是浮夸，认为有粮食，一段时间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到了1960年春节，就闹起了粮荒。

1960年按220亿斤产量安排：种子30亿斤，饲料20亿斤，农村口粮食130亿斤（包括统购返回15亿斤），征购55亿斤。以上说的种子、饲料是在最低限度上又打了折扣，实际是不够用的。农村口粮130亿斤，全年平均每人只有270斤，每天只有12两（老秤，16两为一斤，12两即0.75斤）加上麦收以后多吃了一点，从9月20日到明年6月中旬，每人每天只有10两多一点粮食。加上地区不平衡，约有1000万人每天只有8两（即半斤）左右粮食，而且主要还是地瓜折粮。征购55亿斤也很紧：农村统销去年20亿斤，今年只能安排15亿斤，城市和非农业人口统销25亿斤，这需要压缩城市和非农业人口，20社办工业人口，加上降低标准（原来已经降了2斤，还有降低2斤）。这里列出的数字都是原粮，而且多数是白薯干、萝卜干、菜叶代替，经过各级干部克扣以后，远不是这个数字。山东省委这里的数字是计划数，表8-1中粮食部的数字是执行结果数。后者的产量和征购数都比前者小。

1960年7月，山东农村公共食堂不断发生停伙，到7月上旬的不完全统计，六个地区（不包括青岛、烟台、临沂）有5210处食堂停伙。

1960年12月20日，在粮食部召开的北方15省生活安排座谈会上，山东省粮食厅副厅长张春生发言说：粮食入库和分配全省已结束。到12月20日，已经过秤入库的粮食为164.6亿斤，估计今年粮食产量180亿斤左右，比去年总产量274亿斤减少了94亿斤。征购任务到12月20日已完成42.8亿斤（原粮，粮食年度），比去年征购实绩70亿斤少27亿斤。种子留了23.8亿斤，饲料留了4.3亿斤，口粮留了93.39亿斤，全省农业人口4640万人，平均每人一年201斤。从粮食厅的角度看，粮食总收入为54.82亿斤（其中：中央调给军粮5亿斤，调给种子1亿斤；华东支援2亿斤；征购42.6亿斤；1960年6月底库存4.22亿斤）。粮食总支出为54.70亿斤（其中：统销50.20亿斤；军粮1亿斤；种子1亿斤；损耗2.5亿斤）。收支相抵后山东粮食库存仅有1168万斤。他说，这个盘子安排问题很大。统销50.20亿斤与各县要求销售的粮食差2.5亿斤。今年三四季度已销售出19.1亿斤，明年一、二季度吸剩31.10亿斤，比过去三年同期少8.14－14.18亿斤。

1961年春，山东农村粮食情况：到1961年4月20日，全省农村口粮尚有22.2亿斤（其中农村留下的口粮还有15.78亿斤，国家返销6.41亿斤）。从4月21日到麦收的几十天内每人平均口粮6两多一点（16进位，6两相当于10进位的3.75两）。其中5两（相当于10进位的3.125两）和不足5两的占农村人口的30.9%。口粮不足5两的县有：即墨，胶县，平原，枣庄等。要知道，这不足5两粮食还包括地瓜干在内。扣除各级干部多吃多占，到农民手中已经不多了。而这点粮食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每天热量的唯一来源（那时没有油，没有副食）。这已经挨饿的第三个年头了。

五、馆陶事件

馆陶属聊城地区，后合并于冠县。“五风”对农村的摧残，由粮食问题上的浮夸而引起的高征购，把农民推向了饥饿的困境。从1959年春天开始，各地就有饿死人的情况。但地方官员怕担责任，不让向上反映。最早传出饿死人的情况是馆陶县。馆陶事件是怎么揭开的？1958年12月，在党代会的时候，一位转业军人向中央写信，中央转到省委，省委转到地委，地委转到县委，县委不认账，地委也不认账。这位转业军人一告再告，最后他直接去北京找到门路告了状。中央知道了情况，有关部门打电话，指令认真处理。省委、省人委才派邓辰西、王斋去调查。调查组成员看到食堂停了伙，到处都有饿死的人，老百姓围着调查组的汽车哭。

从山东省委、省人委1959年1月16日的检查报告中可见一斑。这个报告说，自1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正在发展。截至1月10日，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调查，很难举出准确数字，但这种情况已经遍及全县。全县7个公社已有6个公社有停伙、半停伙的村庄。其中以房寨、柴卜、魏塔寨三个公社最多。潘庄、北馆陶、八岔路三个公社次之。南馆陶公社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问题，但现存粮食（包括地瓜干、萝卜干）也只能吃一个月。据各公社自报，全县1195个食堂，完全停伙的有82个（据群众反映，绝不止此数），半停伙的更多。很多食堂从中秋节后就没有见粮食，吃地瓜和罗卜干已经四五十天了。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有4个食堂在去年中秋节后全部吃地瓜，11月全吃萝卜，12月29日停伙，直到中央转来人民来信后，才于1月9　日、10日两天开伙。

食堂停伙、半停伙以后，社员四处觅食，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能远出者到河北邯郸、曲周、大名等地投亲靠友，逃荒要饭。有的卖儿卖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门求嫁，不正常婚姻大

量发生。有人偷盗、自杀。因饿和饿加病者死亡二三十人（这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有的村劳动力全部逃光，生产停顿。

全县据不完全统计，自1958年10月以来，仅到邯郸一地逃荒的就有13000多人。检查组访问了5个公社的20多个村庄，所到之处，男女老幼哭诉饥饿，惨不忍睹。

县委按照自己估计错误的高产安排征购任务和社员生活，征购任务在先，社员口粮有名无实，或名多实少。食堂绝粮后有的叫社员自筹，有的干脆宣布："愿拾，愿偷自己办。"本来没有粮食反而加紧"核实"产量，不报高产不散会，发动群众反瞒产私分、挖"老鼠洞"（即小仓库），挨家挨户搜粮食，搞得群众十分恐慌。

报告说，群众有三个不满意：

第一，对干部虚报产量不满意。这次检查组下去前，几乎各公社都开了会，不让群众向检查组反映情况，只许说产量高，吃得好，不准说吃不饱，没饭吃。"谁乱反映，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对干部不关心社员生活不满意。

第三，对干部强迫命令不满意。不少干部打人、骂人，强迫社员脱光衣服干活。不脱光就是没干劲。强迫社员彻夜劳动，冒雨劳动。有村庄强迫青年妇女脱光衣服劳动。群众反映，秋收烂在地里不收，却强迫群众翻地三尺种小麦。

一个星期以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这个检查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写道："1958年全国受水旱灾面积是4亿亩，成灾面积1亿亩，其中80%是旱灾。经过几年水利工程，旱灾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老规律是成灾成片，易于发现；新规律是旱灾插花，容易忽视。在丰收地区往往有一些减产、或平产或增产不多的地方。如不注意，就容易在这些地方发生严重问题。"

从全国来看，馆陶事件是发现得较早的大批饿死人的事件，如果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采取措施，可以减少其它地方的灾难。遗憾的是，中共中央并没有从这里看到全国性的大饥荒已经来临。从中共中央这个批示中可以看出，他们把馆陶事件当作个别事件来处理，并没有看到全局的问题，还强调自然灾害，根本没有从政策上检讨，这是酿成全局大祸的原因之一。

六、济宁事件

在馆陶盖子揭开以后，济宁的盖了也揭开了。根据上面批来的群众来信，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到济宁调查处理。

谭启龙于3月21日到达济宁，在济宁停留了22天。到了钜野、曹县、金乡、单县、菏泽、郓城等6个县，找了郓城、济宁第一书记谈了话，开了十几个座谈会，访问了一些农民，他的考察还是很深入、很全面的。3月23日，他从钜野给给第一书记舒同的信中写道：

近三个月来，很多地方没有人干活，有的虽然下了地也是应付应付，效率很低，巨野一个队24个人一天只浇一亩麦子。全县72万亩耕地现在只了耕了22万亩……，牲畜死亡仍未停止，原有23000头，死了5000头，还有瘦弱的，现在能使用的仅有2100头。……巨野、曾县、曹县挖麦苗吃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丰产田的麦苗也被挖掉吃了。

郓城县发生抢粮库事件130多起，有一万多人参加，抢去粮食19万多斤。昨天早晨宋江公社又有50多人集合准备抢粮。

金乡县共62万人，据他们汇报，有42万人需要救济。前天往单县运的29000斤粮食，行至金乡被抢走了13000多斤，有100多人伪装成挖野菜的，见运粮车来了就一涌而上。

单县曹马公社前次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瞒产粮食650万斤，会后只搞出200斤。大庄区一个生产队长报告瞒产8斤，回家后他就逃跑了。

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由于措施失当，生产没有安排好，现在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巨野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田桥公社榆树皮四角钱一斤，饼干一角钱一片。有些人饿得脸已经变了颜色，有的摔倒了爬不起来，全县水肿病人原来4000人，现在12000人。人口外流现象也没有停止，单县枣庄管理区最近每天逃走12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有的已经把棉衣卖掉了，现在只穿单裤。巨野县已经发现饿死的。现在群众情绪很不正常，有些人整天愁眉哭脸，有的连脸也不洗了，大小便随地拉，根本无心过日子。

干部不愿来参加会，仲山公社一位干部说："我一见仲山头就头皮发麻，一进仲山城街就浑身发抖。"

谭启龙1959年4月11日从济宁给舒同的信：

……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挖麦苗,有的树皮也剥光了。牲畜毛猪大量

死亡，农具破坏非常严重，单县原有牲畜44532头，死亡10669头，占24%，原有农具58784件，破坏36446件，占62%。

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1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数），已发现弃子卖婴58起，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153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曹县一个县外逃4万多人（全地区外逃跑34万人），他们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饿死，有的自杀，有的晕倒在河里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据了解，仅在河南开封就死亡62人，情景之惨，令人难忍；影响之坏，无法估计。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单县4月上旬水肿病达53000多人，黄后楼一、二排32户260人，患病的达227人，占81%，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巨野县刘官屯村共3000多人，有一半以上水肿病，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造成这种严重紧张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仅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而且还大量侵犯了个人生活资料所有制。例如，“猪羊大集中，粮食一脚蹬（即全部入国库）”，“苦战两昼夜，完成三脚踢”（即粮食、钢铁、猪羊都大集中）。单县实行穷拉平，全县统一分配。巨野、郓城去年秋收时，只准留三天口粮，其余全部入库，实行“三库合一”（国库、社库、队库），全部变成国库。他们全县较好的大车和大牲畜无代价地划归县运输公司。有的调社员的自行车归干部所有。很多地方将粮、草、菜、砖瓦、大材、锅，全都归了公。各县都有一部分地方实行移村并村，全县几天之内移村714个，36140户，占全县总户的三分之一以上。群众说：“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

秋收季节，抽调了160多万劳动力脱离农业办钢铁、挖煤矿、修铁路、搞大型水利工程。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团作战，许多社队几乎没有劳动力，造成秋收粗糙，损失很大。

城武县受灾仍调出粮食4600万斤，发现粮食紧张后，又采取抽富济贫的办法。地县领导仍没有冷静地分析研究，死啃亩产1000斤、800斤不放。群众不承认公社向县里报的帐，地县委则扭住不放（据现在检查，亩产只有400多斤），说下面右倾刮台风。去年12月，各县普遍召开了万人大会，今年3月上旬又召开了四级干部会，都采取了回忆对比、诉苦算帐、反对瞒产私分，反对本位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办法，在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粮食9亿多斤。地委领导很得意。但散会后干部外逃，很少拿出粮食。曹县四级干部会后几天，外逃四万多人。

有的地方干部提出：“有粮食不报，吃饭犯法”、“私藏四两钢铁和私藏一个美国鬼子同罪”（为收废钢铁化钢交指标）、“亩产不上500斤的

豆子一律翻掉”、“深翻不到一尺半的不准下种”等口号，大搞强迫命令。单县反映，干部有三大法宝：一辩论，二戴帽，三拔白旗。对群众进行体罚的花样有10多种，如，顶灯跪砖、穿梭、拔头发、挂玻璃、喝小便、坐飞机、学龟爬、熬鹰、戴高帽子等。群众说：“他们比汉奸、鬼子还厉害。”

1959年春，济宁事件已经很严重，但舒同在济宁会议的总结中，还要求济宁自己解决问题。到了冬季，毛主席不同意再搞反瞒产私分，但舒同还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搞反瞒产私分。在安排群众生活方面，舒同始终强调“是下面的思想问题，有点实际问题，也不大，是能解决的”。

《关于金乡县防治肿病检查情况简报》记载了随同省委裴孟飞书记下乡的王瑛于1959年4月29日给山东省委的一封信。这封信说，金乡县在元月就在鱼城公社开始发现水肿病人时，经调查全县有5000多人，到3月发展到39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2%，其中以鱼城公社为最严重，这个公社的8万人口中，有水肿病人17295人，占总人口的21.6%，4月份又有发展，据4月26日统计，全县累计发病10242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5%（其中发病二次以上的有58034人），死亡792人。这个县对水肿病人推行了偏方治疗：芒硝煮鱼，苍术散，丝瓜络煮枣等。

七、全省大饥荒

1958年冬季出了馆陶事件，1959年春季出了济宁事件，还有菏泽事件。从1959年1月到1959年4月，全省累计出现浮肿病人839925人。这些严重的情况虽然引起了山东省委的重视，但左倾狂热的思想路线没有改变。在庐山会议期间，舒同上山开会去了，裴孟飞在家主持了几次会议，对1958年和1959年的粮食产量和征购任务重新作了讨论，比原来要实际一些。舒同从庐山带回来反右倾的最高旨意，不仅推翻了裴孟飞定的指标，还让裴孟飞作检查，各地跟着裴孟飞调整指标的也要作检查。这样，左倾路线继续把农民逼上绝路。到1960年夏季，出现了全省大饥荒。

范县在1958年秋曾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十分欣赏，说范县的报告是一首诗，在干部中广为印发。结果怎么样呢？修水库占了土地，还使大量土地盐碱化，老百姓哭鼻子流泪。县委还大批拆老百姓的房子、扒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房子和扒祖坟得到的砖瓦木料盖礼堂、盖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到1959年就食堂停伙，水肿病大量

流行，饿死了不少人。

临朐县大峪大队，1959年秋收，40多万斤粮食被征购，剩下人均口粮仅一百多斤。从11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给4两原粮。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粮："萝卜4斤顶1斤，菜叶子5斤顶1斤，南瓜2.5斤顶1斤。"玉米秸、剥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壳、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农民的口粮。实在凑不出了，又假设每人偷了40斤粮食，强行加到每个人的头上，算起来每人的口粮又多了40 斤。最后向上级报告说每人口粮357斤。但一天4两粮食维持不了生命，农民就这样活活饿死。死的人多了赶不及埋，许多人暴尸路旁。

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寿张县一个村庄没有生小孩的。王成怀同志向舒同汇报说淄博地区死了11万人。他还满不在乎，说安徽、江苏也死了许多人，不值得大惊小怪。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1960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到处可以看到饿死人的惨状。在青岛市第三钢铁厂门口，有一个要饭的老太婆，拿着一个破瓢要饭。饿得倒在厂门口，工厂里没有一个人给她饭吃，也没人看她，最后饿死在厂门口。为什么这样？因为给她饭吃就会被说成右倾，不敢管她。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1960年12月23日下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由于饥饿，民兵训练工作不得不停止，1960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迟。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有一位军官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一个战士全家讨饭去东北，父亲临走时去部队，父子见面后抱头痛哭了一场。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15份电报，其中13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

饥荒严肃重破坏了生产力。1960年劳动力只剩1790万人，比1957年的2173万人减少了384万人；1960年耕畜比1957年减少了237万头，

而且剩下的瘦弱不堪；土地荒芜，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900万亩。盐碱地由1500万亩增加到2000万亩。粮食产量退回到1949年的水平，总产量只有160亿斤。

在大饥荒期间，山东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只能用官方资料进行计算。根据《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的历年死亡率资料，可以计算出山东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184.43万人，少出生225.66万人。薄一波告诉赵健民山东饿死了300万人。从当年山东省饥饿的严重程度来看，300万人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

八、舒同丢官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是舒同，是一位很名气的书法家。他出身贫寒，师范学校毕业，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谭启龙是第二书记，赵健民是第三书记。1955年5月，中共中央曾打算调舒同到《人民日报》任社长，后来没有成行。在这期间，山东的新闻报道曾说谭启龙是第一书记。有一次，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到山东访问，在接待时，谭介绍舒同时称他为“原政委”（省委第一书记是军区的政委）。有档案资料称，舒同对谭启龙因此对谭猜忌，怕他取而代之。

舒同怕失去封疆大吏的显赫地位，最终还是失去了。

由于山东情况比较严重，靠山东省委难以挽回局面。中共中央华东局到山东揭盖子。当时山东属华东局。1960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舒同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

曾希圣走马上任，10月29日，他作了一个大报告：《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克服困难而斗争！》。这个报告，用大量事实指出山东问题的严重性：1，农业严重减产，粮食总产量只有160亿斤，回到1949年的水平；2，口粮严重不足；3，病情严重，420万人水肿；4，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5，耕地减少；6，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他批评说，庐山会议上中央提出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舒同没有照办；上海会议中央进一步强调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舒同仍然没有办；北戴河会议，毛主席指示要抓紧时机，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没有认真传达贯彻，青岛会议开了40多天，误了季节。曾希圣指出：

要承认今天其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人为灾害所造成的。而人

为灾害，又主要是因为原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和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同志没有执行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历次指示所造成的。

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我们山东的情况严重以后，就当机立断地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不仅立即撤销了他们两人的职务，而且抽调了一批干部并在调拨大批粮食、医药、种子以及其它物资来支援山东。

曾希圣承认死人是人为造成的，这是对的，但他把中央和毛泽东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山东省委的两个人，是不符合事实的。

舒同从封疆大吏变成了批判对象。中共中央华东局于1960年12月中旬，在山东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和五级干部会议，集中揭发批判舒同的错误。山东省档案馆保存有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省委扩大会议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主持，12月16日，曾希圣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首先揭露了山东“五风”的严重性。接着他批评了几种错误的看法：第一是夸大困难，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第二是怀疑“三面红旗”；第三是怀疑中央领导人。他批评说：“有人说，中央是领路人，舒同是带队人，带队人带得不好，领路人也应负责，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舒同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党中央领导毫无关系。”曾希圣把中央领导人的责任开脱得一干二净，把山东问题仅看作一个省的特殊问题，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根据曾希圣定的调子，参加会议的山东干部向舒同猛烈开火。

会上揭发舒同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系列的纠偏政策贯彻不力。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伸出自己的两个手掌，把近两年的工作比做十个指头,“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指头。在强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的同时，他也指出要解决好“一个指头”的问题。由于毛泽东的重点放在反右倾上，各省在传达贯彻庐山会议时，对“一个指头”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舒同在传达庐山会议的讲话中，甚至没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个指头”这一段话。为什么没有传达？舒同在检查中说，“怕给群众泼冷水”，出于同样的考虑，裴孟飞建议他在传达时把毛泽东关于也要注意左倾冒险主义的说法在一定的范围内提一下，舒同没有同意，反而批评了裴孟飞。

会上揭发舒同在粮食问题上的错误，在1960年四五月份粮食分配会议上，没有听取一些实事求是的意见，把指标压下来，把1959年粮食产量落实为320亿斤，而偏听偏信了农工作部长张新村的意见，把产量落实为400亿斤，征购任务为70亿斤。这是山东省粮食紧张的重要原因。在粮食紧张出现以后，还不面对现实，为农民解决问题，还在全

省搞反瞒产私分运动。给农民造成更大的灾难。

196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除了讨论国际形势外，国内工作提出保粮、保钢、保外贸出口三个任务。毛泽东要求各省要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食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夏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回来后，8月初召开青岛会议传达贯彻。但是，青岛会议开了40多天,一直开到10月份，农时已经耽误了。为什么青岛会议开这么长时间？在批判舒同的省委扩大会上，省委秘书长吴建揭发，原来舒同和一个女护士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到了青岛以后，舒同根本不和其他书记往来，除了参加他非参加不可的会议以外，不是和护士在房间里打扑克，就是带着护士游山玩水，跳舞。要给女护士打胎，打完胎以后，又要休养恢复健康。这样，就有意将会议时间拖延。直到青岛会议结束以后，舒同还不打算回济南抓工作。后来陈云要来济南，吴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催他提前回来。青岛会议没有开好，救灾措施没有落实下来，山东的饥荒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有人说，中国不是议会政治，而是会议政治。会议怎么开，开多长时间，全由第一把手的意志决定。中央如此，各省也如此。

舒同12月10日的检查，讲了由于他的工作失误给山东带来的损失，与会者不满意，没有过关。12月13日的检查时，他一开始就说：“我现在向大会检查我的错误，不但检查错误，而且向大会请罪，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他列举了中共中央自郑州会议以来等一系列的纠偏政策，检查自己执行不力。他说他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从左的方面来接受庐山会议的精神（庐山会议的精神本来就是左的嘛，他这么执行了，还要检查，舒同好不冤枉！），他还扣上了自己个人主义、沽名钓誉、好大喜功、好出风头，急躁冒进等帽子，因此，在做计划、定指标、提工作任务的时候，往往从压倒外省出发（争先恐后），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本省实际情况出发。

曾希圣身挂两省帅印。其实，安徽的问题比山东还要严重，曾希圣到山东来揭舒同的盖子，却紧紧捂住自己的盖子。相比之下，舒同比曾希圣要老实得多。

舒同丢官以后，山东的情况并没有好转。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月份饿死人16700人，9月份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10万，卖儿卖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第九章　浙江之折

有一条江横穿浙江省，上游称为新安江，中游称为富春江，下游称为钱塘江。这三条江首尾相连，却弯成一个“之”字，所以称为浙江。浙江省是一个沿海省份，海岸线长，岛屿众多，气候温湿，自然条件好，加上这里的人民勤劳而富有韧性，有很强的奋斗精神，有经商的习惯和头脑。因此，这里是中国的富煦之地。但是，在1958年以后的三年间，这里的农民也饱受饥饿的折磨，经历了历史上一次重大曲折。

一、从农民口中夺粮

浙江省人多地少，人均耕面积不到一亩。新中国成立以前，浙江是个缺粮省，据国民党有关记载的材料，每年要从外省调进2亿到5亿斤粮食。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实行土地改革，粮食比建国前多了一些，但是，不仅没有粮食调入，还承受了沉重的粮食征购任务。1954年到1955年度征购了51.24亿斤粮食，1955年春出现了“人人谈粮食，户户等统销”、“人叫，猪叫，牛叫”的紧张局面。1956年到1957粮食年度，又因征购过多，使得1957年春天，余姚、上虞、慈溪、桐乡、金华、仙居等县发生了闹粮事件，垮掉了一部分合作社。

到了大跃进年代，征过头粮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也与浮夸风有关。1958年，上报粮食产量为320亿斤（实际产量为142.1亿斤），1958 - 1959粮食年度，开始省里向中央认购58亿斤，后落实征购任务为48亿斤，到1959年4月20日，实际征购57亿零6百万斤（其中本省销售37.6亿斤，纯上调10亿斤）。尽管大幅度超额完成了任务，但中央20日给浙江电报称，“为了支援上海和出口粮食，浙江除完成58年上调粮食10亿斤外，现又增加1.4亿斤”。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向中央表示：“省委研究坚决支持这一措施，同意分别在五、六月份调出。”

粮食部的数字和江华说的数字略有差异，但明确地反映，大跃进以来，浙江粮食连年减产，1961年的产量只有1957年的86%。详见表9-1。

表9 - 1　1957 - 1961年浙江省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45.00 157.00 155.00 129．00 125．00

贸易粮 126．09 136．52 134．78 112．17 108．70

征购 42.41 47．69 53.26 32．99 32．97

销售 34.48 42．23 43.81 31．66 26．90

净拥有 118．16 131．06 125．33 110．84 102．63

总人口（万人）2503．3 2563．5 2598．3 2616．9 2663．2

人均净拥有（斤）472.02 511.25 482.35 423.55 385．36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浙江》。

表9-1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其中，口粮大约占三分之二。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511.25斤，其中口粮大约为340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粮以后，农民平均有300斤就不错了。再经过一层一层地尅扣，吃到农民嘴里的远远低于300斤了。

1959年春天，全省各地出现了粮荒。据安吉等11个县调查，每天口粮不到12两的（即0.75斤）占用膳人口的50％以上，其中安吉县占80％以上，兰溪、桐庐占70－80％，建德、吴兴、义乌、龙游、占60－70％，诸暨、天台、浦江、桐乡占50－60％。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224个食堂有168个停伙，病人大量增加。天井生产队社员孙本根、受荣生产队社员汪明发，因断粮，病势加剧而死。省粮食厅反映，有些地区粮食紧张，表现在：1，食堂断粮停伙，吃麸皮、糠饼、草子、野菜等；2，摘青吃青情况严重；3，排队抢购副食品。安吉县5月1日到7日，全县193个生产队中，有87个生产队的食堂断粮停伙。农民上山下地掘笋、拔野菜、吃青蚕豆的情况相当普遍。群众因吃代食品过多因而引起脸脚浮肿、泻肚子、中毒等现象。据5月上旬10天的统计，已死亡50多人。上于县东关公社从5月16日开始有6个大队62个食堂断粮停伙。

1959到1960年度，粮食征购任务为58.12亿斤，统销指标为40.12亿斤，扣除本省统销数，纯上调粮食任务为18亿斤。这个任务比上一年

度增加了80%，比上一年实际增加了58%。任务一下达，各级干部态度坚决，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从1959年10月1日到12月7日，只用67天时间，全省就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破了历年征购工作一定要跨年度的常规。到1960年2月10日，共征购入库粮食59亿零2百万斤（最后统计实绩为60.2亿斤）。与此相对应的是，省内销售量到1960年2月10日止只有24.82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66亿斤（最后统计数为47亿斤）。为什么能完成得这么好呢？“在粮食登场后大搞群众运动，实行“四快、四边”，这里说的“四快”是指收、打、晒、运四个环节要快，“四边”是指边收，边打，边晒，边运，及时入库。更为重要的是，“用阶级斗争的武器去克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批判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揭穿和打击退地主富农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行为……插红旗，立标兵，掀起学、赶、超、帮的群众运动，组织粮食入库高潮，一鼓作气，短期内把粮食起来。”从这一段话不难看出，其所以能完成任务，采取了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了持不同看法的人，还批评、处分了一批干部。为什么销售粮食比上一年度减少呢？“减少的主要办法是对产粮缺粮队实行增产抵消”，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征了过头粮，过去要靠“返销”来解决，现在不“返销”，靠生产队自己增产来解决。

1961年春天，更严重的粮荒又来了。温岭、黄岩、平湖、嘉兴、兰溪、余姚、新登等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这些情况下面再作介绍。

1960 - 1961年度，严重的饥荒使省里不得不总结前两年“估产偏高，任务过大”的教训。当时算了一笔帐：1955 - 1957年度上调粮食23.98亿斤，而1958 - 1960年度上调了33.59亿斤。浙江省粮食征购任务占总产量30%左右比较适当，1958年这个比重为40.9%，1959年达43.2%。23个重点产粮县1957年每亩平均负担为220斤，1958年达260斤，1959年达290斤。结果，“得虚名落实祸”。因此，这一年度的征购任务减少到50亿斤，统销36亿斤，纯上交14亿斤。但口粮还是很紧张，如果把农村口粮恢复到1955年的水平，全省不仅不能完成中央的上调任务，还要调入11.31亿斤，如果口粮水平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全省要调入1.08亿斤，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1961 - 1962年度，征购任务为45.8亿斤，统销指标为34.5亿斤，纯调出11.3亿斤。同时动员30万吃供应粮的城镇人口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一年浙江灾害严重，征购任务调整43.7亿斤。扣除本省销售外，这一年上调中央9.6亿斤，计划外支援四川省2100万斤。在这一年中，虽然城乡供应是紧张的，部分农村曾发生逃荒、破产渡荒的现象，但情况经上一年好一些。

这里引用的浙江省粮食部门的数字和表9-1中国家粮食部的数字略有

差异。可能是原粮和贸易粮换算的误差，也可能是生产年度的粮食年度的误差。我把两种数字都列在这里，供今后专家研究。

从表9-1中粮食部的征购和销售数字中可以看出，浙江省每年都是征购数大于销售数，即每年向省外净调出粮食，而且净调出粮食数年年增加1961年，浙江省委办公厅对嘉兴、海宁、嘉善等17个重点粮食县进行了调查，写出了17份调查报告。本书作者将17个县的数字综合于表9 - 2中。从表中可以看出，除温州每年调进粮食、绍兴部分年度调进粮食、衢县、海宁县个别年份少量调进粮食以外，其余各县在这些年间都是大量调出粮食，而且调出粮食不断增加。因此，这些鱼米之乡不仅“低标准，瓜菜代”，还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民外出逃荒，浮肿病、青紫病等营养不良性疾病大量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也有出现。温岭县1959年是个平常年景，但在“入库高速度，队队满堂红”的口号下，征购入库强调“先下手为强”，征购数占总产量的47.4%，把农民推入了饥饿的困境。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外流人口2800多人，浮肿病人达8698人。其它县也有类似温岭的情况。

表9 - 2　浙江省主要产粮县调出粮食数　单位：万斤

	1955 - 1956	1956 - 1957	1957 - 1958	1958 - 1959	1959 - 1960	1960 - 1961
嘉兴	13593	19574	15055	16943	14135	19764
海宁	- 206	3686	3855	5487	6794	6370
嘉善	6477	11823	9107	14145	11131	6976
宁波	5662	10310	9387	7334	13033	7132
余姚	10910	10298	9214	9854	7284	5546
上虞	6373	3795	2514	4606	3866	3231
绍兴	- 489	742	- 1076	- 604	- 2748	2709
诸暨	7678	13818	9832	8815	11754	11329
奉化	5219	2318	4947	6848	6575	4749
衢县	2422	1140	- 415	1577	- 183	4154

兰溪 180 697 2103 1850 3130 2325

温州 - 8071 - 9125 - 11611 - 8744 - 7894 - 6791

瑞安 4476 1611 4163 7246 6738 6658

温岭 8554 7407 6047 13206 13820 9035

黄岩 1771 6907 6800 8079 8120 6729

临海 7319 2558 6102 6143 6538 5028

金华 2435 2459 3056 3812 2869 3212

资料来源：《重点粮产县粮食情况调查》（之一到之十七）

一般说来，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大面积的、持久的饥荒。浙江省是一个有商业传统的地方。在刚刚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这里还有着活跃的农村集市。当时，浙江省农村市场集中于大、中、小三种集镇。大集镇（包括县城），人口1万左右或1万以上，这里大都有国营商业，私人工商业在三百家以上，这是农村的经济中心，这样的集镇全省有70多个。如杭县的临平、塘溪，萧山的临浦，余姚的周行。中集镇私人工商业有一二百户，如杭县的乔司、三墩、瓶窑，余姚的天元。小集镇有数十户私营商业户，分布在广大农村。那时合作社（供销社的前身）兴办不久，在大集镇还不能与私营商业竞争。1953年，大集镇上合作社所占的比重很低（临平占33.2%，临浦占24.48%，路桥占20.54%），中集镇占50%左右，小集镇占70%左右。农村商业集市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私人商业所占有。在大集镇，私人商业的资金数倍于合作社。详见表9-3。

表9-3 1954年初浙江私营商业和合作社的资金状况　　单位：亿元

大集镇　　中集镇　　小集镇

临平　临浦　路桥　天元　桥司　戴村　亭趾

私商 46．8 28．1 25．2 5．4 6．6 2．2 1．9

合作社 14．4 4．4 2．8 4．5 5．0 2．6

资资资料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农村市场基本情况调查》，1954年3月18日。

这份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调查报告，实际上是省合作社组织撰写的。他们搞这个调的目的是为了和私商进行斗争，为了用公有商业取代私有商业。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私商大幅度减少。经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私商基本消灭，再经过1958年大跃进，不仅没有私商，连商品经济也没有了。本来十分活跃的浙江农村经济也变成了一潭死水。农民完全被捆绑在有限的土地上，再没有其它生路。

二、江华紧跟毛泽东

“共产风”不是群众中自发地刮起来的，而是来自上面。像全国其它各地一样，1958年中共浙江省委也吹响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对毛泽东的思想是跟得非常紧、非常快的。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反对这个估计，但事隔不到一年，在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不经讨论，就一人断然推翻了这个估计，独自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957年12月9日，江华代表浙江省委，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毛泽东12月17日看到了这个报告，于凌晨2时给秘书叶子龙写了一封信：

请于今日上午8、9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7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1时以前看完。其它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事后，他又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个报告，还加了很长的编者按。编者按强调“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江华的报告为什么引起毛泽如此高度重视呢？主要是这一段话：“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毛泽东独自一人推翻中共“八大”决议以后，第一个响应、并较系统阐述的封疆大吏

就是江华。

在向共产主义进军中，浙江也不落后，这一伟大的进军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与收缩的较量中开始的。1955年，浙江省农业集体化过急过快，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引发了农民的抵抗，“仙居事件”影响最大。1955年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认为合作化发展太快了，对浙江省的合作社采取了“坚决收缩”的方针，从53000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个。毛泽东对此十分震怒，说这是“胜利吓昏了头脑”、“犯出右的错误”。据说浙江省委当时就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作法。毛泽东表扬“中央认为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浙江省委对于今春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所做的批评是正确的”。195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发文向浙江作检讨，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

这说明，在合作化一场较量中，浙江省委的立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这无疑会加强浙江省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信心和决心。

浙江省委不仅在1958年大讲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在“大跃进”失败后的1960年，在农民处于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浙江省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还吹得很响。

1960年3月3日下午，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以《高速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灵魂》为题，向全省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作报告。他以俯瞰全球、高屋建瓴的口气，向听众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个世界、两个体系存在。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是客观事实，连瞎子也会看到。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一切都要贯穿着共产主义思想，用共产主义思想来建设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因此，要不断地进行改造，用不断革命的思想来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一种是停止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巩固一个时期是可以的，长期巩固或永久巩固是不行的，那是违背马列主义辨证法的。社会主义建成了，还要不断前进。第二种是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不满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前进，把共产主义建成为止。第三种是把社会主义开倒车。在这三种思想中，我赞成第二种，要不断地向共产主义前进。

1953年，毛泽东在北京批评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过渡。1960年，江华在杭州批评了“巩固社会主义”新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这大概是对毛泽东的“紧跟”和“活学活用”吧。就在江华高呼向共产主义前进

的前后，各地饥饿的报告频频送向浙江省委。

1960年3月21日，在大华新大厅，江华在向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中说：

人民公社一定要过渡，不过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国家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这两种经济基础长期并存下去是不可想像的。斯大林说过，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有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并存。必须把这两种所有制向单一所有制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怎么过渡？江华说："第一步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第二步由基本公社所有制变成公社全民所有制，第三步由公社全民所有制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像工厂一样。"鉴于"共产风"带来的灾难，江华要求县委书记们不能急于过渡，为此，他要求大家努力创造过渡条件，并且开出了过渡的时间表："第一步过渡需要三、五年左右时间，第二步要八到十年。"江华在这次讲话中再三强调，要搞好向共产主义过渡，面临着"谁战胜谁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我们的目标，不战胜资本主义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提出在这场斗争中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下中农包括新的、老的），团结经过改造的富裕中农。现在地主、富农在大多数地方搞臭了，现在就是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包括老的新的），他们中的一部分对我们有抵触情绪。我们要团结中农里面大多数经过改造的部分……孤立那些不愿意改造的少数中农，特别是上中农"。他要求县委书记："你们回去查一查，每个生产队，是不是贫农占优势？是贫雇农当家还是富裕中农当家？"他还要求县委书记们要敢于改造自然，他举例说："四川有一种茅草和麦子交配，一个麦穗长1500粒。牛和猪交配，生下猪来就是几十斤。"

省委领导人旗帜鲜明的讲话，党报党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宣传，使浙江省的"共产风"连年不断。自1958年以来，浙江省较大的"共产风"刮了三次。第一次是公社化初期到到中共中央郑州会议以前。当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热衷于全民所有制和按需分配，出现了大量的"一平二调"。郑州会议以后，根据中央精神，批判了"共产风"纠正"一平二调"。但长期灌输造成的共产主义情结很深，1959年下半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又刮起了第二次"共产风"，以办水利工程、大办畜牧场、大办社队工业的名义，再次大搞"一平二调"。1960年，为了"加快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这种行为可以从上面引用的江华讲话中找到理论根据），大力发展公社经济，提高公社的经济实力，又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粮食、现金和物资。据1961

年3月统计，公社化以来，全省一平二调的总金额共达20184.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被无偿“调去”36元多。平调的有土地、劳动力、耕牛、房屋、家具、炊具、现金等。当时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平均不过几十元，36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调去”的不仅是当年农民的收入，还把农民过去的家底也调走了。这里说的“调”实际就是掠夺。这种掠夺，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破坏了生产力。

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吃饭不要钱”。浙江省“吃饭不要钱”是靠“大辩论”推动的。建德县大洋公社卫星生产队地处山区，只有154户、695人。1958年，“由于粮食大丰收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以后，广大群众思想觉悟大提高，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纷纷要求实行吃饭不要钱。但有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存在着右倾保守情绪，他们对粮食估产过低，认为吃饭不要钱没有条件。”生产队党支部根据公社党委指示，及时引导群众开展辩论。“在辩论中极大部分社员拥护吃饭不要钱，但也遇到少数社员（主要是富裕农民）的反对。通过辩论，驳倒了富裕农民反对吃饭不要钱的种种论调，不仅在两天内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一致拥护吃饭不要钱。经过公社党委的批准，立即宣布吃饭不要钱。”

共产主义强调有计划的生产，而“周密的计划”必须指挥权高度集中。生产上的瞎指挥是生产指挥权高度集中的必然产物。像全国各地一样，自1958年以来，生产上的瞎指挥在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浙江省农村干部打骂农民，扣饭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些地方农民和处境十分悲惨。平湖县新埭公社黎明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自称“小皇帝”，他和生产队长、副支书三人随意吊打、捆绑农民、不给饭吃、任意扣罚、抄家。据不完全统计，仅1959年被他们处以打、吊、跪、关、冻、扣、罚、改造、没收、抄家，不给饭吃的有91起，有的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1959年夏季社员没有口粮，他们却向上级谎报有粮食，还挨户搜查，把能吃的东西全部没收。因而饿死30多人。

温州地区永强公社1959年11月3日至10日，在群众大会上重点批判了63人。其中，被戴高帽游街的2　人，罚跪的14人，被捆打的9人，被吊的12人。该社永新大队总支书记韩某，将买卖500斤蕃薯的一个妇女戴上四顶高帽，帽上写着“套购蕃薯500斤在轮船码头上挂了牌，叫她自己敲锣，叫她女儿在一旁喊：“我母亲套购蕃薯500斤，大家不要学她样。”金化地区兰溪县游埠公社万善大队确定了24个批判对象，其中7个是富裕中农，其余是贫下中农。遂昌县西屏公社水南大队，1959年10月24日到11月1日，共开了11次斗争会，被斗争的20人当中，罚跪的16人，被打的4人，受伤的3人。这个大队10月13日在清路召开了四个生产队的斗争大会，将12个斗争对象排列跪在两条

长凳上，举起双手，从开始一直跪到结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遥枪托打手臂，从凳上跌下来民兵就用枪托打屁股。南山生产队毛岩林（中农），因年纪大，从凳上跌下四五次，被打后罚跪7个小时，身受重伤。这个大队干部卢某、蔡某指使生产队干部对13小队的24户社员逐户搜查，翻箱倒柜，共搜走粮食1800多斤。

浙江省的反右倾斗争也是很积极的，曾经揪出了“沙、杨、彭”反党集团。沙即沙文汉，杨即杨思一，彭即彭瑞林，都是省里的负责干部。

三、鱼米之乡的饿殍

“共产风”破坏了生产力，高征购拿走了农民的粮食。上级农民留下的口粮已经不多了，到了公社，还要层层尅扣。安吉县南湖公社，在安排口粮时，公社从11个生产队的供应数中扣留了35459斤，到余庄生产队，又扣了4800斤。

从1959年春天开始，全省各地的饥荒报告频频送到省委。1959年5月25日，中共浙江省委转发了两个材料：

《安吉等县口粮情况的调查》称：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224个食堂，已有168个停伙，占75％。全社生病的1042人，已死亡35人。建德县农村食堂吃饭人数263000多人，据5月10日统计，每人每天用粮食12两（16进位，12两即0．75斤）以下的占55％；8两（即0．5斤）以下的占11％。大同公社上马大队5月9日到11日，断粮3天。龙游县在农村食堂吃饭的共有20万零6千人。平均每人每天用粮12两以下的占70．7％，8两以下的占2．8％；海宁县澉浦公社从春耕生产开始平均每人每天只能吃到4两稀饭，许多食堂停伙，有的食堂已经散伙。

《有些地区粮食很紧张》说，省粮食厅反映：长兴县虹溪公社28个生产队有27个因断粮停伙，社员以麸皮、草籽、野菜充饥。平湖县100多个食堂每天只有大米6两（即0．375斤），91个食堂无法开饭。余姚县的横河、郎下、低塘、四明、环城五个公社口粮很紧，全县吃青3300亩。部分社员上山挖葛藤根吃。安吉县5月1日到7日全县193个生产队中，有87个生产队食堂断粮停伙。据5月上旬10天的统计，全县已死亡50多人。据南湖、安城、递铺三个公社的统计，患病者有3047人，占总人数的4．2％。嘉兴县部分生产队断粮，陶庄公社南王、火星生产队断粮。上虞县东关公社5月16日开始有6个大队62个食堂断粮。历海公社5月17日有26个生产队断粮。

在浙江省档案馆存有各地向省委的求救报告：

1959年5月25日，金华专员公署报告，据兰溪、浦江、义乌、金华、桐庐五个县统计，发生大量浮肿病人，仅兰溪县4月分就发生41135人。

1959年6月7日，嘉兴专区安吉县南湖浮肿病报告，5月10日最高发病人数为1126人，占总人口的4.86%。病情为脚部麻木，全身疲乏无力，以后发展到足背浮肿，二、三天后逐渐肿至膝部，严重的肿至大腿及腹部，甚至产生腹水。

1959年7月26日，金华专署卫生科报告，建德县浮肿病人大量发生。

1959年8月4日，景县卫生科报告，据对四个重点村调查了338人，其中有176人有浮肿病，有病者占调查人总数的52.07%。

1959年8月9日24时，瑞安县人民委员会电报称：我县南田、学口、大学、珊溪、黄坦王壶等公社，浮肿病大量发生。仅据南田、学口、大学、珊溪四个公社不完全统计，已有4800例。

1959年8月18日，温州专区《卫生工作简报》称，近来，瑞安、景宁、平阳等县发生大量浮肿病，其中瑞安县8月24日统计，就有10985人。

1960年3月30日，黄岩县报告，全县有浮肿病人2263人，死亡4人。主要发生在新桥、三甲、全清天个公社13个生产队。

1960年5月20日，吴兴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浮肿病的通报》称，从4月上旬以来，我县开始发现浮肿病人，据6个公社上报数统计，共有1072名病人。

1960年6月4日嘉兴县卫生局《浮肿病防治工作总结》中说，据1－5月份统计，浮肿病发生人数为11873人。

除浮肿病以外，浙江省农村还发生了大量的“肠原性青紫病”。病人口唇等粘膜及四肢末端有青紫状，卫生单位认为，这是由于大量以青菜代食，引起亚硝酸盐中毒，使正常的血红蛋白变成了高铁血红蛋白。1958年到1959年均有发生，1960年突然升高。1960年3月1日以来，全省27个县市的188个人民公社的不完全统计，发病人数有11762人，死亡365人。其中金华地区最为严重，发病的有11个县79个公社，病人6809人，死亡233人。这个专区的兰溪县8个公社中就有7个公社发病3869人，死亡131人。发病和死亡的多是15岁以下儿童。另

据兰溪县游埠公社调查，全社76个生产队有68个生产队发现病人，从3月2日到24日，18天当中，共发现1120例（不包括再发病人），死亡多人。

没有粮食，各级政府号召农民吃代食品。组织农民上山、下海，大搞代食品。安吉县青山公社大里生产队1960年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又多卖了3万多斤粮食。就“书记动手，干部带头，老农为师，大搞群众运动，十天挖掘代食品原料92000多斤”。葛藤、郎鸡根、野苧麻根、金刚刺都成了很好的食品。1961年12月，江山县搞了番薯藤叶、橡子等代食品二万二千五百多担。

1960年5月10日，林乎加在黄岩召开的“全省改造落后队现场会”上讲到，落后队有几个特征，这就是；病、饿、流、荒、坏、官。病：根据系统29个县的极不完全统计，从3月1日到4月底，生浮肿病的有72600多人，死亡270多人。流：是指人口外流逃荒。荒：是指土地荒芜。坏：是指坏干部当道。官：是指官僚主义。所谓落后队，并不是个别的，据路桥镇调查，占生产大队总数35.5%。林乎加把这些问题归罪于“反动势力复辟”，归罪于“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统治势力还没有摧毁”。他的这一看法和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看法相似。不过，林乎加这种法比毛泽东早了半年多。

虽然有饥荒，但浙江省还算比较轻的省份，饿死有的不算太多。浙江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呢？我们还是用浙江省的人口统计资料作些研究。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中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1959-1961年的三年中，历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3.85万、6.68万和1.37万，合计为11.9万。另外，根据同书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进行研究，可知三年中的少生人口约为113.14万人。

根据《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的数据，用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的的计算方法计算的结果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0.77万人，少出生105.17万人。大饥荒对浙江人口的影响为二者之和，即116万人。

四、炉头生产大队：从丰足到饥荒

浙江省衢县石梁公社炉头生产大队原来是万田乡的一个自然村，距离县城只有几公里，人均耕地1.4亩，高于平均水平。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耕作方便，是一个富煦丰足之地。1953年这里有两个互助组，1954年，两个互助组发展为两个初级农业社。1955年，这两个

初级社在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之后，平均每人口粮650斤，每个劳动日分红1.2元以上（不包括土地分红和家庭副业收入）。

这样一个丰衣足食的地方，从1956年以后，很快进入贫困，进入饥荒，而且出现了饿死人的悲剧。

问题是从1956年成立高级社开始的。当时，这两个初级社和万田乡的其它12个初级社合并为1116户的高级社（一乡一社），称为胜利高级社。开始，炉头的农民认为自己的收水平较高，与其它初级社合并要吃亏，不愿意合并。但上级领导认为“合作社愈大愈优越”，逼炉头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们在炉头河滩上筑了一道防洪坝，故意在炉头方向留了一个缺口，威胁炉头：“不参加大社，管叫炉头村变成炉头滩！”炉头被迫参加大社以后，就来了一个土地大调整，上百亩好的水田被调出。在年终分配时搞“穷富拉平”，炉头农民的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不少。农民说：“泥鳅黄鳝一样长，多产不多吃，多做不多分，还有什么劲头搞生产！”

面对社员生产积极因素不断下降情况，高级社的领导人不分析原因，不纠正平均主义的错误，却期望用高压的手段来提高生产积极性。1957年整风之后，他们制定了《胜利高级社劳动纪律》，规定多大年龄的人必须做多少工分，只能超过，不能短少。要服从领导，听众指挥，农活不合干部标准的一律返工。不经组长或队长批准，不得外出。违反劳动纪律、不服从分配的要罚款或扣除口粮。从此，干部不仅掌握了社员的劳动权，还控制了社员的吃饭权。

1958年8月，县委又在这里重点试办“共产主义公社”，又把周围的5个高级社合并了进来，组成了一个1639户，长12里、宽7里的大核算单位。10月，又成立了更大的石梁人民公社，原来的“共产主义公社”成了石梁公社的万田生产大队。这一年自留地归公了，社员家庭饲养的猪、蜜蜂等都归公了，做饭的锅收去大炼钢铁了，灶拆去做了肥料。劳动力大调动，土地大调动，农具大调动，房屋大调动，社员说，这一年是真正的“共产年”。主要劳动力都调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当时还大搞“吃饭不要钱”，其它生产队来吃，小学生来吃，中学生来吃，过路人来吃，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3月，整整吃了五个月。

1959年上半年，传达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听说自留地可以退回了，可以私人养猪了，社员很高兴，有的真的养了猪。可是到了12月，管理区（在公社和大队间的一个管理层次）大搞千头养猪场，把社员新养的50多头猪全收走了。群众说：“共产党是上半年骗，下半年变”。

为了达到公社下达的出勤率指标，大队干部把社员都赶下田，让食堂把粥桶抬到田头，不管男女老幼，都到田头吃饭。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瞎子也得到田头才能吃到饭。在田间的人必须通宵达旦地干，下雨也不能回家。干部守在路上，见谁回家就打，连喂奶的妇女也不准回家，孩子在家里哭，妈妈在田头哭。对于不听话的社员轻则骂、扣饭，重则吊打，每次开会，迟到的人不管老小，都要罚跪。管理区私设的监狱，先后关押了200多人。

1960年，管理区提出落早秧、插小秧，因为气温低，不是谷种烂了就是秧苗烂了，烂了补，补了烂，一直到七月只好搞直播，还是荒了100多亩田。仅这一项炉头就损失稻谷两万多斤。原来炉头的100多亩番薯是种在村西的桥头山上，那里的土质适宜番薯生长，管理区为了成片种植，硬让炉头把番薯种在东面的白塔山上，结果没有收成，损失了三万多斤番薯。管理区要求密植，还规定株距为5×2，社员觉得太密，就改成6×2，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发现社员没听他的话，就一把抓住正在插秧的社员的头发，狠狠地将他按在水田里，命令大家把秧拔起来重插。如果上级干部来检查工作，不但要集中欢迎，还要把大路上的野草拔干净。1960年双季稻收割时，公社书记来检查，管理区就从炉头抽180个劳动力去蒋家滩二里长的大路上拔草，误了收割，损失粮食15000多斤。

共产风，瞎指挥，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连年下降。但是，大队上报的产量数却是连年上升。1959年，炉头大队产量实有34万斤，比“三包”产量53万斤少了40%，大队上报的“核实产量”却是72万斤。年终分配时，为了掩盖谎言，让会计专门做了一个“超产粮”分配方案，把虚报的数字分配到每户的帐上，作为社员口粮。1959年，全大队需要口粮265800斤，种子33700斤，只能卖粮51300斤，由于浮夸，一下子卖出了127675斤，还上交储备粮5700多斤，支援其它大队数千斤。到了1960年2月开始，连续三个月断粮。7月夏收后，公社命令大搞春收入库，大队集中全部劳动力，连夜收割，脱粒，连夜挑送粮库，社员得不到粮食，以致秋收后又断粮20多天。在断粮期间，只有下田的劳动力每天4两米（相当于0.25斤），其余的人粒米不给。只能以树皮、野草、树叶充饥。因此，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不少人活活饿死。贫农邵根福的妻子临死时还挣扎着用筷子刮着空碗，说：“给我吃点饭呀！”贫农邵双土27岁的妻子因为把萝卜省给男人和孩子吃，自己生浮肿病死了。贫农邵石侬饿死了，他的妻子得了浮肿病，一个4岁的孩子得了干瘦病，双脚瘫痪了。邵石侬饿死时，有人告诉大队长周某，周却说：“人多了要吃饭，多死几个就好了。”贫农邵渭才，原来是初级社社长，夫妻二人1958年和1960年先后死亡，只留下4个孤儿。

经过几年的折腾，粮食产量年年下降，1957年全大队产量361363斤，1960年只有298317斤。社员的平均口粮由1955年的650斤，降到1960年的数57斤。

五、富裕路桥镇的昔日

2001年10月底，中国改革研究会在台州召开年会。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这里的工厂和商场。在飞跃缝纫机厂，参观者啧啧称赞这里的设备和管理，我用手摸一摸车间的油漆地面，手面一尘不染。我做了20多年的工业记者，到过的工厂少说也有上千家，像这样先进的工厂是很少见的。这是小修鞋匠出身的邱继宝创建的飞跃集团的一部分。2000年飞跃集团销售额达15.13亿元，飞跃牌缝纫机60%外销，出口到国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16个国家设有17个销售公司。我们还参观了星星电器集团，这家公司2000年销售额达13.1亿元。在路桥小商品市场，市场的规模和商品的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参观完了以后，我们在路桥大街边等车，看到宽阔的街道和繁华的商业，大家对这里的富裕和发达赞叹不已。

谁也不会想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曾是饿殍遍地。可见制度稍有松动，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有所放松，同一个地方的面貌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路桥镇公社共辖31个大队。据1961年省委工作组调查其中，洪洋、张李、方林、杨家、应家、李家、上马、古岙等11个大队是落后队，占大队总数的35.5%。有章杨、永跃、龙头王、河西、下保、蔡宇等九个大队是先进队，占大队总数的29%。剩下11个是一般队，占大队总数的35.5%。这11个队是：戴家、松塘、田洋王、乘风、洋洪、洋叶、洋张、竞争、肖谢、肖王、洋官。

落后队的特点是，生产和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社员生活十分困难，饿、病、逃、死、荒的情况非常严重。一般队的生产下降幅度比前一种小一些，社员生活没有前一种困难，但也有外流和非正常死亡情况。如戴家大队，1960年和1958年比较，粮食产量下降15.3%，总收入下降了8.5%，发生了22人非正常死亡。有30多名社员被大队长吊打过，22名社员被扣过饭。先进生产队粮食产量下降10%以下。其中全镇最好的尖子大队是章杨大队，虽然也吃不饱，但用粮有计划，瓜菜多，全队只有6个浮肿病人和8个妇女闭经。没有发现非正常死亡。先进队不是没有问题。章杨大队自1959年以来，集体的粮食和钱款大量被盗，一直没有查出，群众认为大队干部、食堂主任、会计、

粮管人员嫌疑最大。

落后队社员的生活十分悲惨。如方林大队，1960年全年人均收入只有14.9元，口粮只有255斤。倒挂户（即劳动了一年还欠集体的钱）占总户数的96%，平均每户倒挂76元。两年来，全大队只出生了12个小孩，死亡人数却有60多人。仅1960年就死了46人，其中31人是非正常死亡（浮肿病死亡17人，干瘦病死亡14人）。社员变卖财产相当普遍。卖得少量的钱到路桥镇上买菜维持全家生命。两年来，社员卖掉20间房屋全部拆了，有9间房屋拆了一半，有96间房屋拆了一部分，还出卖了大量的棉絮、棉衣、家具。

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生产队的饥荒严重程度不一样呢？调查者将路桥镇最好的队章杨大队，和落后队利丰大队进行了比较。这两个大队相隔一里多，都是平原水稻地区，自然条件和原来的基础差不多。为什么在饥荒程度上出现了差别呢？

“共产风”刮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1958年刮了一阵“共产风”，1959年在传达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对“一平二调”拿走的东西还进行了部分退赔，以后再没刮“共产风”。利丰大队从1958年开始，“共产风”一直刮到1960年，刮走了大量的物资和劳动力，社员的自留地也是“三擒四放”。两个大队在1958年都实行了“供给制”（实际只在粮食方面），但1959年以后，章杨大队，减少了供给制的比例，而利丰大队供给制的比重一直比较大，自从办公社以后就取消了评工记分制度。

生产小队的稳定程度不一样。自1958年以来，章杨大队对其所属的生产队没有进行调整，生产队的人员、组织和生产资料比较稳定。而利丰大队对其生产小队两年变动六次。每次变动，都把土地、耕牛、农具、劳动力打乱平分，因此人心不定，耕牛、农具损失很大。

生产上瞎指挥的严重程度不同。路桥公社对这两个大队都有瞎指挥。但章杨大队的社员采取了一些变相抵制的手段。大队干部对于社员的抵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而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利丰大队的干部执行公社指挥很坚决，社员无法抵制，因而损失很大。

浮夸风的程度不一样。章杨大队在上报生产进度、劳动力出勤率、施肥数量、估计产量方面也搞浮夸，但在上报分配粮食产量、接受粮食征购任务时，尽可能讨价还价，浮夸的比重要小一些。而利丰大队浮夸严重。1957年粮食减产8%，却上报增产10%，1958年亩产810斤，上报1440斤，1959年亩产650斤，上报1019斤。1959年粮食减产7万多斤，征购任务却增加了16万多斤。

这两个大队的干部都有多吃多占和贪污行为。

由于以上种种不同，这两个在队的社员的遭遇大不相同。章杨大队虽然也有饥饿，但只有少数的患浮肿等营养不良的疾病，没有饿死人。利丰大队的社员就很悲惨。

1960年和1956年相比，利丰大队粮食亩产量下降下32%，总产量下降了31%。社员每户收入下降了68%，社员口粮标准下降了31%。据1960年4月调查，有189人患病，占总人口的26%，其中患浮肿病的50人，干瘦病的28人，青壮年妇女闭经的32人，子宫下垂的36人，小儿严重营养不良的13人。两年内死亡88人，占总人口的12.5%，其中非正常死亡的75人。两年内出生的只有24人。由于无法生活，有夫之妇带着孩子改嫁的12户（不办离婚手续），把子女送人的8户，结婚的只有一户（大队保管员，有贪污行为）。

1958年以后的两年内，被干部吊打的社员有28人，被拧耳朵的有175人，罚工分、扣饭票的有192户。1960年1月，社员陈开林看到干部大吃大喝，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王某带几个人半夜敲开陈开林的门，把陈拉出去，让他脱去上衣光膀子去化“跃进灰”（用稻草烧泥块作灰肥），陈不去。就拉到大队办公室，说要送管理区，陈开林的妻子坚持要夫妻子女一同去，干部没有办法，骂了一顿才罢休。1960年7月，13岁的男孩林应彩钓了两斤黄鳝，大队长王某全部拿走自己吃了。林应彩到黄岩城里讨饭，被王碰见，说是“给利丰大队丢面子”，当场打了两个耳光，并把林带回来，用伞柄打了一路。带回后又把林吊在梁上和绑在椅子上两个小时。1960年10月，社员陈小友偷吃了几块番薯，全家被扣了17天口粮，陈已怀孕8个月的妻子带着5岁的儿子外出讨饭，下落不明。

这个大队从1949年到1958年，群众的生活水平是逐年提高的。公社化以后，特别是1959年和1960年两年，由于粮食减产、收入减少、征购任务增加，农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普遍出现吃草、吃糠、饿、病、逃，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社员说有十多：吃草吃糠多、生病多、死人多、出卖家具多、送儿送女多、妇女改嫁多、全家破亡多、人口外流多、讨饭的多、偷窃多。从社员蔡庙寿的变化可见一般。蔡家公社化以前12口人，三个劳动力，家里生活比较殷实，大小家具齐全。1959年春，口粮不足，为了买番薯丝吃，出卖家具五件共得13元：席床二件，4元；织布机一部，4元；铜火炉一个，3元；铜盆一个，2元。1959年9月11日，大儿子蔡小玉因浮肿病死亡，留下老婆和两个小孩（一个8岁，一个4岁）。二儿子蔡小头患了严重的浮肿病。到了1960年春，全家11口人，没有吃的，为了到路桥买一角二分钱一斤的菜叶，一角五分钱一斤的番薯藤，再卖家具：共卖出

26件，得117.6元。到此家具基本全部卖光。1960年3月，大媳妇带两个小孩改嫁，全家12口人只剩下8人。

从1959年到1961年，为了买吃的，利丰大队有190户（占总户数的87%）变卖了家具、农具、衣服，有51户（占总户数的23%）拆房子卖砖、木料。

第十章　大饥荒中的云南

2002年12月，为了调查云南省在大饥荒中的情况，我乘波音737从北京飞到云南省会昆明，整整飞行了3个半小时。在1958年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从昆明到边疆一些县还得有10天到半月的行程。可见云南离中央政治中心多么遥远！但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意志，也施加到云南这样一个多民族边疆省份的每一个角落。边疆少数民族也不能幸免“三面红旗”的灾难，也不能逃脱饥饿和死亡。表10－1记录了大饥荒年代及前两年云南省的人口变动。表中的总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取自《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一书。这些数据是云南省官方提供的。

表10－1　　大饥荒期间云南人口变动（单位：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千分之一）

1956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总计

年末总人口 1841．63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1963．72 2021．68

出生率 34．75 23．61 20．94 24．19 19．40 39．71 43．15

死亡率 15．22 21．62 17．96 26．26 11．85 10．85 14．14

非正常死亡 15．12 8．28 24．04 47．44

少出生人口 28．53 33．96 27．60 36．50 126．59

根据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可以计算出（计算方法见本书“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影响”一章）大饥荒期间，云南省人口变动情况，即非正常死亡近50万人，少出生人口近130万人。表10-1中最下面两行就是本书作者计算的结果。当然，这是用官方数据计算的，实际情况要比这个数据要严重得多。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研究的结果是，在

1959年到1961年三年，云南非正常死亡80万，死亡率为4．2%。他没有考虑云南1958年的非正常死亡。

一、从刀耕火种到共产主义

由于考虑到云南的特殊情况，新政权接管云南以后，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采用内地那种对地主进行残酷斗争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实行“和平协商土改”。和平协商土改的政策原则是：“在保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基本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地主从政治上、经济上作了适当让步。”“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废除高利贷剥削，不分其它财产，并保留与农民同样一份土地。改革中不打，不杀，除现行犯以外不捕，并一般不剥夺政治权利等”。边疆地区土地改革到1955年底才基本完成。

说是和平协商，实际上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和平协商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交待政策、发动群众，组成农民队伍；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这一阶段要向地主阶级进行“有控制的、有领导的面对面的说理说法斗争，全面揭发地主阶级的罪恶”；第三阶段是没收征收土地；第四阶段是分配土地。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以后，地主富农不敢请工，也不敢拿粮食到市场上去卖。农村借贷关系也停止。坝区（云南称山间盆地里的小平原为“坝子”）和内地历年有大量粮食流入边疆和山区，1956年，因坝区和内地土地改革，流入边疆的粮食大量减少。再加上沿边一线边防工作加强，1956年3月以来部队向边沿一带推进以后，边民出国帮工和购粮也大为减少，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缺乏农具和牲口。所以，1956年以来，边疆地区粮食问题十分紧张。思茅地区1956年5月粮荒开始露头，六、七月份更为严重。各地均发生农民到区政府和驻军部队要粮食的情况。由于粮荒，澜沧东回区磨界寨“坏分子企图煽动群众抢劫区政府”，后因及时发觉而制止。酒井区大卡竜乡群众私自开仓分了粮食10多担。募乃粮库从4月下旬到7月8日，发生偷粮抢粮事件22次。澜沧东河区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为此，思茅地委在半个月间连续两次发出解决粮食问题的紧急指示。

在1958年大跃进以前，由于农村政策挫伤了农了的积极性，加上征了过头粮，云南农村就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云南省纪委1955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说，1952年思茅县龙潭、坝溜两区因春荒上吊、中毒致死206人（其中龙潭105人，坝溜101人）。这

个事件一直拖到1955年才作处理。临沧地委在1957年7月22日的报告说，临沧县在1956年3月到9月的6个月时间内，发生了因缺粮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在三个区26个乡的范围内，因饥饿而致死的有110人。原来属余粮户和自足户，因国家多征购了粮，又没有及时供应而饿死的占死者总数的占49.9%；原属于缺粮户，虽有粮票而无钱购粮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72%；因生理缺陷或劳动力极差而无人关心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8.18%；原是自足户因吃粮计划不周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29%；因基层干部贪污了粮票和救济金而饿死的占死亡总数的6.36%；吃野菜中毒和因缺粮被家庭虐待而死的占死亡总数的4.54%。因此，群众普遍产生不满情绪。有的说："共产党领导好，把人饿死了。""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四区斗角乡饿死人丢在河里。家属说：："共产党真伟大，饿死人拿去堵河坝。"

临沧地委上述报告说，在这一时期内，因缺粮使偷盗事件普遍发生。据14个乡调查，被发现有偷盗行为的有188人。因偷盗被吊打、斗争、游街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63起。另一方面，外逃、求乞、出卖农具、家具，甚至卖儿卖女的也不少。斗角乡贫农谢廷楷以两元钱出卖了独生子（后又赎回）。有的地方出勤率降到8%，四、五两个区插秧被推迟两个节令。

报告说，出现饿死人的事件主要原因是分配粮食征购任务上存在"偏差"。死人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四、五两个区。第四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975000斤，相当于1954年实绩3672408斤的1.35倍。第五区1955年的征购任务为4075000斤，相当于1955年征购实绩2930081斤的1.39倍。征购任务太重，不得不对采取强制手段，层层施加压力。因而出现了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现象。五区平村乡工队干部半夜三更背着枪，点着火把，带着运粮队伍到群众家中搜查，贫农交不出粮的打欠条，富农交不出粮就现场斗争。富农王中富被打断三根肋骨，他的儿子被打成残废。

临沧县1956年饿死人的事件一直拖到1957年才处理。这个情况一直被压在地委以下，没有向中央汇报。

云南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土地改革比内地晚了几年，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不少地方还是刀耕火种。有的地方还沿用刻木记事、结绳丢豆记数，不会算账，完全不具备办社条件，但是，土地改革刚刚结束不久，政府就不顾生产力水平的状况，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到1957年底，云南省有初级社3015个，高级社18557个，共计21572个，加入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8.9%。到了1958年初，又开始并社、扩社。到公社化前，农业合作社并为18943个。经过9、10两个月的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就在原有合作社的基础上

建立了833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为301万户，占农户总数的82.4%。有的地方上午刚挂上农业合作社的牌子，下午就换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边疆民族地区变换得更快，一些民族自治州1958年初才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土改结束后才创办起来的互助组，很快就被初级社、高级社所取代，紧接着又变成了人民公社。当时称这种现象为“一年内实现两次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又说这是“民主改革、和合作化高潮，双管齐下，一箭三雕，三步并做一步走。”。就连原来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一些少数民族，也“一步登天”地建立了人民公社。全省公社的规模一般在3000－5000户，最大的公社有3万多户。在公社化过程中，原来合作社的财产一律转为公社所有。农民私有的牛、猪以及其它大小家畜、房前屋后的竹林、果园一律折价入社。说是折价，实际只算原价的50%，而且大部分没有付款，完全是无偿剥夺。云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历来把牛当作财富的象征，公社化强行将其牛入社，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

随着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也办了起来。到10月14日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建立了98572个公共食堂，参加人数达1220多万人。大办公共食堂并不是完全自愿的，有的地方强制取消一家一户的伙食，有些地方还没收农户的小农具，甚至将农户的铁锅砸碎，集体、私人的粮食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很多地方以管理区（大队）为单位合办公共食堂，有粮食的生产队和没有粮的生产队在一起吃大锅饭，宣布“吃饭不要钱”。在居住分散的地区，社员每吃一顿饭要翻山越岭，少则走四五里路，多则走十多里路。

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五风”猖獗，对农民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据云南省委统计，从1958年到1961年，全省无偿调动的劳动力不下5亿个工作日。无偿占用和调用的土地约有245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平调的牛、马、骡、驴大牲畜约60万头，拆除农民住房100万间以上，另外还无偿占用农民住房100万间。与此同时，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风盛行。在高寒山区，不让种适合这里气候的荞麦，改为不适合生长的玉米，称为“革荞子的命”。对西南边疆地区，不准在旱田旱地里种适合这里气候的旱谷，改为不适宜当地的杂粮，称为“革旱谷的命”。为了推广三轮三铧犁，强行火烧老式木犁。为了争先进、抢进度，动辄命令群众割掉没有成熟的作物，或者拔掉不合“规格”的幼苗，进行改种或重种。对不执行或没有按基层干部意志办事的扣工分、扣口粮、打骂，甚至动用各种刑罚。

二、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农业集体化和粮统购统销是在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中进行的。说“阶级斗争是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的强大动力”，实际是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推进农业集体化和统购统销。

1957年，在全省农村进行了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于1957年8月在云南内地108个县（市）展开。8月底的不完全统计，斗争了9153人，捕了1342人。这场斗争“生动有效地批判了农村中的右倾思想。”斗争的结果，“一是合作社的劳动出勤率和劳动质量普遍提高；二是叫粮食的不叫了或不敢大叫了；三是市场物价开始稳定；四是基层干部大大出了气”。省委准备在这次斗争中，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10%，逮捕1%（2000人），个别判处死刑。刑事犯罪分子不在此数之内。

也是在1957年，在城市开展了反右派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1957年6月22日开始，云南开展了反击右派分子的运动。1958年4月起，全省又开展了“反右补课”运动。这两次共划出右派分子10731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4.8%，其中，党内右派分子1795人，占参加运动的党员数的3.6%，共青团内右派1616人，占参加运动的团员数的3.72%。在右派分子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58人。在1795名党员右派中知识分子干部1418人，占78．55%，地下党干部1221人，占67．97%。国民党起义将领导龙云、副省长龚自知、省人民委会委员安思溥、杨克诚、谢崇文、宋一痕、秦淑贞等都被打成了右派。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给了严厉的组织处分和行政处分，大部分人被送往国营农场劳动改造，一部分人被判处徒刑。此外，还对上万名被认为有“右派观点”或“站在右派立场”的干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虽然没有戴帽子，也长期受到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歧视。

在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又在全省开展了肃清“地方主义”的运动，严厉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划出了一批所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云南省，批判地方主义这不是第一次。1954年就批判过郑伯克的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当时的主要表现是，在人事上，主张干部“地方化”；在政策上，强调地方情况特殊化。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不仅在云南省，在山东省、广东省以及其它很多省都开展过。五十年代各省批判地方主义的斗争，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是建立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

1958年4月16－22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第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揭批所谓“郑敦、王镜如为首的反党集团”。21日，会议通过了“开除郑敦、王镜如党籍的决议”。郑敦是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们的罪状是：“实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修改党的全部组织原则，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取消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形势‘漆黑一团’，说当前存在‘十大紧张’、‘十大矛盾’；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地、富、反、坏、右大联合,虽他们的阶级基础”。现在看来，他们和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等领导人不仅在干部任用上有矛盾，更主要的是他们对1957年以来的形势持不同看法。在各专区和县，也相继揪出一批“郑王反党集团”在当地的代表人物，挖掘他们的“钉子”和“爪子”，株连了一大批干部。1979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平反。但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损失不可挽回。

1958年大跃进高潮以前的一系列阶级斗争，多数是人为制造的。残酷的斗争，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再也不敢讲真话，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再也不敢批评党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而为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扫清了障碍。也形成了对上盲目服从、对下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大跃进中的“五风”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农业、工业齐跃进

1957年冬，在中央政府的号召下，云南省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到1958年1月上旬，全省兴修水利的出工人数达200万人左右（1957年末全省总人口为1896.78万人，其中男女劳动力总共约750万人）。原来没有积肥习惯的一些少数民族，也移风易俗，修厕所，盖猪厩，大搞积肥。1958年群众性的修筑公路也形成了高潮。当年全省兴建公路7000多公里，虽然等级很低，但也算改变了许多地方交通闭塞的情况。这些通过政治动员而发动的群众运动，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将农村劳动力的精锐部分调离农业生产第一线，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使农民处于劳动强度极大的苦役之中。

1957年，云南省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已经受到批判“马鞍形”的影响，在干部中存在急躁冒进的情绪。虽然当时云南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冷静，如粮食产量，原计划“二五”时期末要达到200亿斤，省委确定的原则是，算账可以算200亿斤，争取完成可能是190亿斤，按180亿斤往上报。实际上180亿斤也偏高（1956年粮食产量最高，为120.27亿斤）。接着是全国反右倾保守，使“大干快上”的温度急速上升。

1958年1月1日，云南日报发表题为《革命干劲大些，大些，再大些！》的元旦社论，提出“跃进，再跃进”。省报的社论是代表省委的声音，更是代表省委第一书记的声音。

1月13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向云南各地、市委传达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提出的农业大跃进指标：一，原来提的10年实现的水利化计划3年完成；二、这3年要为80亿到100亿方水奋斗；三、3年内基本消灭平坝区和半山区旱田、旱地、荒地；四、改山区坡地为梯地1000万亩。195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上半月各省农田水利及水土保持计划的实现情况，云南省仅实现计划数的217万亩的12%，在全国倒数第一。中共云南省委受到很大的震动，于1月17日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鼓起干劲，反对保守思想，提高水利计划指标。到1月下旬，各地报省的水利计划从原来的540万亩提高到1025万亩。全省投入水利的劳动力由每天的200万人提高到263万人，占全省劳动力的35%。在工地上的农民，每天都劳动10小时以上，通常都干14－15小时。省委还提出“春节不下工地”的口号，民工只好不回家过年，在工地上连续苦战。

1958年2月4日，《云南日》发表《在生产大跃进进中，要做彻底革命派》的社论，说：“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在新的革命浪潮里，是做彻底革命派呢、还是做改良派、妥协派、现状维持派呢？是做促进派呢，还是做促退派呢？这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这里把对“大跃进的态度提到政治高度。

2月15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坚决地干，大胆地干，彻底地干》的社论。社论说：“大跃进的形势，就像奔腾在铁轨上的火车一样，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农业、地方工业的高速度增产的可能性也像‘赤壁鏖兵’的前夜一样，万事俱备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敢不敢取得胜利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把彻底革命派、促进派与保守派、促退派的分野表现得最显然不过了……要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处在高潮当中，必须经常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这已经具有规律性了。”社论尖锐地批评了一些人对形势的观望、怀疑态度。这个社论，对当时本来已经过热的形势，起了推波澜的作用。

像全国各地一样，云南的大跃进不仅表现在水利建设中，也表现在其它方方面面。在6月的大春栽插期间，发动了以盲目追求过度密植为中心的“大面积高产运动”。不管各地区是否适宜，都要求达到每亩比往年多栽5000－10000丛秧。凡被认为保守的就“插白旗”，被认为是跃进的就“插红旗”。

1958年春，全省开展了积肥运动。在春耕积肥中，许多歙和社大量拆民房，用拆下来的老墙土做肥料。晋宁县拆除了农民住房的20%。每个合作社都取消了一两个小村，合并为大村。上蒜社就拆除了三个村子。不少社员住房拆除后没有地方住。

1958年6月18日至10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根据省委指示，先后四次向地、县两级发出创高产的通知，鼓励人们“敢想敢干，创造大面积的丰产记录和单产的最高记录。”（6月18日通知）“省委强调必须放出一些卫星来稻谷能否放出亩产2万斤的卫星”（7月22日通知）。“据了解，各地的卫星都是用移苗并栽的办法，如果时间来不及，你们搞几亩或十几亩3万斤以上的水稻卫星（8月16日通知）．．．．

省委有要求，下面就行动。1958年9、10月间，云南也掀起了“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的高潮。9月6日，《云南日报》报道亩产稻谷33492斤，此后，各地“卫星”频频“上天”。亩产6万斤水稻，3万斤包谷，30万斤薯类，1000斤棉花，5000斤烤烟等，相继在报纸上出现。这些“卫星”，大大超过了人们常识所能接受的程度，事后证明都是假话。

7月21日到8月4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谢富治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三年改变全省面貌；三年工业总产值要超过农业总产值，建成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农产品要大大有余，牲畜要大量出口。他提出1958年的任务：粮食产量翻一番，基本达到每人1000斤到1300斤；生产铁70万吨，钢10万吨。

在农业大跃进中，云南省的边远地区，和中原省份一样，也开展了以滚珠轴承为中心的农具改革的群众运动。丽江地委接到省委的指示以后，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首的技术革新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一名副县长专管，区乡也由第一书记挂帅。边看，边学，边做，边改进，工效由原来的4－5个工生产一套滚珠轴承，提高到一个工生产两套滚珠轴承。四华乡一个铁匠带10个徒弟，采用流水作业，平均每人每天生产三、四套滚珠轴承。以县农具厂为骨干建立了一个滚珠轴承厂，29个大乡中每乡都有分厂，遍地开花。大理地委在1958年10月3日的《关于当前工具改革的情况报告》中说，截至9月21日统计，全州已完成铁质、木质的各种滚珠轴承共计329825套，占计划的16.4%，各种秋收秋种农具480597件。占计划数的48%。其中收割机775件，脱粒机12000件……滚珠轴承竟有木质的，从来没有见过机器的大理这个边远地方，竟然制造出大批收割机、脱粒机。这显然是神话。这些滚珠轴承和农业机械是怎样造出来的呢？这个报告说：“反对单纯依靠铁匠、木匠来改革工具和制造滚珠轴承的作法，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形成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人人当木匠、铁匠，户户造滚珠轴承”。“白云乡原来只靠30多个铁匠、木匠，结果时间拖长，任务完不成，后来把工具改革变成群众运动，仅3天就造出各种畜力车1500多部，同时全乡都实现了转动工具轴承化和运

输车子化。""据大理、台庆、漾濞等县反映，制造滚珠轴承没有材料，群众就自动将自己的锄头、耙、钉耙把、赶面棒、拿出来做滚珠轴承。把棺材板、大门板、吃饭桌等都拿出来制造畜力车。床板、楼板都拿出来做打谷机。漾濞县麦地乡由于大部分利用竹、木制造滚珠轴承，仅3天时间就造出滚珠轴承11260套。"

工业大跃进也出现了奇迹。在省委的号召下，全省的工矿企业数由1957年的3866个猛增为1958年的23110个。半年就增长5倍。有的地区报称平均每1.05分钟就建成了一个厂矿；有一个县的钢厂报称"仅花两块钱就办起来了"；连刀耕火种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报称办起了3600多个厂矿。大办工业使全省约有100万个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仅全民所有制职工就由1957年的64.3万人增加到1958年的154.1万人。

和全国一样，云南大办工业也是以钢铁为中心的。由于云南出铜，所以云南的提法是"大战钢铁铜"。 7月底投入的人力有17.7万人，8月下旬增加到25.7万人，建成小土炉1万多座，小高炉2000多座；10月下旬，集中的人力已达370多万，全省一切工作都以钢铁铜为中心。全省中小学生全被动员起来回收废钢铁，房屋的铁门把和下水道铁盖也被拆下来化成了铁锭交任务。

在"人人炼钢铁，钢铁炼人人"的口号下，全省调动了370多万劳动力参加钢铁铜会战。晋宁县幸福公社动员了1万多人去炼铁，老太婆、娃娃，背着铺盖，像逃荒一样，走了两天才走到工地。工地什么也没有，只好临时砍树搭棚子住。离开钢铁铜工地的社员不给饭吃，对有不同看法的人就辩论、斗争。有5个小伙子和妇女唱山歌，这本是云南的风俗，工地上的干部却说他们调戏妇女把他们捆了起来。炼铁的土高炉需要用人力推拉的大风箱。做风箱需要大量的木板和鸡毛。为了得到鸡毛，干部们把农民的鸡杀了。为了得到木板，征来了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炉子建了很多，但有半数没有开起来。师宗县的火箭、富乐两个公社建炉512个，投产的只有234个，出铁的只有84个。据省委派往富源县核算成本的工作组反映，每吨生铁成本高达2700元到3300元，而每吨生铁才值160元。

工、农业"大跃进"造成了大损失、大跃退。云南省的粮产量从1958年到1960年连年减产，1960年的粮产量低于1957年，只比1953年多一些。1961年和1957年相比，大牲畜减少了14.3%，生猪减少了15.8%。城乡居民消费水平1958年后逐年下降，1958年人均为72元，比1957年下降了4元，1959年为71元，1960年为70元。由于大办钢铁铜和大办公共食堂，大量森林被砍伐，森林复盖率由五十年代初的30%以上，下降到60年代初期的22.6%。由于大面积开荒种粮，

放牧草场（山）遭到严重破坏。

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产6.7%，却不敢讲真话，虚报粮食产量，这一年粮食征购数却比1958年增加了8000多万斤。1959年粮食产量又比1958年减产6.8%，而征购数又比1958年多7.3亿斤。农民的口粮交了征购任务，造成了大规模的饥饿和死亡。表10-1中是1962年粮食部的数字，和《当代中国的云南》一书所载略有差别，但趋势是一样的。

表10 - 2　　1957 - 1961年云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21．60 110．80 102．40 97．23 100．33

贸易 105．74 96．34 89．04 84．55 87．24

征购 20．15 22．22 26．80 19．56 20．04

销售 17．85 24．82 24．20 19．79 16．22

净拥有 103．43 98．94 86．44 84．78 83．42

总人口（万人）1869．78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人均净拥有（斤）553.22 516．84 452．13 447．48 441.14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云南》。

表10-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58 - 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为516.84斤，其中口粮大约有361.79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35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四、陆良事件——“大跃进”中较早暴露的饿死人事件

陆良县属云南省曲靖地区，位于省会昆明市东，距昆明不足200公

里。著名的石林风景区当时就属陆良县（现划归昆明市）。“陆良事件”以后，接任县委书记的孔祥柱在1958年11月14日向省委作了一次汇报。孔祥柱汇报时说：

从1958年2月初就发生肿病，开始出现死亡。3月中旬蔓延到36个乡。小春后有了吃的，肿病开始下降。小春收获很快吃完，6月20日肿病大量发生。7月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病人达17000多人，死亡1700多人。从2月到9月，全县发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肿病死亡5203人，占发病人数的15.6%，占总人口的2.04%

肿病的症状是：发病前疲倦无力，头晕眼花，耳鸣夜盲，四肢发麻；继则精神萎糜，表情淡漠，有的性情反常，容易急躁；随后下肢浮肿，浮肿部分皮肤发亮，神经反射弱甚至消失，面色苍白；进而肚子发胀，并有腹水，肿胀及于手脸；多数病人开始腹泻。这时病人心跳减少，血压、基础代谢及体温都下降，身体消瘦，体重锐减，妇女月经停止，小孩哭不出声；此时如不及时抢救，数日即死亡。

肿病大量发生，明明是饥饿所致，但地委还是责成卫生部门去了解发病原因。4月上旬，地委卫生局派医生曹钟朴和专区医院院长到了肿病严重的西冲和独木水库工地，曹钟朴认定肿病是过度营养不良造成的，提出了改善民工生活的建议。由于曹钟朴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县委否定了他的结论，还批评了专区医院院长。他们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曹钟朴的结论。党政干部和医务人员的不同意见，在全省其它地方也有发生，因此对肿病原因长期得不出结论，延缓了救援。当然，即使县里听取了曹钟朴的意见，也没有能力改善农民的生活。因为粮食掌握在上级手里。直到7月份省里承认疾病和死亡是饥饿所致，才开始采取救援工作。

孔祥柱在汇报中说，距县城3公里的茶花乡最为严重，肿病死亡943人，其它病死亡371人，共死亡1314人占总人口的11.9%。距县城35公里的大挤乡共死亡759人，占总人口的8%，召跨乡死亡551人，占总人口的10%。马街乡死亡965人，占总人口的6.08%。省委检查组1958年11月20日的《检查陆良茶花乡情况报告》中说，陆良县茶花乡原有2513户，因病、饿、打而家破人亡和死绝的有63户，现有2437户。原有人口11204人，现有人口9724人。今年1－8月全乡死亡161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14.37%。其中被打死的47人，扣粮饿死的79人，无粮而饿死的43人，被迫自杀的4人，肿病死亡的639人，痢疾死亡的225人，因伤寒、流感、百日咳等疾病死亡的有267人。其它死亡306人。死人当中贫农占61.8%，中农占23.6%，地主占6.64%，其它成份占3.62%。余家村共有58户，死亡71人，其中当场打死或打而致死共10人。

1957年，陆良粮食不足，是农民闹粮最凶的一个县，县委被迫放了一些粮食。事后省委把这次闹粮当成“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的反扑”，认为县委放粮是严重右倾。在1957年的四级干部会上，省委严厉批评了陆良县委，并撤换了县委第一书记张志。1958年初肿病发生时，新任县委第一书记陈盛年接受前任教训，不敢说粮食不够，眼看着农民饿死也不敢要粮，更不敢放粮救人。他还在6月19日的电话会议上紧跟政治形势说，农村有一股叫喊粮食的妖风。

陆良县除去公粮以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粮、种子、饲料379斤，死人最多的几个乡每人只有200多斤。而劳动强度成倍增加。据医务人员分析，一个农民在正常劳动情况下，每天需要热量2500卡，劳动最紧张时需要3000卡到5000卡。过去农民每天劳动六七个小时，大跃进中，增加到12个小时，有时达16个小时。云南省大米每斤含热量只有1700卡。没有油，没有肉，菜也很少。每天不到半斤粮食几乎是全部热量的来源。也就是说，农民每天从食物中得到的热量不到1000卡，而热量支出达3000卡到5000卡。这是造成肿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

发病和死亡人数中，男多于女，老弱多于青壮。一般是男女死亡比例为三比一，老少衰弱者占三分之二。因为男人干重活劳动强度大，容易发病。而青壮年大多参加会战队，集体吃饭，优先得到粮食供应，抵抗力又强，所以发病较少，死亡较少。

省委农村工作部1958年8月22日给省委的《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中说，茶花乡现有2434户，9510人。从1958年1月到8月16日止，发病4081人，占全乡原有人口11104人的36.8%，其中肿病2946人。死亡1594人，占全乡原有人口的14.3%，占现有人口的16.7%。较严重的第四社，共有273户、1089人，死亡272人，死亡率为25%。有的人患肿病后一泻肚子就死了，有的消肿反复两三次死亡，有的肿后皮肤破裂而死亡，有的不肿却干瘦而死。社员史正富没有肿，十分瘦，在拣小白菜时倒地即死。30岁的社员王德民因肿病插秧时倒在田埂上就死了。社员史老秋肿病一夜小便多次，次日早晨死在床上。开始死人时还用棺材、木匣子装好埋葬，后来用席子卷了抬出去，再后来没有人抬，用牛车拉，一牛车拉三四具尸体，在村附近的泥塘、水沟、房前、屋后随便丢。县委书记孔祥柱还看到一个塘里有9个死人，一条沟里有几个。省委检查组11月20日的报告说，茶花乡共有土地18817.14亩，1957年产粮526.4796万斤，1958年产粮381.099万斤，比上年减少了145.3799万斤。减产27.61%。1957年人均口粮336斤，还要扣除吃掉的罗卜（10斤萝卜折1斤粮）和已超前吃掉的国家供应指标，到1958年春天，农民能吃的口粮已经很少了。

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卓甫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曲靖专区从2月到8月20日，累计发病人数为139451人，死亡18843人。究竟死了多少还弄不清。陆良原统计3067人，后改为5167人，加上其它病死亡的人，共死亡12912人。在病情严重时，个别母亲吃小孩，父亲卖儿女。由于大人死亡，留下大量孤儿，仅泸西五区就有孤儿150多人。为什么死人问题拖半年之久？刘卓甫认为，主要是干部不敢提粮食问题，怕右倾，怕当右派。陆良、泸西对反映粮食问题的干部进行过斗争和处理。

死亡人数仅次于陆良的是泸西县。当时泸西县也属曲靖地区（1985年划归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省监委泸西检查组向省监委报告：1957年，泸西县上报粮食产量10363万斤，以15万人口计算，每人应有粮食600斤以上。每人应分口粮400斤以上。这是一个浮夸的数字。实际上每人只分得口粮245－300斤。（可见浮夸风不是自1958年开始，这是在极权制度下，迎合上级、讨好上级的必然现象。－本书作者注）部分群众1958年2月间就没有粮食吃，3月份开始发生浮肿病，5月份出现肿病死人。6月死人增多，7月死人最多。8月死人数开始降。据各公社上报数字，到1958年12月底，共发生肿病33203人，肿病死人5123人，其它死亡3295人，无病饿死3336人，共计11775人。占全县人口的7.34%。全马公社共死亡4424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12%，中枢公社死亡2177人，占公社总人口的8%。最严重的脚册、山口管理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0%。有的饿得没办法上吊自杀，有的带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丢在山上，两天后，小孩在山上饿死，大人在家里饿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人把孩子杀死本人投案。

路南、罗平、富源、师宗等县也发生了严重的肿病和死人情况。省委检查组提供的报告说，罗平全县有22.8万人口，据县委统计，1月到8月27日共发生肿病884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8%，死亡934人。其中圭山乡1月到8月28日统计，肿病2267人，占总人口的22%，死亡443人，占总人口的4.2%。“地委书记会议资料之二”中记载，富源县3月到9月6日，发生肿病8371人，死亡867人。曲靖县1－9月共发病12032人，占总人口的3.36%，死亡1965人，其中劳动力800多人。马龙县3月到9月10日，共发病8608人，死亡1784人。

农民除了饥饿而死以外，还因一些干部违法乱纪而迫害致死。干部们怕说自己右倾，宁左勿右，在执行上级任务时强迫命令，打骂农民。陆良县茶花乡有129名干部打过人，占全乡干部总数的62.9%。全乡57个生产队长，只有6个队长没打过人。20个管理区的50名干部全都打过人。全乡挨过打的农民有726人，其中贫农313人，中农264人，

地主富农94人，打人时干部打人并不讲“阶级路线”。20管理区生产队长邵安柱所在的生产队，200多名社员中只有5个人没有挨过打。一些坏干部把农民打成残疾或活活打死。扣口粮把人饿死也是常用的手段。茶花乡打人最严重的19名干部（处理陆良事件时这19人被捕）共打过536人。被他们当场打死2人，打伤后致死45人，一二天后死亡的8人，15天后死亡的5人。打残16人，扣口粮而饿死的79人。打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捆绑、吊打、用木头塞咀，等。打人的工具有皮鞭、刺条、棍棒、扁担、锄头、钉耙等。打人事件多发生在五六月份紧张的抗旱插秧期间。

泸西县全马公社647个干部中，打过人的干部占40%以上。管理区干部胡某，指使民兵吊打农民，经他指使吊打而死的就有4人。治保主任朱某吊打49人，打死2人，打残6人，强奸妇女1人，逼奸2人。富源县在春耕生产中，很多干部任意吊打群众，还规定不参加劳动的老人和小孩不给饭吃。这个县的黄泥河乡4个乡干部都吊打过人，社队干部有20多人吊打过人，占社队干部总数的39%。被吊打的农民有98人，其中，致残6人，病中被吊打死亡10人，吊打后死亡11人，逼死2人，关死1人。贫农李小梅饿得偷吃了几个洋芋和红薯，被社主任李某等3人吊起来毒打4小时，成了残废不能劳动，将1岁小孩推入河中淹死。一个小女孩因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掉一个手指。乡党支部书记郭某每次开会都说“不打人的是右倾”。社员饿得不能出工，郭说：“没有吃的也要去做，死也要死在田里。中国有6亿人，死几个没关系。”社员悲哀地说：“人的性命不如一只小鸡。晚死不如早死，死晚了没有人抬了。”曲靖县除松韶、松林两个乡外，其它9个区都有乡干部吊打群众、造成死亡、残废的情况。麦地社党支部书记刘某亲自打过11人，打死3人。有一富农因病拉水走得慢了，刘用棍子毒打，当场打死在水车旁。一青年因到食堂吃饭去早了些，刘说：“你干活不行，吃饭倒很积极。”拉住就打，不久就死了。下坡社党总支委员张某亲自打了100多人，一个农民偷吃了几个洋芋，张用火油将这个农民的手指头烧掉了一个。联合社66个党员打过人的有52个，其余14个没打过人的有10个在水库工地上。社主任周某亲自打了31人，死亡2人。

云南省的问题如此严重，中共云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写报告。7月27日的报告中说：“据了解，现在8个专区（州）50多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11万多人，已死亡2万多人。而又集中在泸西、陆良、马龙、曲靖几个县，发病共8万多人，死亡1万多人。仅泸西就发病1万多人，死亡3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另外，丽江、大理还有痢疾发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数百人。”这个报告还不敢讲出死人的全部真相。

中共云南省委11月18日向中央的《关于肿病死人的检查报告》称，到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38000多人，死亡39712人。以曲靖为最严重，共死19072人。而曲靖地区最为严重的是陆良、沪西、曲靖等县。陆良共死亡12912人，占曲靖地区死亡总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

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是谢富治，他原来还兼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57年9月27日秦绩伟将军接替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谢富治专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对于各地大量发生肿病死人的情况，谢富治感到害怕。就在一年以前，邻省广西饿死的人数比云南这次饿死的人少得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被撤职。现在自己面临的情况很严峻，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主动承认错误，求得中央宽大。1958年11月18日，他以省委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了云南发生的情况并作了深刻的检查，并重点汇报了省委所做的善后工作及其效果。随同这个报告，谢富治还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份检讨：

主席并中央：云南省肿病死人问题，在省委常委会上，大家都开始作了一些沉痛的检讨，已另有报告送上。在这一事件中，省委的其他同志是做了工作的。由于我个人缺乏完整的群众观点，存在片面思想，把领导生产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把保护干部积极性与纠正错误倾向对立起来，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在肿病的发展过程中，我虽然听到一些零碎的情况，但长期未作认真的了解和研究，也未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以致措施无力，造成这一不可挽救的损失。因此，省委所负的责任，主要决定于我个人；应得处分，也应由我负责。

这封信中最后一句话，是谢富治专门写了一个条子让省委秘书长梁治加上去的。这个用红铅笔写的条子至今还保存在云南省档案馆里。也许是他这种敢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得到了毛泽东的宽恕。11月25日，毛泽东以《一个教训》为题，对云南省委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

这是一篇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

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谢富治不仅顺利过关，还官运亨通。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以后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谢富治走后，阎红彦接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喜欢重用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向他表示忠心的干部。这样的干部最听话，最好控制。

事实上，云南省委的检查还是避重就轻。在云南省所留的资料中，情况比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的要严重得多。在1958年11月的地委书记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可能更接近真实。17日的发言者说，大理发病22000多人，死亡3000多人。文山发病8700多人，死亡1675人。红河发病36700人，死亡2975人。弥勒发病25800人，死亡867人。新兴水库工地打死20多人，打残500多人，自杀7人。21日发言的马继孔说；“曲靖松林乡事件死了几万人，没有人敢反映，云南日报记者的报道中只说这里工效高，不说死人。”“松林乡事件还是铁道部队一个连队反映的，死了几万人。”欧根发言说：“肿病大理特重，其次是丽江、德宏。据11月上旬统计，大理发病23380人，死亡3000多人。现在还有1080人在集中治疗。丽江死亡948人，德宏1000多人。”发言中还谈到各地组织“学好队”（实际是劳改队），大量捕人。刘卓甫发言说：“今年已捕反革命分子53000多人，比历年都多。”从这些发言中可以看出，肿病死人不仅限于曲靖一个专区，其它地区也很严重。还有一个死了几万人的松林乡事件，没有向中央提及。松林乡事件只散见于档案的只言片语中，没有看到全面的记述。毛泽东可能不知道更严重的情况，也许知道而故意装糊涂。他手中有了这些更重要的情况而不拿出来，这对谢富治是更有威慑的王牌，可以更好的控制谢富治，使谢不得不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

五、“免疫力”难抗反右倾

毛泽东在《一个教训》中说：“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了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的确，在毛泽东这个批示以后，省委头脑开始有所冷静。毛泽东的批示下达以后，省

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进行了20多天的整风。经过讨论，省委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11月30日，发布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群众生活若干问题的决定（试行草案）》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保护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的通知》。在前一个文件中，提出了调整劳逸节奏，保证农民必要的休息；除了办好公共食堂以外，每个社员家庭要有一套小锅灶，以便社员热饭、炒菜、取暖等。后一个文件宣布：“永远保护社员个人原来的和分得的生活资料所有权。”私人存款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属于私人所有，别人不得提取；私人住房不得收归公有；允许私人培养猪和家禽；等。

1959年1月，又召开了省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对1958年的高指标进行了调整，降低了钢、铁、铜、粮、棉的指标。除了继续扩建昆明钢铁厂以外，各地兴建的小高炉陆续下马。“大战钢铁铜”时抽调的农村劳动力，陆续回到农村。与此同时，省委果断决定，边疆地区停办人民公社，一般不办公共食堂，已搭起公社架子的地方，仍办成初级社和高级社；有不愿入社的单干户，也应当允许；在一部分“直接过渡地区”，仍从互助组办起。但提出边疆在条件成熟后要向人民公社过渡。对内地的人民公社也进行了整顿，实行了三级所有、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了公社规模，将原来的800多个公社划为1281个。公社实行“三包”（包工，包产量，包成本），小组和个人实行“四定”（定工、定量、定时、定质），使得管理混乱局面略有好转。

所有这些调整，在指导思想上虽然没有根本扭转“一高二快”、“一大二公的”问题，部分调整后的指标仍然是难以实现的高指标，但是，这些调整措施还是起了一定的刹车作用，使共产风、浮夸风有所收敛。边疆外逃的老百姓开始大批回归。

但是，到了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在“免疫力”的作用下略有清醒的云南，也卷入了反右倾的激流中，“大跃进”的势头又陡然升起。

9月中旬，在省级机关中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从9月20日到10月28日，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982人，占机关参加运动总人数16304人的6%。有些运动进展较快、斗争更为深入的单位，列为重点批判或斗争对象的达到8%左右。在这些人当中，厅局长或相当于厅局级的干部有11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7%；17级以上的科处级干部有222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12.4%；一般干部749人，占这类干部总人数的5.2%。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医学院院长、长征干部颜义泉等名列其中。地县机关也开展了相应的运动，批判和斗争的对象比省级机关更多。

农村整风整社的风向也随之转变，由原来纠正“五风”变为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大批讲真话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受到批判斗争。一度暂时刹车的“五风”重新抬头。

在反右倾斗争的强大冲击下，1958年底和1959年上半年推行的一些旨在纠正错误的政策，有的停止执行，有的受到批判。省委提出1960年要完成粮食产量200亿斤（1957年为116亿斤，1958年为108亿斤，），钢25万吨（比1959年增长40%），铁45万吨（比1959年增长21%），铜1.64万吨（相当于1959年产量的3.4倍）。在高指标的压力下，“苦战”、“火烧中游”等口号又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出现。省委还组织“改造落后工作队”，到一些县进行检查督促。把办好公共食堂作为农村高举三面红旗、实施持续跃进的突出内容。边疆地区一度停办的公共食堂有的又恢复起来。这些使得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有所猖獗。

于是，饥饿、浮肿、死人的情况又继续出现。

7月底，省委办公厅综合报告：：“全省肿病继续有发展，6月底统计为18000人，7月底发展到28189人。玉溪、楚雄、昭通、7月份都有很大的发展……仅据玉溪、红河、丽江、临沧、昭通不完全统计，自今年1月份起到7月底止，死亡人数787人，其中文山专区390人，玉溪专区223人。”

1959年8月19日，玉溪地委报告说，今年春耕期间肿病1200人左右，6月份增加到3000人，7月份增加到5000人。从3月到现在，共发生肿病16208人，死亡532　人。

7月份以来，楚雄地区肿病、干病发展很快，据初步普查的结果，已上升到15000多人。其中，大姚县上升到7667人，楚雄上升到3073人。大姚县弥兴公社7月1日到25日就死亡313人。弥兴公社有些管理区食堂领不到粮食，一二百人的食堂一顿饭只给一二十斤粮食。这个公社大苴区小春以后，公粮和余粮没入库就吃掉了，上面还紧催公粮任务，管理区就把剩下的57000斤种子全部作为公粮入了库。从7月17日起，管理区就不能给食堂发粮了。小苴管理区是全地区的先进管理区，1955年以来公余粮从40多万斤增加到87万斤。公粮一交，就要吃供应粮。

思茅地委1960年9月3日报告说，从2月开始，就出现了零星死人。7月，病情和死亡急剧上升。据现在调查情况，病人已不下15000多人，死亡4541人，其中非正常3000多人。据省委指示，集中180多个点进治疗。到8月，全县还有病人13165人，8月就死亡1358人，平均

每天30多人。

据砚山县县委1960年统计，1959年秋收分配的结果，平均每人每天口粮3两以下的61个队、8127人；3－4两的有343个队、50092人；5－6两的有357个队、40890人。平均口粮4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35%，6两以下的占总人口的65%。这还不包括寅吃卯粮的数字在内。明德公社绿采大队去年分配每天口粮2.3两，今年5月缺粮。县委书记县长到那里搞安排生活的试点，反复搞了三次，时间持续三个月，都没有正式供应粮食。直到饿死9个人，才按5两口粮供应，继续死亡多人。生活困难的地区普遍出现卖衣服、家具、被子、手饰等物品换点巴蕉充饥。在这种情况下，社员出工不积极，也有人弃农经商。县委就通过开展一场群众性的对敌斗争来解决问题，在短时间内，斗争了500多人。对敌斗争更影响了生产，截至6月5日，砚山全县16万亩稻田只栽了6万亩。

由于“五风”重新抬头，品质差的干部为非作歹，农民继续遭受迫害。楚雄县苍岭公社党委副书记余某在春天插秧时公开在支部书记会上讲：“五十岁以上的社员干病、肿病不给治疗。凡是有病的人一律按半劳动力发口粮。”有些干瘦病、肿病人因此活活饿死。余亲自动手打了46人，其中打死4人，打残9人。朝阳寺生产队社员张发良，在大拐子犁田，牛吃了几口秧，余看到后用牛担击张胸部，张当场吐血。张受伤不能劳动，余又将张的粮食标准降低。张在大山咀犁田时，因饿得没有力气，抬不动犁，被余看见后又打了一次。5月16日，张在大沟边犁田，饿得不行就拿了一点喂牛的豆子吃，被余看见，就将牛解掉一条，让张代替牛拉犁。张拉不动，余就用牛棍乱打，用脚乱踢。张被打得皮破血流，跪在地上求饶，余继续毒打，直把张被活活打死。余经常用扣口粮的办法来惩罚社员，致使六七十人生病和饿死。桃园生产队社员汪兆富兄弟二人，由于六天没给口粮，到山上找野菜，饿死在山上。汪兆富的妻子也饿死在家里。陈家坝生产队12天没有口粮，全队76人只好吃菜根。86岁的社员程树生咬不动菜根活活饿死。他家还有4个月的小孩子没有奶，求余批点米给小孩度命。余把申请米的条子撕掉，还骂了一吨。过几天小孩也饿死了。桃园管理区共有1692人，干瘦病、肿病205人，死98人。71岁的社员郑关氏饿得上吊自杀，她儿子从田里回来料理丧事，余对郑明理拳打脚踢，不准往外抬，直到尸体腐烂才让抬出去。余某对社员如此残忍，自己却大搞特殊化。他家1960年吃了猪肉162斤，牛肉260斤，鸡46只、鱼173斤。他家养三条狗，每月供应口粮90斤。一母狗下了6只小狗，还供应了大米62斤。群众说：“余文明对社员不如狗。”余文明在1958年就打社员，1959年春天有所收敛。1959年秋天反右倾后更加嚣张。这样一个坏干部，在1960年的群英会上却获得了铜质奖章，又评

上了“四好干部”，并由桃园管理区支部书记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在权力没有制衡的制度下，出现余文明这样的干部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余文明的问题暴露后，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却认为余解放前当过兵，是漏划地主，是封建势力复辟。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解决问题。

饥饿一直持续到1961年。1961年6月26日，《文山地区马关、西畴闹粮问题的两个汇报》中说，马关县城关公社第三大队有6个小队，23日晚饭后，来自几个小队的70－80名农民到县委会去请求解决粮食问题。粮食由公社掌握，前几天是六七天领一次粮，现在是吃一顿，领一顿，而且要写报告。23日没有领到粮食，没有饭吃。农民找队长，队长让找大队，大队说找公社，最后一直找到县委。西畴、王栗坡每天只供应3两粮食。

六、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农民大量外逃。

1954年4月14日《思茅地委、思茅军分区对今春以来外逃外迁问题的指示》中说，“自年初以来，边疆外逃外迁事件不断继续发生。与往年比，其主要特点是，面更广，规模更大。截至3月底，共外逃644户，2433人。4月以来，不但没有停止，并有新的发展。”

1958年4月16日，思茅边防司令部给军区的电报有如下叙述：

1958年以来，我区外逃严重，已达3000多人。其中澜沧1600人，孟连998人，猛混70人，猛腊166人，江城10人。形势仍在发展。外逃的特点是：1，普遍性。但澜沧、孟连两区最为严重；2，由二线以内继续向纵深发展。开始是孟连、糯福区，现在深入到澜沧、孟连内地；3，外逃人员65%是我基本群众，并有骨干积极分子、党团员和政府干部带领，逃跑的地主富农只占少数；4，整户、整寨携枪结队，公开对抗，不听劝阻。

思茅边防司令部提供的外逃数字并不多，另一资料所批露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大跃进开始以后，外逃人员大量增加。仅西双版纳自自州所属景洪县，1958年9月到1959年初，全县山坝区外流外迁就有7000多人，其中，勐龙区就有6900多人。1959年春，贯彻中央的一些松动政策以后，外逃人员大部分回来了。1959年秋天反右倾，重新实行左的政策以后，边民又大量外逃。扣除回流人员不计，从1958年9月到

1960年11月，全县8个坝区总计外逃人员3411人。

劝阻边民外逃有时还会发生武装冲突。丽江地委和军分区1958年4月16日22时《对碧江武装部电话请示要派部队帮助劝阻边民外逃的批示》中透露了以下情况：

1958年4月15日晚，碧江县一区联合乡发现外逃35人。该县得悉后，于16日晨组织工作队前往该村劝阻，但因路途太远没有追上。在返回中，又遇外逃者18人。工作组当即喊话劝阻。对方不听，一直朝工作队方向走来。民兵当即朝天打了两枪。外逃者向民兵射毒箭，伤民兵1人。上午9时发生冲突，至下午4时冲突结束。我消耗子弹200多发，打伤对方7人，我牺牲1人，伤1人。

1958年12月6日，中共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

从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14%。其中傣族和平土改区27626人，景颇族直接过渡区24886人。外逃者中，有国家供给干部189人，工作干部62人，小学教员46人，乡干部75人，州直机干部3人，中央民族语言调查组3人。农村党员外逃181人，占党员总数的16.1%。

据瑞丽县材料看，今年外逃有两个高峰，一是4月，共外逃6529人，占外逃总人数21765人的30%；二是9月末到10月初，外逃3065人，占外逃总人数的14.08%。第一个高峰是大办水利的时候；第二个高峰是大办钢铁的时候。

1960年4月26日，《史怀壁同志电话汇报澜沧等地粮食和人员外逃情况记录》中说："今年以来，澜沧共外逃1886人，主要是糯福、酒井、东回三个区。"他将外逃原因归结为缺粮、大办食堂和干部作风。

七、骚乱和暴动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中记载："1957年6月5日，中共迪庆工委就平息叛乱、准备改革问题向省委汇报。藏族聚居的三个县自去年以来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叛乱。德钦1956年6月叛乱，经过一年来的打击，现只剩下少数残余。中甸今年3月叛乱，现尚有部分继续顽抗。维西六区也发生过局部小暴乱。"

云南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都有枪支武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

现将有记录的骚乱和暴动的历史资料抄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丽江小凉山暴乱

昆明军区1956年4月12日报告：

丽江地区叛乱情况：永胜、宁蒗、华坪共有叛叛乱武装3500多人，主要几股如下：棉花地（华坪东北）400多人；毛牛坪300多人；华荣庄300多人；跑马坪地区（宁蒗东南）1000多人；辣子沟（跑马坪北）700多人。

叛匪活动情况：一，羊坪、哨坪等地叛匪200多人，4月6日开始暴乱，抢去大米3000斤，豆子200余斤，菜900斤。我方护送武装（民警7人，公安4人）及马帮20多、马50多匹，除逃出4个马帮外，其余无下落。同时，哨坪、莫尔坪地区将我工作队包围，打死打伤我10人，抢走长短枪4支、物资全部。当晚200多人又包围了我羊场办事处，杀死我送信干部2人。二，华坪以西的水坪、毛牛坪地区有匪300多人、枪200多支。于4月8日时，包围我通达地区政府，9日拂晓，我华坪民警及民兵两个战斗队向该敌进攻，毙、伤其50余人。三，新营村（宁蒗南）有匪600多人，于4月8日开始暴乱，抢走粮食3000斤和贸易组的全部物资。4月7日敌1000多人，将我跑马坪的一个连包围，我当即向宁蒗出动四个排进击，至4月8日增援部队到达解围。

昆明军区4月28日报告：

1956年4月6日以来，小凉山的永胜、宁蒗、华坪地区举行叛乱的武装曾陆续达到4000多人，为平息这次叛乱，我们先后动用了13个连的兵力及民警、民兵2000多人。从4月6日到4月27日，大小战斗36次，歼灭敌人1230余人（敌亡363人，伤397人，俘470人）。

云南省公安厅4月28日报告：

自4月6日起，发生暴乱的小凉山羊坪关、跑马坪地区及华坪县四五两区共参加暴乱的人数约2500人。在宁蒗县境，部分上层集中3000多人，除围攻金棉、西营两地区外，并准备全面围攻我县区政府。

富宁县瑶族骚乱。

中共云南省委1956年9月25日《关于富宁县瑶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几年来，我省苗、瑶民族不断地发生搬家骚乱事件，肯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挑起和操纵的。但问题是，为什么经过我们多年工作，反革命分子仍能进行这样大的破坏活动、群众仍听信反革命的煽动……这就不能不从我们主观工作中检查。

文山地委1956年10月7日的《关于富宁县民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富宁县兰靛瑶族闹退社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开始缓和下来。但是，山瑶和黑瑶闹事又有新的发展。由闹退社到斗争村干部、到抢夺枪支、组织武装骚乱。地主张尚杰（黑瑶，已批捕外逃）持枪率领地富惯匪、以及社员群众40多人，攻打我敬龙乡政府，抢走铜炮枪五支、党支部公章一枚、文件一捆、人民币40元以及衣物，并追杀我乡文书。被乡文书开枪打伤1人后退去。事后敬龙乡弄登社8个寨子86的男子全部跑光。另外，龙绍、龙万两个乡的山瑶族也闹退社并斗争土族社长，抢走土族民兵铜炮枪5支。山瑶族男子大部分日夜上山开会并积极修理枪支、倒砂子、冲火药。民族闹退社骚乱事件与土匪武装暴动有所不同。尽管有敌人策划煽动，但它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的，参加骚乱的大多是被骗的基本群众。事件发生后，我们加派了干部力量，部队也进驻控制，坚持以民族形式和平解决的方针，使多数群众平息。但是，敬龙乡还有10多名外逃分子没回来。楷绍乡还持枪拒绝我干部进去工作。群众怕捕、怕关，不敢下山，食盐断绝，地里的谷子成熟了没有人收。

维西县伏击事件

1956年12月13日丽江公安处电话报告：

12月8日，维西县民警11人护送粮食6驮及慰问品支援凉山前线，中途遭80人伏击，民警牺牲5人，重伤2人，物资全被抢走。

归化寺问题

1956年12月在四村若依母战斗中，我方击毙叛匪7人，将尸体陈列在小街子（喇嘛寺附近），动员叛属认领。到场叛属200多人，发生武装冲突。当场牺牲工作人员1名。我亦击毙喇嘛1人。部队闻枪声立即

赶到，他们也向部队射击。归化寺是迪庆自治州最大的一个寺院。

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昭通地委关于昭鲁二县结合部暴乱事件的情况报告》说：

昭鲁结合部4个区、20个乡，46名土匪暴乱。1958年11月25日晚，46名土匪杀害乡营业所干部1人、服务员2人。26日凌晨，先后杀害干部10人，打伤7人。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我方组织力量即时围歼，历时5天，共捕获匪180多人，其中公开出面暴乱的50多名。打死12人。此外，大理与永胜交界处，在国庆节前发生暴乱，口号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苦战"。打死叛匪几人，还有7人外逃，大部分被争取过来。

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暴乱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

1958年12月27日晚8点30分，元阳县毛草坡、金平县崇岗公社铁匠寨、芭蕉河、铁良寨、河头寨等四个村子43个人为骨干及部分群众共70多人，持火枪15支暴乱。他们攻打老街乡人民委员会，抢走布匹、衣服、胶鞋及零星百货，还抢走现款1300多元。打死粮食局干部1人、售货员1人。攻下老街后就煮饭吃。闹了五六个小时，43个人上了山。

宣威事件

1960年11月30日《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1960年12月24日晚，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这一带是云贵两省结合部，周围驻有铁道兵两个团和3万民工。有的叛匪就在军队驻扎的村里活动。暴乱涉及13个管理区的37个生产队，共417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及财贸人员、小学教员138人，占暴乱地区干部总数的9%。其中有公社党委委员2人、支部书记7人，党员47人，团员45人。在暴乱中，被杀

干部13人、群众1人，抢走短枪11支。25日我部队到达后匪众即鸟兽散。26口叛乱基本平息。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今年7月28日开始酝酿的。叛匪番号叫作‘中建中央司令部云南分部’，号称4个团。暴乱起来的是一个‘团’。其余在宣威的宝山、双河等6个公社，及铁道兵五师24团所属的民工中建立的三个‘团’，共2000多名匪徒。在暴乱前夕被我一网打尽。到11月25日止，主要匪首除徐汝俊1人被毙以外，全部捕获。经过审查，在39名‘营职’以上的叛匪骨干中，地富反坏占54%。

在这次暴乱中，反革命分子针对三面红旗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一些政治口号欺骗群众。如，‘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暴乱来以后，又提出‘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口号。

根据我们的调查，暴乱地区的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有意见的，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1，粮食统管。群众说：“口粮三百二，墙上一行字。”群众的口粮自己看不到，摸不着，只是挂在墙上的一行字。2，食堂办得不好。管理不民主，不公布账目，吃饭不公平。山区居住极分散，有的住家离食堂二三里，最远的二十里，还不准代老人打饭回家去吃。3，共产风，搞“万头养猪场”平调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猪，收回了社员开的小片荒地。4，生产指挥上要求“规格化”、“一字平”，该锄草时公社让搞积肥突击运动；该收庄稼时公社让割茅草。5，干部作风不好，脱离群众。

1960年12月2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说：“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经过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和公安部队工作组协同地、县委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工作，案情已基本查清。今年以来，西南三省发生大小暴乱12起，其中四川5起，贵州5起，云南2起。”

八、退回去就有生路

1958年以来的过激的政策把农民推向了死亡之路。如何重新寻找生存之路？退回去。

1960年11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这实际是从激进政策中大步倒退的政策。中共云南省委于1960年11月中旬召开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三级

干部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的“十二条”。在这次会上，中共云南省会对1958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承担了责任：“在云南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都很复杂的情况下，对于如何结合实际执行党的政策，是比较忽略的。因而对山区、坝区以及不同民族的特点、差别注意不够，特别是内地高山分散地区更为忽视。在处理生产关系、组织生产、生活等方面都抹杀了这些差别，成为助长’五风’的一个根源。”明眼人一看便知，云南省委这认识并没有说出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把全局问题当作局部问题加以分析。这是为中央领导人开脱。在出现全局错误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中央承担责任，这是拍马屁的最好机会和方式。这时你帮助中央领导人下了台阶，中央领导人就会让你的职务上一个台阶。

为了使倒退政策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61年初，新任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到普洱、景谷、漾濞、弥渡等县进行调查以后，在5月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生产队规模、公共食堂、社员分配、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等五个问题提出了退回去的看法。毛泽东于5月16日作了批示：“阎红彦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云南省的倒退的政策是全面的：1，退赔共产风刮走的财产，对1958年以来的错批错斗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2，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规模和农村经济政策；3，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4，调整商业政策，边疆地区不实行统购统销；5，恢复手工业；6，继续对边疆少数民采取特殊政策。

以上政策起到了休养生息的作用，1961年基本没有因饥饿而死亡，1962年浮肿病基本消除。1964年云南省粮食总产量达121.34亿斤，超过历史最高年1956年的120.27亿斤。猪肉从1964年9月起就可以平价敞开供应。除粮食、棉布外，其余数十种凭票商品完全敞开。1965年春节，昆明市场上的日用工业品比1964年增加了1800多个品种。

第十一章　燕赵悲歌

河北省在北京的周围，离皇城最近，能够最快地接受皇家的“恩泽”。这个省位于华北大平原北部，跨内蒙古高原东南部，东临渤海，西枕太行。河北省农业发展历史悠久，土地开垦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耕地1亿亩以上。但由于城市多，还是一个粮食调入省，直到1969年才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这不仅是粮食增产，而是因为天津市1966年成为中央直辖市，不属河北管辖。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及以后的三

年，河北省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一、徐水闹剧

徐水县距北京只有100多公里，属保定地区。1958年，这个本来默默无闻的县份，成为震惊世界的“共产主义试点”，由此导演出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1、闹剧从农田水利开始

1958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冒着严寒来到徐水，听取河北省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汇报。当他听到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后，立即给以肯定和赞扬。

反右斗争胜利以后的1957年12月，谭震林参加了水利部的一个会议，在会上他否定了水利部过去的以大型为主、排泄为主、国家兴办为主的治水方针，提出了“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新方针，马上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并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向全国宣传。各地农村积极响应，利用冬春农闲期间，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水利建设的高潮。水利部根据这个新方针，于1958年1月赶编出《水利是农业的生命线》一书。但是，在这本书中介绍了河北省几十个典型，却没有谭震林新发现的徐水。

几天以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的陈正人奉命赶到徐水，帮助徐水总结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3月14日，徐水经验不失时机地送到了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题目为《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的情况报告》。

这个报告说，徐水从1957年11月起，苦战三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三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86万亩耕地都配备了一套到三套灌溉设施。报告中还介绍了中共徐水县委在领导兴修水利高潮中的一些经验：1，在群众高潮面前，首先强调思想大解放；2，作风战斗化，说做就做，坚持到底；3，找先进，学先进，赶先进；4，强调加强第一线，强调一切工作深入现场；5，坚持个人负责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6，努力使中心工作和各部门工作相结合。

恰巧就在3月13日，即陈正人报告送上去的前一天，谭震林也上交了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毛泽东看到他井冈山时期的两位老战友的报告十分兴奋。3月21日，他作了

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人民日报》在4月17日隆重推出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徐水县就这样被推上了大跃进的风口浪尖。

读者在《人民日报》这篇介绍徐水经验的文章中可以读出以下内容：1，敢说大话。如"以前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软，心软地就硬"，等。2，大兵团作战。徐水县是一个仅有31万人口的小县，实际能投入的劳动力不足10万人。但在兴修水利中却组成了一支"平时10万人，多时13万人的劳动大军"，他们"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成为一支"扭转乾坤的决定力量"。这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很快转化为"军事化"。3，强迫命令之风。用"大辩论"推动建设，"辩论以前，1400名民工14天开渠300公尺，辩论后，1000名民工3天就开500公尺。"4，共产风。"南隆重善乡打井无麻，有钱买不到，发动社员讨论，各户共拿出好麻1250斤，麻绳650条。为了解决水利物资，经过发动群众，在很短时间内，总计干部、群众自愿投资665万元。"中国读者都知道"自愿"是怎么回事。

2、"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大革命

1958年7月1日，县委书记张国忠召开了全县紧急电话会议，他向各级干部发出了号召：开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革命。其内容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协作，具体要求是：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这"四化"的核心是行动军事化。张国忠指出，要做到全民皆兵，思想行动一致；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全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党员、团员和民兵的作用，乡、社、队都要建立军事化的编制。乡要建立"社会主义跃进兵团"，设总指挥（即司令）、政委、后勤部主任等职，由书记、乡长出任；社要建立营、连、排的组织，每个排要有政治干事，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和组织辩论；每个村为一个营或一个连，支部书记、队长分别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营长、连长和后勤部主任。后勤部负责食堂、幼儿园、托儿所、被服厂、洗衣局、粮食加工厂等工作。乡要划分若干战区，由乡党委分片包干。

张国忠一声令下，各级干部闻风而动。几天之内，全县就建立了93个团、29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强弱和年龄大小，组成了"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等名目繁多的组织。上下工要列队并喊口号行进，开工有战地动员，收工有评比总结。食堂也由原来的300个猛增到1693个，全县

在食堂吃饭的社员达225693人，占全县人口的72.9%。一时间，徐水全县变成了一个大兵营。

3、毛主席到了徐水

徐水的创造吸引了毛泽东。1958年8月4日，他亲自到徐水视察。人民日报记者康濯是这样描述的："人们兴奋得跳起来，兴奋得心神无主地南北跑动，人们欢呼领袖，向领袖伸过手来"。毛主席"不时地站住，不停地呵呵笑着，他那集中了上下古今的劳动人民智慧的眼睛看着大家，他那大山般魁伟的身躯和海洋般宽阔的额头，发出万道光彩，照射到每一个徐水人的火焰熊熊的心上。"康濯写的报道至8月11日才发出，其所以晚发一个星期，是因为送中央审定耽误了时间。报道还说：

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下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主席听了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收十一亿斤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都想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

"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

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

……

主席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二十五万斤，有的计划为亩产一百万斤，不禁又笑问道：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又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闹文化娱乐，办大中小学，你们看好么？”

大家都说好，都听得高兴。有人告诉主席，说这个社已经办起了共产主义红专大学；主席惊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

……

毛主席到了县委会，头一句话就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省长说：

“这里的干劲不小哩！”又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毛主席又问了问河北省其它地区庄稼情况，又了解了一下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今年抗旱的情况。最后，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徐水的粮食真的吃不完吗？实际上，徐水当年粮食亩产最低为200斤，最高为350斤，当时有耕地86万亩，按350斤算，总共可收3亿斤，只有张国忠说的12亿斤的四分之一。

毛泽东称赞这里的食堂，称赞这里的军事化组织，称赞这里的水利建设，称赞这里的幼儿园。这一切使他十分兴奋。他情不自禁地说：

“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对大家说：“北京就出不了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

“北京出政治领导，”张国忠说，“出党的总路线！”

毛主席又嘻嘻笑着，不断点头。

最后，毛泽东向张国忠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建议。据辛平考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一般领导干部提出人民公社。但是，毛泽东向高级干部讲人民公社就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

晚上7点半，毛泽东的车队刚离开徐水，县委马上召开了全县电话会议。“乡乡都在电话会议上向毛主席宣誓，保证今年粮食亩产平均超过两千斤，保证工业的百花也要在全县处处争奇斗艳，保证整风和思想也一定要丰收，保证各个战线上都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要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

8月5日，召开了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会后立即把全县248个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几天以后，又将20个乡镇合并为7个乡，实行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

4、共产主义试点

8月6日，陈正人给徐水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央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他对河北省委的领导人说“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差不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在农村、学校、机关都要搞。”陈正人在县委会上号召大家，要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著作，深刻领会共产主义的意义。同时，他还带来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并将它分送给县委领导。

8月22日，徐水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帮助下，提出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草案”提出：“奋斗的目标是：1960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实现：

今冬实现灌溉机械化和加工机械化，明年实现耕作机械化，农村初步电气化。一切主要的体力劳动都为机器所代替。那时，人们的劳动已再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了。

1959年平均每人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20斤，肉类50斤。1963年平均每人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50斤，肉类300斤，棉布100尺，奶品

150镑，蛋品800个，糖240斤，水果147斤。主要生活资料基本实现各取所需。

1959年消灭30岁以下的文盲，1963年达到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再过5年或更短一点时间，即从明年算起7年至10年内，30岁以下的人都达到高等专科以上程度，成为专家。那时，旧的劳动分工形式要改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

为此，徐水县还召开了动员大会，张国忠在会上说："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有的干部还宣传："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最高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8月17日到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到徐水。他在8月21日下午的讲话说："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8月30日上午又说："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据毛的秘书李锐说，毛实际是很赞成军事化的。

由于毛泽东鼓励了徐水"全民皆兵"的作法，国家决定给徐水的社员发枪。8月13日，首先在毛泽东到过的南梨园举行了发枪典礼，1100名民兵战士根据命令，肩扛锄头手持枪，跑步奔向生产战场。报道说，这些民兵两个半钟头就锄地410亩，拔草340亩，追肥95亩，生产效率比发枪前高了很多。

在北戴河会议的鼓励下，9月15日，徐水县成立了徐水县人民公社总社（后改为徐水人民公社），将分配权控制在总社。9月20日，向全县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规定，从9月份起，脱产干部、工人取消工资，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对全县人民实行"十五包"：即吃饭、穿衣、住房、医疗、丧葬等十五项开支全由县人民公社统一包下。干部另发津贴：县级每月8元，科局级5元，一般干部3元，勤杂人员2元。与供给制相适应的是实行公社

一级核算，分配权全掌握在公社手里，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不仅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把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全部改为全民所有制。

徐水的共产主义吸引了很多参观的人。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康濯的长篇通讯《刘少奇同志在徐水》。刘少奇高度赞扬了这里发生的事情。看到这里的密植作物，刘少奇说："你们这种大畦子的办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刘少奇视察丰产卫星田和试验田时，鼓励他们："要大胆试验。试验的东西不要怕失败。"除毛泽东、刘少奇以外，邓小平、谭震林、谭政、刘澜涛、胡乔木、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粟裕、杨成武、安子文、程子华、钱俊瑞、张鼎臣、胡耀邦、杨献珍等中央领导都到徐水视察过。此外，还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也参观了徐水。国内有3000多个单位派人到徐水"取经"，从3月到10月，全国有32万人到徐水参观。当然，这些人到徐水后看法是不一致的，邓子恢回到北京后说；"徐水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5、幻梦的破灭

共产主义试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席卷徐水。

供给制的平均主义分配，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社员们认为"干活吃饭，不干活也吃饭，干不干都吃饭。"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全县财政收入只有2000万元，根本没有能力搞"十五包"。原来说每人每年发的两条毛巾，也只发一条。当年11月间，徐水县曾筹款550万元，给全县公社社员支付过一次"十五包"的费用和津贴。12月，又筹款90万元、挪用商业流动资金700万元，致使商业资金无法周转。以后，由于财力枯竭，供给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全民所有制带来的问题更多。全县统一核算，统收统支。劳动力和物资全县统一调配，造成了全县的"一平二调"。开始，县里不考虑资金能力，办起了30家工厂、1348个小型企业、11所大学，文工团、剧团、医院也一哄而上。后来由于资金跟不上纷纷垮台。

在"扫除私有观念"的口号下，有些村庄将鸡、猪、树木全部归公，把社员家里的锅砸了炼铁，户户不冒烟，全去吃食堂。为了加快消灭私有制的步伐，连箱箱柜柜都归了公，社员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它都归公了。"农民修建的房屋准备随时拆除，公社

将修建若干个居民点。在很短时间内，全县就有32000多所房子被拆除。除了大寺各庄盖起了39栋300个居室外观美丽、质量很差的楼房以外，其它地方基本无力建房。有的社员连过冬的房子也没有。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劳动纪律化”造成了瞎指和强迫命令。县委书记张国忠要求每亩山药必须达到5万棵以上，达不到者受惩罚。有的社员觉得这样太密，又不敢抵制，只好在地头密植，在地中间按正常密度种植。被张国忠发现后，五个小队长被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送到监狱劳动改造。一个叫高老先的小队长，劳改3个月就死了。1958年8月和10月，张国忠搞了两次捕人高潮，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期完成。1958年，全县共捕4643人，其中，一些人死在劳改队里。

到徐水来参观的人多，中央机关到这里来参加劳动的人也多。到这里来参加劳动的干部发现了这些问题。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到里来劳动的干部将所见所闻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

1958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纠正大跃进的偏差的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前，毛泽东就看到了徐水问题的报告。在郑州会议上，毛多次批评徐水。11月10日，郑州会议结束，毛泽东拿起《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看了又看，最后批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批完后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从此，徐水的报道很快在报刊上销声匿迹。

6、目光转向安国县

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徐水转向了安国。8月间，毛泽东到河北视察时，曾听取过安国的汇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国县1956年就建立了“集体农庄”，并且提出了“一年建成千斤县”的口号，制定了一系列高指标。后来在“反冒进”中有所收敛。1958年听了南宁会议传达之后，又提出了更高的指标。在传达贯彻中央八大二次会议的传达以后，6月30日，召开了5万人参加的“保旗夺旗”大会，强调“有了跃进的思想，才有跃进的奇迹”，把农业生产指标再次提高。“粮食亩产1500斤，争取2000斤，皮棉200斤”。7月，河北省委、地委先后制定了工农业“元帅”、“卫星”标准，安国县为争夺“元帅县”，将指标第四次提高到平均亩产3000斤，高出省定的“元帅县”指标1000斤。8月5日，毛泽东视察了安国县，涞水县不服气，送来了竞赛协议书。于是，安国县又第五次提高指标，将粮食平均亩产定为

4500斤，棉花亩产定为400斤，争取450斤。6月30日，安国县宣布：首创小麦亩产突破5000斤。各地慕名而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11月，安国县上报了亩产3361斤的特大喜讯，比实际亩产330斤高出10倍以上。为了强迫社员和某些不同意见的基层干部顺从，对一些社员和干部进行体罚和人格侮辱。有29%的公社脱产干部有过体罚的行为。安国县还总结出一套“先务虚，后务实”的经验，用狠抓阶级斗争的办法，对不同意见的社员和干部，轻则辩论（即批判），重则体罚。

对这样一个比徐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县，毛泽东只知其表面，不知其底细。他轻听了某些汇报，就下结论说：“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

二、闹剧不只发生在徐水

有了徐水这面旗帜，有了毛泽东的亲自鼓动，河北省其它地方也像徐水一样，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肆虐一时，农民深受其害。

三、大跃进　大跃退　大破坏

衡水县大搞“红旗粮海”、“红旗棉海”，“红旗公路”等样子工程，劳民伤财，破坏了生产。仅“红旗棉海”就有42万亩，涉及到8个公社404个生产队。大营公社划入“棉海”的旱地也要作畦，修垅沟就浪费了800亩地、8400多个工。这个公社的10800亩不宜种棉的地也划在“棉海”内，结果每亩只收30斤籽棉。“红旗粮海”总面积40万亩，在公路两倒，供人参观。修红旗大街、新农村，共拆民房111户、603间，用工6万多。为了迎接参观团，调集猪羊1200多只，结果死亡95%。修衡南灌渠造成213名民工死亡。

地处内蒙高原南端的张北县，平均海拔1500多米，是高寒地带，土壤贫瘠，气候干燥。在大跃进以前，平均亩产粮食100斤左右。在全国“放卫星”高潮的鼓动下，这个县提出了“实现亩产400斤，争当粮食元帅县”的口号。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县委就组织“大辩论”，“插红旗，拔白旗”，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张文光等三位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有不同看法，在一起议论过，就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新来的县委书记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海流图

公社副书记因为胆小不敢放“卫星”，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时到处贴满了这样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天冷冷不住决心，地冻冻不住恒心”、“苦干硬干拼命干，严冬寒春变夏天”。为了提高土地肥力，以实现“元帅县”的目标，狗打死了，猫杀掉了，抓蛤蟆、捞蝌蚪、逮草鱼，把这些煮成汤倒到地里。还将44000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试验田里。农民的菜缸、水缸都被收去当尿缸，衣柜衣箱则成为运送肥料的工具。但是，这些努力也没能实现亩产400斤的目标。然而，全县还是放出了亩产莜麦3012斤，亩产马铃薯24000斤、亩产小麦1176斤的“卫星”。还上报粮食总产量达4亿零735斤，人均占有粮食1770斤。

河北省各地的瞎指挥比徐水持续时间长，不仅在1958年搞瞎指挥，1959年和1960年还继续搞瞎指挥。省里不顾河北不少地方缺水的现实，强行扩大水稻种植面积。1958年完成水稻插秧面积586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313万亩，废弃面积占46.6%。1959年计划插秧450万亩，完成290万亩，实际收获面积只有257万亩，废弃面积占11%。1960年计划插秧500万亩，完成290万亩，收获不到200万亩。1960年，沧县按上级分配的计划在运河东种了60万亩水稻，用了760万斤稻种。由于水源不足，收获面积只有12万亩，收获稻谷120万斤，不到稻种的六分之一。大搞“丰产方”运动是河北省的创造。所谓“丰产方”就是把一块地四周挖深沟，把土铲上去，形成一个一个的平顶金字塔。在平顶金字塔顶和塔坡上种粮食。据说这样做可以实现毛泽东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1958年搞了大面积的“丰产方”，1959年冬和1960年春省里提出“无地不成方”的口号，省农业厅在唐县召开了现场会，组织各地干部参观30万亩小麦丰产方和8万亩甘薯丰产方。1960年，省里提出种甘薯计划1500万亩，后又增加了1700万亩、2200万亩，最后定为2000万亩。可是下面都是按1959年栽薯面积留的种、准备的地（1959年种1800万亩），劳动力又不足，难以落实省里的计划。有的地方就用“听不听党的话”、“对党是否忠诚”的政治压力来推动种薯。造成了春薯夏种、洼地栽薯、拔了玉米、豆类栽薯的现象。有的地方到7月底、8月初还在栽薯。玉田县城关公社马头山大队只有350亩的薯种，而上级下达了1500亩的任务，结果荒地1200亩。1958年，上级分配沧县张辛庄种水稻2000亩，由于没有水，只种了130亩，社员背着上级把剩下的地种了玉米、高粱。公社管理区书记得知后，让社员把种好的苗儿拔出来，社员没全听他的话，秋后玉米丰收了，这位书记说：“不听上级的话，多打粮食也不光彩。”还从这个村无偿调走粮食10多万斤。队里交粮不痛快，公社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来了个大清剿，翻走粮食4000多斤，“辩论”了干部，撤了队长的职。

共产风和瞎指挥，使得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然，这种破坏早就在农业集体化时就开始了。河北省的农业生产发展情况可以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50年到1952年发展最快。土地改革，农民分得了土地，积极性空前发挥；第二个阶段，1953年到1957年下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资料由农民家庭所有变为集体所有，影响农民的积极性；第三阶段，1958年到1961年，由于共产风和瞎指挥，生产大幅度下降。河北省档案馆存有一份省农业厅工作组1962年7月1日向省委提交的一份调查材料，名为《沧州地区10个生产大队农业现状调查的综合情况》，调查人员选择的10个大队是：沧县马落坡公社的前李宅、孟庄子、张辛庄；献县陌南公社的新北峰、豆三町、杏元；宁津县杜集公社的大苏；肃宁县付佐公社西甘河；交河县于里王公社的后赵和庆云县城关公社的冯家。自然条件和管理上兼顾了上、中、下三等，因而这10个大队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个材料对上述三个时期有比较详尽的描述：

1950年到1952年，三年共生产粮食1784.36万斤，平均年产574.78万斤。粮食产量三年平均递增14.3%。1952年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683斤，每人平均口粮416斤。

1953年到1957年，五年共生产粮食2378.74万斤。平均年产粮食476.15万斤。年产粮食比上一个时期下降了17.2%。1955年是收成最好的一年，但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由1952年的683斤下降到609斤，减少了74斤。

1958年到1961年，四年共生产粮食1354.78万斤，平均年产338.69万斤，比第一个时期下降了41.4%，比第二个时期下降了28.9%。每人平均社会占有粮食1958年为421斤，1959年为492斤，1960年为269斤，1961年为238斤。1961年的人均社会占有粮食和1952年.1957年比较，分别减少了65.2%和56.4%。

西甘河大队是一个条件较好的生产队，第三个时期比第一个时期还是增产的。1952年粮食总产量22万斤，国家征收1.6万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30万斤，国家征收9.3万斤。由于人口增加，社员口粮由1952年的370斤减少到1959年的280斤，而且1959年的口粮中有一半以上是甘薯。

表11－1　1957－1961年河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182．00 201．00 181．00 146．50 131．97

贸易 158．26 174．78 157．39 127．39 114．76

征购 43．11 64．36 71．54 31．51 32．51

销售 52．80 64．01 66．06 43．62 36．98

净拥有 167．95 174．43 151．91 139．50 119．23

总人口（万人）3670．1 3732．3 3791．3 3779．2 2795．0

人均净拥有（斤）457.62 467．35 400.68 369.13 426.58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河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表11-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58－1959年度，人均净拥有为467.35斤，其中口粮大约有327.15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低于31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四、河北创造了开“吃饭大会”的经验

河北省提出的粮食产量计划一直是很高的，年年不能兑现，研究粮食产量指标时，多是算如意账，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又多次变动加码。全省粮食产量计划：1958年，从上年10月提出208亿斤，夏收后又提高到300亿斤，将要秋收时又提出保证450亿斤、争取500亿斤，一年之内计划指标变了8次。按最后确定的450亿斤的计划算，比1957年的195亿斤增长了1.3倍。最后确定1958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240亿斤。1959年的粮食产量计划先后变动7次。最高曾设想1000亿斤，下达600亿斤，5月间修改为348.6亿斤，而实际产量只有214亿斤。1960年全省粮食计划产量为320亿斤，实际产量只有165亿斤。表11-1中列出的粮食部统计的河北省的粮食实际产量数比河北省农业厅的数字还要低。

1958年河北风调雨顺，庄稼长得很好，当时估产总产量450亿斤。由于上报的产量高，国家的征指标也相应提高，再加上几个月的大吃大

喝，秋收粗糙，浪费了不少粮食。到了1958年12月份，一些地方就出现短粮现象。到了1959年初春，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还认定农村有粮食，说缺粮的呼声是生产队“瞒产私分”造成的。不顾农民饥饿的状况，省委继续提出了1959年的高指标。1959年3月14日，河北省委和省人委联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送的《关于召开1959年农产品购销合同会议的报告》提出：“粮食产量由去年的400亿斤增加到600亿斤，争取800亿斤。”征购指标是：“中央确定我省今年收购86.7亿斤到102.1亿斤（包括大豆）。”“如果我们能实现收购86.7亿斤的计划，1959 - 1960年度，我省就可以大部或全部包下天津的粮食供应。”当时天津还不是中央直辖市，属河北省管辖。

共产主义风刮得最凶的徐水县和它周围，1958年开始就出现了大批死人的情况。1959年1月，徐水县有2447个浮肿病人，死亡262人。徐水县容城公社浮肿病人死亡了23%，经过检查的20个病人中，有3户缺锅，两户没有热炕。涿县方官乡祈黄于池村从1958年4月到12月共死亡57人，占该村人口的9.6%。毛泽东表扬的安国县严重缺粮。这个县伍仁公社伍仁大队原估产（县城确定征购和分配的产量）亩产405斤，总产38万斤，但拿到手的产量只有28万斤，比估产少10万斤。应给农民留10万斤口粮，只留给4万斤。

1959年4月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省委不得不承认粮食不足。但还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估计粮食总产量380亿斤左右，比1957年增加将近一倍。近几个月来，我们对总产量进一步核实了一下。大家认为，增产一倍的估计是高了一些，但总产量达300亿斤以上，比1957年增产50%以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饥饿的现实超过了省委的估计。1959年3月，黄骅、任邱、静海、沧县、武清等县缺粮人口达80%以上。邯郸地区的7969个生产队，缺粮的就有6650个生产队，占83.4%。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半斤粮食（其中主要是薯干），农民不得不以树皮、野菜充饥。永年县农民因吃野草（苍耳子芽）造成127人中毒，16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省委不得不放弃“包下天津”的大话，“请中央再次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按时按量完成调入我省的粮食计划。”

此时，中共中央对1958年的错误作法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河北省执行了这些措施，情况有所缓和。但是，在1959年秋的反右倾运动中，河北省全省脱产的党员干部中，有5802人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帽子。省委候补委员、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省委委员、承德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等在庐山会议结束不久，就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省八个地、市委中，有三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右倾把1959年春天短暂的纠偏措施当作右倾罪

证进行全面清算，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又点了一把火，言路更加堵塞，“五风”更加泛滥。生产力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但是，1960年的粮食征购任务反而增加。

当时河北省农民口粮人均五两左右，而且其中70%以上的甘薯（5斤甘薯折一斤粮食）。由于吃甘薯过多，蛋白质含量低。因此，1960年出现了大面积浮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提高。

1960年1月5日，粮食部在西安召开的北方14省安排人民生活经验交流座谈会上，河北省代表发言说，河北省委大抓“三宝”：一是增量法做饭；二是粮菜混吃；三是抓代食品。1960年11月26日，中央转发河北省委批转的《保定市委关于发动群众开好吃饭大会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说：“所有灾区和非灾区都可以参考这个经验进行试点，取得当地直接经验后推广。”保定的报告称：吃饭大会是为了贯彻“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吃饭大会的经验是五个字：一曰管，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必须当管理员，从按人头称米称菜，到加工做饭，售饭收票，一直到结算公布，都必须亲自参加；二曰作，要发动所有干部都当炊事员，参加搞增量做饭，制淀粉；三曰吃；四曰算，算这一顿饭吃了多少粮，每人平均多少，一天多少即够；五曰安，按照三季度每天的用粮标准，计算清今后需用粮食数，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安排生活。

代食品能解决多大问题？1960年12月4日是个星期天，张家口市委领导人亲自出马，组织4万多人到山川采集种种野生杂物。不到十天，仅张家口市区就有50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山坡上长的，平川里埋的，水底里游的，全部采集了回来，共获得战利品5500多万斤。代食品缓解粮食不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代食品做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即可燃烧。在宣化西望山召开所谓“吃饭大会”时，时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的胡开明主持了这次会。他的司机吃了两个代食品的窝窝头。那还是拿到会上的展品，在代食品中属“优质品”，散会后刚刚把车子开到公路，他就觉得肚子里沉堕堕的，疼得像刀绞一样，汗水直往下流。胡开明看他这样，就让他停车。他怕耽误书记的工作，坚持开回市委大院。一开车门，便“哇”地吐了一地。门诊医生说，亏了车子颠簸，把这些东西吐了。要是留在肚子里非出大病为可。吃代食品的农民病号日益增加，最常见的是肠梗阻。食物中毒也经常发生。

“吃饭大会”不能止饿

1960年2月1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写道：“到今年2月15日，全省有49个县、239个公社、5600多个村（约占10%的村），

发现浮肿病人59000名，已病故450多人……其中唐山地区最为严重，只玉田、宝坻两个县就发现浮肿病人19000多名……绝大多数病人是脚部、下肢浮肿，少数已发展到面部、上肢和全身。患这种病的，50岁以上的老人占50%，壮年占30%，青年儿童占20%左右。”

实际情况比省委向中央汇报的严重得多。河北省监委1960年1月26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反映：据省委农村整风办公室派往磁县的检查工作的同志汇报，双庙公社南开河生产队有三个食堂，三个自炊户，都是以干菜为主食。第四食堂是两锅饭，一个小锅中菜少一点粮多一点，这是管理区和县工作组干部吃的，社员那一锅基本是干菜。有的干菜已经吃完，就逃荒、要饭，把孩子送给人家。北白道村半个月就死了十个人。王家店有34人得重病，卧床不起，生产队已经停止了生产，而公社和县领导都认为这个村的口粮已经留足。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高估了秋季粮食产量，公社和县领导机关夸大了瞒产私分和群众偷秋的情况，认为群众中存粮很多。南开河生产队1959年共播种粮食6018亩，亩产平均292斤，公社党委按平均亩产445斤计算，向队里分配了粮食征购任务。为了使账面平衡，说社员偷秋96.34万斤（平均每户近千斤），把这个数字算作口粮分配到户。社员气愤地说：“政府不给粮食，我们还落了个偷！”其它村庄也有这种情况。县里和公社派出了700多名干部到村安排生活，都看到农民挨饿，但没有一个人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南开河管理区的李书记说：“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就是不敢说，现在正反右倾呢！”

饿死人的现实使得河北省委对粮食问题的态度比前两年冷静得多。1960年10月18日，省委向中央报送的《河北省委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搞好粮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报告》中，对粮食产量“全年估产数字是170亿斤多一点，也可能达到175亿斤。”“在正常情况下，全省粮食消费量为190亿至205亿斤。由于今年灾害重，收的少，我们决心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过日子，按170亿斤安排生活。”

1960年是河北省饥荒最严重的一年。12月17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报送的《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浮肿病情况的简报》中写道：“自从今年1月到11月底，全省累计发生浮肿病人58万多人，死亡4759人。现有患者18.3万人，其中城市8.5万人，农村8.5万人，较重的占17%。因农村漏报较多，实数将在20万以上，其中11月发病15万人。目前浮肿病发展的特点是：1，城市骤增；2；平原多于山区；3，城市里青壮年多，农村老年人多；4，重灾区多而且病重。”

省委这个数字显然是缩小了的。据封云亭向省监委书记裴仰山报告，衡水县1960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3 - 1957年的平均年产量降低20%以上。牲畜死亡5795头，致使牲畜总数比1956年减少了44%。据衡

水县委数字（这个数也是缩小了的），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19.2‰，比常年高出约9个千分点。《河北日报》张家口记者组反映：蔚县1960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其中12月一个月就饿死4082人。

1960年张家口市死亡58877人，死亡率为1．89％（1958年为1．31％，1958年为1．64％）。12月，张家口市死亡9584人，1961年1月上半月又死亡4619人，1月下半月，死亡又有速之势。

中共河北省委监察委员会1960年10月13日报告称：目前浮肿病、拉血、子宫下垂等疾病流行。特别是浮肿病，从今春到现在一直未断，个别地方仍在继续发展。据徐水、吴桥、宁津、交河、静海、蓟县、霸县、遵化、迁安、昌黎、玉田等11个县的不完全统计，今春以来患浮肿病的有109671人，已死1216人（缺交河数字）。10月上旬是秋收不久的日子，为什么这时就出现饥饿？这个调查报告回答说："对粮食的产量估计上，主观臆定，估计偏高，征过头粮，使口粮架空，给人民生活造成困难。"交河洼里王公社党委，去年分配给姜桥生产队的种麦任务800亩，实际只种了400亩，而今年仍按800亩征购，致使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蓟县今年夏季评产7400万斤，实产5800万斤，亏产1600万斤，就压低人民的口粮。干部特殊化、大吃大喝也是造成农民饥饿的一个原因。从去年到今年6月，蓟县书记处就举行招待宴会573次，开支公款4000多元。该县11个公社，有8个公社和管理区的书记、副书记腐化堕落。大厂公社有44名干部的家属不生产，单立食堂，该公社11个管理区有10个管理区的干部不参加农民食堂。迁安城关公社省庄副支书尹某，从食堂的麦子碎米中筛出20斤细面，给干部们包饺子吃。遵化县堡子店公社马相营管理区的临时肿浮病医院，从患者的食物中抽出鱼12斤、大米40斤、白面25斤，请客会餐。

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同时，中共河北省委还念念不忘粮食征购。1960年11月8日省委在一份"紧急通知"中强调："11月份必须十分抓紧粮食过秤入库工作。今年粮食征购，各地必须在保证47．6亿斤的前提下，力争完成49亿斤。"

除了饥饿浮肿造成非正常死亡以外，农民饥不择食，因吃野草中毒死亡的也不在少数。

1960年4月29日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党组报告：1月1日至4月26日，全省共发生中毒事件423起，中毒人数达14756人，致死416人。

1960年5月15日省防毒工作检查组报告：今春以来至5月上旬，涿

县、宁晋、唐县三个县共发生中毒事件63起，中毒2139人，死亡59人。唐山市委1960年10月7日报告，截至10月7日，因食苍茸籽中毒共计15790人。将这四个县、市的数字推向全省的114个县市，其总数显然大大超过省公安厅的报告。

1960年9月21日，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报告：五、六、七三个月，全省共发生中毒事件802起，中毒22033人，致死519人。

两难：既要制止死人，又要完成征购任务

由于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1960年12月28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发出密电：《关于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通知这样说：

省委再次吁请你们严密注意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文题。前此，我们曾揭发了宁晋、衡水县和博野公社的死人问题，最近又发现了涿县、安新部分社队死人问题也很严重。但是，这些地方死人问题，大多是市委、省委派人下去检查才发现的，很少是县委自己向上报的。近日，又发现有的县部分社队也有不少死人问题。但那个地方的县委和有的干部对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仍然无动于衷，不能正视……可以预料，还很可能有被隐瞒的死人问题没有发现。

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级注意解决死人问题，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级完成粮食征购任。前者只是口头上的号召，而后者却是加速死亡的切实行动。1961年9月15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在政策范围内多购一些，少销一些”，“全省全年的征购任务坚决完成32.1亿斤”，并把这个指标分配到了各专区。沧州专区接到2.4亿斤的征购任务后，再向县分配下去，有的县农民的平均吃粮水平每天只有2两多一点。河北省这样做也是中央逼出来的。1961年10月5日晚，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强调指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还批评河北省征购任务完成得极为缓慢。10月16日，参加这个会议的省长刘子厚给在省里的领导人阎达开、李砚农、万晓塘打回紧急电话，提出“首先把征购任务切切实实地肯定下来（不是力争，而是坚决）完成33亿斤。”“我们必须向各级干部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明大义，顾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况下，还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动员起来，做好群众工作，坚决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区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仅邯郸地区就派出了3638名干部下乡，分片包干抓粮食入库运动，入库粮食在增加，但农民和基层抵触情绪也在增加，他们质问：今征购任务增加了两次，为会么还要增加？在这场“粮食入库运动”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泪？这是可想而知的。

1961年的饥饿情况还没有减轻。8月12日，河北省委卫生厅党组报告："进入7月以来，全省114个县、市中，有67个县、市疾病是上升的。七月中旬，浮肿、小儿营养不良、闭经、子宫脱垂现患较6月底上升了5%左右，其中浮肿上升了10%左右。在浮肿病人中，重症和干瘦病人较多，有的地区高达20%至30%。在黄骅、静海、东光、汉沽等地，在儿童中又成批地发生了失明和瘫痪症，不仅病情重，而且很难医治，部分儿童已经长期瘫痪……值得注意的是，肠道传染病和浮肿病等营养疾病，由于互相影响，症状加重，突然死亡的现象又有上升。"省委办公厅1961年10月24日报告：1961年9月底统计，吴桥、南皮、庆云、盐山、宁津、黄骅、故城、景县、河间等县统计，月死亡率都超过9%。沧州全专区5月份死亡401人，6月死亡682人，7月839人，8月1184人，9月2054人，10月半个月1414人。9月底正是秋收季节，还出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真是不可思议。

河北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只能以省官方提供的数据作为依据。《中国人口·河北分册》中提供了官方的数据。得出在大饥荒期间，全省饿死41万多人，少出生166万多人。二者相加即总人口减少207万人。

五、整风整社："四清"运动的前奏

面对严重的饥荒，1960年和1961年，在中共中央"民主革命补课"的号召下，河北省的工作重点是纠正"五风"和整风整社。河北省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在农村的深入。其目的是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1960年的整风整社否定了1959年春天对"大跃进"错误的某些纠偏措施，使错误越走越远，从而加剧了饥荒。

河北省通过"整风整社"这种方式把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深入基层，和粮食征购、反"瞒产私分"结合在一起。中共唐山市委1960年初向省委的报告中写道："我们解决领导核心问题的办法，一是县五级干部会议，二是公社四级干部会议。各县五级干部会议已于1959年12月25日前结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彻底揭发批判，彻底搞臭。在全市参加五级干部会议的16018名干部中，共揭发批判重点人622人，占与会干部的3.88%……为了进一步搞深搞透，相继又普遍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除支部委员、生产队小队长以上党员参加外，都吸收了团支委和小队以上非党员干部参加。以更广的范围、更多的人来集中烧三级领导核心。由于发动的充分，迅速形成了四面八方纷纷点火，上下交烧的有利形势。全市共确定重点批判对象1871人，占与会人数的3.95%。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绝大部分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低头认罪。”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还继续搞反瞒产私分，据不完全统计，“共揭发、自报粮食9214万斤，棉花13万多斤，花生291万多斤。”

中共张家口市委1960年1月16日《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和农村整风运动的综合报告》中说：“农村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中心的整风整社运动，从1959年11月开始，分两批进行。目前少数生产队已经结束。两个多月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一小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分子、农村党内代表富裕中农的人、隐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各种坏分子都已经和正在受到揭发、批判或清洗。全市揭发出来的重点批判对象10133人，占农村总人口的0.4%”

整风整社运动中，河北省确定霸县、宁晋等20个县为重点，派出庞大的工作组。霸县胜芳公社以稻田移栽“放卫星”而闻名。浮肿、妇女闭经、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工作组和县委要给公社党委书记续长岭以党纪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续长岭对找他谈话的工作组队员安振英说：“我没有完全按照县委的规划做，若完全按县委意见办，后果会更加严重。”工作组查明，霸县县委的规划、高指标、大计划、瞎指挥，果然比下面做的更严重。胜芳的稻田移栽的高产卫星，省委负责人多数去参观过，中共中央有的负责人还站在移栽的稻谷堆上拍照纪念。县委有规划、中央和省领导人来参观、鼓励，来树旗帜，这就没有理由追究下级干部的责任了。

但是，在全省还是有大批基层干部当了替罪羊。1960年冬至1961年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河北省共揭发出各种犯错误干部174757人，占干部总数的13.9%，预计处理37412名，占干部总数的2.98%。“把一些五风严重的社队看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或死官僚主义分子夺了权，把犯五风错误的干部，当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进行了批判斗争，并把这些干部集中到县社进行’训练’，实际是批判。据1961年4月中旬的不完全统计，共‘集训’了6763名”。

1960年河北省还在邯郸市搞了32个农村“三反”试点。这也是农村整风整社的一种形式。这32个大队都是三类队，即落后队，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三分之一”。从试点的总结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落后原因的分析。报告认为，这32个队有以下四种情况：属于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占12．5%；属于领导核心严重政治麻痹或犯有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地、富、反、坏的占15．6%；属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很大，领导权被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占40．6%；属于领导核心能力薄弱或组织涣散的占31．2%。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就提出了“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比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民主革命不彻底”早半年。

河北省是从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61年整风整社的作法，很类似于两三年以后的“四清”运动。例如，“四清”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河北省委1960年的整风整社就提出“农村整风的重点是党内，而党内又是领导核心的正确性。”在运动的作法上也为以后的“四清”运动开创了先例。

1962年1月的全国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头脑清醒了一些，196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六十条”），紧接着开始了对“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　处理的干部甄别平反工作。河北省成立了以省委候补书记、省监委书记裴仰山为组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朱子强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全省的甄别平反工作。

甄别平反工作阻力重重。在工作组中，相当数量的大跃进和反右倾积极分子思想难以转弯，有些在大跃进和反右倾升上去的领导干部担心自己的位子问题。经过多方工作，先是给原唐山市委书记刘汉生、原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原承德地委书记王克东等平反。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刘子厚代表省委承担了责任，向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同志道歉说：“现在向你们道歉，向你们道一辈子歉！”在这以后，其他人的问题也得以解决。

但是，事过半年，1962年9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还批评了翻案风，河北省委多数领导人闻风而动，对甄别平反工作大加挑剔和指责。在省委内部，对甄别平反工作的估价出现了分歧，争论不休，难以统一认识。在省委第十三次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讲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河北省的甄别平反工作是正常的，健康的，翻案风也是有的。”才算收场。“甄别平反工作总结”无法向中央上报。

在对被错误处分批判的干部甄别平反之后，“向你们道一辈子歉”之言犹在耳，省委于1963年改组了承德地委，调动了王克东的工作。1964年又大揭张家口地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新账老账一起算”，改组了张家口地委，免去了葛启地委书记的职务，同时被撤职和调离工作的地、县级干部达52人之多。

当时，既容不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容不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甄别平反的人。他们抓住省监委在甄别平反时对被错误处分的干部表示同情的只言片语，罗织罪名，对省监委“拆庙搬神”，让省监委的人统统下去搞“四清”，由一位省委副秘书长管监委。1965年11月，又以这些罪名，召开省直机关处长以上的干部会，对省监委书记裴仰

山进行批判。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裴仰山以“老右倾”被省委抛了出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葛启、王克东也在劫难逃。

六、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在大饥荒期间，有一些干部敢冒政治风险为民作主，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开明就是其中之一。《炎黄春秋》杂志1991年第2期发表了晓凌、柳铮的《胡开明并非“胡”开明》一文。从胡开明的女儿胡晓燕那里，我得到了更多的情况。

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1959年9月底，河北省委派常务副省长胡开明到张家口去指导整风反右工作。同年12月，又任命胡开明为中共张家口地区党委第一书记。

张家口地区的张北县，1958年，实际亩产只有100斤，却冒充平均亩产400斤，成为全省粮食高产的“元帅县”。1959年10月，张北县委总结上报：全县23万人，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770斤。

胡开明到张北县以后，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看了几个粮食“高产”社队：

黄盖淖公社食堂，每人四颗焖土豆，一碗酸溜溜（草）汤。人们喝一口汤，咬一口土豆。胡开明手中的材料却明明白白地写着：黄盖淖公社平均亩产410斤，创历史最高纪录。

大囫囵村，刚刚秋收一个月，生产队、大队的库房只剩下一个粮底子，社员家中没有粮食。而按上报的“卫星”，说这里的粮食成十倍地超过了粮仓的库存能力。

1959年秋收前，张北县总人口23.4万人，就有21.4万人缺粮，缺粮人口占农业人口的93%。1960年形势更加严峻。而各干部却大喊“形势大好”，大张旗鼓地反右倾。

通过调查，胡开明发现，全张家口地区70%的社队缺粮。寒冬已到，200万人生活没有着落。

胡开明走马上任以后，首先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了反，并安排了工作。当然这只限于地委有权限的一批干部。像葛启那样省里管的

干部，他没有权这样做。

1960年饥荒严重。胡开明到蔚县西合营。看到这里的农民饿得没办法，春播时，前面播的种子，后面就有人一边扒出来，一边往嘴里填。生产队没办法，只好种子拌上农药，并通告了全体社员。可是，饥饿的痛苦，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子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在吃以前在土里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非正常死亡人数大量增加，个别村庄没有力量把尸体从屋子里抬出去。

然而，上级自欺欺人地把农民的饥饿当作疾病，让卫生部门解决。宣化市委书记芦起到农村调查群众生活情况，看到一个老人躺在炕上，他问："大爷，您是不是病了？"

老人没有回答。

芦起又问："大爷，您病了吗？"

老人看了看他，还是没有回答。

芦起以为老人没有听清，又提高声音问："老大爷，您是不是病了？"

老人突然用力撑起身子，怒气冲冲地说："我没病，给我吃饱，什么都好了！"

随行的大队支部书记说："这是市委书记。"

老人说："我骂的就是他！"

有人把这事当笑话说给胡开明。胡开明笑不起来。他觉得老人骂的不只是芦起，还有自己……。

1960年冬天一个深夜，卢起打电话向胡开明报告，由于饥饿，许多哮喘病人在黎明前死去。他要粮食，还要治疗哮喘病的大烟土。据说，只要将大烟土和一点食物服下去，就能治疗和减轻哮喘。胡开明承担风险，果然发放了一些大烟土，也真正治好了一些人。

1960年冬，河北省委主管农业和生活安排的负责人和省委商量做出决定，农民口粮每天降为四两（16进位，相当于10进位的2.5两）。省委负责人还说，吃四两者是马列主义，超过四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河北省委提出了"吃四两，晒太阳"的口号。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这也是大饥荒期间的一个奇谈。最实际的还是寻找代食品，1960年12月，张家口有50多万人参加了采集

代食品的活动。采回玉米芯、高粱杆、土豆藤、榆树叶等2亿3千多万斤。26400多台加工机械粉碎这些原料。代食品做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就可点燃。因吃代食品而生病的人日益增加。

胡开明亲自找到省委主要负责人，说："请你们下去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这位负责人说："全省都是四两，又不光是你张家口！""张家口是塞外高原，气候严寒，代食品也极少，不增加粮食，老百姓能活下去吗？""老胡呀，我也想增加指标，可是没有粮食呀。""不是没有，指标就在你们手里，关键是敢不敢负责！"

胡开明说的是实活。省委确实掌握着一批机动粮食。但是，没有人敢负责把它用于救济饥民。然而，与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态度相反，在张家口的蔚县一个公社，却有人敢于负责，做出了一个秘密放粮的决定。这个人就是东城公社书记武万升。

蔚县县委书记赵某与省委驻蔚县工作组共同研究，为了模范执行省委指示，做一个"真马列主义者"，再压低一两，规定每天定量为3两。这3两粮食还是由公共食堂统一管理，经过层层克扣和多吃多占，农民能吃多少？因此，蔚县死亡人口迅速增加。这个县东城公社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在死亡线上挣扎。公社书记武万升想：难道饿死人才是马列主义吗？看着群众饿死而见死不救，连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他秘密召开大队书记会议，做出了秘密决定：第一，从公社掌握的粮食储备中，给全社每人分10斤粮食。增产队可以分15斤。这些粮食不交食堂，由社员拿回家里食用。预计全社放粮40万斤。第二，从入库粮食中拨出白面和玉米面5000斤，与中药材合成制成消肿点心，分配给病人食用。第三，国家干部带头，每人捐献一个月的工资和一身衣服，救济严重困难户和病人。在会上，武万升将自己开会前刚领到的88元工资全捐献了。

武万升是准备丢官的。但是，胡开明不仅没让他丢官，还把他提为阳原县委书记处书记。

1960年冬，胡开明又一次打电话找到省委主要领导人。他详细地汇报了张家口地区的饥荒，提出要杀一批过不了冬的牲口渡荒，请省委领导开绿灯。这种请求使这位领导人为难。他不敢决策。恰好这时毛泽东到天津视察，于是，这位省委领导人小心翼翼地向毛汇报了张家口地区想杀老牛和瘦羊的事。毛几乎没有思索，手一挥，说："救人要紧，杀就杀吧！"一道指示下来，杀了一批老弱牲畜，救活了多少人难以统计。

1960年1 - 10月，张家口下属的宣化市非正常死亡4638人，平均每月

饿死460多人。这时省委提出“吃四两”的政策（在这以前宣化吃五两）。胡开明曾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过意见，但没有采纳，他只好含着眼泪执行“吃四两”的政策，结果，12月就饿死了1059人，1961年1月，饿死1891人。1961年1月21日，胡开明给正在北京开会的省长刘子厚写信，谈张家口的群众生活情况：

张家口市的疾病死亡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全市去年共死亡58877人，死亡率为1.89%（1958年为1.31%，1959年为1.64%）。最突出的是蔚县，去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6%。全市现有病人8623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8%……从今年1月开始，口粮水平普遍提高到五两……现在吃代食品的食堂占95%，许多社员吃了拉不下来。蔚县白乐公社田照町生产队，80%的社员便秘。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疾病和死亡情况未见好转。据统计，去年12月全市共死亡9584人，日平均死亡309.2人。今年1月上半月共死亡4619人，日平均死亡308.2人。1月上半月的后五天同前十天相比日平均死亡增加了157.3人……据《内部参考》3133期刊载的中国科学院资料：从事中等强度劳动的人，每日需要热量3000 - 3500大卡，如能达到此数的70%，就基本可以不发生营养不良性水肿。现在农村人口每日平均口粮5两，中等劳动力不过5.5两，再加上2.5两代食品，发热量只有1000大卡左右……加上有的地方工作不好，群众还吃不到自己的定量，问题就更大了。”

在这封信中，胡开明建议：“不知中央是否可以再挖库存，或者多进口一些粮食，再给河北调一点，以便比较顺利渡过灾荒。”省委终于通过了给张家口地区提高二两的定量。全省也都改为每天6两。

粮食定量提高到6两以后，胡开明注意力转向公共食堂。他认为食堂不解散，农民就不能免于饥饿。省委工作组在涿鹿县西二堡搞调查，总结出公共食堂十大优越性，什么解放了妇女，节约了粮食等等。还引用了很多社员赞扬公共食堂的话。胡开明给涿鹿县委书记王洁波打电话问：“省委调查组在你们西二堡搞的调查你看过了吗？”“看过了”，“你怎么看？”“我....”王洁波支支吾吾。

胡开明对王洁波说：“不要你现在作明确的回答。请你马上组织几个敢说真话、实事求是的同志，不带任何偏见和框框到城关再搞一次调查，要分头和社员个别谈话，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如实给我报来。”一个星期以后，王洁波送上一份报告，公共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倒存在十个问题。

胡开明来到坝上，要亲眼看一看公共食堂的情况。等到吃饭时间，他看到几个食堂。

他顶着“白毛风”来到康保县的一个村。公共食堂设在一个破庙里，百十个社员蹲在避风的角落里，就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和冷风，吃着糠菜饼子。他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胡开明听了，久久没有说话。他目送那个孩子拎着瓦罐，在寒风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

在这段时间，他调查了几十个食堂。在省委常委会上，他有选择地汇报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他请省委考虑，是否可以停办公共食堂？他的提议遭到否定。但是，胡开明抱着对群众生活负责的态度，在张家口解散了食堂。一两个月以后，由于胡乔木等在湖南实事求是的调查，经毛泽东同意，全国的公共食堂也都解散了。

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胡开明在蔚县常宁公社推行“包产到组”。群众进一步要求搞“包产到户”，但胡开明认为还是包产到组好。1962年6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葛启得到平反，回到张家口任第一书记，胡开明调回省里，但他还在张家口调查研究，写了一份《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7月30日，在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胡开明就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发了言。会议简报送上了中央。8月8日，胡开明又把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这时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为八届十中全会定了调子。8月16日，毛泽东在胡开明的报告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没有作任何表态。但胡开明已明显地感到，此时风向已变，对责任制多持否定态度。其实，就在8月9日，即收到胡开明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批评了胡开明。毛泽东说：

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或者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讲解散集体农庄。

接着，毛泽东批评了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又指名批评胡开明：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这段话，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传达，下面不知道，胡开明也没有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中，这段话被公开出来，成了“最高指示”。胡开明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期间的1969年，他被由省里押送到张家口地区每一个公社轮流批斗。但是农民在给他送饭时，在白菜下面偷偷地埋上了猪肉和豆腐。

1978年，胡开明被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配合万里搞联产承包责任制。

胡开明是真开明还是“胡”开明？张家口的一位老干部送给胡开明一副对联：

敢说真话击鼓破天惊

历史作证你是真开明

附记

2004年10月，我到河北省档案馆查资料，有不少收获。但其中“控制”档案不让看。我所看到的与大饥荒有关的“控制”档案目录有：

毛主席对徐水县商庄公社的批示。（1958年，档号：855－4－1270）；

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1958年视察河北的讲话。（1958年，档号：855－4－1271）；

各地市委关于铁路发生偷抢粮、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1960年，档号：855－9－4003）；

河北省委关于省办公厅翻印农村粮食、人民生活、死人整风整社的调查材料。（1960年，档号：855－9－4005）；

毛主席听取河北省委汇报时的指示，（1961年，档号：855－6－2005）；

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档号：855－6－2008）

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央负责人的信件。（1961年，档号：855－6－2016）

中央负责人信件和毛主席的重要批示。（1961年，档号：855－6－2021）

省委书记处会议301次会议材料。（档号：1961年，855－6－2056）

省常委第一届132次会议关于粮食安排问题。（1961年，档号：855－6－2051）；

省委关于当前对敌斗争情况　全省政法工作会议。（1961年，档号：855－6－2249）；

可能还有其它与大饥荒有关的控制档案。等将来档案开放以后，利用控制档案，这一章的内容会更加丰富。

第十二章　黑色的贵州

在大跃进及以后的几年，贵州省是非正常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省。据公开出版物《中国人口·贵州分册》的数据计算，1959年贵州省共有1700万人口，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90万，全省平均非正常死亡率为53‰，此外还少生的120万人。这是按官方数据算的，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得多，有人说大饥荒期间贵州省饿死人150万，但无从查证。曹树基用他的方法算出贵州1959 - 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

2002年12月，我应邀到云南玉溪抚仙湖一个经济论坛作演讲。会后我到云省档案馆查了几天档案。之后，我乘火车到贵阳，计划用几天时间专门查阅贵州档案。新华社贵州分社的朋友很支持我，除了我带的介绍信以外，分社又为我开具了一个用词更为恳切的介绍信。经省委办公厅同意，我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目录。不到一天时间，我就查到了我所需要看的案卷目录：目录号都是3，案卷号在括弧内：

1957年，各地农村大辩论报告（1521）；

1958年12月，周林同志在省委一届八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691）；

1958年2月，省委一次会议向中央的报告（1684）；

1958，安顺、黔南关于粮食问题的处理意见和报告（1758）；

1958，铜仁、黔南关于灾情工作的意见（1761）；

1958，各地、州委关于大办钢铁铜的意见报告（1786）；

1958，遵义、安顺关于灾情等工作的意见（1762）；

1958，中央、省委关于平息叛乱的报告（1754）；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1856）；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及批几位同志的右倾（1870）；

1959，省委批转吴肃等同志有关农村工作的报告（1964）；

1959，各地、州关于发生疾病及防止、治疗情况的报告（1970）；

1959，各地、州委关于粮食工作、粮食调运工作的请示报告（2034）；

1960，周林同志在四级干部会上的报告（2081）；

1960，四级干部会议简报（2082，2083）；

1960，省委书记处遵义会议记录，贵州人口变化统计（2118）；

1960，关于“共产风”的表现和危害（2123）；

1960，中央检查团赵方等人的报告（2125）；

1960，省监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意见（2159）；

1960，遵义地区饥荒情况（2167）；

1960，各地、州农村饥荒情况（2169）；

1960，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的报告（2209）；

1960，公安厅关于几个地区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2215）；

1960，省工会关于劳逸结合、安排群众生活的报告（2251）；

1961，各地关于病情和防治疾病的报告（2423）；

1961，遵义地区粮食包产到户的情况报告（2452）；

1961，安顺、毕节等地食油、粮食问题的批复（2503）；

1961，张才书、杜仲文等人反映“五风”情况（2517）；

1962，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报告（2616）；

1962，1960、1961、1962年上半年人口统计（2617）。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做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

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查档不成，朋友们安排我游览了黄果树瀑布、天生桥和贵阳市。贵州查档无功而返。我把档案号抄在上面，对以后的研究者也许有用。

看不到档案，我只好利用其它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写了这一段。等档案开放以后，再加以充实。

一、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在大饥荒期间，贵州这个很不发达的省份，却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大力推崇。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另一个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经验。这两个经验应当归功于省委书记周林。

周林，三年大饥荒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他1912年生于贵州国酒之乡怀仁。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调任贵州省副省长、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他衣锦还乡，却没有给家乡带来好处。周林在贵州主持工作期间，高举“三面红旗”，迎合毛泽东的意愿，对贵州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周林受到了批判斗争。1977年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北大期间，于1979年7月为马寅初平反。周林于1997年逝世。这说明一个干部能干坏事，也能干好事，关键在中央的路线正确与否。

1958年，贵州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数字，则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到各自所属公社的生产队，以队为计算粮食购销的单位。对农业社的定购数，以1957年农业社（户）的统购粮食数加上1958年增产部份的增购数为准，1958年比1957年增产的粮食，一般增购其22%。定购数核定后，自1958年起，5年基本不变，增产不增购。农业社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品种，在每年春耕生产以前由国家分配一次，并实行“定时、定点、定质、定量、定品种”的“五定”交接合同，使入仓工作制度化。1958年3月和8月，贵州先后召开两次财贸工作会议，确定商业“大跃进”十大纲要，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某些人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农业生产出现高指标，高估产，浮夸风，随之出现的是粮食高征购。1958年，全省夏秋粮食长势很好，一度估计产180亿斤，由于农村抽调大批劳力支援工

业，使一些已经成熟的粮食丢在地里无人收，造成了丰产不能丰收。同时，城市和矿区增加非农业人口60万人，粮食需求量增长很大。因此，将粮食征购任务调增到36亿斤原粮（下同），后来粮食产量降到104.98亿斤，比1957年减产2%，而征购完成33.53亿斤，比1957年增加23.8%，人均留粮又比1957年减少35斤。

1959年和1960年，生产急剧下降，局势非常紧张，为了保证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1959年实行“多购少销”原则。采取“四快”（快收、快打、快购、快运），“四边”（边收、

边打、边购、边运）办法，打破历史惯例，在9月底前突击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向“国庆献礼”，在产量减到84.64亿斤的情况下，征购原粮仍达40.17亿斤，占产量的47.5%。1960年,产量继续减到63.23亿斤，征购则占产量的52.1%，购后人均留粮只有215斤（原粮），

降到1949年以来最低水平。

215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150斤，平均每天只有0.4斤。经过层层克扣，农民能吃到嘴里的只有2-3两粮。这还是全省的平均数，一些差的地方更少了。从粮食部的角度看，贵州省的征购数要小一些，1959年征购不是贵州省志上说的40.17亿斤，而是33.50亿斤。1960年的征购数为23.53亿斤。

表12-1 1957 - 1961年贵州省粮食情况

项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	107.1	114.5	84.8	67.77	63.5
贸易粮	93.13	99.57	73.74	58.93	55.22
征购(亿斤)	22.09	27.78	33.5	23.53	15.86
销售(亿斤)	15.14	25.53	27.08	26.33	14.25
净拥有(亿斤)	86.18	97.32	67.32	61.73	53.61
总人口(万)	1680.9	1710	1744	1643	1623.5
人均净拥有(斤)	512.7	569.12	386	375.72	330.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贵州》。

表12-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60－1961年度，人均净拥有为375.72斤，其中口粮大约有263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大约只有低于25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年7月，贵州省遵义地区几个县发现农村饿死人的问题很严重。省委在遵义召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遵义死人的事件。当时王民三正在黔西调查，突然接到电话，要他连夜赶到遵义。在经过金沙县时，县长邱继刚向他介绍了一种代食品：用榨过油以后的油菜籽饼，用冷水浸泡三小时，再晾干粉碎，蒸成窝窝头。王民三吃了一个，发现比谷壳、麦糠好吞咽一些。榨过油后的油饼过去做肥料，现在成了好食品。他就带了几十个到遵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他摆在一张桌子上，向省委推荐。省委接受了，就在全省推广。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贵州省委还于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篇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的主要内容是：一，粮食问题：1，今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检查整顿，健全了制度，克服了浪费现象，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2，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秋粮征购任务，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季作物丰收；做好入仓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贯彻执行快收、快打、快购、快运的方针；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全力以赴，按时完成。二，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目前商业工作正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思想，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改善经营管理，很高服务质量，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

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每人一份，中央一级各委、各办、各部、各人民团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党组织每处数份，军委扩大会议及外事会议每人一份。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近日我们收到很多

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因此报较短，易于阅读，故选发各同志。以后还将选发一批。

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帽子，从而加剧了饥饿和死亡。

王民三在上引回忆中写道：1959年底，贵州正在挨饿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讲话，号召搞代食品，并介绍了北京市用槐树叶作食品的经验，采集树叶在北京形成了运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

1961年，省级机关干部吃粮标准由27斤降到25斤，接着又降到23斤，没有其它营养，浮肿病在干部中迅速蔓延开来。厅局负责人患浮肿病的也相当普遍。根据省委书记周林的意见，在贵阳市省府路贵阳饭店办了临时厅局长浮肿病院。，住院人数达六七十人。省里各团体也办了浮肿病院，省粮食厅大楼三楼会议室就改为病房，挤满了浮肿病患者。

1961年3月，王民三奉副省长徐健生之命去安顺察看，徐副省原来以为安顺问题不大，没听说死人的事，打算从安顺调点粮食。安顺地区地委书记孙汉章告诉他，安顺地区已死了一万多人。孙汉章对王民三说：“请你务必向省委反映，安顺地区现在实在无力向上调粮食了，我们虽然没有遵义、铜仁那样严重，但势头不好。在蔡官公社，公社书记说，已经死了2600多人，还有2000多人浮肿。旧州公社拉岩小队，共有32户，已死去122人，有6户死绝，浮肿人数200多人，全家躺倒的有64户。到村外四处一看，不是十几个棺材，就是七八具没有掩埋的尸体。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

二、贵州办食堂的经验“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刻，1960年2月16日到18日，贵州省委召开了三

天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报告是2月24日发出的，报告说：

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固定的食堂中出现了一些办得很好的，其特点是：1，巩固地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员一律参加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2，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管理；3，建立了必要的管理制度，首先是口粮管理制度，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人定量、节约归己的原则；4，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5，炊具改革很有成绩，减轻了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饭菜质量。这些办得好的食堂已经成为生产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巩固了人民公社，生产也搞得很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有的还提高了集体化程度，形成了较大的居民点，为建设新农村创造了条件。

报告说，群众热情地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　劲头高又高"。报告还煞有介事地说："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1，有些办得好的食堂，由于解决了吃菜的问题，社员个人种菜已无多大必要，所以有的已把自己的一部分自留地转交给食堂（在这个报告的后部分，明确强调"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2，有些地方由于办好了食堂，有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家有了依靠，所以就纷纷集中到食堂周围。若干个小居民点，集中成一个较大的居民点，这就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个报告也谈到不固定的食堂有三种情况：一是虽然集体做饭，但做得不够吃，分给各户，推出了事；二是时办时停；三是各户单独起伙，食堂有名无实。在这些地方个别已发生外逃、肿病和死人的现象。这个报告认为"少数"食堂搞得不好的原因是"少数人把粮食霸占起来"、"所谓少数人就是富裕中农，这些地方的基层组织也处在他们把持之下。看起来，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

中共中央两天后就向各省、市、共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

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省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当农民期望摆脱公共食堂的桎梏自求生路的时候，贵州省委却送上了这么一份报告，深得毛泽东的欢心。经毛泽东“全国仿行，不要例外”的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三、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

遵义地区和毕节地区由于问题严重，曾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这两个地方曾发生“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由于档案还未公开，无法弄清事件真相。中纪委副主任李坚（大饥荒年代是中监委处长，曾到很多地方调查过大饥荒中的问题）给了我一份材料，即《中纪委大事记》，其中有遵义和毕节的情况。

中央监委王维舟1960年11月上旬在贵州省视察工作时听取了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李景膺、省监委副书记杨用信等人的汇报，发现遵义和毕节地区的严重问题。

1959年冬到1960年春，遵义地区曾发生大量肿病、死人的现象。1960年4月以来，遵义地委组织了5000人的医疗队给群众看病，组织机关干部20多万人帮助群众秋收冬耕，下放22万多人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但是，这个地区的病人还很多，特别是妇女病。约有36%的劳动妇女患了子宫下垂和闭经等病。非正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如正安县大阡公社，从1960年8月以来，有4000人患病，8、9两月死亡150多人。

当群众断炊、肿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的时候，遵义地委却大搞计划外的非生产性建设。建有四座大戏院、三座招待所、一座8000多平方米的服务大楼。服务大楼有跳舞厅、照相室、电梯等设备。招待所的门窗、地板是楠木和紫木制成。室内陈设着许多古玩字画、象牙雕刻、高级皮沙发、锦坐垫子等。他们为了美化街道，搞所谓“半边街”，把街道靠河边的民房全拆掉，有的居民被迫搬到山沟里去住，有的至今没有得到安置。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县也跟着学，大搞计划外非生产性建设。从1960年1月到6月，共搞计划外基建项目93个，动用国家资金400多万元。

毕节地区一些县、社干部违法乱纪和群众肿病死人情况非常严重。如金沙县，在县委书记赵广玉、书记处书记王国民的指挥下，从1959年冬起，连续搞了8个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反瞒产私分当中，提出“四光政策”和“十大兑现”。“四光政策”是：小队以上党员干部一律撤光，破房拆光，家具搜光，灶头刮光。“十大兑现”是：凡是刮树皮、挖野菜、杀猪羊、偷庄稼、不出工、死人后戴孝埋坟堆等，都要罚款、抄家。据统计，全县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仅管理区一级干部被撤职、调离、开除、法办的就有250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69%。禹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杨某，私设监狱和劳改队，关押、劳改干部和群众1270人，其中被折磨死的124人，致残85人。这个公社人口外逃、肿病死人情况十分严重。

金沙县的浮夸、浪费现象也非常严重。从1958年以来，他们搞了一千多个“跃进组织”，把13－20岁的姑娘集中起来，从各公社抽调好房子、好地、好农具，单独成立核算单位。实际上她们根本不从事生产，成天敲锣打鼓、跳舞唱歌。有几名县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不管生产，经常带她们坐汽车到各处“参观评比”，所到之处无不唱歌跳舞、大吃大喝。仅县委书记王国民等人1960年开支的汽油费就达8000多元。

上述中纪委的材料是李景膺汇报的。李景膺的汇报并没有完全反映饥荒的严重情况。从遵义地区的湄潭县的情况可见一斑。

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贵州省湄潭县一起骇人听闻、惨不忍睹的“湄潭事件”（又称“59事件”），是一次以10多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当时湄潭县是由凤冈、余庆和湄潭三县合并而成的大县。全县总人口6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57万人。合县后除县机关仍保留行政建制外，区、镇以下均改级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全县有18个人民公社，下设136个管理区，776个大队，5901个生产队。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妨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杀人而食者达16起，吃死人的事件就更多了，无法统计。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

“湄潭事件”前，全县农村经过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许多生产队除集体饲养的几头耕牛外，其它六畜濒临绝迹，森林严惩被毁，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面临绝境。1959年粮食只收了3.22亿斤，比上年减少32.6%，其它农作物减产更为严重。然而，

1958年大跃进中膨胀起来的浮夸风，不但未止息，反而变本加厉了。当时，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把全县粮食总产定为8．46亿斤，虚报5亿多斤。为了兑现8亿多斤总产，一场骇人听闻的反对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的斗争，就在全县展开了。

1959年11月，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开始就称反出瞒产1200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桔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年12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孚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

有的农民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

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经批准的有65人），关死的就达200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又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实际集中7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万民工，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拢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几爷子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1960年元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抄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背后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960年4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250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2至3个，住院病号6300余人，勉强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23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6个，占公社总数的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31个，组织不纯的51个，共82个，占管理区总数的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377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50%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年6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1960年8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3月平反）；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兜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作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贵州的湄潭事件比河南的信阳事件早揭露半年，两地相差一两千公

里，而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可见大一统的极权制度有何等威力！

1960年6月，在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的江口县（属铜仁地区），农民群起暴动。带头的有几个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但农民手无寸铁，很快被镇压下去。擅自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杀。这就是江口事件。此事待档案开放后核实。

在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林并没有向中央封锁消息，他向上报告了灾情，但还是缩小了严重程度。1961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对“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省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

周林在大跃进中的极左行为和造成的恶果，加上纠正左倾中的“右”为他带来了灾难。在“四清”中他成了斗争对象。

第十三章　各省饥荒纵览

一、十二省以外情况

本书前面十二章介绍了十二个省和城市的情况。这十二个省是我一一考察过、并阅读过档案资料的。还有一些省份我没有专门考察，却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这里作一些介绍。

1、黑色的贵州

在大跃进及以后的几年，贵州省是非正常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省。据公开出版物《中国人口·贵州分册》的数据计算，1959年贵州省共有1700万人口，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90万，全省平均非正常死亡率为53‰，此外还少生的120万人。这是按官方数据算的，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得多，有人说大饥荒期间贵州省饿死人150万，但无从查证。曹树基用他的方法算出贵州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

2002年12月，我应邀到云南玉溪抚仙湖一个经济论坛作演讲。会后我到云省档案馆查了几天档案。之后，我乘火车到贵阳，计划用几天时间专门查阅贵州档案。新华社贵州分社的朋友很支持我，除了我带的介绍信以外，分社又为我开具了一个用词更为恳切的介绍信。经省委办公厅同意，我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目录。不到一天时间，我就查到了我所需要看的案卷目录：目录号都是3，案卷号在括弧内：

1957年，各地农村大辩论报告（1521）；

1958年12月，周林同志在省委一届八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691）；

1958年2月，省委一次会议向中央的报告（1684）；

1958，安顺、黔南关于粮食问题的处理意见和报告（1758）；

1958，铜仁、黔南关于灾情工作的意见（1761）；

1958，各地、州委关于大办钢铁铜的意见报告（1786）；

1958，遵义、安顺关于灾情等工作的意见（1762）；

1958，中央、省委关于平息叛乱的报告（1754）；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1856）；

1959，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及批几位同志的右倾（1870）；

1959，省委批转吴肃等同志有关农村工作的报告（1964）；

1959，各地、州关于发生疾病及防止、治疗情况的报告（1970）；

1959，各地、州委关于粮食工作、粮食调运工作的请示报告（2034）；

1960，周林同志在四级干部会上的报告（2081）；

1960，四级干部会议简报（2082，2083）；

1960，省委书记处遵义会议记录，贵州人口变化统计（2118）；

1960，关于“共产风”的表现和危害（2123）；

1960，中央检查团赵方等人的报告（2125）；

1960，省监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的意见（2159）；

1960，遵义地区饥荒情况（2167）；

1960，各地、州农村饥荒情况（2169）；

1960，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的报告（2209）；

1960，公安厅关于几个地区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2215）；

1960，省工会关于劳逸结合、安排群众生活的报告（2251）；

1961，各地关于病情和防治疾病的报告（2423）；

1961，遵义地区粮食包产到户的情况报告（2452）；

1961，安顺、毕节等地食油、粮食问题的批复（2503）；

1961，张才书、杜仲文等人反映"五风"情况（2517）；

1962，公安厅关于各地治安情况报告（2616）；

1962，1960、1961、1962年上半年人口统计（2617）。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做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查档不成，朋友们安排我游览了黄果树瀑布、天生桥和贵阳市。贵州查档无功而返。我把档案号抄在上面，以后查档者也许有用。

看不到档案，我只好利用其它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写了这一段。等档案开放以后，再加以充实。

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在大饥荒期间，贵州这个很不发达的省份，却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大力推崇。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另一个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经验。这两个经验应当归功于省委书记周林。

周林，三年大饥荒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他1912年生于贵州国酒之乡怀仁。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调任贵州省副省长、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他衣锦还乡，却没有给家乡带来好处。周林在贵州主持工作期间，高举“三面红旗”，迎合毛泽东的意愿，对贵州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周林受到了批判斗争。1977年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北大期间，于1979年7月为马寅初平反。周林于1997年逝世。这说明一个干部能干坏事，也能干好事，关键在中央的路线正确与否。

1958年，贵州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数字，则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到各自所属公社的生产队，以队为计算粮食购销的单位。对农业社的定购数，以1957年农业社（户）的统购粮食数加上1958年增产部份的增购数为准，1958年比1957年增产的粮食，一般增购其22%。定购数核定后，自1958年起，5年基本不变，增产不增购。农业社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品种，在每年春耕生产以前由国家分配一次，并实行“定时、定点、定质、定量、定品种”的“五定”交接合同，使入仓工作制度化。1958年3月和8月，贵州先后召开两次财贸工作会议，确定商业“大跃进”十大纲要，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某些人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农业生产出现高指标，高估产，浮夸风，随之出现的是粮食高征购。1958年，全省夏秋粮食长势很好，一度估计产180亿斤，由于农村抽调大批劳力支援工业，使一些已经成熟的粮食丢在地里无人收，造成了丰产不能丰收。同时，城市和矿区增加非农业人口60万人，粮食需求量增长很大。因此，将粮食征购任务调增到36亿斤原粮（下同），后来粮食产量降到104.98亿斤，比1957年减产2%，而征购完成33.53亿斤，比1957年增加23.8%，人均留粮又比1957年减少35斤。

1959年和1960年，生产急剧下降，局势非常紧张，为了保证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1959年实行“多购少销”原则。采取“四快”（快收、快打、快购、快运），“四边”（边收、

边打、边购、边运）办法，打破历史惯例，在9月底前突击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向“国庆献礼”，在产量减到84.64亿斤的情况下，征购原粮仍达40.17亿斤，占产量的47.5%。1960年,产量继续减到63.23亿斤，征购则占产量的52.1%，购后人均留粮只有215斤（原粮），

降到1949年以来最低水平。

215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150斤，平均每天只有0.4斤。经过层层克扣，农民能吃到嘴里的只有2-3两粮。这还是全省的平均数，一些差的地方更少了。从粮食部的角度看，贵州省的征购数要小一些，1959年征购不是贵州省志上说的40.17亿斤，而是33.50亿斤。1960年的征购数为23.53亿斤。

表12-1 1957 - 1961年贵州省粮食情况

项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	107.1	114.5	84.8	67.77	63.5
贸易粮	93.13	99.57	73.74	58.93	55.22
征购(亿斤)	22.09	27.78	33.5	23.53	15.86
销售(亿斤)	15.14	25.53	27.08	26.33	14.25
净拥有(亿斤)	86.18	97.32	67.32	61.73	53.61
总人口(万)	1680.9	1710	1744	1643	1623.5
人均净拥有(斤)	512.7	569.12	386	375.72	330.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贵州》。

表12-1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30%为口粮。如1960 - 1961年度，人均净拥有为375.72斤，其中口粮大约有263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大约只有低于250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年7月，贵州省遵义地区几个县发现农村饿死人的问题很严重。省委在遵义召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遵义死人的事件。当时王民三正在黔西调查，突然接到电话，要他连夜赶到遵义。在经过金沙县时，县长邱继刚向他介绍了一种代食品：用榨过油以后的油菜籽饼，用冷水浸泡三小时，再晾干粉碎，蒸

成窝窝头。王民三吃了一个，发现比谷壳、麦糠好吞咽一些。榨过油后的油饼过去做肥料，现在成了好食品。他就带了几十个到遵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他摆在一张桌子上，向省委推荐。省委接受了，就在全省推广。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贵州省委还于1959年8月27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篇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的主要内容是：一，粮食问题：1，今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检查整顿，健全了制度，克服了浪费现象，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2，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秋粮征购任务，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季作物丰收；做好入仓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贯彻执行快收、快打、快购、快运的方针；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全力以赴，按时完成。二，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目前商业工作正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思想，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改善经营管理，很高服务质量，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

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每人一份，中央一级各委、各办、各部、各人民团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党组织每处数份，军委扩大会议及外事会议每人一份。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因此报较短，易于阅读，故选发各同志。以后还将选发一批。

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帽子，从而加剧了饥饿和死亡。

王民三在上引回忆中写道：1959年底，贵州正在挨饿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讲话，号召搞代食品，并介绍了北京市用槐树叶作食品的经验，采集树叶在北京形成了运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

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

1961年，省级机关干部吃粮标准由27斤降到25斤，接着又降到23斤，没有其它营养，浮肿病在干部中迅速蔓延开来。厅局负责人患浮肿病的也相当普遍。根据省委书记周林的意见，在贵阳市省府路贵阳饭店办了临时厅局长浮肿病院。，住院人数达六七十人。省里各团体也办了浮肿病院，省粮食厅大楼三楼会议室就改为病房，挤满了浮肿病患者。

1961年3月，王民三奉副省长徐健生之命去安顺察看，徐副省原来以为安顺问题不大，没听说死人的事，打算从安顺调点粮食。安顺地区地委书记孙汉章告诉他，安顺地区已死了一万多人。孙汉章对王民三说："请你务必向省委反映，安顺地区现在实在无力向上调粮食了，我们虽然没有遵义、铜仁那样严重，但势头不好。在蔡官公社，公社书记说，已经死了2600多人，还有2000多人浮肿。旧州公社拉岩小队，共有32户，已死去122人，有6户死绝，浮肿人数200多人，全家躺倒的有64户。到村外四处一看，不是十几个棺材，就是七八具没有掩埋的尸体。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

贵州办食堂的经验"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刻，1960年2月16日到18日，贵州省委召开了三天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报告是2月24日发出的，报告说：

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固定的食堂中出现了一些办得很好的，其特点是：1，巩固地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员一律参加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2，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管理；3，建立了必要的管理制度，首先是口粮管理制度，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人定量、节约归己的原则；4，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5，炊具改革很有成绩，减轻了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饭菜质量。这些办得好的食堂已经成为生产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巩固了人民公社，生产也搞得很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有的还提高了集体化程度，形成了较大的居民点，为建设新农村创造了条件。

报告说，群众热情地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　劲头高又高"。报告还煞有介事地说："还出

现了一些新情况”：1，有些办得好的食堂，由于解决了吃菜的问题，社员个人种菜已无多大必要，所以有的已把自己的一部分自留地转交给食堂（在这个报告的后部分，明确强调“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2，有些地方由于办好了食堂，有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家有了依靠，所以就纷纷集中到食堂周围。若干个小居民点，集中成一个较大的居民点，这就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个报告也谈到不固定的食堂有三种情况：一是虽然集体做饭，但做得不够吃，分给各户，推出了事；二是时办时停；三是各户单独起伙，食堂有名无实。在这些地方个别已发生外逃、肿病和死人的现象。这个报告认为“少数”食堂搞得不好的原因是“少数人把粮食霸占起来”、“所谓少数人就是富裕中农，这些地方的基层组织也处在他们把持之下。看起来，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

中共中央两天后就向各省、市、共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省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当农民期望摆脱公共食堂的桎梏自求生路的时候，贵州省委却送上了这么一份报告，深得毛泽东的欢心。经毛泽东“全国仿行，不要例外”的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　　遵义地区和毕节地区由于问题严重，曾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这两个地方曾发生“遵义事件”和“金沙事件”。由于档案还未公开，无法弄清事件真相。中纪委副主任李坚（大饥荒年代是中监委处长，曾到很多地方调查过大饥荒中的问题）给了我一份材料，即《中纪委大事记》，其中有遵义和毕节的情况。

中央监委王维舟1960年11月上旬在贵州省视察工作时听取了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李景膺、省监委副书记杨用信等人的汇报，发现遵义和毕节地区的严重问题。

1959年冬到1960年春，遵义地区曾发生大量肿病、死人的现象。1960年4月以来，遵义地委组织了5000人的医疗队给群众看病，组织机关干部20多万人帮助群众秋收冬耕，下放22万多人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但是，这个地区的病人还很多，特别是妇女病。约有36%的劳动妇女患了子宫下垂和闭经等病。非正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如正安县大阡公社，从1960年8月以来，有4000人患病，8、9两月死亡150多人。

当群众断炊、肿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的时候，遵义地委却大搞计划外的非生产性建设。建有四座大戏院、三座招待所、一座8000多平方米的服务大楼。服务大楼有跳舞厅、照相室、电梯等设备。招待所的门窗、地板是楠木和紫木制成。室内陈设着许多古玩字画、象牙雕刻、高级皮沙发、锦坐垫子等。他们为了美化街道，搞所谓“半边街”，把街道靠河边的民房全拆掉，有的居民被迫搬到山沟里去住，有的至今没有得到安置。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县也跟着学，大搞计划外非生产性建设。从1960年1月到6月，共搞计划外基建项目93个，动用国家资金400多万元。

毕节地区一些县、社干部违法乱纪和群众肿病死人情况非常严重。如金沙县，在县委书记赵广玉、书记处书记王国民的指挥下，从1959年冬起，连续搞了8个月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反瞒产私分当中，提出“四光政策”和“十大兑现”。“四光政策”是：小队以上党员干部一律撤光，破房拆光，家具搜光，灶头刮光。“十大兑现”是：凡是刮树皮、挖野菜、杀猪羊、偷庄稼、不出工、死人后戴孝埋坟堆等，都要罚款、抄家。据统计，全县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仅管理区一级干部被撤职、调离、开除、法办的就有250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69%。禹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杨某，私设监狱和劳改队，关押、劳改干部和群众1270人，其中被折磨死的124人，致残85人。这个公社人口外逃、肿病死人情况十分严重。

金沙县的浮夸、浪费现象也非常严重。从1958年以来，他们搞了一千多个“跃进组织”，把13－20岁的姑娘集中起来，从各公社抽调好房子、好地、好农具，单独成立核算单位。实际上她们根本不从事生产，成天敲锣打鼓、跳舞唱歌。有几名县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不管生产，经常带她们坐汽车到各处“参观评比”，所到之处无不唱歌跳舞、大吃大喝。仅县委书记王国民等人1960年开支的汽油费就达8000多元。

上述中纪委的材料是李景膺汇报的。李景膺的汇报并没有完全反映饥荒的严重情况。从遵义地区的湄潭县的情况可见一斑。

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贵州省湄潭县一起骇人听闻、惨不忍睹的“湄潭事件”（又称“59事件”），是一次以10多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当时湄潭县是由凤冈、余庆和湄潭三县合并而成的大县。全县总人口6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57万人。合县后除县机关仍保留行政建制外，区、镇以下均改级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全县有18个人民公社，下设136个管理区，776个大队，5901个生产队。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妨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杀人而食者达16起，吃死人的事件就更多了，无法统计。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

“湄潭事件”前，全县农村经过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许多生产队除集体饲养的几头耕牛外，其它六畜濒临绝迹，森林严惩被毁，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面临绝境。1959年粮食只收了3.22亿斤，比上年减少32.6%，其它农作物减产更为严重。然而，1958年大跃进中膨胀起来的浮夸风，不但未止息，反而变本加厉了。当时，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把全县粮食总产定为8．46亿斤，虚报5亿多斤。为了兑现8亿多斤总产，一场骇人听闻的反对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的斗争，就在全县展开了。

1959年11月，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开始就称反出瞒产1200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桔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年12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

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孚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

有的农民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经批准的有65人），关死的就达200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又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实际集中7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万民工，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拢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几爷子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1960年元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

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抄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背后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960年4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250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2至3个，住院病号6300余人，勉强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23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6个，占公社总数的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31个，组织不纯的51个，共82个，占管理区总数的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377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50%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

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年6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1960年8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3月平反）；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兜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作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贵州的湄潭事件比河南的信阳事件早揭露半年，两地相差一两千公里，而发生的情况极为相似，可见大一统的极权制度有何等威力！

1960年6月，在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的江口县（属铜仁地区），农民群起暴动。带头的有几个是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但农民手无寸铁，很快被镇压下去。擅自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杀。这就是江口事件。此事待档案开放后核实。

在贵州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林并没有向中央封锁消息，他向上报告了灾情，但还是缩小了严重程度。1961年后，周林对贵州的大饥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对“遵义、金沙、湄潭事件”做过多次检讨。在农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贵州省委还宣布荒山荒地谁种谁收，三年免征公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宽，恢复了少数民族自制传统服饰所需的“蓝靛土”、“姑娘田”、麻园等。贵州省委甚至把城镇原属于个人或集体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归还给个人和集体，一时贵州省大小城镇中，处处出现前门设店，后场设场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

周林在大跃进中的极左行为和造成的恶果，加上纠正左倾中的“右”为他带来了灾难。在“四清”中他成了斗争对象。

2、山西寿阳事件

在中共中央大跃进的号角下，中共山西省委于1958年1月向全省人民发出“鼓足干劲，猛烈跃进”的号召，指出要“彻底扫除一切消极、保守情绪”，同时对全省工业、农业方面提出了后来曾被称作保守而实际上难以完成的高指标。2月，省委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提出了“提前五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争取十年‘过长江’”的号召，生产指标层层加码，浮夸风、瞎指挥满天飞，人民公社化、食堂化瞬间实现，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小商贩、集市贸易都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取消了，从而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农业、轻工业下降，粮食极度缺乏，市场供应紧张，财政赤字严重。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国一片反右倾、鼓干劲的热潮，谁对“三面红旗”有半点疑虑，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寿阳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59年10月，晋中地委委员王之一调任寿阳县委第一书记。他上任伊始，就主持召开了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四级干部扩大会议，大搞“反右倾、鼓干劲”，并于10月29日和11月16日连续举办了基层干部和县级党员干部整风训练班，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不顾实际，对当年粮食生产的计划产量再次加码。本来，由于深翻土地搅乱熟土层，又加上旱灾，当年的计划产量15840万斤就难以完成。反而向上级谎报，当年实产为 22000万斤，而最后核实的产量只有11900万斤，仅为上报数的一半。按原计划全县当年应交征购任务9800万斤，实际完成9363万斤。这样，在上交任务后，全县实际仅留2537万斤。按16万人口计算，人均口粮仅有158斤，还不包括籽种、饲料。由于粮食出现极大亏空，王之一等人把希望寄托在挖粮上，他们怀疑生产队普遍存在瞒产私分，社员家里至少隐藏有1200万到1500万斤粮食，只要挖出这两部分粮食，就可以弥补因谎报产量而出现的亏空。不仅如此，王之一等为了“干出一番成绩来”，不顾人民的承受能力，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等为由，决定在全县集资100万元。结果各级又层层加码，最后总计集资指标竟高达418.3万元。羊头崖公社这年人均收入仅为46元，而集资任务竟每人达到50元。上湖公社收入总计80万元，而给各村分配的集资任务却高达百万元之多。于是集资有了新的内容，凡是“粮油草菜蛋、金银铜铁锡、砖瓦石头木”都在可集之列，当然，“现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座钟、衣物甚至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资的范围。宗艾村有一户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把祖坟“献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无产阶级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还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余都是祸害”的说法。

为了保证此项工作的“跃进”，以“反右倾，鼓干劲”为借口到处插“红旗”，拔“白旗”，把对他们的命令执行迟缓的人视为“白旗”，进行批斗，谁有不同意见，就给谁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帽子。广大

干部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搞浮夸者受到表彰。鼓励，实

事求是者遭到批判和打击。王之一首先在县委内部开刀，搞所谓“二张对比”，表扬了积极执行他旨意的书记处书记、宗艾公社党委书记张俊文，批判了他认为右倾的另一位书记处书记张存锐和巩佩玺，批判中采用了推拥和站板凳升级的做法，美其名曰“一看二帮”、“帮助帮助”。这种典型示范很快在全县推行开来，推人打人之风一浪高过一浪。

宗艾公社是县委书记王之一的“点”。群众拿不出所集物资和粮食，公社就派搜索队强行搜家，翻箱倒柜，挖地刨墙。有的干部私设公堂，拷打逼要，公社办公室主任王维就是一例。他把学校一座二层楼上的教室辟为斗人场所。批斗中还组织有130人的专业队（打人队），刑法多达二十余种，最常用的是“推拥”和“升级”。所谓推拥，就是一群打手围成一个圈，将“帮助”对象拥在圈内，推过来，推过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甘肃、山东称此刑罚为“炒豆子”，四川称为“炒毛芋”——本书作者注）；所谓升级，就是在桌上放张凳子，然后放砖，让“帮助”对象站上去交待，若交不出东西，就把凳子推倒，将人摔下，有的当场摔死。据统计：该公社在运动期间摔死4人，斗后死亡24人，斗后自杀19人，畏斗自杀16人，饿死24人，因缺粮造成浮肿便秘死亡69人，共计156人。

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点村。全村952人中，有 121被斗，占成年人的五分之一，致死者达36人。该村当年实产粮食66.7万斤，征购任务竟达74.9万斤。对此王维还要再加40万斤。为了完成任务，王维等人以“抵抗统购统销”、“对党欺骗隐瞒”为借口，对干部群众严刑拷打，逼要粮食，原任支书被打伤撤职后，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为新的支部书记，并和学校教师苏景云等人狼狈为奸，操纵全村运动，同时还组织起40多人的打人队。社员赵义元夫妇，被他们捆起来摔打，打坏胳膊，打掉牙齿，口鼻流血，还不罢休，最后被逼上吊自杀。在摔打副队长张信时，将张几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又用拳头猛击胸部，抓住头发在地上猛磕脑袋，张已奄奄一息，还大骂“打死你，哪里还在乎一半个人”，接着又是一阵脚踢，直至气绝身亡。苏景云还将一个生小孩刚满月的妇女，脱掉衣服拉至院里挨冻，一个干部乞求，他竟吼叫：“不怕，冻死我负责。”仅他就亲自打过86人，推打后死亡6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4人。被指定的新任支书梁某也打过82人。

这年，宗艾公社在凹儿修建一座小型水库，800多民工都是离家在外，又没有什么粮食可挖，但揪斗打人之风也十分猖獗，被斗者达121人，致死10人。这个工地上有一个“执法队”。一次，一个叫张四姐的妇女被摔打后，子宫出血不止，她央求说：“我还有一个吃奶的

孩子”，但人称“母老虎”的执法队长任某根本听不过去，还大喊大叫：“死一个算什么，死十个也没人顶。”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劳动标兵王狗小因劳累过度休息时被“母老虎”发现后活活打死。二十多岁的民工任文厚被打死后，水库派人直接将尸体拉到该家坟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许。

在“挖粮集资”运动中，死人事件接连不断，县委书记王之一等却说：“不要大惊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声称“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们经常在电话中三令五申：必须限期完成任务。所以下边蛮干的人气焰更加嚣张。叫嚷什

么“死人算什么，死是他不愿意过社会主义的关，把资产阶级思想带到棺材里去啦”！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1月被中共中央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中共山西省委查清事实后，撤销了王之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了寿阳县委、宗艾公社党委，查处了133名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追究了35名严重违法乱纪人员的法律责任，其中王维、苏景云等四人被处以死刑。对受到摧残的人员和迫害致死者的家属以及其他困难户拨专款派人上门进行安抚，集资物款退还原主，国家拨出3000万斤粮食返还农村，解决群众生活困难问题，尽力挽回极左错误造成的危害和损失。

3、广西环江事件

在大跃进以前，广西就出现了饿死人的事件。

1957年7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广西因灾死人事件给予有关党员干部处分的决定》中指出，广西省于1956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当时广西省委和有关地、县委没有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制止灾荒的发展，造成了平乐、荔浦、横县等地区农民大批逃亡和死亡的严重事件。中央决定，1、广西省委第一书记、省人委委员陈漫远，对严重自然灾害不加重视，没有及时加强救灾工作的领导，造成群众大批逃荒和死亡的严惩事件，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国务院决定撤消其人委委员的职务。2、广西省委书记、副省长郝中士（代理省长），关心群众疾苦不够，忽视灾情的严重性，没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作好救灾工作，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国务院决定撤消其副省长的职务。3、广西省委书记、副省长肖一舟，负责领导财粮工作，不认识灾情的严重性，没有领导有关部门做好救灾中粮食供应工作，使灾情严重

化，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国务院决定撤消其副省长的职务。4、平乐地委书记杨林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5、平乐地委副书记何庶民给予给予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横县县委书记薛秋水、平乐县委书记矫志周、荔浦县委书记王文陆等有关责任者都给予了党纪处分。

据中纪委李坚向本书作者介绍，广西饿死人的事情发生后，民主党派负责人反映强烈，邓小平负责处理这件事，用专机把广西的领导人接到北京作了上述处理。

事后毛泽东说："广西事件让民主党派钻了空子。"可见，毛泽东广西饿死人并没有吸取教训。广西的干部更是没有吸取教训。1958年重犯了比1957年更为严重的错误。

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环江县位于广西北部，总面积4500平方公里，居住着毛南族、壮族、水族、汉族、苗族、瑶族、侗族等多种民族。环江是个产粮食的大县，县内森林资源丰富。

1957年以前在这里任县委书记的王定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介绍了环江事件。本节资料取自此文。

1956年，全县初级社全部并为高级社，实行集体的生产和统一分配。大石山区一些居住分散的农户，为了参加集体劳动，五更前就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中已是半夜。在分配中也出现很多弊端，群众反映强烈。根据实际情况，1956年，这个县实行了"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作法。1956年11月5日，王定就此向宜山地委作了专题书面报告，地委以文件形式批转给各县委并加了按语，要各县参考，同时批准环江县可以搞试点。后来，这一方案被戴上了瓦解农业合作社、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的帽子，环江县委改组。原县委四个正副书记三个划成右派，书记王定划为"极右"。

清除了一大批"右派"分子以后，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就放开手脚"大跃进"。他们提出了"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洪华宣布，粮食产量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为了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精心策划，决定选用并蔸的办法，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已改属柳州地委）向县里暗示："……湖北三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十万斤，恐怕是放不出去的。"

根据地委亩产十万斤的意图，县里派出了县委管农业的副书记季某和农业部副部长覃某等一批人，于1958年8月22日前后，召开专门会议，8月23日开始行动。

具体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1.13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的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8月28日到30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地县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近千人，从几个生产队的一百多亩水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中并蔸。由于不分昼夜，那块田并蔸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

在并蔸过程中，为了使禾苗不倒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将田块分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方格子中。移植的禾苗不透风，就用喷雾器改成的鼓风机，由十个人轮流鼓风，昼夜不停。此外，还用纹帐将粪水过滤后，用喷水壶喷洒。

1958年9月初，环江县委向柳州地委和广西自治区党委报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10万斤的全国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广西自治区党委、柳州地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织检查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以及有关科研院所的水稻种植的专家教授。

1958年9月9日上午10时，举行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开镰仪式，收割时把田里收下的谷子一担一担地挑起排成长队，在县城的主要街道游行两圈后，再挑进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上街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从粮库里挑出的谷子跟在游行队伍后面，这样，挑谷子游行的队伍一下子就增加了两倍多。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1.13亩，当天收割了1.075亩，收到干谷140217.4斤，折合亩产130434.14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1.075亩稻田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67000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47217.4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造”的。

环江县向上汇报的数字是，1958年粮食总产量是3.3亿斤，而实际只

有1.05亿斤（这个数字也有水份）。产量高，征购也就多。1958年的征购任务是1957年的4.8倍。这么高的征购任务肯定是完不成的。于是就反瞒产私分，把农民仅有的口粮都搜罗尽了，但是催交征购粮的压力不减。到1959年春，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份死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广西自治区党委给环江批了100万斤统销粮，才免强渡过1959年上半年的饥荒。

1959年8月庐山会议以后，更加紧了反右倾保卫“三面红旗”的政治运动，新一轮高浮夸、高征购的浪潮超过了1958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粮食总产量任务是9.9亿斤，比1958年的3.3亿斤又增加了两倍，而当年实际总产量只有0.828亿斤。上级分配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亿斤（折合原粮1亿斤），超过了全县粮食总产量一千多万斤。实在没有办法，后来将原来报的粮食总产量由9.6亿斤调整为2.4亿斤，征购任务调整为0.385亿斤贸易粮。10月20日，在地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洪华报喜：已完成征购任务0.388亿斤，后来才知道实际放库只有0.1881亿斤。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广西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0.3156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当场宣布开除崖日坚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轮流斗争后还不给饭吃。在一次斗争后，这位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农村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这个县的反瞒产私分是以反右倾的政治斗争形式开展的。在会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最高的生产队为标兵，要其它生产队向这个队看齐，达不到的就算瞒产私分，就要挨批受斗。让报得多的生产队干部

去批判报得少的生产队干部，在批判时，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粮食的就要送去“小劳改”，不给饭吃。在县委书记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竟逼死13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几个不要紧。”

面对群众的灾难，有良知的人冒着危险为民请命。1959年3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要求上级到环江调查。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令分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谭被查获后，在全县轮流批斗，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为了掩盖死人真相，洪华给邮局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有的环江籍战士回家探亲，见家人饿死，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情况被封锁，得不到外界救助，饥荒愈演愈烈，因饥饿造成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下垂等病人不断增多。在1959年到1960年间，环江县到底死了多少人？没有人作过统计。1954年环江县人口15.7万人（人口普查人数），1959年全县人口已增至17万，而到1962年，全县人口只有12万人（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粗算起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这一。另有一种分析是环江县当时死亡5万人。1959年到1960年死亡率是：城关公社陈双大队为26%，付点公社中山大队为46.57%，驯乐公社康宁大队为4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全部死绝了。据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分析，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有82人，当场斗死的有15人，开枪打死的5人。全家死绝的5户。

后来，广西区党委觉察出环江县的问题，1960年3月，派出一个检查团到环江调查。洪华等极力封锁情况，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洪华指摘调查组“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年轻人无知，生活在城里，很少下乡，下来专找死人的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

县委副书记韦某腰挂手枪，威胁反映情况的人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检查组工作困难重重，检查工作无法进行。后来因环江县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人无法掩盖，广西自治区党政领导亲自到环江，调查工作才得以进行。

经调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饿死人的事实被认定。1960年6月，县委书记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1960年冬，在整风整社（有的

地方称民主革命补课）中，被揪回环江县批斗。1960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宣布开除洪华的党籍，并逮捕法办。后被判有期徒刑5年。1980年，洪华被平反。

4、中宁事件

宁夏中宁县是个小县，1958年人口只有11万，当时属甘肃省银川专员公署。1959年冬到1960年春，在全县范围内发生了因饥饿而死亡、浮肿和外逃的惨痛事件。据官方公开披露的资料，全县死亡1801人，浮肿2605人，外逃8518人。和其它地方的饥荒相比，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为什么死亡人口这么少却成为向中共中央和全国通报的“中宁事件”？我们只能对这个数字存疑。

问题还是发生在粮食方面。1957年，银川专员公署下达粮食产量计划为8553万斤，12月，在批判甘肃省副省长孙殿才的“右派反党罪行”时，中宁县委书记齐丕文称1957年粮食产量达9000万斤。县长贺锦绣提出异议，被当成右倾受到批判。实际上，1957年粮食产量只有6948万斤，完成征购任务2144万斤，占实际产量的30.8%。

1958年原定粮食计划指标为1.1亿斤，传达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的大会上，改为1.6亿斤。会上再一次批判了县长贺锦绣，并被调离，由齐丕文一人兼县委书记和县长。接着，中宁又放了两个“高产卫星”，秋收还没有结束，就上报粮食总产量达1.68亿斤。中宁县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县，齐丕文进京出席了全国农业先进代表会。实际上，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7736万斤，完成征购任务3126万斤，占总产量的40.4%。

1959年1月，全县三届二次党代会的报告中说，1958年粮食总产已达1.8亿斤，1959年要达到3.8亿－4亿斤。最后确定粮食产量计划为2.896亿斤，征购任务为7130万斤。由于偏离实际太远，7月，将两个指标下调为1.1526亿斤和4300万斤。11月中旬，自治区召开六级干部会，齐丕文率队参加。会上借反右倾运动的政治压力，强行落实粮食征购任务。渠口公社渠口大队总支书记汪金山反映粮食估产过高，征购任务难以完成。还说不少社已外出逃荒。汪受到批判，上级还给中宁县增加了105亿斤的征购任务。 12月2日到29日，县里召开五级干部会，采取追、压、斗等手段，让参加会议的社队干部交待“瞒产私分”的粮食数字。在五级干部会上。逼迫全县社队干部承认瞒产私分粮食2800万斤，让他们保证1960年春耕期间不缺口粮，不缺种子，不缺饲料。齐丕文在会上说：“种子、口粮不要考虑，先完成征购任务再说。将来没有吃的最多发生两个问题，一是造反，二是逃荒。不要怕造反，我们有的是解放军。”还威胁说：“谁完不成任务，

是党员的先开除党籍再逮捕。” 12月12日，渠口公社党委副书记陈钰被逼自杀身亡。陈钰死后，全家老小成了“反革命家属”，逃到内蒙古以乞讨为生。

1960年3月，县委干部苏忠深随县长巫克强到黄河北岸两个公社检查春播。但没有看到一个社员在地里劳动，到处都是冷冷清清。当时口粮不分给个人，社员家庭不设锅灶。1960年1月，绝大多数食堂断粮。但食堂还是社员的流动中心。苏忠深随巫克强到食堂。只见20多个社员饿得皮包骨头。看到县委干部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全都跪下，有气无力地喊：“救命，救命！”

1960年1月9日，自治区党委批转了中宁县召开五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在按语中说：“从中宁的情况来看，隐瞒私分粮食的现象是严重的，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各地应注意这一问题，把粮食工作做好。”实际上，1959年粮食总产量只有6566万斤，却完成了征购任务4973万斤，占实际产量的75.73%。

1960年3月，自治区党委在查处“中宁事件”的报告中认为，事件是由于中宁县委“拒不执行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生产、粮食、统购统销、安排社员生活、整风整社等许多指示、决定，长期隐瞒真实情况，抗拒上级检查，以整风整社为名，打击党员、干部，压制和威逼社员群众”而造成的。认为“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县委领导班子被坏人把持，是坏人做坏事”。

中宁县委彻底改组，县委书记齐丕文判处死刑，执行枪决。齐丕文被枪决的真正原因是，他有外遇，离婚不成，1959年12月23日将妻子杀死。除齐丕文以外，县委其他成员，有2人被定为坏分子，开除党籍，在处理时死去；逮捕4人，受其它处分3人。另有20多名科级干部受到处理。

5，福建省的灾难

相比较而言，福建的饥荒是比较轻的。我没有到这个省作专门考察。林强先生发表的《天灾乎？人祸乎？ - -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一文，称福建省遭受空前的灾难。下面是摘录林强先生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大跃进”的年代，福建省的“共产风”是年年刮，季季刮，边处理边刮。几乎每搞一个运动都刮“共产风”，大兴水利，大修公路，大炼钢铁，大开“万宝山”，大造林，大养猪，大办工业，大办食堂，大办学校，大搞技术革新等等，都要无偿地调劳力，占土地，拆房屋，调家

禽家畜、各种生产资料及各种农具。“共产风”是从省到生产小队层层刮，从农业到工交、财贸、文教卫生、部队，各个部门都在刮。乱用义务工，平调劳动力的情况也相当严重。连江县鳌江公社仅1960年1月至10月，县、社就调用义务工394332工（不包括已付工资的），每个劳动力平均月31.8工；宁德县六都大队1960年负担义务工6.6万工，占全队全年总工日的40%，平均每个劳力负担38工。

“大跃进”期间，福建省瞎指挥、乱指挥生产主要表现三个问题：（1）劳力使用“一边倒”，生产顾此失彼；（2）生产季节“齐步走”，不分地区、气候条件，要求进度一致；（3）生产措施“统一化”，缺乏实事求是。如闽侯县城门公社1960年入春以来全社性的统一行动就搞了4次。生产队干部说：“我们行动要随大队旗走，指东走东，指西走西。”杜国大队社员说：“现在领导生产是大队听电话，小队听指挥，社员听广播。”

由于瞎指挥、乱指挥，有的连种子也收不回来。霞浦县盐田公社公社春花生下种556担，只收回224.58担。

1958年“大跃进”时“放卫星”，浮夸离奇，1960年上半年继续“大跃进”时，浮夸之风再度盛行。从上到下，都是如此。如宁德县七都公社六都大队种麦700亩，上报1200亩；闽清县东桥公社洋头大队支部书记汇报一个小队 12个劳力一天积肥2000担，种麦20亩，深翻土30亩，切地瓜25担。社员说：“就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干部吃饱饭没事干，在家作假报告。”又说：“大跃进”是“成绩骗上级，粮食骗农民，浮夸得奖励，实事求是挨批评。”

“大跃进”期间，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也相当严重。龙岩适中公社在“大跃进”时，施用捆绑、吊、打、关、跪、停膳和批斗等手段，摧残群众1938人次，其中被摧残后自杀的有14人，伤病交加致死60人。

在大跃进期间，福建省县以上机关的官僚主义严重。突出表现为：

（1）会议多。据统计，省级机关1960年1月至3月份就召开有下边同志参加的会议266次，累计1519天、28359人；现场会议145次，累计819天、 16015人；电话会议107次，广播大会25次。

（2）临时机构多，表报、汇报多。省、地临时办公室与日俱增，且都要上下对口，都有定期的汇报制度，致使下面无暇应付。福清县干部反映：上面要材料是“一多、二急、三细、四全面”，下面的应付是“一看、二估、三推、四吹牛”，表报不仅数量多，而且项目繁杂，

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例如下发的表格中有“妇女怀孕数’、“子宫下垂数”、“尚未消灭鼠雀数”，还有“母鸡下蛋情况”等等。

（3）文件多。据南靖县统计，仅1960年第一季度就收到省级各单位下发的文件2492件，地级各单位下发的文件3134件，省地各部门下发的电报847件，县里发出文件784件。这些文件很大一部分文字冗长，质量不高，或者照抄照转，可有可无。

“大跃进”运动使福建省的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陷入了极度的困难境地。

1960年全省农业总产值只完成9.21亿元，比1957年下降了18.7%；粮食生产从1959年开始，连续3年减产。1960年全省粮食产量37.95亿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14.5%，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66亿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29.3%，甚至比1949年还低；甘蔗产量下降得更利害，1960年仅6.633亿公斤，比1957年减少近一半。

1957年全省粮食产量43.5亿公斤，1960年降到35亿公斤，3年减产8.5亿公斤，“等于4个福州没有饭吃，等于300万人没有饭吃”。对此问题，作为省委书记的叶飞，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福建省大组讨论时，作了如下检查认识：“1958年粮食估产，报得最高时达170亿斤，1959年上半年还在省人代会上作了报告。1958年11月龙岩会议是头脑最热的时候，曾提过搞万斤县、万斤省，造成的许多错误我是要负责任的。后来主席和中央发

觉有浮夸风，估产过高，几次提出要我们不要相信高指标。高估产，头脑不要发热，要压缩空气，而我们总是改不过来。对1958年粮食产量，第一次由170亿斤降为130亿斤，第二次又从130亿斤降到105亿斤，还提出‘三八线’，不能再缩了，到后来究竟多少也搞不清。”“有了高估产，才有高征购，高征购最严重的1959年，一年征购30亿斤，这是历史上最高的一次。当时决定任务的时候，有些同志不同意，我还采取了举手表决的方法，这是不对的，这个责任我要负。后来问题清楚了，那样不切实际的高征购，必然发生不良的后果。”

由于浮夸风盛行，根据虚报的高估产来确定农村粮食征购任务。福建省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年为16.8%，1959年、1960年分别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

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城乡人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人们跑步进入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饥饿。城市基本口粮供应严重不足，农民的口粮被一挖再挖，职工月粮食定量一降再降，饥饿难忍的群众只能到山里去挖野芭蕉根，采集“野猪肝”等各种野菜。野果，在池塘泥潭中捞浮藻充饥。

大饥荒使得福建省非正常死亡率上升。最严重的是龙岩地区，1960年l-11月，全区9个县185万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率1%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8644人，占全区总人口2.08%，其中最严重的武平县，非正常死亡占全县总人口的5.96%。闽东的宁德县也相当严重，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三年“大跃进”前后几年，全省平均每年正常死亡人数为11万人，而这三年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约为22万人，正常年景全省每年出生54万人，而那三年比正常年景少生了65万人。两项相加，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到87万人。经济损失约80亿元，耽误时间七八年，这就是福建三年“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和所付出的代价。

本书下篇第23章根据《中国人口.福建》中的数据计算，在大饥荒期间，福建省非正常死亡18万人，应当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为64万人。与林强先生的计算结果相近。可见，福建饿死20万人左右，少出生65万人左右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当然，在“大跃进”中，由于广大群众的艰苦劳动，也留下了一些积极后果。在“大跃进”期间，为福建地方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机械、电力、化工、燃料、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直到20世纪末，福建省许多还在发挥作用的重点基础设施就是在那时建设起来的。如古田溪水电站、鹰厦铁路、福州第二化工厂和第一化工厂、福州抗菌素厂等。三明工业城的崛起就是突出的一例。“大跃进”期间，福建省的农田水利建设也有很大发展。1959年全省在新建扩建水利工程1万多处的同时，还完成上千万立方米水库2座，总蓄水4.4亿立方米。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如今在各地仍发挥重大效益。当然，如果不发动“大跃进”运动，福建的工农业将发展更快、更好。

二、各省饥荒程度轻重不同

由于中国当时是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又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着一切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那时，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制度性的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所以，大饥荒是覆盖全国的。

因此，在这一册介绍各省的情况时，读者会发现，各省情况是那么样地相似：浮夸，多报粮食产量——在虚报产量的基础上的高征购——完不成征购任务就大搞反瞒产私分——大办公共食堂——食堂停伙——农民饥饿而死。“五风”在各地横行，“卫星”在各地升空，大办钢铁在各地都是同样荒唐。

但是，各地饥荒轻重程度有所不同，非正常死亡率因地而异。全国非正常死亡率较高的省应当是四川、安徽、甘肃、河南、山东、青海、湖南等省，较低的有山西、浙江、江西、吉林等省。就1960年死亡率而言，据各省官方统计，四川为53.97‰，河南39.60‰，贵州52.33‰，安徽68.58‰，山东23.60‰，甘肃41.30‰，青海40.73‰，湖南29.42‰等。有些省一开始灾情就很重，由于揭露得较早，到1961年就开始好转，如山东、河南等省。有的省的盖子长期捂住，继续推行大跃进的政策，饿死的人就多。如四川省，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一直到1962年还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这五年四川的死亡率为：15.17‰；46.9‰；53.9‰7；29.42‰；14.82‰。

据各省官方数据，1960年，在全国29个省级地区中，只有12个出现人口负增长。这12个省是：四川(－42.23‰)；河南(－25.59‰)；贵州(－32.4‰)；安徽(－57.23‰)；山东(－4.10‰)；甘肃(－25.80‰)；青海(－27.66‰)；云南(－2.07‰)；广西(－10.06‰)；湖南(－9.93‰)；湖北(－4.78‰)辽宁(－0.3‰，1961年)。连续四年(1958-1961)人口负增长的只有四川一个省；连续两年(1960-1961)人口负增长的有贵州、广西、青海、湖南四个省。

1960年代曾在公安部三局工作的王维志研究员给我提供的1960年各地死亡数据。这些数据是从各地报上来的材料中摘出来的。

死亡率超过20‰的县市有675个。这些县分布在12个省区：江苏48个，安徽68个，山东68个，河南63个，湖北38个，湖南64个，广西72个，四川75个，贵州43个，云南60个，甘肃53个，青海23个。

死亡率超过100‰县市有40个。其中：

安徽省11个：肥东县124.89‰，巢县101.23‰，宿县144.32‰，凤阳136.04‰，定远118.45‰，五河116.70‰，阜阳125.57‰，太和174.79‰，亳县162、38‰，宣城163.10‰，无为182.30‰。

广西一个县：环江县131.66‰。

河南省10个县：商城县224.5‰，汝南县103.24‰，新蔡县114.07‰，固始县121.85‰，遂平县110.15‰，息县169.24‰，正阳县137.68‰，上蔡县109.40‰，光山县246.77‰，唐河县100.40‰。

四川省11个县：南溪县101.37‰，资阳县117.50‰，荣县164.68‰，垫江县136.06‰，酉阳县124.81‰，秀山县138.52‰，石柱县168.12‰，乐山县100.34‰，犍为县102.88‰，沐川县107.31‰，荥经县175.41‰

贵州省4个县：桐梓县131.46‰，湄潭县240.16‰，赤水县199.20‰，金沙县188.88‰。

青海省3个县：湟中县138.36‰，正和县113.43‰，杂（朵？）多县136.10‰。

从我掌握的情况看，王维志的数据并不完全。例如，1960年死亡率超过100‰还有四川的大邑（107‰）、丰都（162‰）、郫县（175.1‰）、新津（116.3‰）、蒲江（107.9‰）等。河南淮滨的死亡率高达383.2‰。死亡率超过20‰遗漏得更多，显然不仅是王维志记载的675个。王维志记载的100‰县中，有一些是超过200‰的县，如凤阳、亳县、石柱县、荥经县等。因为王维志的数据是各省官方上报的，显然有缩小的成份。

曹树基以清代的“府”为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这可以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次行政区划的变化造成的影响。虽然我对他的方法中的某些方面有不同看法，但我认为他提出不同省份的灾情严重程度还是可供参考的。但是，我认为四川的非正常死亡率应当在安徽之上。因为四川饥饿时间最长，而安徽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缩短了饥饿时间。不管怎样，我还是将他计算出的各省非正常死亡率列表如下，供读者参考。

表14-1 曹树基计算的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省名 非正常死亡人口（万） 非正常死亡率（%） 排序

安徽 633.0 18.37 1

四川 940.2 13.07 2

贵州 174.6 10.23 3

湖南 248.6 6.81 4

甘肃 102.3 6.45 5

河南 293.9 6.12 6

广西 93.1 4.63 7

云南 80.4 4.19 8

山东 180.6 3.38 9

江苏 152.7 2.88 10

湖北 67.5 2.20 11

福建 31.3 2.02 12

辽宁 33.0 1.71 13

广东 65.7 1.71 14

黑龙江 19.0 1.21 15

河北 61.0 1.10 16

江西 18.1 1.06 17

陕西 18.7 1.02 18

吉林 12.0 0.94 19

浙江 14.1 0.55 20

山西 6.0 0.37 21

合计 3245.8 5.11

资料来源：曹树基：《大饥荒——1959 - 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第282页。

用以上数据划一个中国地图，用不同颜色标出不同的死亡率地区。此图放在此处。

（插图）可借用曹树基《大饥荒》一书中的图并据本书资料加以修订。

三、饥荒轻重不同的原因

为什么在高度集中的国度里严格执行着统一政策下，各地会出现轻重不同的差别？

李若建认为，饥荒轻重不同与各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内陆省份的饥荒重于沿海省份，山区的饥荒重于平原。

曹树基认为，近百年来各地遭受的饥荒程度不一，有些地区经历过巨大的人口死亡，有些则否。因此，关于饥荒和人口死亡，各地存留有不同的民间记忆。他认为，民间饥荒记忆强的地方，对新的饥荒的抵抗能力就强。江西在太平天国时死人最多，山西、陕西近百年内曾出现过大饥荒。在这样的省份，人们对粮食的重视，远远超过未经过饥荒地区，这一因素成功地化解了来自上级政府的高压。政府对于民间粮食的征集是有限的。所以，这些省份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时死人就少。

我认为，李若建、曹树基两位学者提出的看法值得重视。不过，我认为下面两个原因对造成地区死亡率的差别起着重要作用：

哪里的地方的官员对毛泽东的向心力越强，哪个地方的饥荒就越重

饥荒程度的轻重主要是以各省对毛泽东的政治向心力强弱不同而异。总的来说，各省的省委书记对北京，特别是对毛泽东有政治向心力的。有政治离心力的干部早被视为异端而受打击。没政治向心力的干部也早被淘汰出局。但是，各省的政治向心力的强弱是不同的。政治向心力越强的省份，饥荒程度就越重；政治向力较弱的省份，饥荒程度就相对轻一些。通俗地说，在“大跃进”中紧跟毛泽东、并且“创造性地发挥”的省委书记，这个省的灾情就重。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采

取了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那些向心力强的省委书记，认为这些政策从根本上不符合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有的在执行中大打折扣，有的拒不执行。到了1959年下半年、特别是1962年，毛泽东果然批评1959年春的让步政策，说明这些向心力强的省委书记和毛泽东心有灵犀，最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政治向心力和毛泽东距离、与官员的地位高低有关，但这些不是决定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位官员的政治态度和毛泽东的亲合程度。和毛泽东的政治态度亲合力强的干部，不管他在哪一偏远地区，不管他是省级还是县级，都会加重当地的饥荒程度。他们虽然远离北京，虽然只是县级干部，但可以直接看到《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中央文件，也可以听到中央领导人讲话的传达。所以，在省委书记的政治向心力不是很强的省份，全省总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下面也可能发生影响全国的重大事件。如山西的寿阳事件，宁夏的中宁事件，广东的罗定事件等。

对多数省份来说，都是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三面红旗"的路线和政策，但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发挥，灾情就处于中等或较轻的状态。就1960年死亡率而言，山西14.2‰，陕西12.3‰，河北15.84‰，江西16.09‰，吉林10.1‰，黑龙江10.5‰，辽宁11.5‰，江苏18.41‰，浙江11.88‰，广东15.12‰，福建15.34‰。这些省份死亡率不超过千分之二十。东北三省灾情较轻，不仅与省委书记的态度有关，也与这里的自然条件有一定的关系，这里历来是中国的粮仓。

饥荒最轻的应当是比较边远的民族自治区，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15.67‰（新疆的正常死亡率比其它省份高，如1955到1957年死亡率均为14‰以上)、内蒙古自治区(9.4‰)和西藏自治区。同属自治区，但广西壮族自治区（29.46‰）和民族自治县较多的云南省（26.26‰）的灾情重于前三个自治区。因为后两个自治区的领导干部主要是汉族干部，政治向心力强于前三者。

对毛泽东的政治向心力，除了政治态度的亲合力以外，还有由干部任免制度的原因，对形势跟得紧的干部提拔得快，不紧跟形势，不仅得不到提拔，还有政治风险。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在当时形势下，他们的行为可以分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有的事是中央有明确的规定、地方官员是非做不可的。如，粮食征购指标必须完成，人民公社必须建立，必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等。但是，对这些必须做的事，也有执行程度的不同。如征购指标可以同中央粮食部门讨价还价，也可以不顾农民死活尽可能多上交；兴修水利和大炼钢铁可以量力而行，也可以不顾条件地劳民伤财。在这

些非做不可的事中，也有一定的弹性。地方官员可以激进些，也可以保守一些。显然，激进还是保守，对地方官员的仕途是有影响的。

其二，有的事虽然中央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当时的强大政治压力和舆论背景下，不做是有政治风险的，多数官员随大流。如中央要求各地高速度发展工农业和各项事业，但速度多高，地方官员是有决定权的。由于速度定得过低有右倾危险，所以多数官员宁可选择高速度；又如大办公共食堂，开始中央强调社员自愿参加，但中央向全国发布统计，报道各省在食堂吃饭的社员占全体社员的比例，为了不落后其它省，就只好剥夺社员“自愿”的权利。

其三，有些事中央没有要求这样做，但社会上有一股风，报刊不停地造势。社会上的风可以不跟，报刊上的话也不一定非听不可。但是，跟风可以得到先进，不跟风可能被说成落后。如高产放卫星，农民在食堂吃饭的比例，人民公社的规模大小等。

其四，在对饥荒的反应方面，地方官员也有不同的态度。当粮食已经严重不足时，是不顾农民死活继续完成征购任务、还是要求中央减少征购指标？灾难出现以后，是缩小或隐瞒灾情，还是如实上报、争取中央帮助？当发现食堂给农民带来灾难时，是形式上保留食堂、实际上给农民以生火做饭的权利，还是坚持办食堂？农民在死亡的边缘时，敢不敢开仓放粮救济灾民? 对农民自发的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自救措施，是坚决反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支持？这一切，是依地方官员政治态度而异，依地方官员素质高低而异，也是对地方官员人性和良知的考验。只有那些和毛泽东向心力最强的地方官员，才会不顾人性和良知。

山东省昌乐县县委书记王永成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山东省是饿死人较多的省份之一，而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山东省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1959年，山东省昌潍地委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并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到昌乐后首先到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鬃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那—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低，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18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他们划少小队的户数。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20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20户。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5%至7%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7%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

哪个地方粮食征购多、返销少，哪个地方的饥荒就重

1962年8月粮食部计划司的统计表，记录了大饥荒年代各省的粮食产量（表14-2）、征购数（表14-3）和销售数（表14-4），利用这个资料，再利用《中国人口》一书中各省人口数字，可以计算出各省人均拥有粮食数。

表14-2 大饥荒年代粮食（原粮）产量 单位：亿斤

地区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全国	3639	3980	3400	2881	2677

华北区 532.1 409.3 362.4 269.91 284.27

北京 15.7 17.7 11.6 11.04 12.16

河北 182 201 181 146.5 131.97

天津 4.2 3.1 3.5 1.96 2.35

山西 71.1 92.5 81.3 67.41 69.79

内蒙 59.1 95 85 70 68

东北区 338.4 421 394 259.8 289.4

辽宁 117.4 140 126 69.8 81.4

吉林 86 105 108 80 88

黑龙江 133 176 160 110 100

华东区 1052.2 1111.4 973.7 867.99 806.87

上海 20.4 23.2 21.9 23.2 21.97

江苏 220 230 201.8 195 180

浙江 145 157 155 129 125

安徽 204 184 147 150.48 121.75

江西 132 135 125 122.08 118.15

福建 88.7 95.2 80 65.8 60

山东 242.1 287 243 182.34 180

中南区 1002.4 1068.1 887.7 785.9 721.2

广东 229 235 193 190 195

广西 105 106 101 92 88

湖北 196 200 154 158 134

湖南 226 245 221.7 160 160

河南 246 281 217.6 185.9 144.2

西南区 693.8 720.3 555.5 488.9 423.83

四川 465.1 495 368.3 323.9 260

云南 121.6 110.8 102.4 97.23 100.33

贵州 107.1 114.5 84.8 67.77 63.5

西北区 222.3 249.9 226.7 182.13 171.9

陕西 88.8 107.5 97.8 83.1 74.5

甘肃 74.5 76.6 64.9 41.39 45

青海 11.7 11.3 9.9 8.2 7.3

新疆 36.3 40.6 41.4 40.34 36

宁夏 11 13.9 12.7 9.1 9.1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表14-3 大饥荒年代各粮食年度粮食（贸易粮）征购数 单位：亿斤

地区 1957 - 58年 1958 - 59年 1959 - 60年 1960 - 61年 1961 - 62年

全国 920.11 1125.44 1214.29 780.84 679.14

华北区 80.48 124.4 137.82 72.71 75.33

北京 4.31 4.22 2.9 1.21 2.09

河北 43.11 64.36 71.54 31.51 32.51

天津 2.43 1.75 2.09 1.18 1.35

山西 14.4 26.39 29.33 15.32 17.95

内蒙 16.23 27.68 31.96 23.49 21.43

东北区 116.11 174.55 193.36 131.66 109.83

辽宁 26.13 39.71 44.4 25.09 25.77

吉林 29.58 49.61 51.77 44.56 38.61

黑龙江 60.4 85.23 97.19 62.02 45.45

华东区 286.4 304.72 336.72 215.93 198.84

上海 8.26 8.78 10.08 6.96 7.69

江苏 65.69 74.52 74.26 58.76 44.05

浙江 42.41 47.69 53.26 32.99 32.97

安徽 68.42 58.47 57.09 35.06 25.68

江西 30.74 33.21 41.28 35.25 30.97

福建 19.94 20.23 26.06 17.34 14.53

山东 51.04 61.82 74.69 29.57 42.95

中南区 229.26 281.36 273.81 176.56 147.31

广东 50.81 48.97 61.09 47.76 42.09

广西 18.89 22.8 29.81 21.5 17.85

湖北 49.97 56.64 55.43 45.71 33.74

湖南 45.7 53.18 59.83 35.01 31.01

河南 63.89 99.79 67.65 26.58 22.62

西南区 153.12 171.58 189.58 138.48 101.47

四川 110.88 121.58 129.28 95.37 65.57

云南 20.15 22.22 26.8 19.56 20.04

贵州 22.09 27.78 33.5 23.53 15.86

西北区 54.74 68.83 83 45.52 46.36

陕西 21.98 24.27 30.78 13.72 22.32

甘肃 16.91 22.2 25.09 12.34 9.65

青海 3.1 4.47 5.2 3.59 1.64

新疆 9.19 13.33 16.59 13.13 10.17

宁夏 3.56 4.56 5.34 2.74 2.58

资料来源：同表14-2。

表14-4 大饥荒年代各粮食年度粮食（贸易粮）销售情况 单位：亿斤

地区 1957 - 58年 1958 - 59年 1959 - 60年 1960 - 61年 1961 - 62年

全国 842.09 1052.01 1119.13 836.97 736.32

华北区 123.24 150.62 166.05 128.87 109.85

北京 19.99 24.93 29.53 23.96 22.75

河北 52.8 64.01 66.06 43.62 36.98

天津 15.32 19.32 19.8 17.21 16.38

山西 20.17 23.6 27.85 21.47 17.33

内蒙 14.96 18.76 22.81 22.61 16.41

东北区 120.31 136.23 156.59 153.13 128.98

辽宁 55.28 58.13 67.75 62.38 54.27

吉林 26.27 32.34 33.36 35.32 30.61

黑龙江 38.76 45.76 55.48 55.43 44.1

华东区 267.57 326.85 326.61 237.23 203.71

上海 32.63 36.65 40.14 34.55 34.09

江苏 63.82 70.56 73.14 49.41 40.7

浙江 34.48 42.23 43.81 31.66 26.9

安徽 40.95 59.1 50.67 32.44 23.16

江西 22.61 25.77 28.48 26.42 21.7

福建 17.42 21.12 23.64 17.31 16.23

山东 55.66 71.42 66.73 45.44 40.93

中南区 193.44 234.62 249.37 175.32 145.05

广东 47.3 49.28 54.15 45.04 37.52

广西 20.88 22.38 23.76 18.1 15.93

湖北 44.95 51.68 53.17 39.77 32.66

湖南 34.04 37.79 45.09 32.13 27.61

河南 46.27 73.49 73.2 40.28 31.27

西南区 92.08 143.05 152.85 133.55 100.15

四川 59.09 92.7 101.37 87.43 69.68

云南 17.85 24.82 24.2 19.79 16.22

贵州 15.14 25.53 27.08 26.33 14.25

西北区 45.45 60.64 67.86 58.87 44.02

陕西 18.03 20.53 22.8 19.77 17.83

甘肃 13.08 20.38 19.27 17.94 10.75

青海 3.48 5.08 5.96 4.97 3.27

新疆 8.72 11.19 16.07 13.5 9.87

宁夏 2.14 3.46 3.76 2.69 2.3

资料来源：同表14-2。

农民生产出粮食以后，除了上交农业税（征收粮食）以外，农民留足了口粮、种子和饲料以后就是余粮。统购统销以后，国家规定，余粮必须全部卖给国家（即收购）。征收和收购两项加在一起，称为“征购”。但实际上，收购的不是农民的余粮，而是按国家的需要分摊到各省。把农民的口粮、种子和饲料也当作“余粮”收购了。最后还不得不返销给农民一部分。

国家每年通过征购把粮食集中到国库，再从国库向外销售。从粮食部的角度看，前者为收入，后者为支出，收入减支出就是库存。从各省的角度来看，征购是支出，销售是收入，产量减去征购加上销售就是省里可以支配的粮食。

我们用表14-2、表14-3和表14-4中的数据，计算出各省可以支配的粮食。为了使于省际比较，我们再算出各省人均可支配的粮食。

计算有两点说明：其一，《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原粮，征购和销售是贸易粮，为了便于比较，将原粮数换算成贸易粮（原粮数除以1.15即是）。其二，此表中的（产量 - 征购 + 销售），即为当年某省的粮食净拥有数。但是，《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生产年度（当年1月 - 12月），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当年7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例如，1958年安徽省粮食是量184.00（原粮），是当年夏收和秋收之和。而1958 - 1959粮食年度，所对应的产量是1958年的秋收与1959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计算出来的某省各年粮食净拥有量是一个近似数。差别是，计算中用下一年的夏收代替上一年的夏收。由于夏收在总产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所以误差不是很大。

表14-5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30%为口粮。这个人均口粮是全省城乡平均数，由于压农村、保城市，农民人均口粮比这个数少得多。再加上层层克扣，农民吃到口里就更少了。不过，虽然1961 - 1962年度数字最小，但这时很多地方放开了政策（包产到户，三边地），农民实际掌握的粮食比前三年要多。

表14-5 大饥荒年代各省人均可以支配的粮食（贸易粮） 单位：斤

地区	1957年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河北	457.62	467.35	400.68	369.13	426.58

山西 426.03 478.76 415.34 379.93 351.28

内蒙 535.47 747.29 609.51 503.65 465.22

辽宁 547.86 573.25 531.30 382.85 394.08

吉林 572.63 577.95 575.02 431.82 484.48

黑龙江 635.63 726.15 579.19 492.86 473.24

江苏 452.86 460.40 406.41 377.34 360.99

浙江 472.02 511.25 482.35 423.55 385.36

安徽 446.72 468.76 352.37 414.21 345.92

江西 576.03 574.78 485.33 486.26 466.73

福建 513.67 560.27 435.19 363.67 337.15

山东 400.41 477.99 378.45 366.22 293.45

广东 544.51 557.38 430.28 429.25 432.24

广西 434.59 419.69 370.84 352.66 345.50

湖北 539.71 536.91 433.79 417.01 362.68

湖南 513.19 539.14 482.24 379.91 386.92

河南 405.56 441.13 391.18 363.69 277.52

四川 507.75 567.08 413.05 396.84 356.12

云南 553.22 516.84 452.13 447.48 441.14

贵州 512.70 569.12 386.00 375.72 330.20

陕西 406.38 489.14 409.68 402.83 306.20

甘肃 485.63 505.51 391.46 334.31 332.25

青海 515.54 464.00 360.40 342.25 377.40

资料来源：表14-2、表14-3、表14-4和《中国人口》一书各省人口数据计算。

我将表14-5中1959－1960粮食年度和1960－1961粮食年度，人均拥有粮食420斤以下（即人均口粮大约294斤以下）用黑体字标了出来（1961－1962年度，由于有了自留地、小开荒和部分地区包产到户，国家掌握的粮食数字可能低于农民实际拥有粮食数字，所以不作为依据）。

1959年、1960年连续两年人均拥有粮食420斤以下省份是：河北省（400.6斤；369.13斤）、山西省（415.34斤；379.93斤）、江苏省（406.41斤；377.34斤）、安徽省（352.37斤；414.21斤）、山东省（378.45斤；366.22斤）、河南省（391.18斤；363.69斤）、四川省（413.05斤；396.84斤）、贵州省（386.00斤；375.72斤）、甘肃省（391.46斤；334.31斤）、青海省（360.40斤；342.25斤）。

从1959年和1960年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那些饥荒比较严重的省份和人均拥有粮食420斤以下的省份绝大部分是重叠的，如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贵州省、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另外还有湖北、湖南、福建三省仅1960年人均拥有粮食低于420斤，饥荒也较严重，但比上述10个省轻一些。饥荒严重程度与人均拥有粮食数也有不重叠的情况。如江苏、河北、山西三省，人均拥有粮食也很低，当然也有饥荒，但其严重程度远不如前面几个省。这说明，人均拥有粮食是造成饥荒最基本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其它原因有：政策上是不是允许农民靠自己寻找食品，即对自留地、三边地的放宽程度；水利工程是不是太多，是否过度超过农民的体力支出；是坚持办公共食堂还是允许农民回家做饭等。这些都与对毛泽东的向心力的强弱相关。

第十四章　大饥荒年间的城市生活

在中国计划经济制度下，城乡分割，城镇居民和农民是身份不同、待遇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两个社会群体。国家计划部门每年根据预计粮食产量安排下一年度粮食收支的“盘子”。“收”是指从农民那里征购的粮食和进口粮食，“支”是指城镇居民口粮、农村非产粮人口用粮、工业用粮、出口和军事用粮，收入减支出就是粮食库存。中央政权对粮食库存十分重视。由于“收”过了头（即征购了过头粮），在“支”中还包括“返销”给农民的口粮。“支”有强大的刚性，除了农民的口粮以

外，是很难压缩的。政府安排的顺序是，先保证了粮食支出以后，再考虑留给农民多少口粮。由于“支出”盘子太大，所以经常在农民那里征购“过头粮”。为了保证收支平衡，政府强迫农民做出最大的牺牲。所以，在大饥荒期间，饿死的都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一、城镇的粮食供应

那么，能够享受粮食定量保证的城镇居民的生活怎么样呢？普通人是按劳动强度大小不同来确定粮食定量指标的，高级干部和极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则是按权力等级享受特殊供应的。权力层次不同，享受的供应水平不同。广大普通市民，虽然不会饿死，但只能处于半饥半饱状态。

表13-1 大饥荒时期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数（贸易粮：亿斤）

	57-58	58 - 59	59 - 60	60 - 61	61 - 62
全年	422.43	546.82	592.65	524.89	467.87
下半年	211.86	257.38	281.30	266.61	233.66
三季度	105.40	113.97	136.80	142.87	11.44
七月	34.64	36.13	43.97	49.24	40.30
八月	34.87	37.19	44.55	47.44	39.15
九月	35.92	40.61	48.28	46.19	38.99
四季度	108.46	143.45	144.58	123.74	115.22
十月	34.09	43.99	44.20	40.17	35.78
十一月	34.94	46.14	46.60	39.42	36.91
十二月	37.43	53.32	53.76	44.15	42.53
上半年	210.57	289.44	311.35	258.28	234.21
一季度	101.04	146.15	152.69	125.22	117.06

一月 34.36 53.35 53.05 41.22 42.78

二月 31.14 41.84 46.33 39.47 32.12

三月 35.54 50.96 53.31 44.53 42.16

二季度 109.53 143.29 158.60 133.06 117.15

四月 36.23 50.63 54.90 44.44 40.61

五月 36.80 47.87 52.74 44.20 39.49

六月 36.50 44.79 50.96 44.42 37.05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从表13-1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按月份看，每月向城镇供应的数量大体是均衡的，这和国家向农村供应的粮食随月份变化有所不同（见本书“粮食问题”章）。其二，后几个粮食年度国家向城镇供应的粮食比1957 - 1958年度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城市副食品供应减少的原因。其三，1960 - 1961，1961 - 1962国家向城镇销售的粮食大大减少，其原因一是2000多万城镇人口被赶向了农村，二是城镇人口粮食定量减少。

二、城市和农村有一个时差

除个别地方外，农村的饥荒最早发生在1958年冬天。而城市的饥饿发生在1959年的下半年，时差大约有10个月。农村情况好转大约在1961年秋后，城市生活好转在1962年下半年，时差大约1年。1960年9月从我县城中学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到北京前，我已经饿了20个月了。入校以后，比我高一班的同学说，1959年学校的伙食还很好，饭能吃饱，菜的质量也很好，有鱼有肉。当我们进校时，就只能半饥半饱了。1962年，农村自由市场可以不要粮票买到价格较高的食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不行。一般人经历的大饥荒是三年，而我们这些1960年从农村考入大学的人，却经历了四五年的大饥荒。

粮食在农村下场到国家征购，再由国家粮库进入城市居民的厨房，需要一段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政策是由城市人制定的，农村出现了饥荒，城市制定政策的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和农村的经济本

来是一体的，想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是不可能的。但是，城市人的种种努力，可以稍微延迟城市饥荒的到来。所以，城市的饥荒相对农村而言，有一个时间滞后，简称为“时滞”。1958年冬和1959年秋，农村大饥荒来临的时候，由于时滞效应，城市还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寻找食品充饥。四川作家东夫先生在他的记实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 - 川西大跃进纪实》中，记录了当时成都市周围的农民涌入成都的一幕：

1959年春天开始，富甲天下的川西坝子的农民开始大批流亡。7月，一次更大规模的流亡席卷川西坝子，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餐馆、糖果铺挤满了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多则十数万人，他们有的提着几个鸡蛋，或一只鸡、鸭，想给城里人换点粮食，有的背着个小包袱，寻求招雇，更多的人则是两手空空，只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统计，7月20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53428人次，“挤购糖果”的7850人次。少得可怜的馆子其拥挤程度从以下的统计中可见一斑；7月20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3528人次，竹林小餐2706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2100人次，7月21日，香雪海饭店3331人次，竟成园4658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挡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1400斤，糖果400斤，面包800多个，蔬菜2000斤，煤油20斤……

由于进入成都市的十之八九是温江专区的农民。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联合成立“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共同采取措施阻止农民进城。地委采取的措施是：各县各公社严格清点人数，保证“不走一个”，个别确有事需进城的，须经公社批准并出具介绍信；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严加管理，一律不得进城；对夏征未完成、又停伙又放人进城的社队，查清情况严加处理；在靠近成都的场、镇设立检查站，“制止、挡回”进城农民。成都市采取的措施是：动员户籍员、饮食糖果业服务员、居民积极分子“全线出击”，劝说农民返乡；限制饮食糖果业供应时间和数量，饭菜不许出堂；白吃不给钱者加以“处理”，公安部门加强对旅馆、街头巡逻；农民所带鸡、鸡蛋等必须进入市场按规定价格出售，用粮食交换鸡、蛋者，买卖双方均予处罚……

农民有自发进城的，也有基层干部支持出走的。有的社队给社员出具外出证明：“兹证明×××等到成都支援各厂运输”，“该人身体条件差，不适应农村劳动，同意到成都市擦皮鞋”云云。

北京也发生过类似成都的情况。不过，作为首都，是全国保证的重点，非到不得已的时候才出现饥饿的情况。所以，北京的“时滞”到

1959年底，比它周围的天津、保定、石家庄还要晚两个月。据记载，“1959年底，北京周边城市（天津、保定、石家庄）在大小饭馆已经实行了就餐收粮票制度，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到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的早餐队，早餐后又排午餐队，午餐后又排晚餐队，晚餐后又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

到1959年底，农村和城市的饥荒“时滞”消失，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起来，再没有农民进大批入城市了。从此以后，农村和城市的饥饿同步，但饥饿程度农村甚于城市。到了1961年秋冬天，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与1959年上半年方向相反的“时滞”。

由于农村一度放松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大部分省份给农民以自留地，允许农民开荒种“十边地”，再加上相当一部分地区实行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农村粮食多了起来。到了1961年秋冬，大部分省的农村情况开始好转，而城市好转的时间滞后。此时，城市居民反而羡慕农村了。

据1962年8月20日粮食部办公厅编《粮食工作简报》第28期报道，不少地方粮食市场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多到少，出现“剩市”。河南省鲁山县每天平均上市2000多斤，长葛县每天上市5000多斤，叶县和商丘每天上市1万多斤。四川温江县双流镇每场上市3千－5千斤，成交70%－80%。山东郯县城关每天上市瓜2万多斤，成交50%。各地副食品、代食品上市量也大，而且花色全，品种多。河北省粮食工作座谈会分析，卖粮的80%是社员，10%是生产队，10%是商贩；买粮的50%是缺粮户和灾民，15%是城镇的非农业人口，20%是买生卖熟的，10%是商贩。四川金堂县调查，卖粮的60%是生产队，40%是社员；买粮的70%是农村人口，30%是城镇人口。1962年，安徽合肥市22个自由市场中，平均每天上市粮食3200多斤，80%是商贩卖的，农民占13%，生产队占7%。

为什么要卖粮？这期《粮食工作简报》上说：四川温江调查，社员卖粮的原因：购买猪仔；购买农具；家有病人或其它急用钱；有的户分到超产油或奖励工业券需要钱买。生产队为什么卖粮食？江苏省兴化县的调查结果是：修理农船、买农具、化肥、农药。不管是农户还是生产队，卖粮不是粮食富裕，而是挤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能挤出点粮食卖，说明情况比前两年好。

农村粮食市场是1960年以后才开放的，当时是作为解决饥荒问题的一个暂时措施。这与开放自留地是配套的政策。那时自由市场上农产的

价格很高。城市里流传民谣："城里一个八级工，顶不上农村一捆葱"。

城市和农村情况好转的时间差，引诱不少工人私自离厂，希望到农村去吃得更饱一些。1961年4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谷牧和经委的几个干部到石钢、京西煤矿、龙烟钢铁公司考察时发现了这一情况。龙烟钢铁公司在1960年一年共跑了2800多名工人，1961年1月到4月上旬就跑了1700多人。1961年私自离厂的工人逐月增加，1月跑了327人，2月跑了468人，3月跑了558人，4月上旬10天就跑了423人。石钢1961年1到4月上旬就跑了845个工人。在工人当中，对于自留地、自由市场兴趣很大。在生产时间，只要组长不在，工人就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说某某回家后既有了自留地，还可以搞自由市场活动。工人说，在厂里干一个月挣的钱，不如在自由市场上卖几条鱼、几十斤萝卜、几十个鸡蛋。谷牧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并作为中央文件转发。无独有偶，196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也向东三省发了《东北局关于稳定工人队伍的通知》，通知说，"最近，据各地反映，厂矿企业特别是煤矿工人自动离厂离矿的情况十分严重，对生产影响很大。"辽宁省各煤矿自春节到四月底，工人自动离矿人数达9100多人。黑龙江省各矿1月到4月20日，离矿工人达7399人。吉林省仅通化煤矿四月份离矿工人就达700多人。从3月29日到4月27日，鞍钢运输部就有142名运输工人自动离职。

在这种逆向"时滞"面前，城市里的机关、学校、厂矿、部队在农村大搞副食品基地，即在农村建一个小型农场。在这些基地上获得农副产品，以补食品的不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以吉林省为例，1960年以来，有些厂不仅粮食短缺，还因原料和燃料不足，处于半停产状态。虽然精简了一批工人到农村，还有一些闲置劳动力。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一些大企业开始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据12个大企业的初步统计，到1961年底，已办起了30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共有耕地21705亩，收获饲料、粮食127.4万斤，蔬菜253.4万斤，养猪4632头、牛659头（其中奶牛492头）、羊1066只，鸡38600多只。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过去职工保健牛奶全靠市里供应，经常得不到满足，现在已能自给。还组织有职业病和体弱的职工到农副业基地边劳动、边休养，对于恢复健康效果很好。当然，在建基地时，无偿地或很少报酬调用公社的土地、车马、劳动力。这时又刮起一股新的"共产风"，靠粮食定量吃饭的强势群体，"共"弱势群体农民的"产"。由于这些基地有侵占农民利益的倾向，有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下令制止。例如，1961年4月17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严格制止各事业企业单位擅自占用公社和耕地的紧急通报》。通报说，"省

委认为，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学校等部门，利用工余时间，种植蔬菜，大搞副食品生产，争取自给或部分自给，对于这种积极性，应当加以鼓励和支持。”但是，必须注意几点：不得雇用工人或调动人民公社的劳动力；土地自己开荒，不能占用公社的耕地；工具、种子、畜力、肥料自己解决，或与公社等价交换，不能从农村搞平调。

森林工业、矿山、铁路等系统，有的组织职工家属进行自给性农副业生产，以弥补国家供应不足，改善职工生活。1962年6月，周恩来到吉林视察时，要求吉林省委对这件事进行一次调查。1962年11月9日，吉林省委向“中央、东北局、并总理”提供了调查报告。报告说，在职工家属中，能够参加农业劳动的只占家属总人口的6% - 10%。这两年职工家庭小片荒地80%是职工本人耕种的。有的因耕地过多，已严重影响工业生产。据通化矿务局反映，在农忙时，井下工人工时利用率仅达四个半小时，今年春耕时期，因工人种地，出勤率一度由85%降到75%。工人说：“上班留点劲，下班好种地”，“星期五心长草，星期六往家跑，星期天大突击，一干干到星期一”。

上述报告说，森林工业搞农副业生产最大的问题是与林争地。据晖江市三个林业局统计，这几年开荒种地占用林地和采伐基地达51.9万亩，占三个局总面积的10.3%。许多生产队和职工家属为了生产粮食，不惜毁林开荒。景山林场职工家属开荒的300多亩的小片地中，属于毁林开荒的占13%。开荒种粮也破坏水土保持，开荒的小片地不少是在河岸两旁30 - 50米内的土地。职工开荒种粮与农民争地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对城市居民来说，除了吃不饱以外，精简下放是对不少家庭的另一种威胁。有些本来是来自农村因吃不饱是自愿回乡的，但相当多的家庭还是不愿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城市。1961年5月到1962年6月，城市下乡人口共1800万人，减少职工1700万人。城乡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了2000万人。当然，精简下放的对象主要是1958年招工的农民。但是，城镇里出身不好的，受到种种处分的，没有固定工作的，也随之下放到农村。1962年，流传着一首民谣：“嫁军官，怕打仗；嫁干部，怕下放；嫁工人，怕定量；嫁个农民吃得胖”。当时中印边界战争刚打不久，怕打仗也是部分军人家属的一种思想状况。

三、靠国家粮食定量生活的城市居民

自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城镇居民的口粮按人口定量供应。进入大饥荒年代，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一压再压。1960年9月7日，中央向各省

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9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李先念在这个会议上讲话说：“1.3亿城市人口上一年度销售了590亿斤粮食。今年七月北戴河会议上经各省要求确定今年销售620亿斤，为此总理作了检讨。现在看来只能销售540亿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压低口粮标准。在上年度全国平均每人29.5斤标准的基础上，再压2斤。毛主席讲：为什么不压3斤？为什么不压4斤？如果按全国平均29.5斤，再压3斤也对，再压4斤也对。当然，主席讲的是问题的精神。这一措施如果搞好了，按10个月算，就可以节约15.6亿斤粮食。”

表13-2 35个大中城市居民口粮定量水平（斤） 1960年11月4日

定量水平	定量初期	压缩前	压缩后
平均定量水平	25.34	28.45	26.83
特重体力劳动	51.18	50.97	47.79
重体力劳动	41.09	41.52	39.00
轻体力劳动	32.06	33.41	31.40
职工及脑力劳动者	28.88	29.96	27.52
大、中学生	32.00	33.36	31.14
一般居民	25.80	28.87	25.78
儿童	13.20	14.40	14.19
其它	31.66	39.10	31.66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1963年粮食形势开始好转，城市居民粮食定量有所提高，但水平还是很低，详见表13-3。

表13-3 1963年8月份40个城市居民口粮定量（市斤）

平均定量水平	26.55	大、中学生	31.83
特重体力劳动	50.46	10岁以上	26.52

重体力劳动 39.98 6 - 10岁 22.59

轻体力劳动 32.47 3 - 6岁 16.09

职工及脑力劳动者 29.03 3岁以下 8.91

资料来源：同表13-2。

在今天看来，30斤左右的粮食，应当是够吃的。但在当年，每人每月2两油，一年吃不到两次肉，没有蛋，其它副食也很少，这点粮食是城市居民主要热量来源。表13-2中的数据是粮食部公布的，实际上，各地为了“留有余地”，都相应地减少了粮食定量。例如鞍山钢铁公司轻体力劳动的定量只有27．5斤。

在定量中供应的相当一部分是红薯。1957年9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10%，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它地方搭配红薯比例更大一些。进入大饥荒时期以后，红薯的比例提高了。

工矿企业由于粮食很紧张，工人闹粮事件时有出现。1960年五六月份以来，辽宁省的工业生产一直上不去，主要是因为闹粮问题。辽宁省委工业部10月24日《关于在职工中迅速开展一次粮食问题的思想教育运动的报告》中反映：“闹粮原因有三：一是人们心理紧张，二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影响，三是五类分子趁机造谣生事。解决粮食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政治挂帅，以增产节约为目的，对粮食问题进行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凡是采用这一办法的，粮食问题都解决了。锦州市401厂原有85%的职工闹粮或同情闹粮，经过教育辩论后，反而压缩了9000余斤定量，没有一个人再喊粮不够吃。”辽宁闹粮，到底怎么闹，闹到什么程度，报告没有提及。但报告中提供了一个信息：闹粮是靠政治压力平息的。把闹粮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归结为“五类分子的造谣生事，大辩论，说闹粮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在这样政治高压下，谁敢再闹？工人闹来闹去，不仅粮食没有增加，反而定量减少了，看你还闹不闹！12月30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锦州的经验很好，可以在工矿企业中推行。机关、学校、部队也可推行。请各组同志讨论一下。”

401厂的闹粮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和中共中央宣部副部长周扬说：“一方面对广大职工进行了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对少数闹得特别厉

害的人在小组会上进行了辩论，逮捕了三个进行政治破坏活动的分子；另一方面加强了食堂工作，解决了贪污、浪费和用粮无计划等问题。”看来，逮捕三人具有很大的震慑力量。毛泽东于1961年1月10日，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值得推广，但要解决一些实际上的问题”。

在鞍山钢铁公司，由于社会上的“闹粮风”对职工家属影响很大。据分析，在闹粮中，能够顶得住的约占职工家属的25% - 30%；在闹粮中表现动摇、情绪不正常的占职工家属的60% - 65%；在闹粮中闹得最凶的占10%左右。闹得凶的家属故意刁难职工，回家只叫喝稀粥，骂他们是“熊包”，甚至不给饭吃。挑唆鼓励职工到工厂去闹粮。有的说，“共产党好，肚子吃不饱”，“人民公社好，把人饿跑了”，“生产大跃进，啥也没有了”，“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为此，鞍山市在职工当中开展了“以粮食为中心的思想教育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发动出身贫苦的“忆苦思甜”：“看看旧社会穷人的下场。在旧社会哪个穷人一个月能吃上二十七斤半？”同时找一些出身不好的典型作为辩论对象。如第二炼钢厂铸锭车间工人祝守义的老婆何秀英，伪满时期是一个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在闹粮中她编了一首打油诗：“二十七斤半，饿得冒虚汗，上楼腿打颤，有钱也完蛋”。铸工车间就组织全体家属对她“辩论”，她不得不认错。这种辩论会实际上是批判会，斗争会。

由于营养不足，城镇居民浮肿问题也相当严重。城市的幼儿也严重的营养不良。1962年6月，成都市在机关、厂矿、街道的9个托儿所所中检查了572个幼儿，缺乏营养的占18.8%，患佝偻病的占5%。重庆比成都更为严重，托儿所的患病率达9.4%，街道幼儿园的幼儿发病率达40%，有的已双目失明，死亡率也高。

城市里饿死的人很少，但由于营养不良。人口出生率也大幅度下降，一些该出生的人口没有出生。用《中国人口》所提供的数据计算，在大饥荒几年间，京津沪三大城市非正常死亡总共不到9万人，而少出生人口总共为28.57万人。

四、高级干部特需供应

和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不同，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和著名高级知识分子，却有合法的特殊照顾。能受到照顾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受惠最多的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名义下享受特需供应。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现把它摘要转发，希望各地参照执行。”中共中央在转发时，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几个字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需供应”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妒羡的词语。齐燕铭报告的内容摘要如下：

特殊供应办法，分为以下三类（自11月起根据中央指示，党内以下标准再减半，纸烟不减）：

第一类，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

第二类，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鸡蛋3斤。

第三类，全国人大在京的党外代表和全国政协在京的党外委员，国务院各部委党的正、副司局长和党外的国务院参事，各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十一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级烟两条，鸡蛋2斤。

根据上述规定，应当确定第二类和第三类照顾人员名单，各部门应分别报经国家机关党委、中直党委审查送国务院批准后，按照名单供应。

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的按语中还有有这样一段话：“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不宜不分党内外，笼统地规定某一级以上的干部一律享受特需供应。坚持这一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便于团结、教育和改造党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顾他们一点，群众是不会有多少意见的。但是，对党内的照顾面如果规定得过宽，或者虽有比较适当的规定，而控制不严，听任某些干部在规定之外利用职权或‘走后门’来取得额外供应，不作严肃处理，其后果就很严重。”

中共中央这个批语是很清醒的，反映了执政党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由于没有制度性的制约，执行过程中全凭干部的自觉。好干部一般能严格要求自己，尽可能与人民同甘共苦，但不是多数干部能身体力行。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又发了一个关于“特需供应”的文件。 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一办法执行。”国务院财贸办和北京市委的的报告中规定：

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糖1斤，大豆3斤。

科学研究机关九级至八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十级至八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十二级至九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九级至八级编辑人员；新闻界十三级至十级编辑、记者；文艺界十一级至九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九级至八级教学人员；中等专业学校七级至五级教学人员；中等学校四级至三级教学人员；小学一级教学人员；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十七级至十四级行政干部。

2、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肉2斤，鸡蛋2斤，糖1斤，大豆3斤，纸烟2条。

科学研究机关七级至三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七级至三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八级至三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七级至三级编辑人员；新闻界九级至四级编辑、记者；文艺界八级至三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七级至三级教学人员；中等专业学校四级以上教学人员；中等学校二级以上教学人员；全国人大在京代表；全国政协在京委员；国务院各部委正副司局长，国务院参事；民主党派在京常委；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同上述行政职务相当而又名义不同，或者行政级别在十三级以上的其它人员。

3、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肉4斤，鸡蛋3斤，糖2斤，大豆5斤，甲级烟2条。

科学研究机关一级、二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一级、二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一级、二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一级、二级编辑人员；新闻界一级至三级编辑人员；文艺界一级、二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一级、二级教学人员；全国人大、政协在京常委；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人大、政协副秘书长；民主党派中央主席、副主席；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同上述行政职务相当而又名义不同，或者行政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

实行本办法后，中央1960年11月9日发字927号文件中第二类和第三类供应人员，即改按上述标准供应。该指示中第一类人员除按原定标准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增加供应大豆5斤。

1961年这个规定除了照顾面更宽以外，对高级干部增加了5斤大豆。这次没有提党内严党外宽的原则。

有了特需供应人员，随之就出现了特需供应商店。特需供应商店秘密而神秘，一般百姓只知道其存在，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掌握特需商品的人，也享受到特殊利益。这种特需供应商店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成为中国特权阶层的象征，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对象和批判对象。

由于市场上没有食品供应，餐馆几乎停业，仅靠这些特需供应，也难解决食品的不足。何况在一个家庭中能够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通常只有一个人。一个人的4斤肉，也难以维持全家人一个月的生活。所以，即使享受这种特殊照顾，生活水平还是大幅度下降。1960年，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曾对在京的一部分著名专家的健康状况进行了一次重点调查。这次调查了123人，其中教授有冯友兰、朱光潜、冯定等33人，医生有黄家驷、林巧稚、吴英恺、黄宛等52人，科学家有华罗庚、钱崇澍、陈焕镛等25人，作家艺术家有欧阳予倩、戴爱莲、马思聪、刘开渠、叶浅予等13人。这些人当时是中国知识界的顶尖人物，知名度非常高。调查结果是，这些顶尖人物的健康状况也不怎么好，体重普遍下降，体质减弱，疾病增加。这123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体质减弱，但健康状况还比较正常的34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28%；体重下降较多，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基本上能坚持工作的有49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40%；体重下降突出，并患有严重疾病，已经全休或半休的33人，因工作不能离开勉强工作的7人，共占被调查人数的32%。

在一些中等城市，有意放宽特需供应面，使更多的干部得到好处。1960年10月7日，邯郸市轻工业局干部石旭东向中央写信反映了这一问题。信中说：“上级号召不吃肉以后，我们就一点也不吃了，可是特需供应的肉比我们过去大家吃的肉还要多（全市平均每人每月3两）。”“中秋节，全市干部市民和工人连个月饼渣子也没吃到，而领导干部们却每人发二斤。”“邯郸市里的食品商店都成了特需供应商店，群众很有意见。走进商店一看，什么都有，但什么都要特供证。老百姓看到那么多好吃的，一问即说是供应领导干部的，怎么能没有意见呢？”

五、几类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

在城市，不同社会群体的人饥饿程度不同。饥饿最严重的是在街道工厂工作普通市民、政治上受到打击又不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小知识分子。在校大学生的状况比普通居民要好一些。

大中学生的生活　城镇里的中学生也吃不饱。1959年到1960年，我最后一年的中学生活是在饥饿中渡过的。当时正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学生几乎每天都要参加劳动：到农村割麦，到工地挑沙，到码头挑煤。兴修水利、开荒种粮，中学生也是廉价劳动力。大、中学生的粮食定量虽然是31斤，但副食供应很差，肚子里没有油水，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热量入不敷出，整天饥肠辘辘。食堂用瓦罐蒸饭，一个人一个瓦罐，4两米蒸出来的饭几口就吃完了。学校用槐树花等代食品混在米里一起蒸。老师的定量比学生低几斤，他们饿得更厉害。我记得一位姓叶的历史老师，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在学校的菜园里拔了一棵菜，恰好被姓胡的一位同学碰见了。叶老师扑通一下跪在胡同学面前磕头如捣蒜，求胡同学不要告诉别人。结果还是被学校知道了，叶老师受了处分。

大饥荒时期的清华大学，条件比中学好一些。每月定量31斤左右。女同学比男同学低一些。每人每月发一个硬纸片做的“定量卡”，定量卡上有90个小格（大月则是93个小格），每顿饭一个小格。把全月的定量分配在每一小格中。吃一顿饭，划一小格，多吃是不行的。卖饭处专有一个人“划卡”。尽管定量有31斤，但由于副食品少，每到第四节课，肚子里就咕咕作响。我班一个同学，平时表现很好，还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有一次吃饭时，划卡的同学还没划卡，他拿了一个窝窝头就离开了。不一会儿，划卡同学赶上来查看他的饭卡，果然没有划。这事闹到系里，让团支部开会批评，还撤销了团支部宣传委员的职务。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大的精神创伤。八十年代，他担任一家大公司的领导。我们老同学去看他，他请我们吃了一顿极为丰盛的饭，饭桌上盘子摞盘子，怎么吃也吃不完。我们都理解这丰盛背后表达的含义，但谁也没有说出口。当时北京的大学生每人每月在粮食定量以外还供应半斤糕点，凭“糕点票”供应。这半斤糕点的美味，至今还给我留下深深的回忆。

由于营养不良，一些同学患上了“甲肝”病，个别也有浮肿的。1960年，清华大学有一个代号为488的科研项目（为保密起见，当时清华的科研项目都有代号），实际是培植小球藻。当时说小球藻营养价值如何如何高，我们期待着这种营养品以补营养不足。有一天，系里通知今天午饭里有小球藻，但要对外国留学生保密。我们心里暗暗高兴，吃饭时才发现，只是窝窝头里有一点点绿色，吃起来也没有什么

不同的味道。可能是小球藻放得太少了。

老师的粮食定量比学生要低一些，饥饿比我们严重。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班在北院平房教室（这片教室八十年代就拆了）上数学辅导课，上课的是一位又黑又瘦的四川老师。在课间休息时，他到北院的小河边拔了一把野菜放在讲坛的抽屉里，我们发现了，他不好意思地说：“这可以做馅饼。”

清华大学是中国有名的高等学府，这里供应情况应当是较好的。

高级干家庭的生活　韦君宜是一位著名作家，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她的丈夫杨述，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这是一个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结合的家庭。韦君宜用作家的文笔记录下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我是1959年从农村归来，又随即下放到北京郊区长辛店二七机车厂的。在长辛店这年的后半年，我们已经从自己的餐桌上发现了问题。一开始，工厂还有小卖部、食堂，后来就取消了。工厂对门的小饭馆，起初也还有肉菜，后来越变越差。夏天杨述带孩子们到工厂来找我，过星期天，我还能请他们在厂外小饭馆吃饺子。可是到了冬天，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长辛店稍稍好一丁点儿，我记得星期六回家以前到街上买到一块熟牛肉和半个冬瓜带回家。家里的保姆和孩子们高兴异常，因为在城里已经买不到这样并非高贵的食物了。

这样情况，叫我回到城里怎能说好话呢？而且，城里情形也并不更好些。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阶段，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这种生活，曾使过去在我娘家待过多年的老保姆贵芳对我的孩子们感叹道：“唉！你们真命苦。这么小,吃这种东西！你们的妈小时吃的什么呀!”她这话作为“新旧对比”，那简直得说反动。

这时候，饭馆差不多都快关门了。孩子总嘴馋,有一次女儿缠着我:“妈妈带我去吃饭馆。”杨述这人爱吃饭馆，以前常带他们去的，这时也没办法了。我看孩子可怜，就答应：“好。”带着她，母女两人走到离家很近的一家高级饭庄－－新侨饭店对外餐厅。其实我也不知道这里在这种年代卖些什么，以为总还能吃到些好的。可是跨进去一看，唉！只有一盆蛋炒饭放在柜台上，来就餐的人每人给盛一碗就是了。但是，无论如何还是比煮白薯加咸菜好一点，我就让小孩享受了一顿非同寻常的蛋炒饭。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

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毕，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着吃。没有了肉，保姆张文英想尽办法，她买些田鸡来杀了吃，还有一回，买来一只很漂亮的白兔。大儿子那时才几岁，天天和这兔子玩。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忽然不见了兔子，问张文英。张文英说：“用开水烫杀了给你吃。”孩子还哭了一场，哀悼他的兔子。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陈云想出了办法，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一个菜好几元。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们号称高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两顿，不过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

后来，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大概因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这样的苦，有的已经病倒了。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着吃两次，炖着吃还不够。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老百姓愤懑的情绪自然地集中于这些高级人物，当然包括我在内。其实，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罪。

一切能进口入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我听了，不由得立即想到：尽管党的某些领导干了那样对不起人民的事，但是共产党还是有许多干部，为了党，为了人民，是什么苦都肯吃的啊！

一般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　新华社高级记者崔济哲的父亲崔柏森是一位微生物专家，1961年任第一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

师。就是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也经历了饥饿的折磨。崔济哲在他的著作中，以富有感情的细腻笔文字，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1961年，人们已经饥饿到了顶点，我们家吃过米糠窝窝，野菜粥，榆树叶团子；有一次，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回些酒糟，我家吃了几天酒糟窝窝头。能吃的吃了，大家还都感到饿，天天饿得前心贴后背。那时候感到人生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饱，吃什么都行，只要能吃饱就是神仙。

有一天，我听到父母在吵架，准确地说是似乎是母亲在和父亲吵。母亲在低低地哭泣，在数落父亲：你每天吃饭，就只扒拉两口，光喝白水，能行吗？你这么高的个子，这么大的人，办公室老孙跟我说，你几次头昏得差点支持不住。父亲说话低沉缓慢：你不也把那几口饭尽量剩给孩子们啦。哲儿他们是男孩子，运动量大，正在长身体，我们少吃口也到不了哪去。再说，你也不能这么刻薄自己，瞒过别人还能瞒我，你也浮肿得快到膝盖啦！母亲抽泣着说，你看看你浮肿成什么样子了？小腿上一按一个深坑，蹲下都不敢马上站起来。老人们说，男怕穿鞋，女怕戴帽。你浮肿的都快到膝盖了！听说现在医院里一看你们男的肿过膝盖的连收都不收，叫回家等着……母亲深深地抽泣，沉重地呜咽。

我只感到两行热泪顺着眼角流下去。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我和弟弟都背上破篓子上六里屯农村或鬼子坟地去撸榆树叶或挖野菜。那时因饥饿，学校已经不得不改成半部制了。母亲准备了两个大盆，我们弄回的树叶野菜洗干净，用热水焯了就放在盆里泡，把那些苦涩的叶子汁都发出来。有时候星期天，母亲会和我们一起去野地里，她指挥我们捉蝗虫，挖地老虎，蝼蛄。有时候，累得母亲脸色铁青吐绿水。但每捉住一只大蚂蚱她都很高兴。母亲告诉我们，她在北师大念书时曾专门旁听营养专业的课，这些活动物都是人体需要的高蛋白，一个大蚂蚱就相当于一个鸡蛋。在这方面你爸爸胆子特别小，他最见不得这些小昆虫，我们就瞒着他。把它们剁成馅和树叶野菜包在一起，作上记号，到时让他不知不觉地吃进去。母亲想得真细啊。好几次我把作了记号的菜团子也给母亲递过去，母亲总是笑着不接，说我又不是够不到，拿起的是一个没有记号的菜团子。

核武器研究人员的生活　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究试验的张开善写道：

我国原子弹正式起步研究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

样渡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科研人员每天在食堂吃不饱，但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两个小时后，肚子抗议了，于是有人拿出酱油瓶冲一杯汤；有人挖出一勺古巴黄色糖冲一杯糖水；还有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立即又埋头工作，就这样坚持到下班。大家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一小时以上；吃一颗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一个半小时以上。

我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当时是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有时支援他一点粮票。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就奖励谁几两粮票。

核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从长城外爆炸物理现场回来，途中买一点青色的杏子，回到院里送几个给我。因快下班了，正是饥饿的时候，我既没有洗手，也没有洗杏，马上送到嘴里，是苦是酸是涩，也未来得及感觉，但觉得有了点力气，就继续加了一会儿班。看着窗外还未落山的太阳，说了一句：“光亚司令今天真是雪中送炭。”

远在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在那大戈壁里，条件本来就很苦，在那三年最困难的时候，曾经断炊。罗布泊本来植物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不得不向内地求援：“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六、关于“毛泽东不吃肉”

在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出版物中，一再宣传毛泽东在困难时期不吃肉。2002年夏天，曾任李先念秘书的李成瑞告诉本书作者，李先念真有一段时间不吃肉。2002年底，我在吉林省一个资料室发现一个资料，这是商业部副部长牛佩琮给吉林省主管财贸的副书记栗又文的一个电话记录。电话记录如下：

栗又文同志：

先念同志通知，为了坚决保证完成今年猪肉出口计划，中央开会已决

定不吃肉了，并且已从前天开始执行，中央对此决心很大，先念同志指示将以上情况转告各省财贸负责同志，现在中央财贸各部已从6月15日起，开始不吃肉了，特告，供参考。

牛佩琮　　1960年6月15日上午电话通知

李先念和中央财贸各部不吃肉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看到毛泽东和老百姓同甘共苦，不吃肉的消息，我曾经十分感动。毛泽东能够以身作则，值得敬佩。但是，近年不断批露的资料，却是另外一种情况。毛泽东是有一段时间不吃肉，吃什么？他的私人厨师回忆道：

记得1960年的10月，北京已是寒冷的初冬了。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提出中央带头“以素代荤”……

毛主席自己吃的也是“以素代荤”。当时北京没什么蔬菜，只有大白菜。一天，服务科科长问我：“上海有什么北京没有的菜？特别是可以根据北京的条件自己做的素菜？”我说：“有的。如大力油面筋、烤麸、素鸡等，都是北京没有的。”他又问：“你会做吗？”我说：“可以做做。”第二天，汪东兴（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一组组长）和服务科科长找我，让我到一组去烧菜。那时的一组就是毛主席，二组是刘少奇，三组是周恩来，四组是朱德，五组是彭真，六组是邓小平，七组是林彪。就这样，我开始到毛主席家烧菜，做上海素菜，做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鸭，做着做着，我就留在毛主席家了。原来的厨师调走了，我就成了毛主席的私人厨师，一做就做了五年，一直做到“文革”开始……毛主席“以素代荤”一直吃到1961年底。

这些名为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鸡的上海素菜，基本上是豆制品，要达到较好的烹调效果，必须使用较多的植物油。这样一来，无论是脂肪还是蛋白质，都是十分丰富的，其成本也不比肉低。汪东兴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1961年4月厨师为毛泽东制定的西餐菜谱，其中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这里不妨抄录一下：

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延安时代以来的见证人、党史专家何方在他的书中写道：

关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几个月不吃肉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欢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

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种，西餐汤十六七种。

何方这段引文中注明，他这段资料来自《毛泽东生活档案》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1页。

看来，“毛泽东不吃肉”主要是造神者的宣传。即使毛泽东一段时间不吃肉，也不足以证明毛泽东与民共苦。1959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别墅。除省、市首府以外，一些中等城市也竟相效尤。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和“汪庄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等等，都是在1960年前后建造的。这些“行宫”极尽奢华，气派非凡，有些地方的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在国家极端困难时期，耗费了大量财富。和这些巨额投资相比，少吃一顿肉算什么？

天津迎宾馆位于天津河西区，园中的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毛泽东家乡那个投资巨大的“滴水洞”，在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冲西南约五公里，在他家的祖居附近。毛泽东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等先人安葬于此。毛泽东自己说：“这是个好地方，小时候我在这里放过牛，打过柴，割过草，和小伙伴们打过架”。1959年6月，毛泽东回故乡时，对随同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这个地方很安静，我退休后，你在这个地方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其它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不知道是周小舟不会拍马屁，还是几个月后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而没有机会，毛泽东的要求没有下文。1960年5月，毛泽东在湖南又同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起这件事。张平化很快拍板在这里大兴土木，代号为“二O三工程”，迁出了在这里居住的农民，整个滴水洞地区封锁保密。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房式样，再吸取苏联建筑保暖防寒的优点，修建了以三座大楼为主体的建筑群，毛泽东住的那栋楼有主房、副房、会议室、餐厅、娱乐室等，同时还修通了韶山冲到滴水洞的公路。整个工程历时两年，1962年竣工。在建设期间，正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时候。韶山原东郊公社（后改为龙洞公社），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个大队死亡707人，占总人口的13.5%。陈赓公社的楠香和石匠两个大队死亡率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全县约死3万人。

下篇（综合篇）

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

在短短三四年时间内，非正常死亡三四千万人，是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还是领导集团的主观过错？若干年来，中国共产党都归罪于客观原因。

1959年，各地都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四川省还煞有介事地在全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来防止“瘟疫” 。这个说法很快不攻自破，后又归罪于自然灾害。196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说：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更加强调自然灾害的影响：“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但是，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天灾在大多数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进一步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毛泽东很不喜欢这个说法，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批评了对形势估计“一团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提法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这里把大饥荒的原因归结为三点：政策错误；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但强调“主要是‘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这实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具体化，但加上了苏联撕毁合同的因素。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呢？

一、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区发生大大小小的天灾。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中国自然灾害是非常频繁的。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155年内，我国发生较大的旱灾1056次，差不多两年一次，较大的水灾1092次，平均每两年一次。 从1950年到1997年的48年间，平均每年旱灾受灾面积2034万顷，水灾受灾面积988万公顷，二者合计约占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20%。

1949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1950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旱灾，山东、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1952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旱，淮河上游和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1953年，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分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4年长江流域因持续暴雨而产生特大洪涝灾害，淹没农田4755万亩，1800万人受灾，死亡1.3万人。1955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漫溢、决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干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重；1957年晋、内蒙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雨受涝；1958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水，郑州黄河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 尽管年年有天灾，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也同样多灾多难，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 。在大的自然灾害中总是要死一些人（特别是水灾）。要把三年大饥荒的原因归罪于自然灾害，是很容易找到根据的。1959 - 1961年肯定是有自然灾害的。问题在于，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是不是比历年的自然灾害更加严重，即使严重一些，是不是能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这就需要将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与历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作一个比较。

1、用官方的数据分析

据官方数据，1959 - 1961年，全国自然灾害是相当严重的。1959年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继1959年大灾害后，1960又发生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50年来首位。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

表15-1 1950-1983年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

单位：万公顷、万吨

年份 自然灾害受灾面积 成灾面积 旱灾成灾面积 水灾成灾面积 粮食产量

1950 1001 512 41 471 13218

1951 1256 378 230 148 14369

1952 819 443 259 184 16392

1953 2342 708 68 320 16683

1954 2145 1259 26 1131 16952

1955 1999 787 414 307 18394

1956 2129 1523 206 1099 19275

1957 2951 1498 740 603 19506

1958 3096 782 503 144 20000

1959 4463 1373 1117 182 17000

1960 6546 2498 1618 498 14350

1961 6175 2883 1865 540 14750

1962 3718 1667 869 632 16000

1963 3218 2002 902 1048 17000

1964 2164 1264 142 1004 18750

1965 2080 1122 811 281 19453

1966 2421 976 811 95 21400

1977 5202 1516 701 910 28273

1978 5079 2180 1797 285 30477

1979 3937 1512 932 676 33212

1980 4453 2232 1249 915 32056

1981 3979 1874 1213 862 32502

1982 3313 1612 997 836 35450

1983 3471 1621 759 1216 38728

注：自然灾害指水、旱、霜、冻、风、雹等灾害。成灾面积指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耕地。

资料来源：灾情面积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90页，粮食产量见《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41页。

国家统计局的这些数据来自农业部的灾情统计。而农业部的灾情统计是各级政府层层上报的。国家统计局是为政权服务的。中共中央既然在政治上定下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调子，国家统计局不可能提供与此相反的数据。连比较讲科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时也只能“上面要什么数就给什么数”。 其他人就更难说了。当然，作为职业统计工作者，通常是追求数据的客观可靠，这是他们的职业操守。但是，在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在统计系统中还有不少不讲职业操守的人，其中层次越高的官员，职业操守越差，而数据要经过高层次官员“审核”才能发布。更为重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层层上报灾情数据时，总是夸大灾害。夸大自然灾害既可以减少上交和得到救济，也可以减轻官员们饿死人的政治责任。

然而，即使从官方公布的数据中，我们也难以得出饿死人的原因是天灾。

我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粮食产量也列在表15-1中，可以看出，粮食减产和受灾严重程度并不呈正相关关系。

从表15-1中可知，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的成灾面积都超过了1959年，都没有出现大饥荒。在这11个年头中，有9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上一年，其中有6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就从表上列出的1965-1961年三年数字来看，也看不出粮食产量和天灾的正相关关系。1961年的成灾面积比1960年高出15.4%，但1961年的粮食产量却比1960年高出2.8%。

退一步来说，即使是粮食大幅度减产，只要中国门户是开放的，只要有粮食市场存在，就不会发生饥荒。当粮食稀缺的时候，粮价就会上升，外地粮食就会流入，中国没有粮食，外国粮食也会流入。中国当

时是对外封闭的计划经济国家，没有粮食市场，更没有融入国际粮食市场之中。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各地的气象情况是很不相同的，这个地区有灾，可能另一个地区丰收。虽然区域性的灾害频出，但总体上还是过得去。即使没有粮食市场，政府可以从丰收地区调粮救济灾区，老百姓也可以到丰收地区投亲靠友或逃荒。所以，中国历史上只有区域性的饥荒，几乎没的出现像1959 - 1961年期间这样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 - 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1000万人。从1920年到1936年，17年灾荒合计死亡1836万人。 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数不到600万，是最严重的一次；1931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14万。

1958 - 1961年三年之内就饿死3600万人，少出生4000多万人，就是按官方公布的天灾数字，把这个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规模减少归罪于天灾，显然说不过去。

2、用350个站点的气象资料分析

由于中国的一切数据都由国家统计局垄断，除了统计局以外，很难找到其它的数据。然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和利用其它数据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修正。所幸的是，中国的农业气象学家们还有自己的统计和研究。为此，我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求教。我不仅在国家气象局图书馆找到了不少资料，还经专家指点，找到了一本能回答我的问题的书，这就是高素华主编的《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 。

这本图集是农业气象学家根据1951 - 1990年间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站点的气象资料作出的分析。这本书不仅资料来源于非官方，而且用曲线形象地描述了1958 - 1961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和其它年份的比较，不懂气象学的人也能直观地了解这三年的气象和正常年份的差别。

我们从这本书中的几个指标曲线来看1959 - 1961年的灾害程度。再从其它书中引用有关知识对这些曲线作出简单的解释。

1．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根据对自然灾害评价的需要，气象学家通常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

划分干旱等及。他们认为，这个指标能够反映干旱的本质特点。它反映了该年降水量与正常年份降水量的偏离程度。如果当年的降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则不论是降水量多的地方还是少的地方，都不会发生干旱。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按下列公式计算：D＝（B－X）／X×100％

式中，D为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B为降水量（毫米）；X为同期多年平均降水量（毫米）。

表15-2 旱情等级的划分

降水量 干距平百 旱分率 等（％） 级旱 期 一般旱 重旱或大旱

连续三个月以上连续二个月连续一个月 －25～ －50 －50以上－50～－80 －80以上－80以上

资料来源：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进展》，北京，海洋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山东1959年就饿死了不少人，当时说是山东大旱。把死人归罪于旱灾。当时山东的干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气象资料表明，1959年7－8月，全省平均降雨量为278毫米，比常年同期（360毫米）偏少23％。即降水量距平为－23％。 从表15-3中可以得知，－23％在一般干旱线以下。而山东省在1967年12月至1968年9月，全省降雨量距平高达－44％，属一般干旱，这时还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之中，也没有饿死人。

高素华采用各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分析全国情况。

某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某年降水量－40年平均降水量）／40年平均降水量×100％

他们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站点1951－1990年的降水资料。40年平均降水量是1951－1990年历年降水量之和除以40。由此算出每一年的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他们绘出了1951－1990年间各年的降水量距平随年代的变化曲线。曲线图的纵座标是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横座标是年。图15-1中可以形象地看到各年降水量与40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从图中可以看出，1960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约为－30％，为一般干旱。其干旱程

度远远低于1955、1963、1966、1971、1978、1986、1988年等年份。1978年的旱灾远比1960年严重，还处于文革结束不久的“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80%，是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1954、1973等年份。气象专家将涝灾分为涝、大涝两个等级，连续一个月降水距平大于200%，连续2个月降水距平大于100%，连续三个月降水距平大于50%为大涝。 1959、1961年只能算一般涝年。1954年涝灾最重，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

图15-1 1951-1990年中国年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50页。

2． 生长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4－10月是农作物生长期（简称生长季），这个时期降水量多少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高素华等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站点1951－1990年的降水资料，制出了图15-2 所反映的“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从图15-2中可以看出，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与年降水量距平变化曲线大体是一致的。由于各地区在不时季节降水量分布不同，各地的生长季降水量距有所差异。但从总的趋势上看，1959－1961年这三年，生长季降水量距偏离幅度是40年来最小的几年，远远小于1954、1965、1972、1973、1978、1989等年份。从偏离幅度看，这三年是一个常态年份，不能说是大灾之年。

图15-2 1950-1990年农作物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53页。

3． 年平均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气温对农作物的生长有重要影响。我国气象学者利用全国大体分布均匀的350个站点1951－1990年的年平均气温的平均值绘出的全国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如图15－3。可见1958年－1961年的气温同历史平均水平的偏差不是历年来最大的，即年景比较正常。（编辑先生：此图在《墓碑》图表中图15－3）

图15-3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41

页。

从此曲线可以看出，1959 - 1961年气温偏离常年不是最大的，没有出现超常低温。

“降水生产力” （TSPn）和“气温生产力”（TSPt）都属于“气候生产力”。所谓气候生产力就是以气候条件来估算的农业生产潜力，即在当地段的光照、温度、降水等气候因素的作用下，假设作物品种、土壤肥力、耕作技术等作用都得到充分发挥时，单位面积可能达到的最高产量。这是自然条件影响粮食产量最直接的科学表述。降水生产力（TSPn）和“气温生产力”（TSPt）都有科学的公式来计算。 由于过于专业，本处从略。

4． 气温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TSPt）（编辑先生：此图在《墓碑》图表中图14 - 4）

农作物的自然生长力与气候有关，主要是与气温和降水有关。从气温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上可以看到所选的年度与历史平均水平的偏离幅度。偏离幅度小的即正常年景。图14 - 4中可以看出，从1958 - 1961年，气温生产力的偏离不是最大的。

图14-4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56页。

5，降水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TSPn）（编辑先生：此图在《墓碑》图表中图14 - 5）

图14 - 5

资料来源：高素华主编：《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59页。

写完了这一部分以后，我心里还不踏实，想找高素华当面求教。高素华是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已退休。经多方周折，我于2005年8月30日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采访了她。一见面，就感到这是一位很有科学素质的女性。讲话很客观，不偏激。她说：“我们的研究没有政治影响，是纯自然科学研究。客观情况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高素华1963年毕业于沈阳农学院农业气象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国家气象局工作到退休。她看了我的上述文字，认为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她说：“1958年到1961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

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3、用**120**个水文站点的资料分析

金辉先生提供了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 - 1979）》，该表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专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记录了这80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但金辉先生没有提供资料来源，我无法用原始资料作进一步的分析。但我觉得金辉先生的分析方法有错误。由于金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被人广为引用，影响很大，我不得不得作出评价。

表14-3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

年份	- 2度站（涝）	- 1度站（偏涝）	0度站（正常）	1度站（偏旱）	2度站（旱）	120个站点总指数	全国平均指数
1954	41	29	26	16	8	- 79	- 0.658
1956	29	33	30	20	8	- 55	- 0.458
1957	15	17	35	34	19	+ 25	+ 0.208
1958	20	27	35	30	8	- 21	- 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 9	- 0.075
1960	14	21	33	44	8	+ 11	+ 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 1	- 0.008
1962	23	27	38	22	10	- 31	- 0.258
1963	17	28	21	33	21	+ 13	+ 0.108
1964	28	34	25	25	8	- 49	+ 0.408
1965	6	9	30	34	41	+ 95	+ 0.792
1972	5	12	26	35	42	+ 97	+ 0.808

资料来源：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

表15-4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况分为五个等级，即1度为涝，2度为偏涝，3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4度为偏旱，5度为旱。金辉先生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进行了综合整理。为了使情况一目了然，他将原表中的旱涝等级作了符号意义上的对应调整，即涝由1度改为－2度，偏涝由由2度改为－1度。正常或旱涝相当的由3度改为0度，偏旱由由4度改为1度，旱由5度改为2度。其中（－2）度的涝和（＋2）的旱为水文气象上的灾害年度。表中的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趋近于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各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统计更接近于真实情况。

表15-4显示，1959年总指数为－9，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康、万县、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2度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平均指数为＋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多。涝的－2度站14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

1961年总指数为－1，平均指数为－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即开原、朝阳、赤峰、同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重庆、铜仁、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　度站和1度站合计稍超出总数的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

金辉认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也不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都可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为＋27，平均指数为＋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超过正负0.1，三年总平均指数为＋0.003，这在《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过

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

再看与1959-1961年相邻的两个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不如1959-1961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金辉先生的结论是，1959－1961年，全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并且，其正常程度令人吃惊，所以可以说是风调雨顺。

需要指出的是，金辉先生将每个站点的指数求出算术平均值，用算术平均值偏离“0”的大小来判断灾情轻重，这种分析方法是错误的。假若某年有60个“－2”（即涝），又有60个“＋2”（即旱），即这一年又有旱灾，又有涝灾，应该是重灾年，但求出指数算术平均值为“0”，即没有灾情。由此得出“风调雨面顺”的结论，显然是违背事实的。“先旱后涝”或“旱涝相当”是不能抵消的，但这一平均，就抵消了。但是，这里提供的2度站占120个站的比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请高素华看了金辉先生的《风调雨顺的三年》一文。高素华看后说：“我们搞农业气象的不用水文站点的数据。水文数据和农业气象数据不可比。水文数据对研究径流是有用的，但不能用来对农业气象作出判断。”她还说，旱灾和涝灾对农作物的影响不同，一度旱灾和一度涝灾是不对等的，所以，把上述水文站点的旱涝度数进行数据处理是不合适的。高素华说：“我们气象学者不用‘风调雨顺’这种带有情感色彩的说法，我们只是用数据证明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二、苏联撕毁合同不是大饥荒的原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10月3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对中国增强军事力量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很多援助（如通过贷款方式为中国提供60个师的装备）。但是，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使毛泽东不快，毛泽东只能忍气吞声，不便发作。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赫鲁晓夫在新中国成立五周年时

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促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援华项目的签字，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出让中苏合股公司的苏方股份，增加援建重点工业项目和军事贷款，提供原子能反应堆和加速器等。约18000人次的苏联军事和技术专家来华工作。

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的主体是提供重点工业项目的整套设备和技术，据中方资料，整个50年代与苏联签订协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成套设备项目共计304项，单独车间和装置64项。正是这些项目和设备，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框架。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现代工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层接连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为了战胜其政治对手，积极调整对华政策，一再讨好毛泽东。1955年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这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601厂，1959年改称401所），并将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安置在这个基地。以索洛诺夫和阿里柯谢夫为代表的苏联专家组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为基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同年12月，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讲授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在12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苏联科学家主动表示，苏联准备给中国核工业建设以全面援助。

此后两年苏联的核援助进一步扩大。1956年4月7日中苏签署的协议规定，将铺设从哈萨克斯坦的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以便向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同年8月17日，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在这一基础上，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二机部)，主管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1957年3月，三机部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在1962年以前在中国建成一套完整的、小而全的核工业体系。1957年5月，著名的核物理专家沃尔比约夫率领十几位专家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此时已由中科院和三机部双重领导）工作。沃尔比约夫专家组最初的任务是培养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中国专家，后来也负责指导反应堆的实验。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

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并从重水反应堆中获得了少量的钚。此外，通过教学和实验，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学技术人员。尽管以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核援助，但上述援助为中国在1964年的第一颗原子弹打下了重要基础。

中苏关系的破裂是逐渐演变的。

1956年2月4日至3月27日的苏共20大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使毛泽东不快。《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这两篇份量很重的文章，不点名地批评苏联20大的作法。但中苏关系并未像外界估计的那样受到重要影响。1957年夏秋，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做出的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则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中苏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在苏联进行了长达18天的访问。毛泽东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

1958年夏天，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与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这个提议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神经，他在尤金面前大发雷霆。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自到北京向毛泽东解释。毛不热情接待，反而穿着游泳裤与不会游泳的赫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会见。在会谈中，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和与中国搞“联合舰队”的提议。但中苏关系还是没有破裂。

1958年8月8日，中苏两国签订协议，决定苏联在技术上帮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冶金、化学、煤炭、机械制造、木材加工、建筑材料工业和电站，具体落实为建设和扩建47个工业企业。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采取的军事行动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毛泽东事前有意向苏联隐瞒炮击金门的决定。毛泽东此举，一方面无视中苏同盟的存在，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存在的中苏同盟以要挟美国，这令赫鲁晓夫十分恼火。

1958年11月23日，第一枚苏制萨姆－12地对空导弹运抵满洲里；前后共6套发射器、62枚导弹运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苏方还派了专家及一个导弹营前来一对一地教练中国官兵。1959年10月7日，一架从台湾起飞的美制Ｕ－2型高空侦察机在北京近郊通县上空被击落，使世

界震惊。这是世界在实战中用导弹击落敌机的首例。那枚开创世界首例的导弹，正是苏联送的。

苏共对中共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持批评态度，这使毛泽东十分不满。因此，中国就大张旗鼓地批判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在这期间，他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对美政策、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争论。

大跃进、大炼钢铁、炮击金门，使赫鲁晓夫忧心忡忡。他更怕毛泽东得到核武器后在台湾海峡制造事端，把与中国结盟的苏联和与台湾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都牵进去，破坏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的战略。两党决裂势不可免。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此时，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出现了半年有余，显然这次合同的撕毁不是大饥荒的起因。何况苏联这次撕毁的是原子弹的协议，不影响农业生产，也不会影响工业。而与农业有关的苏联援建项目——洛阳拖拉机厂，1959年11月1日建成投产，达到了每5分12秒生产一台拖拉机的设计水平。1959年4月21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报告说，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若干项目合并建设，总数改变为166个。这些项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个。从1959年开始，除了已经签定协议的项目外，根据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两次协议，苏联还将帮助中国进行125个企业的建设。 1960年3月，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还说，苏联1959年继续给了我国巨大支援，对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起了重大作用。

1960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要求华沙条约缔约国家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武器方面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的方针。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唱了反调，并且在中国报刊上发表了这个发言。在会议结束后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喝了酒之后就开始骂人。他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2月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波斯别洛夫和外长葛罗米柯向中国代表团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的，对内政策是主观唯心论；说中国代表团在这个会议上的发言是违背了共同制定的路线。1960年2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于是，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突然袭击”，对中国的

内外政策和毛泽东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中国共产党也作出了激烈的回应。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并通知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多人。据中国官方宣传，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撕毁的是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与农业无关，而且撕毁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有余。把中国的大饥荒归罪于苏联撕毁合同显然是违背事实的。

1960年11月5日到12月8日，刘少奇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1961年6月19日，两国又签订了经济合作和科学技术合作的协定。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没有完全中断。

1961年4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率政府贸易代表团赴苏联商谈1961年中苏两国贸易问题，签订了中苏两国关于1961年货物交换议定书。这次会谈，还就处理1960年中苏贸易业务上的中国欠账问题达成了完满的协议，同时还商谈和签订了关于苏联借给中国糖的协定。叶季壮在苏联外贸部举行的宴会上讲话说："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苏联政府同意我们1960年贸易业务中的欠账在今后五年内分期偿还，并且不计利息。还提出不计利息现在借给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由中国以同等数量归还。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三、偿还苏联债务也不会产生大饥荒

苏联对中国的贷款数量其说不一，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记载共有11笔贷款，总额为56.76亿旧卢布。 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经济学家M.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一书中记载的贷款6笔，总额为14.861亿新卢布（折合66.117亿旧卢布——1个新卢布折

合4.45个旧卢布）。而吴冷西在他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转引1960年7月中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数字：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156项，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了148项，共304项。这些援助不是无偿的，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已经还了72亿卢布，还剩79亿卢布。 北京大学沈志华教授利用中国和俄国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对苏联1950年代援华的贷款数额、用途及其条件做了深入研究。他的结论是：19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应为13笔，而不是11笔，总金额大约是66亿旧卢布，而不是56.76亿。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是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原因可能是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

苏联向中国提供66亿旧卢布的贷款中，军事贷款总计62.88亿卢布，占50年代全部贷款的95%。其中，抗美援朝贷款在贷款总数中所占比例大约48%。经济贷款，如果不算1961年的3.296新卢布蔗糖贷款（合14.6亿旧卢布），则不到3.3亿旧卢布。

表14-4 1950年代苏联给中国贷款的统计 单位：亿（旧卢布）

序号 时间 协议金额 实际使用 军事（其中抗美援朝） 经济

1 1950.2.14 12 12 12 （基本全部）

2 1951.2.1 12.35 9.86 9.86（9.86）

3 1951.4.10 3.4 3.4 3.4 （3.4）

4 1951.9.12 6 6 6 （6）

5 1951.9.15 0.7 0.38 0.38

6 1952.11.9 10.36 10.36 10.36（大约1）

7 1953.6.4 6.1 6.1 6.1

8 1954.1.23 0.035 0.035 0.035

9 1954.6.19 0.088 0.088 0.088

10 1954.10.12 5.2 5.46 5.46

11 1954.10.12 2.78 2.78 2.78

12 1955.2.28 2.47 2.47 2.47

13 1955.10.31 7.23 7.23 7.23

合计 68.713 66.163 62.88 （约32亿） 3.283

资料来源：沈志华：《关于19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沈志华教授认为，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他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却发现了苏联为缓解中国的饥荒提供的援助的资料。1961年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但中国不要小麦，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按协议，这些债务应到1965年全部还清。到1964年，中国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中国还清了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

中国提前还清了的债务，并不是苏联逼债，而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的。吴冷西在他的书中回忆道：1960年7月16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即于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把账算出来，说，按80亿卢布计算（即前面说的79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照此算需16年才能还清。如果按8亿计算，则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要争取5年还清。于是，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豪地说：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基本还清了，我们欠苏联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89亿新卢布，剩下尾数1700万新卢布我们已向苏联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中的一部分来提前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这里引用的《人民日报》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只是摘要，没有发布

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多少钱。在《政府工作报告》的全文中有这个数字："不仅如此，这一期间我们还节衣缩食，拿出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预计到1964年年底，我国的对外援助共计支出人民币66.7亿元，其中1961 - 1964支出的为35.5亿元，占53%。"既然能够用"比偿还外债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小兄弟，说明偿还外债并没有构成重大负担，更说明偿还外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当年中国的援外是"无私"的。在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國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援外，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援助常常被送给那些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国的国家，比如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在1958年就跟中国要了50万卢布。1961年2月2日，中阿双方在北京根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贷款协定》的规定，进一步签订了几份议定书，并且交换了中国向阿尔巴尼亚供应粮食及其他主要食品的换文。根据上述议定书和换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建设化学、冶金、电力、建筑材料、轻工业等二十五个项目方面，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供应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拖拉机及其他农业机械、粮食和其他商品。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援阿的化肥厂，年产二十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四百公斤，还远超过中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当时阿共第二号人物）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国政要》里回忆说：1962年，他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中国政府一方面花很多钱支援"小兄弟"，另一方面把大量的"黄油"变成了"大炮"。在大饥荒年间，中国的国防费用比偿还外债的钱高出很多倍。这也说明还债不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

表14-5 中国偿还外债、对外援助和国防费用的比较 人民币：亿元

年份	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	国防费用

1950 - 1955 6.80 12.60 332.3

1956 5.97 4.04 61.2

1957 6.08 4.67 55.1

1958 7.23 2.76 50.0

1959 7.11 3.50 58.0

1960 6.73 3.63 58.0

1961 6.58 5.19 50.0

1962 6.42 8.54 56.9

1963 2.86 9.61 66.4

1964 0.96 12.16 72.9

注：中国很多武器是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由民用工厂生产的。当时各省市都设有“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军工动员”任务的落实。此外，一些重要的军事科研项目由非军事研究单位承担，很多普通院校承担了军事院校的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来自国防经费。所以，表中的“国防费用”低于实际国防费用。

资料来源：历年国家财政决算报告和《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表15-5中的外援数字低于周恩来报告中的66.7亿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资。从表15-6中可以得知，从1960年到1962年，偿还外债总额为19.73亿元。此数不仅是还苏联的债，还包括偿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欠账。同期外援数17.36亿元（可能不包括援外物资）仅多出2.37亿元；相当于同期国防费用164.9亿的 11.96%。如果偿还外债真的不堪重负，影响到食品供应，只要把“大炮”中分出一点点资金变成“黄油”就行了。

第十六章 大饥荒的祸根是这样酿成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合称为“三面红旗”。这是1958年令中国人狂热的政治旗帜，是造成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就是大饥荒的祸根。

然而，执政者多年来把这一祸根视为珍宝，从1958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是划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忠与不忠的一个重要标准。

“总路线”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称。它的文字表达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报刊宣传说，“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大跃进就是高速度的体现。所以，从思想认识上，总路线和大跃进是一回事。不过，总路线偏重于指导思想，大跃进偏重于行动，大跃进是总路线指导下的行动。

在五十年代，中国有两个“总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前，还有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1953年提出的，它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写进了1954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总纲，表明它有相对的稳定性。过渡时期总路线简单表述为“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时认为，完成“一化三改”的任务10年到15年。也就是说，过渡时期总路线要管10年到15年。结果，写进宪法后的4年就被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取代，开始向社会主义迈进了。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的，但它是建国以后逐渐形成的，在1958年3月9日到25日的成都会议起了重要作用。

一、把革命和建设搞得快一点

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都有一种思想倾向，总是过早地估计革命胜利的到来。人们称为“急性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认为欧洲的革命危机迫在眉睫。列宁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他曾想直接从当时的俄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受挫以后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但他对共产主义的到来也估计过早。他在1920年《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现在已经50岁的这一代人，

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15岁这一代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 按列宁的估计，20世纪30-40年代，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 1952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有急性病，这种急性病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他们其所以有急性病，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纠错机制。即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经济上的市场制度能够对所谓“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不断自动地进行纠正。这正是他们认识上的盲点。这个盲点也造就了他们所设计的社会制度的根本缺陷：对市场的敌视和对民主的轻视。

旧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领导人迫切地希望尽快地改变中国的面貌，总想事情办得快一点：快一点实行城市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快一点实现农业集体化，快一点发展农业、工业、教育事业和其它事业。但是，为了实现这种愿望，领导人往往不顾客观现实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大搞群众运动，什么事情都能办成。由于缺乏民主的决策制度，第一把手毛泽东的意见占绝对支配地位。直接负责经济工作的几位领导人，知道很多主观愿望行不通，有一些切合实际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不仅得不到自由表达，反而被指摘为“右倾思想”。毛泽东一批评右倾，多数人就附和，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了解实际情况的领导人，要坚持自己正确的认识，不仅仅是面对毛泽东的批评，也面对众多人的批评。这样，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正确认识，转而附和毛泽东，从而使毛泽东的认识更偏离实际。他更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认为只要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就能把事情办好办快。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毛泽东一直批判经济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

1955年12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参加会议的有120多人。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择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这条保守的路线……客观事

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据上引资料，在这个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传达之后，表示拥护毛泽东的看法，他还当场念了一幅对联，表示对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的体会。上联是：客观可能超过了主观认识；下联是：主观努力落后于客观需要。他还说："新大陆早已存在，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粮食总产量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来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

按照现代的语言来说，当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想搞"超越式发展"。对当时的中国贫困落后的现状来说，谁都想"超越式发展"。如果有好的制度、好的思路，"超越式发展"也可能成功。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又是舆论一律，当权力中心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只有一个方向的力量推动，只有一个方向的舆论作动员，只有"正反馈"，没有"负反馈"。最高领导人只能得到他喜欢的信息。这就很容易把这种思路推向极端。按照刘少奇的上述传达，毛泽东要"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通过集体化剥夺农民，限制农民的自由；在城市通过国有化剥夺民有企业，消灭民间的经营活动。这实际是从根本上消灭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希望经济发展快一点，更希望消灭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也快一点。这样做，哪里还能实现"超越式发展"？

在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毛泽东著作《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序言中还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的稿子是经毛泽东审定的，"说明"指出，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3000亿斤，增加200％，即9000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粮食总是量只有4374亿斤，不到毛泽东提出的目标的一半。直到1993年才达到9000亿斤。当时毛泽东讲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也是组织人算过账的。不过，算账时从好的方面想得多，从不利的方面想得少。这个纲要还规定，从1956年算起，5年到7年内，基本扫除城乡

居民中的文盲。然而，事实却是，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是年中国文盲人口8507万人，文盲率为6.72%。 要说“冒进”的话，这个序言中的粮食指标“冒进”了近30年，扫盲计划“冒进”了100年。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这篇序言，是“冒进”的罪魁祸首。

在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精神下达后，国务院各部也不顾各自的实际情况，唯恐紧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到1967年）的指标。如粮食计划由6000亿斤提高到9500亿斤（加上大豆为1万亿斤）；棉花由5600万担提高到1亿担；钢由1800万吨提高到2400万吨；煤由28000万吨提高到33000万吨。有的部干脆把上述指标的完成时间由1967年提早到1962年。国家计委，作为全国经济计划的权威部门，本来有审查计划、搞好综合平衡的责任，但是，各部提出的高指标报到国家计委以后，在政治高压力气氛中，他们怕人说自己“右倾保守”，不敢行使自己的职责，不敢提出不同意见。1956年1月14日，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把这个高指标的计划，报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有了国家计委提交的这个激动人心的计划，毛泽东心里更有底了。在1956年1月的多次讲话中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算不了什么，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1956年2月14日开始，34个部委向中共中央汇报。这些汇报也是在批评“右倾保守”的政治气氛下进行的，汇报的内容大多是毛泽东爱听的。听汇报时毛泽东很兴奋，不停地插话，不停地鼓劲，说“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后来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这些插话向下传达后，进一步提高了各部委、各省市搞高指标的温度。

毛泽东如此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要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斯大林1953年逝世之后，苏联领导层几经反复，1954年赫鲁晓夫终于取得了比较稳固的地位。但是，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朝鲜战争胜利以后，他的地位显然提高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他虽然口头上一再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在内心想取而代之。而要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走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前面。毛泽东说要超英赶美，其实，他最想超的就是苏联。对毛泽东这一动机，李锐、沈志华的著作中都有较深入的研究。

二、周恩来带头反“冒进”

冒进，是指走得太快，不顾条件、不顾后果冒然前进。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是1956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续到1957年初。反冒进的主要人物是国务院的一些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因为速度太高带来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难题。而这些难题必须由他们来解决。他们是实际工作者，他们更多地从现实角度考虑问题。他们是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这批人以后发展为中国的“务实派”的主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逝世后的八十年代，他们成为左右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力量，对中国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后话。

在批判右倾思想的形势下，从1955年开始，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势头。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 1958）规定，5年内限额以上的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后来基本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项目追加到477个。几个月以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原来是121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32%，后来又增加到170亿，180亿。基本建设项目一多，资金，钢材，水泥，设计等方方面面都显得十分紧张。各省市也大大地追加了基本建设项目。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压力很大。从他这个岗位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很多部门正在做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一压”，他们商定把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180亿元压缩到147亿元。压缩以后的这个数字还是比上一年增加了68%。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1956年4月中旬，周恩来、陈云还感到指标太高。但4月下旬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不同意毛的意见，说这样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会带来一系列困难。毛泽东最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找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很生气。不久，毛就离开了北京。从5月起，周恩来

从防止冒进转向纠正冒进，5月11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断然提出："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1956年5月，中共中央开会研究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预算报告，决定经济发展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根据中央这个会议的意见，6月3日，财政部提交给政治局讨论的预算报告初稿中，写进了"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的文字。6月10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这个初稿。并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在政治局会议的修改稿中，明显地加重了反冒进的份量。在这期间，又把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进一步压缩到140亿元。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其中有这样的话："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意民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这个稿件的初稿由中宣部王宗一起草，中宣部经过多次讨论，经过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改，于6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登出。在发表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上面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

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来势汹涌的追求高速度的浪潮被遏制住了。但是1956年经济还是有冒进的问题。基本建设、职工人数等方面还是增长过快，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10亿的赤字。在编制第二个一年计划和1957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下来。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八大"通过的这个政治报告实际是政治上的反冒进。报告中有两个估计：

一个是对阶级关系的估计："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消灭的结论。

在上述估计的基础上，对中国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这个估计中可以得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论。

在"八大"上通过的、周恩来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强调"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表面上两面都反的说法，在当时就是反冒进。

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中共"八大"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认识有些不一样。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下，毛泽东必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八大"的决议。否则，他只能辞职下台。但是，中国是一个王权思想影响很深的国家，制度构架已经把毛泽东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且地位极其稳固。毛泽东是不会允许臣下违背他的意愿的。他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不满，对"八大"的决议不满。他不仅要对反冒进进行还击，还要否定"八大"提出的一整套方针和路线。在这个制度条件下，他有力量做这件事。他在等待条件和时机。

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批评反冒进的条件终于有了。1957年下半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已经过去，国内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结束，"一五"计划完成，农村出现了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

毛泽东开始反击了。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中央委员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高调讲话。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就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则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办法……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联盟。

毛泽东把“反冒进”的人说成是“促退委员委”，并且和国民党、和右派“章罗联盟”挂上钩，这是具有很大杀伤力的说法。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以后，毛泽东转向了政治。他不动声色地否定了“八大”决议中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他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提法是不对的。

一个人轻而易举地推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坚持，没有遇到一点阻力，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点民主气息，可见在他身边工作的“战友”们都是他驯服的臣下。既然党代会的重大决议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否定，他的任何意见都会被他的臣下附和，并奉之为金科玉律。

而就在这次会上，在毛泽东讲话之前，周恩来还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毛泽东话音一落，原来主张反冒进的人噤若寒蝉，再不敢说反冒进了。

毛泽东推翻“八大”决议中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判断，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领导干部中是有基础的，党的干部大多数是阶级斗争的专家，一提起阶级斗争就十分兴奋，就会摩拳擦掌，感到大有作为。毛泽东举起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把刀子，为1958年以后压制不同意见，准备了武器。

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于11月13日，又以

《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把批评反冒进的问题向全民公开。这篇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受到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的启示，提出超英赶美的问题。11月6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在以后的15年中，苏联不仅能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目前的主要产品产量。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千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千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毛泽东设想1973达到4千万吨钢的产量，实际上，中国的钢产量直到1983年才达到4000万吨。毛泽东提的指标“冒进”了10多年。但是，毛泽东的这一重大设想事前和事后都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讨论和分析，没有组织专家论证，1957年12月2日，在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那时认为北京空气沉闷，华东空气活跃，想用地方促中央。他1957年12月8日离京，到华东住了一个月。在此期间，他通过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文章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文章，把他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于世。这两位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思想跟得紧，跟得快。紧接着是杭州会议。1958年1月3日和1月4日，毛泽在杭州会议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他用安徽一个冬季就挖了16亿方土，超过7年的土方数量的事例（这是一个假数字，本书“安徽不安一章有介绍），说明原来的计划太低了，太保守了，应该批评右倾保守。他还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1956年工业增长了31％，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他要求各地开展比赛。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省与省比，县与县比，社与社比。比输了活该。他说，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他还说，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花力气去破坏。

四、南宁会议：毛泽东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米

1958年1月6日，毛泽东到了广西的首府南宁。11日到22日召开南宁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在是在一座高大的平房式别墅里召开的。这座别墅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常住的地方。这个会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

为了批评反冒进，会上把周恩来、李先念1956年有关反冒进的讲话，1956年6月20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作为参考材料印发给与会者，作为批评反冒进的"靶子"。在印发到会上的《人民日报》社论前面，毛泽东在文章上划了很多横线、波线、竖线、三角，加了很多批语："庸俗的辩证法"、"尖锐地针对我"、"既然干部走至了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批了右没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等 。他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里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的批评。" 他说的序言是毛泽东为《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作为南宁会议批判材料的还有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

1月11日晚，毛泽东先从"红"与"专"讲起。他强调"又红又专"，"红"是指政治好，"专"指业务好。他说，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要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面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

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气就不得了。"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十个指头中有一个指头生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这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二是四十条纲要，三是促进委员会。这些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6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的反冒进。

“十全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用的说法。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个说法成了各级领导人掩盖工作中缺点错误的借口，谁揭露工作中的问题，就说谁没有分清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说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讲到这里，他回答“右派”对他的指摘：

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未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亩产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问题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落后的问题。古董总是落后一点嘛！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对陈铭枢和张奚若等的这种不同看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反驳过多次。对“好大喜功”的回答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有什么不好？”

在1月1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他在1955年12月发表了《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说：“为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 这是说周恩来的。这一天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三批外宾。13日，周恩来一到南宁，就嗅到会议不同寻常的气氛。他作好了挨批的思想准备。

1月13日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16日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大加称赞。这是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党代会上作的报告，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毛泽东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他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看到毛泽东的目光，周恩来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话，周恩来和几位副总理坐卧不安。

在南宁会议上，柯庆施、康生、李井泉也附和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王任重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表扬，陶铸表示“要赶上柯老”。对反冒进的批评，使会上气氛很紧张。李先念紧张得睡不着觉，吃安眠药。大

家心里纳闷：这到底批评谁？刘少奇说，主席是批评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讲批评主要是指陈云的（陈云没有参加南宁会议）。1月19日，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不知周恩来是顾全大局还是以退自保，在这次会上主动作了检讨。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1956年夏季到冬季）带有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1935年以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在毛泽东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成了君臣关系。周恩来主动把自己放在宰相的位置，经常放弃自己的看法顺从毛泽东。周恩来的顺从，更使毛泽东的认识沿着错误的思路继续发展。南宁会议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周恩来被毛泽东压得非常痛苦，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结束以后，他决定辞职。到目前为止，研究者还没有看到周恩来写的辞职报告，也没有看到别人记录下他的口头辞职报告。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1958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进行讨论，同时讨论还讨论彭德怀的“不担任国防部长”的辞职要求。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报告，主要讲要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为《工作方法六十条》，在这个文件中，要求各级领导对经济指标实行“两本账”制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须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这样，从中央到省、地、县、乡，上级的期望完成账变成下级的必须完成账，各级计划层层加码便成了正常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中央指标不高，层层加码到了基层，也变得极为沉重而难以实现了，何况中央还不断提出高指标？由此而给基层干部带来的巨大压力，成为“高指标”、“浮夸风”也就难免了。

五、成都会议：总路线已有雏形

1958年3月9日召开的成都会议，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只请部分

省委书记到会。会址是成都金牛坝宾馆。会议3月26日结束。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在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参加会议的吴冷西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成都会议是在南宁会议一个月以后，由于南宁会议的贯彻，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的潮头，各省和中央各部重新修订计划，再次提高原来的指标，并纷纷上书毛泽东表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报告说：

毛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

成都会议和南宁会议的基调一样，批评反冒进，鼓劲，为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继续统一思想。看到大跃进的潮头已起，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也不是完全讲一面话，他大讲辩证法，也讲了不要指标太高，要留有余地的话。但他总的精神是鼓劲，他的另一面的话就被人们理解为策略性的。

他说，两种方法比较，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还是采取冒进。他强调“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好？”很明显，冒进是轰轰烈烈，反冒进是冷冷清清。

在成都会上，毛泽东反复讲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他特别鼓励年轻人敢想敢干。他举了古今中外很多名人的例子，说明“自古以来，创新思想、学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他还号召人们要敢于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大胆地创新。“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东西开始都是违法的”。毛泽东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这些话传达到基层以后，一大批无知的年轻人，在大跃进中为所欲为，为了完成某一政治任务而不顾其它，成了一支巨大的破坏力量。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到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措施。否则，指标很高，实现不了。他说，有的高指标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得那样重。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说。他还说，建设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

客观能办到的，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毛泽东要求，要宣传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如何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 毛泽东没有料到，他要求宣传“丰收例子”，引发了各地大放“卫星”，都变成了浮夸的典型。对这些浮夸典型，人们又不敢“泼冷水”，不敢“打屁股”，所以愈演愈烈，终于成了危害极大的“浮夸风”。

在“气若长虹，势如破竹”的毛泽东面前，刘少奇唯恐紧跟不及，他说：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

他附合毛泽东的想法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到底应当多快呢？现在还难以预料，从当前来看，右倾保守还是主要的。”

3月25日，周恩来又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查。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了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个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毛泽东的两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见也就完全可以畅通无阻了。在刘、周之下的官员们也都作了检查。3月21日，陈云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陈伯达作了长篇发言，用理论的语言把毛泽东的想法“科学化”，还提出“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陶铸在3月18日的发言中提出解决“搞社会主义的立场问题”，他举例

说，合浦专区县以下干部大概有80%的干部搞社会主义是有困难的。毛泽东插话说，这个问题全国也没有解决。陶铸表白说“前两年反冒进，我没有反，我是被反的”。3月19日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在会上受命与没有到会的河南、湖南两省联系，显得不同于一般省委书记。他的发言，不仅讲湖北，还讲河南。他说：“速度到底有多快？我的看法，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们在平常情况下能估计到的。”“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产确实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今年麦收要比去年增产50% - 70%。”“一个礼拜一个县就车子化了，群众性的工具改革成果很大。”王任重表白说：“我们没有反冒进，我们查了报纸、会议文件、记录，从全年看，省委总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

在成都会议上，所有反冒进的人都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全都向毛泽东臣服；没有反冒进的或被反的纷纷表功。与会者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讨好毛泽东，并且把他的想法向更为极端发展。

成都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将它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在3月25日，中共中央将提交给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提交给与会者讨论。《报告草稿》中，毛泽东将一段话修改为“今后我们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并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

成都会议通过的37个文件中，其中之一是《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个文件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成都会议把个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在这次会议上，3月10日，毛泽东讲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先若有所指地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然后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就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谁的权力最大，谁就代表真理，最高领导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毛泽东说要崇拜真理，实际就是要别人崇拜他自己。他在这次讲话中还借用列宁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按照他的逻辑，独裁是合理的。

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其它人积极表态效忠。3月18日，陈伯达在发言中把个人崇拜提到理论高度，他：“应当把必要的权威同个人崇拜区别开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没有权威是不行的。”陈伯达引用恩格斯的《论权威》以后说，“权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常识，没有权威，革命就不能前进；正如没有舵手，轮船不能前进一样。任何阶级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群众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中心人物。”“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思，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 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其他中央领导人也纷纷对毛泽东大加赞扬。有的说：我们的水平比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攻击还没有停止。4月上旬，毛泽东在武汉主持了一个汇报会，田家英后来说，武汉会议是成都会议的补充。在武汉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4月5日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反冒进是两个高潮中的低潮。4月8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毛泽东还说，还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在大跃进期间，“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满天飞，都是从这

里“批发”出去的。

毛泽东并不是偏执狂，看到大跃进潮头已起，他还是讲了一些冷静的话。在武汉会议上，毛泽东告诫报纸不要动不动就宣传什么“化”，如“绿化”，“水利化”，还讲到“做事要留有余地”。 但是，由于整个制度没有制衡力量，没有负反馈，毛泽东这些冷静的话，被人理解为这是方法问题、策略问题，他的思想实质还是要“化”，还是要把劲鼓“足”，“充分”调动一切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形成过程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党的领袖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全党紧跟，并且通过舆论工具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巨大的声势。在干部队伍中难免有偏激者或好走极端的人，而这种人常常得到重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专制制度下必然现象。领袖的思想常被下面的人推向了极端。这时，领袖又出来说话，成为纠偏者，他显得比别人更英明，更清醒。但下面的人又“从本质上”理解他的这些“清醒”、“英明”的话，还是沿着原来的倾向走下去。在领导人眼中，走极端的人和不紧跟他的人相比，前者还是可爱一些。“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还说走极端的人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下面的人深知这一点，所以，领袖这些纠偏的话通常是不起作用的。

六、八大二次会议：总路线终于形成

在一个党单独执政的情况下，这个党必须团结一致，必须统一思想。当然，思想只能统一在领袖的思想上去，团结只能团结在领袖周围。凡是与领袖不一致的，只能放弃自己的看法，服从领袖。如果个别领导人和领袖公开对抗，那就是“分裂党”。“分裂党”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刘少奇、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大跃进的势头已定。毛泽东高速度发展战略已被全党所接受。在成都会议上总路线的提法已初步形成，现在需要开一次党代会，把总路线确立起来。这就是八大二次会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半年前开了一个八届三中全会，现在又要开八大二次会议。这两个会有什么不同呢？八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八大二次会议的全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者是中央委员会，后者是全国代表大会。从法律地位上看，后者高于前者。

八大二次会议是在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会上听取并讨论了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听取并讨论了邓小平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听取了谭震林作的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说明；增选了中央委员。

刘少奇的报告接受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正式否定了八大的决议。报告严厉批评了“反冒进”，指摘反冒进造成了生产建设上的“马鞍形”（即1957年低于1956年和1958年）。全面阐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阐述中，刘少奇特别强调速度，要求“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以以论战的语气尖锐地批评了“有些人说，提高建设速度会使人们过度紧张。”、“有些人怀疑多快好省的方针会造成浪费。”、“有些人担心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会在经济上造成不平衡。”、“有些人怀疑农业生产究竟能不能高速增长。”等对高速度怀疑态度。刘少奇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说：

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说得正对！难道我们能够不好6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吗？难道我们应当好小喜过，绝功弃利，安于落后，无为而治吗？

刘少奇在报告中要求各级领导“真正地能够站在群众的前面，运动的前面”，对群众的热情“应当十分爱护，绝不允许向群众泼冷水。”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讲话四次，在5月8日的第一次讲话中，他广征博引，用古今中外成功者的故事，讲解放思想，无所畏惧，讲年轻人胜过老年人，讲学问少的胜过学问多的，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讲这些的目的还是超英赶美。会议期间，他在一份报告的批示 中写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毛泽东当时可能没有想到，他提倡的“破除迷信”最后变成了全民破除科学；他提倡的“敢想敢干”变成了全民的蛮干，胡干；他提倡的“解放思想”最后变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狂想；他说的“高贵者最愚蠢”成了打击专家、学者的根据。

在5月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倡“厚今薄古”。他表扬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毛泽东这时站了起来，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这时林彪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反驳林彪

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在5月17日的讲话主要是讲国内外形势。在讲到农村有人叫没有粮、油、布时，毛泽东说：

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1955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30%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哪些成份呢？这些干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市、中央没有人叫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哪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

毛泽东这段话堵住了干部的嘴，谁要说农民没有粮食吃，谁就是站错了立场。如果一个干部犯了立场问题的错误，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1958年冬天以后的三年大饥荒中，明明农村没有粮食，很多干部不仅不为民请命，反而还说农村有粮，原因就在这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不止一次讲过这样的话。

讲到“准备对付灾难”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讲到：

假如党分裂，要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高岗、饶漱石那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是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党代会代表，特别是中央委员更要注意，要顾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会栽跟头。凡不顾大局搞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高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顾大局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当闹分裂，闹分裂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这里警告对总路线持怀疑态度的人要小心，如果和他不一致就没有好下场。周恩来彻底投降了，没想到一年以后又跳出个彭德怀出来“搞分裂”。这段话为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埋下了伏笔。

对于反冒进的批评，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已经很彻底了，在八大

二次会议上，批评火力不减。周恩来、陈云再一次作检查。陈云在检讨中说“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了当时群众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的紧张情况。”“如果不是得到毛泽东的及时纠正，听任这个错误发展下去，必将使命我们的事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周恩来在5月17日的大会发言中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采，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反冒进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件事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接着，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作深刻的检查，还把反冒进的错误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又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把话题转到对毛泽东的歌颂上：

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

周恩来说毛泽东是“真理的代表”，在其它人的发言中也高度肯定毛泽东，整个会上对泽东的歌颂声不绝于耳。陶铸在发言中不仅歌颂，还要求全党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说：

要破除迷信，做到解放思想，必须在全党广泛地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几年来，我们的学习有教条主义偏向，过分强调学习外国的经典著作，而忽视了学习主席著作，这是不对的。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好的教科书。……毛心席的著作不仅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设胜利的伟大武器。

人们普遍认为，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是林彪。实际上，陶铸比林彪早了好几年！读者可以对照一下，林彪几年以后说的话和陶铸的话何等相似，是不是林彪偷了陶铸的专利权？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在专制制度下，争相向皇帝献媚、争相邀功取宠，本来是正常

现象。这是在专制制度下的必然现象。

王任重发言的题目是《如何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从六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颇有新意的是“大辩论，大字报，大检查”：“干什么，辩什么，哪里不通哪里辩，方式灵活，田边地头，床头灶头，会内会外，父子、兄弟，夫妻、母女、婆媳之间，都可以辩。一场辩论之后，是非分明，工作好做了，落后保守容易克服，先进经验好推广了。”王任重这个“发明”很快在全国推广，辩论会实际是批判斗争会。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倡的“插红旗”“拔白旗”风行全国，不知多少说真话的人被摧残在“大辩论”和“拔白旗”之中！

柯庆施的发言内容是文化革命。他描绘了15年以后的美好情景：人人知书识理，大家都能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是惊人的一致。从5月8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117人，书面发言140人，都表示完全拥护这条总路线。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发言不仅完全支持总路线，还把已经很高的指标，再进一步调高。

5月23日，会议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这次会上，大跃进已经开始。思想一旦统一，经济官员们急忙把总路线落实到具体建设指标之中。

国家计委负责人李富春的发言题目是《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他把超英赶美的设想一一落实到令人振奋的指标数字上。这些指标得到了大会批准。他说：“1958年的形势完全说明，第二个五年是可以大大地跃进的。”

中央各部门唯恐说自己落后，他们的跃进指标又远远高于国家计委的指标。冶金部长王鹤寿的发言题目是《十五年赶上美国》他说，明年钢产量达到1200万吨，1962年达到3000万吨以上，1967年达到7000万吨以上，1972年达到1.2亿吨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铁道部长滕代远在发言中提出了15年内修建12万公里铁路的安排。农垦部长王震发言提出10年内开荒3亿亩。没有大会发言的部长们也向大会提交了本部门大跃进的报告。交通部党组的报告是：《全党全民办交通，水陆空运大跃进》；纺织部党组的报告是《在五年内纺织工业主要产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林业部的报告提出5年内把15亿亩荒山全部绿

化……。

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又把中央部门的指标分解到各自的省。为表示自己紧跟中央，定出了比中央各部委更高的指标。省委书记们竞相向毛泽东表示效忠，你的指标高，我比你还要高；你的速度快，我比你还要快。这些指标，能不能完成，是不是符合实际，除了毛泽东以外，是没人有敢提出质疑的。

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在专制制度下，下级官员迎合上级的情形。1958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处在一层一层的权力阶梯上的官员们，总是把最高层的意志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除了进一步鼓吹大跃进以外，又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本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肉麻，但是，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这恰恰是残酷的现实！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意犹未尽。他对"跃进"这个词儿不停地玩味和欣赏。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5月25日，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彭真送来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跃进"一词是这篇社论最早使用。毛泽东立即挥笔写了一段话，称赞最早提这个词儿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词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　　　5月26日上午7时

其实，周恩来使用"跃进"一词比这篇社论早140天。在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就两处使用“跃进”这个词。周恩来看了毛泽东表扬《人民日报》社论，好像自己的专利权被别人侵犯了一样，连夜把他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毛泽东，并标明“跃进”这个词在第9页和第14页上。同时为自己反冒进的错误辩解，但辩解是小心的，有度的，谦恭的，对自己首先发明“跃进”一词的估价也是很有分寸的：

主席：

现将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送上。在第9页和第14页上提到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

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40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从量到质的跃进。我在这次党代会上发言，说那是“开始觉醒”，经过三中全会，杭州、南宁、成都、三次会议的整风，和接触了一些群众的实际活动，才真正认识到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和力量。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为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

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我在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后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对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的估计并不能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必须在《人民日报》去年11月13日和12月12日两篇社论根据三中全会主席宣告的精神进行号召，才能起动员舆论、促进运动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真理，单单选词相同，这是形式问题，主要看立的什么旗，破的什么邪。《人民日报》两篇社论立的是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的大旗，破的是反“冒进”而“促退”的邪气，所以能够提纲挈领、势如破竹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认为，《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有同样的价值和功劳。

周恩来　　1958年5月26日夜

看来，“功不在禹下”应是周恩来，而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为了不埋没周恩来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功劳，毛泽东把周恩来送给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信件发给到会的人。

小平同志：此件即付印，即刻发给到会各同志

毛泽东　　　1958年5月27日上午11时

功过已经分明，思想已经统一，总路线已经确定。全国很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总路线的热潮。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总路线的旗帜插遍全国》，其中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要“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全国所有的报纸按同一口径发表文章。文艺界也开足了马力，全国每一个角落，颂扬总路线的歌声如潮：跃进，跃进，再跃进！

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因“反冒进”挨批，陈云那时也不受重用，国务院很多工作就转到书记处。1958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的权力枢纽。在“三面红旗”方面，邓小平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大跃进时期许多决策，都出处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不过，“大跃进”的问题暴露以后，邓小平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但他还坚持对“三面红旗”的支持。改革开放以后的出版物对邓小平大跃进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极力回避。

从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上，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都从比较实际向错误的方向转变：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不顾实际条件强调高速度发展。在这个向错误的方向转变中，毛泽东无疑起了主导性作用。但是，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内不仅缺乏一种对主要领导人的纠错机制，还有一种把领导人的认识推向更加错误的机制。当时毛泽东的确有点头脑发热，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发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偏差，并在实际中进行了纠正（反冒进）。但是一旦毛泽东坚持己见，纠偏的人放弃了纠偏，反而附和毛泽东。其他的人不仅不支持纠偏的人，反而站在毛泽东一边，把毛泽东的错误认识更推向极端。为什么没有纠错机制？这是专制制度固有的缺陷。1958年指导思想的错误，不仅仅是领袖和领导集团的错误，而是制度性错误。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要了解人民公社是怎样出现的，就得了解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中国官方一直称农业集体化为农业合作化。因此，很多出版物上把农业合作化和农业集体化混为一谈。其实，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私有制基础上的互惠互利，后者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有人用发达国家至今还有合作制的事实来为中国合作化辩护，实际是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既然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残酷剥夺，集体化过程势必也是残酷的、强制的。人民公社是集体化制度的发展，是对个人利益的进一步否定，是极权制度的基层组织，当然也是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一、毛泽东掀起农业集体化高潮

合作社最早产生于19世纪初的西欧。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出现了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社会弊病，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激烈地批判这个制度，认为这些问题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利·傅立叶（1772－1837）发表了《论家务农业协作社》和《新世界》等著作，提出了未来社会应建立和谐的社会制度和“法郎吉”（来自希腊语“队伍”一词phalanx 的英文phalange，意思为严整的步兵队伍）的设想。

沙利·傅立叶认为，“法郎吉”是和谐的社会组织，有组织的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它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工业，是工农相结合的合作组织。他还设想，每个“法郎吉”占地1平方英里，用招股的办法募集股本组成。 “法郎吉”用股本的形式保存私有制。其收益按劳动、资本、知识进行分配。其分配比例：劳动占5／12；资本占4／12；知识占3／12。不同“法郎吉”之间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商业由行政垄断，不准私人经营。

继沙利·傅立叶提出合作社思想之后，由法国人毕薛（philippe Buchez,1796－1865）倡导，极力鼓吹劳动者应从资本家的支配中求解放，并应组织劳动者自己的合作社。他还亲自指导了一个木工生产合作社。

英国医生维廉·金（Dr Willian King,1786－1865）认为合作组织是穷人自救的好办法。土地是一切财富之母，劳动是一切财富之父，劳动者必须联合，才能免受剥削。他于1828－1830年间，主办发行了一个名为《合作社》（ The Cooperator）的刊物，一共出了28期。

英国人罗伯特·欧文（ Robert Owen，1771－1858）是合作社的第一个实践者。欧文设想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生产和消费组织。其成员除了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公有财产。全民从事农业生产，但农业和工业生产相结合，每个合作公社是一个由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全体成员都分配与

其年龄、特点相适应的工作，各尽所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合作公社设立公共仓库，社内成员都可以从公共仓库里领取民需要的东西，按需分配。

1842年，欧文倾其所有，带领他的4个儿子和英国的信徒们，一同到美国的印第安那州进行“合作公社”试验。他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建立了一个合作示范区，取名为“新和谐公社”（New Harmonig）。在《新和谐公社的组织法》里规定，“我们的原则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别和地位，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财产公有。”“社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公社管理人员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并组成理事会。理事会定期向社员大会报告工作情况。”欧文的搞了4年宣告失败。他为此付出了4万英镑，这几乎是他的全部财产。

马克思主义者对欧文的试验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们认为不采取革命手段，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欧文失败的根本原因。 所谓没有采取革命的手段，就是没有掌握政权，不能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不能控制和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毛泽东等就不同，他们掌握了政权，利用政权的力量可以强制，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可以动员，利用手中的物质资源，可以逼农民就范。先驱者的理想无可厚非，但是，用强权来推行一种理想，就会造成灾难。为了推行某种理想而建立的强权制度，就会把更多的人置于这个制度的奴役之中。

中国实行土地改革以后，一些能力强的人买了大型农具，有的置了车马，还有的雇工。比较弱的农户开始出卖或出租土地。因此，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另一部分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1950年，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提出，要使多数农民丰衣足食，必须让农民由个体向集体发展。刘少奇认为，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没有机器工具，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毛泽东很赞赏高岗的意见，对刘少奇的看法不满。这是1954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一个原因。

土地改革以后，农户出现富裕和贫困现象是有的，但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两极分化呢？不一定。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阶级变化不是向两极分化，而是向中间集中的中农化趋势。据1954年对21省14334户农家的调查，中国农村阶级构成的变化是：土地改革结束时，贫雇农占总户数的57.1%，到1954年末下降为29%，中农由35.8%上升到62.2%，富农由3.6%下降到2.1%。

为了解决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依靠大多数的问题，中共中央及各地又按富裕程度，将中农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从中农中划出的下中农，加上贫农，占农村总人口的60%到70%，这个农村的大多数，就当作

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依靠力量。而富裕中农，就被看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异己力量了。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为了防止两极分化，曾想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并把这个意思向华北局写了报告。这个报告由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副书记刘澜涛转给刘少奇。刘少奇认为，现在搞集体化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合作社。

7月，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毛泽东还让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他批评了互助组不能发展为合作社的观点，批评了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基础的观点。 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10月17日，毛泽东转发了高岗10月14日的关于东北互助合作的报告，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合作社。1954年春夏，农业合作社发展到9万多个。到1955年底，有7000多万农户入社，组成了18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其中高级社2900多个）

其实，防止两极分化只是合作化的一个理由，甚至只是作为动员群众的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要实行计划经济，粮食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当时农村自耕农有1亿1千多户，居住分散。任何一个政府都无力掌握这个分散而庞大的群体，都无法一家一户地征购粮食。没有合作化，统购统销也无法实施。一个政府不能面对千万根头发，把它梳成辫子，就能一把抓住。要建立一个极权制度（totalitarianism），就得把农民的生产、生活、思想全都纳入政府控制之下，集体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是共产党的专长。

在1953年那一段时间的初步集体化过程中，很多地方出现强迫农民入社的情况。河北省大名县五区堤上村的两个合作社，发展社员时，在街上摆了两张桌子，村干部向群众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就在桌子上签名入社"，"咱村就这两个社，不入这个入那个，反正得入一个"。文集村干部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不参加，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金南村叶洪善社共127户，最少有半数不是自愿入社的。社员张得荣因入社思想不通，常常夜间掉泪。 河北省委派人三次到大名县，纠正了这一偏向，解散了一些不合格的合作社。后来毛泽东批评河北省委"三下大名府"，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浙江省吴兴县善连区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会上，县委宣传部长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们一样！" 由于强迫入社，农业社很不稳固，当时农村工作部和各省压缩了一些条件很差的农业社。这就是毛泽东说的"1953年解散合作社的错误"。

1955年夏天，浙江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53000个，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强迫命令的问题。有的县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说谁不入社就要像斗争富农一样斗争谁。有的地方宣布："入了社可以少派粮食征购任务，不入社多派。"全省征购粮食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因此，全省耕牛减少57000多头，猪减少三分之一，羊减少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子粮、逃荒卖子女，老弱饿死的情况开始出现。

为了帮助浙江省做好农业社的整顿、巩固工作，3月下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和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的谭震林，邀请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开会作了研究，并将研究意见写成《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于3月25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用电报发给浙江省委。《意见》说：你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由千分之六发展到百分之三十九），.....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进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据有关人士介绍，这份电报稿写成后，邓子恢曾让陈伯达（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带回去请毛主席审阅。

收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电报以后，浙江省委一致同意，并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作了布置。经过压缩，浙江省的农业合作社由5．3万个退到3．8万个。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的28%退到18．6%。

毛泽东心爱的合作社被砍掉了一万五千多个，他十分恼怒。1955年5月5日，毛在颐年堂找邓子恢谈话，向邓子恢发出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区党委书记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邓子恢：

浙江省由于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53000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个包括40万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经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在1955年4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邓子恢见情况不妙，急忙作检查。9月26日，审查邓子恢准备的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自我批评的发言稿时，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为什么老是喜欢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

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去挫折它。”“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影响了你们，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性，你们却熟视无睹，敢于抹杀，敢于‘与此相反，不是去爱护，而是去挫折它’，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农业集体化以后，农业合作社党组织不仅是农村经济的组织者，在乡以下，合作社也是农村的政治组织者。农业合作社对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都进行着管理和控制。合作社实际是中央政权对乡村控制的基层组织。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特别到了高级农业社，集体经济组织已基本上掌握了农村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农民的全面控制已基本形成。

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在《大社的优势性》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小社为多。但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样的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个乡一个社，当然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在通过的37个文件中，其中有《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人民公社呼之欲出。

二、从仙居事件到社会主义教育

从1955年到1957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集体化高潮。原来计划1960年完成集体化的高级形式，毛泽东建议提前到1959年完成，后来到1957年就基本完成了。官方报纸对农业集体化的报道很多。从已有的报道中给人一个错觉，好像集体化是农民的自愿行动。其实不然。就农民的自身利益而言，特别是就那些生产和经营能力较强的农民的利益而言，合作化是对他们利益的侵害。相当多的人是不愿意集体化的。因此，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退社与反退社的斗争。一直伴随着对农民的强制和迫害。

先说仙居事件。浙江是全国闹退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当时赶往处

置闹退社潮的中央农工部二处处长霍泛回忆："我们到萧山县和上虞县的公路上，就遇到数百人的农民队伍迎面而来。省里同志说，这就是去闹退社的，我们的车躲开点，免生麻烦，可见农村确实不够稳定。到了上虞县委，得知不久前县领导机关受农民队伍冲击……全县农业社的生产多数暂时处于涣散状态。"仙居是闹退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955年下半年，毛主席作了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坚决压缩合作社的作法，合作化迅速发展。1955年12月，浙江省仙居县只有4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55.86%都是初级社。到1956年6月，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8.15%，1957年春天达到91%。同时，社的规模过大。账目混乱，生产上不听群众意见，盲目地将两熟水稻改为三熟，造成减产，全县全年减产22%。由于生产管理上问题很多，全县1956年每个劳动日最高的7角4分，最低的只有9分钱，平均为3角3分钱。与此同时，农村干部作风恶劣，在生产和分配等重大问题上命令行事，不与群众商量，动不动就对社员戴政治"帽子"，扣工分、抄家、脱衣服受冷等办法。合作化以来，在251个乡干部中，有74人吊打过人；23具乡镇1117个党员中，有贪污行为的48名，占4.7%。干部不参加劳动，而且多得工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退社的越来越多。此时，县委不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却大批"富裕农民思想"，从而使矛盾激化。

1956年秋收后，这个县个别地区就发生退社问题。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在全县33个镇中有29个乡镇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有116个，部分垮台的有55个。入社农户由91%下降到195，被打干部107人，社员干部家庭被搜查的有430户。

事件发生以后，县政法部门、兵役局（他们有枪）、驻当地部队、地区公安处组成联合办公室，对案件进行侦察。最后共捕了9人，拘留了42人。

对仙居事件，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对杨心培的报告都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的批示中要求各地引以为戒，要及时解决社员的意见和要求，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要理直气壮地批判错误言论，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决给予反击。

无独有偶。1957年1－4月，浙江上虞县发生各种闹事47起。其中，因合作化引起的有23起，因粮食问题引起的有11起。到5月份又发生闹事63起，涉及4具区，25个乡，4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闹事的人数共达1.3万人。7月份，事态进一步发展，百官镇和永徐乡马家村

发生了大旗会（求菩萨的组织）闹事，参加人数达2000多人。警察向天鸣枪警告，无济于事，后来向闹事者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人，伤12人，才驱散人群。事后逮捕了闹事的首要人物和骨干分子14人，拘留了23人。

农民要求退社不仅发生在浙江，在其它地方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1956年冬天以来，河南省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宁陵、柘城、淮阳、睢县、杞县、中牟等12个县的部分地区部分农业社一度发生了闹社退社现象。据不完全统计，这次闹社退社涉及到278个高、初级社，700多个生产队。在闹社退社中，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到省告状请愿。有的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牲畜，有的社员私分了社内的粮食、种子、油料、农具和饲料。有的社员殴打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些闹社退社的事件中，共殴打干部66人，拉走牲畜4946头，私分粮食12.5万斤，种子2.4万余斤，油料390多斤，农具200多件，柴火5.2万余斤。闹的方式先黑夜活动，后白天活动；先秘密酝酿，后公开开会；先妇女、老年闹，后壮年参加；先几个人、几户，后发展到一个生产队、一个社或一个乡。因为闹社、退社，临汝县老连社，元月小麦才种40%，虞县寓贤乡，元月冬耕地只完成18.6%。民权县浑子乡，因闹社停产1个月。中牟县刘庄社郑油磨村，在闹社过程中，牲畜没好喂，7天死了11头。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7年8月，广东省退社农户已达7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1%左右。已垮掉的社共102个，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7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2%弱。个别地区曾经发展为群众性退社的风潮。如佛山专区的顺德、南海、中山三县经济作物区，受退社风波影响的就有65个乡，210多个社。仅中山县永平、南兴两个区，10月下旬分别到省人委要求批准退社的就有16个乡，600多人。他们有的要回原来的土地、耕牛，有的把已入社的小艇锁上，不给社用。有的到社的鱼塘桑基去捞鱼、摘桑叶，有的将已入社的土地翻耕自行冬种。有的因闹退社而包围、殴打区乡干部、社主任的事件已发生多起。

辽宁省对昌图、凤城等9个县的不完全统计，闹退社的有1万多户，已退社的有4000多户。退社的社员把入社的马拉回去。

1957年春天以来，江苏省各地农村发生了不少的群众闹事，泰县闹退社事件竟在几个乡的范围内成片发生，有2000多人到县里请愿。闹退社员的社员中，中农占60% - 70%。他们绝大多数是因为收入减少，少数是因为耕牛、农具、果木折价不合理，或因为在社内不自由，受干部歧视等。

1956年，农民退社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出现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闹退社的户主要是富裕中农，其次是劳动力少、人口多的户和手工业者、小商贩等。"退社原因：一是收入减少。全省一般地都有10% - 20%的社员户减少了收入；二是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辽宁农民普遍反映："农业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气受不了，""入了社，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一个礼拜天"；三是干部作不民主，社员肚里有气；四是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将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也入了社；五，农村自由市场放开以后，有些社员，特别是一些富裕农民，认为是单干赚钱的门路了，不愿留在合作社里。

在这些退社事件发生以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中央要求各地自上而下地派出工作组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实际是一场政治运动。大辩论一到农村就成了大批判，大斗争。这一场政治运动和城市的反右派斗争互相呼应，是这场政治斗争的两个方面，有的地方干脆称为农村反右派斗争教育。批判"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城乡的同一主题。在这场运动中，一些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有抵触情绪的人受到了惩治。据河北省保定地委报告，清苑县自开展政治宣传运动以来，有11个乡6个人被打，7人被拉，2人游街，7人被斗争。徐水小东张乡在游行时，游行队伍走到生产不积极的社员门前喊"不生产是右派"，走到瞒产者门前喊"瞒产是右派"，有的单干农民不愿交公粮，游行队伍就喊"不交公粮是右派"，看到妇女套磨打牲口，就喊"打牲口的是右派"，一时右派帽子满天飞。

不知道有多少"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仅广东省"全省已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其达16000多人，其中已捕2000多人，重新戴上帽子的1100多人，管制135人。陕西咸阳县斗争了158人，有79人捆绑吊打。云南宜良县斗争了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杀15人，逃跑8人。广东惠来县斗争对象有三分之一被打。山东打死、吓死约10多人。河北省邢台县王快村400多户，摸出65户右派。有的合作社把斗争对象全都扣上了右派帽子。

不仅富裕中农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一些在土改时分得土地的贫农也有人反对。如河北省清苑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整的230多人当中，有18人是贫农。对待贫农的反对意见，通常是教育。全国树了“刘介梅忘本回头”这个样板，教育翻身农民不要忘本，要紧跟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刘介梅是湖北省黄冈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要过饭，生活在最底层。1950年当了乡农会主席，入了党，当了工作组长。土改时分了田，分了“果实”（没收的地主财产分给贫农）。他想好好种田、经商、发家。但是，统购统销，合作化打破了他的种田经商发家梦，他就开始反对。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刘介梅承认错误，作了深刻检讨，认为自己“忘了本”，一定要回头搞社会主义。 当时，报纸上大力宣传刘介梅这个典型人物，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举办“刘介梅忘本回头”展览会。后来这个展览到全国各地巡回展出。

中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在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的背后，有着广泛的抵制和强制、反抗与镇压。但是，和当年苏联集体化比起来，中国农民的反抗和政府的镇压都要缓和得多。当年苏联为了迫使农民接受集体化，曾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出动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在一些地区的镇压，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他们也是“穿军装的农民”）的哗变。仅在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70万人。苏联“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4年，而在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过程没有苏联那么惨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是一个原因；中国文化传统不同于俄国是深层次的原因。

既然农业集体化过程是反抗和镇压的过程，那么，加入了农业社的农民，退出农业社，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谁要退出，谁就要受到批判和斗争。但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在1958年以前的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退社自由的权利还受到尊重，直到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后，退社自由的权利才被剥夺。还说，人民公社使农民失去“退出权”是产生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 显然，这种与历史事实完全相悖的论断。

三、“人民公社好”

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些公开反对集体化的人受到打击，农民顺从了。农村中的青年人，多数是愿意集体化的。一群年轻人热热闹闹地一起劳动，比独自在父亲的严厉的指导下劳动愉快得多。他们太年轻，喜欢新鲜事，对改变现状的事情都拥护。但他们并不知道这

种改变对自己的利害关系。他们在家里虽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但可以在社会上造舆论。与此同时，从上到下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改变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东西，这也减少了农民的抵触情绪。多数人入社以后，不愿入社的人就显得很孤立，不得不参加了合作社。

但是，人民公社还不是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而是按中央的意愿，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它起源于中央领导集团的共产主义情结，也起源于极权制度的需要。不过，它的兴起却借助了全民大办水利的契机。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中央政府的号召和推动下，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都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这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的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十几公里甚至更长的灌溉渠系。这种较大工程需要大量劳力和资金，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没有力量办这种事，只能通过调整农业合作社的规模甚至调整行政区划来解决问题。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改变农村基层结构的思想。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上的越大、越公，就能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4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编者按的形式将毛泽东关于小社并成大社、小乡并成大乡、几乡并为一社的观点发表。

成都会议传出的信息启发了河南省遂平县的领导人，这个县在水利建设、山地开发、发展多种经营方面，在山区与平原互相协助、共同发展方面，乡与乡之间发生过一些磨擦。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遂平县委书记娄本耀、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认为，可以根据成都会议的精神，把在实际利益上难以协调的鲍庄、扬店、槐树、土山这四个乡合在一起。他们请示了到这里检查工作的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要他在联合成大社的问题上表态，张树藩说这是大事，要经过地委讨论才能决定。

但他们等不及地委的讨论，说干就干，立即召集4个乡的党委书记、乡长开会。会上各自表态，他们都同意合并。后过经过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同意，1958年4月20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陈丙寅任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县委委员钟德清任社长。大社内分为八个部：农业部、工业部、水利部、林业部、畜牧部、文化卫生部、交通部。共有5566户，30113人。

县委向省委上报时，受到苏联集体农庄的启发，改名为“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1958年5月5日，专门到省委汇报的娄本耀，受到了当时

正在河南的中共中央书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接见。谭震林说：为什么要叫集体农庄呢？你这个农庄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上比苏联的集体农庄的层次要高，我看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还是叫公社好。娄本耀一听，很受鼓舞，连夜给县委办公室打电话，经反复商量，最后名称定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其实，“公社”这个名字也不是谭震林的发明，而是当时不少中央领导人的集体创作。刘少奇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话中回忆：“公社这个名字，我记得在这里跟芝圃同志谈过。去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是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他们四人去广州的火车上应是1958年4月25日或26日，在谭震林见娄本耀之前。

《陆定一传》中是这样记载他们四人的火车上是怎样“吹”的。1958年4月底，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到广州向毛泽汇报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情况，他们在火车上放开思想海阔天空地议论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半工半读、教育如何普及、公社、乌托邦、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刘少奇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他们还吹了空想社会主义，还吹了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刘少奇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陆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到了郑州，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到车站来看他们。刘少奇对吴芝圃谈了他们议论的东西，要吴芝圃试验一下。吴芝圃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不久，河南农村就出现了托儿所、食堂，工农商学也有了，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了，只是不叫公社。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讲了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问题，后来要北京和天津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

5月间，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召开。19日陆定一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他在这个发言的最后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镇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事业和其他文教事

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这件事时说，陆定一发言中的这段话，是在发言的头天晚上，陆定一自己大会秘书处已经铅印好的发言稿加上去的。这段话包括同少奇在火车上‘吹’的那些内容，但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 陆定一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已经反映了公社的轮廓，勾画出毛泽东对公社的构想和憧憬。

陆定一在火车上接受了刘少奇交给的编书任务，从广州回到北京立即组织中央宣传部的人全力突击，6月间初稿编成。 收入初稿的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菲特的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概况的几段话。这条语录就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部书的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向与会同志一再推荐这本书，即《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人民公社问题是议题之一。从此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得知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后，立即派《红旗》杂志社编辑李友九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帮助工作。李友九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月，和河南省委的干部合作，写出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陈伯达将《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当即对章程初稿进行了修改，批示：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这个文件于1958年9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题为《嵖岈山人民公社试行草案》，成了全国各地办公社的蓝本。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国正式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16日，他又在《红旗》第4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一文，公开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思想。文章讲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当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河南省在公社化运动中走在前面。8月22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说，截到目前为止，全省已建立人民公社1172个，正在建立的有300个。估计运动的结果，将并成1500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7000户左

右，平原地区1万户左右。修武县全县13万人口试办一个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与吴芝圃等当地领导人谈话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时，对谭启龙等当地领导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从毛泽东这次两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于领导"，可以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全面管起来。的确如此，后来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这个全能组织是实现极权主义最为有效的工具。而在极权制度下，老百姓可以随意被统治者鱼肉。

1958年8月2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强调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指导农民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等以外27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的农户112174651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100%。 11月27日农村工作部报告，到10月底，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部数的99.1%。 由于规模过大带来很大问题，后又由26576个分解为52781个。

"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特点。

"大"是指规模大。按经济学理论，"大"可以实现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毛泽东当时不会知道这个理论，但有直观的感觉。不过，要通过"大"来实现规模经济，必须以有效的管理为前提。农业合作社基本是一村一社，一乡数社；人民公社是一乡一社，数乡一社，还有一县一社。全国平均每社5000户，每一个公社的规模比原来的农业合作社扩大了十倍至几十倍。这么大的规模，又是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军事统一指挥，生产、生活全面管理，管理幅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公社领导机构的管理能力。且不说中国素质低下的农村干部，就是水平再高也难以胜任。所以，人民公社一成

立，就出现了管理混乱和强迫命令的情况。在一些山区，规模大，就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例如，云南省普洱县和平公社，仅其中一个大队（雅路生产大队）的552户人家、2696人，就有7个民族，从东到西80里，从南到北60里。除了不少单家独户以外，有3户以上的大小自然村39个，从大队到最远的生产队60里，生产队之间相距一二十里。一个生产队之内的村寨之间相距最远的有35里。这个大队原来是五个高级社，1958年合并为一个大队以后，实行统一分配，贫富拉平，结果连年减产。这样的社队规模，在普洱县占一半以上。

“公”是指所有制方面。首先，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其它公共财产全部转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全社统一核算。其次，由于社员原来经营的自留地以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收归人民公社经营和转为人民公社所有，使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彻底消除。再次，由于国家把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全民经济部门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使公社集体所有制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这种所有制的变革，把经济条件不同的农业社用行政力量拉在一起统一核算，就是让穷社“共”富社的产；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就是让集体“共”个人的产；把全民所有制的部分企业下放给公社，就是公社“共”国家的产。总的来说，只有国家“共”农民的产，没有农民“共”国家的产；只有上级“共”下级的产，没有下级“共”上级的产。“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刮“共产风”使生产力大受破坏，以后不得不将所有制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出现大饥荒以后，对社员的私有财产也不得不作一些让步。这是后话。

“一大二公”，规模那么大，能够维系，公有化程度那么高，却无人反对，就得依靠权力高度集中。人民公社实际是极权制度的具体模式和基层组织。极权制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机关。它不但组织全社的经济活动，又对全社的工农兵学商进行统一管理。从经济组织方面来说，生产计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产品分配，甚至哪块地种什么，按什么样的标准种，都由公社决定，生产队只是一个具体组织劳动力完成上级指令的生产单位。作为政权机关，人民公社管理了本辖区的建设、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武装等一切事宜。在公社早期，它不仅是劳动组织，而且是军事组织。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是以党政合一为基础的，公社党委是全公社的

领导核心。每个大队有党支部，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公社党委任命的。大队党支部贯彻公社党委的决定，党支部书记决定大队的一切事务。由于大队党支部书记通常是连任多届，他的权力资源不断积累，有些人成了凌驾于农民头上的土皇帝。

“政社合一”使得人民公社官员队伍急剧扩大。依照当年人民公社的建制，每个公社有干部30人以上，生产大队大约10人，生产队则5人。这样，在52781个人民公社，69万个生产大队和481万个生产队当中，大小官员共达6000万以上，大体占全部农村人口的7%。这7%的公社官员占有大约10% - 30%的农村收入。农民说，“过去几个村养一个保长，现在一个村养一堆保长”。 这些官员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则奉为金科玉律，深入贯彻到每一人农户的家庭生活之中，箝制着每一个农民的生活和思想。贯彻和箝制是不择手段的，手持刀枪棍棒随意闯入民宅是家常便饭。公社干部是极权制度的末梢，是极权制度的直接执行者。广大农民几乎完全被束缚在行政体系之下，行政关系取代了血缘、地缘关系，只有政府，没有社会。

二是企图用“供给制”代替按劳分配，把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引入日常经济生活之中。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根据人民公社不同的经济条件，供给制主要有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需要供给制三种形式。实行最为普遍的是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民公社实行“七包”、“十包”的供给制。七包是指包吃饭、包穿衣、包生育、包居住、包教育、包看病、包婚丧；十包是除了七包之外，再加上烤火、理发、看电影。由于政府不具备“包”的供给能力，这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供给制，实际上是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人民公社的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为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在粮食供给制的公共食堂里，干部可以随意用不准吃饭的办法惩罚不听话的社员。

三是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中，干部像指挥军队那样统一指挥，统一调度。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

河南省嵖岈山人民公社共建立27个生产兵团和一个钢铁兵团。一个生产队为一个团，一个中队为一个营，营下按村庄和作业组成立连、

排、班。制定了五项制度：服从领导，听从调动；积极生产，不迟到早退；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经常对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爱护公物，团结互助。每月保证出勤28天以上，有事请假，半天内排长批准，一天以内连长批准，一天以上营长批准。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出工，统一收工，统一睡觉，这些行动听军号指挥。全村的房子按营房统一分配，男人住东头的“营房”，女人住西头的“营房”，老人带着小孩住“留守营房”。个别年轻夫妇偷偷相约到野外重温旧课，被巡逻队抓住了的就开全团辩论会，被辩论的一对，男人低头认错，女人哭成泪人。

第四，对农村进行强权整合，使行政权力的扩张深入到中国版图上的每一个边远的角落，使无产阶级专政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头脑和肠胃。

人民公社既管政治，又管经济，既管生产，又管生活，还强化了对农民思想的控制。这使得中央政权的末梢，不仅深入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还深入了每一个家庭。

中共中央在发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的同时，还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是对非共产主义思想的大扫荡。在政治高压之下，乡村社会表面上显得有序，但这种秩序是强权整合的结果，这种收效使得掌权者更加迷信权力，也更离不开权力的强制。

权力至上和领袖崇拜，暂时减小了剥夺农民的阻力。但这种阻力随着农民贫困的加深和奴役加重而逐渐加大，农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反抗。于是，掌权者一方面依靠不断的政治运动来维持，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消除农民偏离社会运行的轨道。另一方面则采取政治高压，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反对意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进行打压。

极权制度能够深入到乡村每一个角落，深入到每一个家庭，除了政社合一之外，还有赖于成千上万的乡村干部。中国乡村干部是从土地改革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农业集体化的主要推动者是土地改革中出现的积极分子。但是，不是每一个土地改革干部都能成为农村干部。江苏一位农村干部说：在建国初期，“乡村干部就像被摊在筛子上，筛子不停地在动，平时小动，运动来时大动，不合格的干部就被筛掉了，一直到高级社时，乡村干部队伍才稳定下来。”当然，这把“筛子”的操作者是各级党的领导，筛选的标准是能不能“听党的话”。所以，能留下来的，大多是“听党的话”的。在皇权时代，虽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皇帝鞭长莫及，在广大乡村，总是“天高皇帝远”。有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又有了这一批“听党的

话”的干部，使得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党的声音，每一个村民都受到党的控制。

四、从共产主义退回社会主义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连在一起的。当时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据说这两句话是政治阴谋家康生最先提出来的。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情有独钟，是与他青年时代的“新村主义”情结有关。早在1919年12月，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渐多。

合若干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敬老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区。”

青年毛泽东受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曾与蔡和森等志同道合者计划在岳麓山建设一个实行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独立的“新村”。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得到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

1958年，毛泽东认为条件具备了。他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之路。” 现在有了人民公社，他认为这条路算是找到了。

这种共产主义情结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有。这些领导人到处演讲，大力鼓吹共产主义。

有了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的共识，就有了北戴河会议决议上“短则三五年、多则五六年”实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提法。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还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到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在这次

讲话中毛泽东还说："河北省刘子厚同志，找来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

但是，使人们始料不及的是，两三个月内，人民公社刮起的"共产风"扫荡着全国各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农民开始抱怨，各种反对意见从四面八方送到北京。毛泽东等不得不暂时收回共产主义的幻梦，对人民公社制度也进行调整。他想尽力纠正，但他的纠正，却跳不出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局限：具体的错误可以改正，但"三面红旗"不能动摇，对人民公社只是进行漏洞的修补和在现有基础上的完善。

10月13日，毛泽东再度出京南巡，直到这年12月最后一天才回到中南海。这是他1958年的第四次离京出巡。且不说前几次，就是9月间他就视察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还是意气风发。10月的出巡和他的态度和前几次有所不同，调子有所降低。

1958年11月2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通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紧接着，同月21日至28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8日至12月10日，就地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两次通称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作出了高度评价，同时把人们从狂热的共产主义畅想中拉回，从共产主义退回到社会主义。八届六中全会澄清了几个理论问题：第一，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第二，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第三，商品生产还得大力发展；第四，按劳分配原则还要继续保持。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否定前几个月的作法，例如，认为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还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对吃饭不要钱十分赞赏。毛泽东一方面不得不强调不能超越社会主义阶段，一方面鼓吹吃饭不要钱。这说明他的倒退是不得已而为之。

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十四句话，作为建设和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确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肯定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就把几个月以前的公社所有制倒退了一步。接着，三四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这次会议以《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作为纪要公布。其内容主要是：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确定基本核算单位，即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旧账”的清算和处理；等。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又把上海会议确定的“基本队有制”（即大队所有制）进一步退到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核算制。

然而，这种倒退是形势所迫，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的庐山会议，不仅使这种倒退刹车，还使得在这次执行倒退政策的干部受到打击。反右倾以后，又急于向公社所有制过渡。

1960年大饥荒更加严重，死人更多。到了下半年，毛泽东对自己的认识开始修正，一是在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说他3月4日对贵州公共食堂报告的批示有毛病，应当改过来。二是11月28日转发甘肃省委的报告中毛表示：“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这种认识的改变在实践上指向两个方向：一是继续执行庐山会议以前的政策，二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打击“五风”干部。前一种作法是以不伤及“三面红旗”为限，后一种作法更强化了中央的权威，强化了非法制的行为。

1962年9月27日，八届十中全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确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改为生产队；社员收益劳分配，以公益金照顾困难户；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各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组织上人民公社还是一个完整的政社合一的组织，生产大队、生产队是公社下级。

经过多次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退回到高级农业社的状况。所有制的退让是以三年大饥荒为代价的，是这种制度酿成了灾难性后果之后。由于政社合一的情况没有改变，农民还是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

五、城市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郑州、哈尔滨等城市也成立了人民公社。1958年10月邓小平视察了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四个城市时，听取了在城市试办公社的汇报。邓小平指出：“城市公社必须办。全国农村正在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后边。” 1959年12月10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问题。

其中写道："人民公社……在城市也在开始进行一些试验。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也会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此时中共中央的态度比较谨慎，主张"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做酝酿工作"。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与这个指示同时下发的还有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发展情况的报告》和河南省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要求各省派一名书记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处参观学习。3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天津会议）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 加快了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速度。

196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上海市委关于里弄工作情况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打算的报告》，上海市委的报告说："里弄居民工作还是城市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数众多的家庭妇女，和一部分闲散社会劳动力，还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参加社会劳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属还有待于继续加强改造；一部分个体经济尚未完全走上集体化道路；一小部分居民委员会组织还不纯；这和当前已经到来的大跃进形势极不适应。在1958年里弄整风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为了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准备组织城市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上海的积极态度，但对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家属加入公社作出了一些政策性规定：第一，除对一些小业主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吸收他们参加公社外，对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不要急于让他们入社；第二，不要动员他们拿出房屋、家具。即使是自己送来，也应加以劝阻。第三，也不要动员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加入食堂吃饭时，应当说服他们等到食堂办好了再说。第四，不要动员他们对公社工业或其它方面投资。

1960年6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一、关于整顿和纯洁干部队伍，保证党对公社各项工作的绝对领导问题；二、关于政社合一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问题；三、关于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几个问题；四、关于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的人民公社大搞生产协作、大搞经济综合利用问题；五、关于在城市人民公

社运动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既要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又要反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既要抓生产建设，又要安排生活（即将有限的粮食配给城市人口）。正如《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说的，是希望达到组织生产和生活、振奋人心的效果。城市人民公社被寄予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期望。1960年春天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继续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乐观地认为城市人民公社将把城市人民更加广泛地组织起来，解放成千上万的家庭妇女，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建设，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彻底改造。

1960年4月1日到8日，新华社连续发了系列报道，分别介绍了郑州、哈尔滨、北京、重庆等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迹。4月8日，新华社发了综合报道《我国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报道说，全国加入人民公社的城市人口已达2000万人，办起了工业生产单位56000多个。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作了题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联合发言，盛赞城市人民公社不仅能促进生产高速发展，而且能彻底改造旧城市，使之适合于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工具，表示大城市也要逐步实现人民公社化。

在1960年4月至8月这一时期，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加速，到8月底，全国城市人民公社已达到1077个，公社人口5693万人，达到了城市人口的76%。1960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人民公社（不包括县城镇人民公社）1032个，其中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组织的417个，以机关学校为中心组织的97个，以街道居民为主体组织的484个。参加公社人口6065万人，占城市人口（不包括城市人口中近郊区的参加农村人民公社的人口）的81%。

和农村人民公社相比，城市人民公社有几点不同：其一，农村人民公社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政社合一，城市人民公社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城市人民公社是以原有的区街政权为依托办的，也仍然保留原有政权的牌子，相当多的城市人民公社是依托大企业、机关、学校组建的，主要是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单位，而不承担政权机关的职能。其二，农村人民公社以集体所有制为主（虽然一度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但还是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虽然城市人民公社也是集体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这是因为城市人民公社生产的产品，大多是为国营工厂加工的零部件，或是国营工厂下放的部分产品。其三，从分配制度上看，农村人民公社以工分制、实物供给和少量的工资制，而城市人民公社则基本是实行工资制。

城市人民公社是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带动下建立起来的，其目标是增加城市的共产主义因素，削弱或者消灭“资产阶级”对城市的影响。但是，由于与大饥荒同时发生的国民经济困难，城市人民公社在六十年代就名存实亡，无疾而终。

城市人民公社虽然消失，它留下了三个结果，一是留下了区街工业，一些不能到大工业就业的人，在这里就业；二是“对旧城市进行了改造”，即对旧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扫荡。三是消灭了在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城市个体工商者，他们有的进入了街道工厂，有的在城市人口精简中，被下放到农村。

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起于1958年夏秋之间，停于1961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国大地保持了不到两年时间，但它带来的灾难和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两年。公共食堂本来是人民公社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放在人民公社一章里介绍。但对于大饥荒来说，它具有直接意义，所以单辟一章。

一、消灭家庭

几千年来，家庭，这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细胞，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还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单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义者看来，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是实现共产主义或世界大同的障碍。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主张消灭家庭。毛泽东等一批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年青时就深受这种理想的影响，接受了消灭家庭的思想。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就看到了这一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力后备并抚养成人的单位。．．．．．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 毛泽东此言一出，他的臣下们，不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当时的报纸说公共食堂是农村干部"自发"办起来的，实际上是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上下互动，"轰"起来的。开始，个别地方办了不大的农忙食堂，上面立即总结，宣传，表扬，把它提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着一轰而起。

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无限欣喜，他们似乎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途径。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设想。他说："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

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用厨师，单独在市场上、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设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 1958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他不仅有恩格斯的根据，还有中国古代的根据。12月10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供参加会议的人阅读。他对汉末张鲁所行的“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赏。，他在批语中写道：“道路上的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张鲁传值得一看。”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除了肯定河南的高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他听说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后说：“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卖饭，比起这里还不行。”他说，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算彻底解放。他对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组织评价很高，称之为共产主义萌芽。周恩来参观结束时，工作人员请他题字留念，他毫不犹豫地写下了19个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刘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论，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现以前的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

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不知道你们对消灭家庭怎样理解？你们要座谈一下。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样一来，六十年后就没有家族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他说如果把妻子儿女作为私有就不能天下为公。因此，他主张消灭家庭。

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消费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消费单位。

现在社会上的劳动力有很大浪费。．．．．．．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家家补衣服、做鞋子……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

这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河南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以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做饭，现在只要40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200人做饭变成了40人做饭，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

后来，由于西方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消灭家庭，中国的报刊上不再提消灭家庭，是为了“不给反动派留下口实”，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一直没有停。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宣传机器，所有的教科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会议，无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考察和任用中，还把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坚定，当作一个重要条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关系这么密切，不积极响应的干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发展速度惊人。很多地方不到10天时间内，所有农民都加入了食堂。 到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连青海、宁夏这些西部边远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发展。据1958年11月20日《青海日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办起公共食堂9800多个，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150多万人，占全省农业总人口的90%左右。《宁夏日报》1958年12月6日报道，全自治区152个人民公社建立了9748个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23．485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的公共食堂，总数在5000个左右。青海和宁夏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发展更加迅猛。1958年10月公共食堂发展到顶峰。

实际上，消灭家庭以后，更有便于各级官员更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使极权社会达到极致。1959年7月，对四川省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调查 称，“人们在食堂一起吃饭，出工时间一致，保证了劳动时间。吃食堂以前，社员一天只能干七八小时的活，现在，平均每人每天劳动10小时”，“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食堂，把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合而为一了，过去开会排活浪费时间，现在队长吃早饭时一宣布排工，碗盏一推，组长就带人出工。”“公共食堂成为对社员进行教育的阵地。饭前饭后给社员读报、组织收听广播，加强了对社员的共产主义教育”。这个调查报告，按照当时的主体舆论，列出了办食堂的多种好处，如节约劳动力；社员吃得饱，吃得好；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假话，而这里摘引的加强了对社员的生活、行动和思想控制的内容，却是事实。给干部控制农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实。

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

完全依赖食堂。消灭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单位以后，就降低了家庭抗御饥荒的能力。家里没有锅灶，连烧一壶开水的条件也没有，更不用说弄点代食品充饥了。

二、大办食堂过使农民家徒四壁

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连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再冒烟。有些地方，农村干部手下留情，没有搞得这么彻底，社员家里还保留简单的锅灶，从食堂打回饭菜以后，再热一下。

在大办公共食堂同时，还大办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办这些公益机构的物资都是从农民家庭里无偿征集的。房子是农民腾出来的。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公社"由于办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乱了，变动面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权，家家户户不安心。" 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点拆除，集中建设"共产主义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来，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开居住。这是真正消灭了家庭。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跟随刘少奇的蹲点工作组写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宁乡县当时有84万人口，有住房70多万间。大跃进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万间，其中又有31000间被国家、集体无偿占用，社员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42万间。 拆房不仅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新村，还有一个目的是拆下陈砖当肥料。大搞"积肥运动"，主意打到农民的住房上。

当时的报纸宣传说，农民交出这些财产是自愿的，实际情况是，在收缴这些财产时，干部、民兵同时出动，挨家搜查，闹得鸡飞狗跳，有些地方还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农民自己交出来，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行为。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强大政治声势。

正是办了公共食堂，才使得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被拆了房子的农民连"四壁"也没有。

四川省简阳解放公社解放管区的民主大队，是省委书记李井泉"蹲点"的地方。全大队有383户、1537人，耕地面积1864亩，共辖八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其中，"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是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仅其规模大，设施好，而且声誉高，远近驰

名。

这两个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员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据知情人员讲，建立万年食堂单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墙壁、做门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劳动才两角多钱）。万乐食堂花的钱也是一千多元。万乐食堂的餐厅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万年食堂的餐厅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两个食堂除了有用红绿油漆漆好的大餐厅以外，还有很多闲置的房间，它们都被挂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乐部"、"图书室"、"保管室"、"男来宾室"、"女来宾室"、"缝纫室"，以及"理发室"、"医疗室"、"托儿所"等等。房屋四周的墙壁上，绘上各种各样的花卉，设有各种各样的栏台，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诗歌台"、"社员五好评比台"、"团员评比台"、"毛主席著作学习台"，以及"创作台"、"来宾诗话、留言台"等等。客厅正中放置一张铺着花毯的长桌，上面摆着花瓶、热水瓶、书刊。客厅前的天池里，修建了一个五角形的花坛，种着美人蕉、凤仙花、兰草等花卉。大门上壁房顶列竖一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间最高一根是国旗竿，两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满插旗帜，从远处望去，煞像一个展览馆或大机关，绝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集体食堂。

建这两个食堂所花的钱，都是由社员出的，每家每户4～5元；房子则是采取强迫与"说服"相结合的办法，把原有的几十家社员逼走后得来的。餐厅内的一百多张方桌、四百多根双人条凳，全是从各户社员家中强行搜来的。为了不让方桌和条凳的主人认出来，就用油漆刷上统一的颜色，掩下了它们的原来面目。食堂建成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有地方机关的、省级机关的，有学校的、工厂的、农村的，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食堂的招待员、炊事员，都穿统一制作的白色工作服，围镶嵌荷叶边的围腰。遇有参观者，他们便显示其最高的"本领"：主食做大米白饭、花卷、包子、馒头，菜肴则是各式各样的，让参观者尽吃，吃好吃饱。另一方面，广大社员这时连稀汤都喝不饱。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粮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着就收走自留地。农业集体化以后，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归社员家庭种植。1955年11月9日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在第3章第17条明确规定，"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拥有的数量"至多不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数的5%"。 在1956年6月30日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与初级社规定的基本相同。

1958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

议》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 办了公共食堂以后，家里不做饭，种菜就没有必要；没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种饲料。要办好食堂，必须建立蔬菜基地，大办养猪场，这就要占有社员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国推广的贵州省办食堂的经验中，明确提出"要办好食堂，社员的自留地势必要转交给食堂"。因此，凡是办公共食堂积极的地方，大都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对他这一招十分得意。1960年2月14日晚，他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会要进行激烈的斗争。"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体生产以外，家庭副业完全被消灭。在大饥荒面前，农民家庭毫无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毙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0年11月。11月3日，全国处于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刻，中共中央才明确规定："应该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当拨出适当土地分给社员，做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这个规定还是坚持自留地不得超过人均土地的5%。 但此时已到冬天，农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决饥饿问题。

三、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从1958年夏秋到1961年夏秋，公共食堂经历了一轰而起——大批散伙——强令恢复——中共中央批准解散的过程。

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后，大吃大喝了两个月，没有粮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当多的食堂是开开停停。以甘肃省榆中县金崖公社红柳沟大队为例，1958年8月，前后不到十天，全队54户、308人都加入了食堂。初办时每人每天口粮一斤，实际上还多一些，以后就放开肚皮吃饭，那时还能吃到蒸馍、面条、米饭等，节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卷。由于人人可以吃饱，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不显得突出，群众意见不大。1959年4月，粮食定量下降，先是7两半，后是半斤，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显得突出，群众意见很大，办了9个月的食堂散了伙。1959年11月，上级又动员办食堂，大家不愿意，就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十几户就勉强加入了食堂，其余户直到1960年4月份，将队里分给的、自留地的粮食吃完以后，也先后加入了食堂。当时的口粮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时断炊。群众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条"下来后，于1960年12月份又开始回家去吃饭，实际是散了伙。从此食堂再没恢复，这一段也是9个月时间。前后两阶段同共经历了一

年半时间。 据本书作者在各地调查了解，全国多数地区的情况和榆中县差不多。

面对公共食堂开开停停的状况，毛泽东还是持乐观的态度。1958年11月底，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说：

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不垮，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

我是到处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次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

1959年春夏之交，饥荒已经很严重，舆论上对食堂的批评也大胆一些。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上客观报道说：在陕西省商城县城关公社召开的党员和社员代表大会上，不少基层干部、代表对农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见。有人干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虽然未明显提出解散食堂，而却说出了一大堆缺点。

此时，面对严重的饥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农民作出一些退让。1959年5月26，《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6条中提出，“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提出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使用。”，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许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59年上半年进行了初步整顿。主要的措施是：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原则；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的原则，调整食堂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根据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采取各种灵活办法，尽量给社员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这些措施仅属应急性质，并不是解决食堂问题的根本办法，但使食堂初办时的混乱现象有所好转。

中央文件说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口粮分配到户”但到基层，农民的“自愿”被各级干部以种种办法剥夺。“口粮分配到户”变成了“口粮指标到户”，粮食还由生产队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为争取1960年粮油工作的继续大跃进而奋斗》的讲话稿时，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写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审稿人改为“以人定量，指标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 ．本书作者在12个省调查，指标到户，粮食由生产队掌，不仅仅浙江如此，也是全国各

地的普遍情况。为什么各地干部不愿分粮到户呢？因为粮食一旦分到社员家中，他们就不到食堂吃饭了，食堂就要垮台。1960年冬，浙江宁波地区停伙的396个食堂当中，有176个是分粮到户造成的。

在整顿中，有的地区的农村，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1959年5月上旬，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同意暂时停办食堂。隆昌县解散了98．72％（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顺县解散了75．5％（以前垮的在外），合江县解散了63％（包括以前垮的），叙永解散了75％（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泸县、古蔺解散了大部分。 安徽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在无为县蹲点，看到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也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

河北省在1958年秋后有30多万个食堂，参加食堂的有3500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9％以上。1959年6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49004个，比原来减少了83．6％，加入食堂的户数只有164万户，占总农户数的19．65％，较原来减省了80％。

食堂纷纷垮台的情况，毛泽东是很不满意的。

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赴庐山开会的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上庐山的船上，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他要求在这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还说，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积极维持；一为湖北号召自愿，拟从少到多，30％－50％，将来80％。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四川老小不要钱，湖北半供给制。供给制部分要少，三七开，四六开，可以灵活。供给制不能否定。

到了秋收季节，粮食上场了，饥饿短暂缓解，毛泽东开始反击了。1959年8月5日，毛泽东对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组的一个报告中批道：

印发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要吹回来的。孙中山先生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

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总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1959年上半年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谈到食堂问题时说：“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 周小舟认为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 这几位说真话的高级干部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这些正确的意见也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7月23日的长篇讲话中，强调“食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坚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对解散食堂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悲观主义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顶政治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对安徽省么书记处书记张恺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愤怒，说他“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宣传机器紧跟毛泽东，密切配合，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对批评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加鞭挞。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中国妇女》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驳斥“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我了”的说法。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以《公共食堂前途无量》题发表社论。用论战式的风格、政治高压语言说：“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接着，社论自己设问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见，高调地歌颂了公共食堂的好处，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辉前景”。社论最后写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诬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欢喜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

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当时党报在批评把国内的不同意见时，总是把这些不同意见和被当作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挂上钩。

各省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都找出了本省的“张恺帆”。四川最为激烈。四川省委在泸山会议之前就即时“纠正”了解散食堂的问题。1959年5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泸州解散食堂的情况以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限期恢复。几天以后，李井泉又亲自打电话批评地委，限7天内将食堂恢复起来，并且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对抵制恢复食堂的干部要给以严厉批评。对搞垮食堂又带头抢购食品的坏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各县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复起来，由于没有粮食，还有些食堂无法恢复。庐山会议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对泸州解散食堂的作法进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几位主工领导人都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过大辩论，使不巩固的公共食堂迅速巩固起来，被右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夸的食堂迅速恢复起来，。 . . . . .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右倾分子，树立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优势，把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由于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用强大的政治高压坚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复了起来。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份统计，截至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000个，参加食堂吃饭人数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分省统计如下：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云南（96.5%），贵州（92.6%），上海（94.5%），安徽（90.5%）；

70% - 9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87.4%），新疆（85.1%），浙江（81.6%），广西（81%），广东（77.6%），河北（74.4%），山西（70.6%）；

50% - 7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陕西（60.8%），江苏（56%），宁夏（52.9%）；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肃（47.7%）、山东（35.5%）、青海（29.9%）、吉林（29.4%）、黑龙江（26.5%）、辽宁（23%）、内蒙（16.7%）。

另据中央办公厅整理资料，1960年2月底统计，在公共食堂吃饭人数占农村人口数的比例，河南为99％，河北为86．1％，山西为81％，甘肃为63．3％，山东为55．4％，黑龙江为40％，辽宁为33％，吉林为29．4％。

但是，因没有粮食，到了1960年新年刚过，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趋势。这时，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公共食堂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怎样巩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经常采用典型引路的办法，即通过总结介绍一个先进典型的经验，让全国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个案都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制度下，相隔千里的两个生产队都实行同样的制度和同样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没有多大差别。

贵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个典型。1960年2月24日，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两天后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县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的批语是：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时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省是饿死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89.59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万。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见本书第23章表23－3）。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委的报告是怎样"科学总结"的呢？

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报告说，"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报告认

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他们“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食堂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在落实贵州经验中，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的规定”，要求所有的农村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除因病等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参加公共食堂，不得独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参加公共食堂的干部必须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定额吃，不得单立小灶额外吃好的；所有到农村的各级干部，必须到公共食堂去吃饭。 这几条规定没有监督和惩治办法，实际很难落实。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 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况》中说，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336000个，在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基本办得好的一类食堂占66%，二类食堂占31.2%，三类食堂只占2.8%。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说使人看了高兴。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

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是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这时正值全国批判彭德怀、反右倾运动的高潮，各省的汇报当然不敢说公共食堂不好。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说，“目前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文中说“办得好”有五条标准：种了菜，养了猪；吃得饱，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炊具改革；讲究卫生。还说，“各地结合整社，纯洁和调整了食堂工作人员队伍……培训了管理员、炊事员、保管员”。“许多食堂进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实现了炊具机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东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员生活委员会”。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指出，办好食堂需要注意几个问

题：第一，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即社员只能得到指标，见不到粮食，粮食一律由食堂掌握，这比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粮食到户”向左迈进了一步。中共中央在这一条下面批注：“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逐步实行”。第二，随着集体生活的发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缩小，要逐步限制和减少自留地。第三，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第四，除了食堂以外，还要全面安排群众生活，如黑龙江省全省农村搞综合性生活站。第五，关键在于领导，如甘肃通渭县由于领导严重右倾，全县2800多个食堂只剩下十几个，至今还没有恢复（此时，通渭县由于断粮，已是饿殍遍地，全县人口1960年减少了三分之一，请看本书“甘肃不甘”一章——本书作者注）。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60年春季再次进行整顿：一是调整食堂工作人员，坚决撤换所谓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如河南的信阳、洛阳、许昌三个专区，清洗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称职的管理、炊事人员2万8千多人。 这里的所谓“不纯分子”、“不称职的”，主要是指富裕中农。二是重新没收社员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的原则。粮食分到食堂，使社员不得不到食堂吃饭。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积恢复。到1960年4月，据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88.6%，其中河南省达到99%。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乐观地认为：“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普遍整顿以来，越办越好”，“我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实际上，食堂维持下去十分困难。中共中央坚持逆水行舟。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为中心安排好群众生活的要求，并且发出了“书记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号召。12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省的报告中更加强调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农村公共食堂又进行了整顿。如河北省从省到公社抽调14万名脱产干部下乡，对18万个食堂大力进行整顿，“清洗了坏分子”，“撤换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员”，打击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共产主义的理想出发，竭尽全力、动用各种政治手段、组织手段和专政手段，保护公共食堂，使它不致于解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种理想，给群众造成了巨大有灾难。

四、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费是在1958年秋天。食堂初开办的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开肚皮，是因为当时有一股认为粮食已经过关的强大舆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生产队里的农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粮食经不起这么大吃大喝，但认为国家的粮食多，吃完了国家会供应。

“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实行“放开肚子吃饱饭”，“开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粮，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致使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紧”了，1959年春天便闹春荒。

江西省丰城县小港公社食堂办起后，在“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下，既不顾生产生活条件，也不管社员觉悟，各村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吃饭不限量，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开桌吃饭。一些社员怕吃亏上当，每餐都是死吃活撑。一些妇女吃饱后，还要再盛上一满碗，边走边吃带回家养猪喂鸡。有的生产队怕吃过了头，实行定量供应，还被大队干部制止。一直到1959年春节前，才发现5个月吃了七八个月的口粮。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回忆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就能做出十几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价想着摆弄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食堂一个月改善20次生活，炸油条、糖糕、丸子、鱼、肉等。社员没有不高兴的。

河北省怀来县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作家协会下放的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一个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这些都是过节和招待贵宾时才有的伙食，现在成了家常便饭。这一吃，就把中国农村吃垮了。

当时，社员和基层干部都知道，敞开肚皮吃饭不会持续下去，但相信国家有粮食，吃完了可以靠国家。这样吃了两三个月，国家定量限内的口粮指标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国家不但不给粮食，还要大搞反瞒产私分。苦果还是农民吃，不少地方到了1958年年底就出现了饥荒。食

堂大面积停伙。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几千万人当中，1958年就占7.72%（见本书“大饥荒中的人口损失”一章），这些人主要是1958年最后一、两个月饿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进行“专政”。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绍了大量的不让农民吃饭、让农民在食堂门前活活饿死的事实，这些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但的确是在公共食堂这种制度制造出来的。例如，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6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过饭。据四川省金堂县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饭，230户被搜查，99人被罚苦工，68人被罚款，27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人，致残者3人。（详见本书“天府饥魂”章）

刘少奇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一位副书记说：“为了建没社会主义，就必须人人跃进，要跃进就得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实现这种高速度就要全民总动员，老弱病残也不能白吃饭，要尽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着送到地里去，也比睡在床上贡献大。”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劳不使，使而不尽力的都要扣饭、少吃，或者一餐几餐不让吃。由于口粮少，又实行扣饭、罚饭政策，有的社员饿得吃树皮和草根。罗湖作业组有个杨十三老倌因粮食少了，又要勉强出工，实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没有起来。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有位70多岁的肖星阶老人，民国16年曾是乡农民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饭饿肚子，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孙说：“以后每到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来饱吃一顿”。

公共食堂利用饭勺子来控制社员，通过对肚子专政来实行对人专政。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问题。

一是干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这不是个别现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问题。本书有关各省的章节中对此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在中国当时的制度下，在每一个权力等级上，都没有对权力的制衡。任何一级官员，哪怕是生产队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只要取得了他顶头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为“土皇帝”，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这种制度条件下的饥荒年代，干部多吃多

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现象。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二是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吃饭时从家里到食堂远的几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几分钟，热饭打回家成了凉饭。由于打饭时间长，孩子在家里饿得哭。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大锅煮粥，粥里常有老鼠屎、羊粪蛋；大锅炒菜，味道极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社员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断发生。据辽宁、甘肃、贵州和上海等19个省市的统计，1959年一、二月份共发生中毒785起，中毒的有8042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来情况又有发展，仅据山西、河北、浙江、甘肃四地的不完全统计，中毒人数即达3843人，已死亡200人。

三是浪费了劳动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长沙县施家冲食堂，72人吃饭，做饭，整米、种菜、挑水、喂猪，一共占了7男个劳动力、两个女劳动力。总人口的12.5%的人专门为食堂做事，在家里很多做饭的事顺手就干了。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在临夏调查的结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队总用工日的13.16%。 胡乔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调查结果是：“办了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积极性。”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在1957年，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是0.94元，1961年，农业用工1466个，每个劳动日的工值应为0.69元，但由于加上食堂用工1812个，工值就降到0.32元。

四是不利于社员家庭养猪和家庭副业。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1957年家家养猪喂鸡，全队共有54头猪，100多只鸡。由于办食堂，1961年全队只有4头猪，11只鸡。

公共食堂劣迹斑斑，社员对它非常反感。

1961年4月，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带领五个干部到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5月9日，他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写道：

群众对食堂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是法厅（炊管人员打人、骂人的地方），是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尅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13人之多。1960年，在这个食堂里吃饭的共死了39人。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汪锋，能说出这样的真话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些话是1961年说的，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态度已经有了改变。这时公共食堂对农民的摧残已成事实。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在大饥荒期间，如果没有公共食堂，有些地方饿死的农民可能要减少一半。从全国来看，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

五、公共食堂是怎样解散的

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各级干部为自保都不敢讲真话。反右倾运动以后，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据说，毛泽东还是从自己家乡的亲戚那里听到了真话。

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仙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找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他们两人于9月下旬到了北京。时值国庆前夕，毛泽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家里。王季范将他们反映的情况整理成十个问题，准备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并说："我愿意作你们的参谋，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庆过后，他们两人与王季范终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荣向毛泽东汇报了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其中谈到，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得力；不少人

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文东仙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毛泽东相信他的亲戚，承认食堂有不少问题，但不认为是公共食堂不好，只是食堂里有坏人，没有办好。所以，12月，提出对公共食堂进行整顿，清理食堂里的"坏人"。对于公共食堂，毛泽东还想听取更多的意见。

1960年冬天，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的途中，把六大区的书记和有关人员找到专列上，与他研究农村工作问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是其中之一。当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参加会议的人当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拥护公共食堂的还是占多数。江渭清不久前曾到作过调查，对食堂问题心里有底。但一开始没有说话。毛泽东点名让他发表意见，他面有难色。毛泽东鼓励他说，并承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江渭清指出公共食堂有三个问题：一，半年吃了一年的粮，我们吃不起啊！二，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头猪，就是3亿头猪。现在猪少了，鸡少了。三，办公共大食堂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树已砍光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弄点干柴树叶，就行了。现在都烧木材，可惜！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他说得对呀！"周恩来点头赞同。

1961年1月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清楚下面的真实情况。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派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率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

图17-1 毛泽东派调查组手迹。

资料来源：。

毛泽东派出的中共中央调查组3月下旬到韶山，然后分为两个小组，一个组在韶山大队（毛泽东老家），一个组在湘乡县沙田公社大坪大

队（毛泽东外婆家）。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以解决公社化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调查组到韶山和大坪之后，广泛听取了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当时，《六十条》草案仍规定实行部分供给制，保留公共食堂，粮食分到食堂不分到个人。但在讨论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公共食堂，他们说："民以食为天，饭都吃不饱，讲什么发展生产？""食堂没得油水，没得菜，一钵饭，一瓢辣椒盐水汤，吃了以后还是饥肠咕咕叫。""食堂是干部尅扣社员口粮的场所，动不动就扣社员的钵子饭，饿起来比受打骂还难受。"有的说，《六十条》不要多，只要有三条就行：解散公共食堂，按劳分配，全奖全罚。

大坪调查组在陈家湾食堂召开了大坪大队社员代表会。这里的社员还是敢说真话。有的说："六十条我们都拥护，就是公共食堂难办好，不如散了算了，分点自留地，让大家在屋前屋后种点菜，菜好半年粮，吃饱了，生产才会搞上去。不解散公共食堂，其他问题都是空谈。"有的说，"什么水肿病、干瘦病，实际上都是饭吃不饱饿出来的病。"有的说，"只有解散食堂，才能铲除干部的特殊化，只有解散食堂，社员才有活路。"座谈会上要求解散食堂的呼声很强烈，但调查组不敢表态。会后，调查组专门开会讨论，认识还不一致。有的说，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这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谁敢否定？有的说，周小舟是省委书记，因为讲了公共食堂不好被撤了职，要是我们表态散了食堂，该当何罪？！经过讨论，调查组内统一了认识，认为不管怎样，应该向中央领导如实汇报。在大坪的中央调查组成员去韶山向胡乔木作了汇报。

中央调查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农村传开。邻近韶山的湘乡龙洞公社谷阳、平里、城前等大队的群众纷纷去韶山打听消息，反映几年来"五风"严重，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水肿干瘦病人多，死人严重等情况。据此，省委调查组即电告湘乡县委，速将上述情况查明，专题报告中央调查组。县委接电后，即派县委候补委员、县监委副书记杨连生率工作组前往调查，并于4月12日向邵阳地委、省委工作组、中央考察团上报《关于我县龙洞人民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胡乔木等在两个小组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四个材料：《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韶山人民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情况简报》、《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毛华初：访问东塘生产队》。这几个材料反映了农村一些真实情况：公共食堂带来的危害，农村多数人不愿意办公共食堂等。4

月14日，胡乔木让毛华初把这四个材料送到在长沙的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毛华初带回毛泽东的指示。信中还反映了邻近韶山的湘乡县陈赓公社大量饿死人情况和其它农村问题。

毛华初随即将所带信件、材料及这封信一并交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请他转交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对材料作了批示，让张平化当日印发给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予以讨论，并送刘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毛华初。毛华初汇报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毛泽东又追问："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毛华初答："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再一家老少几口人，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毛华初答："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柴火力大，所以树都砍着烧了。"毛泽东问："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毛华初答："是的。"毛泽东停了一下又问："唐家坨情况怎么样？"毛华初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严肃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是害人不浅。""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又说："你们在韶山先作试点，注意解散食堂后还会有什么新问题。"最后，叮嘱毛华初："你回韶山去和胡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坨也要搞好。"

4月17日，毛华初从长沙回到韶山，向胡乔木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当即召开调查组和公社干部会议，布置进行解散食堂的试点。

试点先在大坪大队陈家湾进行。4月19日晚，调查组在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并宣布具体做法是用3天时间分3步走，先充分酝酿好，然后作好餐具、用具和屋前屋后自留地的分配方案及现有住房的处理方案。社员听了报告后，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说中央调查组是"青天"，为农民松了绑，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还有的社员说，解散公共食堂早就酝酿好了，具体问题好解决，不要3天，今天晚上就可以讨论好，明天就可以散伙。当晚社员劲头很足，

会议开到很晚才散，所有方案都拟订好了，第二天早上在食堂吃了分锅饭，饭后分配了餐具和粮食、油盐、柴禾、蔬菜，午饭各家自煮自吃。至21日，房屋、自留地等问题都处理恰当了。陈家湾食堂解散后，唐家坨、大坪坳等食堂也一声喊全部解散了。

大坪大队的食堂散了，其余各大队群众踊跃前来参观，纷纷要求中央调查组允许他们也解散食堂。至25日全公社所有公共食堂全部散了。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 中共中央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四件转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这个中央文件的按语是含糊的，没有明确讲是否解散公共食堂。连是否向下转发，也没有明确说法。

在毛泽东组织农村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方党委负责人都深入农村，亲自作调查研究，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见。朱德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食堂有“五不好”、“十一砸”（砸，即整苦了的意思）。五不好是：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十一砸”是：把眼熬砸了，把会开砸了，把批评挨砸了，把脸伤砸了，把上级哄砸了，把群众整砸了，把劳动力费砸了，把树砍砸了，把牲口草烧砸了，把锅把砸了，炊事员把鬼日砸了。 刘少奇在他的家乡湖南宁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时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他亲自向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通报了情况。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 一些省委书记也提交了调查报告，主张解散食堂。汪锋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对于食堂问题，应当坚决地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

1961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改变了过去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共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强调

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从此，公共食堂就在中国消失。

汪锋在《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中说："食堂解散，大快人心"。汪锋的这个报告转述了群众对解散食堂的喜悦：群众说："这下可把勺把子拿到自己手里了，他们再也卡不住我们脖子了。""回家做饭，锅也热了，炕也热了，心也热了。"

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说出了与其他省委书记不一样的话。他对公共食堂还情有独钟。1961年5月11日，他在内江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他调查，有25%的食堂多数社员不赞成解散；75%的食堂有半数社员不赞成解散的。他说，内江县交通公社临江大队第二生产队不愿意解散食堂，社员说："你们再动员，我们也不退食堂。"李井泉在这份报告中主张，凡是有利生产、便利群众，自愿参加、自己管理，适合当前生产力水平的食堂，多数社员将会继续办下去。对这类食堂应当帮他产办好。他还把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四川省各地委、州委。

对公共食堂情有独钟的不只是李井泉。30多年以后的90年代，新华社主办的《中国图片报》一版头条发出了来自山东的一条新闻：一号字的标题是"公共食堂又回来了"，认为这是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这条消息是新华社副总编兼《中国图片报》总编辑姚某亲自选定的。发稿前，他们请我为这条消息配一个评论。我看了哭笑不得。在评论中我只好写道："看了这条消息，使人们起了荒唐的1958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搞公共食堂更是荒唐。如果真的搞起来了，势必成为乡村干部搞腐败的场所。"我对来拿稿子的一位编辑说："这篇评论不要改，如果你们要改，就不要发了。"姚总编看了我写的评论，不但不用，据说还背后骂了我。

第十九章　"五风"肆虐

所谓"五风"是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是随着"三面红旗"而起的，它的产生又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五风"同时肆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观。"五风"以"共产风"为主，相互伴随、交织作恶，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是造成大饥荒的一个直按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

一、“共产风”留下历史的笑柄

1958年8月16日到8月30日的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共产风”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对人民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各地的领导人对决议的理解不同，有的认为，三四年时间是就全国范围讲的，我们这里可以更快一些。毛泽东于8月30日的总结中还讲到：“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几个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目的，为了多数人而辛苦。” 这种公开提倡平均主义的“最高指示”，对“共产风”的作用也不能低估。

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级党报大造共产主义的舆论，理论家们纷纷出来写文章。张春桥为了迎合毛泽东，写了《论资产阶级法权》。这篇文章批评工资制，鼓吹供给制，很受毛泽东欣赏，毛泽东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并亲自写了编者按。8月份，《人民日报》又以“资产阶级法权”为题，开展专题讨论，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关锋发表文章认为，“部分供给制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分配形式”。胡绳发表文章批评工资制，赞扬供给制。在这个专题以外，《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不少鼓吹共产主义的文章，如吴传启发表《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等。发表文章的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对一般干部很有号召力。

人们对共产主义如此热心，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广泛深入人心。无论从小学到大学的教科书，还是各种政治培训班，都讲社会发展规律。说社会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种社会制度比前一种先进，后一种制度必定取代前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且进入共产主义是迟早的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多少年来，中国的知识界都相信这种理论，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都向自己的学生灌输这种理论。这种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到老百姓那里，就成了宿命论：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谁也无法抗拒。大力推进共产主义的人们，都是符合这个“天律”的。扫除这个“天律”的实现的障碍，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是“替天行道”。

1958年，各级党报造同样的的舆论：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在舆论的鼓动下，为了早日进天堂，各地都企图比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还要快。各地的农村干部很快付之行动。结果闹了很多荒唐事，给农民带来了灾难。

搞共产主义，河北省徐水县最早成了全国学习的典型。这个县提出：1959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刘少奇先后到这里视察，并通过报纸向全国宣传。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在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肯定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经验。本书《燕赵悲歌》一章详细个绍了徐水搞共产主义的情况，这里不再重复。

《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毛泽东十分关注报纸对徐水的宣传宣传。毛泽东视察徐水后不久，他让身边的秘书叶子龙看《人民日报》上登的《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报道。文章对徐水人民公社的前景做了生动的描述。其中提到棉花亩产将达到5000斤。毛泽东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到徐水看看。" 后来证明，《人民日报》宣传徐水的一些报道和文章都是假话。但这些宣传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朝圣者。到这里"取经"的各省及中央部门的单位共有3000多个。

1958年10月中旬，徐水县弄虚作假的问题被揭露，11月9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以后不要宣传徐水。但徐水的"共产风"的已飚到全国。各地新出现了一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型。1958年10月，山东寿张县作出了二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山东莒南县制定出大干200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最先实行一县一社的河南武修县制定了"三年丰衣足食、五年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从毛泽东对山东范县（后属河南省）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当时对这些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是很欣赏的，是鼓励的。

1958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宣专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上，刊登了《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主要内容是，在两年内实现全县工业化、电气化；粮食亩产2万斤；建成4至6所大学和一个科学院；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等等。规划同时提出，用三年时间把全县993个自然村改造成25个新乐园。新乐园的前景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种种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月6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这份文件，读后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会后出征，以为如何？"同时印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委书记。 第一次郑州会议是纠偏会议。从这个批示可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范县这个"共产风"的典型却

十分珍爱，没有“纠”的意思。不过在这次会上他说过：“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看来，毛泽东只反对县以上范围的“共产风”，对一县之内的“共产风”是支持的。

湖北省当阳县（1989年1月撤县建市）跑马公社是又一个共产主义典型。这个公社成立于1958年9月底。共有农户5875家、23025人。公社成立以后，打破了原有的乡社界线，人力、财力、物力集中由公社统一支配。按上级要求，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带领大部分劳动力上山“大办钢铁”，党委第二书记张天高留在公社主持工作。

张天高只有初小文化，上级对他的评价是：“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听党的话，工作热情很高。”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他带头大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不仅受到省、地县的表扬，毛泽东还在成都会议上说“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张天高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徐水县的经验和大量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又看到《湖北日报》11月7日的社论《走向最终目的——共产主义》中“不要把共产主义神秘化”、“不应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等说法，就很快付之行动。

10月，跑马公社开始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兴办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各项福利事业。11月17日，张天高在公社干部扩大会上说：“我宣布，今天是社会主义的尾，明天是共产主义的头，共产主义已经到了。”“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除了老婆以外——这是我的意思，什么也不私有了。”在这个会上，有人列举了“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的种种理由。在公社管委会所在的半月街上，相继贴出了许多欢呼进入共产主义的标语，如“人类最美好的社——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了”、“不分你我，各取所需”等。

这次会议以后，就刮起了“共产风”。张天高在公社教师会上讲：“现在是共产主义，你们要文具，就到文具店里去拿。”他亲自带半月中学的事务员到文具店拿走乐器、球类等115件，价值1436元。之后，其它学校闻讯而来，抢光了这个文具店的所有商品。公社党委的试验田需要化肥、农药，张天高带人将商店里的化肥、农药搬走了30万斤。之后，商店里的化肥、农药一抢而空。当有的群众说没有衣服穿时，张天高说：“没有衣服到商店里去拿，各取所需。”结果，全公社商店被抢走了布11624尺，棉衣1304件。在公社内不分集体和个人、不分你我，队与队之间牲畜随便拉，社员家庭的家禽、蔬菜随便吃。育溪

公社关陵大队曙光生产队双目失明的李婆婆喂的5只鸡全部归公后，李婆婆嚎啕大哭。事后统计，共吃社员的鸡2800多只，蔬菜68600多斤。社、队占用社员的生活用具和小农具更是不计其数。公社集中了社员家庭喂养的12753头猪、36251只鸡。集中后，猪死了6164头，鸡死了3691只。

为了体现共产主义，跑马公社实行居住大集中，学校大集中，幼儿园全托化，老人一律收进养老院。全公社5800多户社员由原来居住的1200多处集中到62个居民点。食堂由原来的250个合并为69个。三天内将27所学校合并为8所，而且全部学生一律寄宿。居住大集中后，房屋窄小，十分拥挤，三代同室，男女同室。学校集中以后，四个孩了盖一条被，被子被孩子带到了学校，家长只好盖蓑衣睡觉。

干部按自己设想的共产主义强迫群众实行，对不听话的社员，用罚做苦工、开“辩论会”、批斗、打、骂、不准吃饭等处罚手段。全公社共有28个干部曾用打、骂、捆、斗、罚、饿等手段，处罚社员68人。

不少地方到当跑马公社参观学习，跑马公社的“共产风”迅速蔓延到当阳全县。不少干部开会时讲“共产主义到了，不分你我。”社员怕自己的东西被“共产”，有的把自己竹园里的竹子全部砍光，有的把家里的楼板拆下来卖光。由于大力宣传供给制，有的社员说：“干不干，铁饭碗，搞不搞，少不了，反正吃饭不要钱”。劳动中出现了“三等”：等干部喊了才上工，等人到齐了才下田，等组长分了工才干活。劳动效率很低。

“共产风”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也刮了起来。韶山在大办钢铁、大修公路、大办水利、大建居民点的同时，实行“六大集中”：居住、吃饭、劳动、幼儿、学生、家禽家畜，都统统集中。韶山大队52个屋场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个屋场里。在这个期间，社员迁徙无时，有的搬家十次以上。生活资料和私有小工具谁都可以随便拿。据大队统计，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间，共拆房屋144间，损坏农具360件，平调木料5万根、砖瓦两万块、牲猪190只、鸡鸭570只、粮食6000、家具和炊具1950件、劳动日7700个。但是，这个大队的情况比湘潭县其它公社相比，不算是严重的。

东北的辽宁省，“共产风”从1958年一直刮到1960年底。1960年12月《铁岭县汎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中说“这个社的‘共产风’，从公社化一开始就刮。经过去年春天作了一次纠正，但不久又刮了起来。每一个运动，每一个‘高潮’，每一个‘大发展’，都要刮一次‘共产风’。大运动大刮，小运动小刮，没有运动零星刮。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各级领导机关都有。挂钩单位、试验单位

和搞‘南泥湾’的单位也在刮。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劳力、车马，小至砖瓦石块、破铜烂铁、锅碗瓢盆、皮麻绳套，连幔杆子和供老祖宗的香炉也都刮走了。气得群众说：除了老婆孩子不要，其它什么都要。”这个报告还说，“总的看，共产风队队都刮，只是程度不同。大体规律是：在工作重点、富裕队、城市近郊、公社所在地、重点工程所在地，凡是离官近的地方，刮的就严重。”

“共产风”，实际是“共”老百姓的产，群众大量的财产被充公。四川省新繁县一个调查证明，是上一级“共”下级的“产”，即上级“平调”下级的财产。以这个县的三个典型公社为例：国家“平调”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23．9％；公社“平调”管理区、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43．1％；管理区“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8．4％；生产队“平调”社员的占“平调”总额的14．6％。

由于“共产风”与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相联系，因而传播最广，最难纠正。“共产风”刮到全国各地，刮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倾家荡产。本来生产力水平低下，硬要说到了共产主义；本来形势不好，硬要说形势大好；本来没有条件搞供给制，硬是宣布搞供给制。

共产主义的天堂是靠假话支撑的，“浮夸风”也就成为必然了。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经济，什么都管，干部水平本来就很低，加上公社过大的规模超过了公社干部的管理幅度，“瞎指挥风”也就成为必然。“共产风”否定了“三级所有”，否定了一切管理制度，干部就有了支配一的权力，权力高度集中又没有制衡，就成了干部特殊化的沃土。“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本来就损害农民利益，违背农民意愿，要强制推行，就出现了“强迫命令风”。所以说“共产风”是“五风”之首。

毛泽东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有一个认识过程。1958年8月说是三四年或五六年，11月6日的讲话中认为“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 11月21日，他又说“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 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的的讲话》，其中有十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意思。在苏联以后，还是十五年左右。1959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安徽桐城的报告上批示说：“至少在二十年内，不谈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

供给制是“共产风”的一个重要表现。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会议简报提供

了24个省区供给部分占的比重：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占50%的有河北、浙江、福建、黑龙江四个省；供给部分占60%、工资部分占40%的有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江苏、江西、内蒙九省区；供给部分占65－70%、工资部分占30－35%的有安徽、湖南、辽宁、吉林、贵州、甘肃和宁夏七个省区。

另据23个省、区的21176个公社统计：实行伙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16610个，占78．43%；实行粮食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2872个，占13．58%；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的人民公社有989个，占4．67%；实行半粮食供给制的有261个占，1．25%；实行完全工资制的人民公社有123个，占0．58%；实行劳动日制的人民公社有322个，占1．51%。在分配给社员的总额中的工资部分，平均每个劳动力每月工资，据20个省区反映，一般是3－5元。

据河南、山西、山东、安徽福建、湖南、广西、黑龙江等8个省的统计，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8431个公社当中，已发工资的有6393个，占总数的77．13%，大部分公社发工资二到三个月，准备发但未发的有2039个公社，占22．87%。在两三个月以后都无力发工资了。不发工资以后，就全部实行“供给制”了，即政府给多少就吃多少。政府不给就没吃的了。

二、“浮夸风”使人疯狂

“浮夸风”集中表现在粮食产量上大放“卫星”上，这方面的情况在第“粮食问题”一章已经作了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其实，“浮夸风”还有多方面的表现。

当时河南流行一个口号：“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一次会上讲了一个《李广射虎》的故事。一天，李广出游，隐约看到一虎拦路，遂开弓射之，近看，乃一大石也，但箭头竟入石寸余。彼复射，箭头触石落地。由此“可知意念之重要，解放思想之威力！”这种借助于无根据的传说，鼓励唯意志论，又出自当权人物之口，当然会鼓起群众浮躁浮夸的情绪。此时又反回来依据“气可鼓而不可泄”的论述，压制一切不同意见，并上纲到两条道路斗争，从而使“浮夸风”在各条战线上愈演愈烈。

在工业建设上，“浮夸风”不仅表现在大办钢铁方面，在其它行业也很严重。不仅大城市浮夸，在一些边远地区的“浮夸风”简直到了天方夜

谭的地步。例如，云南有的地区号称平均每1.05分钟就办一个工厂，花2元钱也可以办一个工厂。 1958年甘肃静宁县谎报在15天内建了1万多个工厂，而这个县当年只有25.7万人。 贵州省镇宁县，是一个苗族聚居的县，1958年全县建了494座工厂和1205座高炉，当时全县仅30万人，平均每250人就有一座高炉。

在科学研究领域，应当是最讲科学性的，但这里也刮起了“浮夸风”。1960年秋，我刚上清华大学时，就听上两届的老同学说，1958年，全校搞科学大跃进，搞了很多不切实际的课题。例如，我们系（当时是动力系）就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说克劳休斯的“热寂说”是唯心主义，是悲观论。其它系也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大批判的课题，向科学权威挑战。

大跃进狂风飚到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薛攀皋在《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大跃进”时生物学部的回忆文章。文中有一段说：“会议一开始，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他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后来有人问薛这位领导同志是谁，他说是于光远。 当时于光远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长。

可见于光远当时也头脑发热。有一次，聂荣臻元帅（负责军事科学）曾带张劲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和于光远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泽东，要张劲夫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于光远汇报全国科技的情况。于光远根据山东省委的报告，汇报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长的南瓜上，结果苹果同南瓜一起长。那时的于光远认为，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后来，于光远越想越不是滋味，认为这是他一件丢脸的事。他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从这里吸取了教训。

全国都大跃进，中国科学院也得大跃进。因此，上级一号召，各研究所就分头动起来了，主要是搞了超声波管道化等一些东西，不少所搞大战多少天，向党献礼。这些献礼项目，都是浮夸的。

当时，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下，不迷信教授，向权威挑战，中国科学院广泛开展学术批判。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外，还批判了牛顿力学、微尔和的细胞病理学。在“科学大批判中”，说果树栽培方面农大园艺系教授沈隽“疏花疏果”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保花保果是无产阶级思想。批判在林木采伐中主张“间伐”的（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刘镇谔）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主张“皆伐”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连最抽象的数学领域也搞起了批判，武汉大学数学系的齐民友就是当作白旗给“拔掉”的，等等。心理学的批

判是从批北师大心理学教授朱智贤开始的，心理学被当作唯心主义的被否定。

教育战线的”浮夸风”也不弱。全国各地都办起了大学。专区办大学，很多县也办起了大学。在河南省逐平县10个公社8月底就创办红专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570多所 ，河南省登封县两天之内办起了44所红专大学 。大学遍地都是，村支书就可以任命大学教授。 就在我们中学——浠水一中，也腾出了几间房子办起了“浠水大学”。我们中学一些老师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学教授。不知哪里来的一些二三十岁的“大学生”，在我们这些中学生面前昂首阔步、大摇大摆起来。“浠水大学”不到几个月就散了伙。报纸宣传，截止7月底，全国已有639个县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

在文化战线，其狂热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有的单位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郑州会议还提出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各级都要成立“艺术卫星指挥部”。一瞬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例如江西省组织了5000多个山歌社，四川省组织了 22000多个农村文艺创作小组，安徽省队队有创作小组。由于提出了放文艺卫星的任务，层层布置，层层加码，使得许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一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打转转。”

全国都搞诗歌运动。著名诗人田间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他在那里搞起了“诗传单”，不但他写，还把所有的村干部、社员都拉进去写诗。写出来的都是顺口溜，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六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这些诗编成集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后来，这场诗歌运动越搞越大，闹到火车上每个乘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公社开展有比赛。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最后张家口地区竟出了一位“万首诗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就写了一万首诗！

当时，一些著名作家、诗人、文艺工作者，有的不了解真相，有的随

波逐流，有的卖身投靠，用自己手中的笔，胡说八道，助纣为虐。在这些人当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

当时被认为是大文豪、大诗人的郭沫若，写了不少歌颂大跃进的诗，现引他写的《太阳问答》中的几句：

农民：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我们出工老半天，

你睡懒觉迟迟起。

我们摸黑才回来，

你早收工进山里。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太阳：

同志同志你问得好，

我举起双手投降了。

我因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见不到。

西方的情况真糟糕，

不劳动的人光胡闹。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志同志我敢担保。

接下去是几段农民和月亮、农民和星星的对诗，极其夸张之能事，不

再援引。最后一段是农民、太阳、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谢党呵感谢党，

党是不落的红太阳。

东风永把西风压，

社会主义放光芒。

鼓足干劲争上游，

多快好省建天堂。

红旗插遍全世界，

红旗插在天顶上。

郭沫若还与周扬一起编《红旗歌谣》，这本书极尽浮夸献媚之能事。但是，1963年11月14日，郭沫若给陈明远的信中写道：“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 据说，郭沫若的秘书对这封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如果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1958年不了解真实情况，跟风起哄；如果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1958年是对实际的无知，跟风起哄，还是内心很明白，却要违背良心，作“新文艺的大敌”、“新社会的大敌”，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样浮夸献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泽东曾说过，“经济事业和作诗是两回事。‘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怎么端得起来？” 但是，当时报刊没有宣传毛泽东这些话。因为“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这样的诗歌在当时浮夸风中推波助澜。

统计部门的“浮夸风”影响最大。本来，统计工作的生命和灵魂在于真实，然而在“大跃进”运动期间，统计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用编织的数字来证实谎言。国民经济信息的严重失真直接导致了决策的失误。北戴河会议之所以做出大炼钢铁的决议，就在很大程度上与1958年夏粮的虚假数字造成了“农业问题已经解决”的

假象有关。

1958年的工农业大跃进带来了“统计工作的大跃进”，从而产生了“跃进型”统计体制。“跃进型”统计体制，是指在大跃进期间形成的以党政领导的意图和指示为圭臬，以证明大跃进路线的正确性为宗旨的统计体制。大跃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在数字上必须体现。在组织压力下，统计部门不得不服从各级党政机关的意志，炮制一个个高产卫星，形成一套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统计”数据。困难时期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正与这一体制密不可分。

在极权制度下，国家机器上的所有零件都紧紧围绕政治轴心运转，统计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统计工作者从上级那里得到的指令是：“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要根据党的指示和实际工作需要办事，党叫怎样做，就怎么做。”薛暮桥和贾启允是当时中家统计局的领导人。

为了把统计工作完全纳入大跃进的轨道，使它成为服务于大跃进的“驯服”工具，各级政权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实现软控制，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动用国家机器实行超强控制，对不听话的统计工作者进行批判、斗争。与此相反，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反而得到表扬和提拔。统计管理也下放权力， 国家统计局要求地方统计部门以90%的时间完成地方任务，上报的统计数字要经党委批准，甚至统计方法也突出“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从而便利了地方党政领导对统计工作的干预。根据薛暮桥回忆，1958年8月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他诉苦：“省委要统计局报假帐，不报就要受处分。”问薛暮桥怎么办。薛回答说，“大跃进势不可挡，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真实数字拿出来。”薛暮桥在这里暗示统计工作者搞两套统计数字，把真的留下来，等中央需要时再上报。

随着大跃进的升温，统计部门对“统计大跃进”的认识也呈水涨船高之势。薛暮桥6月份的讲话中提出“方向道路是主要的，业务是次要的。”“我们搞统计工作是为人家服务的，不是为自己服务。要不要，要什么，要问人家。计算方法，计算口径，也是如此，为谁服务，就去问谁。”薛暮桥还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当时经济学界讨论速度和比例的关系（针对只顾高速度）、讨论经济核算（针对不讲经济效益）、讨论商品经济（针对消灭商品经济），薛暮桥还是站在比较科学的一方，但是，在“势不可挡”的形势面前，在他主管的统计工作中，也顶不住了。

1958年6月份在河北保定召开的全国统计工作现场会议上，打破了原来的跃进标准，认为“统计工作是否跃进，既不在报表数量的多少，也不在时间的迟早”，重新确立了跃进的两条标准：第一，政治领导业务，同群众的生产高潮结合起来，及时掌握生产进度，发动群众评比，党政领导需要什么统计资料，我们就提供什么统计资料，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开展到哪里，统计工作就跟到哪里”；第二，在各级党委的经常领导下，由统计部门统一组织，结合群众生产运动，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统计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贯彻执行统计工作的群众路线。”《人民日报》在8月13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全民办统计”，意欲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动“统计跃进”。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下达了几项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如允许家庭养猪，扩大自留地等。统计工作者利用这个稍微宽松的政治环境，准备纠正统计工作中的错误。1959年4月召开的国家统计局长座谈会上提出了提高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建立准确的人民公社统计工作，做好农作物产量调查工作以及整顿工矿企业统计工作等问题。国家统计局还提交了几篇反映大跃进中实际存在问题的报告，如《关于钢铁工业的几个问题》和《女职工人数的增长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地方统计部门也行动起来，用统计手段分析本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如江苏省统计局编印了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统计报告》，专门向指挥生产的党政领导反映情况。这些统计报告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跃进”的得失利弊，对抵制“五风”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不久就被批评为“向大跃进吹冷风。”

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和以后的反右倾运动，国家统计局不得不送上了检讨报告，承认前些时由于“政治觉悟不高”而向大跃进“吹了几口冷风”。而且，国家统计局不仅带头写了十几篇报告，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基本建设等方面全面论证总路线的正确性和伟大成就，还通知各地统计局：“希望各省市的同志们动员组织全体统计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拿起统计武器，为坚决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在极权制度下，统计数字“随风倒”，随最高掌权者的主观意愿而忽高忽低，“热涨冷缩”。即使个人品质较好的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只要他为这个制度服务，也只能随之“热胀冷缩”。这一点，毛泽东是明白的，但在制度面前他也无能为力。1961年3月5日，在广东省委3号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胡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

三、瞎指挥搞乱经济

瞎指挥也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强风。当时搞各种“大办”：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大办工业……每种“大办”都是“大兵团作战”、“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人，呼之即来，招之即去，“白天红旗如潮，晚上是火把如海”。有的县领导人晚上站在山头上看各公社的干劲，看到哪里火把最多，就认为哪里干劲越大，不问劳动效果如何，第二天就在全县广播上表扬。其实，这种大兵团作战不仅造成了窝工和浪费，也使得干部的瞎指挥到了极致。农业上的瞎指挥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少，什么时候种，用什么方式种，都由上级规定。上级的规定不是来自实际，而是来自更上一级的意图。上面有什么意图，下面就层层放大，最后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密植，二是深翻。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说过话，下面就当圣旨，强令农民执行。

关于密植，其实毛泽东只说一个字，这就是他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意思是要搞好农业必须抓好这八个方面。前面四个字好理解，不必解释。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水土保持；工，是工具改革；管，是田间管理。“密”字仅是“八字宪法”中的一个字。这一个字经各级领导人层层放大，就变成了一股狂风，刮遍全国各地。在很多地方，县里规定禾苗行距和株距，由公社贯彻到每一个生产队，没有按这个指示插的秧，不管多大面积，都得全部拨掉重插。不仅重新返工，还要“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不同意搞密植的被说成是“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就要当作“白旗”被拔掉；而把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看作“红旗”，加以表彰和重用。四川省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上一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五个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八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请求来公社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地委领导人答复不行，说：“因为你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由于过度密植，有的一亩地就播下种子几百斤，长出后苗株间密不透风，阳光也进不去，连种子也收不回。尽管如此，但“密植”是来自最高指示，谁也不敢反对。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后还得毛泽东自己出来说话。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才解决“不可太密”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说话没有政治风险。

对深翻，毛泽东也讲过几句深翻对作物生长有利的话。于是，全国各地都深翻土地1米以上。把生土翻上来，把熟土埋在下面。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大幅度减产。

吉林省公主岭凤响乡泡子沿村，1958年10月，将凤响、响水、范家屯三个区并入一个大公社——范家屯人民公社，下设团、营、连的军事体制。然后"大跃进、大兵团大会战"。第一个战役就是深翻地。在会战中"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各家烟囱站岗，锁头看门"，上至拄棍的，下至懂事的，全部到田里参加大会战。全管区共抽1000人，其中500人被调到王学坊管理区"放卫星"，其余500人在本村搞会战，全面掀起深翻高潮。要求所有土地全部翻身，深翻三尺。公社天天搞检查，随时报进度。10 队因进度慢，队长万老九，被公社干部当场拔了"白旗"，撤了职。为了加快深翻进度，劳动力都抽走了，只剩下老人、妇女搞秋收，有10%的庄稼扔在地里。

辽宁省铁岭县汎河公社，上级说搞密植，就不管好坏地，一律规定一个株距，下种时用尺量。有一个社员比规定的株距种宽了一点，就拉到会上"辩论"，直到本人承认"破坏生产"才算完事。各种活计安排，都是公社干部发令，大队干部传令，小队干部听令，社员任凭干部摆弄。不管干什么，都要求一个规格，一个期限，一个进度，完不成就大搞夜战，大搞辩论。杨威楼生产队社员编了一个顺口溜："种地不由民，生产乱调兵，草比苗还高，还喊产万斤"。瞎指挥从1958年一直搞到1960年。1960年社员说："58年你们瞎指挥，我们提意见；59年你们搞瞎指挥，我们还偷着干；今年豁出来了，叫我们种石头我们也种。反正我们挨饿你们也饱不了。"

湖北省沔阳县在贯彻《紧急指示》（十二条）的过程中，由于中共中央开始批评瞎指挥，群众才敢说话，贴了不少批评瞎指挥的大字报。选录如下几张：

天下雪，地下秧，谷芽落地一扫光，

群众反映有困难，右倾帽子实难当。

（沙湖公社中帮管理区群众贴）

稀奇稀奇真稀奇，那有小麦种这密，

每亩下种一千斤，害得群众饿肚皮。

（双江公社黄荆生产队群众贴）

干部强迫命令大，整好熟田不插秧，

一切停止把湖下，误了一年好庄稼。

（沙湖公社杜窑管理区群众贴）

干部主观主义大，扭转乾坤种庄稼，

为了好看连片化，坏田也要种棉花。

（杨林尾公社中心生产队群众贴）

四、强迫命令风视民如草芥

干部强迫命令和特殊化，本是极权制度的产物，又是对农民实行专制的具体表现。在大饥荒期间，除了饥饿死亡以外，被拷打、折磨致死的不计其数。在本书各省的章节中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只重点介绍一下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发生的“上海奉贤县问题”。

1958年6、7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就发生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因而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现象。据调查，被活活打死的农民有4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死的有95人，昼夜连续劳动不准休息而累死的131人，生病不准请医治而导致死亡的205人，不准父母请假、使生病儿童失去护理而致死亡的411人，其它因严重强迫命令而造成死亡的114人。共计960人。仅奉贤公社（县委的重点社）一个社，被直接或间接逼死的群众，就达364人。经初步调查，公社党委副书记、正副社长以上的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捆绑、吊、打、关过农民的就有55人，占上述干部总数的50％，被他们亲手捆绑、吊、打、关过的农民有329人，被他们直接逼死的农民有29人。

10月间，县委领导人王文忠、李少峰等又提出“向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地、富、反、坏分子作斗争”的口号，普遍发生乱斗中农乱撤干部的现象。经县委排队准备斗争、撤职的干部有1800多人（占干部总数近20％），其中725人已被斗争后撤职。被戴上“富裕中农”帽子（实际上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而斗争或劳改的农民，约4000人左右。

10月下旬，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公社和生产营都普遍设立了所谓“劳改队”，被劳改的农民就有2400多人，此外集训了2000多人。有的“劳改队”还定了各种“处罚条例”，动辄加以严刑拷打。县公安局还举办了“儿童集训班”，集训了200多名儿童。进入集训班的儿童大都10岁左右，最小的仅6岁。“儿童集训班”规定不准哭，不准笑，不准玩，不准讲话，违者就受到吊打、脚踢、罚站、罚跪，用针刺手心、用手铐铐（小手小，双手铐在一个圈里），用手枪对准脑袋等种种摧残手段进行折磨。

11月间，该县在消灭红铃虫的工作中，认为放过棉花的房子都有红铃虫，就将放过棉花的2131间房子烧掉。此外，在“拆屋并村”时，又拆掉房屋2146间。被拆房屋的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有的淋雨受冻、气愤发疯，有的叫苦连天，碰头打滚。在深耕秋播中，强迫群众将已经成熟、即将收获的棉花78891亩统统翻掉。在兴修水利时，为了铺设运土方的四轮车木轨道，将全县9000多台织布机全部拆掉，连社员的门窗、地板、板壁等也被拆走，还挖出了墓地里8000多具棺材。掘墓时既不征得墓主的同意，对尸骨也不作善后处理。

奉贤县的问题虽然很突出，但不是个别的。不管是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山东省，还是远在大西南的云南省泸西和远在大西北的甘肃省通渭，都出现过类似奉贤这样的问题，有的情况比奉贤还要严重。但是，在处理这些违法乱纪的干部时，又都追究这些干部个人和其配偶的家庭出身。认为是他们是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大搞“民主革命补课”，为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埋下了伏笔。

五、干部特殊化也成了风

由于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干部掌握着一切资源，权力的运用又没有制衡，干部们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饥荒期间，干部特殊化主要表现在食品方面。干部及其亲属多吃多占，损公肥私比较普遍。干部大吃大喝和农民的饥饿形成了强烈反差。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时已有大量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六、“五风”是怎样刮起来的

“五风”其所以成为全局性的灾难，有刮风的，有跟风的。刮风的是风源，跟风使“五风”越刮越大，越刮越紧。

有人说风源是毛泽东，毛曾自己说过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说风源是刘少奇，1958年夏秋之间，刘说过很多狂热的话。不管怎么样，在当时中国那种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响全国的风潮。全国性风潮一般是由高层领导刮起来的，或者起源于地方（实际是地方官员揣磨中央的意图而作为），然后由高层领导肯定或倡导刮向全国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对“五风”的形成过程讲了一外故事：有一个人砌了一堵墙，粉刷得很干净，不让任何人在墙上画东西，他就在墙上写了“此墙不准画”。有一个人看了就写了一句“我来画一画”，第三个人看了就写了“你画我也画”，后来又一个人写了“要画大家画”。这样就成了一首诗：此墙不准画，我来画一画，你画我也画，要画大家画。周恩来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这堵墙不是一个人弄脏的，“五风”不是某一个人刮起来的。

毛泽东“始作俑者”的事实本书已有充分的介绍。由于刘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于对蒙冤者的同情，在以后的社会舆论和回忆文章中，常常把刘说成毛泽东的错误的反对者，是“右”的，是反“五风”的。其实不然。看了下面列举刘少奇在1958年的一些言论，读者就会知道，刘少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这方面的言论，本书其它章节已经有些介绍，这里再作些补充：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等九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刘少奇这次还讲到要消灭家庭。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认为，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三、四十年之后，我看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

1958年7月1日，刘少奇在首钢视察时说：“总路线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总路线的，通通破掉。”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

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地委向刘少奇汇报到高速度的粮食增产与生产基础条件不相适应是当前一个重要矛盾时，刘少奇说：“乡社合一怎么样啊，你们不是并社吗，一乡一社不好吗？”“农业合作社，合在一块，采取打乱平均的办法，把道路一修，那个吃亏，那个占便宜，好在你这里土地多，大家搞的嘛，什么你的。”“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 中共徐水县委作了一个《关于最近几年全面跃进规划草案》，送刘少奇看，少奇同志不仅在视察前看过，而且还记得非常清楚，于是少奇同志于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只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极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文化，工农、城乡以及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了，这才得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不过，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却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储江同志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少奇同志对群众的这两句在，感到很有意思，他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

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 刘少奇在9月27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对上述“两个心思”又作了进一步的强调。他说：“从马克思以来，从提出共产主义制度这个理想以来，就有人反对。反对的一条理由就是认为实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愿工作了，就要懒下来…….我们实行供给制，也有人怕‘干不干，两斤半’。劳动人民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想到实行供给制以后，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农民这句话证明，实行粮食供给制，不是使人家更懒了，而是使人更勤劳。”

在同一次讲话中，刘少奇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要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他站稳了，他实行了供给制，其它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齐。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视察，不仅鼓吹共产主义，还相信下面干部说的假话，并加以鼓励。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主观唯心论的口号。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刘少奇很支持密植，看过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说：“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方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锄草、间苗的话，可以作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笑着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刘少奇同志一再赞扬各地从公社里组织大批“远征队”上山采矿，到城市炼钢铁的做法。他说：“现在各地方炼钢铁、采矿石、修水利都是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各人自带工具、自备粮食，或者实行粮食供给制，或者半供给半工资制，这办法很好，一个钢铁基地就集中了

几千几万人……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是新的劳动工资制度的萌芽，它给我们今后新办工厂的劳动制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道路。” 刘少奇这段话不仅助长了各地的瞎指挥，还对劳动制度的改革进行了误导。9月27日，他在南京向党员干部的讲话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江苏省有300多万人炼钢铁，大多是从农村调去的。他们搭起棚子就干，情绪很高，不扯皮，不闹待遇，也不闹什么劳动保险，什么工资太少。江苏省只有50万产业工人，现在炼钢铁的有300万。哪个大呢？是300万大。这就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炼钢铁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开纱厂也可以这么做？比如，这个厂要两千名工人，请你们哪两个县调两千工人……那么机械厂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共产主义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因为你横竖有饭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个报酬，而且是没有定额的。”

我这里罗列刘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风”的言论，并不是说，“五风”的风源是刘少奇。也不是为了减轻毛泽东的责任，而是说明，自从批评“反冒进”以后，当时中央领导集团中的多数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是支持毛泽东的。其中，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调子一致，他们有时还说出比毛泽东更激进的话。20多年以后，邓小平回顾当年的情况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何止没有反对？实际是火上加油，推波助澜。如果要追究“五风”的风源的话，那就是整个中央领导集团。当然，说中央领导集团有意刮“五风”那也不符合事实。他们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们的这些言行一层一层地放大、扭曲，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更有制度的原因。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风源”来自中央领导集团。在高度集权的制度下，中央一有动静，下面的跟风者会成千上万、风起云涌。

在庞大的跟风队伍中，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自觉认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机钻的；四是盲目无知的；五是混水摸鱼的。

自觉认同者中有一批是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盲目无知者，相当一部分是“热血青年”，他们深信在“共产主义教育”中学到的一切，深信报刊上关于大跃进宣传。这两部分人在知识水平上是高低不同的两极，但在跟风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真诚”的赞同，他们表现得自觉而虔诚。他们在跟风过程有一种参与神圣事业的自豪感，有一种实现理想目标的责任心。但是，这两类人在这些方面的“深度”和“高度”显然不同。自觉认同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有号召力，能发动群众，关键时刻能提出新的口号，新的说法推动运动深入。无知的“热血青年”，最为激进，最容易把事情推向极端，也最具

有破坏性。这两批人是跟风力量的中坚。

热血青年，脑子里只有舆论所灌输的共产主义信仰，再没有别的东西。他们很容易被上级领导发动起来，不顾一切地去保卫某种价值。为保卫这种价值，他们无所畏惧。这种无畏是以无知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每次政治运动，都是热血青年打冲锋，这是毛泽东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毁性的力量。他们易冲动，往往把事情搞得过火，只要这种过火不破坏政府的目标，这种过火是允许的，甚至被认为是可爱的。

被迫自保而跟风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跟风有可能被认定为“态度”、“立场”有问题，有可能犯“方向”、“路线”错误。右倾的帽子就拿在上级的手上，是可以随时给戴上的，谁也担当不起。在这批人当中，多数人不激进，但也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为了给自己营造更可靠的保护层，也说出一些过激的话，做出一些过激的事。开始有的地方放“高产卫星”，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信以为真，许多地方领导人起初都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到了“浮夸”者得到了中央的称赞，感到自己再不跟风就有政治危险时，才跟风放起了“卫星”。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持否定、批判态度者，开始只是少数人，经过一段时间你看我、我看你，尤其是看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后，才“同仇敌忾”掀起“反右倾”的风潮的。跟风者知道自己的行为违背现实，也违背自己的心愿，但是身不由己或无可奈何。其中，有良心的人，在跟风过程往往伴随着痛苦与不安，伴随着对风潮严重后果的担忧与焦虑。

一些投机钻营分子，跟风是为了投领导人所好，是向上爬的手段。这固然与个人品质有关，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的干部人事制度造成的。干部提拔，人事任免，不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全由领导人说了算。只要主要领导人喜欢，仕途就畅通无阻。在这种制度下，看到上级喜欢亩产1000斤，他就来一个亩产2000斤。他的言行举止，完全是为了取得上面的好感与欢心。他使出浑身解数去跟风，以求仕途通达。

在农村有一批素质极差的人，在任何政治运动中，总是打头阵。毛泽东的《湖南运动考察报告》中称这种人为“痞子”。没有这些“痞子”，运动就打不开局面。所以毛泽东对“痞子运动”持肯定态度。在土地改革以及以后的“四清运动”中，这些人被称之为“勇敢分子”。在公社以下的农村干部队伍中，就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总是表现得十分激进，以求混水摸鱼。对农民进行拷打，捆绑，各种违反政策的事，就是这批人干出来的。但有些事不完全是“痞子”干出来的，彭秀梅就是一例。

彭梅秀是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她不是坏人，只是“三

面红旗”的一个积极推行者。她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湖南省劳动模范、省人大代表。土改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她都是分子。１９５２年她串联了左邻右舍六户农民组织了互助组。秋后，六户农民家家增产。“彭梅秀互助组”被评为全县的模范互助组。以后的合作化中，她又带头紧跟中央，组织了初级社、高级社。省报和地报还经常有她的报道。我这里提到她还因为她和刘少奇直接发生过冲突，作为风源人物之一的刘少奇认识已经改变，而她还没有转变。《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一书对她作了生动的介绍。现摘录如下：

在大炼钢铁时，公社下达天华大队上交林炭的任务很重，按这个指标，得把山上的林木砍光。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段树成建议不要上交这么多。彭梅秀一口否定，上交任务一斤不少，结果几个山头都剃了光头。后来又没有炼出钢铁，段树成说“这是得不偿失”。上级强调棉田成片，但那片棉田中间有几丘冷浸田不适合种棉花。小队干部请示段树成。段树成回答说：“因地制宜吧！”结果，大片棉田中，有几丘田种了水稻。大队有个茶园，由于虫害和干旱，有些茶树枯死，在茶树间有一些空地。段树成让社员在空地上栽上了红薯，以补茶场工人粮食不足。彭梅秀就上面三件事把段树成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日夜批斗， 车轮战术，留党察看两年。

刘少奇到天华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六十条，重点听取对公共食堂的见。彭梅秀也参加了一次座谈会。刘少奇说，“我们今天讨论公共食堂，刚才已经学习过六十条，请谈谈你的看法吧。”彭梅秀拿起桌上的一本六十条，翻了几页，说：“刘主席，我们今天不说办不办公共食堂的事！”刘少奇微笑着说：“为什么呢？”彭梅秀扬着手里的六十条说：“第34条讲得很明白，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天华怎么没有条件呢？省里都在天华开过座谈会。即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要不然，还算什么红旗大队？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拆社会主义墙脚，不办，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刘少奇笑了笑，说：“过去我们的宣传有点过火，也不能说不办公共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看有不有利于群众生活，有不有利于发展生产。红旗大队更应该实事求是！”彭梅秀不假思索地说：“别人办不办，我不管，反正天华的公共食堂要坚决办，积极办！”

彭梅秀文化水平低，不知天高地厚，连刘少奇也不放在眼里。她得知刘少奇找她的“政敌”段树成了解情况，很不满意。在屋里摔东西，担桌子，暴跳如雷。她冲到刘少奇和段树成谈话的屋子，要进去，被刘少奇的警卫拦在门外。彭梅秀大喊大叫：“刘胡子，你到天华来搞我的名堂，我不怕你！”

此后的几天，彭梅秀越来越不像话，对中央调查组的工作设置重重障碍，长沙县委不得不将她调到另一个大队任党支部书记。几天以后，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长沙县委书记李满成等上领导人到天华大队开会，刘少奇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彭梅秀工作调动的决定，同时宣布为段树成平反。并由段树成担任天华大队领导。就在这个时候，彭梅秀闯到会场来了，她哭着，闹着，在地上打滚，破口大骂“刘胡子”。

应该说，彭梅秀这样的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忠诚骨干，是核心力量，中国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就是靠这样一些人推动的。

“风源人物”和大批跟风者又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联系起来，使“五风”的蔓延有了组织依托。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核心人物，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每次运动，都是通过这种层层核心力量，通过种种会议，实行全民动员，大搞“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群众运动，把它作为推动一切工作的手段。不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众运动，就是在科学性很强的工业建设中，也大搞群众运动。作为工业指导思想的“鞍钢宪法”中，就有“大搞群众运动”这一条。其实，在极权制度下，群众运动实质就是运动群众。群众运动背后总是以最高权力的意志为背景的。最高权力人物“运动”群众打击自己的反对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众运动是依靠权力系统层层发动的，在运作过程中有权力的操纵。被“运动”的群众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断能力，处于一种盲目的亢奋状态，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就出现了“过火”行为。只要这种“过火”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内，最高当权者是乐观其成的。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往”思想的指引下，这种被“运动”起来的无知者，对一切反对力量和反对意见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有了风源，又有了跟风者，如果没有舆工具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还不足以刮起持久的影响全国的“五风”。上面介绍的种种跟风人物，都是在舆论工具的鼓动下行动的。甚至风源人物也受到舆论工具的影响。这里说的舆论工具，不仅是报纸、电台，还包括文艺工、教育、社会科学。舆论工具的动员作用是“五风”大面积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新闻、文艺、教育、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中国共产党严格控制下动员群众的工具。在全体人民中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批判一切非共产主义思想，是这些机构的任务。教育工作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灌输，在一张白纸上印上最初的印记；文艺工作者则编织动人的故事，改变人们的感情；社会科学研究，则用共产主义理论“武装”群众，从深层次改变人们的认识；而新闻则无时无地的用“事实”教育群众，开

成强大的攻势。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都是知识分子。建国以来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大多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一些独立思考的人士几乎被扫荡以尽，能留在工作岗位上的，不是顺从者就是没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只知道共产主义不知道其它的年轻人。这些在舆论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在宣传共产主义以及"三面红旗"时，不仅干劲十足，还富有创造性。

舆论工具说假话不脸红，因为也是有理论根据的。 当时新闻界常用的理论是：

"现象和本质"。你看到的虽然是真实的，但只是表面现象，不是事物的本质。记者明明看到了真实情况，却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质"的理由被编辑部否定。明明是与现实相悖的报道，却因为它说出了事物的"本质"，而得到肯定。当然，什么是本质，只有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体"。不能只看一个局部，要从全局上看问题。你虽然看到了真实情况，如饿死了人，但这只是一个局部，不能代表整体情况。缺点只是"一个指头"，而"九个指头"是好的。你如果过份强调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体"的错误。当然，普通百姓、一般记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领导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说话，写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虽然你看到了眼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虽然多数农民的现实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这有利于他们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谁能了解什么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小知识分子，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最高当权者才有这个认识水平。

"事实选择的阶级性"。世间事物是十分复杂的，同一个问题包含着很多不同的事实。说话、写文章就要选择事实。选择过程就体现了一个人的立场，体现了他代表谁的利益。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对"三面红旗"怀有强烈阶级感情的人，在写文章、说话时，决不会选择不利于无产阶级的事实。而选择"黑暗面"的事实，批评"三面红旗"的人，他的立场、感情一定有问题。

这些"本质"、"整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论，把判断是非的权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领导人手里，下面的人只能听命从事。"事实选择的阶级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们思考问题、写文章时，只能选择反映"光明"的事实，不能选择反映"黑暗"的事实。所以，报纸上只能一片叫好，没有一丝批评的声音。

舆论一律，理论一律，文艺、教育也是一律。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声音，没有“噪音”，没有“杂音”。“五风”也就一致地刮了起来。

在思想舆论控制和信息封锁的条件下，开动所有的舆论机器，长期宣传一种价值，批判其它价值，这样，在无知青年的头脑中造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是非和爱憎，形成了实现崇高理想的强烈渴望。这时，如果有反对这种理想或与这种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现，必定受到群起的攻击。

七、“五风”屡禁不止

对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毛泽东在1958年底就有所察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就指出“共产风”“引起了农民的极大恐慌”。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清理“共产风”，“五风”有所收敛，但不久又刮了起来，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刮得更厉害。

1960年11月3日，湖北省沔阳县委报告，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对“共产风”年年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刮，而且越刮越严重。开始，只有县、公社、生产队刮，到后来，省、专两级也刮，社员和社员之间也刮。开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资金、粮食等，到后来，就像群众说的，“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上至树梢，下至浮土”什么东西都刮到了。生产队变成了“一口破锅”、“一个烂摊子”。 9月18日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给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的信中说，在沔阳县通海口公社，“共产风”、乱指挥生产、粮食、自留地等问题最为严重。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至省级，下至小队；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至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许多生产队粗算了一下，“共产风”的各项损失，人均达50元左右，多的达一百多元，相当于社员一年到两年的分配收入。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采取了靠电话统一指挥生产的办法，公社统一安排农活，全社一齐行动，群众称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粮食方面较普遍的问题是征过头粮。有的生产队还几次压缩社员的自留地。社员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粮食连年减产。

毛泽东大概不仅看到来自湖北省沔阳县的报告，中共中央再一次下定了刹住“五风”的决心。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招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对“五风”一刮再刮的问题，毛泽东有过反思，他认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乱，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乱。他说：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 ，十四句话， 也搞了六条指示 ，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厉害，1958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1957年是2400万，1958年是4400万，1959年和1960年又增加了600万，合计比1957年增加2600万。

毛泽东从中央领导思想上找“五风”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确提出“人祸”问题，这是对的。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说到，1960年“五风”比1958年持续时间更长的主要原因，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五风”难以纠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个指

头”，不能伤及“九个指头”。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纠正“五风”，各级干部也听命行事。在1960年底到1961年，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开展了整风整社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整风整社中，纠正“五风”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赔，让社员揭发批斗干部的“五风”行为。退赔、清算是不彻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这些运动中，农村基层干部真正受到了打击。有人估计，在整风整社中，受批判斗争的干部5%左右，受到党纪处分的大约占15%左右。这种政治运动的办法虽然对共“五风”进行了有限的纠正，但同时，由于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运动形式，使行政权力进一步神化，强化了极权制度的的危害。

“五风” 屡禁不止，最后不得不靠强权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来解决，这是因为“五风”有深刻的制度基础。30多年以后，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共产风”其所以连绵不断，清理了又刮，边清理边刮，固然同清算、退赔不彻底，特别是同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有密切关系，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在于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阶段空想论的影响。” 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给制和工资制度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三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四是政社合一的体制。薄一波这一点说得对，“五风”其所以产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实际的理想。而且这种理想已经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仅如此，产生“五风”的制度，不仅仅在人民公社这一层级上。整个国家制度，即极权制度，才是产生“五风”的真正根源。不解决制度问题，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里反“五风”，是不可能彻底的。以后的历史证明，在大饥荒以后的岁月里，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21世纪初，除了“共产风”不再刮以外，其它四风依存在。到20世纪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新的“浮夸风”机制。

第二十章　执政者对危机的反应

任何一个政府，面对危机都会采取相应的对策。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面对全国性的大饥荒，也曾调整政策，纠正错误。这主要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间的八个月。

毛泽东的一切纠偏措施以不伤及“三面红旗”为限，而“三面红旗”恰恰是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毛泽东把执行“三面红旗”的成绩和问题说成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纠偏时只能谈“一个指头”不能伤及“九个指

头”。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说：“毛泽东对错误的纠正是局部的，以不允许动摇三面红旗为前提的。”在庐山会议以后，连这个限度以内的纠正措施也废除了。1960年又一次大跃进，又一次共产风，1961年又一次纠偏，但为时已晚，大饥荒持续了三四年。纠正错误的迟缓、波折、低效，不仅反映这个制度信息闭塞、机制僵化、领导专制等种种弊端，还反映这个制度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

一、纠偏只有八个月，庐山会议一风吹

自1958年夏秋以来，由于大跃进搞乱了全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毛泽东的认识有了转变，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有所冷却。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察觉。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这八个月间，采取了一些纠正偏差、克服困难的措施。毛泽东首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统一领导层的认识。

一是1958年11月2日－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二是11月21－27日，武昌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如商品、货币、按劳分配，我们还要利用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是11月28－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

四是1959年2月27－3月5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见本书“人民公社”一章），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重申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揭示共产风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成果。

五是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上，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决定对“一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除了上述会议，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就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纠正了偏激的看法。

但是，在上述会议和信件中，毛泽东除了讲一些纠正偏差的话以外，也讲了另一面的话。例如，他认为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是快了，但他还说“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萌芽”。他还是想尽快地过渡到共产主义。他说过反对“一平二调”的话，但他也说过“公粮、积累、劳动力，都是调拨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他认为“现在只能部分地调，全省全国调不行。”他主张在公社内部可以无偿调拨，搞公社范围内的“小全民所有制”。 他说过不能一下子否定价值法则，但也说过“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 他讲过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认为“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 在纠正1958年以来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要求宣传部门继续歌颂“三面红旗”。对于1958年秋季以来出现的大量问题，毛泽东肯定了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1月20日报批的《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几项通知》中的意见：对报刊工作的态度是，继续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进行充分地宣传，只宣传成就和积极方面，一般不报道消极方面。毛泽东还加了一段话：“鉴于1956年反冒进时期，对工作的缺点，宣传过多，给群众热情以很大打击，造成了马鞍形。而所谓缺点，事后检查，不过是十个指头的一个指头，或者还不到一个指头。那时却有些人大惊小怪，惊惶失措，是一种左倾情绪的表现。这个教训，千万不要忘记。”

在转变指导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也采取了一些向农民让步的具体措施：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6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社员饲养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对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养猪，有所放松。

指导思想的这些转变和上述向农民让步的具体措施，在庐山会议及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全都“一风吹”。1959年9月29日，农业部党组向中央、主席送交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指出五、六、七三个月内农村出现了一股右倾歪风：改变了“基本队有制”，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包产到户，实际是恢复单干；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吹掉了部分供给制；吹掉公共食堂。 其实，农业部党组指出的这些问题，正是在执行中共中央向农民让步的政策的结果，即上述中共中央的在5月7日和6月11日发出的三个文件的结果。中共中央很快批转了农业部党组的这个报告，说农业部党组揭露的这些问题“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要求“彻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其实，毛泽东对1959年五六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几个让步文件早有看法。他的爱将李井泉1960年2月向地委书记就有所透露。李井泉说：“主席说，去年五六月份中央发的一些东西中，有的是有消极东西的。要检查一下，然后对农村工作还要发一个指示。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领会，应当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问题上，应该积极办好，就是允许自愿，也是为了办好。”

反右倾以后的1960年又是坚持大跃进方针的一年，这一年饿死人最多。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又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大跃进中退回来。但是，在中国当时那种政治制度下，身处中央的决策者们很难得到下面的真实情况，他们发现问题总是要晚几个月，而且他们知道的危机状况比实际情况要轻得多。纠错过程又和反右倾交叉，反右倾不仅阻碍纠错，还助长错误。所以，中国共产党虽然努力纠正错误，但大饥荒还是持续了三四年。

二、毛泽东独自“唱低调”，别人还得唱高调

毛泽东不是一个迟钝的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部分领导人和若干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广泛地讨论了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3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9位省委书记的汇报时，就开始对这些高级干部做“降温”工作。说是“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 4日，在听取吴芝圃、王任重等议论十年规划时，毛泽东说：“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5日，周小舟、舒同、曾希圣反映，群众中有人怕废除票子，怕归公，因而银行提款的多，发生了抢购。毛泽东说：“废除货币，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北京现在乱得很，我们没有章程，天下大乱。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泽东还说，钢铁不去赶美，只赶英国。他还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少则三四

年，多则五六年，就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讲快了。”9日，针对一些人回避商品经济的倾向，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他说；“现在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共产主义越多越好，最好一两年内就搞成共产主义。山东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说得神乎其神，我是怀疑的。” 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多次发表讲话。他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着重讲了“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首先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于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其次，他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经济，批评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而剥夺农民的错误做法。第三，针对各地“大跃进”、“大炼钢铁”中所谓“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灯”、“挑灯夜战，日夜苦干”之类不顾群众生活的错误做法，要求各地实行“劳逸结合”，贯彻“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会议期间，毛主席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要求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并建议广大干部读一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但是，这样的话只有毛泽东能说，别人说了就有右倾之嫌。所以，这些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话都是毛泽东先说出来。毛泽东说出了这些话，又被他的下级奉为“先知”、英明。由于批评反冒进、反右派等残酷斗争，在各级干部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毛泽东说了这些话，也没人敢付之实践，还得继续唱高调。例如，在1958年11月底到12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讲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不能太快、要有条件的时候，刘少奇说，达到150元 - 200元的消费水平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消费水平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则认为，每人到150元 - 200元才可能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转了。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高层有人如此继续唱高调，到下面继续唱高调的人就更多了。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对“三面红旗”情有独钟，对“群众运动”倍加爱护，大家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基调。现在毛泽东低调讲话，大家看作暂时的，不是根本的。何况毛泽东在讲这些低调的话时，还讲了另一面的话。报纸上还成天在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泽东虽然说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话，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实。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对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低调讲话没有认真传达落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怕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还认为反“三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是一时的事，而反右倾是长远大事。 山西省委第一

书记陶鲁笳说："有纠正高指标错误的过程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时又流露出欣赏高指标的情绪，似乎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

毛泽东感到他的意见难以落实，就把纠正偏差的想法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诉到生产小队一级干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几个问题"。这封信一共讲了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为了反对高指标，他对生产队的干部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之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由于相信1958年粮食高产，认为粮食吃不完，几位中央领导人提倡"少种、高产、多收"，主张减少种植面积。毛泽东告诉六级干部，这种说法三年不可行，还是要多种。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要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毛泽东在这封信的最后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目标，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这句话表明，毛泽东还是希望达到较高的目标。唱低调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的聪明的下级早就看透了他的真实想法，按照他的真实意图行事。如吴芝圃、李井泉等。

毛泽东深知，底层干部和农民与上层统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过中上层干部，直接向底层发布他的意见，有时直接发动底层。这封信如此，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这样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级干部搞坏的。

问题发展到大批饿死人的程度，毛泽东深感到受了下面干部的欺骗。1961年初，他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一方面，他直接组织和指导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率队分别赴浙江、湖南、四川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也分别到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调查研

究。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宁乡调查研究了40多天。这些调查，了解了不少农村真实情况。但为时已晚，大错早已铸成。

1960年，中共中央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整顿“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1960年11月3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批示信》（即十二条）向全国下达。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是：

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十二条下达后20多天，即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表示：“自己也曾经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他的这个意思是以中共中央的对一个报告的批示的形式说出来的，这个报告是中共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批示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从中可以看作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的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改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7年时间公社现行的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据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

毛泽东这个自我批评的意思还是制止“共产风”。但是，有些地方“共产

风”一直刮到1961年。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这个美好的理想，在各级干部中印象太深了。这是中国舆论工具的功劳；也是因为，实现共产主义，已经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面，考核干部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他共产主义信仰是不是坚定。

三、所有制上退让，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瞒产私分的问题使毛泽东看到所有制一下子转为全民所有是不行的。为了抑制所谓瞒产私分，毛泽东等人纠正不顾条件过急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偏向，从所有制上退回来。把公社所有退回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六次讲话，重点讲调整所有制。他说：

要基本消灭三级所有制（即公社、大队、生产队）之间的差别，把三级所有制变成一级所有制，即把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生产队的经济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一下子要求完成这个过程。

就在郑州会议期间，1959年2月28日，毛泽东对《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中说：

这里应当加一句：又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全国共有几亿人口之多），公社积累过多，社员分配过少，社办、县办工业过多因而抽去人力过多，使生产队人力过少，妨碍农业任务完成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必须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

为了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毛泽东建议各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1959年3月9日，他在写给各省委书记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立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说。当然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

在毛泽东建议下，各省都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各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议）。按毛泽东的意见，也请了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人，即所谓“观潮派”参加会议。安徽的六级干部会从3月9日开始，18日结束，参加人数达1万人，内有“观潮派”1000多人。 广东的会议参加者有16000人。这些会议都是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算1958年一平二调的帐，清退物资财产。例如，湖北省麻城县召开万人大会，搞“三级检讨，三个兑现”：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让基层干部把话说出来，做到人人心情舒畅、上下团结。“三个兑现”：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穷队，该支援的，立即贷款。毛泽东对湖北省委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的三个报告都作了指示，充分肯定了麻城“三级检讨，三个兑现”的作法。 但是，这只是口头文章，实际上没有兑现，如果真的兑现了“缺口粮的，立即供应”，那就不会饿死人。

不过，从公社所有制上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能否定“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不能否定1958年的成绩，不能否定人民公社。毛泽东在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第一次讲话中有言在先：

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定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正如北戴河会议和六中全会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由农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帐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可怕。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暴露自己。到了这个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

在纠正大跃进的偏差中，干部们头上一直有一把悬剑，罪名有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观潮派、算账派、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这一把把悬剑使人们宁左勿右，阻碍着有限的纠错政策的落实。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人们对错误的估计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内，错误只是“一个指头”，即只占十分之一。超过了这个范围，悬剑就可

能落在自己的头上。

四、搞退赔，仅是纸上文章

为了纠正“共产风”，除了所有制上退回去以外，还要求各地清退“共产风”中刮走农民的和生产小队的财物。有些地方也赔了一些。如江苏省东台县唐洋公社卢南大队，归还社员小农具180件，苗猪、小猪、肉猪27头，羊33只，其它没有偿还的也计价，答应偿还。

农民的房子已经拆了，重建是很困难的，拿走的东西大部分都挥霍了，退赔很不容易。由于中共中央多次督促，各地报上来不少公社退还给生产队、生产队退还给农民的数字。

这些数字大部分是虚夸的。清退工作1959年春天开始，但进展十分艰难，在以后的三年中，中共中央曾多次发文，强调退赔问题：

1959年2月郑州会议以后的各省召开的六级干部会上，清退是一个重点内容。1960年11月3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中的第二条就指出：“凡是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县和县以上各级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向社平调的房屋、家具、土地、农具、车辆、家畜、家禽、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等种种财物，都必须认真清理，坚决退还。”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中，说，中央1960年11月3日的紧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发出后，各地都进行了退赔工作，取得了成效，但总的来说退赔工作做得不彻底，再次强调，“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决心，贯彻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多次的指示，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

中共中央这些指示在基层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呢？请看江苏省的两个资料。

1960年11月，江苏省常熟县莫城公社已经进行了“三反”，10日工作组进村与公社干部开了会，11日、12日召开了小队长以上干部会。在这两个会上都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十二条”，并联系实际进行了讨论。在食堂设立登记处，登记社员被“平调”的物资和去路，制定兑现方案。第二步是全面兑现阶段。传达后群众普遍欢迎，认为毛主席英明。但是，群众怕十二条不能兑现。干部中有人有情绪。他们说：“搞一平二调时是上面刮起来的风，通不通，三分钟，不通也得

通。现在群众批评，退物赔款难上加难，越想越冤。”“我们这些小兵小卒总是先挨当头炮，刮共产风带头上阵，批共产风带头检查。”

共产风共刮了五次的江苏省曲唐公社胡庄大队。十二条下达后，强调退赔兑现。当然，要完全兑现是很难的。只要兑现一点农民就感激不尽。七队社员刘文彬退赔得到了13元钱，高兴得不得了，说：“再不好好生产，就对不起毛主席。”七队社员马金荣退回了两件农具，高兴地说：“做梦也想不到拿去的东西还能拿回来。”兑现的第二天早上，队长的喇叭还没有喊，社员已经到齐，个个争做重活，一会儿功夫就把公路两边全都种上了蚕豆。

1961年2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洛阳地委关于退赔的报告。这个文件介绍了灵宝县大王公社“政策兑现”的情况。时任洛阳地委书记的纪登奎亲自到这个公社抓中共中央“十二条”的落实。层层召开“兑现会”。但是，“各大队兑现退赔的财物合计，只占平调总数的23%”，退赔中最困难的是，大办钢铁的亏损，兴修水利的亏损，公社无法向大队退赔。于是，“地县社工作组决定，在元月1日，又召开第二次兑现会，除了大办钢铁和修水利平调的财产以外，其它基本上退赔彻底了。”中共中央将大王公社的退赔经验向全国介绍。 要求各地“充分发动群众，真正依靠贫雇农和下中农，经过几次严肃的斗争”来搞退赔工作。实际上，斗争再严肃，公社也无法退赔已经消耗了的财物。例如，直到1961年6月，四川省眉县大办钢铁中平调走的财物，基本没有退赔；大办水利、大办交通的调走的财物，只退赔了一小部分。 中共四川省委退赔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在退赔中，县、公社一级没有钱退赔，要求财政拿钱出来；而财政又拿不出钱。各地工商部门组织生产出一部分退赔物资，但由于平调单位没有现金支付，以致这批物资积存起来，退不到社、队和社员手中。

有些地方在退赔时定了很多限制。江苏省东台县卢南大队规定：“在退赔时，苗猪和小肉猪退还给社员，母猪还是全部归集体饲养，以免发展资本主义。”“纠正共产风是人民内部的事，地主富农没有参加运动的权利，对地主富农被刮走的物资，暂不清算”。 据1961年8月统计，全国平调总数为250亿元（较原来估算的111亿元增加了1.4倍），已退赔了的占平调总数的20%－30%。经过退赔，大部分人相信今后“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像个过日子的样子了。”但是，退赔普遍不彻底，据各地统计，实际退赔到社员手中的，只占平调数字的20%－30%，其中实物退赔很少。有的地方又发生了新的平调现象。在1961年夏收中，有的地方还没收群众自留地产的小麦，顶上交任务；有的把自留地产的粮食顶分配口粮食。

五、扩大农民自由，但执行中遇到意识形态障碍

集体组织不能保证农民的生活，只好给社员一点自由，让他们自找生路。从1959年春夏之交开始，对农民的某些政策开始松绑。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为改变牲猪头数大量减少的问题，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也是如此，为此，必须分配社员一定的自留地，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二分自留地。

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四点指示：一，社员私养的猪羊鸡鸭兔卖得价款归社员个人所有，为了经营自留地和养猪羊鸡鸭兔，每月给社员放假几天；二，恢复自留地，不管喂不喂猪，都给自留地。自留地的产品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但自留地不准社员出卖、出租和私自转让；三，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时间，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土地利用起来。这些土地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四、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归社员私有。

恢复自留地和家庭饲养以后，又放开了农村集市贸易（有的地方称为“自由市场”），以调节农民家庭种养产品的余缺。以江苏省为例，集市贸易是1960年底和1961年初允许恢复的。到1962年有了一定的发展，几年不见的生畺、百合、荷藕、荸荠、茨菇都有卖的了。农村集市贸易的商品流通量，大致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5%左右。集市贸易刚开放时，食品的价格比国家牌价高出两倍以上，高价格刺激生产，使东西逐渐多了起来，价格也下降了，到1962年6月，食品只比国家牌价只高出百分之几十。 虽然开放了自由市场，但还是把自由市场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党内规定，党员干部不得到自由市场上买东西。

这些政策是受农民欢迎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出现偏向农民利益的情况（即偏右），各级党委立即制止。中共广东省委很快发现并纠正了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现象。《宣教动态》1959年第60期发表了广东省委的作法，8月1日，毛泽东就作了批示，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一律采取措施，改变现状”。中共中央于8月19日转发了这个材料和毛泽东的批示，要求“适当限制自给部分，尽可能按照城乡需要增加商品部分”，“切实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 这实际是压农民的肚皮，让农民不吃，保城市、保出口。

实际上，有些地区并没有按中央5%的要求给足自留地。江苏省全省平均只占4.7%，有的地方不足4%。一部分干部认为自留地和自由市

场“是资本主义”，怕影响集体生产，怕社员搞“自发”，对于恢复自留地的规定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四川省根本没有执行中央关于自留地的指示。

六、实行责任田，仅是暂时措施

在农业集体化以后，农村实行生产资料公有、集体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原则。怎么分配？按工分分配。工分挣得越多，分得的劳动报酬就越多。开始是“死分死记”，壮劳动力劳动一天记12分，普通劳动力劳动一天记10分，妇女和儿童劳动按劳动能力不同，一天记5分或6分不等。但“死分死记”的办法造成出工不出力。后来又发展为“死分活评”。每天劳动以后，晚上开会评工分。但评工分时拉不开面子，很难评出真正的劳动成果。后来又发展为“定额包工”的办法。这一亩地交给你锄，锄完了，再检查一下，如果合格，就给你30分。从包工发展到包产到组，最后发展到包产到户。所谓包产到户，就是这块地包给一个家庭，上交集体1000斤，多余的归自己。责任越明确，劳动和分配挂钩越紧密，劳动积极性就越高。包产到户也叫“责任田”。但是，包产到户主要生产过程是家庭经营，打破了集体经济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原则，因而被认为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有些地方实行种种变相的包产到户。这实际是生产队自发搞起来的，1959年5－7月就出现了。1961年初春安徽省委推广，安徽10户农民中有8户参加包产到户。当时把分到农户的田称为“救命田”。各地也先后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如甘肃的临夏、浙江和四川局部，参加包产到户的农户十中有七。广西龙胜、福建连城和贵州全省，十中有四。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也有大体同样的比重。到了1962年5月，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认定，全国包产到户者至少已占总数的20%。

“救命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例如，广西出现了7种形式：1，分田到户；2，包产到户；3，“公私合营”，即早造私人种，晚造集体种；4，“井田制”，即征购田集体种，口粮田个人种。有的实行三三制：即口粮田，上交田，照顾田；5，“抓大头”，即畲地分到户，水田集体种；6，山田，远田，坏田分到户，谁种谁收；7，化整为零，即过小地划分生产队，有的成了兄弟队、父子队。江苏省有些地方在全部农活包到户的同时，还以“定田到户，超产奖励”的办法，实行了全部或部分农作物（如山芋等）包产到户。

然而，包产到户是和共产党的理想相悖的，也是与集体化的方针相悖的。在三年饥荒以前的1956年，浙江省永嘉县委农业书记李云河和县委农村工作队队长戴洁天，就在这个县的燎原合作社搞过包产到户的试验。从生产看效果非常好。当时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方向问题”。1958年初，李云河成了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消职务，劳动改造。戴洁天成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双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举家遣返农村。

在三年大饥荒中，挽救危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包产到户。如果没有这项措施，可能还要饿死更多的人。但是，对这是群众的自发的救命措施，省、县级领导人只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有安徽的曾希圣1961年才明确支持并推广，不过，曾希圣也是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对外称“包工包产责任制”，实际搞的是“包产到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微妙而多变。在1959年，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饥荒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对刚露头的包产到户极力打压。195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指出，“包产到户这种毒草必须连根拔掉，一丁点也不许留！”同年12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的文章，把反包产到户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

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的《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中共中央的按语中说，“把全部或者大部农活包工到户或者包产到户的作法，实际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法，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彻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1959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关于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是9月29日写的，并作如下批语：

这个报告所反映的情况很值得注意。河南省委候补委员、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同志和洛阳地委第一书记王慧智同志，借着整社和包工包产的机会，推行所谓“地段责任制”，重新丈量土地、定界碑，主张把土地、牲畜、农具、劳力等，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指导下干活，他们赞扬所谓“满地人，不成群”的单干景象。他们想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倒退为“一小二私”的互助组或单干户。这里明显暴露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实质，是根本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思想直接反映的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要求。但是，归根结底，最后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如果不彻底地加以肃清，党的总路线是不可能顺利贯彻的，社会主义建设

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对于这种思想，各地党委应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深入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险恶面目彻底揭露，把他们的市场缩小得小而又小，把一切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彻底搞臭，以保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执行。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批评“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

也是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委关于在十个公社中选择十个大队整社试点即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经验，中共中央的按语说：“目前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

在当时那种意识形态条件下，在政权机构内部反对“救命田”的力量相当强大。有些领导人，批判右倾比毛泽东还要坚决。据对有关文献的分析，中共中央上述四个报告的按语，除湖南这个报告经过毛泽东的修改以外，其它都不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到了1960年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才真正知道饥荒的严重程度，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以生产责任制的名义默许包产到户，但不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对曾希圣说的三句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微妙态度：1961年3月15日说：“你试验嘛！搞坏了检查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好事。”1961年7月说：“你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1961年12月说：“生产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

1960年以后，由于大量饿死人，中共中央再没有打压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在各地发展很快。到1962年秋后，饥荒稍有缓解，中共中央就明确表示，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道路，下令各地“改正”。

原来搞包产到户比较多的地方，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就千方百计地淡化包产到户的情况。广西桂林地区龙胜县是搞包产到户比较有名的地方。1962年6月6日到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和王任重，到龙胜县听汇报，召开座谈会。他们写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在广西龙胜县举行的座谈纪要》中写道：“情况表明，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目前形势的主流。同时确有一部分贫下中农对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暂时的动摇；也确实还有

一小部分地富分子和少数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积极进行单干。但这不是主流。原来估计全县有60%甚至70%的生产队单干了。事实上单干并没有那么多。那是因为界限不清，把那些正确地采取田间管理责任制和其它基本上仍是集体经营的生产队，都算到单干里面去了。”这个报告表明，在最困难的时刻，中国农民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很需要这样的报告，7月22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

为了推动改正“责任田”，1962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以《安徽改正“责任田”情况》为题，向全国转发了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的总结。这个文件介绍，据最近统计，安徽省已改正“责任田”的生产队有60100多个，占实行“责任田”生产队总数的23%。这个文件说，从改正责任田过程中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说明，实行责任田虽然不到两年，但是已经暴露出来许多严重恶果：生产资料支配权已逐渐转移到个人手里，生产资料所有权发生很大变化；生产上不能统一计划，不能统一使用劳动力；统一分配受到破坏，集体和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四，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农民中个人主义、自私观念日益发展，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逐渐削弱。

改正责任田的过程是一次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当初实行责任田的积极分子，从死亡线上救助农民的基层干部，却遭受到打击。这种打击不仅在改正的过程中，在以后的“四清”和“文革”中，还加倍清算这笔政治帐。

七、下放城镇职工，减小粮食压力

粮食征购是为了满足城镇的需要。工业上得太快，城镇人口增长太快，使农业不堪重负。陈云说，三年来招收职工2500多万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1亿3千万，现在看来，并不恰当。 大跃进中，各地上的工业项目太多，造成物资、财政十分紧张。因此，“下马”一些工业建设项目，精简城镇人口，是解决粮食不足和缓解紧张气氛的一个必要措施。陈云对此作过精确的计算，他说，下乡1000万人可以少供应粮食45亿斤，下乡2000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90亿斤。

在大跃进中，由于要尽快地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大批农民进城当了工人，成了吃商品粮的人。他们由农民身份变成了工人身份，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但是好景不长，粮食一紧张，他们就成了精简下放的对象，又由工人变成了农民，社会地位下降。千万个家庭由此经历了

一次悲欢离合。陈云建议，“凡是近三年从农村来的，一般地都要动员他们回去。那里来的，就回到那里去”。

精简职工从1959年在一些地方就开始了。但精简人数不算很多，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三面红旗”重新高高举起，各地又进一步招工。由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资金和原料不足，一些工厂无法开工，大批工厂被迫关、停、并、转，一些基建目被迫停止，成千上万的工人无事可做。大规模精简职工是从1961年伴随着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的。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5月31日，陈云在会上作了“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发言。他说，要解决粮食紧张问题，有四条：第一，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如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等；第二，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第三，进口粮食，但没有外汇，没有运输力量；第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以上四条，第一条是基本的，第二、第三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则是必不可少的，非采取不可。 中央接受了陈云的建议，1961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提出在1960年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中央一声令下，各地加紧执行，大批城市居民扶老携幼回到了农村。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达《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又加强了城镇人口下放的工作。

当年到底有多少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准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报告》中说，从1961年到1963年，全国减少职工1833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

在中国当时那种制度下，不管做什么事，中央一声令下，各地总是要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下放城镇人口任务也是如此。吉林省的下放指标是81.2万人，实际下放98.0万。 河南省任务是109.9万人，实际下放120.6万人。 福建省的任务是87.3万人，实际下放94.5万人。除了近三年进城农民以外，城市中其它弱势群体的部分人口也被迫下放。上海市在1961年到1963年间，将社会闲散户和无固定工作户计6000户、2.6万人迁往安徽农村。 在齐齐哈尔市，1960年下放了11.4万人，其中在城里的盲流3.5万人，无固定职业的5.6万人。 在有些地方，劳改、劳教人家属，如果在农村有家的，也要下放，这种家庭里超过16岁的学生，也是下放对象。

在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的过程中，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遇到一些阻力。被精简的职工，有的是城市户口，在农村无依无

靠；有的早就脱离农村，在城里已经成家立业；如果下乡务农，不仅生产劳动、衣食住行等方面实际困难很多，而且农村并不欢迎他们。因此，精简职工的阻力很大。以安徽省蚌埠市为例，1961年计划压缩城市人口35600人，到10月底，只完成任务28390人，很难完成当年计划。11月份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把剩下的指标进一步下达到各个部门，要求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摸底排队，落实计划，该停的停，该并的并，该减的减，把一切可以精简的人员，迅速压回农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了1961年的计划，1962又下达了25000人的计划。 有些地方在精简过程中还出了些小乱子，如江苏省常州市大明纺织厂1962年5月20日到23日，70名安排下放回农村的老工人，集体闹事，经过几天的说服工作，事态没有扩大，这70名工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农村去了。 也有的城市，一些确定去农村的城市人口并没有去农村，而是逗留在城市通过种种不合法的手段谋生。但总的说来，两千多万人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没有出什么大乱子，是很不容易的，这只有在中国的制度下才能做到。毛泽东曾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实际上，这几千万人回到农村，留下了大量的遗留问题，受害者中的部分人，几十年来一直上访告状，70年代，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时，就接待过不少这样的来访者，以求得到公正的解决，但很少有如愿者。

八、整风整社，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

上述纠错措施，都是针对“三面红旗”中过激的问题，事实上正是“三面红旗”造成了大饥荒。所以，一纠错，就会伤及“三面红旗”，一伤及“三面红旗”，就触动了毛泽东等人最敏感的神经，认为有一股“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认为大量饿死农民的原因不是“三面红旗”，而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来自何方？毛泽东认为，在上层来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在基层则来自地、富、反、坏、右。他们反对“三面红旗”，是他们造成了农村的严重问题。自从1960年底信阳事件在党的高层揭露以后，毛泽东就把过去九分之一（“一个指头”）的问题改为“三分之一”的地方有问题。而这三分之一的问题是基层干部中坏人掌权造成的。这就把农民受摧残的原因归罪于基层干部。

1960年11月10日, 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11月15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一定要在五个月内把三分之一地区的形势扭转过来，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全国大好形

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的占三分之一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扭转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要争取1961年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在同一报告上，毛泽东批给周恩来一句话：“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196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指示》中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革命补课问题。其中写道：

山东、河南、甘肃三省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你们已有所知。现将中央监委工作情况反映215号转发给你们。这个反映中描述的贵州省的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极其严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令人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最激烈的表现。要知道，中国农村人口中还有8%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属，连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家属，总共占全国人口10%左右。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都经过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已经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中，在种种企业、事业、学校、机关、部队中，至少也生活在街道组织中。因此，我们有绝对必要改造他们。但是，他们中间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也天天在影响和腐蚀我们。其中，未被改造和不接受改造的最坚决的最隐蔽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有意识地随时都在准备“借尸还魂”篡夺领导，实行报复和疯狂挣扎。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不仅要继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务。革命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生产关系的改变，经过一定时间是可以实现的，而上层建筑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只要我们领导疏忽麻痹，政策出了偏差，反革命分子利用钻进来的机会，把我们中间的革命动摇、意志薄弱的人拖过去，使部分地区、单位、至少个别地区、单位党的领导变质，随着也就极大地破坏现在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材料揭发的事实中，已有不少明证。由此可见，整个社会改造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阶级斗争任务。反革命分子只要存在一天，决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绝望的破坏和挣扎，我们对他们万万疏忽麻痹不得。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可以拿来借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从制度、政策、指导思想方面寻找大饥荒的原因，而把大量死人的原因归罪于早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地、富、反、坏、右。说是因“民主革命不彻底”，而使阶级敌人篡夺基层领导权。这显然是违背事实。河南信阳是革命老区，民主革命就很彻底。但也被毛泽东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典型。因此，一些饿死人较多的地方，都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就是像土地改革时期那样，像斗争地主恶霸一样斗争基层干部，让农下中农申冤诉苦，然后全面夺权。（见本书“祸起中原”一章中“信阳事件”）本书作者在九十年代到甘肃、四川、广东等地了解当年情况时得知，在民主革命补课中，也像信阳一样，有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摧残。

1962年10月，中央派到四川的工作组对据四川省合川县作一了次调查，调查结果是：由于反瞒产私分、反右倾、整风整社等运动，农村干部受打击的面很广：全县共有干部25283人，自1959年到1961年，共处理了5184人，占干部总数的20．5%。其中，公社党委书记被处理的占60%，大队正副书记被处理的占57．2%，生产队正副队长被处理的占24．8%。

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中，的确有一批流氓地痞，他们借助国家政权，狐假虎威，欺压百姓。但其中多数人是在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伤害了农民。有些人在执行中过激了些，才对农民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这中间虽然有干部素质低下的原因，但其责任应在中央，而不能让一些基层干部当替罪羊。

九、几个重大错误一直坚持到底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一波三折地调整极左政策，也曾下令纠正农村干部作风，改变1958年大跃进中一些过激的作法，但是，在几个重大的问题上，没有采取切实措施。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粮食问题上对农民见死不救，继续高征购，继续出口，从而加剧了饥荒；二是在建设速度和经济指标上，继续坚持大跃进，迟迟得不到调整。

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天饿死人更多。也就是说1959年春天，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

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4月17日作了批示，只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将这两个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内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是给15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毛泽东认为这是“暂时的（两个月）紧急危机”。 对这么大面积的危机，毛泽东没有采取全局性的措施，还是当作局部问题交给地方自己处理。特别是没有在粮食上松口。

1960年1月7日到17日，正是农村大量饿死人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面对遍地的饿殍，毛泽东继续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他在会上说：“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把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这个会议批准了国家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1959年形势更好；确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6000亿斤。八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完成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会议还要求大办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气氛中召开的，会议以后，全国各地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压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共产内等“五风”又严重泛滥起来。

下面继续送上来欺骗毛泽东的报告。《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1959年4月23日）。报告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在全省的范围内停止发展，山东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俘在发展。其实，当时饥荒正在迅速发展。26日，毛泽东批示：“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

1960年10月26日，毛泽东看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材料。这个材料说信阳地区饿死了几十万人，并介绍了农村的惨状。毛泽东只是轻描淡写地批了十几个字：“请刘周今日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他还是把信阳事件当个别问题处理，当一般工作中的问题来处理。也没有在粮食征购问题上松口。

在粮食征购和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方面，1958－1859粮食年度征购数达1125.44亿斤，比上一年度高出22.32%，大饥荒全面出现的1959年，不但没有减少粮食征购，征购数反而比上一粮食年度高出88.85亿斤，高出比例为7.89%。（从生产年度看，1959年的征购数比

1958年高出103.18亿斤，高出比例为9.45%）。而返销给农村的粮食，1959 - 1960粮食年度只比上一年度多21.29亿斤。也就是说，在大饥荒全面爆发的1959 - 1960年，国家不仅没有救济，反而从农村多拿走粮食67.56亿斤。（见表19 - 1，表19 - 2）在饥民口中夺粮，是一件十分残酷的、而且是很不容易的事，因而出现了本书前面所介绍的鲜血淋淋的反瞒产私分的大规模惨剧。直到大饥荒发生了一年半以后的1960年秋，才不得不降低了粮食征购数。1960 - 1961年度，粮食征购数从上一年度的1214.29亿斤，降低到780.84亿斤，降低了433.6亿斤（从生产年度看，1960年只比上一年降低了342.53亿斤），但向农民返销的粮食也减少了164.4亿斤，实际农民负担只减轻了269.2亿斤。

表19-1 大饥荒时期国家对农村粮食的征购和销售　单位：贸易粮，亿斤

征购与销售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从农村征购	920.11	1125.44	1214.29	780.84	679.14
销售给农村	419.66	505.19	526.48	362.08	268.45

资料来源：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表19-2 生产年度的粮食征购数 单位：贸易粮，亿斤

年度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数量	875.80	1092.02	1195.20	852.67	682.48

资料来源：同表20-1。

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不仅在粮食征购上不让步，1960年1月，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中共中央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说：“粮食征购从1959年夏粮登场时计算起，到1959年12月，已经收到1142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计划1075．8亿斤超过了6%，按粮食季度计算，到1959年12月25日止，已收到1016亿斤，完成计划的94%，再加上1960年五六月的新夏粮，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我们预计1959 - 1960粮食年度，收到1200亿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中在批转这个文件中写道：“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在饿

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救人。

从表19-3的粮食库存数中可以看出，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由此可见这个制度的僵化程度。

表19-3 大饥荒年代粮食库存（贸易粮，亿斤）

	57 - 58年	58 - 59年	59 - 60年	60 - 61年	61 - 62年
七月	354.85	388.94	338.79	265.88	157.46
八月	401.90	398.71	395.84	289.11	191.30
九月	486.31	417.23	503.15	341.02	234.81
十月	560.21	418.12	655.21	386.93	304.95
十一月	690.66	658.02	887.03	540.08	460.57
十二月	756.91	748.43	848.98	572.11	490.02
一月	725.08	714.42	764.15	510.35	438.79
二月	676.75	654.56	673.19	444.50	394.88
三月	601.66	556.01	544.54	359.83	328.86
四月	507.62	433.50	403.51	267.89	257.98
五月	404.53	319.00	286.22	190.86	200.92
六月	384.41	343.28	297.06	171.71	189.28

资料来源：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粮食部另一个数字说1960年6月30日，全国粮食库存为301.48亿斤，和表20-3中的297.71亿斤差不多。这301.48亿斤粮食在各省分布如

下：北京2.30亿斤；天津1.15亿斤；上海2.53亿斤；河北18.26亿斤；山西8.16亿斤；内蒙5.49亿斤；辽宁7.89亿斤；吉林5.08亿斤；黑龙江20.41亿斤；陕西15.96亿斤；甘肃4.81亿斤；宁夏0.72亿斤；青海1.25亿斤；新疆4.45亿斤；山东22.44亿斤；安徽7.05亿斤；浙江12.37亿斤；福建2.72亿斤；河南25.07亿斤；湖北13.22亿斤；江西7.14亿斤；广东7.40亿斤；广西2.84亿斤；四川41.61亿斤；贵州11.49亿斤；云南17.43亿斤。

从这些库存数字可以看出，当信阳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粮食，根本不会饿死人！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却大量出口粮食。按生产年度计，与1957年相比，1959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 ，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比1957年的209 .26万吨多了一倍以上（见表20 - 4）。这一年，中国的粮食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达415.75万吨，这是“贸易粮”，每吨“贸易粮”相当于1.2吨原粮。415.75万吨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留给农民的口粮都是原粮，其中大部分还是山芋（又称白薯、红薯、甘薯、红苕。由于本书引用各地档案资料，所以在各章中名称不一）。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为164公斤，1957年为204.5公斤。按1957年的标准算，500万吨原粮足够2450万人吃一年。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还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1959年几乎没有进口粮食，1960年也进口很少，直到大饥荒发生以后的第三年，才开始进口粮食及少量砂糖。而进口食品都是供应给城市。（见表20 - 5）

在这期间，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1959年4月19日，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先念讲了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猪和蛋出口的问题”。当时农村已经饿殍遍地，没有饲料，猪长得又瘦又小，几十斤就收购走了。李先念说：“今年一季度2.6万吨猪的出口任务只完成一万零几十吨，这样不行。请各省委考虑，既要很好地说服，也要加一点命令。”李先念抱怨说：“猪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我们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卖掉呢。捷克总理西罗基给周总理写信抗议，说：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出售，质量太次。”谈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务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业系统“来一个突击收购运动”，“要采取断

然措施来解决出口问题”。

为了从农民嘴边挤出食品出口，在收购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暴行。四川省璧山县狮子公社虎峰大队在1960年4月收购鸡和蛋时，不是按社员实有的鸡和可能生的蛋来摊派，而是按人头下指标，不管有鸡无鸡，不管鸡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节，将任务层层下达，社员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惩罚。谁家拿不出鸡蛋，食堂就不让谁吃饭。六队社员柯政国没有蛋上交，全家7口人被扣饭。他母亲到亲戚家借了6个鸡蛋上交了才解除扣饭。除了扣饭以外，完不成鸡蛋任务，还不准买盐、煤油、烟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销社干部和生产队干部，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竟不经社员同意，到社员家强行捉鸡。捉鸡经常是深更半夜进行，弄得鸡飞狗叫，人心惶惶。

表19-4 1956 - 1965年间中国的食品出口

单位：活畜：万头，活禽：万只，红枣、香茹：吨，其他农产品：万吨，啤酒：万箱

种类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粮食 265.12 209.26 288.34 415.75 272.04 135.50 103.09 149.01 182.08 241.65

花生油 3.85 1.93 2.86 4.24 2.66 0.62 0.42 0.81 0.98 1.19

花生仁 35.04 23.93 6.80 6.44 3.45 0.05 0.39 0.33 2.66 5.83

鲜蛋 2.13 3.08 3.84 1.34 1.31 1.11 2.08 2.99 3.19 3.76

活猪 54.46 50.70 79.14 71.87 78.75 37.92 81.79 130.19 164.67 171.86

冻猪肉 12.23 5.41 11.81 10.96 7.43 0.93 0.34 1.54 6.21 14.25

活牛 10.72 8.76 13.50 11.55 9.48 1.12 1.64 2.46 4.98 9.33

活家禽 838 1222 1455 612 824 492 659 1044 1658 2141

冻家禽 4525 5890 9569 4202 4755 3055 2175 2963 3860 4013

冻兔肉 221 802 650 926 643 2304 3620 2431 2680

水产品 4.49 5.78 8.85 8.62 9.46 4.23 4.60 5.94 9.25 12.00

苹果 4.76 6.67 9.24 10.11 10.75 4.99 6.35 6.02 7.53 8.06

桔柑 7.00 7.11 8.82 7.69 6.32 3.41 2.97 3.36 3.75 3.72

猪肉罐头 0.96 1.01 3.20 2.88 1.41 0.89 0.57 1.38 3.26 3.51

水果罐头 1.46 1.88 3.81 3.40 1.96 1.92 1.83 2.62 2.75 2.52

蔬菜罐头 0.32 0.69 1.28 1.30 0.62 0.63 0.81 1.06 1.15 1.08

啤酒 3.47 8.27 4.22 10.25 7.38 7.91 7.99 15.03 29.46 41.82

核桃 0.35 0.46 0.39 0.45 0.39 0.39 0.24 0.26 0.31 0.41

核桃仁 0.55 0.54 0.26 0.55 0.45 0.20 0.17 0.28 0.43 0.51

黑木耳 502 491 475 414 331 128 184 269 396 469

红枣 1266 1158 1186 1318 1147 875 994 806 1057 1393

香　菇 526 224 371 224 179 27 34 58 128 204

栗子 0.23 0.46 0.32 0.46 0.34 0.27 0.67 0.63 0.88 1.29

蜂蜜 0.39 0.17 0.41 0.44 0.45 0.22 0.26 0.40 0.75 1.29

资料来源：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VIII - 47到VIII - 50页，《中国经济年鉴》（1982年海外版）VIII - 47到48页，花生仁出口数比内地版多一些。

商业部党组提供的肉、蛋、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数字是：1959年商业部系统供应出口的任务完成了303000万元，占出口计划的110.8%。比1958年供应出口实绩增长了28.9%，其中，猪肉供应出口23.3万吨，是建国以来出口最多的一年；冻牛羊肉2万吨，为出口计划的125%；鲜蛋出口5200多万斤，冰蛋出口6208吨；活家禽出口954万只，冻家禽出口7022吨。此外，还出口苹果10.2万吨，桔柑9.1万吨。

表19-5 1956 - 1965年间中国进口的食品数（万吨，原粮）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粮食合计 14.92 16.68 22.35 0.2 6.63 580.97 492.3 595.2 657.01 640.52

其中小麦 2.62 4.99 14.83 3.87 338.17 353.56 558.77 536.87 607.27

砂糖 17.61 11.93 20.91 2.6 23.38 118.66 99.56 49.69 59.88 70.79

资料来源：同表20-4。

从表20-4中可看到，1959年到1960年，在全国饿殍遍地的时候，中国出口了多少食品！这食品可以救出多少饥民！但是，当时的中国的领导人却没有想到饥民，想到的只是外汇和进口机器。为什么抛饥民于不顾而急于进口机器，是因为没有放弃大跃进的指导思想。

由于在政策调整中不能放弃“三面红旗”，所以在经济建设中，“大跃进”的思想始终存在。直到1960年，还保持着很高的经济指标。

1958年大炼钢铁全面搞乱国民经济以后，10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1959年“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1800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1650万吨。年末实际完成1387万吨。1960年又提出了钢产量1800万吨的指标。到了经济严重困难的1960年，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钢产量不是搞1800万吨，而是要搞2000万吨。除钢以外，1960年，由于反右倾的影响，其它工业生产的指标也是居高不下。固定资产投资最能表现国民经济的冷热程度。1960年，固定资产投资达416.58亿，不仅高于1959年，还比大跃进的1958年高出49%。在固定资产投资中，93%是基本建设投资。全国到处是基建工地。到1961年被迫下马，到处是半截子工程。

表19-6 大饥荒年代前后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单位：亿元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总计 160.84 151.23 279.06 368.02 416.58 156.06 87.26 116.66 165.89

基建投资 155.28 143.32 269.00 343.72 388.69 127.42 71.26 98.16 144.12

资料来源：1988年《中国经济年鉴》XI - 73。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责任田。但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的选择。而自留地、责任田中的大多数是农民背着政府做的，县以下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央和省级不知道搞责任田的面有这么广。从1958年过激政策退回去（所有制，高指标）是形势所迫，但对阻止形势进一步恶化起了作用。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倾。这场政治斗争，加剧了灾难。对中国共产党挽救危局如此无力，罗隆基有一段精辟的谈话："他们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现在还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检查纠正没有触及到基本问题，订的措施没有抓住要点，只会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愈出愈多……共产党讲唯物，实际上最唯心，说的是客观规律，实际上最不尊重客观规律。他们现在拿着1848年的资本论，解决1958年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制度？平心而论，我要对人类负责，就不能同意这个制度。"罗说："物资供应如此紧张，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这段话本来是罗隆基在私下说的，后来被人打小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把它当作反动言论。1959年7月19日，毛泽东批给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作为反面教材。罗隆基还说："目前物资供应如此紧张，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大乱子。依我看，1956年就把事情搞坏了，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大工厂只能解决大问题，日常生活问题要靠小工厂来解决，现在只见其大而不见其小。私营工商业改造以后，又来了个反右，反右以后又接着搞政治挂帅、大跃进、人民公社。"

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知道，罗隆基的这些"反动言论"，是远见卓识的金石之言。

第二十一章　庐山之变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7月2日到8月16日，一共开了46天。8月2日以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按照1959年上半年纠偏的势头，1959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1958年造成的大混乱，饥荒就可能止于1959年。如果是这样，饿死人数只有已经发生的人数的30%，即可以减少70%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计算，如果没有庐山会议，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665万人， 可以少饿死1467万人（见本书“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庐山会议，不仅使1959年春天的一切纠错措施刹车，还使1958年的那种错误政策更加严重泛滥，从而使大饥荒加剧并延长到三四年之久。

庐山会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不仅维护了极权制度，而且强化了极权制度。

一、神仙会暗藏杀机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狂潮席卷全国，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乱。为了挽回危局，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8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

按照这一段时间的政策逻辑，庐山会议应当是在这些纠偏政策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调整。到了1959年六、七月，大跃进的高温已经下降，领导人们也冷静下来了。他们需要总结这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安排今、明两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当然，这些任务和工作安排是狂热过后较为冷静的安排。参加庐山会议的人们认为，庐山会议的初衷应当是纠左的。

不过，这些纠左措施，是在一个重要的前题下进行的，即不仅不能伤及“三面红旗”，还要在维护和高举“三面红旗”。在纠正错误时必须坚持一个总体估计：如果1958年以来的工作是十个指头，其成绩则是九个指头，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另外，在安排任务时虽然要比上一年冷静，但也不能泄气。“气可鼓而不可泄”，这是毛泽东当时常说的话。

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认为1958年打了败仗，应纠正错误，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丢分，甚至失去领导地位。他最怕被人说成路线错误。因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只要是路线错误，就得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路线错误头子是不可能改正错误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错误路线的头子，都没有好下场。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后尘。而这些倒霉的人，是他经常用来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员。他的支持者也极力维护毛泽东这个最敏感的部分，谁的发言略有涉及路线、政治等内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鞑伐。

过去经济工作由陈云主管。1958年，毛泽东和谭震林、田家英一起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毛泽东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1958年毛泽东走到前台直接管经济，结果碰了大钉子，捅了大漏子。1959年他对吴冷西说："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的心情直到5月后才开始好转"。 此外，在1959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发出的一些纠错政策，毛泽东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从心里是不愉快的，认为是右倾的。 可见，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不只是沉重，应当还有酸楚、焦虑、不满。处在极权顶点的毛泽东，有这种复杂的心态，对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作出来，就会伤人。

1959年6月12－13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检讨了1958年的错误。他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他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第三天才找到起义的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他还说："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看来，毛泽东是认了错，是准备"转弯"的。但是，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是很肤浅的，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他说："去年（1958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6月29日，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 在赴庐山的船上召开的会上，毛

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这19个问题除了国际问题是周恩来建议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泽东一人。这19个问题是：1，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第三版下册，县级读《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2，形势；3，今年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8，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即下放了的人权、工权、财权、商权要收回，由中央、省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社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14，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19，国际问题。

在这19个问题中，最为核心的是对形势估计和对1958年的评价。对这个核心问题，毛泽东已经定了调子："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在当时那种制度下，毛泽东的意志是不能违背的。既然毛泽东给纠正1958年的错误定了调子，划了范围。谁不按这个调了说话，谁超越了他划定的范围，谁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毛泽东不乏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周围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泽东权力在地方的两个支柱。他们两人不仅是封疆大吏，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地方官员中仅有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坚决肯定"三面红旗"、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在南宁会议上因马鞍形问题受到批评的周恩来，这次也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可能是出于维护团结，也可能是出于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员都是采取自保而随风倒的态度。另外，军队的高级干部由于来自不同的"山头"，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又结下了旧怨，如果有新的政治斗争，也是报复旧怨的好机会。还有一些政治投机者、政治阴谋者，也总是依仗毛的权势，在整人中求得晋升的机会。

6月23日，毛泽东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时得出了"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结论。还回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28日赴武汉，29日乘船到达庐山。登山后他赋诗一首：

登庐山

1959年7月1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的心境总是那样豪迈、广阔而俯视一切。他为什么想起了陶渊明？是想到自己万一政治斗争失败，走退隐归田之路，还是想把政治对手推向远离权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泽东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当时可以说是民怨沸腾。专制制度下的官员们通常是报喜不报忧的，但当时毛泽东却收到了不少批评“三面红旗”的材料，这些材料已收集起来作为庐山会议的参阅文件：1959年5月，江西省委党校80多名县委一级干部在“鸣放”中，把“三面红旗”说得一无是处。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反映，一些军队干部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央：“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学习中对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了怀疑和指责。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更为尖锐。这些是选送到会上的材料还是经过处理的，下面干部反对“三面红旗”的呼声比这些材料要强烈得多。

就是在毛泽东周围的人，相当多的人并不承认“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认为1958年的问题很严重。6月27日到7月1日，到庐山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从北京乘专车到武汉，然后乘船到九江。在这列专车上的高级干部们自由交谈，1958年的大跃进中的问题是重要谈话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坐在一起。陆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来之命调查过大炼钢铁的问题。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弄虚作假的现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

办法炼铁是极大的浪费，大批壮劳动力去炼铁了，地里的庄稼没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怀谈了这些情况，彭德怀十分关心这些事。

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月，通过《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后，下山各司其职。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是反左的，2003年4月本书作者同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锐交谈时说："连柯庆施带上山来的材料也是反左的，会议转向以后他不得不再让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是不是这么想的？看来不是那么简单，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自己所处的危机，有人对"三面红旗"提出了质疑。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大问题。" 看来，毛泽东是想纠正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错误，但不"三面红旗"的问题，不容许有批评意见。

头几天，会议的开法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人们称为"神仙会"。与会者讲了不少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批评的声音较强。有些天真的人真想"畅所欲言"。毛泽东真愿意让大家"畅所欲言"吗？真愿意硬着头皮听批评吗？不是。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就很明确表示反对批评的态度：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假如办10件事，9 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既然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批评1958年，为什么还要开"神仙会"呢？那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办法1956年用了一次，结果大获全胜，把五六十万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在1959年三四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还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让彭向海瑞学习。就是在这次上海会议会上，毛泽东还谈到彭德怀，他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一个人这样，跟其它同志也是这样，" 这不仅仅是引蛇出洞，还暗藏

杀机。在毛泽东心中，彭德怀是一个不听话的人。黄克诚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地说：“老总，咱们订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黄克诚说，可惜彭德怀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先引诱彭德怀“犯我”，然后再将“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怀。

在会议的最初几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发言中承认河南共产风、浮夸风很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了湖北的一些实际情况，心情显得很沉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认为总的形势不能太乐观。有些人也对大跃进提出了种种批评。但在批评的同时，有些人维护大跃进，经常打断批评者的发言。这使得一些想批评者感到有压力，觉得不能畅所欲言。打断发言的人除了保卫自己工作成绩的“诸候”以外，还有罗瑞卿大将、谭震林副总理等人。

在会议参阅文件中，有几份否定“三面红旗”的资料。如《李云仲仲同志的意见书》，江西省委中级党校的材料，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的报告，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等。毛泽东都不加表态地批给与会者参阅。 有些参加会议的人看到所发的这些文件，强化了“庐山会议要反左”的看法。其实，这些文件也是为了“引蛇出洞”。毛泽东在7月10日和16日还两次召见他的几位“右派朋友”谈话，他们是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等，谈话是轻松愉快的。讲了很多“私房话”、“知心话”。书生李锐天真地感到：“山中半夏沐春风，随意交谈吐寸衷”，“登楼再度群言堂”，“都觉畅怀言已尽”。实际这两次谈话是火力侦察，看一看反对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解一下反对者的动静。毛泽东多次说他有几个右派朋友，其实，他的那些右派朋友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熟读中国古籍，对君王之术烂熟于心。经过江西肃AB团、延安整风、高饶事件、反右斗争等一系列实践，毛泽东整反对派的技术已经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说是半个月的会，已经开到超过了半个月，也没有散会的意思。除了毛泽东以外，谁也不知道会如何继续开下去。会议进程和内容全在毛泽东一人心中。毛泽东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图，都是临时发表讲话，引导会议走向。而他的讲话事先没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袭击。这就是中国当时政治制度的特点。

二、彭德怀为民请命

彭德怀是毛泽东在井岗山时期的战友，那时两人关系很密切，彭要找

毛泽东谈事推门就进，直呼“老毛”，如果毛泽东在睡觉，就揭开被子和他说话。1949年以后毛泽东已位处九鼎之尊，彭德怀还没有想到退居臣下，不喜欢叫“万岁”，不喜欢唱《东方红》，不习惯称“主席”，还是称“老毛”。这在中国皇权制度中已经犯下大忌。

在“大跃进”的时候，彭德怀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

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在讨论公布1958年粮棉数字时，有的人说粮食产量在1万亿斤以上。彭说粮没有那么多。谭震林对他客气地提出了批评：“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后来毛泽东说公布7500亿斤，彭同意了，但心中还有怀疑。 武昌会议闭幕后，彭德怀到湖南考察，他觉得粮食产量没有公布的那么多。在平江县他还发现了数字造假的情况。他认为按公布的粮食产量确定的1200亿斤的征购任务太重。在株洲，他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说不能征购1200亿斤粮食，只能征购900亿斤。在湖南考察时发现农民挨饿的情况，连“幸福院”的老人一天也只能吃二三两米。有一位红军时期的伤残老战士，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农民悲惨的生活，干部们的胡作非为，是他在湖南老家亲眼目睹的。上庐山以后，他怎能昧着良心不“鼓咙胡”？他在湖南考察是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的。后来这成了周小舟的一条罪状：为彭德怀提供“炮弹”。

1959年5月，彭德怀到东欧国家访问，6月中旬回到北京。在匈牙利访问时，了解到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肃反扩大化和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所致。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接见他时，彭德怀感慨地说：“敌人并不可怕，最怕的是党的路线不正确和党的作风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最深刻的体会。”在罗马尼亚时，他给总参谋长黄克诚打电话，专门询问了国内的经济情况。

6月13日，彭德怀出国回京，他对国内问题十分关注，认真看了内部参考，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很多。6月底彭德怀收到了到庐山开会的通知，他不想去，让黄克诚去，黄克诚说：“中央通知你，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你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他后来还是开会去了。

北京到庐山开会的高级干部们先从北京乘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乘船到九江上庐山。6月27日到7月1日，在北京赴武汉的火车上，彭德

怀、张闻天、贺龙、康生等同乘一节车箱，车上交谈很随便。彭德怀都谈到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来的。 后来，他的这些话都被认为是重要的政治错误，而严加批判。

在“神仙会”期间，彭德怀在西北组连续作了七次发言，坦率地讲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是关系到毛泽东的内容。如：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禽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主席家乡那个公社，去年提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实际只增产16%。我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公社只增产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公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件事。我看他是谈过。”（7月3日上午）“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因为党的威信高。 ．．．．．．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事，如砸锅，在一定的时候也可以做到，因为党在群众中威信高。”“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7月4日上午）“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办？”“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7月6日上午）“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 （7月7日上午）“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7月8日上午）“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扩大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7月9日上午）“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的威信，只建立个人的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7月8日上午）等等。柯庆施把彭的这些尖锐发言，送给了毛泽东。这些话，在原来的西北组《简报》中删去了，后来批判彭德怀时，又整理出来，当作批判的材料。

据彭德怀说，在“神仙会”阶段，周小舟到彭的住处谈过两次。第一次

谈话是周向彭谈了湖南的工业情况。还谈了水利建设的成就。过了两天，周小舟第二次来谈。说去年粮食数字造了假。还谈到公共食堂的问题。彭对周说，这些问题应当如实地向主席反映。周说昨天向主席谈了一些。 李锐在日记中记载这两次谈话的时间和内容， 第一次是7月5日，周介绍了湖南的一些情况。彭德怀除了向周小舟重复他在西北小组的发言以外（周小舟在中南组，没有听到他的发言），还谈到，今年1月毛泽东找几个人讨论钢铁指标，陈云认为2000万吨指标不可能完成。说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还说他从欧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谈到铁托左右几十个人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这时毛泽东脸色顿然发红。还对周说在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地开展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能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彭对周说，有些意见想找毛主席谈，又怕讲错，引起不满，由于自己性格，言词生硬，容易顶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误会。不过，“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当国防部长。第二次是7月12日上午，是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谈话之后。他们三人都感到毛是能听不同意见的。周对彭说，我们讲话很随便，主席都听进去了，希望彭也找主席谈一谈。彭说怕谈不好，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组上没有谈，有些谈了《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小舟赞成写信。

7月12日下午彭德怀又觉得写信不易，还不如当面谈一次。他下午到毛泽东住处去了一次，毛泽东正在睡觉，没有谈成。又想到会议几天内要结束，于是下决心写信。

13日中午，彭德怀手持拟好的提纲，向随从参谋口述了详细内容。记录整理以后，他亲自修改两遍，参谋誊了两次，于14日下午送给毛泽东。也许彭德怀自己不会想到，这封信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他接着谈到“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

彭德怀还肯定：“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

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解决”

彭德怀还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大跃进：“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谈到“全民炼钢铁”，彭德怀说：“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在这里，彭德怀说“有失有得”，把“失”字放在前面，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接着，彭德怀谈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接着，彭德怀指出了“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他认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可以说，彭德怀这封信既没有锋芒毕露，也没有直抒胸臆，在讲缺点以前先讲成绩，讲缺点留有余地，并且一再肯定“三面红旗”。像德怀这样敢说话的人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政治气氛之压抑，“神仙会”大概也“神”不起来。没想到这样平和的信，毛泽东却不能容忍。他收到彭的信以后，7月16日，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

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彭德怀没有想到这封本来是给毛泽东个人参考的信成了公开发表的"意见书"。7月18日，在小组会上彭德怀要求收回这封信，申明这封信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而没有完全写明意思 ，覆水难收。善于整人的康生，就在意见书下发的当天，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字条："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 信发下去以后，与会者多数人基本上是同意这封信的，但其中不少人认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对第二部分意见较多，认为讲得过于严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对的则是个别人。胡乔木、周小舟、李锐很支持彭德怀的信。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21日在第四组发言时都积极地肯定了彭德怀的信。陶鲁笳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种精神，信中某些内容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贾拓夫在第三组发言中也表示，彭总的意见书总的是好的，总的是同意的，这会推动大会的讨论。军队干部万毅全面肯定了彭德怀的信。 后来，有这类发言的人都受到批评和追究。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应召于7月17日上山（毛泽东7月16日让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信让调来的，同时调上山的还有林彪、彭真、陈毅、宋任穷、安子文等）。把黄克诚召上山来，是毛泽东向彭德怀发起攻击的一步棋。如果在庐山上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在北京掌握军队，毛泽东感到不安全。把黄召上山来，不仅解了北京之忧，还可以一网打尽。黄克诚上山的当晚，彭告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给黄看。黄克诚看后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写得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 18日，周小舟、周惠、李锐去看望黄克诚，他们三人都谈到在会上有一种压力，不能多说缺点。黄克诚说："在书记处会上我也说过，我黄克诚总算是一个敢讲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了"。在这期间，黄克诚和大跃进的激进派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黄说"反兵"的本意是和谭震林的意见相反，后来受批判时说成是"畜意谋反"。

在毛泽东发起反击以前，与会者的发言中批评彭德怀信的人不是很多，只有陈正人、程子华、贺龙等人。陈正人有这样的态度除了他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因素以外，更多是受柯庆施的影响，在会议期间，他与柯庆施住一栋房子。在毛发起反击以前，柯庆施和李井泉却没有在会上对彭的信发表意见。7月21日贺龙在小组全上发言说："目前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头脑发热和虚报。"他批评彭德怀的信说："我们的缺点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中有

一点缺点、错误，这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接着贺龙揭发了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过火了。”

贺龙把火车上的私下闲谈拿到政治斗争的桌面上了，这个揭发非常要害。23日毛泽东讲话中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这句很重的话就是针对这个揭发的。

彭德怀和毛泽东这里说的“红军”是指中国工农红军，意思是重新搞革命。而邓力群在1998年4月16日的谈话中 ，谈到庐山会议时，却在红军前面加上了“苏联”二字，硬说彭德怀要请苏联红军来解决中国问题。看来，邓力群先生直到40年以后，还坚持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罪名。

贺龙给彭德怀这么重重的一击，大概是出于俩人的关系原因。8月16日，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五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学习。哪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山头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也整过刘伯承、肖克等高级将领。我还记得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会议期间，我与同事陈大斌、姬乃甫三人一起采访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肖克上将，肖克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谈到大跃进饿死人的情况。我接他的话荐说：对大跃进，彭德怀还是讲了些实话。没想到肖克说：“别提彭德怀了，他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说彭德怀和林彪一起整刘伯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批评彭德怀的，还是在80年代，彭德怀已经平反、在社会上备受称赞的时候。高级将领来自不同的“山头”，他们之间有种种矛盾和成见。高级将领之间不团结，对毛泽东的地位来说是最安全的。毛泽东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在7月17日，彭德怀的信交上去两天以后，下午5时到10时，毛泽东还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胡乔木、田家英5人去谈了5个小时。他们在一起吃饭，喝茅台酒，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当时给李锐的感觉是“这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更没有立意发起一场反击”。从7月16日到7月22日，毛泽东没有流露出反击彭德怀的意思。但当时会议的形势，犹如庐山气象：密云不雨，气压很低，云雾缭绕，山

上的人都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一切都深藏在毛泽东心中。

事有凑巧，彭德怀回国不久的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兰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发表讲话中谈到，苏联在内战刚结束时就搞了公社，但公社既不具备经济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所以这些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我们就不搞了，就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认为，赫鲁晓夫7月18日的讲话让毛泽东占了理，这是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原因。 麦克法夸尔的说法是不对的。苏联《真理报》7月21日才发表赫鲁晓夫讲话的全文，只有这个全文中才有批评人民公社的话。新华社7月27日在《内部参考》2831期以《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为题刊出，胡乔木7月28日才将这期《内部参考》送给毛泽东，毛泽东7月29日就批给与会人员参阅。也就是说，毛泽东知道赫鲁晓夫7月18日的讲话是在7月23日讲话以后。毛泽东7月16日就把彭德怀的信当作“意见书”批给大会，而且对会议作了两个新的部署：一是重新编组；二是调援兵上山，这些显示毛此时已露杀机，这时赫鲁晓夫还没有发表讲话。中国作家权延赤也写过与麦克法夸尔类似的文字，他说，在苏联批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以后，在毛看来，“‘意见书’本身的内容已不是问题的焦点，对全局事业而言，他的威信，共产党的领导权，以及党的凝聚力，变成了问题的焦点，这些是远比彭德怀命运更为重要的大事。” 言外之意，毛泽东整彭德怀是出于大局。40年以后的1998年，邓力群也持这一看法，他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的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大同小异。因此，引起怀疑：里外互相呼应。” 根据我上面列出的时间顺序，权延赤和邓力群的说法也是与事实相悖的。

三、毛泽东翻脸倒乾坤

李锐的书中只讲了他们这些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人的一些活动，没有讲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的活动。这些人的活动李锐是不知道的。7月21日，这时距毛泽东的反击只有两天，由于左派的活动，对彭德怀信的指责的声音已经逐步升高，左派说这封信主要是“针对毛主席的”。左派的活动和言论对毛泽东有多大影响，至今不得而知。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人已经闻到了某种气味。张闻天准备这天在第二组(通称华东组，组长柯庆施)发言，得悉风声已紧的胡乔木，早晨打电话给张闻天，提醒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问题。 张闻天不顾这些，却作了长达3小时的发言。在发言过程中，组长柯庆施和其他好几个人，不断插话，表示不同意见。张闻天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提纲，一直把话讲完。

张闻天又名洛甫，早年曾留学美国。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1931年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长征到达遵义时，他支持毛泽东，参与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随后，他代替博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的总书记职务一直担任到1943年，不过，后几年由于毛泽东专权，他的总书记只是名义而已。在延安期间，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麦克法夸尔认为，张闻天是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三面红旗”的主要策划者，而彭是配角。 就这个问题我专门问过庐山会议的参加者李锐（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和姚力文（时任刘少奇的秘书），他们都认为麦克法夸尔这个说法只是他个人猜想，与事实不符。

张闻天对“三面红旗”有一整套看法，他是一位有深厚理论功底的革命家，也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在3个小时的发言中，张闻天讲了13个问题：1，大跃进的成绩；2，缺点；3，缺点的后果；4，对缺点的估计；5，产生缺点的原因；6，主观主义和片面性，7，政治和经济；8，三种所有制关系；9，民主和集中；10，缺点讲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问题；12，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13，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发言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严重问题及其后果作了系统的分析，全面，深刻，明快，尖锐，针对性强，几乎毫无顾忌。他强调，对产生问题的原因“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当从思想方法和作风上去探讨”，领导经济“光靠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规律办事”。他认为1958年以来出现的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他说：“主席常说，要敢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便于下面敢于发表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自由的局面。”发言最后才提到彭德怀的信。他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彭信中受批评最多之处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就是支持彭这封信的人，也认为这句话不妥当。张闻天却说：“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么样，可以考虑。但是，‘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张闻天发言当天晚饭后，他见到彭德怀说，我今天讲了三个钟头，支持了你。彭德怀把张闻天的发言提纲要去，让参谋读了一遍。后告张“你讲得很全面。”

在批判张闻天的时候，有人说他的这个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有人对他的这个发言作了精心统计：全文9000多字，讲成绩的只270多个字。用了39个“但”字，只有一个好“但”，其余都是坏“但”。

张闻天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是6月30日离京赴庐山参加会议的。乘同一车厢的有彭德怀、贺龙、康生等。上庐山后，住东谷河东路177号，同彭德怀住的河东路176号是近邻。7月2日到16日，张闻天被编在华北组。他在小组发言说：大跃进给外交部门的工作造成被动，我们的驻外使节很不好讲话。会议初期，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他对身边的秘书说：小高炉炼钢是无效劳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按劳分配原则不能破坏等看法。还说，现在是骄傲了，就像当年斯大林说的胜利冲昏头脑。7月12日，他同彭德怀交谈时说：会议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我们西北组也是这样。张说：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7月上、中旬，彭、张二人在饭前饭后还有若干交谈。其中曾讲，政治局会议很少讨论，一般只做个大报告，实际是空的。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的信送出。此前张散步到彭处，得悉彭将写信，对彭所说的写信是希望把问题摊开、搞得深些表示赞成。彭要张看信，张不看。彭念给张听，张没听完就走了。

7月17 - 8月1日，张闻天被编入第二组（华东组）。7月18日，张准备在小组会上发言，开始准备发言提纲。

7月19日，张闻天出席小组会议后，路上被田家英邀去小坐，同时相遇的还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李锐。交谈中大家都感到有压力，认为应当肯定成绩之后，缺点也可以讲。胡乔木说：主席也是主张讲一讲缺点的。同日，在田家英处吃饭后，邀周小舟到住处交谈。

7月下旬某一天，张闻天约戎子和到住处闲谈。得知国家给土铁生产补贴了40亿元时说：问题主要还不在于这40亿，而在于9000万人上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7月20日前后在准备发言过程中，张闻天接田家英电话，田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别讲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张闻天对秘书说：“不去管他！”接着继续准备提纲。后来又接胡乔木电话，说毛要向彭开火，劝张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发言与会上对彭批评的气

氛不合，担心会挨批评。但张不顾一切要讲。

李锐认为，“使毛泽东作23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的一副催化剂。”

1959年3月30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报告中谈到：“据榆次市、太谷县的材料，五级干部会议经过三天的鸣放，有观潮派、算账派的言论甚至反动言论的人占10%左右。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言论是属于发牢骚的性质。”毛注：“牢骚也吧，反动言论也吧，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到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现在是1959年，不是1957年了。”

在上海会议上，4月5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抱怨他的下属“不大批评我的缺点”，提倡海瑞精神。他说：

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那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

彭德怀的这封信和海瑞给皇帝的信相比，要客气得多了。劝彭德怀学海瑞的毛泽东，是怎对待彭德怀这封信的呢？怎样对待张闻天等人的批评呢？

7月22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同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早晨，通知大家开会，听主席讲话。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事前没有跟常委讨论，常委们也和大家一样，也是早晨得到通知，事先也不知道讲话什么。

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头就说他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次会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这大概是指紧跟他的京官和省委书记。“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他讲的另一种倾向是：“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集中表现在江西省委

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塌糊涂。”他说：“越讲得一塌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下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

会上发给与会者的江西党校、广东军区等材料，以及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等人的言论上，本来没有加按语，有人还以为是批“左”的材料，毛泽东现在明确列为反面教材。接着，他针对彭德怀的信中说干部脱离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的批评说：“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点，不那么多。”“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讲到共产风、讲到一平调，他说：“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

他为颳共产风的干部和自己开脱，并且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的态度，他说：“他们（指括共产风的干部 - 作者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批评大跃进的意见）“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

接着，毛泽东指出：“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

讲到反冒进，他话锋直指彭德怀，说：“虽然彭德怀“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他告诫那些批评大跃进的人说：“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

接着，他为食堂和大办钢铁辩护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在办食堂方面：“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他正话反说：“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楂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

这篇讲话态度鲜明，对左派只是安抚，让他们“硬着头皮听”；说批评“三面红旗”的人 “离右派只有30公里”；把中间派说成“动摇分子”。他在讲话中批驳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的说法。讲话中也讲了大跃进中一些问题的责任，说自己是“始作俑者，应该绝子灭孙”，但这些

话明显带有赌气的情调绪，不是诚心自我批评，不是“罪己诏”。毛泽东曾说过，他是不下“罪己诏”的。

散会后，万毅将军走出小礼堂时，亲眼看到这样一幕：彭德怀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他立即迎上去，贴近毛泽东，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 7月23日听毛泽东讲话回来后，彭德怀和黄克诚都吃不下饭，沉默不语，他们虽然同住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 在这以后彭德怀再没有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7月24日（或25日）张闻天遇到彭德怀，交谈时张说：不能讲缺点了，不能批评，批评有危险。我们没有错，毛泽东讲话是压，是扣帽子。 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李锐听了讲话犹如晴天霹雳，闷头一棍。他们四人沿着山边信步走去，心中沉甸甸的，没有一个人说话。田家英拾起一根烧焦的松枝，在石头上写了一首有名的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7月23日晚，彭德怀怎么睡不着，直到天亮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呢？

四、大臣们机变求自保

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只要毛泽东拿定了主意，在领导集团中，绝大多数人就会积极响应，很快形成具有压倒优势的主流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发表和主流意见不同的看法，谁就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就会遭到集体的围攻。所以，在这个领导集体中，谁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就很难有人为他说半句公道话。只有若干年后，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主流意见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的错案才能得到纠正。

西方国家是议会政治，当时的中国是“会议政治”。前者是民主制度，后者虽然只是颠倒了一个字，就变成了专制制度了。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开会来贯彻最高领导人的意图，通过开会来围攻与最高领导人不一致的看法。“会议政治”比皇权政治还要厉害。皇权政治只是皇帝一个人讲自己的看法，没有那么多人跟着帮腔起哄，没有“多数人专政”，所以，皇帝想惩治一个人，如果错了，别人还可以为之说情。在“会议政治”条件下，连说情的可能也没有了。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后，风云突变，再也没有人说反左的话了。大会集中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逼他们作

违心的检查。毛泽东身边的高官们迅速改变态度，紧跟毛泽东，加入反右倾的大合唱。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畏惧，在敌人严刑拷打中也没有屈服，而在极权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后，有的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有的变成了凶恶的鹰犬，更多人则是见风使舵，八面讨好。当然，他们这样做有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维护大局，为了党的团结。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个人利害关系。在战争年代，他们多是孤身一个，没有家庭包袱，他们认定斗争的对象是邪恶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牺牲了就是烈士。当了高官以后，有妻子儿女，有荣华富贵。更为重要的是，惩治他们的是被戴上种种理想光环的政权，是被所有的宣传工具天天歌颂的“英明领袖”。这使他们感到，杀了头不仅殃及子女，还要遗臭万年。极权制度就是这样把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奴才。中国的高官历来有一个追求：文死谏，武死战。实际在中国的历史上，武死战的层出不穷，文死谏的寥若晨星。这也是制度使然。

在庐山会议期间，林彪、康生、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像一条条凶猛的鹰犬对彭德怀劲头十足地批判，无根无据地加罪，这是意料之中的。这些人在文革以后也没有多少人为他们说好话。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以后受到报刊舆论备加称赞的高官中，在庐山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令人深思的。

由于庐山会议档案还没有公开，我无法引证更多的资料研究7月23日前后高官们态度的变化。目前唯一公开的信史就是李锐根据他参加庐山会议的记录整理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庐山会议实录》中是按时间顺序写的，高官们的态度变化淹没在复杂的事件和冗长的过程之中。我重新整理《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中每一个人的资料，按人头把每一位高官的言行集中起来。这样就可以清晰看出每一个人在7月23日前后态度的变化。请读者原谅，在这一节中我只能大量用李锐这本书的资料。我尽可能再引用其它当事人的材料，尽可能地避免李锐一个人的孤证。

刘少奇

1959年4月，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国家行政的第一把手。说是当选，实际是毛泽东指定的，选举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当时毛泽东不愿意当国家主席，这把交椅就让给了刘少奇。但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最有实权的职务。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是第一把手。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刘少奇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时中央领导人的地位排序是：毛、刘、周、朱、陈、

林、邓。陈云和邓小平因生病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如果刘少奇是真正的第二把手，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名义上刘是二把手，实际上刘是毛的臣下。刘的命运还是由毛主宰。所以，刘还得看毛的脸色行事。

7月4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时发了言。他说，1958年的跃进，吃了1957年的库存、预支了1959年。他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训。去年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忽视。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不犯长期性、全国性的错误。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正确领导，欲速不达，不要责备下面。他谈到教训深刻的一面，但仍以革命的名义为失误辩护。

7月16日刘少奇讲话，提出“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作为会议的开法。 对于认为反左是主要矛盾的人来说，这12个字中，“缺点讲透”4个字是核心内容。

李锐认为，刘少奇是主张反左的，在会议发言中没有明讲，但从许多言外之意看得出来。他曾找胡乔木长谈过反左问题，胡乔木没有敢向毛反映。 刘少奇是毛泽东下面的第二把手，他的想法不能直接向毛泽东谈，还得通过地位比他低很多的胡乔木向毛反映，这正如皇权时代丞相的意见还得通过皇帝的近臣转达一样。胡乔木虽然地位远低于刘、周、朱、陈、林、邓，但他是毛泽东的近臣。在武昌会议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陈云也向胡乔木表示，不同意公布7500亿斤粮食产量，胡乔木也没敢及时向毛反映。王光美和刘源也说“庐山会议前后，刘少奇是反‘左’的”。

7月23日早晨，毛泽东通知要开大会，他要讲话。刘少奇头天晚上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突然接到开会通知，王光美只得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性还没有过去，警卫员扶着他晃晃悠悠走进会场。刘听了毛批彭讲话以后，约胡乔木到他的住处谈话，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文件。要胡乔木起草这个文件。胡乔木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刘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胡乔木让彭真找刘少奇谈，才决定不写。

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集体围攻中，看法本来与彭德怀接近的刘少奇，不仅没说一句公道话，在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刘少奇还抓住机会插话、帮腔，当别人追逼彭德怀交待什么问题时，刘少奇也积极参与追问。8月1日，刘少奇发言说彭德怀“脑子里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

题在此”。刘少奇还揭发了一件事：“会理会议 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从那以后，我觉得此人不简单。”刘少奇的这个揭发引起了毛泽东和林彪尖锐的插话。 刘少奇还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彭认为中国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了。刘少奇的发言中把八大党中没有写上毛泽东思想这一条的责任推给了彭德怀。 刘少奇这个揭发不仅打击了彭德怀，还讨好了毛泽东。

黄克诚回忆说，有人说我是彭德怀的走狗，我气得要命，说：你砍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绝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第253页可知，这位两次找黄克诚谈话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

8月17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开了一个中央工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了主要发言。他一开头就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接着又为大跃进中的错误辩护说：“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乱子。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个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接着，刘少奇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先说毛泽东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是最正确的领导”，接着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对‘个人崇拜’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和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进行拍马比赛，8月1日，在常委会上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8月17日，刘少奇又超过了林彪。

其实，刘少奇并不是不知道“三面红旗”的危害。庐山会议后不到一个月，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国庆观礼时，他和邓子恢一同上厕所。在厕所里刘少奇对邓子恢说：“想不到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破坏这么严重！”当时邓子恢的秘书在场。事后，邓的秘书将此事告诉

了刘的秘书姚力文。40年后，姚力文将此事告诉本书的作者。可见，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心底里的看法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但他还是参与围攻了彭德怀。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他和其母王光美等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乃父亲生前有两个错误：一是没有阻止大跃进，二是没有阻止文化大革命。书中说："对大跃进，刘少奇的态度是被动消极的，他的观点即使在'文革'中，对造反派的回答中也隐约可见；但他曾力图紧跟，积极去理解，对人民群众中迸发出巨大的积极性，倍感兴奋，为取得惊人'奇迹'所感动，并由衷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如果能够快，当然好，谁愿意慢呢？'不久，发现了严重问题。庐山会议前后，他坚决要反'左'，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尽力去纠正'五风'，反对高指标。"

"刘少奇虽不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他毕竟没能制止这场灾难。作为党的第二号领袖、国家主席，他参与、赞同了'大跃进'，支持了反右。发现问题后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错误，责任重大而不可推卸。"

"至今，因种种原因，对这场浩劫以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没有深刻总结。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批判。"

刘源说乃父没有制止大饥荒的灾难，这是苛求。他没有想到，乃父名义上是党的第二号领袖，但在当时的制度下，实际是毛泽东的臣下。不过，刘源这一句话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最后得以凌驾于全党全民，人们自然归根到始作俑者的他。"他"被自己塑造的神祇砸死"。

周恩来

在过去漫长的革命岁月，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毛泽东。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是"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实际上，周恩来将军事实际指挥权交给了毛泽东。1935年3月的"打鼓新场风波"以后，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军事指挥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并以辞职相要胁，最终得到了周、张的同意，毛泽东从此取得了独自指挥军队的权力。 建国以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毛泽东以君臣关系相处。1956年，周恩来和陈云根据在第一线抓经济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反冒进"，后来在南宁会议以及其它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痛斥。周恩来一度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大跃进"就是针对"反冒进"而提出来的。周恩来从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议"大跃进"了，紧跟毛泽东搞"大跃

进”。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全党范围内的纠“左”，已成气候。6月24日，毛泽东在赴长沙的火车上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竟说出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那样耐人寻味的话。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等人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会议的第二天，周恩来受留在北京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之托，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国家经委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分送到会各同志参考。这份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着重强调: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失调现象也是严重的，低估这方面也是危险的。为此,报告提出了一些调整、巩固的措施。

周恩来是7月1日上山的，2日，他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了毛泽东出的19个题目，关于国际问题是他建议加上去的。以后，他先后参加东北小组、华南小组、华北小组、西北小组等小组会以及各协作区主任会议，都明确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的党在领导工农业方面的一系列缺点、错误:生产计划指标偏高，基本建设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周恩来是一个聪明人，他深知，对某些“左”的错误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或纠正可以，但伤及“三面红旗”是绝对不行的。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认为；“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形势有着和彭德怀类似的看法，但没有采取和彭德怀相同的做法。”

既要维护“三面红旗”，又要解决“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周恩来的内心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

7月10日，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了一次会，讲了一番话。这番讲话主要是为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辩护。第二天传达时，当传达到“一年来有好的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错误的经验；不能光说有坏的错误的经验”时，周恩来插话说，1958年邀请来中国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国后谈在中国的观感，说中国高速度发展，“大跃进”超过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错误缺点发现快，纠正也快。苏联一教授说中国“大跃进”这个词好。其实，扎夏季科对中国有批评性意见。周恩来只转达人家的好话，把人家批评的话隐瞒了。周恩来为了用苏联人的话为毛泽东帮腔，竟片面地转述人家的意见。

7月12日到22日，周恩来四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讨论形势与任务。12日周有一个长篇讲话，谈形势、摆问题、算细账，他认为去年是新的革命，当然问题不少，突破了旧的平衡，要解决新的平衡。 他用大量的时间讲业务问题，这是国务院工作的需要，也可以回避政治斗争的锋芒。

7月16日，关于大炼钢铁问题，周恩来讲话中算了一笔账：虽然财政补贴了40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而且大大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账要算，但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算现在盈亏的账，也要算将来盈亏的账。 当时不少人认为，周恩来这么算账，对于维护“大跃进”，很有说服力。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发表讲话批评彭德怀，却表扬了周恩来。在讲话中间，他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一边表扬，一边又说：“他们重复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这句话虽然是指批评大跃进的那些人，但钩起周恩来南宁会议的旧痛。毛泽东又拉又打，使周恩来更加小心。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散会以后，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其中，周恩来和彭德怀有一段对话颇有意味，不妨抄录如下：

周：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钢，是一个革命。2700万 - 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和泄气分开。

彭：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冷得比较早，10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呢？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要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7天的储备。6月底的存粮只有310亿斤。去年增加了2010万人。按“一五”经验，1元货币比9．6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年1比8．8就紧张了。

彭：这个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就跑到二中全会上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汲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是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两个方面都说了的。

周彭对话中，彭很直率地批评周恩来“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彭德怀学海瑞，周恩来没有学，彭德怀学了。现在周恩来主动了，可以批评彭德怀了。

7月26日，毛泽东提出“对事，也要对人”以后，批斗升级。彭德怀写信成了“右倾活动”，成了“猖狂进攻”。这一天下午，周恩来向北京来的各部委的来参加会议的干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坚持两点：一点是政治上维护总路线，另一点是实事求是地抓工作。说：“这两点一个是政治方向，一个是工作态度”。他强调：“政治主向是第一位的问题，是思想性、政治性、路线性的问题，工作态度是第二位的问题。”他不仅认为彭德怀的信属于政治方向的问题，还说国家计委李云仲的信 也是政治方向上的错误。” 他苦口婆心地对他的部下关照。让大家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要站错队，要保卫总路线，不要动摇；同时要抓好经济工作，渡过经济难关。

8月1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其他人也不时插话，追问。周恩来也有不少插话和追问。彭德怀在谈到一些历史情况时，周恩来问，访问苏联时，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送彭德怀出门时，斯大林跟彭德怀说过什么话。这是在追查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周还插话说，彭德怀的信“方向是向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是指向总路线”。“主席讲了话，还听不进去。”当林彪说彭德怀“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看风使舵”、“马列主义世界观没有接

受”的时候，周恩来插话：“相反，很骄傲，犯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周恩来说彭批评毛泽东是“犯上”，这显然是皇权时代的思维。当刘少奇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时，周恩来插话说：“这是感情问题。”当毛泽东说彭德怀过去和他七分合作时，周恩来急忙补充说：“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8月1日，批判彭德怀的大批“援军”上山，他们是来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这批“援军”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会议中有一种苗头，就是多讲缺点，夸大缺点，以彭德怀国志为代表。他在火车上就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7月7日在主席那里汇报时，他也谈了这个看法，我们听到就不以为然。”，接着，周恩来把常委会上强加给彭德怀的各种罪名，传达给“援军”。如：“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 “张闻天讲了三个钟头，‘文武合壁，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省上的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的。”“彭信一出来，问题性质变了……是纠左之后，右倾机会主义露头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彭德怀同志是这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所以，这次全会毛主席提出来，全会的任务，就是要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内分裂斗争。问题本质是这么一回事。”

8月19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集中力量批判毛泽东强加给彭德怀等人的“军事俱乐部”。8月24日，周恩来在这个会上作《善于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的报告》，不仅传达了庐山会议上加给彭德怀的种种罪名，还按照毛泽东的口径，清算了彭德怀在历史上的错误。

在彭德怀受到围攻的时候，周恩来没有说一句公道话，反而落井下石。在7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附和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还担任了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个定案材料，经周恩来签字，传达到全国每一个党支部。

朱德

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面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朱毛”，朱在毛的前面。建国以后，毛泽东给朱德一个委员长的职务，名义上很好听，蒋介石也不过是个委

员长嘛！实际没有实权。朱德也落得个清闲，不争权，学明朝初年的徐达对朱元璋，和毛泽东保持君臣之礼。朱德有较深的国学根底，知道新的王朝建立以后，必然“狡兔死，走狗煮；飞鸟尽，良弓藏”；知道此时再不能像战争年代那样不讲“名份”。在这一点上彭德怀不如朱德有“文化”。

1958年10月9日，朱德题词支持甘肃荒唐的引洮上山工程：“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如果这是不了解实情的话，那么，1959年他和董必武、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视察，是看到了一些真实情况的。

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发言，很客观、很明白。他说：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么愿意共产吗？食堂说是自负盈亏，实际公家总吃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家庭制度应当巩固起来。各省不要自搞工业体系。

7月23日下午，朱德参加第一组，他第一个发言。他为1958年过热辩护，说：“大跃进是靠热出来的，热是革命的基础。”他的调子开始向支持大跃进变化。不过，他还是坚持说一些真话：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断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7月25日下午，朱德参加第四组，作了较长的发言才谈到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他说，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过去批评我空洞的乐观主义，现在可以说是落实的乐观主义。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符合事实。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重。李锐就这段话评论说：“朱德同彭德怀是30来年的战友，相知很深。看得出来，这时他非说这番话不可。 “非说这番话不可”说明，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连朱德这样高地位的人，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26日，彭德怀违心地作了检查以后，朱宽慰地说：“彭总发言态度是好的，我想他是畅快的。彭总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

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它当作包袱背起来了。”朱德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

8月1日常委会，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当然没有“击中要害”。他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

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晚来庐山的人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在林彪作了长篇发言之后，朱德讲了约10分钟。他说，自己原来估计不合适，认为彭德怀同志写这封信是临时想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他最后说：“现在毛主席还在，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让位，我看谁也不赞成的。德怀同志对总路线动摇，最基本的问题是不认识群众，不认识党。他的最大错误就在这里。”

朱德和彭德怀是老战友，对待“三面红旗”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是，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时，朱德虽然批判的调子比别人低，也没有为彭德怀说一句公道话。朱德也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尽管如此，在毛泽东的眼中，朱德是“老右派”。他曾同他的英文秘书林克私下说过：“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

在“会议政治”制度下，参加会议的人，必须就最高领导人的看法，人人表态。通过表态来“划线”、“站队”。这像每个人必须脱光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高领导人的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不说话是不行的。不说话就意味意站到反对派一边了。但是，要说话，只能跟随主流意见。说不同的意见，就要遭到围攻。朱德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在话下。

林彪

新中国的建立，论战功，没人在林彪之上。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他身败名裂之后，也没有人否认这一点。1954年的高岗事件，林彪受到牵连，在政治上丢了不少分。从此林彪以养病为名，韬光养晦，等待时机。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们分析这中间有毛泽东的授意。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期间，还看望了在上海养病的林彪。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相信，有了这样的政治投资，在关键时刻，林彪还是一员用得着的猛将。也许毛泽东对彭德怀早就不满意，把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

主席，放在彭德怀之上，就有让林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安排。

林彪本来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以后，就调林彪作为“援军”上山。在军事建设上本来林彪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他们两人一起批评刘伯承的军事思想。工于心计的林彪，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洞若观火，他知道毛泽东此时处境相当困难。他盘算，此时支持毛泽东，一定是收效最大的政治投资。

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和其他人经过了“神仙会”阶段不同，他一上山，就以坚决的态度反右。他对彭德怀的批判上纲最高，火力最为猛烈。

7月31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说话，他批彭的过程中别人插话帮腔。当毛泽东说到1958年的问题是在群众运动中发生的，气可鼓而不可泄。彭德怀说，我对此俯不深。林彪急忙插话说，气难鼓易泄，泄了便难鼓。 他的态度和彭德怀成了鲜明对比，他说的话也符合毛泽东的思路。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期间，平型关大捷广为中国人称道的好事，也是林彪的重要政治资本。彭德怀搞百团大战 使在日本铁蹄下的中国人振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百团大战虽然对抗日战争有好处，但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因为它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力，把日本的兵力吸引到八路军这边来了。因此，毛泽东不仅不肯定百团大战，反而当作彭德怀的一个历史错误。为了迎合毛泽东，林彪在批判彭德怀时，把自己指挥的平型关大战也否定了。他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毛泽东接着林彪的话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就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我，日，三国志”。 在毛泽东的心中，共产党的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爱党胜于爱国。如果在抗日战争中全国人民知道了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中国共产党就会受到中国人的唾骂。所以，百团大战结束时毛泽东公开向彭发了贺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这个贺电并不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

7月14日的信，本来是彭德怀给毛个人的，毛不经彭本人同意就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发给与会者。彭对此有意见，一再要求收回。毛在7月31日却违背事实地说：“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林彪立即帮腔：“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8月1日常委会上，紧接着朱德“隔靴搔痒”的发言之后，林彪的发言直

击要害，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定了调子。他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伪君子，冯玉祥。说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在刘少奇的发言后，林彪又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否定：“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字，就是野心，派头、气势。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滑，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刘少奇插话：不好敞开谈）……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利用坦率形式迷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滑的本质。（毛泽东插话：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国内外都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表面上好意，实际要抓辫子……表面似好意，实际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的单独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的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8月4日晚上，由刘少奇主持向晚上山的人传达两天常委会开会的情况，第一个是林彪讲话，他讲了一个半小时，不用“彭德怀同志”。林彪说：“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援兵。”彭德怀的信“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的，反对大跃进的，反对人民公社的。”“他虽然没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在前前后后，会内会外的讲话，字里行间，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反对毛主席。”“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我的直接印象，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毛主席无论在天资方面，学问方面，事业的成就，工作能力，马列主义水准方面，更何况思想意识，在哪些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他太自不量力了。”

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不是始于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始于1964年，而是始于毛泽东最困难的1959年。这对毛泽东是雪中送炭。

在8月1日的会上，彭德怀曾提出换一个人管军队，毛泽东很明确地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但就在8月17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彭德怀被罢了官。经毛泽东提议，林彪接替彭德怀的工作，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帮助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

作。

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亲自主持，对彭德怀、黄克诚、邓华（接替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洪学智（接替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长）、万毅（国防科委副主任）、钟伟（北京军区参谋长）等进行了残酷的批判和斗争。

陶铸

陶铸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重要的封疆大吏。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毛泽东派他到广东大反地方主义，打击和压制了一批广东籍干部。1959年反瞒产私分是广东最先搞起来的。

7月2日，从武汉到九江的江新轮上，陶铸遇到从北京来开会的人。他请大家吃荔枝。谈到广东因闹水灾，更增加形势的严峻。不过，他是乐观的。

7月3日，陶铸在中南组发言谈广东的情况。说共产风将副业、手工业刮掉了，商业协作搞乱了。将丝一下子搅成团，“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农民不养猪了，副食伤得太厉害。不过，他虽然讲广东形势严峻，但还认为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7月3日，刚上山的晚饭后，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1958年的高指标，没有遵守客观规律，计划工作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谈到高指标计委顶不住的问题，都认为计委有责任。陶铸还从王明路线的历史情况，谈到富春是顶不住的。冶金部的负责人，当然更有责任。

7月22日下午，陶铸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谈问题的基调同会议初期有了不同。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用不着怀疑。去年粮食和工业增长幅度古今中外都没有过。谈到彭德怀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来看，对缺点的看法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把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所取得伟大胜利是否可靠。从我党历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所产生的左的错误，那确实是难以纠正的。而难以纠正的错误，也决不是如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屡次指出的

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这样，就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不是一个指头的错误，而这种错误现在并未纠正，因此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左。这就会把事情搞坏。” 请注意，在毛7月23日讲话以前，这样上纲上线的批判彭的信，唯有陶铸。

陶铸三次找黄克诚劝降。第一次没有效果，第二次又找黄谈话，说：“不管你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黄克诚反驳：“如果就能定罪，何必要我承认？”第二次失败，陶铸第三次批黄克诚谈话，让黄“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尽早承认错误 。8月5日，陶铸写信给黄克诚，说：“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站出来与之划清界限，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处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 陶铸用专制社会妇女的“贞节”解释“对党的忠诚”（实际是对领袖的忠诚），把对领袖个人的忠诚，当作一个人立身的“操守”。不顾人民的利益，不管真理在谁手里，只对最高掌权者个人忠诚，正是专制制度中官员的行事原则。

8月6日，陶铸在第三组发言。说他对彭德怀“总的印象是，他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很不服”。“30多年来党的历史证明，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就没有今天革命的胜利。可是彭德怀同志对毛泽东同志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怀说党中央没有民主，那是胡说……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党的生活原则，党内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证”。“彭德怀同志之所以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不满，其用意不是别的，是企图改变党中央的领导，由他来干。他总希望中国出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即时他就可以充当纳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乱，搞乱了，他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实现个人野心。”陶铸把彭德怀比作纳吉，这是这次会上批彭上纲最高的说法。陶还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全面否定，说“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功则归己，过则归人，是彭德怀同志的一贯作风……彭德怀同志的为人就是这样：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艰苦朴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开来看，完全不是那回事。”

8月8日，陶铸在小组会上又揭批张闻天，对张闻天的检讨提出三点意见。说张闻天与“军事俱乐部”的关系“完全是自觉的、有意识伯，并有实际行动的”。逼问张21日发言的目的。还说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出身，根本没有改造好。又声色俱厉地逼问周小舟在“军事俱乐部”里的位置。

在上山不久的“神仙会”期间，陶铸写了《七律·登庐山》：

庐山真面谁能识？尽在云烟变幻奇。

偶见晴空飘白练，忽惊树杪涌清漪。

朱陈往事增惆怅，白李遗诗添彩姿。

最是劲松绝壁立，崇高风格不须疑。

陶铸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判断这次庐山会议一定会风云变幻，他随风向变化而自保，但心头还是若有所失。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松树的风格啊？但是，在专制制度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又怎能像松树那种傲然挺立呢？这是陶铸的悲剧，也是共产党多数高官的悲剧。

谭震林

谭震林是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他在庐山会议上站在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立场是很自然的事。

还是在武昌会议时，讨论粮食公布数字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有的说可以公布1万亿斤，有的说可以9000亿斤。彭说粮食没有那么多。谭震林立即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7月20日，在周恩来处开会，批评周惠时，黄克诚同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说请黄克诚上山是作为批彭德怀的“救兵”，黄回答说，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说的“反兵”本来是从谭的“救兵”而来的，后来批判黄时，谭震林把这句话说成为“蓄意反党”罪证。

26日，在黄克诚检讨之后，谭在第五组发言。他首先检查了自己在1958年的错误，认为他要负主要责任，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在检讨自己时，还为毛开脱，说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作出了伟大贡献。说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批评了左的错误，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然后说到彭德怀的信，说：“这封信是烟幕加毒气。彭德怀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我决不因为这封信，就不承认他的过去。他的为人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地写这封信，引起争论，是一件大好事。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妨碍我尊重他

将来再作出的贡献。”

过了两天，有人批评谭对彭人格和历史功劳的肯定，谭不得不改口，收回了他对彭德怀的肯定方面。还说：“我看他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 在《三国演义》中，张飞是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而魏延却是有“反骨”的。

陈伯达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陈伯达提出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主张，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奚落。后来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实际情况，开始转向反左。

刚上庐山时，他和几个秀才一起发表议论，批评1958年的失误。他在7月18日、19日在第三组曾经两次发言，认为不能忽视大跃进的副产品，要对事不对人。他说：“我和陈正人同志开了一次火”，中央农村工作部应当检讨。因为陈正人认为农业并没有多大问题，粮食只是小部分地区紧张。陈伯达还说到他受骗、“吃苦药”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东范县所看到、所听到的一些东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是下面干部预先布置的。最近《红旗》杂志的同志到那两个县，把一些情况查清楚了。我把反映这些情况的信，给舒同和吴芝圃同志看了。他们两位都很难过。”庐山会议前陈伯达到福建作过调查，因为他是福建人，听到一些真实情况，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问题。

在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前，陈伯达和田家英、吴冷西、李锐等人看法是相同的， 23日讲话以后，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样，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离右派30公里”的人中的一个。

23日以后，陈伯达在小组会上自然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之一。

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陈伯达一方面修改自己的发言稿（《简报》刊出时删掉一些），一方面又长篇大论地批判彭德怀的信。他以理论家的姿态，引经据典地为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帮腔。把大跃进和巴黎公社并提。还说：“我完全同意主席讲话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县，又到广东、福建，是被广大群众那种冲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动的，所吸引住的。对群众的冲天干劲，我是没有怀疑的，虽然我说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陈伯达认为彭德怀的信“一个对形势的估计，一个对倾向的估计，都是错误的。”

由于他在郑州会议上挨过毛泽东的批评，不管他怎样表态，怎样洗刷

自己，别人对他还是不留情面，还是不放过他。在8月初最紧张、斗争最尖锐的时候，陈伯达就生病，不参加会议。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陈伯达埋头写文章。10月9日，他将写就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给毛泽东。此文正中毛泽东下怀，但还嫌火力不足。10月11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更好。"陈伯达按毛泽东的意见，征求了康生、胡乔木的意见并加以修改以后，将题目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修改后，发表在《红旗》1959年22期上。1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

由于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陈伯达走出了郑州会议挨批的阴影，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在文革中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

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是毛泽东的近臣。

在去庐山开会的列车上，李锐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1958年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胡还认为"以钢为纲"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

7月3日，刚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1958年的高指标。胡乔木除了再次引证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以外，还举了遵守战争规律的程序：先遵守战争规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他说，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记了。

7月6日晚，在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李锐、胡乔木、陈伯达五人闲谈，胡再一次谈到综合平衡的重要性。认为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因而才经常出现经济危机。又认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说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的规律。胡乔木还特别谈到，1958年一反常规，毛泽东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之后毛泽东头脑发热之程度。武昌会议公布粮食产量7500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但胡没有敢向毛汇报。为此，上海会议胡乔木挨了毛的批评，毛称赞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

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胡乔木介绍，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对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王不敢去向毛汇报，刘向毛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胡乔木说，王应该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还谈到，自南宁会议以后，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派运动之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了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登峰造极了。

大概是7月18日，在田家英住处，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李锐五人对彭德怀的信都很感兴趣，觉得信内容好，观点跟我们一致。不过，胡乔木说了一句：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他可能从王任重那里得知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满的消息。

7月18日，胡乔木在第二组作了较长的发言，为《记录》（草稿）起草者辩护。因为《记录》（草稿）中关于形势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对1958年成绩讲得不够，问题讲得太重。胡乔木回答这些批评，认为1958年问题还是应该说透。在发言中，胡乔木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他实际上是支持这封信的。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之后，胡乔木一度沉默，几天以后态度180度大转弯，急忙紧跟。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来到第四组（他本是参加第二组的），作了长篇“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长篇发言。 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接着从六个方面将斯大林晚年和毛泽东作了比较，借此对毛泽东进行吹捧。

由于胡乔木、陈伯达等“秀才”的善变，8月11日毛泽东讲话中说：“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样，虽然会议初期，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也说了一些真话，但没有受到批判。

为了进一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一下庐山，胡乔木就送上了《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的长文，对彭德怀的信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强加了种种政治帽子。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示，印发给全国，成为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重武器。

说完了原乔木，还得顺便提一提吴冷西。他身兼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社长之职。上庐山以前和庐山会议初期，吴冷西对大跃进的形势持批评态度。他还给分社下达指令，让分社收集大跃进以来的材料。所以，当时分社发来的内参稿件讲了一些真话。彭德怀回国以后看了很多“内部参考”、并对他产生影响的，就是新华社提供的。庐山会议转

向以后，吴冷西不仅态度很快转变，他还立即给北京新华社总社打电话，让把分社收集的批评大跃进的材料送上庐山，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根据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长尤淇、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四川分社社长纪希晨、云南分社社长陈涌进、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福建分社社长孙权等7位，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杜导正对本书作者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要是总社的意见，广东的陶铸是想保他的。

贺龙及其他几位高级将领

贺龙元帅是一个有胆量的人。1916年春天，他用两把菜刀砍了巴茅溪盐税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济贫的队伍。在南昌起义时，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贺龙先是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后调北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处在高位的贺龙，在毛泽东面前，已经没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胆量了。在庐山会议上，他是毛泽东的一个得力打手。

从7月18日到21日，在第三组讨论中，对彭德怀的信持批评态度的主要有陈正人、程子华和贺龙少数几个人。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发表7．23讲话，他们却态度鲜明，坚决维护"三面红旗"。贺龙还揭发彭德怀说的"请红军来"的话。

7月24日，贺龙在发言中进一步揭发彭德怀，他提到洛川会议，说对毛主席的抗战战略方针，有人不坚决执行。 毛在7月17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五人谈话时，谈到洛川会议旧事。说彭德怀主持的华北军委分发的小册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为主的方针。这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说明彭历史上就跟他不一致。 但这五人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毛谈话的内容。贺龙这个揭发和毛泽东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贺龙发言更为尖锐。8月3日，他在第三组发言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在军队干部中，罗瑞卿、苏振华、黄永胜、萧华等对彭德怀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锐。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罗瑞卿的态度。

7月8日，还是在“神仙会”阶段的早几天，李锐发言批评“以钢为纲”和指出国民经济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时，罗瑞卿就打断李的发言，极力维护“大跃进”。（同上，第31页）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击讲话以后，李锐、周小舟、周惠三人由于想不通，在周惠住处发泄情绪。周小舟怀疑毛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认为按照讲话的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他们三人就去找黄克诚谈谈，后来，彭德怀也进来了。他们出来时，被罗瑞卿碰上了。 当然罗瑞卿不知道他们谈论了什么，但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这几个人相聚，引起了罗瑞卿的高度警惕。经罗瑞卿揭发后成了“23晚事件”。在会议后期的批判中，这个事件成了追查和围攻的重点。

8月3日，罗瑞卿在第五组发言说，彭德怀生活上学冯玉祥（指艰苦朴素）是“伪君子”，“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有人插话：‘换了政治上的欲望’），他的政治欲望很大……党性有亏，私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说生活，为人很多是装的，即使是真的，可是总是反党，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反对总路线，这种所谓生活朴素有什么用处？”罗不仅在小组会上发言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在会下见面时还当面质问彭德怀。

一般人就在自己的组里发言。但罗瑞卿十分活跃，不仅在自己组里发言，还到其它几个组里发言。8月10日，罗瑞卿强行带着着李锐到黄克诚那个小组去，就“23日晚事件”和所谓“斯大林晚年”问题和黄克诚对质。批斗会形成了一个新高潮。像爆发了一棵炸弹，全组立时哗然。罗发言时疾言厉色，说彭德怀、黄克诚的住处成了反党司令部，成了搞阴谋活动的地方。他厉声质问黄克诚：“你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了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罗瑞卿由公安部长升任为总参谋长，和林彪一起主管中央军委工作。据说这是林彪建议的。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政治高压下，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摔断了腿。叶剑英元帅为此赋诗一首，其中有“将军一跳身名裂”之句。“彭陆罗杨”中的彭真，在庐山会议上也是一位批判彭德怀的得力干将。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上，彭真多次发言、插话和质问。

萧华对彭德怀也是落井下石。由于他和彭德怀一起出访东欧，他的揭发是很要害的。8月9日第四组继续开会，有人又追查彭德怀出国的事。萧华说：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

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有人接着念了彭德怀在出访东欧几国时的谈话记录。萧华说：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

在彭德怀蒙受冤案时，其他几位元帅没有人为他说过半句公道话，没有落井下石的也是代毛泽东去劝降，要彭早点认罪。7月30日上午（彭德怀说是7月24日，李锐的日记中记的是30日），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劝说彭德怀作检查。彭德怀的记下了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

他们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它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了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了我准备写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谈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

8月3日，聂荣臻在小组会上谈到这次劝说时的情形说：“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主席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话时，都激动得掉泪了。”陈毅元帅是外交部长，8月24日，外事系统召开批斗张闻天大会，大会小会反复进行揭发、批判。集中火力追查“里通外国”的问题，一盆盆污水泼到张闻天头上，对一切问题都要当场交待清楚。张闻天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回到家里，同亲人相对默坐，禁不住潸然泪下。 主持批斗张闻天的，就是陈毅元师。

湖南的二周（周小舟，周惠）原来都是支持彭德怀的，周惠因讲了不少真话在会上受到不少批评。毛泽东对原来持彭德怀看法的人极力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为了“挖彭德怀的墙脚”，找周惠到美庐（毛泽东的住处）单独谈话。周惠承认了错误，就没有列入反党集团。毛泽东也曾想把周小舟拉过来，8月1日，给周小舟写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并且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毛告诉周，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周小舟站起来诚恳地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

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周小舟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临下山时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嘱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并请他帮自己照顾妻室儿女。 周小舟没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围攻，但他还是坚持到底，1962年对右倾主义分子甄别时，中央规定对周小舟不甄别。

周惠的归顺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40年以后，作家权延赤合写了一本书，书中把右倾反党集团写成“彭黄张周周”，把本来不是反党集团的周惠加了进去，还对周惠作了不符合事实的粉饰。据知情人说，这是周惠的子女为美化周惠而提供的情况。 这一下子惹怒了他的湖南老乡——《新湖南报》即《湖南日报》的前身的编辑记者们，他们自费出了一本书，书中揭了周惠的老底：庐山会议结束以后，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态，回湖南和张平化一起，不仅穷追狠斗周小舟，落井下石，多方加罪，还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株连二万多名干部落马。这本书还揭露，1957年，周惠制造了一个“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将54人打成了右派（全报社共有编辑记者145人）。当年《新湖南报》的社长朱九思还在这本书的前面写道：“谁是真金，谁是粪土，包括当年那位不可一世现在仍不知羞耻的人物，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在中国政治制度下的官员们，要保住地位，是很难成为“真金”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谁没整过人，谁没挨过整？不要苛求周惠，八十年代，他在内蒙古任书记时，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为子女者，希望自己的父亲有一个光辉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过于粉饰，反而损害长辈的形象。顺便指出的是，八十年代以来，一些高官的亲属、子女、部下，写了一批歌颂他们父辈的书和文章，其中，不少有类似《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的问题。

五、常委们昧心陷忠良

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泽东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亲自主持，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人。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 这两天会议，为彭德怀的“错误”性质定了调，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帐。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不可能公布于世，幸亏李锐在场，而且做了笔记。所以，这一段，我还是不得不多引用一些《庐山会议实录》中的内容。

7月31日，由毛泽东一人主讲，由他定调，其他人插话帮腔。8月1

日，也是毛泽东讲话最多，其他人逼问和围攻。其中林彪上纲最高，发言最尖锐。会上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全都是一边倒。

194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既定的前题，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在过去的革命历程中，凡是和毛泽东有过不同意见，都是历史问题，都是政治上的污点。以后再和毛泽东不一致时候，都要清算过去这些问题。

在两天的常委会上，毛泽东亲自清算彭德怀，说过去31年年的共事过程中，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把两人过去工作中的分歧重新上纲上线，重新清查在过去的路线斗争中彭德怀的站队情况，抗日战争期间的"百团大战"也是彭德怀的重要罪过。

毛泽东在清算历史旧帐以后，又说"同在北京城，10年9次电话，1年不到1次"，说彭德怀和他疏远，请示回报太少。 对7月14日的信，毛泽东说："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这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是准备发表了，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没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 "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

参加常委会的其它人除了追问彭德怀的政治问题以外，还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并乘机吹捧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彭真等都揭露批判彭德怀反对搞"个人崇拜"的言论，肯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常委会本来应当是一个领导集体，毛泽东应当仅是这个集体的召集人。实际上，毛泽东高踞常委之上，成了太上皇。集体领导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出现这种结果，当然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为毛泽东"抬轿子"、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人难道就没有责任？

这两天常委会为彭德怀等定了调子，冤案已经构成，无中生有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的铁帽子已经戴在他们的头上。第二天（8月2日下午），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为这个冤案盖上合法的图章，并动员全党开展批右倾运动。

全会开幕时，毛泽东讲话不长，但十分鲜明而坚决地动员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他说："我们的路线到底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初上庐山后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

不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踟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我们反了9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个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左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的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也是在全会开幕的这一天，毛泽东写了《给张闻天的信》，并立即印发给全会。这封信虽然只有500多字，却大量引经据典，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信中为他们五人罗织了“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还说这个“军事俱乐部”的成员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自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成三个大组，李井泉大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大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大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批评质问的方法，十分尖锐。 在这些批判会上，进一步围剿“军事俱乐部”和追查周小舟说过的“斯大林晚年”问题。围剿之烈，追逼之严，气氛之紧张，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会。在接连不断地追逼下，彭德怀说：“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可我不能那么讲。”有人指责他态度不好，彭德怀说：“我没有辩护律师，你们像法庭审判。”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作批示，也同时印发给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

为了给批判彭德怀等提供理论武器，并不是理论家、也不从事理论工作的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动组织人编写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马、恩、列、斯、毛语录，毛泽东收到后如获至宝，8月15日和8月16日，接连写了两个长篇批示。15日的批示说：“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经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断横行’，不给你们‘自由’、‘民主’，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

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16日的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几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不仅使得八届八中全会上对所谓“右倾反党集团”的批判斗争一步步升级，还为会后的全国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提供了错误的指导思想。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等文件。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了性：“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而“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因此，“坚持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说，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特别指出他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使“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受到某种威胁，这就是要害所在。《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决议》中还有这样一段彭、高反党异同论：“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你看他，连伪装都不要了，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只能说彭德怀比高岗更加疯狂，所以叫做猖狂进攻，不过也还是有伪装的：“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因此，《决议》向

全党提出了“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的任务。

为了揭露，《决议》清算了彭德怀的历史老帐：“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他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发难，猖狂进攻呢？《决议》对此作出了分析，这些分析今天看来特别值得回味：“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是因为毛泽东决策重大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而是总路线等等的胜利使面临灭亡威胁的剥削者蠢动的。

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成员，除了“彭黄张周”以外，还有李锐。因为李锐不是中央委员，级别不够，所以没有提他的名字，但对他的处分很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下放劳动。

庐山会议加剧了1958年以来的错误政策，把已经深陷困难的中国推向更深的灾难。同时，还更加强化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强化了他个人独裁。为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六、反右倾烈火烧神州

庐山会议还没有结束，中共中央就下达文件，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个月，坚决反对右倾思想”。

庐山会议毛泽东大获全胜，他已经狂热到变态的程度。这种变态在他给《诗刊》主编、副主编臧克家、徐迟的信中充分反映出来。1959年9月1日，毛泽东将他上山前和刚上山时写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寄给臧克家、徐迟，同时在附信中写道：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

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认为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只不过是几片“鸡毛蒜皮”，骂为农民说话的人是“王八蛋”。这种思想由各级党组织贯彻下去，为反右倾的运动添柴加火，也为1958年以来的错误作法推波助澜。一时，全国所有的报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会议，都围绕批判右倾思想这个中心。各种报刊保卫“三面红旗”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斗争。被批判斗争的人，有的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定为“严重右倾”。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经中共中央转发，成为全国的统一标准：1，公开散布系统性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2，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3，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缺点，反党反中央的；4，对党中央规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业务方针拒不执行，同党闹独立性，或者采取其它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手段，以阻挠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5，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1958年以来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6，在革命斗争中，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以来，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以后，仍然保持错误贯观点，不主动检讨的。

上述6条，只要有其中一条，又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军队系统，中共中央批准了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条标准：一是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二是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三是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攻的；四是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大

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作深刻检讨的。凡是犯有上列情况之一的，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军队的反右倾标准定在地方干部之前。地方标准是在军队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的。

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为全国做出榜样。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从1959年8月中旬到1960年1月中旬，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共有1900人，占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3%（其中司局级以上有287人，占同级党员干部的9．3%）；被列为重点帮助对象的共有2714人，占这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4．4%。重点批判和重点帮助的共占党员总数的7．5%。经过揭发和批判，这两个党委给224人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其中司局级干部61人。此外，在这次运动中，还揭发出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其它坏分子90多人。

9月初，各地反右倾的战况汇报到中共中央。1959年9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一些省市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材料，以推动运动时一步深入。9月初的情况如下。

甘肃。揪出了省委书记霍维德、省委委员贺健山（农业厅长）、省委委员雷恩钧（省监委书记）。霍维德主要问题是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说省委在粮食问题上犯了错误。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后两人的罪名是在反对“三面红旗”方面的看法与霍维德完全一致，他们所发表的“露骨的反党言论”还受到霍维德的赞扬和支持。

青海。揪出了省委书记张国声、省委宣传部长聂景德、省委委员副省长张毅忱、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陈光远。说张国声攻击省委第一书记，否定1958年的伟大成就。张毅忱的罪状是“攻击”省委在1958年中的做法，“认为去年省委订的粮食产量过高”“夸大了农村缺粮问题”。陈光远的罪行是写了一篇题为《要注意加强州、县、公社党委的集体领导》（内参），批评了党委第一把手的不民主作风，还写了《革命胆略与实事求是》（发表于7月10日的《青海日报》）的文章，“夸大了1958年的阴暗面”。

新疆。揭发批判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辛兰亭。“对大办钢铁泼冷水”、“对去年大跃进成绩有怀疑”、“对自治区党委领导不尊重”。

贵州。1958年8月就揭发批判了省委书记常颂，到庐山会议后，常颂已死，但还要“清算”，又揭发批判和常颂看法相同的省委组织部长夏

德义。

湖南。揭发批判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麟。“他与周小舟的社会观、政治主张是一样的，并和周小舟一起进行宗派活动”。

安徽。揭发批判省委书记张恺帆，候补书记、宣传部长陆学斌。张恺帆“下令强迫解散食堂”，“最近又揭发出他包庇反革命分子、代表地主富农到处叫喊等严重问题。”陆学斌“认为大办钢铁是劳民伤财，大跃进是一笔糊涂帐，人民公社是一大二空，中国农民太老实了。”“诬蔑毛主席给公社小队长写信是不相信中间这一层干部。”

黑龙江。揭发批判了省委委员、黑龙江大学校长兼东北农学院院长刘成栋，哈尔滨市委委员、哈尔滨电机厂党委书记邢子陶，鸡西市委委员、鸡西矿务局长李奎生。刘成栋说大跃进的“缺点是一个大拇指”。

河南。“揭发批判了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和洛阳轴承厂厂长闫济民等人的严重的右倾言行。”

陕西。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了西安市委书记程元方、西安市委宣传部长丛一平、省经委副主任陈平、省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岳邦珣等人反对大跃进、公社化、大办钢铁的一系列反动论点。

吉林。全省党员干部正在批判通化地委书记李晨反对农业八字宪法，反对供给制等右倾言行。

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揭露批判了海南区党委委员、琼崖县县委第一书记王荫轩等24名右倾思想、言论突出的重点对象的错误论点。

江西。揭发了省地质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承恩等人说大跃进“得不偿失”、今年再跃进“绝不可能”等右倾言论。同时还揭露了1956年省党代表大会期间，原赣南区党委工业部长等人，对省委领导和三反、五反、镇反、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毒攻击。

中共中央在这个材料的按语中写道：

现将一些省市自治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简报发给你们。右倾分子的人数虽然不多，在高级干部中所占比例虽然很小，但是在适合他们的气候下，却可以兴风作浪、煽起一股逆流，如果不及时加以揭发和批判，就会妨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跃进，给工作以很大危害。请你们加以注意。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倾的“靶子”。有些省将揭发出来的省级干部

定为“反党集团”。如青海省定为“以张国声国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撤销张国声省委书记、常委的职务，保留省委委员；撤销聂景德的宣传部长等一切职务；撤销程光远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的职务。

在工矿企业，按照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对职工进行分类排队，对问题严重的进行重点批判。为了推动各地的反右倾运动的深入，中共中央接二连三地批转各地反右倾的经验：

1959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在《中共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次会议（扩大）情况的报》，上的批示中强调：“对一切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要像对待病菌那样，从一切角落里把他们的思想影响扫除。”批示全文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是：

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这实际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庐山会议以来，在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斗争中，已开始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大量地揭露出来，请你们认真注意，彻底加以批判。

这个文件不仅把1959年春夏的一些纠偏措施全部否定，还说成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在城市反右倾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共中央还多次批示、转发各地的斗争经验，说“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线路也是不可能的。”

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1958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都说成是“右倾”造成的。中共四川省绵阳地委的一篇报告中说：“绵竹县兴隆公社是全县土地最肥沃、水利条件最好的米麦之乡，但是在以党委书记丁仁发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害下，粮食竟减产30．

8%，生猪减少51%，耕牛死亡12%，社员出勤率只有50%。又如青川县苏河公社，因为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田地荒芜，连年减产，疾病流行．．．．”报告说，反右倾运动就是要“给铁打的人民公社再包一层钢，给大跃进的车子再加足油！”这样以左反左，后果越来越严重。

在这场斗争中有多少人受到批判？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 显然，这个数字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全部。

1962年5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甄别平反时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40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数总有几千万。”

反右倾斗争使几千万人受到影响。1957年反右派斗争，封住了知识分子的嘴；庐山会议封住了高级干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从此以后，中国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国只有一声音，就是毛泽东的声音。不管他说什么，都是“最高指示”。对他说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发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反右倾斗争是和保卫“三面红旗”结合在一起的，因1959年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这更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因此，1959年继续饿死人，1960年出现了饿死人的高峰，1961年饥饿死亡的情况还在继续。这时毛泽东才说：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纪要、上海会议十八条的精神，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要搞到连队，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有一点悔过之意，但他对错误的认识多么肤浅！

第二十二章 粮食问题

要研究中国的大饥荒，必须研究中国的粮食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粮食短缺就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加速推行工业化，增加了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减少了粮食的供给。粮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资源都在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对极为短缺的粮食，中央政府对其生产和分配实行直接管理。控制越严密，粮食越短缺；粮食越短缺，控制更加严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粮食战争”：这种“战争”每年一次，到1959年以后，天天、月月都有。这是政府和农民的战争，是工业和农业的战争，是城市和农村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伤亡的大多是农民。被国家机器严密控制了的农民是弱者。为了粮食，农民成了政府无限压榨的对象。政府一感到粮食紧张，“征购任务必须完成”这句号令，就会迅速被政权机器物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层层放大，到农民那里就成了巨大的灾难。

1958年以后的大饥荒，是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背景下出现的。统购统销，消灭了粮食市场，扼杀了使粮食增加产量的市场动力；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取得食物的权利，每一餐饭都仰仗政府供应。集体经济，又剥夺了农民通过个人的加倍劳动，生产食物的权利。统购统销和集体经济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饥荒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必然。

一、 统购统销以前的粮食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4年的8249万，5年增长了43%。 而粮食部统计的1953年城镇人口为9182万，这是从粮食供应的角度统计的，比国家统计局从户籍统计的数字多一些。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统购数由1950年的355亿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亿斤，三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中央14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的粮食销售量，以1950年为100，1951年为147，1952年为228，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 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6月30日，国库存粮由145亿斤减少到105亿斤，特别是

各大城市粮食库存大幅度减少。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1953年6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加上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粮食产量以1949年为100，则1950年为117，1951年为128，1952年为145，1953年稍高于1952年，1953年粮食产量已超过战前最高年度的10%。 但是，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城市对粮食需求的增长。1953年，需要国家供应的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659亿斤。详见表22-1，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国家征购粮食721亿斤，和1952年相比，产量只增加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20.1%。

表21-1 1953年城乡需要商品粮供应的人口和数量（贸易粮）

城乡分类 人口（万人） 每人需要量（市斤） 总需要量（亿斤）

城镇人口 9182 480 441

经济作物区 5300 454.7 88

分散缺粮户 6600 121 80

灾区 2196 124 86

缺粮区 990 253 20

共计 24788 659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

表22-2可以反映出国家征购数食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农业税－即征收加上收购），1950年占产量的13.45%，1953年增加到21.77%。这是统购统销以前的数，我们将会看到，在以后的年代，这个比重将会大度提高。

表21-2 1950－1953年全国粮食征购与产量的比较（单位：亿斤）

年份 产量 征收和收购 征收 收 购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1950 2646 100 355 13.45 266 10.05 90 3.40

1951 2876 100 479 16.66 299 10.40 180 6.25

1952 3271 100 596 18.22 282 8.62 314 9.60

1953 3318 100 721 21.74 316 9.53 405 12.21

资料来源：同表22-1。

当时粮食紧张，除了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沿海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从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2516956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作原料。自1931年以后，洋麦入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数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个月中有10个月用洋麦作原料。

1949年以后，停止了洋麦进口，还有少量粮食出口。粮食部长章乃器1954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为了搞好粮食平衡，1952年成立粮食部。像财政部收钱、保证财政收支平衡一样，粮食部收粮，保证粮食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手段就是尽可能多收，尽可能少卖。在统购统销之前，粮食部和粮食商人争粮，统购统销以后，粮食部就和农民争粮。粮食部按月、按季分析粮食收购和销售情况。粮食部成立之初，还没有进行城乡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搞统购统销，还有粮商，有粮食自由市场。因此，国家必须和私商争粮。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1952年度为61：39，1952－1953年度为56：44。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243亿斤）。光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

章乃器在上述发言中认为："我国粮食问题的本质，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党外人士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这一看法，显然是代表了当时权力主流的看法。这种看法表明，统购统销和农业集体化是计划经济的需要，这势必加剧政府对农民的压榨。

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基本没吃饱过

面对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因病在外地休息，由薄一波主持工作。此时，各城市粮食进一步紧张，此时陈云顾不得养病，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力，把全部粮食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所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全国城镇5000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这种作法当然会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在专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从陈云肩担两个"炸药包"的体验可以看到，一个政权想为其被统治者提供必要的保障是非常困难的。政权不是万能的，"一家包天下，天下靠一家"是很难很难的。所有的国家主义者都轻视了这种困难。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除国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粮食买卖。农民的粮食只能卖给国家，不能卖给他人。《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1亿万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农业集体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在统购统销中，国家规定了城镇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各省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余地，在国务院规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粮

食定量略低于国家的定量。

表21-3 1956年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单位：市斤）

居民类型	十五个城市的标准	国务院规定标准
平均数	26.07	27.70
特殊重体力劳动者	51.72	55.00
重体力劳动者	41.49	44.00
轻体力劳动者	32.57	35.00
大中学生	32.75	35.00
一般居民及10周岁以下儿童	26.15	27.50
6 - 10岁儿童	20.56	22.00
3 - 6岁儿童	8.85	9.00
3周岁以下儿童	7.89	8.00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

今天看来，城镇这个定量并不低。但当年副食供应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粮食是人们热量的主要来源。虽然城镇居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但对农民来说，这种有保证的粮食定量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特权。

统购统销是1953年12月实行的。在农村的口号是，把余粮卖给国家。实际上，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征购任务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农民卖掉的不是余粮，而是被强制性地把口粮、饲料和种子也卖掉了。

1954年9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上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年7月 - 1954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长说粮食库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51%，这是事实的一面。但是，还有事实的另一面，即由于粮食需求增加，使库存逐日减少。当时，粮食部和中央财经办公室提供了1954年全国粮食库存减少的数

据：

4月6日库存为477.93亿斤；

4月9日库存为469.61亿斤；

4月12日库存为465.79亿斤；

4月15日库存为456.52亿斤；

4月19日库存为446.42亿斤；

4月23日库存为434.50亿斤；

4月28日库存为422.81亿斤；

4月30日库存为416.56亿斤；

5月6日库存为400.54亿斤；

5月10日库存为389.43亿斤；

5月13日库存为378.96亿斤；

5月17日库存为370.20亿斤；

5月20日库存为360.77亿斤；

5月24日库存为352.84亿斤；

5月27日库存为346.02亿斤；

6月10日库存为317.38亿斤；

6月22日库存为301.98亿斤；

6月30日库存为298.92亿斤。

中央财经办公室和粮食部紧锣密鼓地向中央提出这样一组数字，有如一次次警报，可见当时主管粮食的干部们心情之急。国家领导人眼看着全国粮食库存从477.93亿斤逐日降到298.92亿斤，心里也一定无比焦急。这种焦急的心情将转化为加强对粮食的统购力度，转化为统购指标的提高。

第二年，统购任务进一步提高，195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给粮食部的计划是：征收309.8亿斤，收购569.73亿斤（指标分配到各大区）。二者合计879.53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1.98%，，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湖北省浠水县农村，那时由于打场后粮食全部被强迫卖给国家了，秋收后一个多月，农民就没有吃的。这时乡政府不得不再开供应粮食的条子，农民拿着条子去买粮食。每到星期天，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到三里以外的乡政府去排长队开条子，每次只开五斤到十斤。我们拿着这宝贵的条子再到五里以外的粮库去排队买粮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来，我的家乡还算幸运的。为了完成过高的征购任务，有的地方，对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

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逐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5年2月2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四、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众性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

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9个县统计，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上面批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 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俱，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

在统购统销初期，出现了大量的反抗和严厉惩罚。湖南常德地委作出的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 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 四川省德昌县在1954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 。1953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 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

大量的农民反抗事例表明，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1955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 中是这样说的：

有人认为，今年春季，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

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粮食部门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上面都当成是自发势力的叫喊，而当时认为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甚至当作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据统计，1957年6月国务院52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 有的干部不服，认为饿死人是统购统销造成的。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

三、“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1957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50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430亿 - 450亿斤库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480亿 - 500亿斤库存，最好能有600亿斤库存。

李先念在这个会上介绍了1956 - 1957年度粮食收支情况。这个年度计划征购801亿斤，实际征购了833亿斤，实际征购数比上一年度的860亿斤减少了27亿斤，因为这一年灾害较大。在粮食支出方面，销售计划是743亿斤，实际销售833亿斤。比计划多销了90亿斤。

比上一年实际销售多出了132亿斤。多销了粮食是因为灾年。另两项支出是出口和军粮。出口计划是48亿斤（包括大豆），实际出口43.76亿斤，军粮计划是23亿斤，实际是17.2亿斤。以上三项支出总共为894亿斤，比收入（即征购）多出了61亿斤，只好挖库存填平。去年6月底库存为427亿斤，今年6月底库存减少到366亿斤，连一个灾年都应付不了。库存再不能减少了。

李先念说，现在城镇人口逐年增加，今后城镇的粮食供应每年大约要增加二三十亿斤，即每年销量要增加6%左右。怎么办？一要坚持“三定”（即一级一级政府向下定产量，定收购数，定销量）为基础；二要增产增购；三要坚持统一调度；四要坚持先公后私；五要严格控制销量；六要加强政治工作。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六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加强政府对粮食的控制，多征购，少销售。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陈云在8月31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850亿斤。 这次会议初步认定1957－1958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856.32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757.20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亿斤，出口36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亿斤补进库存。1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1.15斤到1.2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复讨价还价，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852亿斤，销售提高到767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31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3685亿－3700亿斤，比上一年增产35亿－50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852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847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767亿斤，减为748亿斤。军粮18亿斤和出口36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31亿斤增加到45亿斤。

中央这样坚决地压缩销量、确保库存增加45亿斤，是迫于形势的压

力。1956 - 1957年度，粮食收入（即征购）只超过计划19.2亿斤，而销售却超过计划77亿斤，使得出口计划没有完成。国家库存减少过多。

进入1958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政府更加焦虑。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58]104），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 - 1958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920.11亿斤，销售842.09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奕中还是中央占优势。

表21-4 “大跃进”以前粮食产量和征购情况（单位：亿斤）

产量与征购	1953 - 1954	1954 - 1955	1955 - 1956	1956 - 1957	1957 - 1958
产量	3337	3390	3678	3855	3898.2
征购数（折贸易粮）	1003（828）	1078（903）	1041（860）	994（838.48）	1038.3（854.74）
占产量比重（%）	30.1	31.8	28.3	25.8	26.6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 - 1958年度不是最后数。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从表22-4中可以看出，1954 - 1955年度征购比重最大，多收了70亿斤粮食，后两个年度的征收数不得不下降。由于每年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销给农村的粮食高达40%以上。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国家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表21-5 “大跃进”前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数（单位：亿斤）

	1954 - 1955	1955 - 1956	1956 - 1957	1957 - 1958
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拆贸易粮）	494（401）	405（334）	490（402）	429（351）

占征购粮食的比重（%） 45.8 38.9 49.3 41.3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 - 1958年度不是最后数。

在“大跃进”以前，在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有40多亿斤粮食出口，用于换取外汇进口设备。这些粮食都是从农民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表21-6 “大跃进”以前粮食出口情况（单位：亿斤）

年份	出口贸易粮	折原粮	其中大豆
1953 - 1954	32	36	18
1954 - 1955	41	46	23
1955 - 1956	44	51	23
1956 - 1957	44	51	24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 - 1958年度不是最后数。由于粮食部的数字是按粮食年度计，《中国经济年鉴》的数字是按生产年度计，所以这个表中的粮食出口数和第20章“1956 - 1965年间中国食品出口”一表中的数字有所差别。

1957年，在粮食征购中国家和农民间多年的“顶牛”现象有所发展。各地要求提高农村用粮标准的呼声很高，有的地方发生农民集体抢粮，不少地方出现成群逃荒，耕牛瘦弱病死。冀、鲁、豫、皖、苏（北）五省“顶牛”现象最为尖锐。城市反右派斗争，农村也开展“大辩论”。农村“大辩论”的主题是“明辨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例如，湘西两个地区的“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辩论要点”是：一，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要不要？二，口粮标准低不低？国家是不是卡农民？三，粮食统购统销任务要不要完成？增产应不应该增购？四、计划用粮和节约用粮能不能做到？通过大辩论，益阳超额完成了早稻、中稻征购任务。明为辩论，实际是为征购粮食施加政治压力。对上述辩论题目谁要作出与政府意见不一的回答，谁就要成为被“辩论”的对象。当时中央和地方报纸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新闻报道。例如：《统购统销好得很——驳右派分子》，《反对统购统销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舆论工具告诉农民：再“顶牛”就有当右派的危险。

不管怎样加大征购力度，政府总感到粮食紧张。因此，中央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减少粮食供应的措施。

1957年5月17日粮食部发文 ，对牲畜的饲料实行定量供应。北京有组织的专业运输骡马每月每头供应饲料180斤，驴供应饲料90斤，零散大牲畜减半供应。在饲料供应上，对牲畜也限制单干，鼓励集体化。麸皮、玉米皮一斤折粮一斤，榨油后的豆饼每斤折粮一斤。

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发出文件：《国务院关于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中写道："1955年实行的粮食'三定'所规定的留粮标准不得提高，国家核定的粮食收购数量不得减少，定销数字不增加。灾区人民的口粮标准应该适当降低，收成较差的地区的农民口粮标准也应该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于粮食紧张，1957年9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10%，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大地方比例更大一些。 1958年2月21日，刘少奇从河北省拿来各种百分比的红薯面和小麦面掺和做的馍十多个，给中央领导人尝一尝。大家尝了以后觉得好吃。建议粮食部全国统一安排。1958年3月7日，粮食部党组全面安排薯类生产和销售。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在农村和城市销售粮食搭配10% - 20%的薯干或薯面。

1958年春天，农村缺粮问题相当严重。4月17日到19日，中央办公厅听取了安徽、河北、山东、广西、广东、甘肃、山西、四川、江苏、吉林、辽宁、湖南、福建、内蒙古、云南16个省的电话汇报，得知这些省都发生了缺粮、断粮、闹粮情况。安徽130万人缺粮。山东农村有67万多人断粮。广东仅15个县断粮的就有69万多人。甘肃21个县缺粮，其中最严重的县饿死735人。

在"大跃进"以前，粮食短缺问题就相当严重。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1958年5月8日写的《对今后五年粮食局势的展望》中说："过去几年粮食工作是很紧张的，冬季抓统购，春季抓统销，夏季既要抓统销，又要抓夏粮统购，工作稍一放松，粮食局势就会出问题。这是因为，粮食产需矛盾非常尖锐。""原来认为，要经过十几年的紧张，才能争取粮食情况的好转，而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则要到更远的将来。"

四、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由于“大跃进”期间“五风”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全国粮食总产量1956年就达到3855亿斤，1958年估计为4000亿斤，1959 - 1963年，一直在3400亿斤以下，最低的一年即1960年只有2870亿斤，低于1951年。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6年的水平。

但是，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1958年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粮食总产量一下子吹到8500亿斤。

表21-7 大饥荒年代及前后年代的粮食产量（亿斤）

年份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产量	3855	3901	4000	3400	2870	2950	3200	3400	3750	389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41页，统计年鉴的粮食数为生产年度（1月1日到12月30日前。粮食部的粮食数为粮食年度（上年7月1日到下年6月30日）。

人们通常认为，1958年粮食“放卫星”只是下面干部的荒唐，是下面干部欺骗中央。实际上，这种荒唐行为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最早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 毛泽东一句话，党报立即紧跟，马上宣传“丰收的例子”，就放起了“卫星”。上面有高产的希望和急切心理，并且听不进“保守”的意见，下面就千方百计地迎合上级的意图。毛泽东希望亩产1万斤，下面就会送来亩产10万斤的好消息。浮夸，实际上是对上层意志的迎合和夸大。而这种迎合和夸大是权力机器的利害所逼。

浮夸风是从1958年夏收开始的。《人民日报》先出现的是河南省遂平县“放卫星”的报道，说是亩产小麦2015斤。

遂平县假话只不过是全国假话大合唱中的一个音符。翻开1958年的《人民日报》真叫人大开眼界：在一版显著地位不断地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小麦创高产的新闻，不断地为假话推波助澜 ：

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

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 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 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海拔2797米的一个农场亩产8585斤6两。

从报纸上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简直是组织浮夸竞赛，后一个参赛者的"成绩" 总是比前一个参赛者要高，后一个吹牛者比前一个吹牛者胆子更大。

进入7月，《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的工作人员写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到寿张县调查的工作人员是奉刘少奇之命派遣的。这句话一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说假话的人胆子就越来越大，报上来的产量说越来越高。

作假者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

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浮夸风中起了主导作用。它今天推波助澜，鼓励浮夸；明天施加政治压力，打压不相信浮夸的看法。当时吴冷西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2002年6月16日，吴冷西病逝，他的老同事穆青在纪念吴的文章中写道：“冷西同志不但是新闻界优秀的领导人，也是我党老一代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发我们前进的动力。” 新华社有人写的纪念文章中竟说吴冷西“用一生诠释两个字”：“真”和“严”。新华社和吴冷西同时代的老编辑私下议论：“吴冷西‘真’在何处？”“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这样吹捧吴冷西，说明改革20多年了，中国的新闻界和吴冷西时代没有根本变化。”

党报宣传的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有被打成右倾的危险。在基层，谁怀疑，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当时的所谓“辩论”，是一种看法压制另一种看法，不让另一种看法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驳，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

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邪风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就成为肆虐中国大地的恶风。

在人们对报纸上的“高产卫星”心怀疑虑的时候，著名的科学家、当时全国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钱学森，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

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著名科学家的文章以科学的权威扫除了人们的怀疑。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期间，李锐问毛泽东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回答说，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 2004年，李锐对本书作者说，毛泽东这一说法也可能有推脱责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实。

科学家如此，官员的狂热和无知就更不足为奇了。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水稻亩产可达一万斤。1958年8月11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不仅肯定了所纸上的浮夸数字，还从政治高度肯定了这些数字的伟大意义。9月26日，以讲实话著称的副总理陈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广东番禺县访问记》的文章，说他亲眼看见了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

如果说上述单产是个别现象的话，下面的报道就是全面大丰收了：8月22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省；9月13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个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9月29日《人民日报》称：“甘肃粮食增产1倍多，粮食总产量可达200亿斤，比去年增长1.4倍，全省平均每人拥有粮食1540斤，至此，一向缺粮的甘肃省在粮食方面开始富裕起来了。”《人民日报》还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69%，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倍。

多年来为粮食而发愁的粮食部也高兴起来。他们向中央的报告写道：“过去我们以为粮食大量增产、粮食状况根本好转是10年以后的事，现在我们看，三、四年后粮食状况就能根本好转。三、四年后粮食产量可达6000亿斤（包括大豆），人均900斤，比现在增长50%。” 粮食部党组1958年8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更为乐观：“据各地

汇报的材料来看，今年全国粮食产量预计为6283亿斤，比去年的3899亿斤增加2384亿斤，增长61．44%。

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是一顶不轻的政治帽子。在信阳，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人次。 于是，浮夸风越刮越严重。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下面的浮夸，而且在于相当多的中央领导人以致中央工作会议，竟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高产记录。1958年8月29日）毛泽东对这些高产“卫星”有时相信，有时怀疑，但相信还是主要方面。他对1958年粮食成倍增长深信不疑。1958年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翻，明年还可能翻一翻，这样我们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1958年11月16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两人联合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中说：“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四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8500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幅度一般比地县报的数字少10% - 30%。下面报产，有浮夸的，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了些折扣，8500亿斤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会少于7500亿斤，可以照此数公布。这比1957年的产量3700亿斤翻一番还多一点，这是很大的跃进。这一点必须肯定，不能为少数虚报浮夸现象以及某些缺点错误而动摇这个总的估计。”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这两位领导人对待数字的态度是认真的，各省也注意了数字的真实性。但是，这些自认为“认真”的高官们却是被下面干部“认真地”骗了一把。而下面干部其所以骗上面，也是上面逼出来的。有了8500亿斤这个数字，这两位农业领导人乐观地说：“1958年粮食增产较多，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300 - 500斤储备粮……这样做，减少了集中储备所引起的仓房设备等困难”。也是有了上面的数字，“意见”中谈到下一年的计划时说：“1959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4亿亩左右，比1958年减少了20%以上。但粮食产量计划定为10500亿斤，城乡人口人均粮食2000斤。”

高产神话不仅扫除了主管农业的高官们多年粮食紧张的愁苦，也使毛泽东对粮食的状况十分乐观。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

县，他相信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假话，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还说："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还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

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进而提出了种植方面的对策：少种，高产，多收。1958年9月底，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少种、多收"。 。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文规定："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理论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农作物面积缩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值物，实行大地园田化。" 高产不容易，少种是最容易的，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自然是少收。上面这么说，下面就行动。这一行动又和瞎指挥结合起来。江苏省曲塘公社胡庄大队为了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精神，1958年秋种全大队只种耕地面积的54.5%，社员看到大片良田抛荒十分痛心，瞒着干部直到腊月三十夜还偷种了200多亩。 但是，不是所有被干部抛荒的土地社员都偷种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所不惜960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说："1959年播种面积比1958年少17700万亩，即减少10％弱。这大概是1959年粮食减产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以后，还引出中国科学院的一场闹剧。8月6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人说："主席说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粮食也要大大增产，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年有3000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经过紧张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6个与化学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它们是：在长春的应用化学所，在大连的石油研究所（即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学所，在上海的有机化学所、生物化学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停止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于8月25日正式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课题。这些课题进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资，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时，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们也饿得发慌。于是，20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转而进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 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

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

五、残酷的高征购

粮食高产的神话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征购。大吃大喝是在1958年秋季短暂时间，但也是造成1959年大饥荒的一个原因。有些地方“吃饭放卫星”，“甩开膀子干，敞开肚皮吃”，一天三顿干饭。个别地方还开“流水席”，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当时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俭学，帮邮局送信，在一次从浠水县城到洗马镇送信的路上，正碰上一个公共食堂开午饭，食堂墙上挂着“吃饭不要钱”的红布横幅。我也试着走进了食堂，管理人员二话不说，就给我一个大碗让我随便吃。我饱吃了一顿白米饭，享受了一次“共产主义”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队，食堂还为农民炸油条吃。过去农民连节日也吃不上油条。

由于大办钢铁，大办水利，留在农业上的只有老年、妇女和儿童，已经成熟了的粮食烂在田里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很少，有的乡只留下几个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还提“秋收放卫星”，庄稼熟了不收割，等着放卫星的时候，“青黄一齐割”，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腊月二十七还割谷子的怪现象。收获上浪费，一般要丢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红苕丢失二三成。

对农民致命的打击是高征购。由于把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估为8500亿斤，公布数为7500亿斤（两三年后粮食部的数字是3980亿斤，1980年代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4000亿斤，实际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征购指标也就水涨船高。1958 - 1959粮食年度（1958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实际征购粮食1113.35亿斤，比上一年度多征购了195.14亿斤，增长幅度为21.25%，粮食实际产量按4000亿斤算，只比上年增长0.26%。 1113.35亿斤比正常年景的850亿斤高出263.35亿斤。

高征购的直接后果是挤占农民的口粮。福建省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年为16.8%，1959年、1960年分别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

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 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87万人。 福建当时并不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它省份可想而知。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通栏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这是动用400多名劳动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产队1.016亩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干部造假，农民糟殃。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内，仅第二生产队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饿死了70多人，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见了建国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

农民没有这多粮食，征购自然遇到困难。1958年10月4日，粮食部党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中说："今年粮食大丰收，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可是粮食购销调运情况很不好。从今年7月1日到9月底，全国征购粮食26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9亿斤，销售粮食211亿斤，比去年同期多22亿斤。其中城市多销10亿斤，农村多销12亿斤。全国9月底，粮食库存41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8亿斤。有17个省市库存减少，其中津、京、辽、吉库存最为薄弱。"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从1959年春天开始，农村大批饿死人。由于地方官员隐瞒和缩小死亡数字，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1959年2月21日，谭震林在晋、冀、鲁、豫、陕、川、鄂、苏、皖、京十省市小麦座谈会的总结上说："现在粮食问题主要是心理状态，并不是实际上有什么粮食问题。河南整社还没有结束，据说就搞出来成百亿斤粮食。为什么这样的丰收他们还要打一些埋伏？这是一个心理状态。" 谭震林其所以这么说，因为当时上层有这么一股舆论。

1959年1月27日，广东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写了《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的舆论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粮食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个报告介绍，雷南县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

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在赵紫阳的报告上的批语中强调“去年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赵紫阳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认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在批语中肯定了雷南县的两条政策。

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杜导正，当时经常列席广东省委常委会，是知道广东反瞒产私分的。他在2003年8月对本书作者说：反瞒产私分是陶铸的意见，赵是支持的，当时只有陈郁夫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东莞反瞒产，赵在湛江反瞒。赵比陶缓和得多。陶整人，赵不主张整人。不过，到了在四月份，陶铸看到农民真的没粮食，主动停止了反瞒产运动。

无独有偶，1959年2月，国家计委办的供领导人参考的内部刊物《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见本书第 * 页“安徽不安”一章——页数待编完后定，致编辑先生）。毛泽东不知底细，2月28日，他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他认为只有实行“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决瞒产私分的问题。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郑州会议上，虽然各地闹粮食的严重情况不断传来，但中共中央还不承认缺粮。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说：

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在这里，毛泽东认识到公社所有制还不行，要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毛泽东还不相信粮食不足，不相信农民挨饿。认为只要所有制调整了，粮食就会来。

表21-8 大饥荒时期国家调度粮食情况一览　单位：贸易粮，亿斤

收支 1957-1958 1958-1959 1959-1960 1960-1961 1961-1962

收入 合计征购 粮食年度生产年度进口 920.11 1125.44 1214.29 823.74 794.67

920.11 1125.44 1214.29 780.84 679.14

(875.80) (1092.02) (1195.20) (852.67) (682.48)

 -   -   -   - 42.90 - 115.53

支出 合计销售城镇销售乡村销售财政供给出　　口损　　耗 899.65 1166.57 1260.51 949.09 777.10

842.09 1052.01 1119.13 886.97 736.32

422.43 546.32 592.65 524.89 467.87

419.66 505.19 526.48 362.08 268.45

12.43 12.32 13.12 12.18 12.45

41.68 72.56 86.51 23.92 17.55

3.45 29.68 41.75 26.02 10.78

期末库存其中陈粮 384.41 343.28 297.06 171.71 189.28

291.68 217.14 151.83 109.39 130.30

资料来源：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说明： 57 - 59年，58 - 59年，59 - 60年　三个年度购销数字中包括周转粮和品种兑换，60 - 61年度和61 - 62年度不包括。财政供给是指军粮。

高征购指标下达以后，农民算计了一下，按这个指标，口粮、饲料、种子都没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产队的确私下藏了一些粮食，但数量不多。中央和省级干部过高地估计了这个数量，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候，还不相信没有粮食。有了这个错误的估计，中央和各省还继续加大粮食征购力度，征购指标一斤不能少。征购任务

的沉重压力，上级对征购期限的紧迫要求，基层干部也顾不得按毛泽东所要求的从所有制上、从政策上做工作，通过反瞒产私分对农民的暴力掠夺是一条捷径。反瞒产私分和整风整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政治压力。可怜的中国农民，在深受饥饿的拆磨的同时，又遭受反瞒产私分的暴力摧残。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的章节中，对反瞒产私分中出现的惨状进行了描述，这里再补充两个案例：

1959年，四川省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10月2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这个会上吊打了30多名社队干部，10多人致残，捕了3个公社干部。10月25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4000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这个会有30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14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4人，撤职8人，受其它处分2人。该公社大小队干部被打的有142人，当场打死1人，打残病死1人。县委第一书记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的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打人成风，"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坏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于是，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3人。（详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1959年12月9日，丰都县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区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先打第一线(管区支书、大队长、会计、保管)，再打第二线（生产队长），后打富裕中农"的主张。现场会上吊打7人，其中1　人当场打死。会后，区、乡先后召开现场会，当场打死173人，1179名干部被撤职。

辽宁省铁岭汎河公社在查粮挖粮过程中宣布："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有的在党员干部会上提出"没有杀人的心，就购不出粮食"。公社党委书记徐某在杨威楼片召开生产队支部书记会时，把绳子摆在桌子上，问大家："你们认识这个东西不？有没有粮食看着办！"当场把药王庙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崔凤伍斗争得尿撒在裤子里。在药王庙召开的生产队队干部会上，第一小队队长刘春林生病没有来，徐广仁让人用手推车推到会上"辩论"。徐问刘："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刘只好答："大跃进了。"又问："人民公社优越不？"刘答："优越。"紧接着问："那你为

什么不拿粮食？”购粮干部（县委宣传部的）安某逼社员李墨林回家拿来70斤口粮，还要他再回去拿。李说这是逼人命，安就说李“破坏粮食运动”，送县公安局押了15天。购粮干部魏某（县农委股长）在药王庙生产队逼社员刘玉青拿粮，刘说没有粮。魏就把刘绑起来让其跪在地上，魏亲自用脚踢，还游街一天，刘被迫自杀，刘的老婆也逼疯了。魏在老河生产队开大会动员群众交粮时，叫社员跑步走，他站在台上学着日本人的腔调训话：“你们把粮食统统地拿来，粮食大大的有！”会后领着30多人到各家搜粮。公社秘书李兴民，在城南堡生产队立公堂，审讯逼粮。在1959年购粮过程中，全公社有67名干部打过人，被打的88人，被“辩论”的112人。

农民本来没有粮食，反瞒产私分是反不出粮食来的。到1959年初夏，中共中央才承认粮食真的紧张，但不否认1958年的大增产。4月19日，李先念在中央电话会议上说；“今年的特点是大增产也大紧张”，他认为1958－1959年度粮食产量还是比上一年度增长了35%（上一年度的产量为3898亿斤，增长35%即5262亿斤）。他说，国家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5亿斤，今年6月底，库存连360亿斤的最低线也保不住了，是统购统销以来库存最少的一年。

为了证明农民手中还有粮食，科学家钱学森又以科学为证。1959年9月25日，钱学森又在《知识与力量》8、9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按照中国的平均纬度，接受的太阳能转换成碳水化合物的干物质，每亩粮食产量应为7.8万斤，扣除阴天和非生长季节，也应有3.9万斤。

1959－1960粮食年度，还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

六、粮食部的喜讯，农民的眼泪

1959年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了15%。但当时继续头脑发热，认为粮食总产量将达5500亿斤。1959年11月2日，粮食部长沙千里在他的报告中公布了这个数字后说：“在整个非常好的经济形势下，粮食形势也好得很。”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向中央提供了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历年城乡粮食销售情况和历年国家粮食收支情况，建议把1959－1960年的粮食产量定为5000亿斤，征购指标定为1150亿斤，销售指标定为855亿斤。7月5日上午6时，毛泽东作了很长的批示，说这个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我基本同意这个文件

所述的意见，印发与会各同志。批示说：

一，假如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下，征购1100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二，下半年销售计划我感到不但1020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855亿斤似乎也略多了一点。是否可调为800亿斤，或810亿－820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可以吃饱吃好。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配给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细地过日子，是否可按1957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1957年的日子不是过得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和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在三五七年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9－1960年度，征购任务为1100亿斤，销售计划为820亿斤。由于估产5000亿斤大大高于实际产量，征购任务1100亿斤很难完成。为了完成毛泽东钦定的征购任务，反瞒产私分还继续进行。征购粮食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用反右倾的的政治压力征购粮食。因此，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得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规。1959年10月15日，李先念在全国电话会议上称："从7月1日到10月10日，共收购粮食453．8亿斤，比去年同期多收156．8亿斤。"他强调，收购粮食"是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和对右倾思想的批判。"残酷的政治斗争终于从农民那里拿来了粮食。1959年11月27日，粮食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 ，字里行间露出喜悦之情："今年秋季粮食征购运动声势浩大，来势猛，进度快，为往年所没有。从7月1日到11月20日，征购入库已达897亿斤，比往同期多275亿斤……全年粮食征购任务预计11月底可完成，比往年提早了一两个月，打破了往的常规。"这个报告还有其它的喜讯：粮食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亿斤；出口调拨计划完成了79亿斤，提前34天完成了1959年的计划；10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已达658亿斤，为历年同期最高峰。报告还承诺：中央确定的1959－1960年度1075．8亿斤的征购计划可以超额完成，各地决心很大，已安排了1100亿斤，完成1200亿斤是有可能的。……

宏观报喜，微观报忧。粮食部门的喜讯是对农民压榨和剥夺的结果。

正是反右倾运动，使这一轮剥夺比往年更加顺利。1959年冬到1960年冬，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大饥荒中饿死的人，60%发生在这一年。

表21-9 大饥荒年间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数（贸易粮，亿斤）

	57 - 58	58 - 59	59 - 60	60 - 61	61 - 62
全年	419.66	505.19	526.48	362.09	268.45
下半年	134.03	201.01	166.93	132.67	57.16
三季度	84.06	102.20	101.14	84.47	53.24
七月	38.73	42.18	37.55	35.14	25.97
八月	23.02	31.56	29.37	27.13	19.73
九月	19.31	28.46	24.22	22.20	13.54
四季度	49.97	98.81	75.85	48.20	37.92
十月	16.75	36.06	28.59	17.96	11.86
十一月	15.54	31.02	22.10	13.54	11.76
十二月	17.68	31.73	25.16	16.70	14.30
上半年	285.63	304.18	359.49	229.41	171.29
一季度	94.46	110.26	142.71	89.46	171.29
一月	22.19	30.18	33.63	21.63	16.61
二月	22.96	29.88	40.91	26.13	15.93
三月	44.31	50.20	68.17	41.70	31.04
二季度	191.17	193.82	216.78	139.95	107.71
四月	59.09	69.67	78.02	49.49	38.18
五月	72.71	72.87	77.92	49.43	37.46

六月 59.37 51.38 60.84 41.03 32.07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国家销售给农村的粮食除了供给种经济作物的农民以外，基本是征购的“过头粮”的返销。从返销的数字可以看出，每年7－12月销售少，1－6月销售多。7－12月离秋收时间近，农民自己可以维持一部分，1月以后，就得完全吃返销粮了。1958年和1959年过头粮征得多，返销粮也就多；1960年和1961年过头粮征得少一些，返销粮就少一些。

七、压农村，保城市

如果说，1959年末粮食部门因收得多、销得少、库存增加而喜悦，到了1960年夏天，粮食部门开始尝到上一年对农民压榨过度的苦果了。7月12日，国务院财贸办负责人的一个报告 称，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辽宁的10个城市和吉林部分地区情况紧急，现在粮食库存北京、天津只够销4天，上海只够销两天，辽宁只够销6天。

由于1959年冬到1960年春饿死人太多，到1960年夏，各地再也不敢多报粮食产量了。10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各省报上来的粮食产量汇总起来只有3535亿斤，比1957年的产量3900亿斤还少。征购进展十分缓慢，而销售却增加很快，粮食库存不断减少。那时，全国82个大中城市6100万人口，9月底库存只有26亿斤，为上年同期的一半。津、京、沪、辽等地库存很少，随调进，随销售。10月16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上的报告说，今后9个月（今年10月到明年6月）剩下的销售指标只有648亿斤，每月平均72亿斤。上年度同期实际销售886亿斤，月均98亿斤。农民的口粮指标剩下更少。李先念说，如果每月平均销售量不比上年度减少26亿斤，今年增加33亿斤的粮食库存计划就不能实现。李先念总是念念不忘国家粮食库存，把国家粮库看得比农民肚子还重要，这是统购包销制度的必然。没有宽裕的库存，他就无法保证粮食供应，而粮食供应首先保城市。

城市粮食定量虽然一压再压，但还有保证。可怜的是农民。据谭震林1960年11月2日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6月，每人每月的口粮为：山东11.13斤；河南17斤；河北17斤；山西20斤；辽宁20斤。这些口粮中以地瓜为主，如河南的17斤中只有5斤纯粮，山东没有纯粮。 这还是国家供应指标，各级尅扣口粮的情况分严重，农民能吃到口里的比上述数字要低得多。

在大饥荒期间一直实行压农村、保城市的政策。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年底，贵州正在大批饿死人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 邓小平到四川时对李井泉也讲过和彭真类似的话，认为四川缺粮不如大城市的政治影响大，要李井泉从政治大局考虑，多调出粮食保城市。

如果说过去几年压农村、保城市只是实际操作不见诸文字的话，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却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方针。8月2日下午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去年6月底库存300亿斤，今年只有147亿斤，其中新粮55斤，库存再也不能挖了。准备进口粮食500万吨，但外汇紧张。农村调整先于城市，好转先于城市。问题在城市。要紧缩农村，保大中城市。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

1961 - 1962年度是粮食部最难的一年。粮食部反复算账，算来算出，中央粮库要亏空120亿斤（贸易粮）。国家打算进口100亿斤来补这个亏空。但外贸部估计，由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有旱灾，我们的外汇又不够，进口100亿斤有困难。这一年怎么过来的？还是挤农民的口粮。1961年粮食产量只有2850亿斤，即使全部留给农民，农民的口粮还不如1957年（1957年农民占有粮食3130亿斤）。实际上，这一年从农村净调出粮食383亿斤，拆原粮460亿斤。这样，农村人均占有粮食比1957年少123斤。 幸亏很多地方已放宽政策，农民自留地、三边地生产了一些粮食，有些地方还搞了包产到户，形势实际开始好转。否则1961年饿死人会更多。

1961 - 1962年，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有1.2亿人，仅供应的口粮食就有400亿斤，还有食品业、副食酿造业及工业用粮，总共需要500多亿斤。尽管从农村挤出383亿斤粮食，但不能满足城镇的需要。因此，不得不大力压缩城镇粮食销售量，1961 - 1962年度，城镇粮食销售量比1959 - 1960年度减少了122亿斤，但比1957 - 1958年度还是多48亿斤。为了补上亏空，只好进口粮食。1961 - 1962年度，进口粮食115.5亿斤(从1961年上半年就开始进口粮食，1960 - 1961年

度进口粮食42.9亿斤)。从1961年开始，津、京、沪主要是靠进口粮食维持。1961年8月26日，李先念在粮食、商业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说，现在票子多了，商品少了。1961年购买力为675亿元，而商品可供量为655亿元。尽管商品供不应求，还是要优先保证出口。为了进口粮食，一定要挤出一切可以出口的东西出口。 出口的商品是猪、蛋、油之类的食品,还是从农民的嘴边上夺过来的。进口的粮食只供应给城市。这也是压农村保城市的措施。

幸亏由于实行包产到户等应急措施，农村的粮食比前两年度多了（全国总产量统计数为2950亿斤，实际上农民自己在“三边”地上种的粮食很难进入统计），征购粮却比前两年大大减少，只有679亿斤。这是几千万农民的死亡逼得政府让步。但这个粮食年度，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也减少了150亿斤。农民还在饥饿中挣扎，据粮食部统计，1960年农民的粮食占有量比1955－1957年三年平均数减少了190多斤。1961－1962年度，全国农村大约有1亿人口每天吃粮水平在半斤或半斤以下。

“压农村”最典型是在食油供应方面。1959年春季，食油供应紧张，城市紧，乡村也紧，出口任务完不成，工业用油不能满足。中共中央开会讨论，认为“多头紧不如一头紧”，决定把农村的食油供应坚决压下来。除了生产油菜籽的地区以外，其它农村6、7、8、9四个月不供应食油。中共中央为此下了紧指示。 1959年9月10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谈到这件事时说：“采取这个措施引起了不少议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我们也有这一条，他们说农村不供应食油农民会造反。现在证明，农民没有造反。”李先念用农民没有造反的事实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真是言不由衷。他说：“农村9月份恢复供应，但是供应量不能超过停止供应以前的水平。城市每人每月供应标准已经减少到2两，新油上来以后是不是增加上去？我们的意见不再增加。”

众所周知，同量脂肪的热量是碳氢化合物（即淀粉类）的好几倍。本来热量不够的农民，却剥夺了他们吸收脂肪的权利，这是农民大量死亡的原因。省下食油干什么？出口是一个方面。1958－1959年度，收购食油25.7亿斤，出口4.38亿斤，国内销售不到19亿斤。农民吃不上油，更吃不上肉，连鸡蛋也吃不上。肉和鸡蛋到哪里去了？国家强行收购走了。国家用强制手段要农民交蛋交肉。有些地方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按人头下达指标。国家收购的生猪和鸡蛋一是满足城市的需要，二是出口。1960年4月19日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行念要求各省加强收购副食品，他说，收购上来的蛋，80%出口，20%内销。内销中第一是满足在中国的外国人，第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带

有调侃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吃鸡蛋。工农联盟，工农都不吃鸡蛋。"他说的"满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就是城市的特需供应。特需供应的对象一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更多的是高级干部。

八、大饥荒年代的代食品运动

粮食短缺，全国上下都大搞代食品运动，发动群众寻找代食品。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10日，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 说："为了广泛开展大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省、地、县各级党委和较大的企业、机关、团体党委，都要成立领导小组，设立代食品办公室。"他说："现在中央已经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由总理亲自挂帅，还设立了专门办公室。"谭震林说；"人造肉精（一种食用酵母）、小球藻、叶蛋白这几种东西，比大米、小麦、高粱、玉米的营养价值还高。"中国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利用他们"生物分类和生物化学方面的基础"，寻找粮食以外的食物。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这个建议说："根据中央支援农业的指示，为了有助于节约用粮，安排群众生活，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着重抓了粮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他们提出了一批"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料丰富，做法简便，可以分别情况，大规模的推广"的代食品。

这些代食品主要是：一，橡子面粉。先将橡子去壳破碎，然后用千分之一浓度的碳酸钠溶液浸泡一、二天，就可以去掉不适合食用的单宁，得到可食用的淀粉。全国年产橡子粗估约80亿斤以上，如果将其中20%提取淀粉，可得六七亿斤。二，玉米根粉、小麦根粉。将其磨碎，碾成粉，色香味有点像炒面。用玉米根、小麦根的20%做成根粉，全国可得几十亿斤代食品。三，叶蛋白。经过选择后可食用的新鲜草叶、作物叶子和树叶，每百斤一般可提取叶蛋白干粉2 - 10斤。从叶中取叶蛋白跟做豆腐相似，即先把采集的鲜叶（采集后不能过夜）切碎，掺水磨成浆，榨出叶汁，加热至摄氏70 - 80度，使叶汁中的蛋白凝固沉淀，然后过滤、弄干即成。四，人造肉精。这是一种用酵母菌做成的食品，所含营养极似肉类。我们从400多种菌种中选出一种叫做"白地霉"的酵母菌。把白地霉放在培养液（淘米水、涮锅水、残菜帮、烂水果、无毒的树叶、野草、农作物的根茎叶煮后都可制成营养液）里，保持摄氏20 - 30度，两三天内就繁殖出一层白膜。白膜在摄氏50 - 60度温度下，即溶解成糊状，便是人造肉精。五，小球藻、栅藻、扁藻。小球藻和栅藻的干粉中含蛋白质20% - 40%，脂肪4% - 6%。小球藻、栅藻是淡水中繁殖的，扁藻是在海水中养殖

的。此外，我们还在研究红虫（即水蚤）、玉米杆麯等代食品，看起来也是很有前途的。

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14日向全国转发了中国科学院党组这个建议。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又提出了一个新建议：采食昆虫。他们的报告说：“两个星期来，采集了可和食用的昆虫1200多斤，虫体蛋白质既多，油又很大。昆虫所已用来作成了酱油、乳酱、肉松和食用油，并加工成各种糕点和饼干。”昆虫所还介绍了烤食、油炸、制干粉、榨油、作酱油、作糕点等几种简便的加工方法。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发通知东北三省，要求各地推广。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推荐了十三种昆虫，并作了营养分析。

表21-10 十三种虫体营养成份分析（以虫体重量的百分比表示）

昆虫名称	粗蛋白	粗脂肪
豆天蛾越冬幼虫（干虫）	50.8	23.3
金龟子幼虫（即屎克螂，干虫）	48.1	21.0
蝇咀（干虫）	63.1	25.9
蝇蛹（干虫）	41.7	25.1
玉米螟越冬虫（干虫）	41.2	44.8
刺蛾越冬虫（干虫）	50.6	37.7
菜粉蝶老熟幼虫（干虫）	60.6	21.4
菜粉蝶蛹（干虫）	53.9	24.4
粘虫蛹（鲜虫）	13.8	6.2
棉蝗虫成虫（鲜虫）	21.3	2.8
蝗虫（鲜虫）	18.7	4.1
白蚁（鲜虫）	23.2	28.3
蚕蛹（鲜虫）	23.1	14.2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1960年11月。

只要中共中央一号召，下面就会搞起群众运动。中央号召搞代食品，各地就大搞代食品运动。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了一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此外，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代食品运动破坏了生态环境。本书有关各省情况的章节里，介绍了很多地方大搞代食品运动的情况。

九、农民的热量平衡

生产粮食的农民却因得不到粮食而活活饿死。李锐多次对我说：挨饿的滋味最难受。他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在劳动改造中有挨饿的亲身体会。我所查阅的十多个省的档案中，零星记载了一些饥饿死亡者濒死时的悲惨状况，因此，我想研究一下饥饿死亡的生理机机制。我的一位同乡王梅松，六十年代初毕业于湖南医学院，后在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环境医学研究所多年从事特殊条件下的生理变化的研究，转业后在天津医科大学任教，著述颇丰。1960－1961年，他曾带领一个医疗队到湖南几个县救治饥饿病人，积累了很多资料。他父亲和伯父都是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他听说我正在写这本书，热情地给我提供了帮助。这一部分内容是根据他写的文字材料和他提供的书籍写成的。

人体活动所需要的能量

生命的活动就是能量的循环，人的生命需要能量维持，据《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一书介绍，人体在不同的状态下能量的需求不同：

基础代谢所需要的能量：即人体处于安静状态时，体温的维持、心脏的跳动、肺的呼吸和肌肉紧张度的维持，都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即基础代谢能量。机体静卧在摄氏18－25度的环境中，完全处于休息状态，既无体力劳动，也无脑力劳动，而在12小时前就已停止进食，消化系统也处于静止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消耗的能量就是基础代谢能量。基础代谢能量是维持生命活动最低的能量。基础代谢能量受身体的大小、性别、年龄和气候的影响。男性比女性高，儿童和青少年比成年人高，寒冷气候比温热带气候高。一般说来，在普通情况下，成年男子每公斤体重每小时平均消耗能量1千卡（即4.418千焦耳）。以65公斤体重的男子计算，则24小时的基础代谢需要1560千卡。

除了维持基础代谢以外，从事各种劳动也需要能量。如走路（4.9公里／小时）每一分钟消耗能量3.7千卡。一般根据劳动强度不同将人体的能量消耗分为五级：

极轻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以坐位为主的工作，如办公室工作、修理钟表和收音机等。每日需供应热量2400千卡；

轻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以站立为主要的工作，例如商店售货员和讲课教师等。每日所需热量2600千卡；

中等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如重型机械操作、拖拉机与汽车驾驶等。每日所需热量约为3000千卡；

重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如非机械化农业劳动、半机械化搬运工作等。每日所需要热量约为3400千卡；

极重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能量：如非机械化装卸工作、采矿、伐木和开垦土地等，每日所需热量为4000千卡。

劳动者所需要的热量除劳动强度以外，还与工作环境有关。如冬天是露天作业还是室内作业，显然露天作业所需要的能量要多一些。

中国农民所从事的劳动多是重体力劳动和极重体力劳动，都是露天作业。每天所需要的能量大约在3400－4000大卡之间。

中国农民在大饥荒期间获得的能量

中国农民每天需要的3400－4000千卡的能量是从食物中摄取的。那么，在大饥荒期间，中国农民每天能得到多少能量？

综合各省情况，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国农民的口粮平均每天原粮不超过半斤。半斤原粮相脱壳后只有0.35斤。这还不是纯粮，多是以红薯、瓜菜替代。那时农民没有油，没有肉，这点口粮，是农民的全部热量的来源。

首先看各种食物能够产生多少热量。这一点，医学界已有成熟的研究成果。

表21-11 不同地区每一市斤农产品所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及热量

食物项目 别名 地区 蛋白质（克） 脂肪（克） 碳水化合物（克） 热

量（千卡）

稻米(籼)（糙） 大米 北京 41.5 12.5 371.0 1765

小麦粉（标准粉） 北京 49.5 9.0 373.0 1770

小米 伏地小米 北京 48.5 17.5 364.0 1810

玉米碴（黄） 包米碴 北京 46.0 3.5 380.0 1740

玉米面（黄） 北京 42.0 21.5 351.0 1765

高粮米（红）（三级） 红高粮米 东北 42.0 13.5 378.0 1800

黄豆 大豆 北京 181.5 92.0 126.5 2060

黄豆粉 豆粉 北京 200.0 96.0 141.5 2230

甘薯 红薯、白薯 北京 7.8 0.9 128.3 552

甘薯片 白薯干 北京 19.5 4.0 401.5 1720

甘薯粉 白薯面 北京 19.0 4.0 395.0 1690

马铃薯 土豆 北京 10.1 0.4 73.0 339

马铃薯 洋芋 陕西 7.1 0.9 71.0 320

大白菜 四川 5.8 0.9 15.3 94

大白菜（竹筒白） 天津白 四川 3.2 0.4 13.5 72

小白菜 油菜 湖北 5.6 0.9 16.9 99

南瓜（八方瓜） 湖北 1.8 1.4 29.2 135

番瓜（花皮） 饭瓜，南瓜 甘肃 2.3 0.5 14.0 68

冬瓜 北京 1.5 0 9.1 42

西葫芦 北京 2.5 0 8.7 44

猪肉 湖北 87.0 104.0 …… 1285

资料来源：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食物成份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6年12月。

在大饥荒期间，中国广大农村平均口量定量为每天0.35斤大米，折合热量618千卡。在大饥荒期间，农民是见不到大米的。有甘薯吃还算是不错的。5斤甘薯折一斤粮食（有的地方4斤折一斤），半斤口粮定量只有2.5斤甘薯，按每斤甘薯产生热量552千卡计算，折合热量只有1313千卡，比基础代谢1650千卡还少337千卡。有些地方以菜代粮，每斤大白菜只产生热量80千卡左右，一天能吃5斤大白菜，也只能吸收热量400千卡。一些饥荒严重的地方，既得不到2.5斤甘薯，也得不到5斤白菜。有的地方食堂停火，不给农民供应食品，而树皮剥尽，野草挖尽，农民从食堂以外也找不到食品。农民得到的热量更是微乎其微。

人体每日从食物中摄取五大类营养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由于食物过少，除了热量严重不足以外，蛋白质、维生素、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的缺乏会引起多种疾病。但在当时的统计中，对因此类病而死亡的人，列入正常死亡之列，不算饥饿死亡。

在大饥荒年代，政府推行了很多违反科学的渡荒办法，从而加剧了农民的灾难。王梅松教授向本书作者指出了当时推广的几种反科学的办法：

“双蒸饭”：把米放在瓦盆里加上水蒸成饭，再加一次水，再蒸一次。蒸了两次以后，饭的体积扩大一倍，吃到肚子里当时感觉饱。实际上它和稀饭没有区别，过后饿得更快。当时还宣传这样做饭可以增加营养，实际上，有许多不耐高温的维生素在反复加热后遭到破坏，营养比一次蒸的要差。

“瓜菜代”：这是当时政府提出的口号，而且普遍实行。没有粮食时只能用瓜菜代替，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报纸还宣传如何有利于人的健康。实际上瓜菜是代替不了粮食的。从食物成份表中可以看出，一斤白菜含蛋白质5.8克，脂肪0.9克，碳水化合物15.3克，产生热量94千卡。一斤南瓜含蛋白质5.8克，脂肪1.4克，碳水化合物29.2克，产生热量为135千卡。一斤冬瓜蛋白质1.5克，脂肪0克，碳水代合物9.1克，产生热量42千卡。而一斤大米含蛋白质41.5克，脂肪12.5克，碳水化合物371克，产生热量1765千卡。由上述数据可以计算出，18斤大白菜、13斤南瓜或27斤冬瓜才相当于1斤大米的热量，这些东西怎么能代替主食呢？蔬菜中含有较多的亚硝酸盐。人体吸收亚硝酸盐以后，它将人体内的血红蛋白氧化为高铁血红蛋白，从而使得血红蛋白

失去了运输氧的功能。因此，就出现口唇、指甲及全身皮肤青紫，重者可因呼吸衰竭而死亡。这就是大饥荒年代大量出现因“青紫病”而死亡的原因。

桔杆做馒头：如将稻草用石灰水浸泡以后，再切碎加入到面粉里做馒头。稻草的主要成份是纤维素、木质素，它们是用一种很复杂的碳水化合物结构（即复杂的多糖）。草食动物吃它能长肉，这是亿万年来生物适应环境进化的结果，它们的消化道中能分泌一种纤维素酶，这种酶能消化纤维素，使之成为单糖。而人的消化道是没有这种功能的。石灰水是碱性，它也不可能消化纤维素，用石灰水处理后的稻草，人吃了以后不会得到任何营养。

吃陈骨头：有些地方将死后放在户外多年的牛骨头收集起打碎后煮汤喝。牛骨头通过在户外多年风化及细菌分解后，除了剩下钙和磷以外，不会有任何能提供能量的营养物质。

饥饿引起死亡的病理生理机制

医学界将饥饿分为“完全饥饿”（机体完全得不到食物）、“不全饥饿”（总热量不足，食物成份不足）和“部分（质）的饥饿”（总热量充足，但缺乏某一种或几种机体必须的物质）三种。 大饥荒年代，中国部分地区的农民处于间断性的“完全饥饿”状态，全国城乡都处于“不全饥饿”状态。也可以说，自实行统购统销以来，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除了短暂的收获季节以外，基本上处于“不全饥饿”状态。

当人体的能量入不敷出时，首先动用体内储存的“糖原”来供应能量。体内存储的“肝糖原”和“肌糖原”的重量为370克，全部氧化代谢产生的热量为1480千卡，还不够一天基础代谢的能量需要。

体内储存的“糖原”消耗完了以后，下一步就消耗体内的脂肪。消耗脂肪所持续的时间取决于人的胖瘦。肥胖者持续的时间长一些。但是，完全依靠脂肪产生热量，有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产生大量的酮酸，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

当体内存储的脂肪消耗完毕时，便开始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人体内的蛋白质被大量消耗以后，肌肉出现干瘦，脏器出现萎缩。

心肌萎缩，就出现收缩无力，血排出量减少血压降低，乃至心力衰竭而死。王梅松教授在大饥荒期间参加的医疗队，在一所公社学校里收治水肿病人，常住水肿病人200多人，所观察到的水肿病人，最后大

多是死于心力衰竭。

肾脏萎缩、肾血流量减少、肾小球滤过率降低，尿量减少，出现肾功能不全。

垂体、甲状腺、性腺等内分泌腺都出现萎缩和功能低下。胃肠道黏膜萎缩，使营养消化吸收减少。

生殖器萎缩，由于缺乏蛋白质，年轻女性子宫发育不良，出现幼稚子宫。更多的人是月经量减少，乃至停经。由于子宫悬吊组织萎缩，子宫脱垂出体外。全国妇联党组在1961年2月16日《关于农村治疗妇女子宫脱垂、闭经病初步经验的报告》中指出，“去冬以来，各地党委在大抓群众生活的同时，将普查普治妇女病列为除害灭病的重要内容之一”。报告中明确指出妇女病就是闭经和子宫脱垂。可见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时任甘肃省委书记汪锋1961年5月9日在临夏调研时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5人，闭经的12人，占48%。一直没的闭经的两人中一个是女队长，一个是炊事员，1959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一个孩子。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6人，闭经的21人，占81.2%，全队自1959年以来没有生一个孩子。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19人，闭经的13人，占68.4%，在通经的6人当中，三个是炊事员，两个是女队长，一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生了两个小孩，都是干部家属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4人，闭经的16人，占66.6%，一直没闭经的四人，一个是炊事员，另三个是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只有干部家里生了一个孩子。

王梅松教授在1960年－1961年在湖南参加医疗队时，在涟源、邵东、祁东等县调查发现，一整个县的育龄妇女中，数十万人中只有极少数妇女来月经，其它都是非妊娠性停经。这些极少数来月经的妇女是多吃多占的“四不清干部”家属。青壮年男性出现睾丸、附睾萎缩，精液不能生成。青壮年未婚男子，在正常营养的情况下，每月遗精1－3次是正常现象，王梅松教授在湖南调查发现，在1960－1961年间，许多青壮年未婚男子，一年到头都未发生过遗精现象。所以，在大饥荒年代，除了因饥饿而死以外，人口出生率降到极低的水平。

在食物缺乏时，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都有不同程度的缺乏，但首先最突出表现出来的症状是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protein energy malnutrition），也就是摄入热能量和蛋白质量不足的症状最先发生。热能不足，人的各项体力活动都不能进行，全身无力，各项机能下降。蛋白质摄入不足，血液中的血浆蛋白含量下降，血浆胶体渗透压下降，血管的通透性增加，血管内的水份大量渗透到血管外的皮下

组织中，引起全身水肿。

人体内的各种酶和激素其本质都是蛋白质，是以蛋白质为原料合成的。如胰岛素、垂体前页激素，在蛋白质摄入量不足时，这些酶和激素就不能合成，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胃蛋白酶、胰蛋白酶、胰脂肪酶缺乏，摄入的蛋白质、脂肪就不能消化吸收，这就更增加了体内蛋白质的缺乏，从而出现恶性循环。

当蛋白质摄入不足时，体内抗体不能生成，如免疫球蛋白不能生成，淋巴细胞、吞噬细胞、白血球减少，抵抗力极度下降，很容易患细菌性感染疾病而死亡。

长时间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不足，体内脂肪消耗尽，内脏、肌肉的蛋白质亦消耗穷尽，病人出现干瘦，骨瘦如柴，这就是干瘦型的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

至于饥饿时生命的持续时间长短，则看热量不足和蛋白质缺乏的程度，看机体原有的营养水平等因素。长的可达几年，短则数月，当体重下降到正常值的70%以下，这个病人就无可救药了。但是，很多饥饿者在机体消耗尽以前就因并发症而死亡。但是，当年各地的死亡统计中，将并发症死亡都列入正常死亡之列，排出饥饿死亡数字之外。

上面介绍的是“不全饥饿”的情况。如前所述，在大饥荒期间，部分地区的中国农民处于间断性“完全饥饿”状态。“完全饥饿”可分为“饮水全饥饿”和“不饮水全饥饿”，前一种完全饥饿可以喝到水。大饥荒年代的农民都是属于“饮水全饥饿”。

饮水全饥饿的整个过程通常可分为三期：1，兴奋期，约3到4天；2，抑制期，约35－40天；3，麻痹期，约2－3天。

兴奋期以消耗机体内储存的糖原为主；糖原消耗殆尽，就转为以分解脂肪为主。机体能量80%以上靠分解脂肪获得；到末期时，由于脂肪消耗殆尽，同时代谢调节机能发生了深刻的障碍，组织蛋白质急剧地被分解。因此上述三个时期也可称为：1，最初适应期；2，最大适应期；3，濒死前障碍期。

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水肿较不突出，在早期可能发生水盐丧失。到了后期，当血浆蛋白减少、血液胶体渗透压降低时可以出现水肿。但它并不是普遍出现的症状。

完全饥饿的脏器形态改变没有不全饥饿明显，尤其是心脏一般并不萎

缩。就各器官的重量丧失程度而言，心脏重量减少得最慢。但是心脏的收缩力的减小与其重量的减轻并不成比例。心脏的重量虽然减少得慢，但心力衰竭并不慢，因为心力还与糖的供应有关。所以，相当多的饥饿者死于心力衰竭。完全饥饿100天时，脂肪消耗了97%，脾消耗了60%，肝消耗了53.7%，睾丸消耗了40%，肌肉消耗了30.7%，血液消耗了30.7%，肾消耗了25.9%，皮肤消耗了20.6%，肠消耗了18%，肺消耗了17.7%，胰腺消耗了17%，骨消耗了13.9%，神经系统消耗了3.9%，心脏消耗了3.6%。最为重要的器官消耗得最少。 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时往往体重丧失更多，达40% - 50%或50%以上时才死亡。

人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一千起 ，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读者在本书上篇中已经看到，在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第二十三章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期间，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大饥荒发生期间，由于饿死人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级政府极力隐瞒和缩小人口死亡数字，没有留下完整可靠的资料。再加上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比较混乱，很难用公布的人口数据推算。所以，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一种估计，而各种估计之间相差很大。我在这里先介绍中外学者的估计，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一章数字计算很多，读者在读这一章时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最好手拿计算器，一边看，一边算，否则一头雾水。

一、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结果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报送的，其根据是户口登记。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从人口统计数据上

看，说是三年大饥荒，实际上从1958年冬天就开始了。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表明，1958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由于饥荒以后的恢复性增长，出生率高于正常的状态。所以，本书对全国数据的分析计算中，从1958年算起。个别省份的起止年份，视其情况而定。

中国官方对大饥荒期间饿死人的问题讳莫如深。据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由于死亡人口过多，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省的人口统计数字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的人口数只能五个人看：省委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在这以后，没有公布人口数字。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少报饿死人口不仅可以减小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还可以领取这些已死的人的口粮，这种“吃空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除了公布1982年普查数据以外，还公布了1953年和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公布数字中，1960年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万（1959年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人），这个数字曾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日本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60年人口比1959年整整少了一千万。这个数字是不是人造的？为此我访问了公安大学的张庆五教授。张教授从1955年到1986年一直在公安部三局从事人口统计工作，1986年以后才到公安大学任教。他说，1984年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都来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一本人口年报。有总户数、总人口、男、女、城市人口、乡村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数、迁入数。公安部的数字是各省公安厅所上来的，各省公安厅是各县公安局上报的。而县的数字是由公社、大队、小队逐级上报的。下面报多少，就写多少，除了明显的技术错误以外，公安部三局一般对下面来的数据不加改动。1960年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万，就是根据各省报上来的数字汇总的，没有进行加工。由于基层干部怕死人多担政治责任，不愿多报死人数。再加上一个人一份口粮，死一个人口粮就减少一份。所以死亡数是偏小的。

在生产队里并没有真正的人口统计，大队要数字，小队的几个干部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其中男女各多少，会计记录下来就上报。小队的总人口是与粮食供应相关的，和出生、死亡数比，相对准确一些。

1983年还公布了历年的人口总数、死亡率、出生率。详见表23-1。

表22-1 国家正式公布的历年总人口（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

年　份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1954	60266	37.97	13.18	24.79
1955	61645	32.60	12.28	20.32
1956	62828	31.90	11.40	20.50
1957	64653	34.03	10.08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68	25.43	-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9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1966	74542	35.05	8.83	26.2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83页。

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即：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当年死亡率 - 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说某年饿死多少人，除了当年的死亡率、当年的总人口（由于年初和年终人口数不同，计算时取平均人口）以外，正常死亡率也很重要。正常死亡定得高，则非正常死亡就少；正常死亡率定得低，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多。在计算1958 - 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时，有些学者将1957年的死亡率当作正常死亡率。

我在计算的时候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1、由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是用每年平均人口计算的，所以先要算出每年平均人口：（上年底人口＋本年底人口）/ 2）。

2、在1949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如果没有特别情况，出生率逐年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72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如果没有“大跃进”，1957年和1964年间的人口趋势是连续的。在这期间，死亡率趋势是一条略微向下倾斜的直线，出生率是一条略微向上倾斜的直线。其间各年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都应分布在这条线上。这是估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依据。

3、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 - 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年后三年（1964 - 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终点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820多万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由上述数字，我们可以算出：

正常死亡率 =
{(12.28＋11.40＋10.80)/3＋(10.04＋9.50＋8.83)/3}/2‰＝10.47‰

正常出生率 =
{(32.60＋31.90＋34.03)/3＋(39.14＋37.88＋35.05)/3}/2‰＝35.10‰

表23-1中列出了各年度的实际死亡率。当年的实际死亡率减去正常死

亡率就是当年的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平均人口，就是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5324×（11.98 - 10.47）‰ = 98.64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74.4万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97.94万人，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48.94万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为1619.92万人。

此外，在三年大饥荒期间，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大批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男子精子减少，失去了生育能力，加上饥饿使得夫妻生活减少，因而出生率普遍下降。从三年大饥荒的实际情况来看，饥饿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远胜于死亡率的提高。例如，上海市1960年的死亡率为6.8‰比1957年的6.0‰上升不多。但1960年的出生率为27.6‰，1961年的出生率只有22.4‰，比1957年的45.6‰下降了很大的幅度。 所以，上海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很少饿死人，但有约14万正常年景下应当出生的人口没有出生。

有了正常年景的出生率和各年的实际出生率，可以算出各年因饥荒少出生的人口数。例如，

1958年少出生人口为：65324×（35.10 - 29.22）‰ = 385.4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1959年少出生人口为687.3万人，1960年少出生人口为949.9万人，1961年少出生人口为1127.8万人。大饥荒期间共少出生人口3150万人。

也就是说，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由于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1619.9 + 3150）万人，即4770多万人。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计算三年大饥荒造成全国总人口的减少。由表25-1中各年度的自然增长率，我们采用计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办法，算出正常年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了正常自然增长率，有了1957年年底的总人口，就可以推算出，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底应当有多少人口。而由于大饥荒，使得1961年底只有65859万人。应有人口和实际人口的差额，就是大饥荒造成总人口的减少。

我采用1955年、1956年、1957年和1964年、1965年、1966年，两个三年的平均自然增长率，计算出的正常自然增长率是24.38‰。以1957年底人口64653万人为基数，按这个自然增长率，1961年底应有人口为71192万人。所以，三年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71192 - 65859）万人，即5333万人。这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两部分。

为什么用后一种计算办法得出的总人口减少比分年度计算出来的要多563万？这是因为，第一，在分年度计算时，由于上一年的影响，1959年、1960年、1961年总人口比正常年景少，总人口少了，得出的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也就少了。第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总人口的自然增长数和按自然增长率算出来的人口增长数对不上。 以上两种计算中，都用了总人口数和自然变动数，把原来人口统计中的误差转移过来了。

图22-1 中国人口金字塔图

人口金字塔是以条形图的形式直观地表现某一年人口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的组合图形。它以纵轴表示年龄，横轴表示人口数量或比重。横轴的左边表示男性人口，横轴的右边表示女性人口。年龄最小的放在底层，然后逐一将相邻各年龄组向上叠加。中国三次人口普查都绘出了人口金字塔图。从图23-1中可以看出，在与大饥荒相应的年龄组上都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二、用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相差很大，以1957年人口死亡率(官方数据)为例，广东8.43‰，云南却高达16.29‰，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0.8‰。不考虑地区差别，用统一的标准估计中国全国的情况，必然存在较大误差。前面我们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了计算，现在，我们用各省数据进行计算。

各省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这一套书。《中国人口》每省一分册，包括香港和澳门，共32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此书是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各省分册由各省组织有关人员编写。1986年以后陆续出版。各省的数据也是经各省官方审定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缩小了的，但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我从除了西藏、台湾的28本书中，将各省、市、自治区的总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数据抄录如表23-2。

表22-2 《中国人口》各省分册记载的人口状况（人口：万人，率：‰）

年份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四川

总人口 6790.6 6790.6 6945.2 7081 7077.9 6897.3 6459.2 6485.6 6695.8 6898.3 7136.8 7386.3

出生率 28.39 28.5 29.22 24.03 16.71 11.73 11.81 28.01 50.11 46.94 42.41 39.95

死亡率 9.18 10.41 12.07 25.17 46.91 53.97 29.42 14.62 12.82 13.87 11.46 10.76

自然增长率 19.21 18.09 17.15 -1.13 -30.26 -42.23 -17.6 13.39 37.28 33.07 30.95 29.2

河南

总人口 4652 4733 4840 4943 4979 4818 4830 4940 5080 5099 5240

出生率 30.82 35.85 33.71 33.16 28.07 14.01 15.31 37.5 45.08 36 36.1 35.61

死亡率 11.77 14 11.81 12.7 14.12 39.6 10.18 8.03 9.43 10.6 8.5 8.5

自然增长率 19.05 21.85 21.9 20.46 13.95 -25.59 5.13 29.47 35.65 25.4 27.6 27.11

安徽

总人口 3221.4 3261.6 3356 3426.7 3445.5 3085.6 2987.7 3133.2 3232.3 3181.2 3285.6 3407

出生率 27.67 33.17 29.75 23.83 19.85 11.35 12.34 53.26 50.69 39.85 41.79 41.05

死亡率 11.8 14.25 9.1 12.36 16.59 68.58 8.11 8.51 7.92 8.59 7.24 7.12

自然增长率 -57.23

山东

总人口 5174 5256 5373 5422 5373 5188 5265 5246 5585 5607 5711 5851

出生率 37.3 32.7 35.79 25 20.9 19.5 24.41 38.14 44.18 36.88 35.46 34.56

死亡率 13.73 12.1 12.05 12.77 18.19 23.6 18.49 12.35 11.78 12.04 10.2 9.9

自然增长率 23.6 20.6 23.7 12.3 2.07 -4.1 3 25.79 32.04 24.82 25.3 24.6

甘肃

总人口 1155.04 1218.7 1255.06 1281.48 1293.12 1244.04 1210.82 1240.1 1249.17 1290.03 1345.44 1392.97

出生率 28.8 28.2 30 31.5 19.3 15.5 14.8 41.4 42.1 47.2 45.3 42.5

死亡率 11.9 10.8 11.3 21.1 17.4 41.3 11.5 8.2 10.4 15.6 12.3 11.49

自然增长率 16.9 17.4 21.7 10.4 1.9 -25.8 3.3 32.9 31.7 31.6 33 31.1

江苏

总人口 3984 4089 4183 4258 4290 4246 4243 4334 4441 4516 4624 4748

出生率 32.21 37.6 34.38 24.83 20.92 18.56 18.84 33.27 37.68 34.7 36.91 34.89

死亡率 11.76 13.02 10.26 9.4 14.55 18.41 13.35 10.36 9.04 10.13 9.48 8.05

自然增长率 20.45 24.58 24.12 15.43 6.37 0.15 5.49 22.91 28.64 24.57 27.43 26.84

浙江

总人口 2385.5 2442.9 2503.3 2563.5 2598.3 2616.9 2663.2 2707.2 2800.5 2874.6 2957.3 3033.4

出生率 38.09 33.4 34.91 34.1 26.28 23.52 17.58 36.07 40.71 37.18 36.48 32.48

死亡率 12.58 9.46 9.32 9.15 10.31 11.88 9.84 8.61 7.9 9.21 8.09 7.12

自然增长率 25.51 23.94 25.62 24.95 15.47 11.64 7.71 27.41 32.81 27.97 28.39 25.36

广东

总人口 3429.7 3494.2 3592.6 3671.8 3739.2 3785.7 3817.3 3909.8 4013.7 4108 4231.3 4346.9

出生率 31.09 34.93 34.99 30.1 24.67 18.96 21.27 43.31 39.17 36.74 36.28 32.18

死亡率 10.7 11.19 8.43 9.13 11.74 15.12 10.67 9.32 7.62 8.33 6.82 6.37

自然增长率 20.49 23.74 26.56 20.97 13.04 3.84 10.06 33.99 31.55 28.42 29.46 25.81

贵州

总人口 1586.8 1628.1 1680.9 1710 1744 1643 1623.5 1664.3 1703.6 1752 1820.7 1885

出生率 37.92 32.26 34.43 33.69 27.57 19.97 16.58 43.72 48.7 52.62 49.96 44.04

死亡率 16.24 13.02 12.35 15.26 20.28 52.33 23.37 11.64 17.14 20.66 15.16 13.49

自然增长率 21.7 19.3 22.1 18.4 7.3 -32.4 -6.7 32.1 31.6 32 34.8 30.6

广西

总人口 2052.6 2091.8 2146.63 2186.16 2205.22 2172.06 2159.16 2217.82 2299.7 2261.66 2444.68 2528.2

出生率 30.26 29.37 34.52 32.87 24.52 19.4 17.73 39.08 46.72 4.95 42.4 39.23

死亡率 14.58 12.46 12.35 11.74 17.49 29.46 19.5 10.25 10.13 10.55 9.03 7.5

自然增长率 15.68 16.91 22.17 21.13 7.03 -10.06 -1.17 28.83 36.59 30.4 33.37 31.73

陕西

总人口 1716 1756 1803 1832 1881 1944 1969 2008 2018 2100 2144 2194

出生率 30 28 32.2 26.7 26.6 27.7 21.1 34.6 38.7 40 34.7 34.4

死亡率 10.6 9.9 10.3 11 12.7 12.3 8.7 9.4 10.5 16 13 12.9

自然增长率 19.4 18.1 21.9 15.7 13.9 15.4 12.4 25.2 28.2 24 21.7 21.5

青海

总人口 179.2 199.92 204.64 225 260.01 248.65 211.42 205.01 209.33 219.47 230.45 240.61

出生率 35.93 24.68 32.18 27.94 23.02 13.07 11.43 35.72 45.56 52.08 48.72 41.39

死亡率 14.06 9.34 10.4 12.99 16.59 40.73 11.68 5.35 8.37 15.53 9.06 9.75

自然增长率 21.87 15.25 21.78 14.98 6.44 -27.66 -0.25 30.37 37.19 36.55 39.66 31.64

山西

总人口 1508.7 1553.58 1586.74 1621.7 1666.57 1703.2 1710.04 1745.33 1790.11 1824.37 1871.56 1911.05

出生率 34.2 29.9 33.3 28.7 27.5 27.3 19.1 37.7 38.1 36.2 33.9 30.3

死亡率 12.9 11.6 12.7 11.7 12.8 14.2 12.2 11.3 11.4 14 10.4 10.3

自然增长率 21.3 18.3 20.6 17 14.7 13.1 6.9 26.4 26.7 22.2 23.5 19.7

河北

总人口 3529 3588.7 3670.1 3732.3 3791.3 3779.2 2795 3883.6 3956.2 3996.7 4087 4183

出生率 32.29 29.24 29.62 24.45 23.09 20.5 15.13 28.63 38.61 33.63 32.92 29.32

死亡率 11.64 11.34 11.3 10.92 12.29 15.84 13.63 9.06 11.2 10.91 8.74 8.69

自然增长率 20.65 17.95 18.32 13.53 10.8 4.67 1.5 19.62 27.41 22.72 24.18 20.53

湖南

总人口 3472.83 3507.47 3602.2 3672.72 3691.95 3586.37 3507.98 3600.26 3715.2 3785.13 3901.47 4009.65

出生率 31.1 29.59 33.47 29.96 24 19.49 12.52 41.4 47.29 42.2 42.25 37.23

死亡率 16.36 11.51 10.41 11.65 12.99 29.42 17.49 10.23 10.26 12.88 11.19 10.16

自然增长率 14.74 18.08 23.06 18.32 11 -9.93 -4.97 31.16 37.03 29.31 31.06 27.08

福建

总人口 1366.6 1400.4 1452.5 1493.4 1543 1572.6 1597.8 1639.7 1678.4 1703.5 1759.8 1813.7

出生率 27.28 28.67 38.24 29.12 27.56 25.11 17.42 40.16 44.96 38.33 41.18 37.04

死亡率 8.26 8.43 9 7.46 7.78 15.34 11.87 8.28 7.36 8.62 7.34 7.11

自然增长率 19.02 20.24 29.24 21.66 19.79 9.77 5.55 31.88 37.6

29.71 33.84 29.93

云南

总人口 1805.85 1841.83 1869.78 1914.48 1911.93 1894.55 1889.86 1963.72 2021.08 2088.44 2160.36 2231.86

出生率 32.48 34.75 36.27 23.61 20.94 24.19 19.4 39.71 43.15 45.66 44.01 38.97

死亡率 13.6 15.22 16.29 21.62 17.96 26.26 11.85 10.85 14.14 15.23 12.99 10.08

自然增长率 18.88 19.53 19.98 1.99 2.98 -2.07 7.58 28.86 29.01 30.43 31.02 28.17

吉林

总人口 1202.1 1224.5 1248.1 1280.9 1313 1397.1 1414.3 1476.4 1537.1 1595.1 1639.1 1679.3

出生率 41.57 32.64 35.46 33.31 28.04 32.51 26.45 40.7 47.03 44.19 40.46 34.58

死亡率 9.9 7.5 9.1 9.1 13.4 10.1 12 10 9.4 12.6 9.7 8.6

自然增长率 27.7 25.1 26.4 24.2 14.6 22.4 14.5 30.7 37.6 31.6 30.8 26

辽宁

总人口 2261.5 2306.5 2395.5 2445 2501.8 2559.5 2519.3 2549 2653.1 2734.2 2808.3 2869.7

出生率 39.1 33.7 41.9 38.7 28 31.8 17.2 34.1 49.1 40.2 36.2 29.4

死亡率 9.4 6.6 9.4 8.8 11.8 11.5 17.5 8.5 7.9 9.5 7.1 6.2

自然增长率 29.7 27.1 32.5 29.9 16.2 20.3 -0.3 25.6 41.2 30.1 29.1 6.2

黑龙江

总人口 1321 1418 1479 1564 1682 1807 1809 1893 1972 2053 2134 2198

出生率 40.4 33.1 36.6 33 30.4 32.5 27.3 35.5 45.1 42.6 40.4 34.3

死亡率 11.4 10.1 10.4 9.1 12.8 10.5 11.1 8.7 8.5 11.5 8 7.3

自然增长率 29 23 26.2 23.9 17.6 22 16.2 26.3 36.6 31.1 32.4 27

湖北

总人口 2896.7 2963.2 3064.8 3146.7 3173.2 3152.2 3182.96 3273.93 3350.09 3418.01 3504.54 3601.01

出生率 26.06 27.07 34.36 30.49 26.42 16.41 27.34 42.51 41.05 37.73 35.1 34.8

死亡率 11.55 10.85 9.64 9.64 14.5 21.19 9.19 8.76 9.83 10.39 10.04 9.63

自然增长率 14.51 16.22 24.72 21.01 11.92 -4.78 18.14 33.75 31.32 26.8 25.06 25.16

宁夏

总人口 165.11 172.02 179.38 193.51 208.85 213.03 203.05 198.81 206.7 214.89 226.78 235.38

出生率 34.09 34.2 43.24 39.32 23.8 16.58 13.04 44.6 50.52 49.37 48.02 42.2

死亡率 10.24 10.58 11.06 14.98 15.82 13.9 10.71 8.49 10.22 13.44 9.27 9.35

自然增长率 24.66 23.62 32.18 24.34 7.98 2.68 2.32 36.11 40.3 35.93 38.79 32.85

江西

总人口 1763.38 1799.97 1851.45 1912.89 1975.97 2009.85 2002.67 2039.91 2101.03 2143.63 2209.54 2283.65

出生率 32.33 29.01 38.34 30.28 28.64 26.78 21 37.19 39.56 38.05

38.85 38.13

死亡率 16.23 12.49 11.48 11.34 13.01 16.06 11.54 11 9.76 10.87 9.39 8.54

自然增长率 16.1 16.52 26.86 18.94 15.63 10.72 9.46 26.19 29.8 27.18 29.46 29.9

新疆

总人口 511.78 533.17 558.01 582.35 648.98 686.33 710.06 698.97 713.12 744.18 789.1 837.99

出生率 30.67 31.1 31.48 31.03 29.87 28.13 25.16 32.02 35.14 42.21 41.7 38.08

死亡率 14.4 14.2 14 13 18.84 15.67 11.71 9.71 9.43 16.35 11.1 9.39

自然增长率 16.27 16.9 17.48 18.03 11.03 12.48 13.45 22.31 25.71 25.91 30.6 28.69

内蒙古

总人口 843 896.6 936 986.1 1062.5 1191.1 1163.1 1171.8 1215.4 1253.7 1296.4 1329.6

出生率 37.5 29.5 37.2 28.4 30.8 29.4 22.1 38.2 45.1 41.9 40 36.1

死亡率 11.4 7.9 10.5 7.9 11 9.4 8.8 9 9.4 11.8 9.3 8.07

自然增长率 26.1 21.6 28.7 20.5 19.8 20 13.3 29.2 35.7 30.1 30.7 28

北京

总人口 555.92 598.23 619.08 631.85 684.1 732.13 721.02 723.64 747.38 765.01 773.93 770.06

出生率 40.07 40.02 42.1 37.02 30.7 33.03 25.7 35.92 43.41 30.4 22.95 19.41

死亡率 9.6 7.57 8.19 8.08 9.58 9.22 10.08 8.71 8.11 8.27 6.75 7.24

自然增长率

天津

总人口 487.3 506.9 529.5 548.2 567.5 583.5 584.2 595.6 615.3 629.5 637.7 640.8

出生率 37.12 34.39 37.28 34.56 28.49 27.38 20.42 33.68 40.61 28.72 24.33 21.02

死亡率 9.85 8.79 9.35 8.66 9.88 10.34 9.89 7.36 7.3 7.79 6.17 6.91

自然增长率 27.27 25.6 27.93 25.9 18.6 17.04 10.53 26.3 33.31 20.93 18.16 14.11

上海

总人口 925.6 942.07 1009.58 998.82 1028.39 1054.08 1053.17 1057.86 1073.64 1086.72 1093.79 1095.83

出生率 41.7 40.5 45.6 36 27.8 27.6 22.4 26.3 30.3 20.6 17 14.6

死亡率 8.1 6.8 6 5.9 6.9 6.8 7.7 7.3 7 6.1 5.7 5.3

自然增长率 33.6 33.7 39.6 30.1 20.9 20.8 14.7 19 23.3 14.5 11.3 9.3

注：《中国人口·湖北》缺1955年的出生率、死亡率，本表用公安部的数据补上。《中国人口·北京》中缺1955、1956、1959、1960、1962、1963、1966的死亡率，表中数据系用公安部数据补上。另外，安徽数据中也缺大部分年份的死亡率，也是用公安部的数据补上的。公安部的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人口·江苏》中数据有错，本书用《江苏统计年鉴》数据作了修正。

根据表23-2中的数据，采用本章前面的办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算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人口。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取前三年（1955，1956，1957）和后三年（1963，1965，1966）的算术平均数。计算结果如表23-3。

表22-3 大饥荒对各省人口的影响（单位：万人）

地区 1958年 1959年 1960年 1961年 1962年 总计

四川

非正常死亡人数 98.53 253.37 299.42 123.04 22.65 797.01

少出生人数 86.96 139.61 172.59 165.53 54.5 619.19

安徽

非正常死亡人数 9.46 24.12 192.7 226.28

少出生人数 39.74 53.81 79.03 70.48 243.06

河南

非正常死亡人数 9.89 17.18 139.38 166.45

少出生人数 7.44 32.79 101.25 93.52 235.00

山东

非正常死亡人数 14.30 43.50 71.18 43.75 11.71 184.43

少出生人数 5.35 78.49 84.17 57.65 225.66

湖南

非正常死亡人数 4.93 64.67 20.72 90.32

少出生人数 21.86 44.04 59.97 83.18 209.05

贵州

非正常死亡人数 1.19 10.05 63.96 14.34 89.59

少出生人数 13.88 24.70 37.09 41.30 116.97

广西

非正常死亡人数 1.43 14.07 40.23 18.23 73.96

少出生人数 7.41 25.84 36.87 40.20 110.32

甘肃

非正常死亡人数 14.45 9.91 40.10 2.21 66.67

少出生人数 5.90 21.69 26.2 26.21 80.00

江苏

非正常死亡人数 17.52 33.97 12.30 63.79

少出生人数 43.43 60.69 70.78 9.23 7.93 192.06

辽宁

非正常死亡人数 2.42 9.89 9.36 24.63 1.77 48.07

少出生人数 21.64 12.53 49.65 6.72 90.54

广东

非正常死亡人数 1.80 11.49 24.38 7.72 2.63 48.02

少出生人数 15.51 35.94 57.98 48.00 157

云南

非正常死亡人数 15.12 8.28 24.04 47.44

少出生人数 28.53 33.96 27.6 36.5 126.59

湖北

非正常死亡人数 13.11 34.28 47.39

少出生人数 6.30 19.28 50.92 16.41 92.91

河北

非正常死亡人数 1.78 6.96 20.44 12.08 41.26

少出生人数 24.87 30.40 40.39 60.75 9.75 166.16

福建

非正常死亡人数 11.56 6.26 0.58 18.40

少出生人数 8.84 11.48 15.59 28.06 63.97

江西

非正常死亡人数 3.32 9.49 0.48 13.29

少出生人数 10.37 13.9 17.96 29.67 71.9

吉林

非正常死亡人数 0.09 5.67 1.45 4.17 1.40 12.78

少出生人数 6.12 13.11 7.64 16.45 43.32

浙江

非正常死亡人数 2.61 6.73 1.43 10.77

少出生人数 3.37 23.62 31.06 47.12 105.17

青海

非正常死亡人数 0.61 1.56 7.77 0.35 10.29

少出生人数 2.18 3.65 6.36 6.13 0.49 18.81

黑龙江

非正常死亡人数 5.71 2.13 3.29 11.13

少出生人数 7.46 12.17 9.42 19.16 4.44 52.65

山西

非正常死亡人数 0.24 2.06 4.46 1.11 7.87

少出生人数 6.85 8.99 9.55 23.67 49.06

陕西

非正常死亡人数 2.78 2.10 4.88

少出生人数 11.85 12.29 10.58 23.95 58.67

宁夏

非正常死亡人数 0.91 1.15 0.79 0.12 2.98

少出生人数 0.47 3.63 5.33 5.99 15.42

新疆

非正常死亡人数 3.45 1.62 5.07

少出生人数 3.67 5.17 7.48 16.32

内蒙

非正常死亡人数 1.20 1.2

少出生人数 6.38 8.6 17.57 32.55

北京

非正常死亡人数 0.98 1.55 2.53

少出生人数 5.39 5.39

天津

非正常死亡人数 0.97 1.27 1.02 3.26

少出生人数 1.11 1.78 5.87 8.76

上海

非正常死亡人数 0.49 1.44 1.02 2.95

少出生人数 2.5 8.01 3.91 14.42

全国

非正常死亡人数 172 475 1109 300 42 2098

少出生人数 365 735 989 1044 87 3220

人口总减少数 537 1210 2098 1344 129 5318

由表23-3计算结果可知，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了5318万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少出生3220万人）。各省的死亡率数据基本上是以官方统计为基础的。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有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少省份对数进行了一些修正。应当比原有的统计数更接近实际一些。但是，即使到了八十年代，饿死人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有些省份用这些数据计算出的非正常死亡据，比调查者的数字偏小。例如，中监委李坚当年到安徽调查的估计是，非正常死亡是300万人。文革中，中共中央原组织部长安子文下放安徽劳动，回京后对李坚说，安徽饿死500万人（见本书第四章“安徽不安”）。而我上述计算的结果只有226万人。薄一波对赵健民说山东饿死300万人，这里计算的结果只有184.43万人。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著文认为，四川省饿死1200万人，上表中只有787万人。《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期载文认为， 福建省三年非正常死亡万人数为22万人，少出生65万人，该文是用省公安厅的数字计算的。而表23-3中福建非正常死亡只有18万人。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当年在省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如果八十年代还在该省或在中央担任要职，他有可能干预这些省份的死亡数据，以减轻其历史责任。我在调查中发现过这种情况。所以，用各省的数据计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虽然比国家统计局的数要接近实际一些，但还是一个比实际情况缩小了的数据。

用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按年度分布情况，见图22-2。

根据各省官方数据计算，早在1958年，全国就有172万人非正常死亡，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5万，至1960年达到顶点，非正常死亡为1109万人。随着落实救荒措施，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迅速减少，1961年为300万人，至1962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已基本走出饥荒，但个别省份如四川还在饿死人，全国总计仍有42万人非正常死亡。此图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实际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变化趋势是可信的。

三、国外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

国外学者对中国大饥荒引起的人口减少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数字。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

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科尔认为1958－1963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700万。杰勒德·卡罗特认为，1958－1963年有2700万人过量死亡，有2900万婴儿没有出生，他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重新估算，认为在1960年，死亡人口为4090万。

国外学者在研究这个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时，首先用人口学的方法，对《中国统计年鉴》上的人口数据进行修正。

《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各年底人口总数、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户籍管理部门统计的，具体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三局（治安局）四处（户政处）提供的。户政处有关人口的数字是省公安厅和县公安局逐级报上来的。据当年在公安部户政处工作的张庆五和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中国的人口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他们不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上报的数字就不太准确。当时生产队人口报表上有总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迁入数。总人口是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是回顾的：生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所以，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总人口数相对准确一些，但死人过多的年份总人口有多报的情况。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据上述三个数字计算出来的。考虑人口调出和调入以后，总人口增加数（当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和自然人口增加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应当是相等的。但是，各省报上来的这两个数字汇总后却有不小的差别。见表23-4。

表22-4 人口统计数字中不应有的差别（万人）

年　份	总人口增加数（1）	自然增长人数（2）	（2）-（1）理论上应为0
1953	1314	1337	＋23
1954	1470	1466	＋4
1955	1199	1233	＋34
1956	1363	1270	-93
1957	1825	1479	-346
1958	1341	1124	-217

1959 1213 677 -536

1960 -1000 -304 ＋696

1961 -348 249 ＋579

1962 1436 1794 ＋358

1963 1877 2270 ＋393

1964 1327 1927 ＋600

1965 2039 2026 -13

资料来源：王维志手稿：《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的情况》，1881年3月7日

《中国统计年鉴》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数漏报。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出生人口漏报较多。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出生人口漏报不多，但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这个人死了，如果销了户口，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它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影响他的仕途。对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王维志说，基层人口数字报到县里、省里以后，上面看到死亡人数太多，就问："你的数准不准？再核一核！"经过这种暗示，把数字改到上级满意时为止。在1958到1962年间，死亡普遍少报，而出生少报的情况较少。这就造成自然增长人口（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高于总人口（是按分配生活资源统计的，相对准确一些）的增长。

鉴于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不准确，人口学家则采用人口学的方法来修正。

相对于年度人口数据（即户籍数）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要准确得多。中国1953年和1964年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1953年的人口普查项目较少，主要调查年龄、姓别、民族等基本特征。1964年的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项目，成为九项。1982年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比前两次规模更大，普查项目更多。除了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3年公

布了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结果。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约30万名15至67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对1940年以来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

有了几次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数据，人口学家们就采用人口学的方法，对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修正。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她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班久蒂）是一位国际著名的人口学家。据李成瑞和她接触时的印象，这位学者没有政治偏见，对中国比较友好。她也用千分之一生育率调查的数据，重新对出生率进行估计。并用人口普查数据重估死亡率。她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的总趋势。她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对估计中国三年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动提供了基础数据。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一书上。他依据我国计生委的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和三次人口普查资料，重估历年出生率。再根据他推算出来的历年出生人数，减去实际存活人口，重新估计了死亡率。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Calot）（又译杰.卡罗特）也用他自己的办法重新修订了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现将几位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订结果列如表23-5。

表22-5 几位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订结果

年份	出生率（‰)			死亡率(‰)		
	班尼斯特数	科尔数	卡洛数	班尼斯特数	科尔数	卡洛数
1954	43.44	44.4	41.91	24.20	29.1	19.96
1955	43.04	41.3	41.37	22.33	22.4	22.31
1956	39.89	40.02	38.28	20.11	20.8	16.85

1957 43.25 41.1 41.45 18.12 19.0 13.24

1958 37.76 37.7 36.22 20.65 20.4 15.98

1959 28.53 28.3 27.24 22.06 23.3 19.20

1960 26.76 25.2 25.65 44.60 38.8 40.76

1961 22.43 22.3 21.70 23.01 20.5 27.03

1962 41.02 40.9 39.79 14.02 13.7 18.28

1963 49.79 47.3 48.69 13.81 13.0 21.22

1964 40.29 40.7 39.82 12.45 13.5 20.82

1965 38.98 39.7 38.77 11.61 11.1 10.26

1966 39.83 38.3 39.52 11.12 10.4 12.27

资料来源：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Ansley J .Coale：《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1952-1982》，NATIONAL ACADEMYPRESS Washington，D.C 1984

有了以上各位人口学家修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数，就可以算出三年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计算办法是，用1955 - 1957年的三年平均数作为起始点，用1964 - 1966三年平均数为另一点。如果不发生三年大饥荒，出生率和死亡率是连续的。即1959 - 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在这两个点的连线上。为简单起见，取这两个点的平均数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

用班久蒂的数据计算：正常死亡率为：

{（22.33＋20.11＋18.12）/3＋（12.45＋11.61＋11.12）/3}‰ /2＝15.96‰

正常出生率为：

{（43.04＋39.89＋43.25）/3＋（40.29＋38.98＋39.83）/3}‰ /2＝40.88‰

用班久蒂提供的各年度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各年度的非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的平均人口（用班久蒂修正后的总人口数字，见下表），即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年为300.1万人，1959年为386.8万人，1960年为1833.5万人，1961年为456.7万人。1958 - 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87.1万人。

同样办法，计算出各年少出生人口：1958年199.7万，1959年为803.4万，1960年为921.33万，1961年为1195.1万。四年共少出生人口总数为3119.5万人。

用班久蒂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期间中国人口减少总数为（2987.1 + 3119.5）万人，即6106.6万人。

表22-6 班久蒂对中国总人口和增长率的修正

年份 修正后的平均人口（百万） 修正后的总人口（百万） 修正后的自然增长率（‰）

1955 606.5 20.7

1956 619.1 19.8

1957 633.2 25.1

1958 638.85 646.7 17.1

1959 650.5 654.3 6.5

1960 652.5 650.7 - 17.8

1961 647.75 644.8 - 0.6

1962 653.3 27

1963 674.2 35.9

1964 696.1 27.8

1965 715.5 27.4

资料来源：彭尼.凯恩：《1959 - 1961中国大饥荒》，郑文鑫、毕建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04页

用同样的办法，根据科尔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6.2‰，正常出生率为40.2‰。即：

正常死亡率：

{（22.4＋20.8＋19.0）/3＋（13..5＋11.1＋10.4）/3}‰/2＝16.2‰

正常出生率：

{(41.3＋40.2＋41.1)/3＋（40.7＋39.7＋38.3）/3}‰/2＝40.2‰

用科尔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科尔修订的总人口数(以1954年底总人口60266万为基数)。

表22-7 科尔修订的人口数

年份	修正后的自然增长率（‰）	修正后的总人口（万）	修正后的年平均人口（万）
1955	18.90	61405	
1956	19.22	62585	
1957	22.10	63868	
1958	17.30	65075	64522
1959	5.00	65400	65238
1960	-13.60	64510	64855
1961	1.80	64626	64568
1962	27.20	66384	65505
1963	34.30	68661	

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有了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就可以计算出这几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

1958年：64522×（20.4 - 16.2）= 271万人；同样可以算出1959年为463万人；1960年为1468万人，1961年为278万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481万人。

少出生人口：1958年：64522×（40.2 - 37.7）= 161.3万人，同样可以算出1959年为776.3万人，1960年为974.9万人，1961年为1155.8万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3068.3万人。

用科尔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总影响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相加，即5549.3万人。

用卡洛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卡洛修订的总人口数(以1954年底总人口60266万为基数)。

表22-8 卡洛修订的人口数

年份 修正后的自然增长率（‰） 修正后的总人口（万） 修正后的年平均人口（万）

1955 19.06 61415

1956 21.43 62731

1957 28.21 64500

1958 20.04 65806 65153

1959 8.04 66335 66070

1960 -15.11 653430 65838

1961 -5.33 64994 65167

1962 21.51 66392 65693

1963 24.77 68037

依据表23-8中列出的卡洛提供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1954年总人口为基数，用卡洛的自然增长率，计算出卡洛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结果是，正常死亡率为15.96‰，正常出生率为39.87‰。1958 - 1962年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1958年为130.3万，1959年214.0

万，1960年1632.8万，1961年721.4万，1962年为152.4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万（1958年为237.8万，1959年834.5万，1960年936.2万，1961年1184.1万，1962年为5.25万）。

用卡洛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总影响为上述两项加，即6048.8万人。

现将依据三位国外学者的的修订数据计算的结果列下表。

表22-9 根据三位外国学者的数据计算出的三年人口变动（万人）

年代 班久蒂 科尔 卡洛

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1958 300.1 271.0 130.3

1959 396.8 463.2 214.0

1960 1833.5 1468.9 1632.8

1961 456.7 277.6.9 721.4

1962 152.4

总计 2987.1 2481 2850.9

少出生人口人口总减少 1958 199.7 161.3 237.8

1959 803.4 776.3 834.5

1960 921.3 974.9 936.2

1961 1195.1 1155.8 1184.1

1962 5.25

总计 3119.5 3068.3 3197.9

6106.6 5549.3 6048.8

四、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

蒋正华的研究

蒋正华研究的结论是，在三年大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由于蒋正华的这个结论已被国内主流意见接纳，所以，我作一详细介绍。

蒋正华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动下进行的。李成瑞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干部，是副部级高官，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1956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秘书多年，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他在统计局长任期内，主持了1982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因此对人口问题有相当深的研究。1985年6月，李成瑞赴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国际人口科学研究会的第二十届大会。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科尔、班久蒂和卡洛等国际著名学者，同他们交谈中产生了研究中国大饥荒期间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愿望。回来以后，他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提议，将这个问题列入了国家研究课题。经过多方“招贤”，最后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接受了任务。

蒋正华，1937年10月生，1958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系，1958－1980年在该校自动控制系任教，1980－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研究院读研究生，回国后在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任讲师。1984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立一年多，就接受了李成瑞的这个课题。蒋正华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结论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远远低于国外学者的估计。蒋正华的研究成果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后，得到了认可。

李成瑞在他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认为，和国外学者比起来，蒋正华的研究“科学性更高一些”。他接受我的采访时，也一再推荐蒋正华的研究。

由于此时的蒋正华已经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算是国家领导人，找他采访很困难。于是，我找到了蒋正华就这个问题发有的所有文章。但是，我看到了他提供了三组完全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数字（后来我向李成瑞提起此事，李似乎不知道这个情况）。一是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的数据。（以蒋正华和李南的名义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供的论文《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学讲义专用纸手抄稿复印件，也是这组数据。）二是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 上以《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为题的文章中的数据。 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617页上的数据，李成瑞对我说，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人合

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现列出三组数字列表如下：

表22-10 蒋正华提出的三组不同的中国人口数据（‰）

年代	《中国人口·总论》数		《中国人口年鉴，1987》数		《西安交大学报》数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1955	36.54	17.23	37.32	22.54	37.98	12.68
1956	35.20	16.77	35.92	21.52	36.39	12.80
1957	36.45	16.55	36.84	20.53	37.19	13.01
1958	31.62	17.25	31.77	20.06	32.29	13.36
1959	28.46	18.96	27.86	26.91	27.77	17.29
1960	23.84	31.25	24.24	31.58	24.67	32.40
1961	20.78	24.57	25.03	24.38	24.50	16.52
1962	44.73	18.08	39.65	17.84	38.37	13.60
1963	45.57	16.72	46.23	16.35	45.37	13.27
1964	40.48	13.03	43.63	14.93	41.23	12.64
1965	38.46	11.28	39.51	13.04	39.43	10.86
1966	35.76	9.64	36.54	11.62	36.66	9.60

表22-11 蒋正华对中国总人口数的修正（万人）

年份	估计年末人口	估计年中人口
1954	60310	59468
1955	61484	60785
1956	62636	61873

1957 63893 63057

1958 64829 64354

1959 65476 64999

1960 65239 65504

1961 64926 64932

1962 66760 65489

1963 68749 67603

1964 70400 69461

1965 72358 71263

1966 74325 73356

资料来源：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第618页。

蒋正华以历年的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为6602万人。二者相减，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97万人，约1700万人。

读者可能看到，蒋正华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国外学者低，主要不是他估计的死亡人口少，而是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口多。蒋正华提出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这和科尔的估计的8626万人仅少327万人），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数高达6602万人（这个数比科尔的5840万人高出662万人）。

我不知道6602万人这个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但我们可以用蒋正华提出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用他修正后的死亡率求出正常死亡率，再用他修正后的每年平均人口数，算出每年的正常死亡数；总死亡数减去正常死亡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们起点用1955，1956，1957三年平均数，终点取1964，1965，1966三年平均数，用他提出的三组死亡率分别计算：

按西安交大学报数据计算：

正常死亡率＝
[（12.68＋12.80＋13.01）/3＋(12.64＋10.86＋9.60)/3]/2＝11.93（‰）

按11.93‰正常死亡率，用蒋正华修正后的历年年中人口，可以算出每年正常死亡人数，6年正常死亡人数总共4685万人。蒋正华算出的6年死亡总数8626万人减去4685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3941万人。

按《中国人口.总论》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4.10‰，由此计算出的6年正常死亡人数为5538.5万人；则6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760万人；

按《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7.36‰，6年正常死亡人口为6818.8万人。6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1478万人。

蒋正华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此文收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上）一文中正式公布大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1700万，原因在于这篇文章中他公布的大饥荒以前各年的死亡率比前两组数字要高得多，从而算出正常死亡人数高，非正常死亡就自然少了。

上面我用蒋正华估计的总死亡人口，用蒋正华修正后的死亡率算出正常死亡人口，从而求出非正常死亡人口。

我再换一种方法验算，还是用蒋正华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修订后的每年平均人口，计算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年中人口

某年少出生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当年年中人口

由于他提提供了三组数据，我们还得计算三次，其结果如下：

用蒋正华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计算：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36－11.93）×64354＝92.03（万人）

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7.29－11.93）×64999＝348.39（万人）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2.40－11.93）×65504＝1340.86（万

人）

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 =（16.52 - 11.93）×64932 = 298.03（万人）

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 =（13.60 - 11.93）×65489 = 109.36（万人）

在1958年到1961年四年间，非正常死亡为2188.67万人。

用西安交大学报数据可以算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2821万人（1958年为377.1万人，1959年为674.7万人，1960年为883万人，1961年为886.3万人）。大饥荒对人口的总影响为5009.9万人。

用蒋正华《中国人口.总论》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337万人（1958年为204万，1959年为317.2万，1960年为1124.7万，1961年为681.1万），少出生人口为2868.5万人（1958年为359.1万，1959年为568.1万，1960年为875.1万，1961年为1066.2万）。大饥荒对人口总影响为5205.5万人。

用《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209.9万人（1958年173.1万，1958年620.1万，1960年830.8万，1961年455.2万，1962年30.8万）。四年少出生人数为2748.9万人。大饥荒对人口总减少为4958.8万人。

以上用蒋正华的数据从不同的角度计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万的结果。按数学常识，一种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验算。但不知道为什么验算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为什么蒋正华同一种方法得出三组不同的数据？为什么提出与前一组数据不同的数据时，不作为什么不同的说明？为什么用他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都远远超过他的1700万的结论？2002年6月我曾就此写信向蒋正华求教，他没有答复。此时，我冒昧猜测，蒋正华最早用《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过多，就提出了后两组数据。后两组数据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办法来减少非正常死亡数，从而减少政治风险。他发表的三组数据中，官方性最浓的《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于这种考虑。他做的毕竟是国家下达的课题啊！

我不愿意停留在猜测上，2005年6月再一次将三年以前的信寄给蒋正

华，10月19日，终于收到了他的回信（手写，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信签，信签抬头是黑字，显然发给我的是复印件）。为了供读者研究，现将此信全文公布如下：

继绳同志：

收到来函，以事烦未即复为歉。

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是国内外都关心的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一段往事。外国学者对这几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推算是以1957年或在此前死亡率与1964年前后死亡率或1964年死亡率为基准，估计其间正常死亡率水平，与实际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数。这样的估计有两个最大的误差，第一，每个年龄人口死亡率不同，采用总死亡率不能考虑到1957年到1964年中国不同年龄人口死亡率变化模式的影响。当时的死亡率水平下，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较快，其它年龄段死亡率变化较少，或基本不变。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对较多，因为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条件冲击较为严重，逃离最不利的环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学者获得的计算结果高于实际。我们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获得了很好的数据，在第四、五两次人口普查后，我们都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两次普查数据质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认为可利用的详尽的死亡率分年龄资料仍以这次最可靠。我们利用1982年数据构建了年龄别的生命表，并利用优化拟合的回推技术，再现了历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据此计算1957年到1965年的死亡率与非正常死亡率之差从方法学而言比外国学者更加严密，我们的优势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观个人数据。

三组数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优化拟合回推时，需要采取历史上的时点的基准数，优化技术也可以有总体优化和年龄组优化的不同准则。历史上的基点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后的平均值为准，也可以对每一年的死亡率都进行拟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学报上发表的就是采用总体优化和时点基准计算的结果，年鉴数据发表时，我们已经用总体拟合了历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结构就有了变化。“中国人口.总论”的数字计算中，我们在优化技术上又进行了改进，采取了分年龄组的优化方法，从方法学上看是最严密的，我个人认为这个结果是我可以推荐你作为参考的基准。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现在的印象三次计算相差不过200万左右，1700万是取其整大数，待我找到原始材料当可提供直到个位数的计算结果。

以上情况供您参考，您在退休后仍关心国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

敬。匆匆，顺祝

秋安

蒋正华　　　17／10，2005

蒋正华的回信没有完全解释我的疑惑。蒋正华说用三组数据计算的结果相差不过200万人，我在上面用三数字分别计算的结果的差异显然超出了200万。他说三组数字其所以不同，是因为对数字不同的的“优化”。蒋正华的“优化”的技术的问题，人口统计学者会作出科学的评判。三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蒋正华的1700万为国内的主流所接受，被视为权威数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了很多。

丁抒的研究

研究三年大饥荒人口减少的第二位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他认为：

一， 如果有可靠的死亡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前一年年底人口数

二， 如果有可靠的出生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该年年底人口－[1＋（出生率－正常死亡率）]×前一年底人口数

由于没有可靠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将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10.08‰），如果不发生大饥荒，死亡率应当是逐年下降的，选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各年正常死亡率，不会低估正常死亡率，从而不会高估非正常死亡率。他认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62年的出生率可信（37.01‰）。由于不能得到每年可靠的死亡率，他只能用上述第二个公式计算。

丁抒计算的结果是，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3500万人。这个数是以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数字为依据的计算结果。

然而，丁抒不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总人口数据，因为统计局公布的年底人口数和人口增长率互相矛盾。但他认为他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比较可信。他同意金辉的判断：“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而人口增长率就是他们保留

的真实数据。所以，丁抒以人口增长率为依据，推算出则非正常死亡为4400万。（丁抒：《人祸》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丁先生远在国外，他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他的叙述中，对中国人口统计数据的形成过程不甚了解，还相信什么"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我觉得其计算结果不可靠，只能作参考。

金辉的研究

上海的金辉先生也提出了一个数字。1993年，金辉先生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年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 - 正常死亡人口 + 总人口减少值 = 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

金辉先生虽然计算方法不同，但还是用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并没有对数据进行修正，他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陈一咨的数据

[英]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在他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一书中透露，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曾告诉他，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这份资料的准确性得不到检验，迄今少为人引用。

曹树基的研究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

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他的作法是，采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料，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确定各地灾前灾后人口，藉以再求出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具体作法是：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再加上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所得为减少人口或称全部减少人口，再加净迁移人口，所得为这一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人口普查资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它任何资料所不可替代的，这是本项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地方志资料虽然不完整，但从抽样的角度看，却已足够。两套资料的配合应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误差，排除错误。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饥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损失，并藉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而求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他研究的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 我阅读了曹树基的专著《大饥荒——1959 - 1961年的中国人口》 ，我觉得他以清代的“府”为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比较可取，这可以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次行政区划的变化造成的影响。他的方法我还要作进一步研究。

五、我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

我在这里要重点介绍介绍另外一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位学者就是王维志。

王维志，1955年到1959年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习人口统计专业，1959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后，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20世纪六十年代初王维志曾到一些省去核实人口数据，了解了更多的实际情况。80年代以后，到中国社会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他对中国人口统计的理论和实践十分熟悉。王维志认为，蒋正华提供的1700万非正常死亡数据偏小，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他的研究结果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300万 - 3500万人。

王维志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对已经公布的1959年到

1961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修正。

表22-12 1959 - 1961年总人口和自然增长情况（万人）

年份	总人口	总人口增加数	自然增长人数
1958	65994	-	-
1959	67207	1213	+677
1960	66207	- 1000	- 304
1961	65859	- 348	+24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83页。

中国政府已公布的上述数字相互矛盾，三年累计，按总人口增加数计算，减少135万人，按自然变动算，却增加622万人，两者差额为757万人。究竟哪个对呢？王维志认为，这两笔数都有问题。他分析，1959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情况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677万比上一年的增长数下降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长1213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万，增长率仍然保持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减慢，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对1960年来说，总人口减少1000万，自然变动减少304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一方面有意多报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报死亡人数。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了249万人，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

根据1964年人口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减少1486万人。这就需要对三年困难时期总人口和自然增长人数重新估计。王维志做了以下假定，1959年按自然变动计算，人口增加677万人。1960年和1961年共减少2163万人，比原来统计数减少1348万人多减少815万人。王维志将这多减少的815万人调整到1960年和1961年两年里。即将1960年的原统计总人口减少1000万调为1500万，1961年原统计人口减少的348万调整为663万。见表23-13。

表22-13 王维志调整后的三年总人口数和自然增减数（万人）

年份 人口数 人口增减数

数量 以1958年为100 数量 增减比例（%）

1959 66671 101.03 ＋677 ＋1.03

1960 65171 97.75 －1500 －2.25

1961 64508 98.98 －663 －1.02

公安部公布的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年1647.4万人，1960年1389.3万人，1961年1188.6万人。 如前所述，当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国家的供应指标，出生人口漏报较少，所以假定这些数字是准确的。当年的出生人口减去当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就是当年的死亡人口：

1959年死亡人口＝1647.4－667＝980.4万人

1960年死亡人口＝1389.3－（－1500）＝2889.3万人

1961年死亡人口＝1188.6－（－663）＝1851.6万人

三年总死亡人数是以上三项相加，即5721.3万人。在这总死亡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人口，即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饿死人口）。1958年死亡人口为781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王维志仅粗略估算，将781万人作为1959－1961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数，则1959－1961年三年正常死亡为2343万人，总死亡人数5721.3万人中扣除正常死亡的2343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5721.3－2343＝3367.9万人。即三年饿死3378.3万人。

其实，1958年四季度有些地方已发生饥荒，这781万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1956－1958年三年平均死亡人口作为正常死亡人数，即（706.2＋687.5＋781.1）／3＝724.9，则1959－1961年正常死亡人数为724.9＊3＝2174.7万人，将总死亡人口的5721.3万人扣除2174.7万人，则三年饿死人口为3546.6万人。

按王维志的修订数，1960年的死亡率应为44.33‰，而不是统计年鉴上的25.43‰。44.33‰这个死亡率和班久蒂估计的44.60‰、卡洛的40.76‰接近，高于科尔的38.8‰，更高于蒋正华的31.25‰（《中国人口·总论》数）、31.58‰（李成瑞书中数）和32.40‰（《西安交大学报》数）。

王维志上述工作是以他多年的实际经验和亲身体验对统计数字进行调

整的。他是学统计的，当然熟悉数学工具，但他没有用复杂的数学计算。他知道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是多么不准确，如果用精确的数学工具来处理这些数据，显得滑稽。

金辉、曹树基、王维志几位中国学者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250万到3500万之间，他们三人用的方法不同，却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但是，金辉、王维志没有考虑1958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因为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有饿死人的现象。曹树基的计算中虽然包括了1958年和1962年，但他计算中小规模的人口死亡无法发觉。有些地区计算中有遗漏。如果加上1958和1962年两年的饿死人的数字（按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8年为181万，1962年为42万，共计223万人），则大饥荒饿死人在3500万到3700万之间。取其中数3600万。

据我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十多个省对大饥荒课题的调查，我认为，同所有中外学者的数字比较，3600万这个数字比较接近实际，但还是低于实际。例如，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认为，四川饿死人数在1200万人（本书前面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797万）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在文革期间下放安徽时考察结果，认为安徽饿死500万人（本书前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226万）。在大饥荒期间曾负责亳县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梁志远（他当时担任亳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以亲身经历证明，非正常死亡统计数据远远低于实际情况（见本书《安徽不安》一章）。亲历者提供的数据远远多于现有的各种统计数据，也高于王维志的数据。

在人口减少中，本书计算没有考虑各省净迁出人口。如果考虑这一因素，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少一些。但不会少很多。这是因为流动人口的数量是有限的。据当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提供人的数字，1960年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省内流动人口为600万人，省际流动远远小于这个数。 省内流动不会影响我上述各省非正常死亡数字，省际流动对我上述计算有一些影响。因此，我将廖伯康、安子文、梁志远等亲历者所说的情况抵消省际流动的数字。全国非正常死亡还是按3600万计。

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

附录：（可删去）

蒋正华先生台鉴：

请恕我称您为先生而不称副委员长，这是因为我看重作为学者的蒋正华更胜于作为官员的蒋正华。古人云："文章草草传千古，仕宦匆匆仅十年"，何况您的文章不会是"草草"之作，应是精心研究的学术著作，其影响更为深远。

是李成瑞推荐我找您的。据李老讲，您原来住19层，他住8层，经常交谈。对大跃进期间中国的人口变动，国外学者研究很多，有科尔，有班久蒂，有卡洛，等等，而李老独推崇于您。他认为您是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大跃进人口变动第一人。李老已发表了专门推荐您的文章。我是新华社退休记者。退休后想研究一下大跃进期间人口变动问题。李老建议我必须找您谈。

经李老推荐，我拜读了您的论文。现有几个问题想求教于您：

第一个问题：您提供的三组数据为什么不同？是同一方法算出来的吗？这三组数据哪一组代表您最后的看法？为什么要对前一组时进行修正？

现在我看到了您提供了三组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数字。一是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的数据（以蒋正华和和李南的名义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供的论文《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学讲义专用纸手抄稿，也是这组数据）。二是《中国人口年鉴，1987》，中国经济管理出版社，第94－106页。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617页，据李成瑞讲，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人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现仅列出死亡率一项三种出处的差别。

年份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中国人口总论 16.55 17.25 18.96 31.25 24.57 18.08 16.72 13.03 11.28

中国人口年鉴 20.53 20.06 26.91 31.58 24.38 17.83 16.35 14.93 13.04

西安交大学报 13.01 13.36 17.29 32.40 16.52 13.60 13.27 12.64 10.86

第二个问题：您推算出来的三年非正常死亡数为1700万，是用哪一组数据为基础？是用什么办法算出来的？

一般说来，知道各年死亡率（如您提供的）各年平均人口数（按统计年鉴两个年底数之和除2），就可以算出各年死亡人数。

各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

怎样确定正常死亡数呢？科尔以1957年和1964年的死亡率两点，取其中数。也有人取1955－1957三年的死亡率平均数作为起点，取1963－1965三年死亡率的平均数为另一点，再用科尔办法取其中数。这比科尔数要准确一些。也有人用1955－1957年三年平均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您是怎样确定正常死亡人数的？

以上问题如能给我以启蒙，将不胜感谢。

找您很难，王维志提供了您夫人办公室的电话，我两个星期四都打电话，没找到人。我把我的电话留给了您夫人，也未见回音。给人大常委打电话，把我当成信访的。所以，只好写这封信。

敬祝

大安！

杨继绳　2002年6月

2005年8月再发

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

尽管粮食生产非常重要，但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更为重要，如果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一旦出现饥荒，国家可以从国外购买粮食。所以解决饥荒问题的关键是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不能仅限于增加粮食生产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状况。

1958年8月16日到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对1958年的形势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17个问题，其中，重点讨论了当年的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正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锐说，如果说大跃进是狂风巨浪，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8月31日，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上作总结发言，传达了毛泽东一个惊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 一般的超英赶美已经不够气魄了， 要变成四个美国，还要成为老大哥苏联的一倍。人们的思想更加狂热。

这次会议不仅就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还提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办法，这就是“拔白旗”和“插红旗”。所谓“拔白旗”，落实到基层就是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的人施加政治压力，甚至批判斗争。“插红旗”就是对那些激进分子进行表彰。这样做的结果，形成了“正反馈”机制，使大跃进越来越向激进的方向偏移。

大跃进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实现超越式发展，反而使国民经济落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1957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总值为369亿美元，日本只有297亿美元。1961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总值超过了中国，从此以后两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一、农业跃进　粮食减产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的跃进就是要完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具体目标是，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如本书“粮食问题”一章所述，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3000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374亿斤。1996年才突破1万亿斤，以后一直在1万亿斤上下徘徊。可见，这个指标“冒进”了30年，当时却作为政

治任务层层下达，非完成不可。

为了完成高产任务，各地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如，深翻土地，密植，开荒，大兴水利。而这些都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大兵团作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为荒唐的瞎指挥和骇人听闻的强迫命令。其中的具体情况，在本书介绍各省情况中有详尽的陈述。

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是水利化运动。1957年冬，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以后，各地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兴修水利是应该的，但要求过高过急，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在修水利过程中，又不讲科学，强迫命令，蛮干，好的出发点，就造成了坏的结果。

据统计，全国各地农村兴修农田水利每天的出工人数，从1957年10月的两三千万人，到1958年1月，增加到1亿人左右。到1958年4月中旬，全国农民投入兴修水利的劳动日共计130多亿个，完成土石方量250多亿立方米。有人计算，如果将这些土方铺成1米厚、66米宽的路，可以从地球铺到月球。

1亿农村劳动力兴修水利是个什么概念呢？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55303万人，农村劳动力约有2.65亿人，即每2.65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人上了水利工地。这是全国平均而言，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劳动力远远超出了这个数比例。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长期在水利工地上。

据水利部门当年统计，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4月，全国扩大灌溉面积35334万亩，比解放后8年增加的灌溉而积还多29.3%。 显然，这个数是夸大了很多，是不可信的。不过，当年建设的水利设施，有一些到80年代还起作用。所以，对1958年的水利建设，不能全盘否定。但是，相当多的水利工程，有的没有考虑当时科技和经济能力，有的缺乏科学的勘探和设计，结果半途而废，既劳民伤财，又破坏了生态环境。1亿人上工地，消耗了大量的粮食，这是民饥荒的原因之一。

兴修水利是大兵团作战。在工地上的劳动者按军事编制。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劳动都不停止。在水利工地上，干部摧残农民的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任务难以完成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打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当时搞水利化运动实行的是“三边方针”：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使很多工程仓促上马，半途而废。修成了的，也留下了很多后患。

在耕作上，一反农民千百年的犁耕的习惯，要农民用铁锹搞深翻。过去农民犁耕的深度20厘米左右，现在用铁锹深翻深度要求一米以上，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还把上面的熟土埋到深处，把深处的生土翻了上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深翻时候，田头红旗招展，上百个劳动力，每人一把铁锹，站成一横排，像运动场上短跑比赛一样向前挖掘。领导人还组织学生们在田头敲锣打鼓助威。

水利化运动和积肥运动，使得运输任务重。上级要求各地在搬运土方和肥料时，用手推车取代扁担。于是，各地又大搞“车子化”的群众运动。为了造车子，不仅砍树，还把农民家里的板凳也拿来做车子。有了车子，为了提高速度，上级要求给车子装上轴承。于是又搞起了“轴承化”。轴承哪里来？发动农民自己制造。于是，千家万户拿起铁锤砸铁珠子。农村铁匠把这些珠子镶嵌在大小两个铁圈之间就算是轴承。显然，这样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费了。

农业大跃进，不但没有跃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和1957年相比，1961年粮食产量下降了24.3%（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粮食部的数字，减少了26.4%——本书作者注），棉花产量下降了51.2%，三种油料下降了57.1%，，林牧副渔也大幅度下降。耕畜减少了28.8%，中小农具减少了25%，旧式中型农具减少了40%左右。 1959 - 1961年，农业总产值连续三年下降。按可比价格计算，1960年和1961年的农业总产值低于1952年。按当年价格计算，1960年农业总产值低于1952年。详见表24-1。

表23-1 农业总产值及其指数

年份	农业总产值（亿元）	以1952年为100	以上一年为100
1952	461	100	115.2
1953	510	103.1	103.1
1954	535	106.6	103.4
1955	575	114.8	107.6
1956	610	120.4	105.0
1957	537	124.8	103.6
1958	566	127.8	102.4

1959 497 110.4 86.4

1960 457 96.4 87.4

1961 559 94.0 97.6

1962 584 100 106.2

1963 642 111.6 111.6

资料来源：1980年《中国经济年鉴》第五部分和1983年《中国经济年鉴》第六部分。

本表中农业总产值为当年价格。农业总产值不变价格曾有三次变动，因此表中的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从指数可以年出各年农业发展速度。

二、以钢为纲　搞乱全局

“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及全民大办钢铁的作法，搞乱了国民经济全局。对国民经济影响最大，危害最深。

1957年钢产量535万吨，1958年计划620万吨。如果不搞大跃进，实现700万吨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是不可能的事。

表23-2 大跃进以前各年的钢产量（单位：万吨）

年份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钢 61 90 135 177 223 285 447 535

钢材 37 67 106 147 172 216 314 41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225页。

毛泽东早就把大话说出去了。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访苏期间，得知赫鲁晓夫计划苏联15年赶上美国后，于11月18日，就在64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提出了中国用15年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毛泽东金口一出，就成为全国上下铁打不动的任务。

1958年3月初，冶金部长王鹤寿组织治金部党组“务了8天虚”向毛泽东提出了钢铁“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的报告。这比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标又提前了5年，毛十分高兴，多次表扬了这个报告，还说这个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1958年2月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钢产量为624.8万吨的指标，比上一年增长16.7%。但是，这个指标被认为太低。

1958年4月14日，又把指标提高到771万吨，比上年增长44.1%。但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1958年5月30日，政治局会议又把钢产计划提高到800万 - 850万吨。比上年增长49.5% - 58.9%。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5 月底，中央政治局第48次扩大会议时，华东局柯庆施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 800万吨。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随后，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各自提出明年钢产指标：华东800万吨，华北600万吨，西南310万吨，东北1100万吨，西北150万吨，并预计到1962年将达到八九千万吨。

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月22日，毛泽东将此件印发给军委会议各同志，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毛泽东批示说：

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达到英国了。

在这种气氛之下，6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毛泽东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领导人，冶金部长王鹤寿也参加了，毛问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6月19号才决定搞一千一。1958年钢产指标为 1100万吨（对外公布是1070万吨）就是这样的确定下来的。这么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边三言两语决定了。

但是，从6月19日到8月中旬，钢铁完成任务的情况不理想，8月16日，在北戴河会议召开的那一天，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在北戴河会议的前几天，毛泽东听取了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以后，给陈云打电话，作了8点指示，其中谈到要有铁的纪

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些处分措施后来写进了北戴河会议的文件中）。并让陈云把各省工业书记召到北戴河开一次会议。8月21日，陈云向参加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传达了毛的指示，并提议，要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薄一波插话说，对土炉子要有信心，100个土炉子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 从此，“小、土、群”（小炉子，土炉子，遍地成群）在中国大地到处风行，危害极深。一向被人们誉为讲究科学、头脑冷静的陈云也出此下策，可能当时人们头脑热到什么程度。在北戴河的工业书记会上，按月落实了钢铁的生产进度，还按地区分配了钢铁生产任务，连几乎没有钢铁工业的广西，也必须生产20万吨生铁，其它省市的任务就更重了。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的大炼钢铁运动迅速展开。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8月30日的总结报告中说：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死”是不行的。1100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2500万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其中2500万吨是“死”的，是“死钢”，另外200万 - 250万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

北戴河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已经9月份了。在剩下两三个月时间内，还要完成600多万吨的任务，才能实现全年的1070万吨。按常规这是不可能的，只好发动全民蛮干。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铁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9月5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这一“停车让路”，使各项工作停顿，各个部门为钢铁行业作出牺牲，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当时，1070万吨这个数字用巨字写在全国各地的墙壁上，“为钢铁元帅升帐”“为钢铁元帅让路”的宣传品遍及各地。全国上下，不分工农商学兵，不分男女，都为“1070”而奋斗。工厂，农村，学校，机关，都搭起了炉子，找来矿石，不分昼夜地大炼钢铁。9月4日的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今年1100万吨钢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彭真说：“主席要求在9月15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个月。”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到9月30日，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 9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8月份的几百万人增加到5000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60多万座。10月，达6000多万人，最高达9000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

的人数超过了一亿。

为了配合大办钢铁，还大办地质，全国上千万人上山找矿；大办煤炭，到处设法挖煤，仅小煤窑就开挖了10万多个；大办运输，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既有现代化的运输车辆，又有牛车马车和肩挑背驮。

这上亿人的大办钢铁的大军中，绝大多数人不仅从来没有炼过钢铁，连高炉也没有见过。对他们能不能炼出钢来，是有人怀疑的。怀疑是要受到批评的。1958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在介绍湖南邵阳专区的经验中说："他们组织全民大辩论，驳倒'农民炼不出铁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名干部、93万群众投入炼铁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

"全民大办钢铁"，的确到了全民的程度。中南海也架起了炼钢炉，建立了小型钢铁厂，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叶子龙被任命为厂长。叶子龙对钢铁生产一窍不通。毛泽东还到这个"钢铁厂"视察，听取叶子龙汇报。 在中南海的带动下，中央机关和各省委机关也都架起了炼铁炉：

在国家计委在三里河的办公楼的院子里炼钢炉火冲天，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

文化部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副部长、著名戏剧家夏衍担任炼钢总指挥，倒是颇有戏剧性。

外交部也在院里筑起了小土炉，燃起了熊熊烈火。

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炼铁炉，秘书、司机、炊事员一齐上阵，孙夫人也亲自动手，也在努力为"1070"作贡献。

中央命令一下，到地方就变成了荒唐的行动。河南省遂平县提出了口号："建百厂，设万炉，日产千吨"。后来以发展到："社社建炉，乡乡建厂，三天准备三天建，五天投入生产，日产万吨钢"。为了找矿报矿，他们提出："向深山进军，向高山要宝，白天山河一片人，黑夜山河一片明，撒下天罗地网，围剿山中宝藏，不漏一个山头，为找到6000万吨铁矿石而奋斗！"矿石还没有找到，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就接受到县里分配的钢铁生产指标，10月14日，公社就把钢铁生产指标到各大队。经过千辛万苦，人们终于在歪尖山下红石崖发现了铁矿，品位很低。但人们已经顾不得品位高低了，疯了一样到红石崖挖矿石。

几天时间，红石崖、柴王台的山野里，就建起了一座座炼铁炉子，8万钢铁大军聚集在这里，全县建立了三个战区、42个营，174个连队，开始了大炼钢铁的战斗。原来这里满山遍野是树林，林子里有老虎、豹子、野猪，这一大炼钢铁，树全砍光了。县委还嫌进度太慢，高炉太少，要求村村建高炉，几户建小炉。建炉的砖从哪里来？扒房子。先扒没人住的，夫妻双双上占战区去了，房子空了，拆了再说。据统计，在大炼钢铁期间， 嵖岈山公社共扒房屋1653间。煤烧完了，树砍光了，可钢铁指标还是上不去，急坏了公社书记陈炳寅。后来公社党委决定“六找、七查”：床下找，墙上找，墙内找，大人小孩一起找，找光，找净，不放过一根铁钉。查古老山寨，挖古炮；查古庙古寺，找大钟香炉；查武举人后代，挖古代兵器；查地富分子，挖埋藏铁器；查光，查净，家家不能有铁锅。一夜间，千家万户没有锅，古庙寺院再没有钟声，石磨石碾挖去了铁轴，门没有铁鼻。这一夜，嵖岈山公社共缴“废铁”71786斤，全部投进了炼铁炉里。

全国各地都像嵖岈山公社一样，机关、学校、公社、商店，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钢铁生产指标，搜集各种铁件，化成铁锭，向上级交差。老百姓真正成了“手无寸铁”。

当时，我所在湖北省浠水一中也为“1070”而奋斗。在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运动中，青年学生们是很真诚的。浠水县，既没有铁矿，也不产煤。我们这些中学生到四十里外的兰溪港去挑从外地运来矿石和煤炭。那时我们热情很高，虽然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却挑了上百斤的担子。学校请人在校园后面的空地上搭了一个很大的土炉子，请木匠做了一个很大的风箱。拉风箱是四个人，他们以同一节奏，以跑步的速度前进，后退，前进，后退，不到几分钟就满身大汗。因此组织了几个小组，十几分钟就轮换一次。物理老师，化学老师也在炉子边忙碌着。忙了几天，没见出铁。有人说，必须用铁做“引子”，新炼的铁水才会出来。于是，毕业班陈武安、范炳文、雷伯轩、侯耀等同学把学校上下课报时的大铁钟砸了，投进炉子里。不久，红红的铁水果然出来了，大家欢呼“总路线万岁！三面红旗万岁！”铁水流进模型里铸出了几块“钢锭”，还不等完全冷却，就给它扎上红绸，敲锣打鼓地抬到县委会去报喜。大家心情非常激动，认为在“1070”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贡献。当时只有50多万人口的浠水县，组织了13万多人的“大兵团”砍树烧炭，建炼钢炉168个，炼铁炉2846个，在城关、兰溪两地各建钢铁厂一个，职工上千人。据当时上报共炼钢9.34吨，铁3078吨，实际多为废渣。 这13万砍树烧炭的“大兵团”使全县所有的山林都变成一片光秃。

像农业上大放高产卫星一样，各地也大放钢铁的高产卫星。《人民日

报》在鼓吹钢铁生产“放卫星”中，又一次大显身手，除了发表大量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在一版显著位置不停地发表社论：

9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中介绍，9月14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14000吨，提前完成了9月份的9000吨生产计划。

9月17日，《祝河南大捷》的社论中说，仅在9月15日这一天，全省就产铁18939.2吨，日产千吨以上的县出现了8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4396吨。

10月1日，《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中说，9月29日，是中央确定放卫星的日子。这一天，各种卫星一齐上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6万吨，铁的日产量近30万吨，出现了9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73个日产生铁超过千吨的县，出现了两个日产5千吨钢、一个日产4千吨钢的省。

10月18日，《祝广西大捷》的社论中介绍，毫无钢铁生产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反而后来居上，接连放了几颗特大的卫星。其中，环江县日产生铁6300多吨。

10月26日，《“钢铁生产周”胜利以后》的社论中说，10月15日到21日，中央确定的“钢铁生产高产周”，在这一周内，钢铁平均日产量比以前14天的平均日产量增加了85%，生铁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增加了303%。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10万多吨，生铁最高日产量达到37万多吨。

12月23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0七0吨钢——党的伟大号召实现》。消息说，据治金工业部12月19日统计，全国已生产钢1073万吨。以后的报道说，到12月31日，全年累计产钢1108万吨。

《人民日报》提供的这些钢铁产量的数字，和它提供的粮食产量的数字一样，完全是天方夜谈。但是，对这些谎言不容怀疑，谁怀疑，谁就要倒霉。时任中央工业部副部长的高扬到河南了解大炼钢铁的情况，他发现“小、土、群”炼铁炉炼出的根本不是铁，只是一些熏得乌黑的石头。高扬当即对禹县委书记刁文指出，这里有严重的弄虚作假现象，上报的数字90%与实际不符。高扬还向中央工业部和中央监委写了报告。但是，他一回到北京就受到批评，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人民日报》的这些假话比赛的恶果不仅是数字的浮夸，而是成天以中共中央的权威使荒唐更加扩大，逼迫人们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1958年同时兼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家权威新闻单位第一把手的吴冷西，在37年以后的1995年，出版了《忆毛主席》的小册子，其中反省道：

我主持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吴冷西在1958年的行为是制度的必然，他像所有的人一样，逃不过制度的约束。所以，人们不能过多地追究他的责任。但是，他对于造成他犯错误的制度是恋恋不舍的，以致于在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公然出面强烈反对。在《忆毛主席》这本小册子中，虽然讲了一些真话，但还处处还流露出对那种制度的留恋，流露出他当年能伴随毛泽东左右的得意之情。

不讲科学的蛮干，必然受到科学的惩罚。1958年四季度和1959年一季度，各钢厂调入的生铁，合格率不到一半。有的小高炉处产的生铁含硫量超过2%、3%，有的高达6%。生铁质量太低，用这种生铁作原料的大钢厂产品质量也下降。鞍钢1958年四季度一级钢在全部钢产量中的比重，由原来的93%下降到50%以下，1959年初的几个月，鞍钢每天有3000多吨铁水不能炼成钢，只能铸成铁块。不仅质量差，成本也上升。原来生铁的调拨价每吨150元，小高炉生铁的成本多数为250－300元，为了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从1958年9月起，小高炉生铁的调拨价提高到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仅这项补贴就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大炼钢铁只折腾了几个月时间，但给中国人留下的创伤是多少年也无法医治的。大量农业劳动力成了钢铁大军，使粮食烂在田里没人收获。在大炼钢铁第一线，一度“放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大干”，吃掉了很多粮食，是造成1959年春天饥荒的原因之一。大炼钢铁还挤掉了轻工业，造成了日用品市场供应紧张。矿产资源遭到破坏，茂密的森林破砍光，古城墙的千年砖块拆下来砌了炼铁炉，价值连城的金属文物都化成了铁水。

但是，“以钢为纲”的方针并没有就此结束，1958年10月，在第七次全

国计划会议上提出1959年“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1800百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1650万吨。年末实际完成1387万吨。1960年钢产量的指标又定为1800万吨。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要给毛主席争气，给我们国家争气。你赫鲁晓夫欺侮我们，我们要干个样子给你看。钢产量不是搞1800万吨，而是要搞2000万吨。就这样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谁为这场灾难负责？现在几乎所有的著作中都把责任推给了毛泽东。当然，作为国家第一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始作俑者”。但是，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肤浅的。在当时那个制度，没有民主决策机制，没有制度性的纠错机制，没有畅通的信息传送渠道，如果把别人放在毛泽东的位置，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三、工业跃进　盲目建厂

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在5年到10年内，各省的地方工业产值都要超过当地农业产值。3月成都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4月7日，中央正式批发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年到10年缩短为5年到7年。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从省、市、县到乡、社纷纷提出大办工业的跃进计划，都要求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月到8日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由于粮食高产“喜讯”频传，1958年8月17日到30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1958年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已经达1000斤左右，省一级领导今后的工作重心应当由农业转到工业上去。会议公报指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力的重心转发移到工业方面来”。这个会议估计，“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传大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宏伟的设想使各级干部亢奋。为了实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目

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工业落后的西部省——甘肃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建厂1000多个；3月到5月，建厂3500个；5月到6月，全省厂矿数猛增到220000个。其中，省办的2500多个，县办的15000多个，社办的185000多个。全省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 河北省定县，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建起了1530个中、小型工厂，平均每天35个工厂投入生产。 只有13万人口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到5月底就建成了厂矿307座。根据各乡镇提出的数字，全旗1958年新建厂矿可达1267座。 这些数字显然带有浮夸的成份，不可信以为真，但盲目建厂的情况是真实的。不过，全民大办工业为以后县乡以下的“五小”工业播下了种子，成为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起点之一。然而，这种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为了追求产量和产值，新建煤井尚未投产，就追加了煤产量任务，这些增加的任务还得靠原有的矿井完成。中央直属煤矿在1959年时92%的产量依靠原有矿井提供。由于高指标的压力，这些矿井的采掘比严重失调，工作面大量减少，设备破坏。据国家矿山小组1962年调查，在煤炭部属的508处矿井中，生产能力破坏严重和简易投产的有179处、设计能力7484万吨，占设计总能力的44%。其中采掘关系不正常的矿井占77%，因此从1960年4、5月份开始，产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

由于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办工业，把过去一套管理制度都冲垮了，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果显著下降，成本提高，品种减少，产品质量下降。重点煤矿煤炭灰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21%，1960年提高到2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12%。亏损额直线上升，到1961年达到105亿元。其中工业亏损46.5亿元。

由于以钢为纲，只顾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轻重工业的比重1957年的53：47下降到1960年的33：67。 自行车、电池、火柴、日用陶瓷、铁锅、甚至女人用的发卡等小商品严重供不应求，影响群众生活。轻工产品的质量也很差，老百姓称质量差的日用工业品为“跃进牌”。

要大上工业，就得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基本建设投资：1957年138亿元，1958年267亿元，1959年345亿元，1960年384亿元。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共996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还多81%。平均每年投资332亿元，比1957年高出1.4倍。 机械、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重工业部门，上了一大批重点项目，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1958年，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

有1587个，1959年1361个，1961年1815个，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只有1384个。小型项目更是遍地开花，不计其数。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很差，建设周期长，建成投产少，许多建成项目因设备不配套，不能充分发挥效益。 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太大，尽管挤了农业、轻工业、文教卫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难以为继，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紧张。从国民收入分配看，1958年至1960年三年共增加国民收入312亿元，而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就增加了246亿元，占新增国民收入的80%，其中1960年国民收入减少2亿元，基本建设投资还增加了39亿元。基本建设材料的增长速度低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长速度：钢材为38.8%，木材为14.8%，水泥为31.7%，而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为40.7%。在编制1959年计划时物资无法平衡，就留了50元物资缺口，致使许多项目开工后不是无物资就是无资金，长期不能投产。从人力看，尽管基建职工人数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421万人，但仍到处喊人不够。不少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建，仅停建项目，全国损失约150亿元。

表23-3 全民 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位：亿元）

年份	总计	基本建设投资
1954	102.68	99.07
1955	105.24	100.36
1956	160.84	155.28
1957	151.23	143.32
1958	279.06	269.00
1959	368.42	349.72
1960	416.58	388.69
1961	156.06	127.42
1962	87.28	71.26
1963	116.66	98.16
1964	165.89	144.1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301页。

为了筹集基本建设投资，就扩大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国民收入即全社会创造的财富，一部分用于当年消费，一部分用于积累，积累主要用于工业建设，以图进一步发展。积累过多，消费必然减少，群众生活水平必然下降。这就是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几年也是可以的，但事与愿违。1958年到1961年的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共占39.1%，积累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24.2%。高积累、高投入，却是低效果。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35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仅有1元。

“大上快上”工业，就必须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要进口设备，就得增加出口，换回外汇。而当时出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主要是食品），1959年和1960年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1959年为76.3%，1960年为73.3%。见表24-4。出口商品都从农民口边挤出来的。

表23-4 大饥荒年代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情况

年份	出口额（人民币，亿元）	进口额（人民币，亿元）	出口商品额构成（以出口总额为100）			进口商品额构成（以进口总额为100）	
			工矿产品	农副产品加工品	农副产品	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
1956	55.7	53.0	26.1	31.3	42.6	91.5	8.5
1957	54.5	50.0	28.4	31.5	40.0	92.0	8.0
1958	67.1	61.7	27.5	37.0	35.5	93.1	6.9
1959	78.1	71.2	23.7	38.7	37.6	95.1	4.3
1960	63.3	65.2	26.7	42.3	31.0	95.4	4.6
1961	47.8	43.0	33.4	45.9	20.7	61.9	38.1
1962	47.7	33.8	34.7	45.9	19.4	55.2	44.8
1963	50.0	35.7	32.9	42.9	24.2	56.0	44.0

1964 55.4 42.1 32.9 39.1 28.0 55.5 44.5

1965 63.1 55.3 30.9 36.0 33.1 66.5 33.5

1966 66.0 61.1 26.6 37.5 35.9 72.2 27.8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VIII - 32，经济管理出版社，第33页。

“大上快上”工业，不仅基本建设项目大增，城镇人口也急剧增加。195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各地的招工计划经省、市确定后即可执行，不必经中央批准。招工权力下放以后，各地放手大招工，有的甚至在车站设立招工点。职工人数从1957年的3101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5969万人，三年增加2868万人，增长92.2%。与此相应的是城镇人口增加。1957年，城镇人口总数为9949万人，以后连续三年猛增。1958年为10721万人，1959年为12371万人，1960年达13073万人。三年共增加3124万人，增长31.4%。 其中从农村迁入城镇的大约有2218万人。 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吃商品粮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粮食征购指标不得不提高，加剧了农村的饥荒。

在人们的印象中，认为大庆油田是在大饥荒年代开发出来的，认为这是工业大跃进的亮点。实际上，大庆油田的地质勘探始于1954年初，经过几年艰辛的努力，于1959年9月国庆10周年前夕射孔试油成功。大庆油田并不是大跃进的成果。

四、全面跃进，全面紧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不能起配置资源的作用，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完全靠宏观经济领导部门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平衡，重工业与轻工业平衡，相关产业间的平衡，等等，如果这些方面失去了平衡，就是比例失调。这样，有的部门生产能力闲置，有的部门生产能力不足，就会造成严重的浪费。此外还有物资平衡，财政平衡，外汇平衡等，这些也是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大跃进期间，由于按主观意志行事，搞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关系，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失调又不能靠市场配置资源去自动地平衡，就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财政金融全面困难。从1958年到1960年，财政收入年年增加，1960年的财政收入竟比1957年增长了84%，当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47%，大大突破了中国财政收入一向只占国民收入30%多一点的比例。这表明国家财政集中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国家财政集中得过多，其资金又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就挤了人民的消费。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又很差，就直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财政集中过多的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加上在财政收入中还有不少虚假部分，因此，财政收入很快锐减。在1960年81.8亿的赤字的基础上，1961年财政收入比1960年减少37.8%，1962年又减少11.9%。财政的虚假收入，银行的虚假存款，掩盖了财政赤字。据有关部门事后估计，大跃进造成的财政赤字，大约180亿元。 在市场经济国家，民间财富大于国家财富，这个赤字不算大；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个赤字已经相当危险。何况当时的财政总收入才300多亿元，180亿元的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财政不平衡，只能靠多印票子来解决。1961年，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57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同期的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14.7%。货币流通量大大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社会购买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额，1960年达74.8亿元，1961年仍有26.9亿元。 每一货币流通量拥有的商品库存量（包括一部分没有用的质次价高的在内）由1957年的5.2元降到1961年的4.1元。 1962年2月26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说："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表23-5 大饥荒年间的财政状况（亿元）

年　份	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收支差额
1957年	310.2	304.2	+ 6.0
1958年	387.6	09.4	- 21.8
1959年	487.1	552.9	- 65.6
1960年	572.3	654.1	- 81.8
1961年	356.1	367.0	- 10.9

1962年 313.6 305.0 ＋8.3

1963年 342.3 339.6 ＋2.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417页。

商品供应全面紧张。自1958年以来，市场上商品短缺现象逐渐严重，从吃的、穿的到一切日用品都严重供不应求。1960年商品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减少粮食、棉布、食油的定量标准。1961年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更为严重，食盐、火柴、锅、碗、盆、筷之类日常用品都买不到。但是，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总额却增加35%，其中，日用品库存总额增加近70%。这些库存商品都是质次价高、不适销、不对路的冷背残次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后的清仓中报废了。 这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结果。货币流通过多，商品供应不足，应当物价上涨。但中国的物价受到行政管制，对占人民生活开支的60%的生活必需品，国家不让涨价，它们是列入国家控制的18类商品。但越管制，商品越不足。不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供应的平价消费品还是涨了15%，为了回笼货币，还开放了一些高价商品。1962年一度放开了集市贸易，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上涨，比计划内的价格高出很多。详见表24-6。有人分析，计划内商品涨价、高价商品的影响、集市贸易价格的带动三项因素加在一起，整个价格上涨了30%，有的地区上涨了40%。

表23-6 四川省简阳国家牌价与自由市场价对比表（1962年3月） 单位：元/斤

品名 国家牌价 自由市价

大米 0.093 0.93

菜油 0.67 8～10

红苕 0.015 0.15

胡萝卜 0.05 0.20

棕片 0.21 1.10～1.20

莲花白菜 0.08 0.20～0.30

白布 0.28 3.00～3.20

猪肉 0.67 8.00～8.50

水牛肉 0.46 5.00～5.50

鲫鱼 0.47 4.80～5.00

鸡蛋 0.64 7.50～8.00

资料来源：惠文：《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大饥荒网站”。

职工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副食品供应也大幅度减少：食用油减少47.6%，猪肉减少80.6%，有些副食品连定量供应也不能保证。以当时生活水平最高的八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1961年居民消费水平为例，全年每人消费猪牛羊肉：重庆最高，每人5斤，上海3.6斤，北京、武汉2斤，天津、广州1.7斤，西安1.3斤，沈阳0.6斤。全年每人消费鸡蛋：天津、广州、沈阳无货供应，其它城市平均每人每年不到半斤。全年每人消费食糖：广州最高，为12斤，上海、北京3.5斤，重庆2.8斤，天津、武汉、沈阳1.3－1.8斤，西安不到7两。 职工工资也下降。1961年，国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工资平均为537元，比1957年下降低15.7%；如果扣除物价因素，比1957年下降28.7%。根据全国大、中、小13个城市、526户职工家庭收支情况调查，1961年上半年，职工家庭每人平均货币收入为17.07元，扣除物价因素，每人平均实际收入只有15.53元，比1957年减少了1.87元。

由于商品供应全面紧张，商品“走后门”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果没有私人关系，就是手持国家发的供应票证也买不到东西。有了私人关系，就可以买到超过票证供应量的商品，商品的质量也比正常渠道买的要好。能够“走后门”的主要是干部。当然，一些掌握商品供应人员的亲戚朋友也会沾光。“走后门”卖出的商品有时比正常供应的商品还要多。河北省唐山市节日的副食品供应量，“走后门”卖出去的比实有人数定量供应量多10%。在商品供应本来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走后门”猖獗，普通百姓更买不到东西了。所以，群众对商品走后门的情况非常愤慨。1961年，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召开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专门会议，中共中央在这个会议的《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上批示：“在全民所制企业中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到1962年3月底，在27个省市自治区中（不包括西藏），有21个开展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群众运动，有3个省进行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教育，有3个省把反对商品“走后门”作为整风运动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之一。1962年4月16日，国务院财贸办和

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联合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情况报告》，这个报告在肯定运动成绩的同时，指出“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边反边走，有些不合理的‘内部供应办法’还没有取消。”实际上，只要商品供应紧，只要权力至上，走后门的现象不可能停止。

五、被迫调整，一步三折

面对国民经济的困境，在1960年7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不年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所谓调整，实际就是从前两年过激的政策中退回去。不过，在这次会上，调整的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完成钢铁生产任务。

北戴河会议期间及稍后，国家计委党组根据中央的决议，酝酿提出对工业进行调整、巩固、提高的初步设想。8月底，国家计委党组向国务院汇报1961年的计划指标时谈了他们的设想，周恩来总理补充了“充实”两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报告》的批语中指出：“1961年，我们要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这八个字，但当时尚未当作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明确起来。由于思想认识尚不明确，组织行动不及时，所以1960年下半年调整工作并未实际贯彻下去。中央对1960年的高指标也未提出修改。眼见钢铁生产月月完不成计划，中共中央还于8月和12月两次发出紧急指示，作为政治任务，要求保证完成当年1860万吨钢的生产计划。这一年虽然经过拼消耗、拼设备，勉强把钢铁生产任务完成了，而农业却大幅度地减产，结果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更大失调。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作为方针确定下来，是在1961年1月中旬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决定的。全会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和全国宣布：必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在调整方针的贯彻过程中，中共中央制定了若干具体政策和措施，首先制定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同时，压缩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和基本建设的规模，充实和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队伍；压缩党政机关和社会集团的购买力；提高农副产品的价

格，等等。

这些措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八届九中全会还抱着“十个指头”成绩和“一个指头”缺点的看法，不承认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的严重后果，调整工作还是在肯定“大跃进”“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因此，当时确定的1961年的主要工业指标，如要求钢的产量达到1，900万吨，比上年增长1.6%；原煤产量43，100万吨，比上年增长2.6%；粮食产量要求达到4，100亿斤，比上年增长10.8%。发展速度比“大跃进”的速度是大大降下来了，但仍然要求在上年过高的水平上有所发展，而实际执行的结果同人们的主观愿望相反。1961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战线都在全面下跌，不仅距离完成计划甚远，而且大大低于上一年同期的水平。夏收的粮食产量也没有达到计划规定的指标。

在这种情况下，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认真研究了工业状况。会议对当时工业生产中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有了较深的了解，9月15日向全党发出了《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在这一指示中承认，八字方针虽然提出一年多，但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没有能够有效地进行，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也不能犹豫了，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应当后退的地方坚决后退，而且要退够。庐山会议确定了具体降低钢、铁、煤、电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规模的指标。又对40种急需的轻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提出具体的发展指标。这次会议提出“退够了再前进”的思想是符合实际的，但经济调整工作仍然不能越过“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障碍。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随后他又形象地说，“现在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了”。 因此，“退”的决心还不大，这一年计划指标还是很高，始终没有放下大跃进的架子，结果，调整后的计划也没有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30.9%，国民收入比上年下降29.7%主要工农业产品，除粮食略有增长以外，多数下降，有的下降幅度很大。吃穿用的紧张局面还在发展。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大家对经济形势讲了一些真话。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但是，在对经济困难程度的估计以及如何克服困难的步措施上，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领导核心间和高级干部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部分人能够实事求是地承认国民经的严重局面，主张采取坚决有效的调整措施，扭转危局。另一部分人不愿意

承认工作中犯了错误，把困难主要归之于农业遭到的自然灾害，认为只要农业有了好收成，困难就过去了。他们留恋“大跃进”，不仅不肯下马收摊子，还认为政策的后退是右倾，并且随时准备反“右倾”。

真正实现“退够”还是“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14天，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这次会议上，陈云分析了经济形势的严峻情况，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措施。西楼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由陈云任组长。5月7日到10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认识，特别是在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切实加强农业这两件事上下定了决心。进一步调低了1962年的各项经济指标，明确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具体方案。在这次会议以后，对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1)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城镇人口在1961年已经减少1000多万人（其中减少职工873万人）的基础上，1962年又减少1000万人（其中职工850万人）。1961年、1962年两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 精简工作1963年还继续进行。从1961年1月，到1963年，三年共减少职工1940万人。如果减去同期安排就业的大中专学生等，净减职工1744万人。其中，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有1300多万人。精简职工相应带来城镇人口减少，截至1963年6月，共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左右。

（2）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基建战线。1960年基建投资完成384亿元，1961年减到123亿元，1962年计划减到46亿元，后来实际完成56亿元加上自筹完成67亿元。这样，积累率就从1960年的39.6%降到1961年的19.2%，1962年进一步降到10.4%。基本建设的大中型项目，从1960年的1815个减到1961年的1409个，1962年进一步减至1003个，许多工程下马。

(3) 缩短重工业战线，实行某些必要的关、停、并、转。首先是压缩钢铁指标。1960年钢产量1866万吨，1961年压到870万吨，1962年最初的计划是750吨，后来调整为600万吨，实际完成667万吨。煤炭，1960年实际产量39700万吨，1961年完成27800万吨，1962年计划25100万吨，后来调整为23900万吨，实际完成22000万吨。
关、停、并、转，1961年已经开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民所有制企业，1961年已经比1960年减少25000个，主要是大跃进时期发展起来的地方小企业。1962年继续减少了18000，两年合计减少了43700个，相当于1960年96000个的44.8%。

(4) 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农业。首先，是精简职工下放城市人口，停止那些徒劳无益的水利建设，农村劳动力1960年只有17017万人，1961至1962年两年，增加到21278万人。其次，减少粮食征购量。为了解决国内粮食供应不足，仅1961年和1962年两年，净进口粮食160多亿斤。第三，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向农业增拨钢材、木材、毛竹，满足农村制造小农具需要。到1962年，农村铁制小农具基本上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1和1962年，集中力量修理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及运输工具。第四，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农民实行退赔。1961年粮食价格提高25%，几年来由国家财政共向农民退赔20亿元。

（5）对一些急需的工业进行了充实。在轻纺工业方面，除了恢复传统手工业和一般轻工业产品外，还发展了洗衣粉、塑料、化学纤维工业。在重工业方面，特别是保证了石油工业的发展。原油产量1960年520万吨，1962年575万吨，化纤1960年10600吨，1962年13600吨，1965年达到50100吨。

（6）整顿了经济秩序，整顿了管理。在经济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集中。同时，在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银行、计划各个方面，都制定了许多新的规章制度。

（7）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首先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和各项事业支出；其次，清仓查库，处理库存积压，包括机关招待所的物资；第三，在坚决稳住18类基本生活必须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如糖果，糕点，饭馆，自行车，尼龙袜子等。第四，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开头，自由市场上许多产品的价格，比国营的价格要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经过采取上述措施，很快回笼了几十亿货币，自由市场价格就下来了。

经济调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说是“全民”所有，实际无人负责，工程下马以后，很多地方对停建、缓建工程撒手不管，造成了很大损失。1961年9、10月，建筑工程部派了几个工作组，到沈阳、天津、太原、西安、兰州、长沙等城市，对停建缓建的项目进行了调查，向中共中央送上了调查报告。 报告称，截至1961年9月的不完全统计，上述六个城市先后停建的工程共1035项，建筑面积334.4万平方米，约占开工工程的一半左右。其中，只搞了基础的有95.4万平米，占停建工程的28.5%；主体工程进行了一半的约有132.9万平米，占38.6%；主体工程基本完成的有74.6万平米，占22.3%；只剩下少量装修工程的有31.4万米，占10.6%。到工作组检查的时候，许多工程基础下沉，柱子歪斜，屋面漏水，门窗玻璃丢的丢，坏的坏，甚至房倒屋塌，造成伤亡事故。天津东郊电厂、天津西

郊电厂的主厂房和天津钢厂的粗轧车间，都是只挖了槽，打了基础桩，就停下来了，这些基础槽，都被雨水灌满，槽帮遭到严重破坏。沈阳市筹建的小洋水泥厂工程，主要厂房已建成，机械设备也基本安装起来，由于地下防水工程没有做，地下水渗出，深达3米，把安装在地下室的机电设备全部淹没。商业部兰州石油仓库的宿舍工程，砖墙即将砌完，停工以后，由于没有搞好排水，四面墙基全泡在水里。太原艺术学院新建的2600平米的食堂工程，只等挂瓦，就停了工。1961年8月底，一阵大风把屋顶刮掉，刮倒了墙，压死了3人，伤了两人。

停建以后，工地上的大量建筑材料保管不善，造成了很大浪费。据沈阳、天津、甘肃等四地的不完全统计，共留下钢材10285吨，木材10900立方米，水泥12650吨，以及大量的地方建筑材料。这些材料不仅呆滞积压，而且很多损坏变质。天津炭黑厂工程进场的白灰138吨，大部分被风刮走。

有些设备，露天放置，无人管理，损坏严重。沈阳市砖瓦厂一套隧道窑，停建以后，两台鼓风机放在野外，全部生锈，200多个炉篦全部锈烂，不能使用。沈阳合成氨厂七台大型设备也是露天堆放，任其风吹雨淋。天津东郊电厂第一期10万千瓦的进口发电设备和第二期的10万千瓦的国内设备，先后进厂，一无仓库，二无遮盖，在车站、马路以及施工现场，到处乱摆乱放，普遍生锈。

许多停建工程下马以后，多占的土地没有及时退还，任其荒芜。凡是工程下马之处，都能看到残垣断壁，荒草萋萋。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上级一声令下，说停就停。很多本来可以利用的工程，功亏一匮。沈阳地区1960年砍掉的中央和省属工程中，有13项已经基本完成，只需用很少的材料和人工，抹抹灰，上上油，装上玻璃，就可以竣工使用，但由于“一刀切”，这些工程无人收尾。

不管代价多么大，以上措施对于纠正过激的政策，还是取得了明显效果。到1965年，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是，这样大步倒退，虽然稳住了经济，但毛泽东从心底里是不满意的，国民经济稍有转机，他就想反右，1962年夏秋经济形势刚有转机。毛泽东等人却认为形势本来不错，主张实行大调整的人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犯了所谓右倾错误，刮了“黑暗风”。于是在8、9月间相继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又发动批“右倾”，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为新一轮政治斗争埋下了杀机。

第二十五章　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

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通常会引发的农民的大反抗，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有的会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实现王朝更迭。20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的规模是空前的，死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为什么没有引发重大的社会震荡？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历史之谜。

一、大饥荒年代的社会治安

在1958 - 1962年间，由于苛政害民、饥民遍地，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据陕西省兴平县、宝鸡市和西安市雁塔区三个地方统计，1960年发生的116起“反动标语”和信件中，有50％是针对粮食问题的。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局部地区出现了小规模的骚乱和暴动，边民大量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1、骚乱和暴动

骚乱和暴动较多地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汉族地区相对少一些。这是因为，政府对中原汉族地区的控制比少数地区更为严密，民间没有武器，没有非政府组织；有些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并有枪支武器，有些地方头人还能够起一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对这些骚乱和暴动，政府讳莫如深，报纸上通常不作报道，现将散见在地方志里的一些资料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介绍了“丽江小凉山暴乱”、“富宁县瑶族骚乱”、“维西县伏击事件”、“归化寺武装冲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宣威事件”等暴乱。其中“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和“宣威事件”规模最大。这里不再复述。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老馆里，本书作者调阅了几十本1990年代编修的地方志，从中看到了以下记载：

1958年4月18日，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韩乙奴为首的200余名匪

徒，胁迫群众4000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县发起武装叛乱，随之牧业区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这场叛乱历经五年才得以平息。“从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为期5年共进行大小战斗3639次（其中部队作战2811次，地方干部和民兵作战828次），毙敌1.6万人，伤敌4876人，俘获4.68万人次，招降5.88万人次。缴获无座力炮4门、高射机枪4挺和其它大量武器。”

1958年3月18日晚，甘肃省卓尼县录竹全区发生武装叛，上迭区（今迭部县）扎尕那、北山地区也相继发生叛乱。

1958年7月，云南省在鹤庆、永胜、宾川三县结合部的四角山发生土匪骚乱。

1958年8月15日，甘肃省广河、东乡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在马国忠等人的策划下，广河、东乡等县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呼喊反动口号、捣毁政府、杀害干部、抢劫银行、破坏公路及通信线路等。8月下旬，兰州部队在民兵的协助下，及时平叛，9月中旬叛乱平息。在平叛中，有扩大化问题。”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年四川省荣昌县破获“归根堂”、“乾元堂”、“万全党”等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

1958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

1958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

1958年广东连南和连山两县的瑶族地区发生暴乱。

1958年12月27日，云南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发生暴乱。

1958年和1959年广东翁源县两度发生暴乱。

1958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

1959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

1959年4月16，云南省建水县岔科公社白云村发生暴乱。生产队长李万成被杀，夺走民兵枪支14支。4月26日平息。

1959年青海省海西州发生部落叛乱。

1959年湖北保康县有人自称皇帝，纠集200多农民企图暴动。

1958年，贵州省黔东南州共破获反革命案件24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天柱县的“自由中国民主同盟西南联合反共战斗军”反革命暴乱案、黎平县的中黄农场劳改犯预谋叛国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归养反革命集团预谋暴乱案和岑懂“四一”反革命集团复活预谋暴乱案。四案共逮捕首犯、主犯35名。1959年这个州共破获反革命集团案19起。1960年10月这个州镇远县破获“中国自由民主党”预谋暴乱案。1961年1月，在锦屏、剑河、黎平三县结合部的青山介地区破获“中国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反革命预谋暴乱案。

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他们家里的孩子也饿死了。手无寸铁的农民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300多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枪支18条，子弹1200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4人，绑架干部16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1961年7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党”首犯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枪5支，子弹50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1960年12月20日，甘肃省镇原县屯字公社发生“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第一师”反革命暴乱。

1960年10月28日，湖南公安厅、株州市公安局和凤凰县公安局在凤凰县的腊尔山、沱江镇抓获以吴求富、龙绍海为首的“中国民主救星党”阴谋暴乱案，抓获40多人。

1960年12月，云南省宣威发生“反革命暴乱。

1960年12月，河北省邯郸市破获“新星会”阴谋暴乱案。首犯阎普真（女）利用“疫病”流行的机会，成立武装组织“仁义军”。12月13日阎普真带领95名道徒人企图占领河北省永年县老城。被公安部门全部抓

获。

1961年4月，四川省剑河县公安局破获太拥公社展模管理区反革命集团“中国英雄党”案，首要分子被逮捕法办。1962年8月，剑河县公安局与三穗县公安局配合，捕获涉及剑河县南明、大洋、磻溪、平岑和三穗县瓦寨、顺洞等地的反革命集团“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政司令部”全部成员。

1961年四川省垫江县在西山虾蟆湾一带破获预谋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革命军”，捕获头目5名。

1961年7月，吉林省公安部门破获“中国民主党”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赵革东是原怀德县委宣传部长。

1962年11月10日，云南省南华县沙桥、五街地区发生反革命武装土匪暴乱，11月22日平息。

1963年，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峪关公社黄草营大队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

四川省阿坝地区从1956年到1961年元月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持续不断。

1962年云南镇沅县发生30余人的暴乱。

在地方志里（特别是各地的“公安志”）这样的记载很多，本书不再一一列举。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到图书馆里翻阅。

绝大部分暴乱的规模都不大。有些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并没有政治动机，只是为了填饱肚皮。有些地方官员把正常的反映意见行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为成为反革命暴乱。例如在1957年12月云南通海一名共产党员联名向上级写意见书，反映该乡缺粮情况，并且发动800多人在意见书上签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骚乱”，14人遭冤狱，到1979年才平反。

2、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居民大量外逃。我所掌握的资料中得知，大规模的边民外逃有三处。

一是西南边界。云南省沿边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8万人，从现存材料上看，外逃人员超过了此数。仅德宏州外逃人员就有近6

万人。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二是广东深圳，从1958年以来就出现了成批的人逃往香港，但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发生在1961年和1962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参与这次偷渡外流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详见本书《岭南风云》一章）

三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1962年春夏，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3、哄抢粮食

饥民哄抢粮食的事件很多地方的档案馆有资料记录。哄抢粮食多发生在铁路沿线，成群结队的饥民哄抢运粮列车。哄抢粮库的情况也有发生。

张掖地委1961年1月7日晚向省委的报告 说，武威车站自运粮一开始，群众就成群结队地到车站偷粮，1月5日，白天约有五六百人，晚上约有200多名青年人，到车站偷粮、偷煤，共偷去青稞90多包，约18000多斤。驻车站炮兵团警卫战士阻拦不住，有的向战士掷石头，逼迫战士后退。有的喊话说："你们不敢开枪打我们。"有的一个人纠缠战士，其他人去偷。据了解，当时警卫战士已架起了机枪，以阻拦群众。下午，到车站的群众已增加到1000人左右，县委常委黄进忠，从炮兵团又调两个排。同时，抽了部、局长10多人，到车站附近的生产队了解情况，教育群众，安排社员生活。张掖地委得知情况后立即撤回新调去的两个排战士，不准打骂群众，不准拘留，绝对不准开枪，对远道而来吃不上饭的给他们做饭吃，说服他们回去。这天下午6时张掖地委乔生瑞向省委电话报告说，警卫人员架了一挺机枪，又从炮兵团抽了两个排的战士。

中共酒泉市委1961年1月11日、14日连续向省委的报告 说，从1月5日到8日，先后三天有400多名群众成群结队地抬上梯子，拿着口袋，手持木棒、刀子、铁铣等到面粉厂抢粮。有的是搭上梯子越过墙去硬要，硬拿，有的在墙上挖洞进去偷，还有一些人在公路上趁天黑拦劫拉粮的皮车，用刀子将装粮的口袋割破，一涌而上，抢到粮就走。5日曾鸣枪驱散，但后两天有人继续抢粮。对鸣枪行为酒泉市委向地委和省委作了检查。

省委天水工作组和中共天水地委1961年1月23日联向省委的报告 说，最近以来，铁路沿线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列车被抢被偷事件不断发生，继续蔓延，日益严重，损失非常惊人。北道车站检查组去年12月份检查了进站列车338次，发现有142组列车被盗。另据统计，1960年10月到1961年1月22日，共发生列车被盗事件420次。其中，1961年1月的20天中就发生184次。被盗地区由小到大，由站到线，逐步蔓延发展，偷盗人数由单个发展到三五成群、结伙作案，由小量地偷窃粮食到大宗地见什么偷什么，由黑夜秘密偷盗到白天公开抢夺。

一些地方志记载了一些群众哄抢粮食的事件：

1960年12月安徽芜湖专区发生大小抢粮事件180起，据查清的96起统计， 抢走粮食3.6万斤，1961年初全省又发生抢粮事件65起，抢走粮食万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抢粮事件发生。抢粮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大的地区。据淮南等13个县22起抢粮事件调查，参与者5495人。

甘肃省在1961年1月间发生哄抢粮食事件 五六百起，损失粮食百万斤以上，牲畜近万头，还有大批百货，使交通陷于瘫痪。

1961年在张掖市发生3000多人抢国家粮库哄抢粮食事件。

1961年甘肃安西县发生群众砸开国家粮食仓库抢粮食事件。

贵州省雷山县在1960年发生多次哄抢国家粮库事件。

贵州黎平县1960年12月－1961年1月期间发生4000多群众因缺粮而哄抢国家和集体粮食事件。

广东省潮州市也发生哄抢集体粮食事件。

4、刑事案件增多

个案调查报告显示，四川省泸县治安情况混乱，个别严重的生产队、管理区，连夜里开会都开不起来。如杨九公社自1961年1月6日到10日5天当中，连续发生抢劫偷盗案件17起。该村二朗管区三队社员杨云章在10日晚就被持棍棒进家抢走6只鹅、12个鸡蛋、3只羊。又如曹市公社从1960年12月底以来，发生抢劫偷盗案件104起。据政法部门统计，1961年春一周内，全县69个公社中，有36个公社发生了抢劫偷盗案件。

过去中国是不公布犯罪统计资料的，1987年才在有关部门中逐年公

布，并且将以往的犯罪统计补充公布。从公布的刑事案件数据中，可以看到，正常年景刑事立案数21万起左右，在饥饿最为严重的1960年和1961年，刑事立案数大幅度上升。

刑事立案数大幅度上升的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但也与司法部门的指导思想不当有关。甘肃省《民勤县志》记载：“1959年 - 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人们大量外逃和死亡，为了生存，一些社员宰杀牲畜、偷盗粮食。期间，法院审判工作由于受左的影响，将这些行为当作破坏活动进行打击。1959年受理各种案件种类刑事案件492件，占总案数的55.8%。”这本县志的说法也符合其它地方的情况。

中国公安大学研究社会治安的教授张庆五当年曾在公安部工作，他对本书作者说，当年所发生的所谓刑事案件，大多是饥民为了生存偷窃或抢劫食物。所以，在刑事案件中，盗窃案最多，杀人案很少。从吉林省的一份统计资料证实，在最困难的时候，凶杀、纵火、诈骗等案件与常年差不多，强奸案大幅下降，而盗窃案和残害牲畜案（杀了吃了）大幅上升。这和张庆五教授的看法一致。

表24-1 1957 - 1963年吉林省刑事案件发案数(起)的变化状况

年份	凶杀	强奸	盗窃	残害牲畜	诈骗	纵火	合计
1957	140	603	4537	79	366	74	10753
1958	165	671	7867	73	203	64	6148
1959	107	493	4395	24	125	26	5278
1960	106	542	4295	60	163	32	6557
1961	114	263	5478	397	297	38	12945
1962	146	388	11284	159	260	28	10593
1963	136	967	9443	27	366	48	9540

资料来源：《吉林省志》卷12《公安司法志·公安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2页。

二、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震动的原因

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震动，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有效的社会控制，而这些社会控制的手段都是来自极权制度。

1、大规模的镇反肃反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名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这些政令发出以后，各地大规模地开展了镇压和肃清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这场大规模的镇反运动中，共捕了260万人（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人），杀了71．2万人，关了129万人，管制了120万人。

以后这种惩治反革命的政令持续不断：

1951年6月22日，公安部公布《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

1952年7月17日，公安部公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罗法》；

1955年4月21日，国务院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的决议；

1957年8月9日，国务院第56次会议通过关于处理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在肃反运动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工龄和工资问题的规定；

1957年9月20日到11月27日，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罪证展览在北京展出，开展了关于肃反的大宣传。

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加强对“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肃反力度。

中央政府每一次指示，都会在各省、地、县掀起一次肃清反革命的高潮。从广东省镇反可见一斑。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名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发表以后，1950年10月，广州市军管会就颁布了《关于特务分子登记自新的布告》，限令所有国民党特务在10月11日之前，前往公安部门登记自新。广州市的镇反由此拉开序幕。叶曙明先生写了一篇题为《1951年：广东镇反实录》长文，现摘引部分内容如下。

直到1951年3月为止，在省、市机关及铁路自首登记的特务共有1013人；另有反动党团分子登记，在市机关有10669人；铁路系统职工总人数9000人，其中已登记的反动党团分子就有5054人……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新生的人民政府已把3437名反革命分子投入大牢（不包括治安案件在内，其中广州市1263人），杀了1465人（其中广州市67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中南局要求尽快完成两广的剿匪和镇反。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反中“宽大无边”的偏向。毛泽东多次指示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领导，国民党进攻厦门、汕头的可能性很大，广东、福建要加强剿匪，大胆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匪首。“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毛泽东《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的电报》），

1951年1月22日）。广东决心急起直追。至1951年1月上半月以前，再逮捕了1340人（不完全统计，其中广州市300人），杀了1308人，在押15322人（剿匪中的俘虏未计，其中广州市3322人）。中央派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到广东坐镇督战。1月下旬以后，广东再加快捕杀的进度。为了提高效率，决定把杀人批准权，下放到地委一级。据广东省公安厅2月份的公布，从11月会议之后，至翌年2月，“根据初步统计，全省处决反革命分子2831名（其中军区1406，地方1425），破案180件。另外仅潮汕、珠江、西江三个区和汕头湛江二市的统计，已抓7270名，现在全省统计共押犯人40486名，其中公安系统28575名，法院11911名。”但距离完成“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的任务尚远。

2月17日，毛泽东在一封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信中，对两广在剿匪和镇反中的“宽大无边”政策，再次提出严厉批评……随着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批准和公布，广东各地，再次掀起镇反高潮，成批镇压反革命分子。并定下指标，在大城市须按0.5‰比例杀，在农村须按1‰比例杀。

按3月份一个月统计，全省处决反革命分子8039名，超过了解放后至1951年2月的14个月内所处决的总和（5218名）。现在（截至3月份）全省共已处决13257名，关押49281名。

通过游街、举行宣判大会、街头布告、动员、上门宣讲，以及诗歌、小说、电影等等形式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形成全民镇反的高潮。 4月25日，广州市举行了有3万人参加的各界人民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判处198名反革命分子死刑。会后三天之内，政府收到群众投寄

的拥护信和检举反革命分子信件，竟多达3万多封。

3月以后，雷霆万钧，高潮叠涌，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公审大会、控诉大会。在报纸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我检举了我的爷爷"，"我不承认他是我的父亲，我要控诉他"，"我的丈夫是特务，现在人民政府枪决了他，我很欢喜"。

广东的情况不是个别的。朝鲜战争开始以后，为了纠正一些地方对反革命分子处理"过宽"的倾向，根据政务院和最高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东北地区迅速大规模地逮捕了匪特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处决近千人。 广西接到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后，扣押了各类反革命分子8万多人，其中一批人被处决。

建国初的彻底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五十年代中期又进行了多次肃反。在1955 - 1957年，全国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进行了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各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遵照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它基层单位共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由于肃反任务过于繁重，就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从而"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40多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0 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期间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大跃进期间，公安力量的地位得到明显的突出。1959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基层的领导，南京各公安派出所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公安部门与所辖地段的所有单位建立了经常的工作联系，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已全面渗入到每一个角落。

连续不断的镇反、肃反运动，使社会反抗力量大为削弱，没有人敢当

反抗的带头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的一份报告分析说："由于几年来镇压反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上各级政治机关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抓紧了打击现行、挖掘残余、大搞改造、加强预防等工作，给敌人连续不断的沉重打击。所有这些，促使全省敌我斗争形势进一步趋向缓和，反革命虽然还有，但比过去更少、更弱和更加分化孤立了。"

2、利用专政工具连续严厉打击

大跃进以来，专政机关也对专政工作实行了大跃进，任何反政府的言论和行为以及犯罪嫌疑都被及时发现和严厉打击。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肃反斗争进行了总结，还作出了《关于彻底肃清山区、结合部、水上、落后地区漏网外逃反革命分子和流窜犯的决议》，加强了肃反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清理力度。根据全国第九次公安会议的决议，各省纷纷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59年6月，吉林省共挖出残余反革命分子9058名，反动会道门骨干943名；捉住流窜犯677名。还揭发出隐瞒成份逃避管制、改造的地富分子4959名。此外，还清查出嫌疑分子11145名。战役中收到群众检举揭发材料26839件，其中有价值的16538件。在群众压力和党的政策的感召下，有2232名反革命、流窜犯投案自首。1960年7月，吉林省将"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批捕人犯的权限下放到县委和省、地委工作组，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打击力度。据本书作者党握的资料，吉林的情况具有普遍性。1958－1960年，安徽天长县法院带着盖好公章的空白判决书下乡，遇到被认为表现不好的人，随时判决，宣布管制。公安、检察机关和公社干部亦可随时填写空白判决书，甚至出现少数口头判决现象。 1958－1961年间，云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击现行反革命5813人， 在1958年共打击各种坏分子10549名，其中死刑37人，逮捕3238人，劳动教养702人，被打击的坏分子大约占总人口0.7%。 这些被打击的对象，有相当一部分是冤假错案。

除了常规打击以外，各地还集中组织力量，进行突击性的打击。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统一部署，1961年12月13日到19日，吉林省在城市、铁路沿线的集镇，集中力量统一领导，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对盗窃和投机倒把活动，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围剿。这次行动，全省组织了2万多名干部参加，检查了12487个重点场所和部位。全省共发现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和可疑、嫌疑分子共9905名，其中集中审查8733名，拘留审查1172名。清查处理了7713名。其中逮捕了39名，劳动教养79名，强制劳动143名，行政拘留315名。其它属一般问题，转交有关部门或经过批评教育后放回。由于广泛发群众，群众检

举各种犯罪线索1万多件，扭送违法犯罪分子52名。在强大的声势下，7天中坦白自首的盗窃、投机倒把、走私分子2000多名，坦白出来的集团有21个。 1961年四川崇庆县开展了7天的突击“治安运动”，对909名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进行斗争，造成打死和被打者自杀事件12起。

为了防止敌捕乱杀，有的省对捕人、杀人有控制数字。但是，1960年，感到原定的捕人、杀人的指标不够。如，1960年吉林省捕人的控制数为5000人，杀人控制数字为80人。到6月底，全省已捕2575人（其中，反革命分子714人，其它犯罪分子1861人）占控制数字的51.5%；杀53人，占控制数字的66.25%。吉林省政法委党组给省委的报告说：“据目前情况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加深入，特别是改造落后地区、三反运动和城市调查摸底工作的全面展开，必然会有许多敌人被揭发暴露出来，捕人、杀人也就会相应地增多……为了争取主动，领导心中有数，必须将捕人、杀人的控制数加以调整。我们的意见是，捕人控制数由5000人增加到6500 - 7000人；杀人控制数由80人增加到160人。” 吉林是一个饥荒不算严重的省份，杀人的指标成倍突破，一些饥荒严重的省份，捕人、杀人就更多一些。

除了加强打击以外，大跃进一开始，各地基层政权对“敌对势力”加强了控制。《垫江县志》记载：“从1959年起，采取由党员、团员、民兵、治保员组成‘包夹小组’，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监管起来；实行一月一训话、季度一考评、年终总评的制度。根据表现好坏，摘‘帽子’或戴上‘帽子’，由县人民委员会批准，予以宣布。” 四川省垫江县的作法具有普遍性。

3、严密的组织、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食品供应

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共产党有1500万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都必须听从党的意志，并带动和监督他周围的群众执行党的意志。党组织的控制深入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车间、每一所学校、每一家商店，每一个连队。共产党还领导着共青团、工会、妇联、少年先锋队等“群众组织”，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共产党所控制的组织里面工作、学习和生活。每一个人都只能从组织里得到生活资料，只能从组织那里得到信息。每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都受到组织的控制。很少有人发表与政府不一致的言论，反政府是极其个别的极端行为。

流民失控最容易造成社会动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分注意减少流民、控制流民。自1953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居住所在地领取。1958年1 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口登记工作。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作为公安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户口的控制，公安部门对每一个居民的情况了如指掌。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由于把农民紧紧捆在土地上，社会上基本没有流民。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 - 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 - 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

1961年11月2日，吉林省政法工作负责人徐守身在省委召开的整顿城市治安秩序的电话会议上讲话 说：最近中央公安部、内务部召开了会议，研究了收容自流人口和整顿城市的治安秩序问题。因此，吉林省8个市在11月都要行动起来，到年底要求见效，到春节要求见大效。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坚决制止流动人口。首先要堵住外流的口子，教育农民不要外流。第二是铁路要卡紧，火车上要严格执行凭票上车、凭票就餐制度。凡是流入城市、铁路沿线的流动人口，一律收容起来，有一个收一个。有家可归、自己愿意回去的，就遣送回乡；实在不愿意走或有困难的，也可以安置到农村。对遣送不归或假籍贯的人，要集中劳动，边劳动，边审查，边教育，边处理。

二是认真解决城市闲散人口。经过整顿以后，户口工作要加强起来。城市户籍警一般只管500户，力量不足的要补充。户籍警按干部待遇，并且不得轻易调动。对旅店、饭店、澡堂等复杂场所控制要严，防止坏人混入。立即停止对外售票的舞厅。

三是加强交通要道的治安工作。此外，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要整顿内部秩序，加强纪律，建立制度，堵塞漏洞。

徐守身还说，要有计划地大张旗鼓地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中央公安部指示，各个大城市都要选择典型案件杀几个，中等城市、农村也要杀一点。杀人要开万人大会，会上要有市长讲话，当场宣判，立即执行，张贴布告，做到家喻户晓，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4、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

那时，真理的旗帜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乱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新生政权得到人民的信赖，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把大家引向美好的共产主义，不少人愿意为这个伟大的理想作出牺牲。自己挨了饿，家里饿死了人，还认为这是个别现象，为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作出这样的牺牲也是应该的。

所有报刊，所有会议，所有的课堂和讲坛，都千篇一律地宣传政府的声音，发布对政府有利的信息。党支部、共青团、民兵、妇联、工会、学校，都向群众灌输中共中央的意志，抵制和消灭一切与中央声音不一致的“杂音”。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实现了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

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们驯服，新闻封锁使人愚昧。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问题”，不仅当时邻近地区不知有其事，甚到几十年后还严加保密。处理这些重大事件的办法是，把全局问题当作个别问题来处理，把一个地方饿死人当作“一个指头”，在承认“一个指头”的同时，大讲“九个指头”的成绩。谁要否定“九个指头”，谁就是否定“三面红旗”。用空洞的“全国形势一派大好”淡化人们实实在在的饥饿，压制人们对饥饿的不满。

5、饥民的反抗在萌芽状态即被消灭，不可能发展壮大

在古代，饥民没有办法生存时就啸聚山林，揭竿而起。毛泽东早年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中央政权对抗。在现代社会，这些已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间力量很难借助武力来推翻它。这是因为：第一，没有领袖。中国历代农民起义，起骨干作用的还是地方豪强和中小地主。由于土改、镇压反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农村的强人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既然豪强不存，农民起义也就没有领导精英。第二，没有财富。在中国共产党掌权以前，可以通过剥夺民间富豪为造反提供经济手段，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切财富全由国家控制，民间再没有可剥夺的地主富豪。第三，没有可以与政府抗衡的武器。

政府掌握了现代化武器和现代交通、通讯工具，而民间不能拥有任何武器。任何啸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内。对任何边远地区的“根据地”，政府军都可以借助现代交通，迅速到达。第四，没有组织。没有结社自由，一旦出现政治组织，很快就被扑灭。无组织的群众难以对付有组织的政府和军队。在现代极权制度下，民间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既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井冈山。现代极权制度只有在社会矛盾积累到相当尖锐的程度，靠领导集团内部瓦解，靠宫廷政变来更换领导集团。民间的反抗和骚乱只能是上层权力更迭的外因。

在1958年 - 1962年间，政府拥有400万人以上的强大军队。这支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它既应对外患，更是为了应对内乱。民间反对者不可能聚集与政府军相抗衡的力量。为了维持这支军队，为了提高这支军队的装备水平，军费支出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见表25-3。

表24-2 中国的国防战备费金额（亿元）及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年份	国家财政总支出	国防战备费	国防战备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1950	68.1	28.0	41.1
1951	122.5	52.6	43.0
1952	176.0	57.8	32.8
1953	220.1	75.4	34.2
1954	246.3	58.1	23.6
1955	269.3	65.0	24.1
1956	305.7	61.2	20.0
1957	304.2	55.1	18.1
1958	409.4	50.0	12.2
1959	552.9	58.0	10.5
1960	654.1	58.0	8.9

1961 367.0 50.0 13.6

1962 305.3 56.9 18.7

1963 339.6 66.4 19.6

1964 399.0 72.9 18.3

1965 466.3 86.8 18.6

1966 541.6 101.0 18.7

1967 441.9 83.0 18.8

1968 359.8 94.1 26.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420－421页

1950年－1952年是朝鲜战争期间，国防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特别大，最高达41.1%。以后比例下降了。但是，国家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以后，这个表中列出的费用不是国防战备费用的全部。中国很多武器是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由民用工厂生产的。当时各省市都设有“国防工业办公室”，负责“军工动员”任务的落实。此外，一些重要的军事科研项目由非军事研究单位承担，很多普通院校承担了军事院校的科研项目和培养人才的任务。“两弹一星”中的大部分消耗不是来自国防经费。从表25－3中可以看出，大饥荒年代军费开支是最低的。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还在8．9%－13．6%之间。

6、惩罚农村基层干部，消减农民的不满情绪

饿死人最多的地方通常是干部作风最为恶劣的地方，也是“五风”刮得最严重的地方。中共中央通过全国性的纠正“五风”运动，处理了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处理这些基层干部的借口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说这些被处理的基层干部本来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为受害的农民出了一口气，缓和了矛盾，让农民感到“中央是英明的，只是地方干部不好”。而这些坏干部又都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就把共产党的过错推到已经下台的国民党身上了。这些情况在本书上册介绍各省情况时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再重复。

第二十六章　大饥荒的制度背景

为什么像粮食“高产卫星”那么离奇的谎言没人揭穿？

为什么数千万的饥民濒临死亡得不到救助？

为什么造成饿死人的路线、政策一直持续三年？

为什么农村基层干部能如此残忍地摧残农民？

为什么饿死的大多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为什么饿死几千万人绝世惨案能够密而不宜、一直隐瞒半个世纪？

这些问题只能从制度中找答案。

产生大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造成中国这场大饥荒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是以中国传统的王权主义加上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为特征的极权制度，即借助秦始皇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制度。

一、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1973年8月5日，毛召见江青，令其手记七律一首，这首诗是批评郭沫若《十批》 的。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帝王专制史。毛泽东没有摆脱几千年帝王专制的强大惯性，在他的头脑里，王权思想还有重要地位。他这里说《封建论》作者“唐人”是指唐代的柳宗元，字子厚。在秦以前的分封制，封建领主在他的封地上有很大的独立性，中央政权不能全面控制，有“尾大不掉”的情况。秦始皇废封建设郡县。柳宗元在《封建论》一文中，认为秦始皇最先实行的郡邑制优于周代的分封制。柳宗元从权力集中的角度来评判优劣的。郡邑制把全国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手中，地方官员由皇帝任命，地方官员的去留完全由皇帝决定，“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秦始皇创建的行政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

多年来，人们用“封建社会”来描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的《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使这个认识加深了一步：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不是封建主义，而是王权主义。 实际上，和毛泽东对应的不仅仅是王权主义，而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也有人译成全权主义。它是20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一个政治术语，是墨索里尼最早发明的，墨索里尼强调“一切从属于国家，不许脱离国家，不许反对国家”。极权主义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试图通过强制和镇压，对个人生活各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导。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民的整个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统治。极权主义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按国家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和偏好制定的，他们认为这个目标是为了“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利益”，只有他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利益”的代表），不惜一切代价，倾全力以达到目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在极权制度下是被允许的，有时是必要的，它因无限忠于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变得合理。在王朝时代，由于交通、通讯的落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一个理想，国家的权力很难经常深入到版图的每一点上。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有了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边远的乡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每一家的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奉行的是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他们描绘出了人类最美好制度的图景。为什么他们所建成的制度和原来的理想大相径庭呢？哈耶克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回答。我不再重复他这本书的内容，我只是想说，我并不怀疑开创者的真诚。他们中很多人也许是想救民于水火的仁人志士。但是，他们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

开始用这个理想建造这个制度的时候，不会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人的认识是有限的。

制度是人和人的关系，也是个人和整体的关系。通过制度把单个人的活动连接成整体。但是，连接整体以后所导致的结果，任何个人凭着有限的知识和观察，是不能预知的。这像数学中的“有限”和“无限”的概念一样，在“有限”中得出的正确结论放在“无限”中有时是不正确的。这是一。

制度是千百万人共同建造的，但是，建造的过程并不是完全遵循建造者的意愿，它要因袭原有制度的遗产（现代语言称为“路径依赖”），它还要受到种种外力的影响。一种“理想的”制度建成以后，建造者会惊奇地发现：“竣工验收”的成果和“设计图纸”大相径庭。这是二。

第三，从理论上说，制度是为人服务的。但是，一旦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人们都要受到这个制度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制度本身的力量（制度的逻辑力，制度的惯性力）又迫使制度的执行者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做出这些事情的后果是与制度建造者的最初愿望有时是相悖的。

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 中国人经历的情况正是如此。

毛泽东身处高位以后，在中国王权文化传统浸润中，在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里，把早年自己曾宣扬的民主抛到九霄云外，俨然以帝王自居。

2000年的一天，曾任毛泽东的秘书的李锐，在与他的老朋友在一个饭桌上（当时本书作者也在这个饭桌上）说，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

毛泽东这个理解不足为怪。他是在中国农业社会成长起来的，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法治的教育，对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情有独钟，在他眼里，总统和皇帝都是君临天下，都是统率万民，当然没有什么不同。

1981年11月14日，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朱德的秘书陈友群提供一个情况：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审定时，亲笔加上

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也好理解：要“君临天下”就得有人山呼万岁，在专制社会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法国大作家兼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曾在1972年向身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介绍毛泽东：“有一次我问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毛泽东这一代人借助“分久必合”、“久乱必治”的历史契机，把历经半个世纪战乱的国家整合起来了。他们在中国皇权文化的土壤上构筑了一个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强有力的思想控制，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这些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十分稳定的、高度集中的权力金字塔。毛泽东身处金字塔的顶端，牢固地掌握了这个权力结构之柄。这个“柄”就是军队和党的控制权。有了这个权柄，他就比任何人强大，他就成了全国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思想权威。民众的个体在这个权力结构里微不足道，他们只能为全国唯一的目标——共产主义献出一切。

这个金字塔结构最早是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尽管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帝王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控制比历代帝王的专制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

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毛泽东。毛泽东实际是现代中国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历代皇帝更加强大，统治更加严密。历代帝王可以像法皇路易十四那样说“朕即国家”，毛泽东的权限远远超过了他们，他可以说“朕即社会”。在毛泽东以下的各级领导机关，主要领导人都是毛泽东的臣下，但在他自己领导范围内像毛泽东一样行使权威。他们也是一个个土皇帝。

二、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

哈耶克说：“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他们想要引导社会努力所要达到的目标性质不同。但他们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不同，则在于他们都想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这个单一目标，而拒绝承认个人目的至高无上的自主领域。”

怎样“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共产主义的“这个单一目标”呢？这就得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正是这样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完全剥夺了个人的自主领域。

在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

在城市，工商业都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各类物资全由国家控制。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53.8%，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公私合营工业占26.3%，私人工业占0.1%，城镇个体工业占0.8%。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62.1%，集体所有制商业16.4%，公私合营商业占16%，个体商业只占2.7%，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为2.8%。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只有国家计划，没有市场。个人不可能在“国家分配”以外的渠道买到任何物资。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全都由国家下达计划。工厂建一个厕所也得层层报批，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动工。财政统收统支，产品统购包销，外贸统进统出，职工统招统配，工资全国统一制定级别、统一时间调整。

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集中到中央。其中，毛泽东的个人意见份量最重。例如，中国的很多经济指标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在这样经济制度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架大机器里，控制中枢（中共中央）一方面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中枢支配，一方面对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实行各种形式的配给制。中国当时的制度不仅剥夺了老百姓获取食物的权利，也剥夺了百姓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食物的权力。

要使最高当局的经济指令畅通无阻，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要使最高当局的指令不受干扰，就得清除“噪音”和“杂音”，实行舆论一律。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共产党有

1500万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一条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一个领袖－－毛泽东。由于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所以，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 “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党内奉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对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制衡力量很微弱。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和秦始皇建立的专制制度结合起来，就成为最高领导人实行专断的工具，成为极权政治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城市按部门或单位建立组织，在农村按属地建立组织。这些组织与各级政府相平行（实际是凌驾在各同级国家行政机构之上），都设立了党委会，基层组织为党支部。名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行代表大会制度，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党的主席凌驾于代表大会之上。他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各级党代会只不过议事机构和表决机器。中央委员会内又产生政治局，政治局内又设常务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是掌握实权的领导机构，而政治局常委又在中共中央主席的领导之下。党中央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名义上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委员会，实际上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常委均由上一级任命。在干部任命等一切重大问题上，党的第一把手有绝对的权力。地方党委会内也设常委，执掌日常实际权力。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特征是，一是它在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处于独立的执政地位。按照党的理论，共产党执政一直到国家消亡、共产主义实现为止。二是党的机构全部国家化了。党的专职干部就是国家干部，他们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开支，党的活动经费也由国家财政支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实际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民主只不过是集中的手段。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外再没有人敢于批评共产党。1959年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内也不敢批评领导人，不敢批评党的政策。各级都是一元化，一言堂，各级党委书记都成了家长，毛泽东是全党最大的家长。党的各级领导人既缺乏党外监督，又缺乏党内监督。从1957年以后，党内特权开始严重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即通过协商、讨论，少数服从多数。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看法靠毛泽东“一锤

定音”。而对重大问题的争论是靠“路线斗争”来解决的。所谓“路线斗争”，就是不同意见双方互不让步，最终是一批人战胜另一批人。执行“错误路线”的一批人下台，坚持“正确路线”的一批人上台。这种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有时是“你死我活”的，因为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自从毛泽东有着绝对权力以后，路线斗争常常成为他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唯一政治集团。中国虽然也有其它党派，但这些党派都不以取得执政地位为目的，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们被称之为“参政党”。这些民主党派的第一把手是中国共产党派进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有的民主党派内还设立中国共产党的“党组”，作为该党派的领导核心。从经济上，是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民主党派的干部也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命。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只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为共产党服务的社会团体。

在帝王社会，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皇帝，又用一个新皇帝来代替它。在政党社会，推翻了一个一党专政，又一个新的一党专政来代替它。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果呢？还是一党专政。只不过是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取代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两个党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过苏联共产党的帮助，都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吸取了组织经验，都是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原则。

四、用枪杆子保卫权力

军队是这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的支柱。高度集权制度是靠军队来维持的。这支军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这支军队共歼灭蒋介石掌握的国民党军807万人，实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一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庞大军队。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末，即1948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有400万人。到1950年7月，又增加到500万人。1951年，人数为历史上最多，即611万人。朝鲜战争以后，还一直维持在400万人以上。一直到1985年6月，邓小平决定裁军100万，人数降低到330万人。 除了这支庞大的常备军以外，一旦战争需要还可以随时召集数以千万计的预备役军人。

这是一支由多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和战略导弹部队。这支多兵种高度合成化的部队，其火力、防护力、突击力、机动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都相当强大。

这是一支由庞大的军事科研队伍支撑的部队。全国有数以百计的国防科研机构、100多所军事院校和国防科研机构，几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优秀人才。

这是一支由整个国家的重工业为后盾的军队。毛泽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出于备战的需要。一旦需要，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汽车拖拉机工业很快就可以转为军事工业。毛泽东时代的很多武器装备都是在民用工厂里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生产的。即动员民用工厂的力量、用民用工厂的资源生产武器，毛泽东时代的军费不包括“军工动员”的费用。

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在毛泽东帝国，是“党指挥枪”。党指挥抢，不是一项空洞的原则，不仅是靠军官们对党的忠诚，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帅全军。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中央军委的成员。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各级军队都有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军事干部都是同级党委的成员。部队的重大事情都由党委讨论、批准。从上到下，党组织无处不在，无处不起领导作用。这些是“党指挥枪”的重要组织保证。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每一个战士都知道“党指挥枪”的原则。此外，毛泽东还吸收了中国历代的监军制的经验，并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

一，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这样，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这就防止军队变成个别军官的私家军队。在一支军队内部也不可能进行对抗中央的密谋。

二，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军长和军长以下的各级带兵的军官，不能带领自己的部队移动。作战部队一个营的移动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一个团的移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另一方面，有调兵权的人，不经批准，不能自已到一个部队里去带兵。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三，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调兵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研究，集体决定。当然，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四，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不能就地筹饷。过去军阀割据，其中一个原因是军阀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里筹饷，他可以在辖地内成为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地盘大，军饷就充足，就可以进一步扩充军队。因此就有军阀间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饷由总后勤部统一供给，一律“吃皇粮”。军队自己不能就地筹饷。

五，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在军阀时代，地方军政合一，军事长官就是行政长官。他们既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和中央分庭抗礼，又凭借自己的行政职务，对百姓发号施令。毛泽东时代，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力量，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这样，地方实行军事割据就无可能。虽然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兼任当地驻军政委、当地驻军主要负责人参加驻地党委，但这只是一种相互沟通，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还是泾渭分明。

六，“双长制”，即同一部队有两个一把手。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两人都对上级党委负责。二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们很难齐心协力进行谋反。

七，司、政、后分立，军队里的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分别负责。三者都服从同级党委领导，同时接受上一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

八，强干弱枝。在军队部署上，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力量。万一个别地方出现问题，中央可以凭借具有压倒优势的首都军事力量讨伐叛逆。驻首都以外的部队（包括军事首长）带一支枪进入首都要经过批准。空、海军的飞机不能飞越首都上空。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也就是毛泽东指挥枪，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拿着枪来指挥党，再通过党控制全民。过去毛泽东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毛泽东用枪杆子来保卫自己的权力。

五、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政体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市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毛泽东站在天安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共和国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毛泽东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他曾多次提出过民主政治的口号，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对民主的态度比过去显得不同了。1949年8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他把人类创造的现代政治制度——"议会制"和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立"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泽东把国家组成分为国体和政体两个问题。他说，"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支配问题。" 在中国应当由那个阶级来专政呢？在1940年2月，他主张"各个阶级联合专政"。到1949年6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到了晚年，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三种提法有其一致的方面。关键在于对"人民"的解释上。如果把"人民"解释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各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如果强调在这个联合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则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的范围越来越小了，除了地、富、反、坏、右以外，在城市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在农村连富裕中农也受打击。实际上还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毛泽东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敌人"并没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律界定。从毛泽东到一个村支部书记，都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敌人"，从而变成专政对象。

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它的"政体"。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最高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除了有权修改宪法、制定法律、行使立法权外，拥有产生并监督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的权力。国家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国务院总理，经国家主席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有权决定国家生活中的各种重大问题，如审查和批准国民经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批准省、市自治区区划，决定战争与和平等。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有国家元首制度。按照1954年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必须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结合起来才能行使某些元首职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元首实际是国家主席和人大常委组成的集体。第一届人大届满以后，毛泽东再不愿意当国家主席，1958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后，就不设国家主席了。以后，由于毛泽东自己不愿意当国家主席，又不让别人当国家主席，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就规定不设国家主席。《宪法》上的条款也得遵命毛泽东的个人意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有“共和”两字。孟德斯鸠把国家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种。他认为，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遵照法律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来执政的政体。从《宪法》的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的，不是专制的。

中国当时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宪法》，一部是《婚姻法》。毛泽东（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宪法》而不顾，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

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参考。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双反”，报纸一登，全国展开。）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的大会 (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 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他说的“我们那一套”是指中国共产党那一套，“我们这一套”否定了“他们那一套”。“决议”是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党大还是国家大？党大。刘少奇反对法治，赞成人治。最后他还是被人治所害：他作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度，就被置之于死地。这是后话。

西方现代国家是议会政治，中国则是“会议政治”。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会议来决定一切重大事情，中国共产党会议的“决议”高于法律。然而，什么时候开会，会议讨论什么内容，用什么形式讨论，会议开多长时间，参加会议的人是没有决定权的，有关会议的一切完全听从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会议是贯彻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会议的“决议”实际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文字表达。会议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议会政治”和“会议政治”虽然只是调换了一个字的排列顺序，却发生了本质变化：“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会议政治”是专制政治。

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田头、地角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工农商学兵，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各级党组织，第一把手又凌驾于组织之上。书记当家，委员们对书记如众星拱月。行政领导人对书记也只能俯首听命。名义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实际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这样一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形同虚设。《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是一纸空文。《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选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际上，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反复讨论过了的；《宪法》规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一个虚设机构，军队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掌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

在秦始皇的制度根基上嫁接列宁、斯大林制度，就被称为“革命政权”，反对这个政权的当然也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要受到严厉惩处。

六、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

与党权、政权、军权、经济权高度集中相适应的是舆论高度集中，高度统一，“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抓紧“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这两杆子。“笔杆子”就是一切舆论工具，抓紧“笔杆子”就是掌握动员资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笔杆子”和枪杆子并列，可见其对思想控制的重视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用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国的统一思想，要求全国人民完全地、永远地服从共产主义这个目标。让每个人都知道，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的实现，牺牲小我，顾全大我是必要的、光荣的、高尚的，不愿做出牺牲是可耻的。关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个比前一个进步，后一个必然取代前一个，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个人利益，个人生命在历史规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为此，一方面不让知识分子发表与共产主义不同的言论，另一方面对广大群众强力灌输共产主义。一切舆论工具，一切图书，一切讲坛，一切会议，都灌输共产主义理想，批判与之不同的思想。广大群众，特别是无知青年，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只知道一种理论，使他们思想十分“纯洁”，他们的“爱憎”分明而强烈。这些“纯洁”的青年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又是排斥、打击非共产主义思想的真诚、坚定、强大力量，在政治运动中他们是狂热分子，是制造过激行为的主力。共产主义理想是以“大我”消灭“小我”、以强权剥夺个性的最有说服力的、最合法的工具，是推行“一大二公”最有力的动员工具。为什么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共产风”刮了一阵又一阵，这是多年共产主义灌输的结果。

当时只有两张全国发行的大报，一张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另一张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这两张报纸除了风格略有差异以外，指导思想完全一样。各省在省委直接领导下有一张报纸，除了省委审定的地方新闻以外，其它内容和《人民日报》没有不同。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发什么，不发什么，全由上级党组织决定。党报的编辑记者要遵守党的宣传纪律。为了避免犯错误，各省报纸的夜班编辑在每晚确定版面时都要打电话和《人民日报》夜班编辑“对表”，以求“版面语言”的一致。在相当多情况下，同一天全国所有的报纸的第一版的稿件、标题、排版几乎完全一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也绝对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虽然选题是上级定的，但稿件还要送审。审稿者要考虑的方面虽然很多，但是，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的共产主

义信仰，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是降低还是提高领导人的威信，是决定稿件能否发表的最为根本的原则。外国的真实情况，工作中的负面情况，不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播，除了国家设立强大的干扰电台以外，还以“偷听敌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偷听“美国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时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机，有收音机也不让有短波。

当时中国也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选题、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成果的发表，都由党的官员决定。研究人员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独立地研究，不能对真理进行追根问底的探讨。对官方意见的注释、论证，对官方错误的辩护，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当时也有一些学术刊物，如《哲学研究》、《经济研究》等，但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党政官员手中，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具。

全国各地图书馆，一些与中共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文化艺术被当作革命事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当时的文艺作品绝大部分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神化领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文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如果说，报刊从舆论上、社会科学从理论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的话，那么，文艺则从情感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动员人们忠于毛泽东。中国的文艺在神化领袖方面起了其它舆论工具无可比拟的作用，中国的文艺是造神文艺。

毛泽东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态度讲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认为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人，而“我们”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这是实话实说。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没有这样做、并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陈寅恪等极少数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又对思想界进行了整肃，近60万不服从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一场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更加强了思想的“统一”。

在那个时代，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为同一目标服务，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了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

合一”。

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没有人敢独立思考。大批无知者相信毛泽会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天堂。大批干部自认为是“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无暇进行说服的情况下，他们对不顺从者施暴是理所当然的。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人们视毛泽东的思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造就了众多的真诚的信奉者。所以，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人为造成这么大的灾难，而农民却认为毛主席是英明的，中央是正确的，只是下面干部没搞好。

七、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中国在帝王时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但是，由于交通不便，鞭长莫及，还有王法不行的荒蛮之地。在毛泽东时代，借助现代的交通和通讯，真正实现了昔日帝王的梦想。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政治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本书介绍了一些省份在三年饥荒时的情况，读者会看到，各地的情况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这里。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城市，是市——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居民组——居民。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一个城市相同的结构和相对应的层次和角色。在农村，是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社员。在任何一个乡村都可以找到与另一个遥远的乡村相对应的层次角色。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稳定，社会成员角色简单，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政府机构金字塔，城市结构金字塔，农村结构金字塔，交织成网络，构成金字塔体系。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这一网络的不同层级一个个网眼中。社会成员不能流动，社会成员之间也没有交换关系。这种社会结

构便于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错误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在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没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章诒和悲哀地说：“哪有草啊！”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饥民连逃荒都没有去处。

八、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为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前面说的都是属于有形制度。无形制度是指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思想灌输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力，常常超过有形制度。

毛泽东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是由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学说、永不停息的斗争哲学、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个人保证集体的道德观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构成的。信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道德观等构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是通过所有的舆论工具长期灌输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

几千年形成的以王权思想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其积淀比新形成的价值体系还要深厚。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是至高无上的。中国古代虽然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说法，但从根本上说，重民，爱民不是目的，它是维护君权的一种手段，君主才是目的。 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乱兴亡的决定因素，是全社会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一体。臣民必须自觉认同为子为臣的卑贱地位和工具属性，恪守本分，尽心从事。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个人尊严、个性独立是对立的，依附、盲从、奴性是王权主义的产物。

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在随时随地在起作用。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相沟通，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例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思想中，把“仁”理解为“牺牲小我为大我”，把“义”理解为“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在迫害临近的时候，人

们以欺骗求自保，以出卖朋友而换取自己的安全。在每一级权力阶梯上的人都具有两面性：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主人。在这个权力金字塔上，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这是错误的政策产生并顺利推行的条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错误会得到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放大”。这里只有正反馈，没有纠错机制。权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诱惑，使干部们失去了理智，变成了疯子、骗子，变成了用鞭子驱赶着奴隶的恶棍。

无形制度不仅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还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是极权制度的社会根源之一。捷克前总统、著名学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

九、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

专制制度首先压制的是地方豪强、社会能人。这样，使豪强不能欺压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财富。在专制制度下，处于社会最顶层的少数人可以任意消费和处置国家财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虽然可以按行政级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许官员以外的豪强存在，不允许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这样，可以实现高官以外的社会公正。高官的特权是国家机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与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舆论还不断地宣传官员们如何“廉洁奉公”。老百姓虽然受专制的高压，但心里不平的情绪很少。

在专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数群众虽然处于半饥半饱、衣衫褴褛的状态，但可以维持生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简单的医疗。如果年景好，经济情况好一些，群众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于信息单一，老百姓不知道国外的情况，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虽然自己生活水平极度低下，但情绪上还满足，没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没有更大的压迫，就不会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国家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过高估计了专制制度下群众的反抗情绪。在2003年的美伊战争中，美国人以为他们的大兵一到，伊人民就欢迎解放者。实际情况与美国人的期望相反，不仅没有大批的叛变者，也没有外逃的难民，而叛变者恰恰是接近萨达姆的上层人物。

极权制度使多数人利益受损，但很难有人出来为多数人的利益而挑战当局。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论证了这个思想：如果个人行动使整个集团增加利益，则可以假设个人付出成本与集体收益等价。但付出此成本的个人却只能获得集体收益中的极少份额。集团利益属于所有的人，集团越大，成员越趋向于搭便车而坐享其成。以致于“经济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进而产生“集体行动的困境”。由于迫害，所谓“理性人”都不敢对暴政有任何微词。于是，前所未有的强大专制出现了。每个人都服从于权力的意志，无疑，它比以往任何一个政权强大。

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是因为政权以外的民间力量难以推翻它，这一点，在本书“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一章中已有阐述。

十、这个制度缺乏纠错机制

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难避免犯错误。

首先是他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办好。一个人的脑袋代替了千百万人的脑袋，难免出现决策错误。他做出错事以后不仅没有人敢批评，还要阿谀奉承，小错会铸成大错，局部错误会演成全局错误。

更为重要的是，专制制度下的高层领导者常常受骗。他们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决策，哪有不犯错误的？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垄断了一切信息，控制了一切舆论。他主观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观上也就封锁了自己的耳目。在这个制度下，信息只能纵向传播，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由于利害的诱导，下级总是反映对自己升迁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级爱听的信息。最高领导人就是根据这些假信息作出决策的。1958年粮食“放卫星”的假信息，使毛泽东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并提出了“少种、高产、多收”的指导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从1958年冬到1960年初，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大量出现。由于得到不全面、确切的信息，在毛泽东认为，这类情况是个别的、暂时的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1960年春夏，在饥荒进一步全面加剧的情况下，毛泽东从省委书记那里得到的还是好消息。1960年2月24日，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中共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在全国推广了贵州省办公共食堂的经验。 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了兴修水利改造农田的大量喜讯，还说“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 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于社员的生活安排问题……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 ，还总结形势无限好的几大表现。 3月5日，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大多数食堂办得很好，一般都有菜园子，大多数养了猪，一部分培养了鸡……” 3月5日，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向毛泽东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88%已入食堂，办得好的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市的汇报整理的报告说：“目前大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

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曾对我说：你站在天坛圜丘的园心大喊一声，一会儿回音从四面传来。你听到的声音还是你自己的声音。天坛这个地方就象征我们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听到的声音都是自己的回声。换言之，他发出什么信息，下面就会送来同类的信息。他不可能听到与他意志不一致的声音。

毛泽东有时相信一些谎言，有时对有些谎言将信将疑，但也没有办法。据毛的秘书叶子龙回忆，开始，毛泽东对“放卫星”的报道是相信的，对于粮食“放卫星”的浮夸报道，毛泽东都逐篇认真阅读，在一些地方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 后来，对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毛泽东看到了。他视察很多地方，尽管事先地方干部做了这样那样的“准备”，毛泽东对一些放卫星、说假话是有所察觉的。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公社领导人说这块地亩产10万斤。毛泽东不信，他指着一位市领导说：“你在吹牛。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种过地的，你没种过地吧，这靠不住，10万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来么！”那位领导说：“他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往里吹风。他们让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泽东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泽东对听不到真话也很苦恼。有一次他当着叶子龙的面，像是自言

自语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说真话？到底为什么？"

据叶子龙回忆："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听到的不完全是实话。"毛泽东找人了解情况，但听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没人讲问题。 为了摆脱假话的困扰，1961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亲自搞调查研究。毛让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分三个组搞调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陈去浙江。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宁乡调查研究了40多天，周恩来去河北，陈云去青浦，朱去四川。没有这些调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

在这个制度下的领导人不仅容易犯错误，而且缺乏纠错机制。没有纠错机制的制度是最危险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纠错机制。而极权制度出现错误后，只有最高统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纠正错误；或者通过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改组领导机构，才能改弦更张。

在是否出现错误和纠正错误方面，制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坏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减少损失，但全局的损失难以发现和纠正。在大饥荒期间，由于主事的领导人素质不同，各省死人严重程度不同，但全国还是饿死几千万。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坏人主事，也会造成损失，但容易发现和纠正。坏人会很快会失去权力。

第二十七章　集体信仰——共产主义宗教

1958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口号铺天盖地，共产主义的狂潮席卷神州。一时，中国的多数人被共产主义理想所振奋。正是在这美好理想的旗帜下，铸成了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但是，这共产主义的狂潮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少数人一时的疯狂。它源远流长，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极端化。为了探索这一理想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从它的源流说起。

一、对千古难题的探索

人是万物之灵，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高级动物，他自私、贪婪、残忍、淫荡，而且无休无尽，在这些恶劣的方面远远超过其它高级动物。但人有同情心，有关爱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这是其它高等动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说人类"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德

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说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人是群居的，有社会性。作为"魔鬼"的人经常和其社会性相冲突，而作为"天使"的人使他们和谐相处。为了维护其社会性，使其不至于相互残杀而自灭，人类的精英们一直想方设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一面，因而出现了种种宗教，种种学说。然而，在这种种宗教、种种学说之间的相互斗争中，人类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那些执行抑制人类魔鬼性的精英们，自己常常变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1958 - 1961年三年间，这种执行者的魔鬼性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人类是智能高度发达的动物，正是智能的创造性才使人类社会从茹毛饮血发展为现代文明。尽管人类的创造是在社会中相互启发、相互激励和相互合作中发展的，但作为创造性的本源还是每一个人的脑力和体力。但是，人的创造性冲动常常与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类的魔鬼性的过程中，同时把个人的创造性抑制了，人类社会就会出现停顿的危机。计划经济制度和与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发挥其创造性，成了千古难题。

人是社会动物，如果没有社会，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和上一个难题相关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把成千上万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组织起来和谐相处？即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组织社会生活需要权威，需要在一些共同的问题上众多的意志服从共同的意志。然而，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一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为"依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马克思语）。控制众人的权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过于强大，就会变成力量强大的魔鬼。毛泽东组织社会的方式就是运用秦始皇遗留下来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权威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恶魔，大饥荒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怎样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这也是人们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难题。

人类社会对上述千古难题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在长达数千年时间内，人类依靠超乎众人之上的最高权威力量来压制人性恶劣的一面。这个最高权威有的在人类之上，如上帝以及种种神；有的在人类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结合。但控制最高权威、防止他不变为魔鬼的难题直到现代才在部分国家中得到解决。

与服从权威相适应的理念是崇尚集体主义，压抑个人主义。崇尚集体、压抑个体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图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渊源。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们克制个人的私欲，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礼"的规范之中。汉字中有一个"公"字，这个字是由"八"和"厶"组成的。"厶"即古"私"字，《说文解字》说："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私为公。" 中国的"公"是和个人相背的，是表示

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国很早就有“天下为公”的说法，其本来意义是“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礼运第九》从“天下为公”出发，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大同”，是中国人几千年梦寐以求的社会政治理想。

人类面临相同的问题，在交通极不发达的远古，相隔万里的异域也会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远隔万里的柏拉图认为：“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他认为，如果你不能为了整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你就是自私的。 柏拉图承认的首要准则是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图主张“共有财产”。在同一书中，他写道：

妻子们、孩子们及其所有的奴隶们都有他们的一份共有财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尽可能地根除各种形式的私人或个人行为。只要这点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为私人或个人的，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家的共有财产。就像我们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视、听和行动－－好似它们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一样。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让他们甚至在相同的时间内，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欢喜或悲伤。所有这些法律因把国家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而更加完善。

为了实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柏拉图主张控制舆论，主张对文艺作品的检查制度。他甚至认为：“治理者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时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话和欺骗。”

在中国，几千年来，是王权支配一切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王权是至上的，是无限的，没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统治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个人都是国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权思想就是专制思想。这种专制思想，由秦始皇构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实体化。这种制度将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所谓“格式化”，就是消灭了个性。

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距今几百年前，对上述千古难题的探索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这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工商文明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梁启超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引述了颉德（即英国哲学家基德，著有《社会进化论》）的话：“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两种理论，使得人类对千古难题的探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

第一条线：集体主义 - 行政整合 - 公有制 - 计划经济 - 专制政治 - 封闭社会；

第二条线：个人主义 - 契约整合 - 私有制 - 市场经济 - 民主政治 - 开放社会。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平行线。这两条平行线不能交叉，却相互感应，在感应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对方积极因素。

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因专制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这两条平等线的极端把对方当成势不两立的异端加以攻击，两个极端还不停地争夺中间地带。数百年来，这两条线是不断地磨擦、碰撞、互补、融合。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自由主义不断得到张扬。

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和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利己主义是和利他主义相对应的。个人主义可以和利他主义相结合，用利他主义来抑制人类的魔鬼性。而利他主义也是出于人类的同情心和关爱心。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相结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圣经》上说，“爱你的邻人”，不要“爱你的部落”），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学说的核心。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它跟它一样如此有力的思想。”波普尔批评柏拉图“简单地把所有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同起来，把所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划上等号。”这就为集体主义穿上了无私的外衣，为个人主义披上了自私的脏外套。

个人主义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了基本原则，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发展，此后成长和发展为西方文明。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

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无缘无故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

个人主义的美德是：尊重和宽容别人和他人的意见；独立精神；敢冒风险；有首创精神；自力更生；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随波逐流；为维护自己的意见不受上级左右（刚直不阿）；对弱者的关怀；尊重别人的隐私，对别人的善意怀有信任；不干涉别人的事务；宽容异端；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这些美德减少了社会交往中的磨擦。

个人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只能在个人能负责任的范围内才是真正的道德。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个人没有权力作决定，谈不上恶和善，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任何人没有权力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博取无私的美名。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是用强力威逼出来的善行，自己决定在自己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为他人做出牺牲，自己对这个决定的后果负完全责任，这才是真正的道德。

“个人自由是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完全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的至上性这一观念水火不容。自由社会绝不能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战争和它暂时性的灾难。”

从17世纪到19世纪，由于商业的发展，欧洲那种有严格组织的压抑个性的等级制度，在剧烈的社会震荡过程中，逐渐转变成一种新制度。在这种新制度下，个人从束缚他的种种习惯和成规中解放出来，个人能够创造自己的生活，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商业规范逐渐代替了等级规范，自由竞争逐渐代替了行政垄断，契约整合逐渐代替了行政整合。一旦除去了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类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个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结果是科学技术的大进步，生产力的大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如是说。

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民主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保护个人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自决权是国家的目的。政府的权力不能无限扩张，必须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这种制度不承认有“内圣外王”的超人，却承认任何一个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两面。因此，不能把管理社会的全权交给任何一个人，也不能交给一个不受外力制衡的独立的组织。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些都是为了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

如上所述，人类是群居的，是有社会性的。除了协调人性以外，还有一个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的问题。在组织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种种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极而言之分为两类：一是自由民主制度，二是专制独裁制度。在二者之间，因民主和专制的程度不同，有着种种不同的情况。专制独裁制度通常是以代表大众利益的面目出现的。专制独裁制度的统治者总是宣称自己代表全民利益。

从人的生理本源上看，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人的动物性。看一看某些具有社会性动物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它们的领袖取得权力靠的是强力征服，维护权力靠的是强力镇压。其征服和镇压是极其残酷、极其血腥的。猴群如此，蜂群和蚁群也是如此。随着人类的进化，人性的成份逐渐增多，动物性成份逐渐减少。政权更迭方式和执政手段逐渐人性化。专制制度逐渐被民主制度取代。

二、共产主义探源

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些危机的概括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一是贫富悬殊，工人阶级贫困化，造成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二是个别资本家占有巨额的生产资料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造成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引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三是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谎言和真理，泪水和微笑，良心和尊严都可以变成商品出卖。金钱淹没了真理、正义和道德，埋葬了融洽与和谐。这些危机造成不停息的社会动荡，造成不停息的冲突和战争。

对于这些弊端，自从资本主义出现那天起，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都用各自不同的理论武器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然而，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源泉大都来自古已有之的集体主义思想。

因此，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思想，在其发展中找到了新的社会实践依据。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它的现代形式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一些天才人物作出了重要贡献。

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1478－1533）出版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有益且有趣的金书》，这就是以后人们简称为《乌托邦》的传世之作。这本不到10万字的小册子，使托马斯·莫尔名垂千古。莫尔在这本小册子里，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岛国，在那里废

除了私有制度，一切财产、甚至包括个人消费品都属于全民所有。为了杜绝私有观念的产生，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签调换一次。金钱被取消，没有金钱流通。那么黄金干什么用呢？“粪桶和尿盆，都是金银铸成的”，“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金的或银的”。“可耻的罪犯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还有一项金冠”，“金银变成了可耻的标记”。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和手工业，人人参加劳动。产品按需分配，设立公共食堂。但保留着奴隶。《乌托邦》的问世形成了一个的思想流派，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起源。

1602年，意大利人托马佐·康帕内拉（1568－1639）发表了《太阳城》。这是他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27年的囚禁中写成的著作之一。在“太阳城”里，居民建立了公社制度，由公社组织生产和分配。在那里，没有贫富之分，没有私有财产，一切产品都由公社的公职人员分配，人人都能从公社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由祭司掌握政权。居民在集体食堂里用餐，食谱由医生安排。劳动是全民的义务，人人热爱劳动，劳动光荣。“太阳城”比乌托邦前进了一步，在那里没有仆人，没有奴隶。

18世纪末，法国人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提出了国民公社。国民公社实行财产公有制。原国家的财产、私人的财产、耕地和未开垦的土地等等，一律归国民公社所有。参加国民公社以自愿为原则，依靠公社的优越性，使私有者放弃财产加入公社。人人无条件地参加劳动。福利由大家享受，平均分配。为防止盲目生产和产品过剩，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19世纪初期，英国人罗伯特·欧文（1771－1858），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法国人夏尔·傅立叶（1772－1837）使社会主义理想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把他们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提出工业资产和其它资本实行公有制，并且建立计划化社会。

所有的社会主义学说都认定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都主张消灭私有制，有的主张取消商品、货币，采取直接分配。马克思继承了在他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并加以发展。人们说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哪些方面变成了科学呢？恩格斯说：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的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

由此看来，马克思把空想变成科学，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对为什么要实现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指出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即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克思全盘接受了从莫尔到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消灭货币。连他的关于“用黄金修建厕所”的说法也是来自莫尔的《乌托邦》。他对这些核心内容并没有进行多少科学的分析。例如这些设想是否可行，怎样实行，实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他都没有进行科学分析。但是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理应如此”，马克思认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后者是历史的逻辑。马克思用德国人特有的严密的逻辑把这一理想妆扮起来，使社会主义由赏心悦目之花变成了历史必然之果。

这个合乎逻辑的理想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答：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有了资本和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愈来愈多地变成了无产者，并且资产者的财富愈是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惨和难以忍受；第

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范围，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动。因此，现在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这些，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纯”越好的理论根源。“一大二公”的思想源远流长，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新中国建立以来，动用了各种舆论工具宣传全民所有制的理想，批判私有制的罪恶。成千上万的人把消灭私有制当作自己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这么美好的理想当然早一点实现比晚一点实现好。从这里可以找到毛泽东追求“一大二公”的思想根源。

近代实践证明，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国有财富的执掌者必然成为国家的主人。国有人的经济不仅低效率，而且是和专制制度相匹配的。消灭了私有制，必然为专制制度奠定基础。

这个理想的第二项内容就是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

消灭了私有制以后怎么办呢？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的。这就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各个产业之间、各种产品之间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达到平衡。消灭私有制以后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经济危机就会消除。

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的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计划要‘具有立法的职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应具有立法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

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

后来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是，在资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人不可能准确、及时地认清市场变化并及时对经济活动做出正确、及时的指导。所谓计划指导，实际是一连串的错误指导。在不断的错误指导中，巨额投资付诸东流，大量的财富被浪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劳动者，每一家企业，都是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按一个指令运转。因此，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扼杀。停滞、匮乏和贫困也就必然。

既然全社会按照一个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计划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噪声”加以消灭。所以，计划经济体制和民主不相容，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极权制度。

这个理想的第三项内容就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是指“消费资料”，因为生产资料已经公有了，没有分配问题。

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

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

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排除了其它分配形式。如按资分配。因此，把拿利息当作剥削。中国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资本家把工厂交给了国家而拿很少的“定息”。但是即使如此，后来也被当成剥削的根据而一直受到政治歧视。

按劳分配，谁来分配？实践的结果是：分配者成了主人，接受分配的

人成了奴隶。分配者可以随时剥夺接受分配者的生存资源。干部在公共食堂里随意对农民“扣饭”，就是分配者控制和奴役接受分配者最典型的一例。

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就能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经济危机将终止，剥削、阶级和阶级的对立将消除，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人们将从金钱的奴隶变成社会的主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将变成平等的互助关系。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然而，这个美好的理想一经实践，就出现了和他们初衷相反的结果。

这个理想的第四项内容，也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推翻资产阶级以后怎么办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

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至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根本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的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

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马克思主义者设想，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当时他们没有说这个“过渡时期”有多长。从苏联和中国的实践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很长很长。共产党执政时期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为了实现“全体一致地嘻笑怒骂”，“对意识形态的全面专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实践证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领袖专政。专政对象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而是不愿意效忠领袖的人。

由于从古代的集体主义思想到近代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针对人的魔鬼性的，都针对社会不平等种种社会弊端的。因此，自古以来，这种思想体系就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处于下层的百姓是它的忠实信众，一些同情下层群众的知识分子，也极力宣扬它。从康有为到李大钊，都主张“大同”和“共产”。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个美好的理想，以各种通俗的或深奥的形式，向各种年龄、各种不同文化水平、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灌输。虽然在实践中，有些理想暂时不能实现，但作为未来的奋斗目标是不能动摇的，中国共产党还把对这种信仰是不是坚定，作为考察党员、任用干部的重要条件。

这样，共产主义信仰就成了1500万共产党员的集体信仰，还通过政权的强制，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都信奉这个集体信仰。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它的党员：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其实，科学和信仰是不相容的两回事。信仰通常中坚定的，而科学是要不断地发展和扬弃。信仰是心灵的，而科学需要实验去验证。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学性。

人类不能没有信仰。只要你不对人们进行强制，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不管什么样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产主义信仰变成了全民信奉的集体信仰，并且用政权强制所有的人、动用全国资源实践这个集体信仰，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一个人如果只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务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为的目标和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共产党的舆论控制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一大批人成了共产主义虔诚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单纯幼稚的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们，对共产主义怀有强烈的宗教感情。

从古今中外的教派斗争中我们得知，凡是怀有极端宗教偏执的人们，通常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异教徒。在政教合一的国度里，必然如此。于是就出现了大跃进年代（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的残酷迫害。

三、中国为什么走上了极权主义

最早将社会主义一词译作中文的是黎昌庶的《西洋杂志》，1877年黎昌庶随郭嵩焘出使英法，接着又转任德国和西班牙的使馆参赞。《西洋杂志》是他对欧洲的了解。这本书中两次提到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将Socialist一词译成“平会”，“会”是“会党”的意思，即当时中国民间结社。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平”字，与中国“均贫富”的传统思想有关。稍后，西方传教士的一些中文著作对马克思的一些片断介绍中，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贫”、“均富”、“富民”的安民学说。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中国人蔡尔康节译的英国哲学家基德（梁启超译为颉德）的《社会进化论》，将译著命名为《大同学》，用中国的“大同”思想来理解、介绍社会主义。１９０２年１０月，梁启超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一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克思。提到马克思的“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 。不过，他认为马克思这种抑强济弱的思想，中国古已有之。他把王莽改制的作法也与此并列，还说：“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

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都曾著文介绍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称赞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认识各异，也不打算在中国实践。宋教仁认为共产主义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等人本来是想把中国建成一个宪政国家，但当时相当多的人把那场革命当作一场种族革命。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旗帜上，“驱除鞑虏”放在第一位。“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反对“异族”统治是宋、明以来的主流传统。

当年在武汉三镇经历过这场革命的老人回忆，当时不叫“辛亥革命”，而称“兴汉灭旗”，即振兴汉人，消灭旗人。当时杀戮了不少旗人。我的家乡距武汉只有100多公里，我在童年时（当时距辛亥革命仅30多年）多次听到这样一个传说：为了区别汉人和旗人，有些革命军抓住俘虏就让他念“六百六十六”，念出“陆伯陆司陆”的就放人。如果念出“溜百溜十溜”，最后一个“溜”字还没出口，就已人头落地。

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有人在明陵举案祭奠，以政权归汉来慰告朱家王朝在天之灵。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

这样狭隘的革命成功以后，就很难有制度创新了。大清帝国的旗号换上了中华民国的旗号，清帝国的专制制度以及它的小农经济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以及清帝国的种种社会问题，几乎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中华民国的旗号之下。帝国的根基和灵魂并未随着满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国进入了专制帝国崩溃后军阀混战的局面。

在混乱中，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不断地寻找救国之路。二十世纪之初，达尔文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等源于西方的种种学说纷纷在中国登场，各自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解释，开出各自的药方，争取各自的信徒。

本来，英美等国家的思想、制度，也就是我上面所说人类文明的第二条线，那时已经介绍到中国。当时，由华盛顿、杰弗逊等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制度，在不少国家已经成为现实。正如陈独秀在晚年（1940年）所说的，这套制度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了的”。

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西方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却从苏联那里接过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之路呢？这不是少数精英的选择，而是历史的机缘。

首先，西方思想是和毒品鸦片同时进入中国的，是靠洋枪和大炮打开国门的，是与割地、赔款的耻辱和圆明园的废墟相联系的。这些，势必在中国人中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近几年来，余英时等学者提出了与毛泽东这个看法不同的见解， 但是，中国和西方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不同文明的冲突必然会发生的。在西方野蛮性的市场扩张和两种文明冲突中，强者一方采取了令人遗憾的血腥、残暴、掠夺手段，当时的中国人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机。在外强入侵面前，势必民族独立压倒制度创新、主权压倒人权、集体主义压倒个人主义。

其次，中国专制制度统治的时间过长，在中国没有像西方产业革命以后的那种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在英国，16世纪资本主义就有相当的

发展。而中国，专制制度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民间经济没有发展的余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出现比欧洲晚了一两百年。1872年，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1883年出现了股份制。1883年至1887年，只有39家股份制企业。这些企业多数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批准的，重要的企业是由皇帝批准的。但是，这些企业都窒息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中。在封建专制条件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起来，也不可能出现民主制度的主体阶层——中产阶层。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重农抑商”，把商人视为“四民之末”，市场经济是重商经济；儒家文化强调“修身”，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不易吸收英美文化，而便于吸收马克思主义。吸收英美文化更重要的阻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王权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意识。在广大底层群众中，形成了的“非参与意识”。人们畏惧王权，又崇拜王权，只能伏在君主脚下当顺民。在王权的束缚下，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没有对于自身权利的自觉。政治是极少数人的事，大多数人甘心作王权统治下的良民。长期的专制制度造就了这种政治文化土壤，这种土壤又培育着专制政治。

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化土壤，对西方民主制度有一种自然的排斥。而来自苏联的集体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较多的亲合力。

第四，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工人失业，贫富悬殊。当时，苏联和美国比较，显出了更多的优越性。1929年经济危机时，不少西方知识分子也赞扬苏联的制度。这种情形，对正在选择制度的中国显然会发生影响。

对于长期抑郁在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股沁人心肺的新鲜空气。它那广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使他们看到了远比儒家学说所描绘的更加明晰、更加精确、更加可信的图景。这个图景不仅有理想的魅力，有扶贫济困的正义之光，还给除统治者以下的各个阶层以巨大的利益诱惑。仅这些就会吸引众多的人为之奋斗终生。

按照列宁的学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再利用政权的力量，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可以集中国力实现超越式发展，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当时对苏联建设成就的宣传资料已经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实践的佐证。这种前景，对于处于落后挨打的中华民族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实践中找到了可行的证据。毛泽东把农民起义当作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把太平天国这个近似邪教的组织当作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式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流派称为“第二国际”（现代为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主张非暴力革命，主张民主制度，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逐渐演生出社会主义。列宁称他们为“修正主义”，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暴力革命，主张建立有严密组织、有铁的纪律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党，主张用暴力剥夺有产者，取得政权以后，用行政强制推行经济的超越式发展，用暴力镇压反对者。因此，从苏联引进来的“主义”，更是带有专制的血腥。在中国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又把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翻译成具有中国乡土气息的思想体系。这种中国乡土气息不仅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而是承袭了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些价值观，用农民起义的方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体制推行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王权思想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躯壳在中国还魂。“五四”运动，倡导民主、科学、人权，结果事与愿违，引进的却是反民主、反人权的思想。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终成了这样一个结果：苏联的专制主义和中国王权思想的叠加。

于是，人类文明的第二条线与中国社会擦肩而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中国的“国教”，毛泽东的极权制度在中国确立。三年大饥荒以及其它种种“人祸”接踵而来。

这一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历史逻辑中发生的。

第二十八章　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大事，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没有反右斗争，就没有“三面红旗”；没有“三面红旗”，就不会有大饥荒；没有大饥荒，就没有反右倾运动，就没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极端，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

1962年初，面对几千万人饿死、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国高层的不同意见又一次浮出水面。如果说庐山会议毛泽东的主要对手是彭德怀，那么，现在毛泽东的主要对手则是刘少奇。毛、刘之间的斗争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一直持续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一、在七千人大会上高层出现分歧

刘少奇在1958年紧跟毛泽东，说了很多比毛泽东还要狂热的话。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认识的？我曾就此问题请教于刘少奇的秘书姚力文。姚回答说，可能是1961年回家乡调查，也可能更早一些。他1959年秋后就看到了生产力的大破坏，那时他对形势应当是清醒的，也许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也许是为了“党的团结”，也许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还是和毛泽东唱一样的调子。

然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唱出了和毛泽不一样的调子。

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没有得到切实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11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五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克服困难。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事后，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的报告。1961年11月22日，刘少奇看完报告初稿后，找到起草小组提出修改意见。刘说，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够接受教训。（二）这几年出现的问题，中央要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各省都有这样的事实。（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来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

这个报告是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经过多次修改后逐渐清晰起来。

1962年1月8日和9日，刘少奇分两次（先送第一、二部分，后送第三部分）将报告的第一稿呈送给毛泽东。9日23时，又把第二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给毛泽东（第三部分还没有改完）。但这时距开会只有一天。毛9日一夜未眠，看完了前两部分。10日上午10时毛作了批示，建议会议推迟3天作报告。在这三天讨论农村基本核算位和别的问题。但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他说第三部分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根据大家意见作修改，然后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成为正式报告。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定为三级（中央、大局、省、地），后来毛泽东建议扩大为五级，即增加县级和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领导人。参加会议的有7118人，所以通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于1月11日正式开幕。以小组会议形式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即上述报告）。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都把国家计划以外的经济活动都当作“分散主义”加以反对。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 七千人大会开始就把反分散主义作为重点。但地方的代表们对分散主义有不同意见。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也有多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

由分散主义讨论到大跃进以来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争论越来越激烈。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的问题时，大多数代表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反右倾以后，多数人都是这么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代表说，“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了粮食、市场紧张？西北地区的代表对“三面红旗”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质疑

代表们对刘少的报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见，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庆施则从左的角度对稿子十分不满，说“越看越没劲”。毛泽东提出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强调，委员会内可以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三不主义”——不挂

账、不打击、不报复，但是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 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等。

在讨论这几年的缺点错误的责任时，起草委员会出现了争论。1月18日，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讲到这里，邓小平插话说：毛主席说过，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 周恩来从维护毛泽东的方面提出了问题，他说：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着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力挽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发言不久，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讲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报告经过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泽东看过后，表示“赞成这个方向”。1月25日，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26日下午，毛泽东决定，这个报告作为书面文件发给大家，27日下午开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刘熬了一个通宵写了提纲，提纲在大会前经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下午2时开会，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报告。报告长达3个小时，其中有些内容是毛泽东最不爱听的。

第一，认为“大跃进”不仅没有进，反而倒退了许多，造成了一个大马鞍形。讲话还对当前经济困难作了较严重的估计。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的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也难以上升……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

第二，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是“三份天灾，七分人祸”。一是天灾，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还有一条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对群众加以说明。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第三，成绩和错误的比例用“三七开”代替了毛泽东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过去我们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方还可以这样讲（毛插话，这种地方少），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翻箱倒柜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种人势必陷入被动……

第四，认为对这几年的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当负起责任。

第五，认为“三面红旗”还要经过实践考验。“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能进一步作出结论。

刘少奇在讲话中，毛泽东有不少插话。当刘少奇说到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饿了两年饭，毛泽东插话：“有不少的人害过

浮肿病。”毛泽东只承认“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不承认饿死人。更不承认大量饿死人。而刘少奇对饿死人看得很重。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口头讲话显然是不满意的。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在同阿尔巴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谈话中说：“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有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当时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经看出一些问题。” 毛泽东当时看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可能是从刘少奇的报告中看到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原计划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可是29日下午代表们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有一肚子气。毛泽东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会议接着开下去。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他十分坚决地、充分地、并且以空前的高调肯定了“三面红旗”，还说大饥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说“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他不仅把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中的责任洗刷得一干二净，还对毛泽东极力神化。他说：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就会走得少，今天的困难就会小得多。

我个人几十年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几十年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讲话时正是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听了这些话，一定会有一种“患难逢知己”的感觉。他当时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3月20日，毛泽东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讲话稿以后，立即批给田家英和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

高兴。”

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讲话没有正面讲大饥荒问题，却大讲民主集中制。这是毛泽东阐述民主集中制最全面的一次讲话，似乎这几年出了问题是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的结果。毛泽东把“民主”和“集中”两个对立的东西结合起来，强调“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破坏呢？因为集中是有制度保证的，而民主却没有制度保证，它只是领导人的恩赐。民主是对当权者的约束。约束总是不舒服的。作为个人，总是对上要求民主，对下要求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就是集中，它本来就是专制制度的一张遮羞布。在这次讲话中虽然也讲民主，但更强调集中。他说：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从林彪和恩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可知，毛泽东讲集中，还是要集中到他那里。正如林彪说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来所说的“现在要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

毛泽东这篇讲话虽然没有对刘少奇没有正面回击，但还是用大量篇幅对“三面红旗”作了论证。这表明他对刘少奇说的“‘三面红旗’还要经过实践考验”的话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会对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起了促进作用，会上也对中央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但始终守住两道防线：一是对“三面红旗”完全肯定；二是对庐山会议的案不能翻。

七千人大会决议向各省传达以后，基层干部不满意，在学习讨论这些文件时，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意见。甘肃省在讨论中，省委党校的干部说：“硬说成绩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饰太平。我国六亿人有五亿人搞饭吃，还没有粮食，怎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过去觉得甘肃问题严重，现在才知道问题有普遍性。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问题，其损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卫生厅的一个同志说：“几年来不仅没有成绩，反而把事情搞坏了，不仅物质上搞坏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坏了。”省财贸办公室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不仅

区域广，而且时间长，因此，不能说中央的指导思想没有问题。”《甘肃日报》印刷厂的同志说：“听了报告后好像中央没有错，主要错误是下边执行中的错误，感到中央对缺点错误检查不够，从根本上找问题少，从下面找问题多。”有人在发言中直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几次会议和一些文件不妥当，对下面影响很大。如，北戴河会议说共产主义看来为时已经不长了。还提出苦战三年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说中央政策完全对，我有怀疑。敦煌县搞成一个人民公社，说这与一大二公无关；大办钢铁要指标翻一番，秋收作物烂在地里，甘肃如此，河北也如此，这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省粮食厅解仙清同志说：“毛主席说过粮食多得吃不了。这没有调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样，晚年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轻工办公室主任杜西林说：“我听到老百姓骂毛主席，说主席听奸臣的话，不听忠臣的话，还说：毛主席钻到哪个洞里去了，下面发生这么多问题，他知道不知道？”党群系统的干部说：“甘肃饿死人，毛主席不会不知道。全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

这样的简报各省都有。毛泽东看了这些简报会有什么想法？他感到有一股力量，有一股使他畏惧的力量，如果不强力反击，他的地位就很危险。

七千人大会显现出中共高层的严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是全面肯定，还是持怀疑态度。具体分歧有以下几点：第一，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主要是人祸。毛泽东有时也说过人祸，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区，即“三分之一”地区。第二，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和对几年以来形势的估计。刘少奇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的估计远重于毛，对形势的估计没有毛那么乐观。第三，对大饥荒责任的看法，刘少奇、彭真等，比较看重毛泽东的责任；而林彪、周恩来等，为毛泽东开脱和洗刷。

危难之中见真情。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谁支持他，谁反对他，他是会深深地记在心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再一次看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对四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打倒谁”心里初步有了底。

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进一步触怒毛泽东

不少文献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实际上，这次会上，明显地加深了中共高层的裂痕。一散会，毛泽东就去武汉了。刘少奇又召

开了“西楼会议”，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

“西楼会议”是1962年2月21日召开的，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址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陈云2月26日的讲话中把严峻形势归纳为五个方面：其一，农业近几年有很大幅度的减产；其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不相适应；其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其四，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刘少奇说，七千人大会上“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西楼会议以及2月26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和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进一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3月14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常委多数人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计划的部署。

鉴于前三年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怕把困难估计过重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认为“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基础不巩固，在困难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转坏。”他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慨，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 毛泽东曾要求他们不要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刘却一再要求要充分估计困难。是不是刘有意和毛作对呢？不是。

在中国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重要物资统收统配。“爱哭的孩子多吃奶”，为了从中央财政治和中央统配物资中多分一块蛋糕，各地经济业务部门总是向中央业务部门叫困难。就是省委

第一书记，在毛泽东面前说形势大好，但向中央业务部门要东西，也是寸步不让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毛泽东面前说粮食够吃，但为了减少四川省的征购任务，曾和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多次讨价还价（见本书“天府饥魂”一章）。所以，主管实际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总觉得困难很大。毛泽东不管这些具体事，听的都是各省第一把手的意见，感受到困难的压力比刘少奇、周恩来要小一些。“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征询过一些领导干部的意见，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

对形势的估计不同，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其一，摆脱大跃进的思想束缚和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点放在恢复上，争取三到五年把国民经济由大跃进的状态调整到协调、持续、稳定的状态；其二，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1961年已经减少了1000万，1962年再减少1000万。其三，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降低生产建设的高指标；其四，恢复农业生产，搞好市场供应；其五，抑制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五月会议”上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 邓子恢主张适当地扩大自留地。对各地的包产到户，实际也是采取默认的态度。

1959年春天，采取了一些“退回去”的措施，庐山会议后全都否定了，这一次“退够”的措施，毛泽东会同意吗？对一贯主张“冒进是马列主义”、“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要积极平衡，不要消极平衡”的毛泽东来说，他能容忍刘少奇等人的调整吗？刘少奇心里没底，还是要请示毛主席。

1962年7月，毛泽东从炎热的南方回到凉爽的北京。陈云立即拜见毛泽东，系统地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云感觉毛不反对这些意见，只是在考虑。毛很快通知刘少奇见面。毛正在游泳。刘少奇赶到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泄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平静下来向毛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继续搞下去。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松下来，以为雷霆已过。

2003年9月25日，曾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书作者谈了一件与此有关的事。西楼会义后不久，陈云到了上海。让陈国栋、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务，陈云说：你们到一些省去看看，农村真实情况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里干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发表意见，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粮食产区，看到的情况是，集体的大田几乎荒芜，而自留地里粮食作物长势非常好。农民是靠自留地吃饭的。他们到上海向陈云谈了所看到的情形。陈云说："看来是农业集体化是搞坏了。但这个问题现在不好说，政治风险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农业集体化了。"陈云告诫他们几人回北京以后什么也不要说。还是陈云亲自向毛谈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七月陈云向毛汇报的那些事。

并没有像刘少奇预计的那样雷霆已过。一旦度过了难关，毛泽东就重新发难。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清算了"1962年的右倾"这笔账。

毛泽东之所以对1962年的调整耿耿于怀，是因为他把与他不同的看法视为阶级斗争，视为要推翻他。这种看法终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来了。

三、八届十中全会祭起"阶级斗争"的杀手锏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国共产党的上层有着不同的看法。毛泽东总是低估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对当时的形势的估计也较为乐观。持毛泽东这种看法的有柯庆施、林彪等后来被称为左派的干部。而以"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为代表的一批干部则对困难的估计比较严重，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

当然，这种不同的估计，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也会不同。

在解决困难第一线工作的陈云对这种不同的估计深有感受。他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上说："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农业恢复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计。""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

如前所述，这种对形势的不同估计，有着工作岗位不同的原因。当然也和各种不同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不管怎样，对形势不同的估计，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过民主讨论或投票方式来决定政策。在专制制度下，处于最高权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见不好贯彻。而对1958年以来困难估计严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红旗"的重要根据。毛泽东对此忧心忡忡。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采取了的一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开放了自由市场，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远。如包产到户大面积推行。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把这些压回去了。由于饥饿，到1961年，又大面积推行起包产到户。1962年年中，全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总数的20%，安徽达80%，甘肃、浙江、四川一带地、县超过70%。

1961年到1962年邓子恢就曾多次主张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五月会议"上及其前后，邓子恢曾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主张包产到户的讲话。如4月11日，他在广西桂林听取地区负责人汇报时说："单庄独户，离村庄远的就包产到户，或者让他们单干吧。这样有好处，不要有顾虑，怕说单干，怕说右倾，什么都要实事求是。" 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关于安徽省"责任田"的汇报。中共中央华东局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支持和批评的各占一半。邓子恢认为安徽省的"责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错误。邓小平发言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或以试试看。" 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七届三中全会代表时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也说过"刘伯承同志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陈云7月向毛汇报时，也讲过重新让农民分田的事。如本书前面所说的，正是这些"倒退"才是走出饥荒、减少死亡最为有效的措施。但这和毕竟和共产党的理想相悖，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在当时毛泽东的忧虑中，还有一股"翻案风"，其中主要是彭德怀翻案。"七千人大会"决定给这几年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但有一个界限，对庐山会议上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不能平反。刘少奇

在“七千人大会”1月27日的口头讲话中，特别讲到彭德怀问题。后来收入《刘少奇选集》时，删去了这一段话。这段话大约1100字左右，其主要内容是：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不是因为彭德怀写了那封信。信中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庐山会议其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的颠覆活动有关。他阴谋篡党。等等。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会后他得知刘少奇的这些诬陷之词以后，倍感委曲，不得不奋起为自己申辩。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写作，他于1962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送上了一个长达8万字的申诉材料（后被称之为“八万言书”）。这个“八万言书”不仅否定了刘少奇上述诬陷，还把庐山会议以及其后对他批判和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彭德怀翻案，这是毛泽东很不愉快的事。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其它方面也一改过去紧张的状况，开始出现松动和宽松。如对冤假错案大规模的甄别平反，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让步，对民主党派有所尊重，等。在这些松动中，出现了一些“过头”情况，使毛不快。如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等讲了一些尊重知识分子的话，陈毅还提出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周、陈的“脱帽加冕”引起了上层的不同看法。主管意识形态的陆定一强烈反对“脱帽加冕”的说法。直到1979年，陆定一才在这个问题上认错，说：“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是“左的，所以是错误的。”

大跃进失败以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认为，内忧已经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1962年2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以《党内通讯》的形式送上去的。这封信有五点内容：1）对外政策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他不同意说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有和平共处的世界和平；2）要尽可能避免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主动做好巩固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的工作；3）我们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要避免朝鲜式战争，不能因为别国提出要求，再派军队去那里参战；4）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要打开目前的僵局，要高举中印友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争端；5）支援各国人民革命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不能公开号召别国人民起来革命，不干涉别国内政。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了以

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大会快结束时，有几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和讲话不满意。毛泽东接到反映这个情况的电报后批评说：这样做“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康生乘机到处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并鼓动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到毛泽东那里告王稼祥的状。毛听了刘宁一的汇报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与此同时，有人把国内的一些调整措施归纳为“三自一包”（自由种植，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统称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

“七千人大会”及这以后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毛泽东十分不快。他身在南方，却密切注视北京。他感到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央，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都正在偏离他的路线。使毛泽东引以警惕的是，刘少奇讲话中还流露出的一股“秋后算账”的意味。1962年3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刘的这番话使毛联想到赫鲁夫对斯大林的清算。毛泽东对北京所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酝酿着反击复辟。

从统购统销到农业集体化；从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到反右斗争；这一系政策严重侵犯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因此，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始终有一股反对力量。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高压下，这股反对力量只是一股潜流。身居权力最高层的毛泽东，是会感受到这股潜流的压力的。1958年以后，几千万人饿死，这是一桩非同小可在大事。“三面红旗”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使党内对“三面红旗”持怀疑或反对意见的力量成了对毛泽东的离心力，而且离心力有日益强大之势。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对毛泽东的离心力和社会上历来存在的的潜流有合流之势。毛泽东感觉到，他身边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在聚集，一股与他敌对的力量在聚集。一贯奉行“斗争哲学”的毛泽东，随时准备挑起新的斗争。

他选择了八届十中全会这个机会。

八届十中全会是在北京召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4天（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但预备会开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预备会之前还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的调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

7月25日开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问题。8月6日，毛泽东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 。他又在8月9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会议主题就转为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黑暗风”是指“西楼会议”、“五月会议”以及前后与其相似的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在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多次讲话说：“有些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月5日）“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8月6日）“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两年了。”“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压力总是有的。”（8月9日）“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8月11日）“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8月15日）“讲困难、讲黑暗已经两年多了，讲光明不合法了。”（8月20日） 从毛泽东的这些言论来看，他根本没有接受大跃进以来的教训。1958年冬以后他虽然也做了一些纠正错误的工作，但对这几年的“倒退”措施一直耿耿于怀。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随。刘少奇不得不对“五月会议”进行解释和自我批评。

这次会上对“单干风”的批判是很严厉的。8月5日毛泽东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8月6日，毛泽东讲话强调：“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8月9日，毛泽东插话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批示上严厉批评了邓子恢：“动摇了，对形势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了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

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 一些高级领导人也揭发批判了邓子恢。随后，撤销了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给了他一个“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虚职。

批判“翻案风”的重点是彭德怀。他6月上交“八万言书”以后，8月22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彭德怀两次上书，被认为是向党新的进攻。8月5日，毛泽东说：“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9月1日，毛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 9月3日，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布置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拿到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有批判彭德怀的内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谭政、邓华、甘泗淇、洪学智也都受到批判，他们都被迫作了检讨。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个专案组以贺龙为主任。

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同时围绕小说《刘志丹》批判了习仲勋等人。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有了这块根据地，红军长征才有了落脚点。创建这块根据地并能活到建国以后的有高岗、习仲勋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新秩序”，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抛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高岗站在毛泽东这一边，积极搞农业集体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准备作为接班人取代刘少奇 。毛私下同高岗谈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的话。因此高岗反对刘少奇，并把毛和他谈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当时力量对比下，高岗没有斗过刘少奇，也使毛被动。1954年，毛就把高岗抛了出来作为替罪羊，而且和高岗没有任何关系的饶漱石捆在一起称为“高饶事件”。在这场斗争中，高岗被打成反党分子愤而自杀身死。 《刘志丹》的作者是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说第五稿印成样书送审。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他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看到样书后不同意发表，一面打电话让《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停止连载，一面告诉康生。康生看后说这部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9月8日，在西南组会上，阎红彦首先提出《刘志丹》问题，他说：在当前形势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 。批判“翻案风”又多了

一个靶子。实际上，习仲勋只是审阅过书稿，提出过修意见，而且反对写高岗。但是在批判“翻案风”时，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几位陕北根据地的干部打成了“反党集团”。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个条子，并且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以康生为主任。

北戴河会议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他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一系列的讲话，最后通过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表述如下：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死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种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刘少奇或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或是出于其它考虑，他对毛泽东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立即紧跟和附和，有些言论，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那里知道，这些话，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也正是为刘少奇设下的坟墓。

1962年10月后，各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

斗争平地掀起，接着就是“四清运动”。

四、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则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

为了指导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三个文件：1963年5月的《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1963年9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物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1965年初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这三个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一个比一个严峻。《二十三条》又将“四清”的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比原来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在城乡同时进行。

《后十条》是在《前十条》的基础上修订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刘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强调整个运动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组领导，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由工作组对他们进行清理。在全国各地都派出了庞大的“四清”工作队伍。在校的大学生和部分军队干部都进入了“四清”工作队。当时我也作为北京市委工作队的一员，赴延庆县大柏老公社团山大队搞了8个月的“四清”。我参加“四清”时，《二十三条》已下达，这个文件强调“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下乡以前先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总想在村里查出一个“反革命集团”，设想村支部书记是一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农村搞“四清”本来是出自毛泽东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在农村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个说法，通常以为是毛泽东1960年12月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来的，实际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郸的一个报告中就出现过。 当时刘少奇对河北省农村问题很关心，“民主革命不彻底”可能是刘少奇先提出来的。在农村搞一场阶级斗争，把“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的地方夺回权力，这是毛刘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刘在“四清”中出现了分歧，最终导致二人决裂。从表面看，他们二人的分歧表现在对“四清”打击目标、斗争性质上和具体操作实施等方面，从深处看，很可能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权力上升且咄咄

逼人，不能容忍刘少奇对他不够尊重。

研究“四清”运动，不能回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原来定为一类队（即最好的队）。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这个大队“蹲点”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他们进村时，不是采用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而是像进了敌占区搞秘密活动一样，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通过五个月的“蹲点”，她发现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政权”，党支部书记吴臣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 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开的一次会上讲了她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受到一些人的鼓励。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受挫，刘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势，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有时忘乎所以。6月到8月，他带着夫人王光美在十多个省市以“桃园经验”为题作巡回报告。8月1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中央党、政、军机的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报告。这次报告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参加会议的李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在刘少奇没有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他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写道：退出会场时，他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 “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 刘少奇在讲话中不仅吹捧王光美，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王力在他的回忆中有记述：“他说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这个报告整理一下。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掉了。后来突然少右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王光美的报告不发了。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是李雪峰。” “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毛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的。可是刘少奇8月1日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9月1日，在刘少奇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桃园经验”，转按语中，强调“桃园经验的的“普遍意义”。

10月12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并提出了对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10月24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天津市委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小站“四清”工作组是陈伯达领导的，参加这个工作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纪等高级干部。这个报告说天津南郊小站地区的政权是由“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两面政权”。刘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夺权”经验。

11月12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即“后十条”），这个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抛开原来的领导班子由“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来实行领导。等等。

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中，以转发《桃园经验》和《小站报告》影响最大，事后证明，这是“四清”工作组制造的冤案。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使“四清、运动向左倾错误发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错案。不仅一村一社，还在贵州省搞“四清”，把“桃园经验”推广到贵州省。

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南、贵州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刘少奇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刘少奇在昆明的报告中，点名批评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所以，贵州省的“四清”运动非同小可。

贵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去昆明开会的领导们带回两大本文件：刘少奇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从10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一律夺权”。在一两个月时间内，,贵州的大批干部有的停职，革职，有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的甚至逮捕，关进监牢”。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说的“1964的形左实右”的来由。

但是，从王光美35年以后的著文说，这些不全是刘少奇的错，毛泽东也脱不了干系。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五个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边。”王光美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头汇报了“四清”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后即《桃园经验》。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以示推广，并让王光美到处作报告，还让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

王光美在书里只讲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并由毛批转全国，这也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是刘少奇很欣赏《桃园经验》。1963年8月19日，刘少奇亲自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在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由于是推荐自己夫人的报告，刘少奇这封信先是抬出“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后面又不伦不类地一连用四个“中央”，看来措辞很艰难。毛泽东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刘少奇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是符合毛泽东当时的看法的。1960年12月，毛泽东就认为大规模地饿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即“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没有肃清。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造成了农民大量死亡。解决的办法就是“民主革命补课”，即进一步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根据这个精神积极行动。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就送上报告。报告说“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报告介绍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做法：“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既是民主革命补课，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组织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组织处理要坚持初步处理和最后处理‘两步走’的做法，贯彻执行狠、准、稳的方针。”“建立与健全‘司令部’，组织强大的整风队伍。”“把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生活安排密切结合起来。”1960年12月31日，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 从信阳地委的报告看，信阳等地的“民主革命补课”，和后来四清运动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为三类，问题最严重的为三类。三类社有多

少？毛泽东有时说有20% ，但更多的时候说“有三分之一”。 毛泽东在1960年就有这种“三分之一”的判断。1960年11月15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的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他要通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把权力从“国民党残余”的手中夺过来。

从1960年到1961年，针对农村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全国各省都召开“六级干部会”，农村大搞“整风整社”。通过这种政治运动的方式，对1958年以来的“五风”进行清算。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960年5月21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运动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账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等。陶铸的报告获得毛泽东赏识，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说“广东省委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

1960年12月24日 - 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把农村干部分为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在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头脑不清，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对于前三类，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六级干部会和“整风整社”中清算出来的问题是骇人听闻的。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中记述了不少骇人听闻的事实。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回答：为什么农村干部这么肆无忌惮地摧残农民？这本来应当从极权制度中寻找答案，从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从1958年的政治气氛中找答案。在这种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好人也会干坏事，本来素质很差的农村干部更是肆无忌惮了。但是，毛泽东等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分析，认为干坏事的都是阶级敌人，而这些阶级敌人又是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分子。为什么残余分子还存在？因为民主革命

不彻底。所以，“整风整社”实际就是“民主革命补课”。这样，就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已经失去大陆政权的国民党身上了。

1960年12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12月25日，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写信给省长李大章。这封信先是转述了毛泽东将农村干部分为“六种人”的意见，接着写道：

主席讲，恐怕90%是好人（后三种人）。请大家研究，前三种人10%是否恰当？要求大家具体分析，因为落后社中也有好队好人，而且坏人的性质不完全一样。另外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把工作搞坏了，把生产搞糟了，究竟占多大面，要各省在这次会上研究。

谈到有些坏人绝了群众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众围起来不准走，不准群众扯野菜等情况时，主席讲：这种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汇报到落后地区，不是刮共产风而是刮国民党风时，主席说：国民党还没有死亡，不仅台湾如此，大陆上也是如此。又讲，这些人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

汇报到农村整风时，主席讲，城市也必须整风，并且同意农村先整、城市整风放后的意见。主席讲同意小平的意见，整风要先分是非，后分敌我，这样就能帮助好人过关，就不会乱。当井泉同志汇报到有右倾倒退的问题时，主席讲，不仅有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有资本主义的问题。又讲，必须把坏人搞掉，共产风要纠，把东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级所有制建立起来，让群众放心。

主席还讲，凡有坏人的地方，必须像通海口一样，派大批确实得力的干部去打歼灭战，搞彻底，搞透，不透必须返工，试点务必搞好。烂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来的力量（工作团）去搞。同时也必须靠本身的70%的基本群众。

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风”的典型。这里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在一个介绍通海口这个案例文件 中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于1960年12月20日进村。工作队一进村，就像土改时一样，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小组，让他们起来和“五风”作斗争。

据群众揭露，这里的“五风”问题十分严重。干部可以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口粮、

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相”、“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高帽、游街示众。官路管理区总支副书记杨远辉，用上述办法亲手处罚过142人，有12户被逼外逃。

这个公社各级干部有31%的人有贪污行为，有30%的人挪用公款，有38%的人超支借钱。多吃多占更为普遍。在社员忍饥挨饿的时候，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多吃多占有数可查的，有粮食36000多斤，猪肉4100多斤，油626斤，蛋431斤。他们“要鱼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凭证供应的短缺商品都被干部占了。

由于干部的种种恶行，社员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

工作队认为，这里的“五风”问题，除极少数小队属敌我性质矛盾以外，绝大部分生产队和小队属人民内部矛盾。

工作队所说的敌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通常的说法是“打进来”的，没有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被说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坏分子（即“打进来”的）和蜕化变质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权的生产队和小队，一律对这些人残酷斗争，夺回领导权。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采取另一种办法。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开大会批判；对错误较小的干部，开小会批判。大会小会相结合，让群众把话说完，把气出尽。并让干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员赔礼道歉。

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北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这个报告时加的按语说：“凡五风严重，但不是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公社，都应当采取通海口公社整风的办法进行整顿。”

1961年的“整风整社”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整风整社”是怎样演变成四清运动呢？不用演变。有些地方的“整风整社”和三四年以后的“四清”运动毫无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龙江省的向阳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80年代划归佳木斯市，90年代县改市，由省直辖）向阳川人民公社。这是富锦县委的重点社，是有名的“粮食囤”，地多，地肥，人强，马壮。但是，自1958年以来，由于“五风”横行，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产急剧下降，群众生

活水平急剧恶化。1960年同1958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21%，劳动力减少了24.7%，大牲畜减少了30.5%，粮食产量减少了71%，商品粮减少了84%，社员收入减少了94.7%。对不听话的社员，百般打击陷害，有多名社员被干部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改变阶级成份、打成“五类分子”就是陷害社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58年以来，全社共有300多个贫下中农被划成“五类分子”，白天监督劳动，晚间审讯斗争，有不少人被打成残废。给干部提意见的被赶出屯。两年来，仅马鞍山和六合两个管理区，被赶出屯的贫下中农就有60多户。

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锦县委联合组织了工作组，到向阳川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的报告认为，“这是一个被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三类社。”“经过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了敌我矛盾问题。”经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复查，同意工作组的意见。1961年2月15日，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和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写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 中详细了几个月的“整风整社”的情况。

在公社党委的13名委员当中，有6人被定为“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官僚主义分子”。工作组认为，全公社15个管理区，就有五个被“地富反坏分子”、“日本小特务”、“蜕化变质分子”把持。 “日本小特务”是指在“伪满州国”期间，可能为日本人干过不大的事，但无确实的证据。

在社员吃不饱的情况下，向阳川人民公社的干部大吃大喝，利用权力奸污女社员。马山管理区的干部1960年就吃了12头猪，4000斤大米白面，喝了200多斤酒。粮食管理员胡勤堂拿社里的粮食喂了11条狗，专门杀狗肉吃。

这份报告写道：“整风整社”工作组进入公社后，遇到“三不清”：敌我不清，好人坏人不清，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向不清。他们找当地干部多次谈话，也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工作组跳出干部圈子，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找“根子”，终于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工作组以积极分子为核心，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让大家对干部问题进行大鸣大放。根据大鸣大放揭露出来的问题，对干部普遍进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行动表现。开始大鸣大放中，社员怕报复，不敢讲话。工作组向群众表决心，不彻底解决问题不走。这样，土地改革时的场面又出现了，像当年斗争地主一样斗争坏干部。最后把“印把子”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了，交给了真的贫下中农。群众把这次“整风整社”称为“第二次翻身”，“拨开乌云见青天”，“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兵”。

这个报告还讲述了，在这场斗争中，一些“阶级敌人”如何拉拢四清工作队员、工作队员如何拒腐蚀的故事。

据本书作者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无论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还是黑龙江的向阳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风整社的的做法、用语和“四清工作队”基本一样。所发生的故事和“四清”时基本一样。《桃园经验》、《小站报告》中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揪出一个个反革命集团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风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春夏之后，饥饿基本解除，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现在该是搞阶级斗争的大好时机了。抓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干部的强项，面对大有作为的时机，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心情亢奋。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在《二十三条》制订以前，刘少奇是全国“四清”运动的总指挥。随着《二十三条》的制订，刘少奇就失去了全盘指挥“四清”的权力开始削弱。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铺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终于爆发。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讨论“四清”的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在会议期间的12月20日，召开了一次“很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议，一向对毛泽东百依百顺的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却和毛泽东争执起来。王光美、刘源的书中介绍了这场争论：

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

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点谁的名，谁就要被打倒。

毛泽东对这次争论十分在意。几天以后的12月26日，是他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菜。毛泽东和几位劳动模范及科学家在一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在另一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常是谈笑风生的，这次却一脸严肃。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做什么工作。随后他批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1965年1月28日，还是在讨论“四清”工作的这次会上，邓小平主持了一次会议，他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般汇报会，会前，邓出于好意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毛泽东误解了邓的好意，他一手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手拿着《中国共产党党章》，走进了会场。他说 “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说的“（刘少奇）不让他讲话”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晚年向他儿子陈晓农谈了当时的情况：

在讨论“二十三条”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先发言，刚讲了不多几句，刘少奇就插话。插话说几句不就行了么，总还要让人家讲完嘛。可刘少奇却自己一直说了下去。毛主席就没有机会再讲。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就拿来了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参加会议的人一听就明白他是说刘少奇不让他发言。

刘少奇的这种做法令人不解，陈伯达也不理解。可见两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刘源的书中写道：“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最轻微的挑战，平等的讨论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泽东在1970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1966年5月16日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北京市委已被定为“黑

市委”，以它的名义派出的“四清”工作组立即撤出。延庆县的“四清”运动中途停顿，我们参加工作队的学生也撤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果然打倒了刘少奇。当然不只是用一个小指头，而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归结为毛的个人性格和品质，是过于肤浅的；但是，毛对刘的猜疑、不满，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领导人的更换有一套正常机制，但在专制制度下，在最高领导人周围总是充满谄媚和阴谋，领导人的更迭总是伴随着残酷和血腥。坐在权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炉上一样（曹操说过让他当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炉上）。熟悉中国专制历史的毛泽东，自然会对周围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五、从批判“修正主义”走向“原教旨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求自己的党员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也用这个理想教育所有的中国人。但是，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中，这个理想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现实的冲击。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是坚持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还是根据现实作某些修正？是快一点建成社会主义，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推进？中共“八大”的决议实际是理想对现实的让步。毛泽东在八大三次会议上不经中央讨论推翻了“八大”的决议，接着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加快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速度，从而造成了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的根源在于用极权制度、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快速推行共产主义理想。

大饥荒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面向实际，从共产主义理想退回现实，做现实需要做的事，可以称为“务实派”；另一派还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用不停的政治斗争来推动这一理想的实现，可以称为“理想派”。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划分，阵线也不十分清晰。务实派在务实过程中由于理想的情结，使他们在做违背理想的事时，总有一种理亏感，因而不事张扬；理想派由于理想总是遭到现实的无情碰撞，在维护理想时，总有一种阶级斗争的危机感和敌对情结。在中国这个政治条件和话语条件下，务实派在政治上处于劣势，但是，在理想派把经济搞乱了以后，总得由务实派来收拾局面。在收拾局面的过程中，务实派更加偏离理想，使得理想派认为他们更加危险。在毛泽东手中，对付务实派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修正

主义。

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同时，开展了批判“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九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当时的代表人物。1893年7月底恩格斯立遗嘱时，把全部手稿和书信遗赠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并把伯恩施坦作为遗嘱执行人之一。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他根据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和议会民主发展新情况，从1896年10月～1898年6月，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在《新时代》发表6篇文章，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899年3月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3个方面，全面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自诩为“修正主义分子”，说明当时“修正主义”并没有贬义。持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批评俄国的十月革命，批评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国际”就受到列宁的批判，从列宁开始，“修正主义”就成了贬义词。

批判“修正主义”除了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外，与毛泽东企图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也不无关系。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初步的工业基础，而波、匈事件 的“圆满解决”则有赖于中共领导人的出面相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毛泽东此时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与1950年访问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照本党中央通过的讲稿作报告，只有毛泽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在会下，毛泽东俨然是莫斯科半个主人，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似乎平起平坐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全面揭露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推倒了压在他头上的这尊神，提高了他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忧的是批判斯大林也会危及他毛泽东，因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所以，最后定的调子是斯大林“功大于过”。毛泽东反对

赫鲁晓夫丢掉“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也反对全部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实际上，丢掉了“两把刀子”就会危及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丢掉两把刀子”是修正主义最为根本的罪状。

当毛泽东在做国际共运领袖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却被苏共抢了先机，即赫鲁晓夫在倡导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方针时，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不甘落后，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奋斗目标：“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8月，毛泽东又说：“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有学者分析，毛泽东搞大跃进，除了国内的原因外，还有国际共运的原因。他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当时他说“以苏联为首”只是一种策略。

然而，苏共领导人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持批评态度。自苏共20大以来尽管两党有分歧，但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对苏共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上。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直指苏共中央。5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批评“戴维营精神”，还表示“将来要算算账”。

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激烈批评，不可能不引起回应。1960年6月2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批评中国党的方针政策。 从此，中共中央的反修斗争态度更加坚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苏共领导人也说成是修正主义者。“苏修”就成了中国人口头上一个常用语。在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相通的两个概念。毛泽东曾说彭德怀是修正主义者。以后又把这顶帽子扣在刘少奇头上。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毛泽东把“反修防修”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

1963年可以说是“反修年”。为了打好这一仗，中共中央组织了一个“中央反修领导小组”，由总书记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有康生、吴冷西、姚臻、熊复、王力、范若愚、吴江。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写反修文章。他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从1963年9月到1964年3月，共写了9篇指名道姓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简称“九评”）。“九评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激昂的战斗音调一遍又一遍地向全国广播，在中国深入人心。“九评”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推到了极左。现在看来，批判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在1958年就在中国开始实践，大跃进失败，文化大革命又更加疯狂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在中国南方一个小国也大行其道。这就是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这是毛泽东输出革命的一项重大“成果”。

波尔布特所领导的组织成立于1960年，但长期不公布名称，国外称之为“红色高棉”，1977年9月他访问北京时公布党的名称为柬埔寨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宣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完全一样。波尔布特多次秘密访问北京，自称是毛泽东的学生。

波尔布特的作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受到称赞。毛泽东对他这位得意门生的作法非常满意，他称赞波尔布特：你们干得好，我们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你们干成了。

然而，柬埔寨共产党执政几年，全国人口死亡三分之一。毛泽东称赞波尔布特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恶果。

自“大跃进”以来，中国的“理想派”和“务实派”的斗争经过多次反复，裂痕越来越深，斗争逐渐加剧，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张推向了极端，也推向了毁灭。到20世纪末，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这面旗帜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为了挽救危机，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务实派”把中国推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却进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机：多数中国人、甚至中国共产党内相当多的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当理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时，执政者不敢对这个理想提出质疑。因为放弃共产主义旗帜，共产党就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唯一的办法是，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未来而加以搁置。

把强加于全体人民的理想搁置起来，未免不是一件好事。执政集团不再用某一种理想来塑造国家的未来、规范人民的行为，而是面向实际，做一个有效的社会管理者。这是社会的重大进步。但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执政集团，它的管理权限应当是民众授予的有限权力，对它管理效果的评价应当是民众的实际体验，而不是某种先验的标准。因此，管理权的授予和管理效果的评价，只能通过民众的选票来表达。显然，这样的制度是民主制度。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共产主义理想被搁置以后，把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当成最高目标，也就是把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作为最高目标，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政权把保护执政集团的利益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就不能服众，就没有希望。

从邓小平以后的政治实践和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应当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但是，我们不能太乐观。勒庞说过："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他们执政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 因此，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建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等待，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近百年来，中国人吃激进的夸太多了，教训十分深刻。激进的作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软弱的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所以，反对专制制度过激、过急的那一群，可能恰恰是摧生新的专制制度的那一群。

有关大饥荒的大事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开始确立。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主张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形式。刘

少奇认为山西省委的提出的“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支持山西省委的看法，批评了刘少奇的看法。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支持高岗在东北搞农业集体经济的作法。

1953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要求各地有领导地大量发展劳动互助组，在有基础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全国有近半数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也比1952年增加了三倍多。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就解决粮食困难问题采纳了陈云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建议。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决议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

195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同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目前食油的产销情况和处理办法的报告》，作出《关于在全国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

1953年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销售的命令》，11月23日公布，从12月初开始，除西藏、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1954年12月27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40多万个。部分农民抵触情绪严重。

1955年3月，邓子恢到到浙江对合作社进行整顿和巩固。浙江的农业合作社由53144个，减为37507个。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讥讽怕农业社发展快了是“小脚女人”。他严厉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收缩农业社，他强调，“在发展问题上，目前不是冒进的问题。”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正式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对非农业人口一律实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供应，工商业用粮实行按户定量供应，牲畜饲料用粮食实行分类定量供应。

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2

月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104条按语，对合作化和其他许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尖锐的批评。序言中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5年12月5日下午，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这条保守路线。客观事物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在这个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传达之后，表示拥护毛泽东的看法，他说：“新大陆早已存在，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粮食总产量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来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

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说明”指出，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算不了什么，中国要超过它，第一步是接近它。国务院各部唯恐紧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到1967年）指标。1956年1月4日，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把这个高指标的计划，报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1956年2月6日，由于指标越来越高，周恩来感到压力很大。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一压”。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登出由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改定稿的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的重点是批评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反冒进”的标志性文件。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

大”政治报告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56年，农业集体化在几个月内快速完成。年底，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87.8%的

农户参加了高级社。原来预计18年完成的农业集体化，7年就完成了。

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就工业而言，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公私合营三者合计占工业总产值的99．1%，再加上农业集体化，私有经济基本被消灭。计划经济体制从此全面确立，国家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城乡居民的一切生活资料都由政府按国家确定的定量供应。

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发生“仙居事件”。浙江省仙居县在33个镇中有29个乡镇先后农民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退社，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有116个，部分垮台的有55个。

1957年在城市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一大批“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

195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处理了广西饿死人事件，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等12人受到撤职等处分，《人民日报》18日发表社论《坚持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改组后的广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常委王梦周、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陈漫远、郝中士鸣不平，认为饿死人是合作化与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果，中央在农村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中央委员作了《做革命的进派》的高调讲话。他把“反冒进”的人说成是“促退委员会”，并且和右派章罗联盟挂上钩。批评了经济建设中的反冒进以后，他轻而易举地推翻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

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 “八大决议上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个提法是不对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们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 1957年12月2日，在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辞，公开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一设想，从而成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1957年冬到1958年春，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没有力量办大型水利工程。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想法。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7年反右派斗争，6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从而堵塞了一切言路。再加上舆论垄断，与政府不同的意见不能发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封锁群众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封锁了自己的信息，从此，他们听不到真实情况，听不到对错误政策的批评。

1958年1月11日到22日，南宁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气就不得了。”周恩来作了检讨。他说，反冒进是带有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会后，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的潮头。

1958年3月9日到3月26日，成都会议。会上，毛泽东“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周恩来再一次就反冒进作检查，还说毛泽东是“真理的代表。”这个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

1958年4月7日，中央正式批发《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年到10年缩短为5年到7年。 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各地力争在 5年左右，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月到8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

的热潮。

1958年4月20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5月5日，改名为嵖岈山人民公。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

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95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总路线的旗帜插遍全国》，其中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要“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提到消灭家庭和建立公共食堂。他说：“我有这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要“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他还谈到消灭家庭的问题。

1958年3月－9月月陆良事件。云南省曲靖地区陆良县，从2月到9月，全县发生肿病33319人次，占总人口的13%，因肿病死亡5203人，占发病人数的15．6%，占总人口的2．04%

1958年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月22日，毛泽东对此件批示说：“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钢的产量就达到英国了。”

1958年6月19日晚，毛泽东在北京住地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领导人，毛问冶金部长王鹤寿：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1958年钢产指标为1100万吨（对外公布是1070万吨）。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

1958年六、七月间，上海市奉贤县在“扫除残余反革命”和“反击富裕中农进攻”的口号下，发生了乱关、乱斗的现象。到1958年深耕深翻、兴修水利中，又提出“苦战三十昼夜”，“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在全县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捆绑吊打，乱罚、乱斗、乱关等现象。造成了960人非正常死亡。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国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16日，他又在《红旗》第四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一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思想：把工、农、商、学、兵（民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他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他除了肯定河南的高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时，对谭启龙等当地领导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徐水。8月6日，陈正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这里来搞“共产主义试点”。《人民日报》大力宣传徐水的试点吸引了全国各地的32万人到徐水参观。中共中央领导人几乎都到徐水参观过。从此全国刮起了共产主义风。11月6日，毛泽东在《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共产风更加强劲。

1958年8月29日，中共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以外的27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的农户112174651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100%。到10月底，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总的99．1%。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毛泽东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在安徽视察时，他听说该省舒茶人民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时说，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认为应该提倡。

1958年9月27日，刘少奇在南京向党员干部的讲话中说："江苏省有300多万人炼钢铁，大多是从农村调去的。他们搭起棚子就干，情绪很高，不扯皮，不闹待遇，也不闹什么劳动保险。江苏省只有50万产业工人，现在炼钢铁的有300万。哪个大呢？是300万大。这就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炼钢铁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开纱厂也可以这么做？机械厂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比如，这个厂要两千名工人，请你们哪两个县调两千工人。共产主义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因为你横竖有饭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个报酬，而且是没有定额的。"

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刘少奇在江苏省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问乡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连忙接上来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少奇说："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

1958年夏秋以来，《人民日报》经常在一版显著地位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先是夏收小麦创高产的新闻 ：

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

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 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 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海拨2797米的一个农场亩产8585斤6两。

秋收开始，《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1958年6月16日，当人们对高产卫星产生怀疑的时候，在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

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1958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全国各地城乡纷纷成立公共食堂。12月10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他在批语中说：“张鲁行五斗米道，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大受群众欢迎。”12月7日，另有一则批示中说：“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体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大发展。

1958年11月25日晚，云南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4个区、20个乡，发生“土匪暴乱”。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公安部队组织力量即时围歼。

1958年11月21 - 27日，武昌会议。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提出经济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实际。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如商品、货币、按劳分配，我们还要利用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1958年11月28 - 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这个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评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空想，重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相结合。批评企图否定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观点，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评浮夸风，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把经济工作越做越细。

1958年12月6日，中共云南省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从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边沿县

总人口的14%。

1959年1月山东“馆陶事件”暴露。自1959年1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迅速发展。社员四处觅食，到处逃荒。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罗卜度日。生产停顿。饿死多人，惨不忍睹。

1959年1月27日，中共广东省委送上《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1959年2月，《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认为“目前农村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的粮食工作。” 这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反瞒产私分”的经验。2月22日、28日，毛泽东先后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全国掀起了反瞒产私分的运动。

1959年2月27 - 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话，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两种倾向。重申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揭示共产风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成果。

1959年3月25 - 4月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决定对“一平二调”的财产清算退赔，强调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修改和调整钢铁等经济指标。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致信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就包产问题、密值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纠正了偏激的看法。

1959年3月，山东“济宁事件”暴露。从1958年冬到1959年春，这个地区的农民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全区水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大量非正常死亡。

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毛泽东于4月17日作了批示：一、将这两个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内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速处理；二，给15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实际上，从1958年年底开始，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饿

死人当作个别现象，当作“暂时的紧急危机”，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

1959年4月18日至25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批准了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将这些高指标正式公布。

1959年进入第二季度，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农业方面，当年夏季作物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20%。夏收粮食、油料大幅度减产。蔬菜、肉类等副食品更加短缺。工业方面，钢铁生产上不去。由于“以钢为纲”，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人民日用品生产下降，许多商品库存减少，到处供应紧张。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业的紧急指示》，第四条中提出要迅速扭转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并重，对私人养猪要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同一天，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鸭鹅问题》。

1959年5月11日，陈云向中央政治局建议：1959年的钢产量应降为1300万吨，获得批准。

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自留地等问题的指示稿》，再一次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问题。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庐山会议”。

第一阶段是“神仙会”，主要是反左气氛。7月14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标题，批示：“印各同志参考”。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向彭德怀发起反击。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大会小会展开了对彭、黄、张、周的斗争。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决议正式肯定“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1959年8月中至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全国有上千万的干部遭到批判。195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不仅停止实施，还当做右倾加以批判。上半年有所收敛

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1959年8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报告，报告谎称粮食紧张的问题已得到了彻底解决，保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市场好转等，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

1959年10月，山西寿阳发动“挖粮集资”运动。从发动到1960年 1月被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 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 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 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49人之多。后称“寿阳事件”。

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河南省信阳地区因饥饿而死亡的农民超过一百万人。这就是令人痛心的“信阳事件”。

1959年冬到1960年春，甘肃省通渭县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全县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被称为“通渭问题”。

1959年，国家出口粮食415．75万吨“贸易粮”，创出口粮食最高纪录。这些“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这一年进口粮食折合原粮只有0．2万吨。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

1960年1月到8月，广东省罗定县发生了大批饿死人的事件，称为“罗定事件”。占全县一半左右的公社，约27万人的地区，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浮肿、瘦弱死亡情况。据全县1－8月统计，死亡达17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62%。

1960年春，贵州省遵义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人吃人的现象也有发生。成为惊动北京的“遵义事件”。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这个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气氛中召开的，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会后，全国

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泛滥起来。

1960年3月4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对贵州省委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全国仿行，不要例外”。贵州省委的报告用“群众的话”的话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社员劲头高又高”，还主张取消自留地。此时，贵州省的农民正在大批饥死。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

1960年3月24 - 25日，毛泽东在天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讨论了十七个问题，如：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今年全国80%的人在食堂里吃饭；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钢铁要依靠“小洋群”，还要搞“小土铁路”、“小洋铁路”；农业发展纲要提前完成的问题等。天津会议还是坚持“三面红旗”，但反对刮共产风。

1960年3月25日，饿死多人的“中宁事件”被揭露，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工作组进驻中宁，接管了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算原县委错误的斗争。

1960年3月30日至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通过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继续跃进　一定能继续跃进》。

1960年春青黄不接之际，各地农民大量饿死。这是大饥荒期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300多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枪支18条，子弹1200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4人，绑架干部16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1961年7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

党”首犯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枪5支，子弹50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暴动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年6月10日－18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14日的讲话中提出降低计划指标，提出钢铁要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会议期间他写下了《十年总结》，开始反省前几年经济建设中高指标的错误。

1960年7月6日，中共中央提倡大搞代食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在讨论中苏关系问题的同时，研究了国内经济问题，会议通过《关于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专家合同343个，科技合同257个），并通知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在华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多人。这些合同与农业无关。

1960年7月30日，《齐燕铭同志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11月9日发文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现把它摘要转发，希望各地参照执行。”

1960年8月，主管计划的李富春，深感全面“大跃进”难以为继，提出了“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后周恩来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成为八字方针。但由于认识不一，八字方针此时还无法贯彻。

196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确保完成粮食调运计划的指示》。

1960年9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9月10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关于压低农村

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

1960年10月23 - 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的汇报。主要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的问题。会上讨论了问题暴露得较早的河南和山东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汇报了信阳事件。信阳事件的材料，10月26日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认为信阳事件的原因是农村基层政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这个文件主要是纠左，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十二条”还坚持办公共食堂。

1960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代食品会议，谭震林副总理在这个会议上的报告，号召全国开展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接着，各地组织成千上万的人上山下水，寻找各种代食品。代食品为缓解饥饿起了一点作用，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民因吃代食品中毒甚至死亡的不在少数。

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看了关于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报告，写信给周恩来，信中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对农村形势作出了严峻的判断。他说，有三分之一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

196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

1960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抓紧粮食调运的通知》。

1960年12月24日晚，宣威暴乱。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暴乱涉及13个管理区的37个生产队，共417人。暴乱分子提出的口号：“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

1960年12月24日 - 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除子讨论国际共运的问题以外，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1960年，中国出口粮食272．04万吨。这些“贸易粮”折合原粮326万吨，相当于一千万人一年的口粮。当年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稀缺的食品。这一年进口粮食只有6．63万吨。1960年大量饿死人后，1961年进口粮食580．97万吨。出口粮食减少到135．5万吨。

1961年1月14日－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当时的提法是“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但由于认识上不一致，真正的调整是在1961后下半年开始的。

1961年1月18日，毛泽东提出1961年要成为一个调查年。20日，毛派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三个组分别去浙江、广东、湖南去做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

1961年3月28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召开省委常委会，确定在全省搞“责任田”。为了减少搞包产到户的阻力和猜疑，1961年4月27日中共安徽省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安徽省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搞起了责任田。这是当年拯救农民最有效的办法。

1961年4月19日晚，经毛泽东同意，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大队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员皆大欢喜。

196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号，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这是第一个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

1961年5月21日－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会上讨论和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个文件强调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一律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从此，公共食堂在中国消失。

1961年8月23 - 9月16日，第二次庐山会议。会议讨论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认为：经济形势1961年到了谷底，从此天天向上。

1961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在有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会上邓小平说粮食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今年的数无非60亿，搞得好70亿。主要是30天的工作。这30天抓住，就抓到了，这30天抓不到，就呜呼哀哉。总想减，不努力完成任务，说不过去。这是这两年的一个思想状态，整风要首先整这一条。庐山会议确定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不能讲价钱。

1961年12月9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北京市委拟了一份报告：《关于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请示》，12月17日中共中央同意这份报告，并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一办法执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党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1962年2月21日到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西楼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对经济形势作了比较严峻的估计。“西楼会议”和2月26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以及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进一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3月14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常委多数人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广东每天都有大批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

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

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计划的部署。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1962年7月，田家英、陈云、邓子恢等向毛泽东谈了搞包产到户，毛泽东坚持集体经济。事后，毛在游泳池质问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8月6日，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他又在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1963年 - 1965年，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 - 1976年，文化大革命。自“大跃进”以来，中国的“理想派”和务“实实派”的斗争经过多次反复，两派分歧逐渐加剧，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张推向了极端，也推向了毁灭。文化大革命失败，从反面导致1978年底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一、 来源十分可靠的原始文件

河南省

路宪文向毛泽东汇报，见《毛主席在信阳的谈话》，1958年11月13日晚。

中共潢川县委：《关于粮食征购问题的报告》，1959年10月30日，2407。

《宋致和同志关于信阳地区几个县当前几项主要工作情况的报告》，1959年12月4日。

省委检查组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1960年6月3日。

省地委联合检查组伞陂寺公社小组：《关于潢川县伞陂寺公社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3日，2403。

《中共潢川县委关于死人问题的再次检查》，1960年6月3日。

中共淮滨县委：《关于发生浮肿病和其它疫病造成死人情况的再次检查》，1960年6月7日，

中央办公厅、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18日。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1960年10月9日1960－3017。

中共中央组织部赴河南调查组：《关于息县和防胡反瞒产私分的情况》，1960年10月9日。

杨蔚屏：《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报告》，1960年10月15日。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除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党籍、判除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死刑和对信阳地委死人事件处理几个政策问题的请示》，1960年11月1日，1960－2409.

信阳事件专案审查组：《关于马龙山的问题》，1960年11月20日，河南省档案馆，年代：1960，期限：永久，卷号：2403。

李立：向吴芝圃的报告，1960年11月28日，2405。

《路宪文对自己错误的检查（初稿）》，2412。

马龙山1960年10月21日于信阳报告，《谨呈刘科长转省里来的两位主任》。

《王秉林揭发杨蔚屏的材料》，1960年11月。

《张富同志向中央反映经情况受到压制的过》，1960年，12月。

《中共河南省委对信阳事件的检查》，1960年11月1日，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1960年11月1日。

中央专案组：《关于信阳事件专案审查情况报告》，1960年11月20日。

王从吾、徐子荣：《关于信阳地区封建势力复辟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报复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1日。

王任重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1960年12月6日。

中央工作队魏震1960年12月21日报告：《关于鹿邑县揭发出的几个突出问题》。

甘肃省

张仲良：《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１９５８年2月9日。

中共定西地委组织部：《关于1958年“拔白旗”“插红旗”的复查情况报告》，1959年10月19日。

《清水县委关于生活安排、人口外流情况的电话汇报》，1960年2月17日。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定西分院：《关于对通渭搞劳教队的情况检察报告》，1960年3月30日。

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岷县问题的报告》，1960年8月19日。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编：《中共甘肃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简报》第4、

6、13期，1960年11月9日。

中共兰州市委：《关于干部职工中发生的浮肿病的情况报告》1960年12月3日，[60]846号。

省工交部：《工交系统发生浮肿病的情况》，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1960年12月9日。

中共玉门市委：《关于在厂矿、企业、机关、党校中发生浮肿病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11日

中共白银市委：《关于积极防治浮肿病发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60年12月18日

中共天水地委：《关于请拨免费医疗款的报告》，1960年12月24日，甘收[60]1725。

中共酒泉钢铁公司党委：《职工浮肿病情况报告》，1960年12月30日。

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主持的中央工作组：《关于甘肃省天水地区反右倾斗争中大批干部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1961年1月5日。

《张掖地委1961年1月7日晚向省委的报告》，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甘收[61]2060。

《武威地委关于永昌县发生疾病、断炊、人口外流情况的电话汇报》,1961年1月15日，甘收[62]20049号。

《省委卫生厅检查组给省卫生厅党组并定西地委的报告》，1961年1月8日。

《定西工作组李步胜、李生华、田园给省委的报告》，载《定西地委扩大会议简报之三》，1961年1月12日，甘收[61]2164。

省委天水工作组、天水地委：《省委天水工作组、天水地委关于保卫铁路运输安全工作的报告》，1961年1月23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甘收[61]2381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举办集中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的规定》，1961年2月27日。

中共榆中县委书记雷秉让：《食堂问题的报告》，1961年5月，中共甘肃省委收文：甘收（61）21697号。

中共甘南州委：《关于生活安排情况和增拨农村粮食指标的报告》，1962年4月8日，甘肃省委收文,甘收[62]20638号。

临夏州委：《临夏县大河家保安族公社生活情况简报》，1962年5月11日，《甘肃省委收文》甘收[62]20864号，共印23份。

中共榆中县委书记雷秉让：《食堂问题的报告》1961年5月，中共甘肃省委收文：甘收（61）21697号。

中共酒泉市委：《关于面粉厂对偷粮群众鸣枪错误的检查报告》，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甘收[61]2231，甘收[61]2189。

《甘肃省的省级单位十九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学习讨论扩大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对中央、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意见》，1962年年2月28日，省委办公厅汇集。

临夏州委：《临夏县大河家保安族公社生活情况简报》，1962年5月11日，甘收[62]20864号。

四川省

《井泉同志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决议的报告（记录）》，1958年8月30日上午，四川省档案馆，办公厅1514。

省委检查团绵竹工作组：《关于绵竹红旗公社缺粮情况和解决办法的报告》，1959年3月9日。

《李井泉同志在省委六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1日。

省委简阳工作组：《杨部长并转廖书记：解放公社解放耕区有关当前生产的几个问题的简单报告》，1959年4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收文第2448号。

四川省委生产整社检查团西昌分团孙传学：《致地委、省委》，1959年6月29日。

《关于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调查》，1959年7月3日，四川省档案馆。

省委检查团宜宾分团江安工作队：《关于长宁县桃坪公社的落后情况报告（摘要）》1959年7月9日，

阎红彦：《关于在仁寿了解到农村工作中几个问题致省委并大章同志》，1959年7月23日，省委收文第4873号。

郭炳林给夏部长的信，1959年7月29日，省委办公厅收文第5107号。

省委检查团泸州分团叙永检查组：《关于叙永天堂公社部分生产队推行红苕“包产到户以产记工”办法的报告》，1959年8月4日。

杨万选：《关于长宁县旱灾和水肿病情况的报告．》1959年8月9日，省委收文第5268号。

省委整社、生产检查团泸州分团安法孝：《关于泸州专区整顿巩固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1959年9月1日。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1959年9月2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指示）总号[59]418号。

李大章：《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地点：金牛坝，时间：1959年9月7日。

《井泉同志1959年11月7日上午在市、地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于重庆潘家坪》。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关于省、地、县三级机关反右倾斗争情况向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汇报》，1959年11月21日。

中共泸州地委办公室：《关于古蔺县疾病情况汇报》，1959年12月7日。

《井泉同志对“中共泸州地委办室关于古蔺县疾病情况汇报”的批示》，1959年12月8日。

《全省区级机关党员干部和公社党委书记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统计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年12月25日。

《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党员干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统计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年12月25日

《厂矿企业党员干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统计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年12月25日。

《厂矿企业非党干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统计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年12月25日。

《大专院校、中等学校非党干部反右倾斗争中重点批判人数统计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年12月25日。

《中共绵阳地委关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改造落后社会、队的情况报告》，1960年1月8日，第一次地委书记文件之25。

《全国粮食厅长会议简报》，四川南充，1960年2月9日。

《井泉同志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纪要》，1960年2月14日晚，四川省档案馆。

李井泉：《在南充第二次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3月26日。

灌县县委办公室：《关于两起不正常的死亡事件给温江地委办公室的报告》，1960年3月26日。

刘仲伍、王政、肖林：《关于金堂县三星公社五爱管理区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1960年4月4日。

乔钟灵、翟容致省委并内江地委，1960年4月16日。

温江地委办公室接大邑县委办公室电话记录，1960年4月25日。

《省委农业检查团江津组向四川省委的报告》第56－59页，附件三：《关于财贸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材料》，1960年5月3日。

《关于财贸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材料》，1960年5月3日。

甘棠、王善庆、李茂云：《关于泸州地区生产、生活的检查情况综合汇报》、《关于泸州地区一些违法乱纪情况报告》，1960年6月3日。

李井泉1960年8月5日给李先念副总理的信。

梁歧山给省委、万县地委的信，1960年9月26日。

《王子清同志关于于荣县一些问题向农村工作部的汇报》,1960年10月3日.

中共壁山县委：《关于抢救肿病的十二条紧急措施》1960年10月22日。

省委万县专区粮食工作检查团薛志强致省委、万县地委，1960年10月28日，收文号1960年7011。

张守愚、刘景周：《就荣县问题给省委的报告》，1960年11月30。

《内江猪只减少的情况》，1960年11月3日，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印《农村工作简报（第83号）》。

《樊执中同志关于合川县南坪公社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一些反映》，1960年11月13日，收文第7266号。

郫县县委第一书记高义禄：《关于共产风给生产带来的损失的初步检查》，1960年12月1日。

李怀培：《关于一平二调的问题》，1960年12月1日上午。

《省委农业检查团江津组向四川省委的报告》，1960年。

国务院财办调查组：《关于四川省纠正“一平二调”清理退赔情况的调查估算（初稿）》，1960年12月。

温江地委工作组：《潘廷光违法乱纪案件》，1960年12月1日。

四川省公安厅、中共邛崃县委联合工作组：《关于对被控人原道佐公社党委第二书记杨树楼严重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事实初步查证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6日。

四川省农村工作部调查组：《乐山县通江公社柏杨管理区一平二调造成农具严重缺乏的情况》，1961年1月5日。

《刘文珍同志在壁山县检查农村食堂所发现的严重问题的电话汇报》，1961年1月6日，秘书处收文[61]第126号。

张广钦：《关于农村治安情况混乱的汇报》，1961年1月12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61）收文第214号。

省委整风整社工作团绵阳工作组：《绵阳石马公社改变落后面貌的情况材料》，1961年1月12日。

省委工作团乐山县棉竹公社工作组：《乐山棉竹公社二管区干部瞎指挥给生产带来严重损失》，1961年1月16日。

省委整风整社温江工作团：《金堂县五级干部会议揭发出有关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1961年1月16日，[61]收文第447号。

省委整社工作团绵阳工作队：《绵阳县松桠公社落后情况的调查材料》，1961年1月17日。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工作组对目前防治肿病的情况反映》1961年1月18日，收文号343。

刘文珍：《关于江津、合川、江北、永川、荣昌等五个县、区、公社三级党委整风整社指导思想的检查报告、1961年1月22日。

李林给省委并廖书记：《垫江县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区的情况报告》，1961年1月31日。

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防治肿病工作情况》，1961年3月7日。

省委检查团垫江工作组：《关于界枫公社整风整社第三阶段贪盗赃款追退工作情况报告》，1961年4月8日。

李井泉：《关于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11日于内江，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1961年5月12日抄发各市、地、州委、省委常委、省级各大口。

《眉山县退赔的主要情况》1961年6月2日，主送李大章同志，抄送廖起高同志、许梦侠同志。

宜宾地委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关于全区肿病发展情况的报告》，1961年7月5日，四川省委办公厅[收文61]3402号。

李寅：《宜宾安边公社空田空土情况》，1961年7月26日，收文[61]3597号。

地委除害灭病办公室：《关于涪陵、武隆部分公社当前疾病调查情况简报》，1961年8月12日。

中共屏山县委工作组《屏山县清凉公社五一大队纠正包产到户的经验》，1961年8月25日，

魏萍、谭万才：《涪陵县明家公社当前防治肿病情况的调查报告》，1961年8月26日。

省委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检查组：《关于渠县部分地区因生活安排不落实群众吃“观音土”的调查报告》，1961年8月31日。

中央工作组统战部小组：《关于长田公社幸福大队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调查》，中央工作组长统战部小组编《情况简报》第17期，1961年9月3日。

四川省委退赔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当前退赔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意见》，1961年9月19日。

《关于甄别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意见（草稿）》，1961年9月19日。

《李大章同志在省委地委书记会上关于庐山中央工作会议的传达报告．》（记录整理），1961年9月20日

省委检查团涪陵组：《马鞍公社结合生产自救、节约渡荒开展防治病工作的调查报告》，1961年9月20日。

《乔志敏同志关于合川南屏公社整顿情况的报告》，1961年11月29日。

中共壁山县委：《关于1961年防治疾病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1962年1月2日，中

共四川省委收文[62]208号。

《万县地委办公室关于当前农村肿病情况的汇报》1962年1月15日，四川省委办公厅[62]收文295号。

省委检查组：《关于荣县几个严重问题的汇报》，1962年，1月16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收文[62]313号

中共江津地委：《关于肿病情况的汇报》，1962年1月21日，中共四川省委收文[62]417l号。

马吉良：《关于长寿县一些情况和问题的电话汇报》，1962年1月25日，中共四川省委收文[62]519号。

王道一：《柳荫区石坝公社抢治疾病情况的报告》，1962年1月28日，中共四川省委收文[62]643号。

林翩天、吴国宪：《关于四川情况的报告》，1962年3月2日，

省委工作组：《关于新繁县河屯公社当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意见》，1962年3月。

《陈国栋同志给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其中谈到四川问题），1962年3月17日

《周颐同志关于西昌地区点滴情况汇报》，1962年5月27日 [62]收文2290号。

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疾病情况》1962年7月24日，收文号：147号。

四川省经济计划委员会：《对我省历年粮食产量的分析（资料）》，1962年7月25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62年7月26日印。

中央统战部工作组：《四川省大足县土桥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多吃多占问题的调查》，1962年8月24日。

中央工作组统战部小组：《四川省江北县兴隆区包产到户的情况》，中央工作组长统战部小组编《情况简报》第12期，1962年8月28日。

李定邦：《雅安地区当前生产、生活情况》，1962年9月4日。

中央工作组（统战部小组）编《情况简报》（第24期），1962年10月13日：《四川省合川县三年来公社一级党委书记受批判、处分面达60%》。

《内江猪只减少的情况》，见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印《农村工作简报（第83号）》。

中共郫县县委：《郫县五级干部会议关于劳动力问题的讨论》。

安徽省

中共凤阳县委工交部：《关于1958年度工交部的总结报告》，1958年12月。

中共凤阳县委：《赵从华的反党罪恶材料》，1959年10月30日。

中共凤阳县委：《凤阳县整风开展情况》1959年12月8日。

中共蚌埠市委节约粮食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全市普遍推广先进做饭方法的报告》，1960年1月26日。

《陡沟公社关于开展三反整风运动情况总结报告》，1960年7月18日无为县委转发。

曾庆梅：《关于萧县马井公社部分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报告》，1960年8月4日。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试点情况报告》，1960年11月24日。

中共无为县委：《贯彻中央12条紧急指示信的情况》，1960年11月27日。

程光华：《全民动手，大办代食品》，1960年11月29日。

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第一次检查材料）》，1961年，1月7日。

《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第四期（1961年1月8日）、第五期（1月9日）、第六期（1月10日）。

《凤阳县赵玉书同志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第二次补充检查》，1961年1月15日。

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小溪河公社坏人当道情况所调查报告》，1961年2月10日。

凤阳县委调研组：《关于政府城公社四凤大队三包四定工作简报》（第一期）、（第二期）。

凤阳县委：《整风整社工作简报》（16期），1961年3月14日。

《程光华同志代表蚌埠市委所作的检查报告》（记录稿），1961年3月18日。

蚌埠市1961年三级干部会议简报，《对省委的意见和要求》。

中共蚌埠市委：《进一步发动组织群众采集野菜的指示》，1961年3月26日。

《武店公社党委关于整风整社工作情况的报告》，1961年4月18日.

凤阳县《科局长整风会议纪录》，1961年8月9日。

马维民同志在县委三级会议上的讲话：《凤阳县两年来的经验教训》，1961年8月24日。

（蚌埠）市委压缩城镇人口领导小组：《关于进上步压缩城镇人口和精简职工的工作意见》，1961年11月17日。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五风情况》，1961年11月7日。

蚌埠市除害消灭病领导小组：《关于防治疾病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1961年11月17日。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和改正包产到组的工作情况汇报》，1963年3月10日。

吉林省

吉林省检察院党组：《关于打击违犯粮食政策、破坏粮食征购的犯罪情况报告》，1958年2月13日。

吉林省检察院党组：《关于当前部分地区粮食紧张情况的报告》，1958年4月30日。

吉林省检察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省监察厅：《及时惩处违反和破坏粮食政策的违法犯罪分子保障粮食征购工作顺利进行的初步意见》，1959年1月9日。

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六级干部会议简报》第一期，1959年3月11日。

吴德：《吉林省六级干部会议总结》，1959年3月21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当前粮食情况的报告》，1959年6月9日。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少数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

1959年8月5日。

吉林省政法联合办公室：《关于战役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草稿）》，1959年8月10日。

1959年8月26日到9月10日，省委扩大会议文件（传达贯彻庐山会议）。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在农村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政策，彻底杜绝自杀现象的通报》，1960年2月20日。

中共吉林省委监察委员会第二书记岳林在中国共产党吉林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60年3月.

吉林省副省长王奂如在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安排人民生活问题》，1960年3月21日，会议秘书处3月22日印。

中共吉林省委批转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1959年全省批捕人犯情况的报告》，1960年4月4日。

中共四平地委：《关于双辽县发生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情况的报告》，1960年6月15日。

中共吉林省政法委党组：《关于调整1960年捕人、杀人控制数字的报告》，1960年7月18日。

中共吉林省委：《批发栗又文同志在省三级干部会上关于粮食工作的总结发言》，1960年10月31日。

吴德在吉林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60年11月10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粮食工作报告》1960年11月14日4。

吴德在省委电话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粮食征购和生活安排问题》，1960年12月17日。

省、市、县委工作组：《铁岭县汎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中共辽宁省委1960年12月25日报送东北局。

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大搞代食品的情况》，1961年1月7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地区大搞代食品情况的报告》，1961年1月18日。

东北局财委：《关于三省财贸部长座谈会对抓好代食品安排人民生活的意见报告》，1961年1月25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防止旅客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1961年2月10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粮食情况和生活安排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1日。

东北局农委工作组、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1961年2月15日。

（延边州委干部）何建中来电记录：汇报当地饥饿情况，1961年3月4日晚。

吉林省卫生厅党组：《关于洮安县两个管理区发生浮肿病情况的调查报告》，1961年3月11日。

中共吉林省委：《严格制止各事业企业单位擅自占用公社和耕地的紧急通报》，1961年4月17日。

《吴德同志写给主席的第一封信》，1961年5月9日。

《吴德同志写给主席的第二封信》，1961年5月10日。

宋振庭：《关于怀德县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和进一步整党整社的报告》，1961年5月10日。

中共长春市委办公厅：《关于制止某些群众扒树皮、损坏公共设施的报告》，1961年5月11日。

中共长春市委办公厅：《关于制止某些群众扒树皮、损坏公共设施的报告》，1961年5月11日。

吉林省卫生厅党组：《关于防治当前几种主要疾病的报告》，1961年6月2日。

阮泊生：《怀德县当前生产及生活安排方面的情况汇报》，1961年7月27日。

吉林省公安厅党组、吉林省民政厅党组：《关于坚决制止自由流动人口的意见报告》，1961年10月30日。

《徐守身同志在省委召开的整顿城市治安秩序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1月2日，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61年11月6日印发。

《关于粮食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1961年11月29日。

张士英：《抚松县发展人参生产问题的报告》1961年12月7日。

《崔次丰同志在全省统一行动打击盗窃和投机倒把活动的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1962年1月10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厂矿企业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情况的报告》，1962年1月20日。

中共吉林省委财贸部：《关于召开农村生活安排会议的报告》，1962年3月5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职工家属参加自给性农副业生产的调查报告》，1962年11月9日。

辽宁省

中共辽宁省委工作组：《铁岭县汎河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总结》，1960年，12月15日。

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在职工家属中进行以粮食为中心的教育运动和安排好群众生活的情况报告》，1961年1月19日。

江苏省：

江渭清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政治挂帅，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一道前进》，1958年5月。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和决议的通知》，1958年5月8日。

江苏省委整社检查团扬州分团：《在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问题向省委汇报》，1959年2月12日。

《南通县委关于石港人民公社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3月24

日，

颜景詹1959年4月15日上午电话汇报：《关于人民生活问题》，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编印.

粮食部工作组：《关于宝应、宜兴两县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25日。

《殷炳山同志在县、市委第一书记会上的讲话》，1960年7月22日。

孙海光给省委的信，省委韩批给书记阅。1960年7月25。

《向干部提八条意见》，整风整社《大会简报》第二期，1960年7月28日。

《西冯大队近几什么没有大跃进》，1960年8月4日。

上海局办公室：《江苏省工作组来信》，1960年8月24日。

卢敬给省委的信：《吴县东桥公社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为什么这么严重》，1960年9月5日。

《省委驻建湖县天美公社蒿崙大队工作组第一次报告》，1960年9月18日。

江苏省委派赴丹阳县工作组（即重工业厅丘陵山区工作给）给省委的报告，1960年9月20日。

宋超、郭铁松、李震给省委、扬州地委、江都县委的信，1960年9月25日。

省委工作组：《关于常熟县白茆公社浮夸产量的调查报告》，1960年10月18日。

江苏省委、镇江地委溧水工作组：《省地委工作组关于溧水县委常委整风的情况报告》，1960年10月19日。

《上海局杨主任关于丰、沛、东海县情况向地委的汇报》，1960年10月30日。

中共苏州地委：《莫城公社贯彻“十二条”第一步的情况简报》，1960年11月。

中共江苏省委驻建湖县天美公社郑南大队工作组：《关于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的调查材料》，1960年11月15日。

淮阴市五里公社八大队省委工作组：《关于淮阴市五里公社第八大队“四风”情况的调查报告》，1960年11月16日。

江苏省委东台县工作组刘子见：《关于卢南大队纠正“共产风”的工作报告》，1960年11月19日。

江苏省委、县委驻曲唐公社工作组：《关于曲唐公社胡庄大队纠正一平二调的情况报告》，1960年11月23日。

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徐慎行：《关于泗阳县粮食问题的报告》1960年12月2日。

孙海光：《给辛、孙部长并报省委》，1960年12月27日。

冯光才：《淮阴市王兴公社尅扣社员口粮》，1960年12月28日。

地委调查组：《高要县四甲大队组织不纯、坏人当道的情况调查报告》，1961年3月12日。

瓜埠公社整社工作研究小组：《关于六合县瓜埠公社干部作风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1961年4月，海军政治部政治理论教研室印。

宝应县委工作组：《宝应县天平公社情况报告》，1961年6月10日。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苏北里下河地区当前情况的报告》，1962年5月30日。

《中共常州市委关于大明纺织厂在精简工作中发生群众性起哄闹事的通报》，1962年6月10日。

江苏省人委财办秘书处：《金沙等六个集镇集市贸易的情况调查》，1962年7月15日。

广东省：

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广东目前镇反运动综合报告》，1951年4月11日。

吴南生：《关于合浦县发生大量水肿死亡情况的报告》，1960年5月

4日。

张进齐：《关于罗定县出现严重水肿、死亡事件向省委的报告》，1960年9月20日。

郑群、成家英、张乐民：《关于南雄县始兴公社严重违法乱纪和大量死人事件的调查报告》，1960年7月31日。

《中山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1961年1月 5 日。

《增城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1961年1月4日。

《宝安县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1981年1月3日。

中共文昌县委：《关于四级干部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1961年1月11日。

《高要县四个大队组织不纯坏人当道的情况调查报告》，1961年2月。

《江门市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1961年1月21日。

《中共顺德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1961年1月3日。

地委调查组：《高要县四甲大队组织不纯、坏人当道的情况调查报告》，1961年3月12日。

山东省：

《谭启龙给舒同的信》1958年1月18日于济宁。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赵健民同志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主要事实》，1958年10月21日。

《山东省委、省人委关于馆陶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1959年1月16日。

《谭启龙给记舒同的信》，1959年3月23日于钜野。

《谭启龙给舒同的信》，1959年4月11日于济宁。

王瑛：《关于金乡县防治肿病检查情况简报》，1959年4月29日。

《中央监委转发山东监委关于济宁地区在开展‘拔白旗，插红旗’的竞赛运动中发生错误的报告》，1959年4月30日。

夏征农：《夏征农同志关于检查寿张工作情况向省委报告》，1959年6月18日。

《山东粮食厅党组关于调整全年粮食统销指标情况向省委的报告》，1960年2月25日。

山东省委办公厅：《通讯与资料》第31号，1960年7月。

中共山东省委工作会议文件，1960年8月14日简报。

中共山东省委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传达贯彻北戴河会议的报告》，1960年9月20日。

曾希圣在山东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克服困难而斗争！》，1960年10月29日。

穆林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0年12月13日。

舒同：《我的检讨》，1960年12月13日。

赵健民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0年12月15日。

1960年12月13日 - 15日山东省委扩大会议简报。

《山东省粮食厅关于印发樊培华同志在全省粮食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纪要的通知》，1961年1月14日。

山东省粮食厅：《山东粮食问题（汇报材料）》，1961年5月12日。

《昌潍专署粮食局关于请示收购一部分霉变瓜干向省粮食厅的报告》，1961年10月29日。

山东省粮食厅：《关于1960 - 1961年度农村和国家对粮食需要市、地委匡算的情况》。

浙江省：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从典型调查来看浙江农村市场的基本情况和特点》，1954年3月15日。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农村市场基本情况调查》，1954年3月18日。

《中央农村工作部对浙江省合作化问题的检讨》，1955年9月13日。

江华：《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57年12月9日。

特急电报：（就主动增加从浙江上调粮食事）《江华致先念同志并报主席、中央、上海局》，1959年4月21日20时。

《省委转发省委办公厅关于部分地区粮食紧张情况的两个材料》，1959年5月25日。

《省委批转省粮食厅党组关于1959年全省第一次粮食会议情况的报告》，1959年7月1日。

温州专区《卫生工作简报》，1959年8月18日。

《全省各地向省委的求救报告》，1959年5月至8月。

《为争取1960年全省粮油工作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1960年2月12日。

江华：《高速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灵魂 - 向全省公社党委书记的报告》，1960年3月3日下午。

《江华同志在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3月21日。

浙江省卫生厅：《关于青紫病的调查报告》，1960年4月6日。

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当前整顿食堂和安排人民生活情况资料》（供领导同志参考），1960年5月9日。

林乎加：《全省改造落后队现场会上的讲话》，1960年5月10日，于黄岩。

吴兴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浮肿病的通报》，1960年5月20日。

嘉兴县卫生局：《浮肿病防治工作总结》，1960年6月4日。

《部分地方发生食堂停伙》，载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编《情况资

料》3期，1961年1月13日。

《大里生产队大搞代食品》载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情况资料》第3期，1961年1月13日。

《黎明生产队基层组织整顿情况》，载浙江省委农工部办公室编《情况资料》第10期，1961年2月9日。

曾绍文厅长在全国粮食局长会上的报告：《关于粮食工作问题》，1961年7月16日。

浙江省委办公厅：《重点粮产县粮食情况调查》（之一到之十七），1961年。

省委办公厅：《全省一平二调情况和兑现情况》，1961年3月，J007-13-20。

省委黄岩县路桥公社调查组：《利丰大队群众生活状况调查资料（草稿）》1961年4月23日。

衢县工作组，《炉头生产大队基本情况资料》，1961年5月4日。

中共浙江省委黄岩县路桥公社调查组，《两个生产大队的对比》，1961年5月18日。

中共浙江省委工作组：《黄岩县路桥镇农村工作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初稿）》，1961年5月28日。

省委农工部分配处：《当前农村生活安排情况》，1961年12月15日，载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情况资料》第35期，1961年12月18日。

《粮食会议文件》，全省粮食会议秘书处印，1962年5月14日。

云南省：

《思茅地委、思茅军分区对今春以来外逃外迁问题的指示》，1954年4月14日。

云南省纪委：《关于墨江县坝溜、龙潭二区1952年春荒饿死人及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及有关干部处理意见的报告》，1955年5月3日。

《思茅地委关于领导群众克服粮荒的紧急指示》，1956年8月4日。

《思茅地委关于解决当前边疆粮荒问题的第二次紧急指示》1956年8月20日。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富宁县瑶族骚乱事件的报告》，1956年9月25日。

中共文山地委：《关于富宁县民族骚乱事件的报告》，1956年10月7日。

《关于归化寺问题的报告》，1956年12月。

临沧地委：《关于临沧县1956年死人情况的报告》，1957年7月22日。

《云南省委关于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斗争的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7年9月12日。

《省委批转农村工作部关于晋宁县认真处理拆房以后社员安置的报告》，1958年3月27日。

《丽江地委和军分区对碧江武装部电话请示要派部队帮助劝阻边民外逃的批示》, 1958年4月16日22时。

《于一川同志的总结性发言 - 在4月20日省委扩大会上（记录稿）》，1958年4月22日。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曲靖等部分地区发生肿病情况的报告》，1958年7月27日。

省委农村工作部：《陆良县茶花乡肿病死人情况调查》，1958年8月22日。

刘卓甫：《关于曲靖专区肿病情况报告》，1958年9月3日。

《地委书记会议资料之二》（富源县、曲靖县、马龙县饥饿情况），1958年9月。

省委检查组：《关于罗平县肿病情况的调查报告》，1958年9月2日。

马力、贾兴福给省监委的信，1958年9月16日。

孙雨亭：《从和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斗争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党的战斗力——在云南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1958年9月25日。

丽江地委：《关于开展土法制造滚珠轴承的报告》，1958年10月。

大理地委：《关于当前工具改革的情况报告》，1958年10月3日，

《陆良县肿病死人情况 - 陆良县委书记孔祥柱同志汇报纪要》，1958年11月14日。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1958年11月18日。

中共云南省委检查组：《检查陆良茶花乡情况简报》，1958年11月20日。

《地委书记会议讨论汇报》 1958年11月17日，11月21日。

省委书记处书记马继孔的讲话，1958年12月2日。

《昭通地委关于昭鲁二县结合部暴乱事件的情况报告》，1958年12月2日。

中共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1958年12月6日。

省委检查团昆明分团曲靖组报告：《关于曲靖专区、富源师宗等县钢铁铜焦放卫星的情况报告》，1958年12月14日。

《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报告》，1958年12月29日。

泸西检查组：《检查前泸西县违法乱纪问题的总结报告》，1959年2月28日。

省委办公厅：《全省各地肿病情况综合》，1959年7月30日。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届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关于坚决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以实际行动保卫党的总路线，力争提前和超额完成

1959年生产任务的决议》，1959年9月24日。

《史怀壁同志电话汇报澜沧等地粮食和人员外逃情况记录》，1960年4月26日。

中共省委工作组：《关于砚山县忽视群众生活实行乱斗争的报告》，1960年6月8日。

楚雄地委：《关于肿病情况向省委的报告》1960年7月29日。

思茅地委：《关于澜沧县肿病死人问题的检讨报告》1960年9月3日。

《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案件的调查报告》，1960年11月30日。

《谢富治同志向总理、富春汇报云南宣威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及粮食情况》，1960年12月2日。

中共楚雄地委：《关于楚雄县苍岭公社桃园管理区问题向省委的报告》，1960年12月9日。

《文山地区马关、西畴闹粮问题的两个汇报》, 1961年6月26日。

河北省：

解学恭：《关于浮肿病调查报告》，1959年1月22日，河北省委1月24日批转。

河北省委、省人委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告：《关于召开1959年农产品购销合同会议的报告》, 1959年3月14日，

河北省委：《关于当前粮食情况的报告》，1959年4月16日。

省委监委会1960年1月26日致省委的信。

中共张家口市委：《关于反右倾整风运动和农村整风运动的综合报告》，1960年1月16日

中共唐山市委：《关于前段农村整风整社情况和今后意见向省委的报告》，1960年，1月21日。

河北省委：《关于防治浮肿病情况的报告》，1960年2月18日。

省防毒工作检查组：《关于涿县、宁晋、唐县中毒事件检查情况的报告》，1960年5月15日。

中共邯郸市委：《关于32个农村三反试点基本总结和下段安排意见向省委的报告》，1960年6月2日，中共邯郸市委文件，[60]141号。

中办安国工作组：《关于安国县伍仁桥公社党委和伍仁村支部控制群众退出食堂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7月18日。

河北省公安厅党组：《关于当前中毒事故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60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1960年9月21日转发。

中共河北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某些农村继续发生浮肿病情况的报告》，1960年10月13日。中共河北省监察委员会报告，总号[60]48号。

《河北省委关于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的紧急通知》，1960年11月8日。

河北省委办公厅翻印农村粮食、人民生活、死人、整风整社的调查材料，1960年。

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的密电：《关于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1960年12月28日。

《河北日报》张家口记者组：《蔚县情况》，1961年1月。

河北省农业厅党组：《关于瞎指挥风的初步检查（讨论稿）》，1961年1月17日。

封云亭致裴书记，1961年1月7日。

胡开明致刘子厚的信，1961年1月21日。

河北省卫生厅党组：《关于立即开展治病防病运动的报告》，1961年8月12日，[61]258号。

省委办公厅：《各地委对省委电话会议精神研究讨论的情况和意见》，1961年9月17日。

刘子厚：《关于务必抓紧征购工作的紧急电话》，1961年10月6日。

省委关于当前对敌斗争情况，全省政法工作会议，1961年。

省委书记处会议301次会议材料，1961年。

河北省委办公厅：《各地区粮食工作情况第四次简报》，1961年10月14日。

各地市委关于铁路发生偷抢粮、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

省常委第一届132次会议关于粮食安排问题，1961年。

中央负责人信件和毛主席的重要批示，1961年。

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中央负责人的信件，1961年。

省农业厅委工作组：《沧州地区十个生产大队农业现状调查的综合情况》，1962年7月1日。

《中共河北省委整风整社办公室、监察委员会关于1960年冬到1961年春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组织处理工作总结》，1962年4月28日。

中共河北省委整风整社办公室、监察委员会：《关于1960年冬到1961年春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组织处理工作总结》，1962年4月28日。

中央有关部委：

粮食部　　《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委给粮食部下达的计划指标》，1954年6月15日。

粮食部、财委粮食组：《全国粮食库存逐月减少情况》，1954年7月。

章乃器：《五年来的粮食工作情况—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4年，9月25日。

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1950－1953年全国粮食征购与产量的比较》，1954年。

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1953年城乡需要商品粮供应的人口和数量（贸易粮）》，1954年。

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1955年4月

22日。

《粮食部拟提供李先念副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材料》，1955年。

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1956年。

粮食部：《关于饲料用粮的供应报规定》，1957年5月17日。

《全国粮食会议文件》，1957年7月。

《1957年第二次粮食会议文件》，1957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关于粮食购销问题的报告》，1957年8月。

《湘西自治州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辩论要点》，《益阳县通过大辩论超额完成了早稻征购任务》，1957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市镇供应简报》，1957年11月。

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年。

粮食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关于安排薯类生产和销售的报告》，1958年3月7日。

《粮食部党组向中央的报告》（58）粮发20号，1958年5月20日。

《粮食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1958年8月15日。

粮食部党组：《当前粮食购、销、调运情况汇报》，1958年10月4日。

沙千里：《反右倾，鼓干劲，掀起红旗运动新高潮》，1959年11月2日。

粮食部党组：《关于当前粮食情况和今后粮食工作意见》，1959年11月27日。

1959年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资料。

《中央批转粮食部“关于今后三年内把国家粮食库存增加到一千亿斤

的报告》，1960年1月26日。

粮食部计划司统计数字，1960年7月5日统计。

李井泉就四川省粮食征购数问题给李先念副总理的信，1960年8月5日。

牛佩琮、陈国栋：《关于粮食情况的紧急报告》，1960年7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粮食问题汇报提纲》，1961年5月7日。

《陈国栋同志给李先念副总理的报告》，1962年3月17日。

粮食部办公厅编《粮食工作简报》第28期，1962年8月20日。

《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简报》[第十期]，1959年1月22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1961年8月24日。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央工作组统战部小组编《情况简报》第12期，1962年8月28日

中央工作组统战部小组编《情况简报》第24期，1962年10月13日。

商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供应出口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1960年1月8日，（60）上海会议文件97。

公安部　　徐子荣：《关于镇反以来几项主要数字的统计报告》，1954年1月14日。

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彻底肃清山区、结合部、水上、落后地区漏网外逃反革命分子和流窜犯的决议》, 1958年8月16日.

《广西省镇压反革命情况及目前存在的思想麻痹问题》，1951年5月15日，见广西公安厅编：《情况与资料》1950－1951年第6期。

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1961年2月1日。

二、 官方文件

《中共中央转发云南省委关于边疆六个县区第一批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土地改革的初步总结》，1955年12月10日。

《中央转发中央办公厅综合的“关于十六省区缺粮、断粮、闹粮情况和各地党委提出的解决措施的简报”》，1958年4月25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公报》，1959年8月26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1958年8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公报》，1958年8月31日。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公报》，1958年12月17日。

《中共中央批转“山东省委、省人委关于馆陶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1959年1月22日。

《党内通信》（即毛泽东给6级干部的信），1959年4月29日。

《中共中央关于粮食工作的指示》，1959年7月31日，1959年我国国财贸书记会议参考文件之一。

《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1959年8月7日。

《中央转发一些省、市、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材料》，1959年9月8日。

《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1959年10月13日。

《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次会议情况的报告”》，1959年10月13日。

《中央同意青海省委关于以张国声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1959年10月14日。

《中央转批浙江省委“关于温州、金华地区少数地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违犯政策情况的报告》，1959年12月21日。

《中央批准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1959年11月27日。

《中央批转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整理的“老干部为什么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材料》。

《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在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中犯错误同志的处理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原则》，1960年1月15日。

《中共中央批转李先念关于立即突击调运粮油棉和成立调运指挥部的报告》，1960年2月21日。

中央办公厅整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1960年3月18日。

《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1960年3月6日。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所规定》，1960年3月7日。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指示》，1960年3月9日。

《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1960年3月18日

《中央批转上海市委关于里弄工作情况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打算的报告》，1960年4月18日。

《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

《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21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1960年5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1960年8月10日。

《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1960年9月7日。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1960年11月3日。

《中央关于转发齐燕铭同志关于对在京迴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的报告的指示》，1960年11月9日。

中共中央转发河北省委批转的《保定市委关于发动群众开好吃饭大会的报告》，1960年11月26日。

中央批转全国总工会《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1960年6月8日。

《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1960年12月8日。

中共中央转发《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1961年1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1961年1月20日。

《中央批转湖北省委关于沔阳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总结报告》，1961年1月31日。

《中央关于转发河南省委、洛阳地委关于政策兑现问题的三个文件的批示》，1961年2月4日。

中共中央转发五人小组《关于调整农村劳动力和精简下放职工问题的报告》，1961年4月9日。

胡乔木等：《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1961年4月10日，《中央转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

《中央转发谷牧同志“关于迅速克服工人私自离厂现象和巩固工人队伍的意见”和贾步彬同志的信》，1961年 4 月30日。

《中央办公厅转发安徽省委关于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1961年5月3日。

《毛主席批转胡乔木同志5月8日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9日。

《阎红彦同志于弥渡县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9日。

《毛主席批转邓小平、彭真同志月10日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13日。

《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1961年6月16日经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1961年6月16日。

《中央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北京市委“关于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请示”》1961年12月17日。

《批转建筑工程部党组关于停缓建工程中存在问题的调查报告》，1962年1月6日。

《中央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1962年2月14日。

《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1962年3月18日。

《中央批转财贸办公室、统战部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情况的报告》，1962年5月9日。

《毛泽东同志关于印发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的座谈会记录的批示》，1962年7月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1962年9月27日。

中央批转《安徽省改正“责任田”情况》，1962年12月11日。

《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即桃园经验），1964年9月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中共中央西北局批转关于陕西、甘肃、新疆等省区严肃处理违反和破坏粮食政策的行为》，1960年12月19日。

《东北局关于进一步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28日。

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局关于稳定工人队伍的通知》,1961年5月16日.

三，有关省的官方文件

河北

《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召开1959年农产品购销合同会议的报告》，1959年3月14日。

《河北省委批转霸县县委关于煎茶铺公社发生浮肿病救治经过的报告》，1960年2月2日。

《河北省委批转内丘县县委善于隆尧公社重贤管理区人民生活安排情况的报告（摘要）》，1960年2月10日。

《河北省委转发省公安厅党组关于我省中毒事故的情况简报》，1960年4月29日。

《河北省委批转省委财贸部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整饬粮食纪律加强粮食管理意见的报告》，1960年9月27日。

《河北省委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搞好粮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报告》，1960年10月18日。

《河北省委关于大搞群众运动搞好粮食工作和安排好生活的报告》，1960年10月18日。

《河北省委批发石旭东同志反映邯郸市特需供应问题的意见》，1960年11月1日。

《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浮肿病情况的简报》,1960年12月17日。

《河北省委转发省卫生厅党组关于立即开展治病防病运动的报告》，1961年8月17日。

甘肃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1962年12月3日省委第三届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1965年7月5日。

《汪锋同志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961年5月9日，于临夏。

吉林

《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农村人民生活的若干问题的规定》，1959年1月7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召开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的部署的报告》1959年5月5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解决社员自留地问题的通知》1959年6月2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讨论主席指示中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思想动态的报告》1959年6月11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调整农村人民公社工资制与供给制的比例和整顿公共食堂的指示》1959年6月30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整社算帐工作的总结》1959年11月9日。

《省委批转通榆县委关于高速发展大和扭转大牲畜大量瘦弱情况的报告》，1960年4月19日。

《中共吉林省委批转通榆县委关于立即制止牲畜大量瘦弱、死亡情况的报告》，1960年4月27日。

《关于在农村中必须坚决贯彻杜绝自杀现象的通报》，1960年2月20日，中共吉林省委文件。

《中共吉林省委批转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1959年全省批捕人犯情况报告》，1960年4月4日。

《省委同意省政法组关于在解决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将批捕人犯的权限下放至县委的意见》，1960年7月18日。

《省委批转粮食厅党组“关于延吉县八道公社发生少数社员逃跑问题的情况简报》，1960年6月15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试点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28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精简职工、调整安排劳动力和压缩城市人口支援农业生产战线的意见》，1960年12月29日。

中共吉林省委转发吉林市委《关于当前浮肿病情况的报告》，1961年1月5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有些地方违反中央指示重犯“一平二调”错误的通报》1961年1月14日。

《关于粮食情况和生活安排问题给中央和东北局的报告》，1961年2月11日。

《省委转发吉林市委关于严格制止各事业、企业单位擅自占用公社耕地的紧急通报》，1961年3月26日。

《揭开假先进的盖子，拔掉真落后的根子 - 省委批转九站人民公社整风整社情况的报告》，1961年5月18日。

《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迅速抢治重型浮肿病人的紧急的通知》，1961年6月26日。

《中共吉林省委批转四平地委批转梨树县委“关于河山公社在贯彻政策中重犯一平二调错误的通报”》1961年7月15日。

《省委批转公安厅党组、民政厅党组关于坚决制止自由流动人口的意见的报告》，1961年11月13日。

《省委批转公安厅工作组关于四平收容遣送站违法乱纪情况的报告》，1961年12月25日。

《省委批转省委财贸部关于召开农村生活安排会议情况的报告》，1962年3月18日。

江苏

《中共江苏省委批转南通县委关于石港人民公社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3月30日。

《中共江苏省委批转省委办公厅和兴化县三个不同类型生产大队的调

查材料》，1960年10月9日。

云南

《省委关于富民县反击反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几个问题的通报》，1957年8月12日。

《省委关于农村整风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7年8月17日。

《云南省委关于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7年9月12日。

《省委关于在省级机关中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9年10月28日。

《省委关于粮食安排的三个调查材料的批示》，1961年1月11日。

浙江

《中共浙江省委批转黄岩县委“关于当前农村中各阶层思想情况的调查报告》，1956年3月12日。

《省委转发“建德县大洋人民公社卫星生产队实行吃饭不要钱和计划用粮的情况”和富阳县场口公社建立粮食计划管理制度的情况》，1958年12月29日。

《省委转发省委办公厅关于部分地区粮食紧张情况的两个材料》，1959年5月25日。

《省委批转省粮食厅党组关于1959年全省第一次粮食会议情况的报告》，1959年7月1日。

四川

《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荒的指示》，1959年9月2日。

《中共四川省委批转燕汉民同志转报万县市龙宝公社反右倾、鼓干劲，增产粮食，节约渡荒运动的情况报告》，1959年9月23日。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报告：《关于工矿企业职工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情况简报》1959年11月28日。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报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简报》，1959年12月18日。

《中共四川省委批转南充地委转发地委潆溪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关于潆溪公社整风整社试点中进行1961年“三包一奖”的情况报告》，1961年3月16日。

上海

《上海市委对奉贤县问题的情况报告》，1959年2月28日。

《上海市委关于市委扩大会议情况给中央的电话汇报》，1959年9月2日，

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及批示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12日。

《毛泽东成都会议上的六次讲话》，1958年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1958年3月。

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成都会议期间的讲话（四川省委办公厅记录整理），1958年4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多次讲话》，1958年5月8日，17日，18日，20日，23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多次讲话》，1958年8月17日，19日，21日上午，21日下午，30日。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6日，7日，9日，10日上午,10日下午。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多次讲话》，1958年11月21日，22日。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28日，3月1日，5日。

主席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9年2月1日下午。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

廖志高致李大章：《23日晚主席召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插话》，1960年12月25日，四川省档案馆，办公厅-241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1960年12月30日。

毛泽东：《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2日。

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

（陕西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同志传达主席、总理在中央会议上的指示。档案年代字足迹不清，从行文来年，大约是1960年底或1961年初。此件甘肃省档案馆。

毛主席听取河北省委汇报时的指示，1961年，855-6-2005。

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1958年视察河北的讲话，1958年，855-4-1271。

《毛主席在信阳的谈话》，1958年11月13日晚，河南省档案馆，11441－2。

《毛主席对新乡、洛阳、许昌、信阳四个地委书记座谈会的谈话纪录》，1959年2月27日上午。河南省档案馆，1441－2。

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

《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1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9日。

毛泽东：《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

刘少奇同志对全国妇联党组同志的谈话记录，1958年6月14日。

刘少奇同志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9年2月1日下午。

刘少奇同志在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9月27日于南京。

《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

李富春：《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1959年4月21日。

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1960年3月31日。

《彭真同志在中央元月三日召开的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59年1月3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1959年1月4日印。

谭震林在河南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7月15日。

谭震林、廖鲁言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1958年11月16日。

谭震林同志1959年1月3日在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上的讲话（四川省委办公厅记录稿）。

谭震林同志在十省市小麦座谈会上的总结，1959年2月21日，（记录稿）。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1959年2月26日印发。

《谭震林在大会上的讲话》，1960年2月12日，载《1960年2月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参考文件之17》。

谭震林在甘肃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60年5月25日下午。

谭震林在全国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1月2日。

谭震林：《开展大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1960年11月10日在全国代食品会议上的报告。《中央电话会议上李先念同志的讲话》，1959年4月19日，吉林省、江苏省、山东省、四川省档案馆都存有此件。

《中央书记处1959年10月15日电话会议上李先念同志讲话纪要》，AB1-02-510。

全国财贸会议秘书处：《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预备会上的讲话要点整理》，1959年9月10日，《全国财贸书记会议简报第1号》，AB1-02-511。

《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预备会上的讲话要点整理》，1959年9月10日，《全国财贸书记会议简报第1号》第7页

《李先念同志9月10日晚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9月10日。

李先念：《在全国粮食、商业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8月26日，180-9-79。

陶铸：《虎门公社调查报告》，人民日报，1959年2月25日。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关于镇反以来几项主要数字的统计报告》，1954年1月14日。

徐子荣同志在河南省委常发会上的讲话（谈信阳事件），1960年12月6日。

（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同志在河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谈信阳事件），1960年12月6日。

《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在河南省统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统计工作》，1958年第12期。

薛暮桥：《统计工作如何大跃进》，《统计工作》1958年第5期。

《贾启允局长在全国省市统计局长会议的讲话纪要》，江苏省档案馆：3133 - 2125

五、专著

[美]彭尼·凯恩（Kane Penny）：《1959 - 1961中国的大饥荒》，郑文鑫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美]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丁抒：《人祸》，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6年。

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英]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姜和平译，明镜出版社，2005年。

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告别饥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王耕今、杨勋、王子平编：《乡村三十年 - 凤阳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 - 1983）》，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

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

东夫：《麦苗儿青菜花黄 - 川西大跃进纪实》，网络电子版。

张大发：《金桥路漫》，定西作家协会出版，2005年。

张乐天：《告别理想 -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社，1998年。

丛进：《曲折发展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张湛彬、刘杰挥、张国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

米鸿才、李显刚主编：《中国农村合作制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年。

莫日达：《我国农业合作化发展》，统计出版社，1957年。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时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柳随年等编：《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回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郭书田：《失衡的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第一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李成瑞：《中国人口普查和结果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1983

年。

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0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

张步真：《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珠海出版社，1998年。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陈清泉、陆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

权延赤、黄丽娜：《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广州，广东方旅游出版社，1997

郭沫若：《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47年。

黎昌庶：《西洋杂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美]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 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卡尔．波普尔（Ppper，K．R）：《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F．A．Hayek）著：《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　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法]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托马斯·莫尔：《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有益且有趣的金书》，宁津度译，见《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88年。

邢贲思等：《影响世界的著名文献》政治、社会卷，新华出版社，1997年。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12月，第28页下。

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中册，北京，中国书店，精装影印本， 1985年，第121页。

刘泽华：《中国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袁伟时：《近代中国论衡》，香港Roundtab Enterise Limited出版，2006年。

孙广忠等：《中国自然灾害——献给“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活动》，北京，学术书刊出版社，1990年，第5 - 6页。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高素华主编：《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北京，气象出版社，1993年。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北京.

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进展》，海洋出版社，1998年。

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

张晓、王宏昌、邵震：《中国水旱灾害的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

魏光兴、孙昭民主编：《山东自然灾害史》，北京，地震出版社，2000年.

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美]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兴起，1949 - 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利文出版社，2005年。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联共（布）党史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

河南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风雨春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 - 1969》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法]亨利·米歇尔(Henri Michel)：《第二次世界大战》，卢佩文、刘幼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

崔济哲：《清唱》，新华出版社，2003年。

张万舒：《故乡人民的笑声》，新华出版社，1986年。

朱正主编：《1957新湖南报人》，湘新出准字（2001）第161号，2002年。

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编《大跃进中的河南水利》，出版社＃＃3，1998年。

河南省水利厅：《河南水利40年掠影》，出版社＃＃＃，＃＃＃年。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44页。

大连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室编：《病理生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62年。

武汉医学院主编：《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第20 - 21页。

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食物成份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6年12月。

六、论文、研究报告及文章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教训》，《百年潮》，1998年第12期。

冯有林、魏鹄立：《湖北当阳跑马公社的“共产主义”考》，《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

高智勇：《北京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卞悟：《公社之谜 - 农业集体化的再认识》，《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48期。

高华：《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二十一世纪》，第60期。

高华：《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48期。

高华 ：《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对一篇当代史回忆文本的解读》（修订全本），《领导者》，2006年1月号（总第12期）。

王维志手稿：《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的情况》，1981年3月7日.

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陆平：《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开放》，2003年第10期。

(此稿作者应为梁志远)。

中共镇原县委党史办公室：《“大跃进”期间的镇原冤案》，《百年潮》1999年第4期

辛平：《梦幻的天堂——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炎黄春秋》1994年第1期；

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载《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

杨闻宇：《荒唐的引洮工程》，《炎黄春秋》1993年第3期.

高化民：《对五十年代富裕中农问题的研究》，《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4期。

《北明访余英时：中国近代史讲诸问题》2007年7月27日，新世纪www.ncn.org

冯同庆：《实际有惊，但求无险》，《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5年第1期。

顾钧：《中国人初尝西餐》，《中华读书报》，2000年5月。

郭志珍、武代玲：《1959年：寿阳事件》，《沧桑》，1999年6月

何立波：《大跃进期间在河南大刮“共产风”的罪人吴芝圃》，《党史纵览》，2006年第2期。

何祖明、徐敬尧：《上虞县大旗会闹事的始末》，《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9年第1期。

黄东文：《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炎黄春秋》，2002年第9期

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第4-5合期。

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

李若建：《困难时期的精简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

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与社会控制》，《二十一世纪》第60期。

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迁移初步探讨》，《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李维民：《万毅将军在庐山会议》，《炎黄春秋》，1995年第3期。

李真真：《大跃进时的中宣部科学处—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第6期。

林强：《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再认识》，《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期。

彭建新：《60年代广东省经济调整概述》，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37页。

刘秉勋：《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百年潮》，1997年第6期。

刘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一次辞职》，《炎黄春秋》，2003年第4期。

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中共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

王思睿：《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载《书屋》2000年第4期。

交通大学研究所调查报告：《解放前洋麦进口情况》，年代：1954；180 - 2 - 54。

龙宇闻：《公共食堂积弊千日，解散一时——丰城县小港公社公共食堂追记》，《中国农业合作社史料》，1988年第4期。

罗平汉：《“三年困难时期”的知识分子》，《炎黄春秋》，2005年第4期。

马钟嶽：《大饥荒中的县委书记王永成》，《炎黄春秋》，2006年第3期。

潘祝平：《刘顺元事件与中苏关系》，《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彭建新：《60年代广东省经济调整概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乔培华：《周恩来与信阳事件》，《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权延赤：《彭德怀落难与林彪得势真相》，《炎黄春秋》，1993年第4期。

沈志华：《“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同盟的破裂》，沈志华、李丹慧个人网站。

沈志华：《关于19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沈志华：《援助与控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04年第3期。

苏林达口述，赵光整理：《我给毛主席当厨师》，网上信息。

舒倜、方辰：《定县办地方工业前后两个方针两种结果》，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18日。

田家英：《韶山大队概况》，《中国农业合作化史资料》，1990年第2期。

王静林：《历艰辛之程　踏富裕之路——泡子沿农业合作化发展史》，《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98年第2期。

王任重：《毛主席在湖北——扎记二则》，载《七一》杂志1958年第5期。

王民三：《走在钢丝般的日子里》，《中国粮食经济》，2001年第7期。

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1964年7月5日.

吴冷西：《和田家英共事的日子》，《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

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48期。

谢贵平：《安徽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

辛平：《梦幻的天堂——徐水“共产主义”试点记》，《炎黄春秋》，1994年第1期。

薛攀皋：《自然科学研究盲目听命政治的教训——荒唐的科研课题“粮食多了怎么办”》，《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

阎明复：《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

陆定一：《怀念人民的好总理 - 周恩来同志》，1979年3月6日《光明日报》。

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 - - 1962年被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义罪名的真相》，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

杨第甫：《庐山会议周小舟坚持不批彭德怀》，《炎黄春秋》，2001年第1期。

[印度]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民主的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程晓农译,《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2期。

《鱼米之乡的大逃亡——广东三年大饥荒情况》，[新观察/xgc2000.com]

俞乃蕴：《张恺帆铁骨诗魂》，《炎黄春秋》，1997年第4期。

张开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十大要闻》，《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章跃兵：《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炎黄春秋》，1995年第3期。

赵胜忠：《跃进型统计体制的形成和后果》，《二十一世纪》，第60期，1989年8月。

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

郑义：《大跃进时期农村的悲剧——江口事件梗概》，香港《争

鸣》，1993年1月号。

中共镇原县委党史办公室：《“大跃进”期间的镇原冤案》，《百年潮》，1999年第4期。

周承恩：《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空想论》，《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

周德民：《宁乡“五风”回忆片断》，《长沙文史资料》第七辑，1988年。

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1962年被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义罪名的真相》，《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

李真真：《大跃进时的中宣部科学处---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

原载《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23-30页。

穆青：《挥泪送冷西》，人民日报，2002年8月13日。

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第4版。

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载《知识与力量》8、9期合刊，1959年9月25日。

薛攀皋：《自然科学研究盲目听命政治的教训——荒唐的科研课题“粮食多了怎么办”》，载《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

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 1998年8月号第48期

晓凌、柳铮：《胡开明并非“胡”开明》，《炎黄春秋》杂志1991年第2期

胡开明：《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1962年，7月30日。

薛暮桥：《苦战三月，改变全国统计工作面貌，实现全国统计工作大跃进！》，《统计工作》，1958年第14期，

杨明伟：《“大跃进”席卷神州　周恩来险些辞职》，《炎黄春秋》

2000年第1期。

刘秉勋：《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百年潮》1997年第6期。

冯有林、魏鹄立：《湖北当阳跑马公社的“共产主义”考》，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92 - 94页。

吴冷西：《和田家英共事的日子》，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

七、回忆录：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李锐：《大跃进析历记》（上、下），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6年。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 - 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耿飚：《耿飚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王力：《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未刊本，2004年。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李磊：《悠悠岁月》，1999年10月自费印刷本，第149页。

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

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萧李廖事件”》，打印稿二稿。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阿尔巴尼亚]雷兹·马利列（R.Malile）：《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们》，王洪起译，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

余德鸿：《关于信阳事件的忆述》2001年9月17日，打印稿。

陆平：《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开放》，2003年第10期。

（此文作者应为梁志远）

梁志远：《亳县农业卫星经验官修记》，《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梁志远：，《亳县统购统销反右的后果严重》《炎黄春秋》2003年第7期。

梁志远：，《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大、人委、政协》《炎黄春秋》2006年第3期。

梁志远：，《沉痛的历史教训——亳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实录》《春秋文存》，（炎黄春秋内部版）。

杨金声：《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

惠文：《困难时期农村整社记实》，观察网：大饥荒档案。

周德民：《宁乡“五风”回忆片断》，载《长沙文史资料》第七辑，1988年12月。

黄东文：《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炎黄春秋》2002年第9期

段君毅：《深切怀念张北华同志》，《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2日

张开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十大要闻》，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苏林达口述，赵光整理：《我给毛主席当厨师》。

范睦：《身在天府写文章》，新华社离退休干部局编：《老年生活》，2006年第4期。

八、资料汇编：

《当代中国》从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山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四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云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安徽》，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当代云南编写组编：《当代云南大事纪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年。

丁伟志、甘棠寿主编：《中国国情丛书·静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

浙江省统计局编：《浙江省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

安徽省统计局：《安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江苏省统计局编：《江苏省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

云南省统计局编：《云南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1960年全国大中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全国总工会党组城市人民公社工作办公室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整理），1961年6月3日印。

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科学出版社，1992年。

《河北党史资料》（内部资料）第15辑，1994年11月。

《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989年。

张雄龙、李子和主编：《中国国情丛书·镇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宁夏文史资料》第21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专辑，1991年第1期（总81期）。

宁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1926．11——1995．12》，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江地区历史大事记》，成都出版社，1995年。

云南省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室、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农业合作制史料重要文件汇编》（1952－1962），云南新闻出版局许可证130号（内部发行）。

云南农业合作化史编辑室、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编：《云南省农业合作制史料:历史资料选编》（内部发行）云南省新闻出版局许可证130号。

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河北省报刊登记证第1169号，自1986年到1998年各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

中国社会调查所：《中国国情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84页。

邱石编：《共和国轶事》第二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毛泽东生活档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

黄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鲁彤、冯来刚：《刘少奇在建国后的二十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新华社国内资料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年。

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公安部三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1987》，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

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

潘治富主编：《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苏润余主编：《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谭崇台主编：《中国人口·湖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王明远主编：《中国人口·河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王嗣均主编：《中国人口·浙江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吴玉林主编：《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

朱云成主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邹启宇、苗文俊主编：《中国人口·云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

胡焕庸主编：《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李慕真、仇为之主编：《中国人口·北京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郑玉林主编：《中国人口·安徽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曹明国主编：《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杜闻贞、顾纪瑞主编：《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1987年。

全国各省（除西藏、台湾、新疆、香港、澳门以外）的1956－1964年间每一年的总人口数、出生率、死亡率，取自《中国人口》各省分册，此处不再详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国经济年鉴编撰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80）》，经济管理杂志社，1980年。

中国经济年鉴编撰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81）》，经济管理杂志社，1981年。

中国经济年鉴编撰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82）》（海外版），经济管理杂志社，1982年。

中国经济年鉴编撰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83）》，经济管理杂志社，1983年。

中国经济年鉴编撰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88）》，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1961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会谈的新闻公报》，1961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罗隆基、龙云、于学忠、蔡廷楷、章伯钧、王家桢、周一志等民主人士在大饥荒年代的批评言论，1959年7月19日毛泽东批印作为庐山会议的反面材料。

九、地方志

《阿坝州志》，民族出版社，1994年。

《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

《安西县志》，知识出版社，1992年。

《百色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保康县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1年。

《常德地区志·粮油贸易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潮州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崇庆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楚雄彝族自治州志》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德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垫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东安志》，？？，1981年。

《丰都县志》，四川科技出版社，1991年。

《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

《福建省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

《甘南州志》，民族出版社，1999年。

《甘肃省志（第二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广东省志·公安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贵州省志·粮食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海西州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河北省志》第71卷《公安志》，中华书局，1993年。

《河南省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鹤庆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湖南省志》第六卷《政法志·公安》，湖南出版社，1997年。

《吉林省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嘉裕关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

《剑河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建水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

《溧水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

《岷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泾川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

《雷山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黎平县志》，巴蜀书社，1989年。

《连南瑶族自治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连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民勤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

《牟定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南华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郫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齐齐哈尔市志稿》，内部印行，1994年。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公安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青海省志·公安志》，黄山书社，1994年。

《青海省志·军事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荣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邵武市志》，群众出版社，1993年。

《石柱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

四川省公安厅编：《四川省公安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

《思茅地区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

《天长县志》，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通海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通渭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

《翁源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浠水县志》，中国文史出版，1992年。

《无为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岳西县志》，黄山书社，1996年。

《云南省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云南省志·粮油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张掖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齐齐哈尔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齐齐哈尔市志稿》，内部印行，1994年，第124页。

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其它国家领导人的著作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

社，1972年。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

联共（布）党史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人民出版社，1964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出版信息不详。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出版信息不详。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

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批判材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内部发行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编：《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核：《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选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5年。

邓子恢文集编辑委员会编《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